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1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5 $\frac{1}{8}$ · 插頁 8 · 字数 587,000

1961 年 10 月第 1 版

196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507 定价(四) 2.50 元

目 录

第八卷說明	VII—XXV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5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14
二 普魯士邦	15—2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5—29
四 奥地利	30—36
五 維也納起义	37—40
六 柏林起义	41—45
七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46—50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1—55
九 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56—60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議會	61—64
十一 維也納起义	65—70
十二 对維也納的攻击。对維也納的背叛	71—79
十三 普魯士制宪議會。国民議會	80—84
十四 秩序的恢复。議會和議院	85—90
十五 普魯士的胜利	91—95
十六 国民議會和各邦政府	96—99
十七 起义	100—104
十八 小資产階級	105—109

十九 起义的終結	110—115
卡·馬克思。声明 1851年10月4日	116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旧譯“拿破侖第三政变記”)	117—227
一	121—131
二	132—144
三	145—160
四	161—171
五	172—190
六	191—211
七	212—227
弗·恩格斯。英国	228—240
I	228—236
II	237—24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泰晤士报”編輯的信	241—243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	244—256
一	244—248
二	249—251
三	252—256
卡·馬克思。致“科倫日报”編輯部的声明	25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259—380
一	261—284
二	285—292
三	293—297
四	298—300

五	301—316
六	317—323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324
八	325—328
九	329—336
十	337—342
十一	343—352
十二	353—359
十三	360—375
十四	376—378
十五	379—380
卡·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輝格党	381—387
卡·馬克思。宪章派	388—397
卡·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398—404
卡·馬克思。选举的結果	405—411
卡·馬克思。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侖的联盟。——帕麦斯頓	412—415
卡·馬克思。貧困和貿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416—423
卡·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24—42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編輯部的声明	429—430
卡·馬克思。致“晨报”編輯的声明	431—432
卡·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433—437
卡·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438—442
卡·馬克思。科苏特、馬志尼和路易-拿破侖	443—44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倫案件的 最后声明	445—448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倫案件	449—456
卡·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457—536
一 前言	461—466
二 迪茨的档案	467—471
三 舍尔瓦尔的密謀	472—487
四 原本記錄	488—517
五 “紅色問答书”的附函	518—520
六 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521—529
七 判決	530—536
卡·馬克思。議會。—— 11 月 26 日的表決。—— 迪斯累里的預算案	537—544
卡·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	545—546
卡·馬克思。內閣的失敗	547—552
卡·馬克思。衰老的政府。—— 联合內閣的前途及 其他	553—558
卡·馬克思。政局展望。—— 商业繁荣。—— 餓死 事件	559—568
卡·馬克思。选举。—— 財政困难。—— 薩特倫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569—576
卡·馬克思。死刑。—— 科布頓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銀行的措施	577—584
卡·馬克思。国防。—— 財政。—— 貴族的死絕。—— 政局	585—592

卡·馬克思。意大利起义。——不列顛的政策	593—598
卡·馬克思。弗兰茨-約瑟夫遇刺。——米兰起义。 ——不列顛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說。—— 拿破侖的遺囑	599—608
卡·馬克思。議會辯論。——僧侶和爭取十小时工作 日的斗爭。——餓死	609—615
卡·馬克思。強迫移民。——科苏特和馬志尼。—— 流亡者問題。——英国选举中的賄賂行为。——科 布頓先生	616—623
卡·馬克思。科苏特和馬志尼。——普魯士政府的詭 計。——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通商条約。——“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	624—631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	635—641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642—643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屬的呼吁书	644—646
注釋	649—71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11—728
人名索引	729—772
期刊索引	773—776
譯后記	777

插 图

載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論文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原版的一部分	92—93
最先刊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杂志 的扉頁	119
載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一文的“寄語人民”杂志的扉頁	253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手稿的一頁	336—337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巴塞尔第一版 的扉頁	459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 年波士頓 版的扉頁	523
載有卡·馬克思的“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人民 报”原版的一部分	570—571

第八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期間所写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进一步从理論上总结 1848—1849 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經驗、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論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識，并使他們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論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馬克思在 1848 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論证科学共产主义，在 1848—1849 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則把經濟学說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 年底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馬克思希望很快就結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沒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計劃。这不仅由于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絲不苟的認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現的新的資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異的事实和材料。从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筆記可以看出，除了

研究經濟科学本身而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許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經濟学时使他感到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馬克思对任何科学領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軍事科学和軍事学术史。由于1848—1849年革命斗爭的需要，恩格斯当时已經从事于軍事問題，尤其是武装起义問題的研究。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着手对軍事进行系統而認真的研究。“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6—577頁）一文手稿及本卷所載的“英国”一文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經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認識到武装斗爭問題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是促使他研究軍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时，恩格斯除了研究軍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語言及語言学問題。恩格斯精通許多种欧洲語言，1850年12月，他又着手研究俄罗斯語言及其他斯拉夫系語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語言是同研究該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結合起来进行的。恩格斯研究語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及行将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論研究和組織无产階級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党的政治工作結合在一起。这一时期，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同維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爭达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这个宗派集团在1850年9月时就已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分裂。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間的傾軋以及他們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計劃，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階級政党的思想原則，論证了无产階級政党在已經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停止写政論文章。在好几年中，他們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語人民”和“人民报”上著文捍卫对于重大的政治問題的无产階級观点，发表对当前的重大事件的評論。从1851年秋天起，一連十多年，馬克思經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通过撰稿，馬克思得以在几乎完全沒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繼續进行战斗的政論活动，并影响社会輿論（尽管是間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階級政党。由于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馬克思的全部時間，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經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該报所写的許多篇論文和通訊是应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組論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闡明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論文是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通过“新莱茵报”这个讲坛所发表的言論的总結。通过对革命教訓的分析，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階級政党关于通过革命的道路来統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政綱的正确性。恩格斯在他的論文中清晰地描繪出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經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

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錯綜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 1848—1849 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經濟基础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分析社会的經濟基础对于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而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見本卷第 38 頁）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貫申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場上去，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軍农民的利益。这个結論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許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弗·伊·列宁在分析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而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結論。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領袖們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視、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

領袖們的“議會迷”，抨击他們迷信議會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範圍，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們“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見本卷第106頁）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階級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見本卷第82頁）弗·伊·列宁非常重视这个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時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陣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4頁）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說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見本卷第102頁），并且規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則。弗·伊·列宁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說，他指出，这些原則总结了過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訓。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問題。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魯士統治階級所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撥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責了德国資產階級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叛变立場，并論证了德国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場——支持給这些民族以独立的要求。

恩格斯的著作也談到了当时作为奥地利帝国組成部分的斯拉

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問題。大家知道,在1848—1849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年6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得以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繩来看待民族問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們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35頁)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論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93—207頁和第322—342頁),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錯誤論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們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結論,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經形成的关于弱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是集中,是大国的形成,因而一定会导致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

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領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即大国的形成这一趋势，但他沒有考虑到另一种趋势——弱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爭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以及他們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組織的願望。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們的觉悟的提高和組織性的加强，弱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綫。历史已經证明，过去是奥地利帝国組成部分的斯拉夫弱小民族，不仅有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組織，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創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載的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一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論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論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內西的話來說，馬克思的这一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維納利斯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 107 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說是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125 頁）这一著作的繼續。如同在前一本著作中一样，馬克思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規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階級斗争的理論作为利器来闡明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的。

由于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辯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經典性的分析，仔細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階級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闡

明了1851年12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活的历史的理解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21頁）

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场上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他们的活动的隐蔽的动因。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他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馬克思预先警告说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像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这个阶级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也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見本卷第152頁）

对于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释，把整个问题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因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释相反，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事件的以前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认为

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資產階級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是經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这次政变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是慑于“紅色怪影”而向波拿巴派陰謀家节节让步的資產階級政党的怯懦而动搖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規律的結果。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紀末叶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紀中叶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領導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經这样开起倒車来了。”（見本卷第 145—146 頁）馬克思的这种思想說明了在資產階級已經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而无产階級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撓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別明显地表現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不穩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創造了条件。

馬克思特別着重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质，指出它是虛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馬克思說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廢除自由”。（見本卷第 135 頁）

馬克思闡明了在法国建立起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評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各个階級之間看風轉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蠱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便掩飾它的維護上层剝削分子的利益的行为。馬克思揭露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的資產階級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統治手段，指出資產階級为了保持剝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給了最狂妄无耻的冒險家，听任实行軍閥式的血腥鎮压，利用罪犯，

采取詐騙、賄賂、露骨的煽動以及其他種種卑鄙醜惡的手段。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這些令人厭惡的特征，有先見之明地預言，被深刻的內部矛盾震撼着的復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會遭到滅亡。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很注意法國的農民和他們對波拿巴政變的態度。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農民中的鼓動是有成績的，同時也着重指出，充當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這部分農民所以擁護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們政治上的落后和閉塞，由于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絕，由于彼此隔離的分散的小農經濟的生活條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淺。把農民看做不過是勒索捐稅的對象的資產階級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所制定的政策，使農民厭棄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促使他們這樣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農民私有者眷戀自己的小塊土地，把拿破侖王朝當作自己的傳統的庇護者。馬克思着重指出農民的两面性，他寫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見本卷第218頁）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得出結論說，隨着小農經濟的破產，隨着高利貸資本家對它的盤剝，將有愈來愈多的農民群眾擺脫“拿破侖觀念”的腐蝕。農民的理智，他們的被正確理解的利益，他們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發展，——這一切必然會使農民同工人階級採取一致的行動。馬克思寫道：“……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見本卷第221頁）

馬克思的這一結論是他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就已表述過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农聯盟這一思想的發展。從1848—1849年

革命战斗的全部經驗中得出来的这个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論证。

关于資產階級革命和无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差別这一天才的思想，是馬克思这个著作中所做的重要的理論概括之一。无產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在于它的宏偉的任务：它要彻底摧毁現存制度，把現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資產階級革命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產階級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它經常批評自己，从来不滿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錯誤并勇于改正錯誤，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產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別重大的理論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里，馬克思根据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結論，丰富了他关于国家，关于无產階級专政的学說。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資產階級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結論說：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沒有动搖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軍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鎮压被剝削階級。“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毀坏。”（見本卷第216頁）无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剝削性的鎮压群众的工具。馬克思认为无產階級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弗·伊·列宁写道：“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該书中，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是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

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3 頁）

弗·伊·列宁着重指出，1848—1851 年革命的历史經驗是馬克思这一重要的結論的基础。“馬克思的学說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4 頁）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在內容上是和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銜接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起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駁斥了想把政变的責任推到法国无产階級身上去的資產階級作家和新聞記者。恩格斯一方面指出，由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在 1848 年 6 月遭到失敗的工人階級，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沒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着重指出，无产階級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不調和的态度，他們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者生前沒有发表，这是一部抨击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首先是这一派的德国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他們还在 1848 年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資產階級流派的思想 and 策略。他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階級思想立場和策略立場的独立性和純洁性，使它們不受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和整个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應該說是对那些拼命

誣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們的一个直接的反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是出色地运用各种政治諷刺的写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丑恶面——写成的，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平庸和狭隘，他们所固有的在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性，小资产阶级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他们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和無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們的流亡生活的紗幕，描绘了在原則性爭論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謂爭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斥責各种泛泛空談、用革命的詞句蠱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爭权夺利的場所的现象。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國內进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們把偉大的革命事业貶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結論。

由于在德国許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魯士政府策划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在1851—1852年的好几个月中，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魯士政府和警察当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許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科倫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細密

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階級的代表，反对它們卑鄙地迫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旧是一部具有很大的揭发力的文献。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倫被告的辯护人，而且是控訴人。他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組織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譴責了整个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魯士国家体系。

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魯士司法当局的偏頗不公，資產階級的“公正裁判”的階級性。作为被告站在資產階級法庭上的革命无产階級手无寸铁，因此被告是事先就被定了罪的。科倫案件以及其他案件都清楚地說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階級的等級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資產階級良心的寬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見本卷第 536 頁）

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駁了加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所謂图謀不軌的这种莫須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險主义的密謀的策略是同組織无产階級政党和培养无产階級階級意識的真正任务不相容的。馬克思以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的結果是脱离群众，給工人运动带来損害，并为警察当局的奸細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論和主观唯心主义偷換唯物主义世界观，把所希望所想像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現實条件。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馬克思发言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以便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冒險主义立場，他發揮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階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

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国际冲突。”（見本卷第 465 頁）

在科倫案件以及由此而来对各地无产階級組織的破坏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不可能繼續存在。1852年11月，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同盟宣布解散。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作为无产階級政党的萌芽，作为第一个无产階級革命者的組織而載入史册的，这个組織的綱領性文献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同盟解散后，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以其他方式繼續进行党的活动，因結无产階級的队伍，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所写的許多論文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些論文的主要題目是論述英国的經濟和政治状况。英国的經濟給馬克思研究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材料。馬克思在他写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最初几篇論文中，就已通过英国的例子指出了一系列的資本主义經濟規律的作用，揭示了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证明了經濟危机的必然性。馬克思揭穿了资产階級的庸俗經濟学者的虛假的乐观主义，他着重指出，当时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出現的活跃是暫时的現象，它不能阻止劳动群众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不能阻止失业和貧困的加剧。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馬志尼。——流亡者問題。——英国选举中的賄賂行为。——科布頓先生”这篇論文中，馬克思論述了人口过剩問題。馬克思指出，如果說在古代人口过剩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而引起的，那末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飢餓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見本卷第 619 頁）馬克思证明說：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劳动者的受难史，要結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着他們的力量。

“选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論文。馬克思在这篇論文中指出了英国資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大地主殘酷地剝夺农民并把他們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如果說把哪一种財產称为盜竊更确切的話，那末不列顛貴族的財產就是名副其实的盜竊。掠奪教會的財產，掠奪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詐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財產变为私人財產，——这就是不列顛貴族占有領地的法律根据。”（見本卷第 575 頁）这篇論文中所收集的关于薩特倫德家族发财致富的历史材料，以及馬克思在“論壇报”上发表的其他几篇論文中的材料，后来都被馬克思利用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在“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銀行的措施”这篇論文中，也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指出了像犯罪行为增长这种現象的社会原因。他揭露了資產階級懲罰制度的野蛮，并批判了为这种制度辯护的資產階級的哲学法律理論。說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懲罰理論时，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贊同了現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許多情况下也是如此。”（見本卷第 579 頁）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证明說，消灭犯罪行为的根本手段，就是消灭必然产生犯罪行为的資產階級社会本身。

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結果”等論文中，全面地論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資產階級貴族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他指出英国議會和剝夺大多数人民选举权的选举制度

的反民主的性质，清楚地描繪出选举中的賄賂和恐吓行为。在“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內閣的失敗”、“衰老的政府。——联合內閣的前途及其他”这几篇論文中，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托利党的得比-迪斯累里內閣和 1852 年底接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內閣的反动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土地貴族寡头集团和資產階級上层独攬政权的意图，他們除了向工业資產階級作些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外，竭力阻撓国家制度方面的任何进步的改革。馬克思在他一系列的通訊中指出了英国教会的反动作用。

馬克思的“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輝格党”、“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等这組論文，道破了英国傳統的两党制，指出这个制度不过是由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和輝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輪流执政。馬克思指明托利党是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輝格党是資產階級的貴族代表。馬克思一方面指出資產階級貴族寡头的那些旧政党已开始分解，同时指出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即自由貿易派在反对資產階級貴族寡头方面的温和和不彻底性。他揭穿了自由貿易派政策的本质，即“力图剝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維護他們自己的特殊的階級利益”。（見本卷第 591 頁）馬克思着重指出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害怕工人階級，随时准备同貴族妥協，他写道：他們“宁願同垂死的对手勾結，也不願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見本卷第 390 頁）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人民的大多数，即无產階級和其他劳动階層，是同英国統治階級的各个集团相对立的。馬克思在他的論文中，对英国工人起来維護自己經濟利益的一切較为重大的事实都作了仔細的分析，而对英国无產階級政治积极性的每一个表現則予以特別的注意。他竭力支持以厄內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

階級的優秀代表人物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重新鼓吹憲章運動的活動。在“憲章派”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指出了憲章派提出的使英國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綱領的意義，這個綱領的中心要點就是要求普選權。這篇論文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認為暴力革命是在大陸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認為當時條件下的英國是一個例外。馬克思和恩格斯考慮到英國的特點——當時英國不存在發達的軍事官僚機構，同時英國在歐洲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認為英國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的、議會的途徑取得政權。他們認為實現這個可能性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提高英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積極性，實行普選權和徹底改革議會制度。

馬克思在為“論壇報”寫的文章中，對大陸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作了闡明。馬克思對1853年2月反抗奧地利統治的米蘭起義所作的評價，是值得注意的。馬克思從這次起義中看到即將來臨的新的革命危機的徵兆，對參加起義的無產者的英雄主義給了應有的評價，同時也斥責了這次“即興的革命”的鼓動者馬志尼及其一伙人的密謀性策略。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時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製造出來”。（見本卷第601頁）他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流亡者的領袖，民族運動有被反革命的波拿巴主義集團利用的危險。馬克思證明，指望路易·波拿巴幫助被壓迫民族是決不可靠的，他忠告意大利愛國的革命者要更密切地聯繫人民，首先是聯繫無產階級和農民，因為“甚至在反抗異族人的專制政治的民族起義中，階級差別這種東西也起着作用，在我們這個時代不能期待上層階級的革命運動”。（見本卷第625頁）

在本卷附錄中有1850年9月15日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會議記

录。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見本卷第 465—466 頁）一文中摘引了这个記錄。这个記錄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內部的冒險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曾不遺余力地維護同盟的团结，而同盟之所以分裂，其过在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在附录中还刊載了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两个呼吁书。这两个呼吁书包括了馬克思代表科倫案件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草拟的、簡短的告在美国的德国工人书。这两个呼吁书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发表在美国民主派的报刊上。

* * *

本卷所发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沒有編入全集的第一版，这篇著作于 1930 年刊載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五册。“关于最近的科倫案件的最后声明”以及載于附录中的文件系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1年8月—1853年3月

弗·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¹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8 月—
1852 年 9 月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和 28 日，
11 月 6、7、12 日和 28 日，1852 年
2 月 27 日，3 月 5、15、18 日和 19
日，4 月 9、17 日和 24 日，7 月 27
日，8 月 19 日，9 月 18 日，10 月
2 日和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議員、民政委員、軍事委員、地方长官、法官、將軍、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拋到異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們在那里又組織起新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異国的”〕^①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說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嗎？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嗎？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

^① 直譯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

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①（他們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毀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問題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們又怎么迷了路而讓他們从前的領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們要向“論壇报”²的讀者說明 1848 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們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評論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連貫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們現在只限于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而如果我們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來說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轉折，使我們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許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現的爆发将指示給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們也就滿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階級的构成比任何別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經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殘余，而德国的封建貴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还保有

^① 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員。——編者注

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

这种权力。可是，自从 1815 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 1815—1830 年和 1832—1840 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⁴ 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1840—1847 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依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僕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問題，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

只是少数。如果說資產階級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階級的运动則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①的工人起义⁵。我們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經過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階級，农民階級。这个階級加上附屬於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階級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 Groß- 和 Mittelbauern [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納捐稅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間的階級來說，最自然的政治方針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結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們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經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們贖买了从前加在他們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階級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階級，他們的財產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們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們必須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許多大农場中，他們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階級的状况完全一样，他們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貧穷饥饿之中，作他們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階級——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經为他們开辟了一个充滿光輝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命对他們每个階級都有利，因此可以預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

① 即捷克。——編者注

們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見的一致，所以他們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現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們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階級的概述，已經足以說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協調和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錯綜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沒有倫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項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爭論），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許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費大量的鮮血、精力和資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結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釋。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动了。不錯，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議會⁶，却从来沒有代表过德国的統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經因此不得不組成它們自己的关税組織⁷，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門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滿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現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並沒有

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 年 9 月于伦敦

二

普魯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⁸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党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

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不大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⁹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¹⁰。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¹¹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

一切宗教信仰給予严酷的批評，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則，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們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澀的哲学語言，把作者和讀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檢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术部門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說，德国的輿論界显然已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識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階級中的大多数，漸漸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現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評德国政治进步迟緩时，任何人都不應該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問題的正确認識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識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貧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么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維也納为例，維也納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經營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論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們更是远远超过別人，但他們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別人更为无知，他們在革命中犯的錯誤也比別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对于最普通的政治問題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釋也很清楚，政治知識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錢私运政治知識到国内来的階級，尤其是利益最受現存制度侵害的階級——工商业階級所一手壟断了。因此，这些階級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繼續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們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應該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①——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沒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一切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¹²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

^①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貴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統治他那些忠順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級或階級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級或階級都有各自的特权，它們彼此之間應該用門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壘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階級或“王国的各等級”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現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丽理想 [beau idéal]。

不很了解理論問題的普魯士資產階級，过了相当一段時間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們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們却很快就看出来。新王的“辯才”剛剛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使用无数的演說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說、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資產階級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訶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輕視金錢这种十字軍后裔的最高貴的傳統是承襲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組織虽然已經相当節約，但用費依然浩繁，而国庫已經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貧困、破落而貪婪的貴族的賜贈資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稅收已不够宮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財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1820 年的法令規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議机关”的許可，任何新的公債或增稅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議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願意建立它；而即使他願意建立的話，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輿論已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經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頒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現在他們发觉自己錯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萊茵省（全普魯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滿情緒如此强烈，他們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們意見的人才，竟同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別結成了联盟。在科倫出版的“萊茵报”¹³，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說它是德国現代期刊的先声。这是 1842 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經濟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紀嗜好的最尖銳的諷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代議机关”（它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被遺忘的諾言的最后一点遺迹体現在 1820 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繼續統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討厭的法令的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議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議會是 1823 年成立的。普魯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議会的成員是：（1）上层貴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們的首脑是等級會議的当然成員；（2）騎士或下层貴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議會都是这样組織的：在每个省議會里总是以两部分貴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議會都选一个委员会，現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組成一个代表會議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債。据說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債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絕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們不能行使人民代議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侖时許下的諾

言——实行代議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會議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緒的已不只是資產階級了。一部分农民已經站到資產階級方面来；許多貴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贊成代議制的要求，因为他們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經營大农場，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計劃完全破产了；他不仅沒有得到一文錢，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議會會議，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議會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 1813 年和 1815 年的諾言，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有些議会的決議措詞頗为不恭，国王在激憤之下所作的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財政困难日漸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縮减对政府各部門的撥款，由于通过《Seehandlung》¹⁴（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賭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財政經紀人）进行欺詐交易，曾經維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增发国家紙币也起了一些作用；整个地說，財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頗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計謀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試行另一个計劃：設立一个銀行，其資本部分出自国家，部分出自私人股东，主要的管理权屬于国家，也就是說，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銀行的資金，从而繼續进行已經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詐交易。但是，很自然，沒有一个資本家願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資；于是銀行的章程必須改变，必須保证股东的財產不受国庫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計劃也失敗之后，除了发行公債以外再沒有別的办法了，当然，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資本家，他們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議机关”的允許和保证就願意出借他們的現款。于

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說，如果公債有“人民代議机关”作保，他馬上就认购，否則，他就根本不打算談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錢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議机关”已經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絕貸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議會召集到柏林，把它們組成一个統一的“联合議會”。这个議會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況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決公債和增稅，此外它不應該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見，只是諮議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討論什么問題它就討論什么問題。当然，議員們很不滿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們一再申述他們在各省議會中提出的願望；他們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們通过发行公債（仍然說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們又一次加以拒絕。

这个表決使會議很快就結束了。愈来愈憤怒的国王解散了議會，并对議員們严加申斥；但錢还是沒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資產階級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貴族和蘊积在各个下层等級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滿分子包括在內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東西。国王在联合議會開幕时的演說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賜給現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話等于白說；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現代的、反封建的代議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們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們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繼續下去，必須有一方让步，否則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資產階級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爭取城市中工人階級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

家知道，1847 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間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 1840 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間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 年以后，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 1843 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¹⁵ 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 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織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 1847 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說，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沒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貴族和上层文武官員是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貴族、工商业資产階級、各大学、各級学校的教員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員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滿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階級群众，他們虽然暫時贊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異常的方式議論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資产階級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階級則准备随后再推翻資产階級，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頑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沒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談到。

1851年9月于倫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几乎仅仅限于談到 1840 年至 1848 年間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魯士邦。現在我們則應該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他各邦。

自从 1830 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議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魯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創制宪法的君主們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維也納會議不依任何指导原則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議會統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虛有其名，但在 1830 年和 1831 年的風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險。所以它們几乎全部被廢除，僥幸保存下来的則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凱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會設想，他們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議會里被允許表明的那种摻和着可耻的諂媚的、不值錢的反对立場，能够获得什么結果。

这些小邦里比較坚决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1840 年后很快就完全放棄了他們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魯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議會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階級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魯士实行議會制度而斗争时，他們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領袖。現在，这已是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

国民議會并因他們召开单独會議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討論过一个計劃，后来，在1849年，他們把这个計劃略加修改就提交給全德国的代表。他們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魯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議會，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魯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賴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該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計劃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魯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預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預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們下面就要談到），人們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們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們普魯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滿意他們的政府，不滿意加重捐稅，不滿意剝夺他們那些虛幻的政治权利（他們在同奥地利和普魯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們的反对立場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們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間的不滿情緒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靜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經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魯士以外的別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傳的中心，这个

階級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緩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魯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¹⁶。历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例子，說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問題的討論却受到束縛的国家里，冒險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許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討論，但它們却不敢貿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羅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視為該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統，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論派¹⁷，他們公开宣称反对普魯士国王和他的寵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統主义的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們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沒有別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沒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們的真正实质。它們自称要建筑一个偉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頂下联合起来；这样它們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思想，即統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們自己中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

得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播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¹⁸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 *disjecta membra* [分散的成员] 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现,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想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 *soi-disant* [所谓的] 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¹⁹。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 1847 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

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場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 地 利

我們現在應該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之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²⁰一样。

当然,我們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題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們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們将在以后来談。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針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則),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們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們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們之中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們,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們的直接压迫者的²¹。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債,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縛。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維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債務,所

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們的很大一部分資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債。他們全都需要維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維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們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貸款，以維持他們过去已經投資的債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賴維也納的銀行家和証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資金，他当然就能心滿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資本家們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們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銀行家、証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經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潤，但这是以政府对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們絲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階級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軍隊和官僚机构，它們組織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員自成一个門第；他們的父輩是为奥皇服役的，他們的子孙也要如此。他們不屬於那在双头鷹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許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們經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們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沒有“皇室貴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輕視；他們沒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說，正是他們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員的特殊等級，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統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馴順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 *ancien régime*〔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

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現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識部門可能获得比較高深造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給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沒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違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約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縮減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稅关官員的警戒綫，还有书报檢查官的警戒綫；不經過两次三番的詳細审查，不查明它們絲毫沒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檢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 1815 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階級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沒有絲毫变化。不管階級与階級之間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統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較高的階級作为政府一切橫征暴斂的工具，使他們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級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說来，他們对于中央政府是沒有不滿或很少不滿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話，——他曾經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說：“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維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緩的、表面上看不見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工商业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階級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

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处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①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

^① 斯拉夫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秘密；奥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①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1847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

① 即捷克。——编者注

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 維也納起義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趕出巴黎，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緊接着，在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摧毀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權，使他可耻地逃亡國外。3月18日，柏林人民舉行武裝起義，經過十八小時頑強的戰鬥之後，滿意地看到國王向他們求饒乞降。同時，在德國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發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樣的勝利的騷動。如果說德國人民沒有能夠完成他們的第一次革命，那末至少他們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考察這許多次起義都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只想闡明這些起義的性質以及各個階級對這些起義所採取的立場。

維也納的革命可以說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資產階級（銀行家和證券投機商除外），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像一個人一樣同時起來反對大家所憎惡的政府，這個政府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從前贊助它的一小撮貴族和金融巨頭在它開始遭到攻擊時也都隱藏起來了。梅特涅一向使資產階級處於政治無知狀態，以致從巴黎傳來的關於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和恐怖的統治的消息以及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即將展開鬥爭的消息，他們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由於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這些消息的意義，就是以為它們是梅特涅惡意捏造的，為的是恐嚇他

們，讓他們再去服從他。而且，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而行動或者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階級利益而鬥爭。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不能設想剛剛如此熱烈地聯合起來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階級之間，會突然發生什麼矛盾。他們看到工人在所有各點上——在憲法、陪審法庭、出版自由等等問題上——都與他們一致。於是（至少在1848年3月），資產階級一心一意地贊助運動，而在另一方面，運動從最初起就使資產階級（至少在理論上）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但是，各階級的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總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這種聯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一當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動起武來。正是舊的複雜的社會機構中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階級對抗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强大發動機；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產生和迅速的成長，它們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震動時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一百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維也納革命使資產階級成為理論上的統治階級；這就是說，它從政府那里取得的讓步一定會保證它的統治，如果這些讓步能夠實際執行並且在一定時期保持有效的話。可是，事實上這一階級的統治權還遠沒有建立起來。不錯，由於國民自衛軍的建立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掌握了武器，資產階級獲得了力量和權勢；不錯，由於成立了“安全委員會”這種由資產階級占支配地位的、對誰都不負責的革命政府，資產階級取得了最高的權力。但同時一部分工人也武裝起來了，每當發生鬥爭時，他們和大学生總是承擔起鬥爭的全部重擔；約四千名裝備優良、訓練遠比國民自衛軍要好的

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願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頗不安靜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間的中間立場，以不断的騷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經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議。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錢雇用他们在公共事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項当然必須取自納稅人的腰包或維也納市的金庫。这一切自然使維也納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維也納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貴族的消費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貴族和宮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頓，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騷动自然不能对当时人們常說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靜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間的关系很快就出現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轉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內閣（尤其是宮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剛剛爭得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維也納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軍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貴族和金融巨头們已經銷声匿迹，农民則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殘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²²，也由于宮廷忙于維也納和匈牙利問題，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

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議會只好追认农民已經实际实行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說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較平定了，甚至比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他什么东西，农民所爭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倫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他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

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靜，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皇宮前討論各种新聞，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傳來、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資產階級便认为革命已經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謝恩，說他已滿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願望。可是紧接着便是軍隊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潰敗。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資產階級曾經尽力想把他們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階級，現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們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他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資產階級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們下面的階級——現在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場面的危險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險面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階級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階級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殊要求。資產階級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訂立了联盟。他們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議會中各反对派的領袖組成的內閣，为了酬答这个內閣保全王位的功績，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貴族、官僚、軍隊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澤曼先生組閣的条件。

新閣員們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們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搖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塗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險都已經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員沒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絲毫沒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責任內閣的寶貝閣員們，甚至把那些由于他們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

高潮中赶跑的官員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閣員更換而外，普魯士沒有任何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門的人員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統治者周圍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得到了暗示：應該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員，因为現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的”閣員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們一样。起义沒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現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資產阶级及其現任閣員的領袖們，很願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圍的反动的宮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內閣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內閣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給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議會，想让議會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議會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議會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間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議員。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級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議會允許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債，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議會又同意了。

內閣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現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的政党異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經把大多数工人团結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議會，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

滿意，它的較先進的一派則要求徹底建立共和國。兩派都同意承認德國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立憲派和反動派對這個議會的自主權卻懷着很大的恐懼，他們宣布說他們認為這個議會是太革命了。

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被革命暫時打斷了。運動的直接要求和環境不允許把無產階級黨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實上，當工人獨立行動的場地尚未掃清、直接的普遍的選舉制尚未建立、三十六個大小邦照舊把德國分成無數小塊的時候，無產階級黨除了注視對他們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巴黎革命運動，以及和小資產階級一同爭取那些使他們日後能夠為自身的事業進行鬥爭的權利以外，別的還能做些什麼呢？

當時無產階級黨的政治活動不同於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或所謂的真正的民主黨之處，主要只有三點：第一，對於法國的運動的評價不同，民主派攻擊巴黎的極端派，而無產階級革命者卻保護他們；第二，無產階級黨宣布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而民主派中最最激進的人也只敢把聯邦共和國作為自己渴望的對象；第三，無產階級黨在一切場合都表現了革命的勇氣和行動的決心，而這却是以小資產階級為首並主要由他們領導的黨永遠不會有的。

無產階級的或真正革命的黨只是逐漸地使工人群眾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隨在民主派之後的。但是在一定的時刻，民主派領袖們的優柔寡斷和軟弱怯懦終於把事情引到了盡頭，而現在我們可以說，過去幾年的震動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階級相當集中的地方，工人們都完全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這種影響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們犯了許多錯誤，

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們在前六篇文章里敘述了德國的革命運動，敘述到了維也納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兩次人民的偉大勝利。我們看到，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建立了立憲政府，自由主義的原則，或資產階級的原則被宣布為未來整個政策的指導方針；這兩大運動中心之間唯一顯著的區別是：普魯士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這兩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了權柄，而奧地利的資產階級受政治訓練較少，結果是自由派官僚們掌握了政權，他們宣稱自己是受資產階級的委託來執掌大權。我們又看到，原來團結一致反對舊政府的各黨派和各社會階級如何在勝利之後、甚至在鬥爭進行中四分五裂；而獨享勝利果實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如何立即轉而反對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對一切較先進的階級或黨派採取敵對態度，並且同戰敗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結成同盟。事實上，早在革命劇開演時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有依靠較激進的人民黨派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陣地，抵抗那已被擊敗但未被消滅的封建和官僚政黨；另一方面，為了對付這些較激進的群眾的衝擊，自由派資產階級又需要封建貴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沒有足夠的力量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并使一切國家機構適應於他們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內閣，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梯，從這

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 1848 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

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囔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

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

能實現的措施，通過一些誰也不感到興趣的假想的決議。而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制憲議會至少還是真正的議會，它們推翻了舊的並且任命了真正的內閣，而且至少曾一度強迫它們與之進行鬥爭的各邦君主實行它們的決議。它們也是怯懦的，它們也缺乏遠大的見識而不能作出革命的決定；它們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權交還給封建的、官僚的和軍事的專制制度。但當時它們至少還被迫討論了一些有關目前利益的實際問題，被迫同別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蘭克福的吹牛家們卻以在“夢想的空中王國”（*im Luftreich des Traums*）²³里遨遊為無上的快樂。因此，柏林和維也納制憲議會的辯論構成德國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頁，而法蘭克福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卻只能使文獻和古董收藏家感到興趣。

德國人民深深感到必須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狀態，因為這種狀態分散和抵銷了民族的集體力量，他們曾一度希望至少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會奠定一個新紀元的開端。但這群自作聰明的蠢人的幼稚行為很快就使全國人民的热情冷卻了。在簽訂馬爾摩休戰條約方面的可恥行為（1848年9月）²⁴，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來反對這個議會；他們本希望它會給民族提供一個自由的活動場所，但它卻無比怯懦，它只是使現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各種基礎恢復了它們從前的穩固。

1852年1月於倫敦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²⁵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 1848 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①，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① 即捷克森林。——编者注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

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①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②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

①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编者注

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²⁶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

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說捷克話时还有錯誤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調。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敗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談)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內繼續說非德国的語言。

1852年2月于倫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 Niemetz 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事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

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²⁷,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

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驅逐出城，并把他們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議會中的捷克、莫拉維亞、达尔馬威亞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貴族），在議會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統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貴族）在这个議會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們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們竟无耻地同驅散了他們的布拉格會議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結。他們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們在制宪議會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現在这个几乎全体議員都是斯拉夫人的議會，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軍隊驅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說，如果他們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們关进監獄。他們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結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現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毀，而这是他們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問，那也一定要引起爭端。但是，幸而沒有引起爭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連，他們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諒解一刻也沒有发生破綻。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殘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們必須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說明梅特涅的統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識的发展），1848年前六个月曾經在維也納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滿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並沒有繼續多久。

最后，还曾經为了爭夺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語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軍

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說，德国也需要它們。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經頑強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約他們也有这种权利。三月革命使它們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們。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許外国进行外交干涉，結果，尽管作了許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結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願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們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們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間不能有任何諒解和共同行动。它們使人民习惯于內战和军队镇压的場面。普魯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滿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謂 «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²⁸）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淺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維希和倫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彈下送死的时候，普魯士和奥地利的正規軍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战胜外人的功績来重新贏得人心。但是我們要再說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剛一稍稍恢复它們的自信和紀律，便掉轉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还給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軍营中接到維也納的“責任閣員們”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閣員是些什么人？他們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現在就只存在于

我的軍營中；我和我的軍隊就是奧地利；等將來我們把意大利人打敗，我們就要為皇帝奪回帝國！”老拉德茨基是對的。但維也納的沒有頭腦的“責任”閣員們卻沒有注意他。

1852年2月於倫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議會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經被社会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締結的联盟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²⁹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4月16日和5月15日）也同样被击败了³⁰。在意大利，“炮彈国王”^①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³¹。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議會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維也納，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說是人民的力量最后一次胜利的閃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轉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靜的軌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經提到，它剛剛萌芽就被普魯士的刺刀鎮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結局，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們更加团結自己

① 即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

己了。甚至在普魯士，那里一部分下級軍官在 1848 年以前十分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軍隊中引起的混亂也使这些穩健的年輕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們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紀律和絕對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貴族和官僚們現在开始看到他們的出路。空前團結的軍隊，由于在鎮压小規模起义和对外戰爭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揚，他們也很想取得法国士兵剛剛得到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軍隊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資產階級議員們的傲慢不遜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厭煩的議會辯論，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們就不談了。只需要說明一点：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者虽然在議會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沒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們普遍感到，他們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間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穩固了；因此，他們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較民主的党派討好。这种不断的搖摆使輿論對他們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趨向来看，他們的遭受輕蔑，暫時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們。

到了秋初，各政党間的关系已极其尖銳而緊張，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軍隊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軍隊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魯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許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同丹麦簽訂和約，这个和約不但把什列斯維希的德意志人交給丹麦人去蹂躪，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

革命性的原則。法蘭克福議會以兩三票的多數否決了這個和約。在這次投票之後演出了一出內閣危機的滑稽劇，而三天以後議會重新審查了自己的決議，實際上取消了這個決議而承認了和約。這種可恥的行為激起了人民的憤怒。人民築起了街壘，但法蘭克福已經調來了足夠的軍隊，經過六小時的戰鬥，起義便被鎮壓下去了。這次事件在德國其他地方（巴登、科倫）引起的類似的但是比較不重要的騷動，也同樣被鎮壓下去了。

這次前哨戰給反革命政黨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完全由人民選舉出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唯一政府——法蘭克福帝國政府，也像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一樣，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這個政府和這個議會都不得不用軍隊的刺刀來反對人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它們已名譽掃地，雖然它們以前多少還能得到一點尊敬，但這次的忘本行為和這種依賴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軍隊的作法，卻使帝國的攝政，使他的閣員們和議員們此後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擺設。我們不久就會看到，最先是奧地利，接着是普魯士，後來是各小邦，都怎樣輕蔑地對待這群無能的夢想家所發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項要求、每一次委派。

現在我們應該來談談法國六月戰鬥在德國所引起的強有力的反響，來談談對德國有決定意義的——就像巴黎無產階級的鬥爭對法國那樣——事變了。我們是指1848年10月維也納的起義和隨之而來的對維也納的攻擊。但這次鬥爭的意義十分重大，說明對這次事件的進程發生比較直接影響的種種情況需要占“論壇報”很大篇幅，因此我們不得不專門用一篇文章來加以闡述。

1852年2月於倫敦

十一

維也納起义

現在我們來談談一個有決定意義的事變，這次事變對於德國的革命意義正像巴黎的六月起義一樣，它使優勢一下子轉到了反革命政黨方面去。這次事變就是1848年10月的維也納起義。

3月13日革命勝利以後維也納各階級的地位如何，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也看到，德意志的奧地利的運動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奧地利各省的事變互相交錯在一起，以及後者如何阻礙前者。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簡短地敘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奧地利的這次最後的、最勇猛的起義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為梅特涅統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層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三月事變後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決定性影響，這是因為他們不僅利用了宮廷、軍隊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資產階級中間迅速傳播開來的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怖。他們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試探氣球，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貴族憲法和以舊日的“等級”區分為基礎的選舉法³²。由怯懦無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組成的所謂憲制內閣，5月14日竟敢直接攻擊群眾的革命組織，解散了國民自衛軍代表和大学生軍團代表的中央委員會（這個團體是專門為了監督政府並且在必要時動員人民群眾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組織的）。但這種行動激起了5月15日的起義，政府被迫承認了上述委員會，取消了憲法和選舉法，並且把全權授予由大選產

生的制宪議會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諭确认了。但是在內閣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們的“自由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軍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經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較温和的維也納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內閣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分国民自卫軍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許能够成功，但是政府連国民自卫軍也不相信，它調动了正規軍隊，于是国民自卫軍立即倒戈和大学生軍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內閣的計劃。

但是皇帝^①和他的宮廷早在5月16日就离开維也納逃到音斯布魯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倫巴第的軍隊有入侵的危險，他們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蕩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軍隊駐在附近，他們同音斯布魯克的距离在大炮的射程之內。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視，毫无危險地集結它被击潰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組織中可信賴的人們之間的联系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領袖們之間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說，反革命的宮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維也納的无能的閣員們却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議会的辯論中消耗着他們短暫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暫時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統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結合体里則是重新調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① 即斐迪南一世。——編者注

維也納的資產階級以為，在宮廷連續遭到三次失敗之後，在有了由大選產生的制憲議會以後，皇黨已經不再是一個可怕的敵人了，於是就愈來愈陷入厭倦和冷漠，老是呼喚秩序和安靜；在猛烈的動蕩和由此產生的工商業混亂之後，這個階級充滿了這樣的情緒。奧地利首都的工業，幾乎完全是生產奢侈品，而對奢侈品的需求，自從革命發生和宮廷逃亡以後，當然是大大縮小了。要求恢復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宮廷還都（這二者都被指望會帶來商業的重新繁榮），現在已成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呼聲。7月間制憲議會的召開被當作革命時代的終結而受到熱烈的歡迎。宮廷的歸來也受到同樣的歡迎；而宮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獲勝和多布爾霍夫反動內閣上台之後，感到自己已經足以抵擋住人民的浪潮，同時它認為也需要回到維也納以完成它同在議會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議員策劃的陰謀。當制憲議會討論把農民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並且免除他們為貴族作強迫勞動的法律的時候，宮廷耍了一個巧妙的手腕。8月19日，有人要皇帝去檢閱國民自衛軍，皇室、廷臣和將軍們竟相恭維這些武裝的市民，這些市民看到他們被公開承認為國家的決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來。緊接着發布了一道由內閣中唯一有聲望的閣員施瓦策先生簽署的命令，取消國家一向發給失業者的補助金。詭計成功了。工人舉行了示威；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宣稱擁護他們的閣員的命令；他們向“無政府主義者”進攻，他們像猛虎一樣撲向手無寸鐵、毫未抵抗的工人，他們在8月23日那天屠殺了許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團結和威力就這樣被摧毀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在維也納也演成了流血的搏鬥，反革命的宮廷權奸則看到，它可以進行致命打擊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阁员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①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②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普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一个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納四周的軍隊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英雄。他的軍隊迅速地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維亞、施梯里亞、上奧地利和意大利，一團一團的軍隊开往維也納，与耶拉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維也納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末就集結了六万多人，他們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圍起来，到10月30日，他們已經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籠罩着維也納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剛剛获得胜利的資產階級，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階級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了。工人們也还清楚地記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資產階級对待他們的态度，記得整个資產階級的搖擺不定的政策，因此不願意指靠他們去保卫維也納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軍事組織。热望与橫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軍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階級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說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众和領導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團。議會中殘余的德意志族議員和几个給他們的奧里繆茨的朋友作偵探的斯拉夫族議員（几个革命的波兰議員除外）是經常开会的。但是他們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時間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慣例的範圍內抵抗帝国軍隊这种无聊的辯論上。差不多全部由維也納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組成的安全委員會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許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大学生軍团的委員會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決議，但它完全沒有領導的能力。不受信任、沒有武装、也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階級，还很少解脫旧制度加于他們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他們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合于他們的政策。他們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現自己；不能指

望他們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們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們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維也納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經過整頓的奥地利軍隊，他們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們的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組織都很良好，尽管指揮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揮者。在城內却是一片充滿階級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軍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沒有領袖，沒有受过一点政治訓練，他們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語都能影响他們；他們决心战斗，但是沒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沒有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組織很差；議會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經燒着他們头上的屋頂的时候，他們还在討論一些瑣屑的理論；領導委員會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壘中充滿混乱，唯一有組織的力量是革命所創造的力量。这样一場斗争的結局如何，几乎是不問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問，那末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經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倫敦

十二

对維也納的攻击。对維也納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維也納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維也納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

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澤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候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

談。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驗的时刻他們在哪里呢？

我們已經看到，維也納人以剛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而出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們不让奥地利軍隊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願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軍隊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們这样高尚地挺身而出援助他們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維也納，用他們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維也納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責任應該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維也納——不是援助維也納議會，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員會或維也納的其他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維也納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記了維也納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應該忘記維也納是維護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維也納陷落，便沒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軍隊向匈牙利进攻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弄清匈牙利人為他們在維也納被包圍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辯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們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維也納議會或其他官方团体都拒絕向他們求援，他們必須恪守宪法立場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糾紛。关于匈牙利軍隊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样：在維也納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規軍隊，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規軍还远远沒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維也納人会合，而使奥地利軍隊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戰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戰爭中，在沒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

本規則；而且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從純粹的軍事角度來看，佩爾采爾在和維也納人會合以前是不應該停止行動的。事情當然是有些危險，但有誰打勝仗而不會冒一點危險呢？當四十萬維也納人把要開去征服一千二萬匈牙利人的軍隊吸引來攻擊他們自己的時候，難道他們就不冒一點危險嗎？在奧地利的力量集結起來以前採取的觀望態度，以及後來在施韋哈特舉行的軟弱無力的示威（結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敗），——這種軍事錯誤比堅決向維也納進軍、追擊耶拉契奇的潰散了的匪軍，招致了更大的危險。

可是，據說匈牙利人不經官方機關的同意就這樣進兵，便是侵犯德國領土，便要和法蘭克福的中央政權發生糾紛，最重要的是，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棄了合法的和立憲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據說正是他們的運動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維也納的官方機關不過是形同虛設！奮起為匈牙利而戰的難道是議會或什麼民主委員會嗎？不是維也納的人民（而且只有他們）拿起武器為匈牙利的獨立而首當其衝地作第一次戰鬥的嗎？問題不是必須支援維也納的這個或那個官方機關，所有這些機關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是會而且很快就會被推翻的；問題在於革命的高漲，在於人民運動的不斷發展，而只有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當維也納和整個德意志奧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敵人的同盟者的時候，考慮革命運動以後將採取怎樣的形式的問題，是維也納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們要問：匈牙利政府這樣堅持要取得某種所謂合法的認可，不正是追求一種頗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個明顯的徵兆嗎？這種追求雖然沒有能夠挽救匈牙利，但後來至少在英國資產階級的公眾面前倒產生了不壞的印象。

至於借口說可能和法蘭克福的德國中央政權發生衝突，這也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維也納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貿易派的滿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維也納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結局又会怎样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始終坚持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維也納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給他們爭取到的。我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們應該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規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統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現維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場了³³。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嗎？

大家知道，我們对匈牙利沒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們是维护它的；我們完全有权利說，我們的报纸——“新莱茵报”³⁴，对于在德国宣傳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闡釋了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評論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論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問題的书籍都抄襲它們，連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們甚至現在也还认

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願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①，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法兰克福議會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議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謂的中央政权，因維也納的运动而暴露了它們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們前面已經說过，这个可鄙的議會早就丧失了它的純貞，它可以說是少年老成，它已經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謊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瓏的伎倆。議會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統一滿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現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頓人的动听言詞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議員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則誠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拋棄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說，他們深信，他們做的愈少，說的愈多，他們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說他們认为他們的許多會議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們已經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問題，对于他們都是禁地，他們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們像一群东羅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驕傲而勤懇的态度（他們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懇的报酬）討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論条文，或者討論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結果的显微鏡下的实际問題。这样，議會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³⁵，議員們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議会对他們都有重大意义，而他們都相信，这个議會貢獻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們认为，誰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誰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維也納起义爆发时，这个議會曾就這個問題作了許多質問、辯論、建議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沒有一点結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員——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凱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維也納去。同这两位德国統一的游俠騎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異的冒險行为比較起来，唐·吉訶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奧德賽了。他們不敢到維也納去。文迪

施格雷茨恫吓他們，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們，內閣閣員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們。他們的公文和報告也許是法蘭克福記錄中可以在德國文獻里占一席之地的一部份；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諷刺小說，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紀念物。

國民議會的左派也派了兩個委員——弗呂貝爾先生和羅伯特·勃魯姆先生——到維也納去，以維持他們在那裡的聲望。當危機臨近的時候，勃魯姆正確地斷定，德國革命的大會戰將在這裡進行，並且毫不遲疑地決心為此而獻出自己的頭顱。弗呂貝爾却相反，他以為他的職責是保全自己，好去擔當他在法蘭克福的重要職務。勃魯姆被認為是法蘭克福議會里最善於雄辯的人才之一，他當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辯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經驗的議會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為他太喜歡德國非國教派傳教士的那種空洞的高談闊論，而他的論據既缺乏哲學的銳敏，又缺乏實際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屬於“溫和的民主派”，這是一個相當曖昧的派別，但正是這種在原則問題上的模稜兩可，受到許多人的喜愛。雖然如此，但羅伯特·勃魯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雖然已經有點脫去平民氣了），在決定性的關頭，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戰勝他的模稜兩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動搖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見解。在這種時刻，他的才幹遠遠超過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維也納便看出他的國家的命運要在這裡決定，而不是在法蘭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辯論中決定。他立刻下了決心，拋棄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揮革命軍的担子，行動異常冷靜而果斷。正是他使維也納城的陷落遲延了一個長時期，並且燒毀了多瑙河上的塔波爾橋，使該城的一面沒有受到攻擊。大家都知道，在

維也納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軍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議會虽然駭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決議，就其措詞的緩和和委婉來說，与其說是对奥地利的詛咒，不如說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議會会对它的一个議員——尤其是一个左派領袖——的被杀害表示憤怒嗎？

1852年3月于倫敦

十三

普魯士制宪議會。国民議會

維也納于11月1日陷落，同月9日柏林制宪議會被解散，這說明維也納事變怎樣立刻助長了全德國反革命黨派的气焰和力量。

关于1848年夏季普魯士的事變，不久之前我們已經叙述过了。制宪議會，或者更确切些說，“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議會”，以及它的由資產階級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較积极的成分而同宮廷勾結起来进行种种陰謀，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們承认了，或者毋宁說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們既沒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沒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們差不多只是忙于瑣碎的理论定义、純粹的形式問題和宪法的仪式問題。事实上，这个議會与其說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說是一个供議員們学习議會 *savoir vivre* [礼仪] 的学校。而且，議會中沒有一个比較稳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搖的“中間派”，这一派以它忽左忽右的搖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內閣，后来又傾复了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宮廷却把它在貴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軍隊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組織起来。在汉澤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軍官、由一切頑固的反动派組成的內閣，而这个內閣却装

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議會的要求。議會所持的变通原则是“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內閣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內閣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組織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維也納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閣員都撤了职，用以現任的內閣首相曼托伊費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了他們。于是梦中的議會才突然惊醒，意識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內閣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責令議會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議會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城鎮。但議會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將軍統率近四万大軍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軍軍官會議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議會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資產階級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障地，并从他們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們本来是想把这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間最初行动³⁶的光荣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靜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軍，它規規矩矩地繳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議會被軍隊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軍隊所驅散，而議員們却要求市民保持鎮靜。最后政府宣布把議會解散，它才通过一項決議，宣布征稅是非法的，議員們奔走全国，組織抗稅。但他們发现，他們選擇这种手段是个大錯誤。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願再拒絕納稅以取悅于一个甚至連自卫的勇气都沒有的已死的議會了。

是 1848 年 11 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經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

分軍隊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轉到議會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結局有利于議會，——这也許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問題。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計成敗地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沒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魯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領導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魯士制宪議會，不但沒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談不上了，因为它連自卫都宁肯放棄。在弗兰格尔率領四万大軍叩打柏林大門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軍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滿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門，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們欣賞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們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異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錯，如果議會和人民抵抗，也許会被击败；柏林也許会遭到炮击，也許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們立刻繳械乞降的理由。頑强奋战后的失敗是和輕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敗和10月維也納的失敗，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許，制宪議會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們虽敗犹荣，他們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險，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敗、甘受奴役的理由嗎？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陣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試其身手就

把这种障地丢棄的人，永远应该被視為叛徒。

普魯士国王解散制宪議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議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訂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議会的权力大成問題。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議院，这两个議院应该在短期內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問：当普魯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議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見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決議，譴責普魯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贊“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委員到柏林去調解內閣和議会間的糾紛，但他們遭到了他們的前任在奧里繆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議会的左派即所謂激进派，也派遣了他們的委員，这些委員在看到柏林議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績，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員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說，因为近来常看見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現，所以普魯士內閣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議員和革命的坚决捍卫者便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經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議会的完全无能。再沒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連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維也納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問

題時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存在似的，單只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個機構不過是個由一群輕信的笨伯組成的辯論俱樂部。這些人讓各邦政府把自己當作議會傀儡，拿來給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業者開心，因為政府認為暫時有必要轉移一下這一部分人的視線。這種作法需要作多久，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這個議會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個人都絲毫沒有感覺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麼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蘭克福俱樂部的舊日的成員們也還原封未動地保留着他們所特有的歷史感覺器官。

1852年3月於倫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議會和議院

奥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利用 1849 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 1848 年 10 月和 11 月的战果。自从維也納被占領以后，奥地利的議會就在莫拉維亞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①的小鎮上繼續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議員和选派他們的人曾經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現在在这里，他們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經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輕蔑的态度来对待議會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議員；当帝国軍隊的最初的胜利已經預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結束的时候，政府便在 3 月 4 日解散了議會，議員們也被武力驅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終於看到他們是受了愚弄，于是他們大声疾呼：“我們要到法兰克福去繼續我們在这里已經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經太迟了，而他們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議會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們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現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結了。有許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們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們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

^① 捷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編者注

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們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屬或法屬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領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倫地亚人、达尔馬威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們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 status quo [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應該已經告訴他們，这样开倒車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薩利河以东的全部領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統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現在也还是西欧文明傳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結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們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們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經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來說，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們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虛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們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圍，他們几乎从不能記憶的时候起除了德語以外就再沒有别的語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們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領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

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們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贊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們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許多斯拉夫人都沒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領袖們所制造的关于民族問題的瑣屑的紛爭,但我們永远不應該忘記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經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們1848年的嘗試初次遭到失敗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給了他們教訓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們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們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沒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①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②在解散議会的同时所頒布的宪法,我們沒有必要再談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現在則已完全廢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經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魯士,議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頒布的新宪章。它們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們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謙卑恭順,但它們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們的願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們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魯士都暂时摆脱了議会监督的束縛。奥普

① 万第——法国西部省名。在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紀初,这里是貴族和僧侶在英国支持下所組織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場所。因此“万第”一詞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譯者注

② 即弗兰茨-約瑟夫一世。——編者注

两邦政府現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場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魯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魯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現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維也納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風，只是在較小各邦里斗争的結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漸不利于革命方面。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謂的国民議會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連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間它曾經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場；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終於能够作出一項決議——虽然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決議——說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經夺取了它的陣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自然都把他們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議會的多數派身上，而小資產階級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漸困难的境遇中团結在这个議會的少数派周圍，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議會中最后的完整的陣容。另一方面，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魯士的內閣，日漸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經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們所以沒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魯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釣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議會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維也納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員都遭到极端的輕蔑；它的一个議員^①在維也納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議員

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

① 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

切界綫和差別。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議會已經通过的決議和已經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議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議會除了应战而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議會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議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縛手足，跪倒在普魯士政府面前。說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經譴責他們違背宪法和敌視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換而沒有成功的那些閣員。这种可耻的行徑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詳情，將是我們下一篇文章的內容。

1852年4月于倫敦

十五

普魯士的胜利

我們現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議會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魯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魯士所鎮压。

我們已經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实际行动了。我們已經看到，奥地利如何踐踏它，普魯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軟弱、动摇、渺小的立法机关終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結論：“統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就恰恰等于說，法兰克福議會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議會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結果。这就是說，必須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任的，究竟誰該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格累茨-什雷茨-罗宾斯坦-艾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 *dii minorum*

gentium^①，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話，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斬断戈尔迪之結^②因而使議會解脫了麻煩的話，这个崇高的議會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討論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問題而得不到結論。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馴伏，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国其他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議會授与它的皇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以后，它已經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給它增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陣地，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烏有，它永远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議會——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約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頒布的宪法，則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議會所要改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們实在沒有別的办法，只得把奥地利攆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

① 直譯是：小神；轉意是：二流人物。——編者注

② 古希臘傳說，弗里吉亞國王戈尔迪用亂結把軛系在馬車的轅上，牢固不可解，聲言能解此結者，得以統治整個亞洲，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拔劍斬開此結。“斬断戈尔迪之結”一語的轉意就是以大刀闊斧的方法解決複雜的問題。——譯者注

Christian streets, they were found if not more severely punished. It was under such an oppression, however, that the fortunes of his house took their rise and began to flourish. At the entrance of this street is still the house, the ancestral home of these fortunate Jews, whose they receive shelter from the persecutions and poverty of the world. A poor sort of a Christian clock sits there close on the tower, to show not small signs to travellers and others as letters of credit, etc.

Jews settled in Frankfurt under most imperfect, scanty-paid protection of the German Emperor so early as the twelfth century. In 1379 they obtained a constitution which was not free to religious fanaticism, called *Majestatsbrief*. In 1487 they built in the present *Judenbogen*, or New-Egypt, as it is sometimes named. Fire came upon them yet again in 1711. I roughly translat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ast conflagration, as illustrative of the spirit of that time: "Meanwhile, all the houses were burned up, stock and branch, and indeed in such wise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my many houses, say, not so much as a stick of wood of an arm's length remained, which is surely marvellous. It was remarkable, also, that when one side of the street was burned down, the wind turned about as though it had finished there the business on which it was sent, and would now carry it on further; so that by this the other and greater part of the street was saved as by the fire and laid in ashes. The fire broke out clos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in the house of the Rabbi Hephthah, their most famous Doctor. It is related for a certain truth, that when their Rabbi, who was besides a good Catholic, was minded to teach his scholars the Catechism, and had finished for argument a great heap of wood in his house, he became confused in his locution, and in place of conjuring the water-spirit to extinguish the fire kindled by him, called up the devils. Wherefore it was altogether in vain to try to save the smouldering building. This is also to be observed in the conflagration, that of the many Christian houses near by, not a single one was consumed." Going on one side this account, writte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e persecutions and oppressions under which the Jews endured until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seeing on the other side the steadily growing and wealthy Jews and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now live and work together here, one would say that world had made progress. Many, however, is to be made. Some additional measure of justice was dealt out to the Jews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but they are not yet admitted to a full political equality with the Christian citizens of Frankfurt. Just at this time the question of reviv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ity in such a manner, and some progress, as one of the allegations, the admissibility of Jews to the Senate. With the present reactionary spirit of the German powers, it would seem, however, a dangerous time to al-

igning. Local events of the day, or some general view of the situation, are the essential parts of a few-issued newspaper, freely purchased with long chains of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mouths of the subscribers. As for Europe, and their relations by any publication or rising from their doors to command every attention, such French vivacity is never indulged in. The services of the hand are supposed to hold the pen, while the other attends to the glass, and the rest of the body, more seated, never leaves its morning till bedtime. These gentlemen must have had periods in their lives of greater mental activity than they indicate at these meetings, which are very possibly, to their habit, only an antidote taken after the agitation of the day's business, as a preparation to fall asleep. They answer a question by always intelligently and politely. May they sleep well, with quiet consciences and good digestion. They retire usually before 10 1/2 o'clock. The Frankforters generally are early to bed. Think of my coming home from Don Francisco at the theater last night, at a little after 9 o'clock!"

GERMANY.

XV.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We now come to the las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the conflic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 especially of Prussia; the invasion of Southern and Western Germany, and its final overthrow by Prussia.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at work. We have seen it kicked at by Austria, insulted by France, despised by the lesser States, deposed by its own impotent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again was the depository of all and every power in the country. But as long things began to look threatening for the weak, vacillating, inept legislative body. It was forced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ublime idea of German Unity was threatened in its realization,"—which meant rather more or less than that the Frankfurt Assembly, and all it had done and was about to do, was very likely to sink in smoke. Thus it set to work in good earnest in order to bring forth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grand production,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There was, however, one difficulty. What Executive Government was there to be? An Executive Council? No;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y thought in their wisdom, making Germany a Republic. A "President"? That would come in the same. Thus they must revive the old imperial dignity. But—of course a prince was to be Emperor—who should it be? Certainly some of the *Dei miserere* profusion, from House-Schleswig-Groß-Lobenstein-Eberdorf up to Bavaria; neither Austria nor Prussia would have borne that.

A dilemma which prostrates its unfortunate victims with the solemn conviction that the whole world, its history and future, are governed and determined by a majority of votes in that particular representative body which has the honor to assemble among its members, and that all and everything going on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ir houses—war, revolution, railway-construction, colonizing of whole new continents, California gold discoveries, Central American canals, Russian armies, and whatever else may have some little claim to importance upon the attention of mankind—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incommensurable events hanging upon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atever it may be, just at that moment occupying the attention of their honorable House. That it was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Assembly, by effectually smuggling a few of their axioms into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first became bound to support it, although in every essential point it fully contradicted their own self-proclaimed principles; and at last, when this mongrel work was abandoned and bequeathed to them by its main authors, accepted the inheritance and held out for this monstrous Constitution even in opposition to everybody who then proclaimed their own republican principles.

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n this the contradiction was merely apparent. The fundamental, self-contradictory, nominal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was the very basis of the measure, confined, confining political ideas of these democratic gentlemen. And if their own sayings and writings—as far as they could write—were not sufficient proof of this, their actions would furnish such proof, for among sensible people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to judge of a man not by his professions but by his actions; not by what he pretends to be, but by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really is; and the deeds of these brutes of German Democracy speak loud enough for themselves, as we shall learn by and by. However,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with all its appendages and paraphernalia was definitely passed, and on the 28th of March the King of Prussia was, by 306 votes, against 245 who abstained and some 200 who were absent, elected Emperor of Germany, *intra Austria*. The historical irony was complete; the imperial crown executed in the streets of unloved Berlin, three days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March 18, 1848, by Frederick William IV, while in a state which elsewhere would come under the name *Lincoln Law*—this disgusting farce, just one year afterward, had been sanctioned by the pretended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of all Germany. That, then, was the result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KARL MARX.

London, July 27, 1852.

載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論文的
“紐約每日論壇報”原版的一部分

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魯士国王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由主义空論家們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計劃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失体面的状况視为天賜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們可以把旧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間，議會結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討論，同时不得不在許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說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議會中較进步的派別让步。很明显；从前屬於右派和右翼中間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議會領導权，現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緩地）轉到議會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議會中奥地利代表的頗为曖昧的立場（虽然这个議會把他們的國家擯除于德国之外，但他們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議會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間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們使議會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輕視，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認識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純粹是空洞无益的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搖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議會中的左派（他們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驕傲），完全陶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說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們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則的主張以一种用順勢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議會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

就宣称他們已經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們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絕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們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們那种瑣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們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們就比議會中任何其他派別更深地感染了議會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滿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們作为議員的代議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們深信，他們議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軍隊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們这个可敬的議会的关注的重要問題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議會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們成功地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帶了他們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們自己所常常宣揚的原則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們把这个作品拋棄，把它遺贈給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遺產，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張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則的人。

但是應該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們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說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和所写的文章——既然他們一般都有能力写作——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末他們的行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說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称

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 and 二百位議員缺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絕大的諷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³⁷（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許会被认为触犯了緬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會議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倫敦

十六

国民議會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把普魯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見了代表們。他告訴他們說,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駕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統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說,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他說,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們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議會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們經過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結論說,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絕皇冠。于是他們(在4月12日)作出一項決議: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須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應該怎么走,他們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員會,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議。

这个決議就是法兰克福議會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間現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資产階級,尤其是小資产階級,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們不能再等待“終結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魯士,

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經終結。上述各階級本想選擇一個較和平的方式來執行這個任務，但他們沒有得到機會。事情既然已經做了，只得妥協一下，——這就是他們立即採取的並堅決執行了的決定。在事情進行得比較順利的較小各邦，資產階級早已局限於那種最合他們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於沒有實力而毫無成效的議會鼓動。這樣一來，德國每一個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種新的、據說能使它們今後走上和平立憲發展道路的確定的形式。只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關於德意志聯邦的新的政治組織的問題。人們認為這個唯一的、看來還包含着危機的問題必須立刻加以解決。於是資產階級就對法蘭克福議會施加壓力，要它儘快制訂憲法；於是大小資產階級都決心接受並贊助這個憲法（不管它是怎樣一種東西），以便立即造成一個穩定的局面。總之，要求制定帝國憲法的運動一開始就是從一種反動的情感中產生的，並且是從那些早已厭倦革命的階級中產生的。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未來的德國憲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則，在1848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幾個月就已經通過了；當時，人民運動還處在高潮時期。那時通過的決議雖然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反動的，但在經歷了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的暴虐行為之後，現在看起來它們卻是非常有自由主義甚至民主主義精神的了。衡量它們的標準變了。法蘭克福議會如果勾銷這些它曾經通過的決議，而根據在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的刀劍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憲法的模樣去仿造一個帝國憲法，那它就等於在道德上自殺。而且，我們已經說過，議會中多數派的地位已經掉換，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勢力不斷增大。因此，帝國憲法的特色是：它不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時，雖然它充滿了矛盾，卻仍然是全德國最富於自由主

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紙空文，它的条文沒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謂的民主派即小資产階級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階級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資产階級更进一步的；它曾經表现出比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經常慷慨地宣称它为爭取自由不惜鮮血和生命；但是許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見了，而在遭到彻底失敗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沒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論如何事情总算已經做了。所以，当大銀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較慎重，只願意簡單地对它表示贊成的时候，紧挨在他們下面的階級——我們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資产階級，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們宁願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資产階級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傾向的小資产階級——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議會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魯士、汉諾威、薩克森、巴登和維尔騰堡的議院都宣称贊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議會之間的斗争尖銳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魯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違宪的，因为它們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魯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騷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魯士內閣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須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魯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圣人們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³⁸（它是旧联邦議会的复活）来討

論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魯士把軍隊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納赫，并且建議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該邦的議院贊助法兰克福議會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諾威和薩克森馬上照着普魯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結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騷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緒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軍隊，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績。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決議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議會。科倫为此召开了一个萊茵普魯士各市議會代表的會議。在普法尔茨、在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紐倫堡、在奧頓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会，情緒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議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騷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連續不断的光輝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間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薩河压回到萊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維也納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像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議會里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

1852年7月于倫敦

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間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議員，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議員外，已經离开議會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議員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們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議會。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談，仅只右派議員的离职，就足以使議會里以前的少数轉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經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軟弱、犹豫和怠惰，現在他們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現在要他們表明他們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他們的活動自然應該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滿生气的。他們，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搖的閣員們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話，他們就要（誰敢怀疑这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廢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撓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傢伙們！他們的統治——如果沒有一個人服从也能称为統治的話——和他們的前任的統治比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須实行，并且必須立即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議院的議員，而这个議院8

月 22 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 5 月 4 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

① 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② 即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即列奥波特。——编者注

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經拿起武器来捍卫議會；軍隊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較小各邦，軍隊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則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馬扎尔軍隊。只有普魯士尚待制服；由于該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無疑問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議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这些規則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們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規則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邏輯推論，它們是如此淺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經驗已經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們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帶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們就要被击潰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須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須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襲击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須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須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爭取过来；必須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軍隊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們所知道的一位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 *de l'audace, 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勇敢, 勇敢, 再勇敢!] 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認識到，現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經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議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們的委任者便代表他們）的君主、閣員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廢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縮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給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揮的一切战斗力量組織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陣地，削弱敌人的陣地。

法兰克福議會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們不滿足于他們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紐倫堡就是这样做的。他們让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鎮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魯士政府的殘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議。他們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們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們却呼吁他（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謀。帝国的閣員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議會，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議員、“新萊茵报”編輯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議會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場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簡單說来，他們繼續清談、抗議、发宣言，但

一直沒有行動的勇氣或意識；各邦政府派來的敵軍日漸逼近，而他們自己的執行者（帝國攝政）卻忙於和各邦君主密謀儘快地消滅他們。這時，這個可恥的議會連最後一點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來保護它的起義者也不再關心它的命運了。最後，當它那可恥的末日到來時（我們以後將要講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於倫敦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議會之間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5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頓，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魯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

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 *status quo* [状况] 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們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曾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 1849 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險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險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頓，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頓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

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現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①监牢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魯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萊茵普魯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許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則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饒的省份和整个的邦。金錢、武器、兵士、軍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規軍的士兵們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們甚至是起义的先鋒。薩克森和萊茵普魯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組織运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維也納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連军队也都坚决贊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資產階級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倫坦諾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們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們坐在閣員的安乐椅里深感內咎。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們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結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鋒芒,使它軟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謀远慮的政客即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的”英雄們的热誠支持,他們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們当真相信他們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倫坦諾这样一些比較圓滑的人牵着他們的鼻子走。

至于軍事方面,过去还从来没有見到过比巴登总指揮济格尔(他

① 乌克兰称作:木卡切沃。——編者注

过去是正規軍的中尉)所指揮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揮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組織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給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們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已經沒有別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澤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一次絕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軍是由老練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他起义战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場合表现得英勇頑强,但同时也有許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滿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潰,十万正規軍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們在軍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們面对的是拿破侖的老近卫軍一样。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旬它完全被鎮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結了。

十九 起义的終結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費了十多个星期的時間——从德勒斯頓的軍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議會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場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級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創立的中央政权的軟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資产階級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終目的的工人階級的紛紛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議員們；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轉变，几天之內，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們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的一場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議會。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們也把議員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們成百地开了小差。議員最初有八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規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議會里。

剩下的議員該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們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給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賦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

他們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軍隊來保護自己。他們應該要求中央政權立即使一切軍事行動停止，如果這個政權既不能也不願這樣做（這是預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廢除它而代之以一個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義部隊調到法蘭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對鬥爭缺乏準備、還處在猶豫不決狀態的時候，這一點並不难做到），那末議會可以不失時機地遷移到起義區域的中心地點去。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堅決地實行，起義和國民議會就還有取勝的希望。

但是誰也不能指望德國小市民階級的代表會採取這樣堅決的行動。這些抱負不凡的政治家一點也不能拋開他們的幻想。那些已經失去他們對議會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議員們，已經溜之大吉，要讓剩下的民主派放棄他們整整一年來所懷抱的對於權力和虛榮的夢想又很不容易。他們忠實於他們以前所採取的方針，百般迴避堅決的行動，直到最後失去了一切勝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榮地失敗的希望。他們進行了一些純粹表面上的無事忙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毫無效果和它的虛張聲勢，只有使人覺得既可憐又可笑），他們繼續向對他們毫不理睬的帝國攝政和公開同敵人聯合起來的閣員發布決議、文告和請求。而最後，當施特里高^①的威廉·沃尔弗，“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整個議會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稱，如果他們嚴肅對待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就應該結束空談，立刻宣布德國最大的叛徒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時，這些議會紳士們積蓄已久的義憤，一下子全都爆發出來了，而其來勢之猛，連政府一再凌辱他們的時候也從沒有看到過。當然按理也應該如

① 波蘭稱作：斯特舍哥姆。——編者注

此，因为沃尔弗的提議是圣保罗教堂³⁹四壁之內說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話；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須做的，而話又說得那末直截了当，一針見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們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應該做的。每一句像閃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們的头脑而他們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話，每一个能把他們引出他們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議，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見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議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議員先生們的地位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們提出了种种決議、申訴、質問和宣言)，他們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驟未免太胆大了。他們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維尔騰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們終于廢黜了帝国摄政，从他們自己中間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規定手續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議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議會！于是便創造了——当然是在紙上——一支保卫国民議会的軍隊。师、旅、团、炮兵連，一切都被規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軍隊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現在国民議會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請求議会的指揮，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維尔騰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議會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費了。国民議會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維尔騰堡政府的摆布了。議員們意識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間的騷动。这样他

們便喪失了他們還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們獲得了應得的輕蔑；維爾騰堡政府在普魯士和帝國攝政的逼迫下結束了這出民主的滑稽劇：在1849年6月18日封閉了議會開會的大廳，命令攝政的成員離開該邦。

於是他們去到巴登，去參加起義者的陣營，但現在他們在那裡已經是无用的東西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們。可是攝政仍然以有主權的德國人民的名義在繼續努力拯救祖國。它企圖獲得外國列強的承認，對一切願意領取護照的人都發給護照。它不斷發表宣言，派委員到維爾騰堡那些它曾經拒絕及時地予以積極支援的地區去發動起義；這一切當然沒有成功。現在我們手邊有一篇報告原文，是這些委員之一律斯勒先生（埃爾斯^①的議員）寄給攝政的，它的內容很能說明問題。報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圖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寫了六位委員征募資金毫無收獲的奇遇之後，舉了一大堆理由說明他為什麼一直沒有到達指定的地點，接着又就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維爾騰堡之間可能發生的紛爭及其可能引起的後果發表了深謀遠慮的見解。他詳細地考察了這一切以後，却得出結論說，仍然沒有什麼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議由可靠人員組成驛站式的機構以傳達消息，並建立諜報機構以偵查維爾騰堡內閣的意向和軍隊的調動情形。這封信沒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為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攝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門”即瑞士去了。當可憐的律斯勒先生正在為一個衰敗王國的可怕內閣的意向而絞腦汁的時候，十萬個普魯士的、巴伐利亞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經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後一戰中把整個事情解決了。

① 波蘭稱作：奧列斯尼察。——編者注

德国的議會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創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議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過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議會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現代的德国革命完結的日子。在資本家階級的影响下由分裂渙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剛剛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議會，它的作用是把 1820—1848 年間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統統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們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資產階級期待奇迹，但是却給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掙来了耻辱。工商业資本家階級在德国遭受的失敗，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們在德国各邦被打敗，被击潰，被逐出官場，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議會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資產階級的統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議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 1848 年 3 月以来領導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幫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階級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階級在 1849 年 5 月和 6 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現它在德国組織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們已經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敗；它的失敗与其說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說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現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敗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現了同样的短見、畏縮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 年 5 月，它已經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階級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議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贊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

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⁴⁰。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卡·馬克思 声 明

在奥格斯堡“总汇报”⁴¹上发表的一篇标有“科倫 9 月 26 日”字样的郑重其事的通訊中，竟然荒謬地把我的名字同倍克男爵夫人的名字以及科倫的逮捕⁴²連在一起，竟說什么我曾經托付倍克男爵夫人以某种政治机密，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徑为政府所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見過两次面，两次見面都有第三者在場。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談到了向我約稿的事，而对于約稿我不得不加以拒絕，因为它是以我同德国報紙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錯誤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結束以后，直到我听說这位夫人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沒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人見面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終沒有把他們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我沒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倫通訊員或者在倫敦的那些把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的德国“大”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我从来就认为德国報紙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謬而且拙劣的謠言是不值一駁的，不管它們是从倫敦直接制造出来的，还是从倫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所以破例加以駁斥，只是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倫通訊員竟企图把虛构的所謂我同倍克男爵夫人談話时的不慎当做在科倫、德勒斯頓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

卡尔·馬克思

1851 年 10 月 4 日于倫敦

載于 1851 年 10 月 9 日
“科倫日报”第 24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科倫日报”

卡·馬克思

—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⁴³

卡·馬克思写于 1851 年 12 月—
1852 年 3 月
1852 年作为“革命”杂志第 1 期
在紐約出版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 1869 年版本譯的，
并与 1852 年和 1885 年版本
校对过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erausgegeben von

J. Weydemeyer.

Erstes Heft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von

Karl Marx.

New-York.

Expedition: Deutsche Vereins-Buchhandlung von Schmidt und Helmich,
William-Street Nr. 191.

1852.

最先刊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一书的“革命”杂志的扉頁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⁴⁴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們中間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侖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羅馬的服装，讲着羅馬的語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創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經營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則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給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創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連同一切复活的羅馬古董——所有这些布魯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务实的資產階級社会把薩伊、庫辛、魯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釋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会完全埋头于財富的創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护过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誕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內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羅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会的斗士們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見自己的斗争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偉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倫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过旧約全书中的語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經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①。

由此可見，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贊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蕩起来。

在1848—1851年間，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蕩，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 *ré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 [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 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侖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險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問，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紀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貝德勒姆⁴⁵ 那里的一个癡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設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盞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監視人的監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語言。瘋癡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債，”——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頑固的念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侖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⁴⁶ 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

① 是聖經中的一个先知；見旧約全書“哈巴谷書”。——譯者注

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⁴⁷，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侖的漫画，他們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侖本身，是在十九世紀中叶所应当出現的老拿破侖。

十九世紀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內容，現在是內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襲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則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紀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騙子所葬送，結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紀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結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劍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統治。1851年12月的 coup de tête [輕率行为] 报复了1848年2月的 coup de main [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間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訓和經驗，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蕩。看起来仿佛社会現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創造为保证現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

絕對必需的形勢、關係和條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十八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地，像十九世紀的革命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却，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時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⁴⁸

但是，每個多少會觀察的人，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過法國事變發展的進程，也不免要預感到，這次革命必將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聽一聽民主派先生們當時那種自鳴得意的勝利叫囂就夠了，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為1852年5月第二個星期日⁴⁹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185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他們頭腦中成了一種固定觀念，成了一個教條，正如基督徒腦子裡的基督再臨和千年王國到來一樣。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驅除了敵人就算打敗了敵人；他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建樹、但現在還言之過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對現實的一切感覺。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

成一个特別集团，来駁倒关于他們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們的 *in partibus* [不存在的] 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貼現。12月2日像晴天霹靂一样震惊了他們。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們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內心的惊愕，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經过去了。

宪法、国民議會、保皇党派、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鳴声、报刊的閃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爱] 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这个人連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遺囑，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⁵⁰

像法国人那样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这样的言談並沒有揭穿哑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个說法罢了。还应当說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現在我們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經過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議會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⁵¹）；**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議會时期**（从1849年5月28

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分子——王朝反对派⁵²、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內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

面上的協調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偉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討論各种社会問題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結，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創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議會，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議會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議会的性质，所以他們在国民議會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經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們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沒有成功。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結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說，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統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統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議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結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

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棄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偉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

是君主国”的爭論，而是別的問題。这次失敗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階級对其他階級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划分比較发达、具有現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識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們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換着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里，現代的生产資料不仅不和經常人口过剩的現象相結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應該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滿青春活力的进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机会来結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階級和党派都团結成一个**維持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們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們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軍。从这时起，那些曾經团結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戰場，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統治者集团范围縮小时，每当比較狹小的利益压倒比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謀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懲罰，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責。最后，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

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打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的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了**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⁵³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

二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被打斷的話題上來。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历史，是資產階級中的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这个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報”⁵⁴，和“辯論日報”⁵⁵一樣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於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第一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國主義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國主義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勝利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餘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

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 leading articles [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⁵⁶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

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請願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見。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II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續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經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詳細地解釋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調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資產階級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廢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設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損、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頂上罢了，或者不如說是在全部建筑物頂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

是立法議會，另一個是總統。只要把憲法瀏覽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確定總統對立法議會的關係的條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這裡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憲法第45—70條規定，國民議會可以用合乎憲法的辦法排除總統，而總統要排除國民議會却只能用違背憲法的辦法，即只有取消憲法本身。可見，這裡憲法本身是在號召以暴力來消滅自己。憲法不僅像1830年的憲章那樣尊崇分權制，而且把這種分權制擴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權和行政權在議會內的爭吵稱為**憲法力量的賭博**，依據1848年的憲法，這種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選產生並享有連選連任權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構成一個不受監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國民議會，它擁有無限的立法權力，最終決定宣戰、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獨攬大赦權，因自己不間斷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權的一切特性的總統，他**有權不經國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部長**，他掌握行政權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職，從而在法國操縱着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的命運，因為正好有這麼多的人在物質生活上依靠於五十萬各級官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裝力量。他享有赦免個別罪犯、解散國民自衛軍部隊以及——經國務會議同意——罷免由公民自己選出的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市鎮委員會的**特權**。同外國締結條約時，他具有倡議和領導的作用。國民議會永遠留在舞台上，是公眾日常批評的對象，而總統却在極樂的土地上過着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眼前和心裡老是有憲法第45條在提醒他：**«frère, il faut mourir!»**⁵⁷ 你的權力在你當選的第四年，在美麗的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時你的威嚴就要完蛋了，這

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时用宪法規定給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⁵⁸！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給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議會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条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規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这里它們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議員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选出一个人来湊足七百五十个議員，并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議會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議会的各个議員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議會比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創建人即純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們愈是接近于完成他們那个偉大的立法艺术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們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 111 条来欺騙命运，根据这条規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須

有五百个議員。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們已經事先預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議會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嘗試，这种势力現在当他們还在議會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經一天天地从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別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給“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給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頂帽子碰倒了；誠然，这頂帽子是拿破侖的三角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議會内忙于虚构、討論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議會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陣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說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着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給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終於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項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識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檢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为

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軍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資產階級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問題，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軍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現金报酬，而当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們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軍隊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資產者的錢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尔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經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創設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御用軍所賴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屬於他們的还有另一种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們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現在，当他們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們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⁵⁹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議會。

宪法第44条說：“曾經丧失过法国公民資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總統。”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資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經归化了的瑞士人⁶⁰。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⁶¹已經詳細談

过，这里就不再談了。这里只須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現，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現。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沒有取得光荣，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們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詳細地談談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議會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复辟时期居于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統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貴，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們能够共同进行統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經把他們联合成“秩序党”，現在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議會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极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現在，当需要捍卫他們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們却极其怯懦地、畏縮地、沮丧地、

軟弱无力地放棄了斗爭。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們解体的可耻历史。他們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仅仅表現为过去的影子，每当問題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給这个派別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轉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結束这一时期之前，我們还應該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議會結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且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資產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組織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請注意，即以議會資產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領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閣。巴罗先生終於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职位，并且是內閣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議會反对派的最先进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勁敌即耶穌会派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議會送进坟墓。他終於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隱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决定派出远征軍去羅馬，并且商定要瞞着国民議會来安排这件事，而經費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議會索取。这样，內閣就开始以欺騙国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国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議會及其立宪共和国的12月2

日政变。不要忘記，在1848年12月20日組成波拿巴內閣的那個政黨，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國民立法議會中的多數。

8月間制憲議會曾經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在未制定並公布一套補充憲法的構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黨通過議員拉托建議議會不要去搞什麼構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項關於解散自己的決議。這時，不僅是以奧迪隆·巴羅先生為首的內閣，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全體保皇黨議員，都以命令口吻對國民議會說：為了恢復信用，為了鞏固秩序，為了終止不確定的暫時狀態而建立完全確定的狀態，必須解散國民議會；議會妨礙新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於執迷不悟才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它已經使全國感到厭惡了。波拿巴把這一切攻擊立法權的說法都記在心裡，熟讀了這些說法，並在1851年12月2日向議會保皇派證明，他確實從他們那裡學得了一些東西。他把他們自己的口號拿來反對他們。

巴羅內閣和秩序黨往前更進了一步。他們在全法國掀起了向國民議會請願的運動，殷勤地請求國民議會隱退。這樣，他們就把無組織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對國民議會、反對依照憲法手續組織起來的民意表現的鬥爭。他們教會波拿巴從訴諸議會轉而訴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憲議會終於不得不解決關於自行解散的問題了。這一天，軍隊佔據了國民議會舉行會議的場所；總攬國民自衛軍和常備軍指揮大權的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就像是在會戰前夕一樣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而聯合起來的保皇黨人威脅議會說，如果它不表示讓步，就將使用暴力。國民議會果然表示願意讓步，但商定再苟延一個短短的時期。1月29日是什麼呢，豈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那樣的 coup d'état [政變] 嗎？不

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議會会罢了。保皇党老爷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迫使一部分軍隊在土伊勒里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訴諸武力来反对議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⁶²的故事。他們当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尙加尔涅。

特別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縮短制宪議會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謂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謂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責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議會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 coup [打击] 防止了这一 coup。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議會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現成的总统責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議會会制成的总统責任法啊！

当制宪議会在1849年1月29日自己毀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們不放过一个机会来貶低它，强迫这个軟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絕望的議會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頑固的拿破侖观念，竟公开利用議會权力的这种貶低。例如，当国民議會1849年5月8日譴責內閣让烏迪諾將軍占領契維塔未克基亚，并命令羅馬远征軍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⁶³，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这位將軍建树了英雄的功績，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議員相反，装出一副寬大为怀的袒护軍隊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譏笑。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能愚弄他。最后，当制宪議會議长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議

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責令一个上校率領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議會时，那个上校却以軍紀为借口而拒絕調动，并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尙加尔涅交涉，但尙加尔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歡 *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 [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他們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經企图在他們的所謂議會总务官法案⁶⁴中規定国民議會議长能直接調动軍隊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簽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尙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贊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贊揚了已故制宪議会的有远見的智慧。陸軍部长圣阿尔諾像尙加尔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派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內閣而不是国民議會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議會制度。而当1851年12月2日政变把議會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議會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期間是立宪共和国或議會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統治以后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統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聳了聳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綫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

样开起倒車来了。

我們所談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立宪派公开組織陰謀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議會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預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 *patres conscripti* [参議員] 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軟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結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貫徹到底作为根本的規律；无謂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揚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績；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緊張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們醉心于极小气的傾軋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們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倫特运动^①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鈍前面甘拜下風；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頑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現，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騙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

① 是指十七世紀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王权的运动。当时的貴族統治階級把它称为“弗倫特运动”，弗倫特是一种被禁用的投石器，也是搗乱或破坏秩序的代用語。——譯者注

表現。如果历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爾——沒有肉体的影子⁶⁵。革命自己麻痺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紅色怪影”终于出現，那末它出現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亞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时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党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內閣。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縮短了共和主义制宪議會寿命的巴罗—法卢內閣，直到制宪議會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將軍尚加尔涅繼續执掌着正規軍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軍的最高統帥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立法議會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統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統主义者說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議會党团。他們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 *mauvaise queue* [可怜的附屬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軍隊和立法机关，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統治炫示为民意表現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權难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議會中只剩下了一个以非洲的將軍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称。

在国民議會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別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議員都是屬於山岳党的；軍隊以选出三个下級軍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領賴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議員地位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內部，以及在整個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間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內。

在我們繼續叙述議會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錯誤，需要作几点說明。在民主派看来，無論在制宪国民議會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議會时期，問題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間的斗争。他們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詞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泻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結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們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結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魯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謂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

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过，正統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①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嗎？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僕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統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襲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統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

①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象征。——譯者注

朝不能結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應該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們对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統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資产階級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資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屬地位。我們談論資产階級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資格，抱着高貴門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現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經完全資产階級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們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們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⁶⁶，在議會之外，总是互相傾軋。在幕后，他們又穿起他們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进行他們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議會政党的角色时，他們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們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現，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資产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騎士；是作为和其他階級对立的資产階級，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会階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資产階級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結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階級

的統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階級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統治。如果他們以秩序党身分痛罵共和制，并不掩盖他們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統治的社会基础，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階級并且直接和它們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权之間的次要斗争来轉移全国的視綫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軟弱无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縮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們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們的議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們因此必須把自己統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們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統派的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議會担保說，关于共和国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后者纏着三色头巾，以演說家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說。的确，有一陣譏笑的回声响应着他：Henri V！Henri V！〔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和資產階級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謂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資產階級发觉自己受了騙，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損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資產階級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議會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

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鋒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員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漸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資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緩和資本和雇佣劳动間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們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实质始終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狹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則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們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說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阶级間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繳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議會剛一開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須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击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議會中。因此必須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議會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議會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轰羅馬。这次炮轰違反了宪法第 V 条⁶⁷，因为該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 54 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經国民議會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議会在 5 月 8 日的決議中曾指責远征羅馬的举动。賴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們提出彈劾案。他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譏刺所激怒，威胁說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 月 12 日，国民議會否決了彈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議會。6 月 13 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們“处在宪法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軍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尙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訊，余下的山岳党人則像小学生一样，按照議會規則受到国民議會議長的瑣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

严，巴黎国民自卫軍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議會中的影响和小資產階級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6月13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繼續到現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鋒队，拒絕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陣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載这个宣言。小資產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軍沒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撓街垒的堆筑。代表們欺騙了小資產者：軍隊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沒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沒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傳染給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偉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領袖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备他們的“人民”背叛了他們，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备他們的領袖欺騙了他們。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談論什么事情像現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們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們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議會中获得胜利，它就不應該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議會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應該在街头上采取議會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沒有預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問題在于，小資產者和他們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當他們錯誤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當他們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們的威胁付諸实行时，他們就采取

模稜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員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氫气球一样，針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輕率地錯誤估計局勢。当一部分軍隊投票贊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軍隊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軍隊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羅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們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的記憶还太新鮮，以至无产階級对国民自卫軍深恶痛絕，秘密团体的領袖們对民主派的領袖們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現。宪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說，难道宪法不是已經被人破坏了許多次嗎？难道最流行的報紙不是已經責罵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嗎？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資产階級，即代表两个階級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階級，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階級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們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階級，但他們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們所維護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們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階級的利益和状况。他們不必过分仔細地估量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們的力量是軟弱无力，那末这就應該归罪于危险的詭辯家，他們把統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陣营，或者是由于軍隊太殘忍，太盲目，因而不能

把民主党人的純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細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沒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敗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敗时是純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敗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棄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減、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議会規則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6月13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領袖，但是这一天又給第二流的“能者們”騰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們得意忘形。虽然他們在議会中軟弱无力的情况已經无可怀疑，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有权把他們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憤怒和虛張声势的言論了。虽然秩序党把他們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現象的体现者，但是他們在实际上已能够表現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敗，他們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說：“只要他們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們就会向他們显出我們的本事来！*Nous verrons!* [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末这里就只須指出：賴德律-洛兰在不过两星期的時間内就把他所領導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負有使命 *in partibus* [在国外] 組織一个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的应届选举中，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資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发出通告，威胁說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来对付大陆上的

专制暴君。蒲魯东曾向这班老爷們說过：«Vous n'êtes que des blagueurs!»〔“你們就是会空談!”〕他这样說难道沒有一点道理嗎？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破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議會多数派的決議的原則**。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資产階級通过議會形式实现統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議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議會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說資产階級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議會範圍內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議會中最孚众望的議員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議會对付行政权力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議會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嗎？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許多議員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廢棄了它本身的議會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議員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規則，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貶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責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謀顛复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違犯宪法的侵犯时訴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將軍烏迪諾，这位將軍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羅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騷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維埃伊拉，曾經率領一帮屬於金融貴族的国民自卫軍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內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議會讲坛上的称赞；这个維埃伊拉竟参加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議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軍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

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罗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司长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⁶⁸。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谈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①。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

① 奥斯特利茨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城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译者注

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军的反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志，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的性质了。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

不像一个忠順的臣僕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經應該毀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說来，資產階級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禦手段尽行毀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羈絆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罵未来、現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連它自己的領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內，最后还頒布了箝制报刊言論、消灭結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規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議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間的常任委員會。在休会期間，正統派和爱姆斯一起进行阴謀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进行阴謀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謀活动，而各省議会則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會議上施展阴謀，这是国民議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們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較为詳細地予以論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議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議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具有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的保皇派构成部分来使公众感到难为情。每当这种休会期間議会的喧鬧声趋于沉寂而議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議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 *Infanterie, Cavalerie, Artillerie!*〔步兵，騎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議會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給議會一个咨文，說巴罗—法卢內閣已經免职，新內閣已經組成，这使議會大为震惊：就是驅逐一个僕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驅逐自己的內閣閣員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預定要向国民議會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們已經說过，巴罗內閣是由正統派和奥尔良派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內閣。波拿巴需要这个內閣，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議會，实现对羅馬的远征，并摧毀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內閣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給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報紙的責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 *homme de paille*〔冒名頂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現在他把假面具丟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隱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內閣，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驅散共和派的国民議會；他解散这个內閣，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議會无关。

要解散巴罗內閣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內閣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議會并存的权力时，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礼节都忽視了。在国民議會休会期間，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①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議

^① 即庇护九世。——編者注

会发表了称赞烏迪諾进攻羅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議會批准远征羅馬的撥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維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問題。秩序党在表示輕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內閣閣員沒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憤憤不平地讲到据他說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內閣从国民議會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爭得了寡妇撫恤金，坚决拒絕向国民議會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議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險家的身分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負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負有使命替他偿清債務。

巴罗—法卢內閣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議會制內閣。所以，这个內閣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轉折点。随着这个內閣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維持議會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現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軟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議會如果不簡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縮减庞大的官員，不让市民社会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資產階級的物质利

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經費和人員，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輿論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們猜疑而加以摧殘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議會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則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內閣叫做奥普尔內閣。这并不是說奥普尔將軍得到了內閣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統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沒有王位和王冠，沒有王笏和宝劍，沒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沒有世襲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沒有皇室費。奥普尔內閣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議員头衔，这就是高利貸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財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內閣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繼續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議會。每当內閣閣員們敢于怯生生地試圖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們好像只是迫

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們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⁶⁹的时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国民議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来好像他說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們的幸災乐禍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階級的深刻的輕蔑。資產階級从来还没有这样絕對地統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統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資產階級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稅的法律，另一个是廢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資產階級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費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純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們。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們能够容忍这一稅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資產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問題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們双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結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于是他們在各省开始騷动起来。他們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們服从于僧侶，迫害地方长官，使他們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

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蝕該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議會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議論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應該說“是”和“否”一样！不論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論，都很单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談請願权还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出版自由还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預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題目总是一个，判詞总是早已准备妥貼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說：“社会主义！”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資產階級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鍛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离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評價，就比所謂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評價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謂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資產階級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

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揚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談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階級的協調和幸福的制度。資產階級只是沒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論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資產階級的統治还没有充分組織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时，其他各个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現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轉化为反对資本的斗争的危險形式。既然資產階級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說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議會制度**呢？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禁止辯論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釋，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維的东西而强使人們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級作家的斗争；議會中的辯論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館中的辯論会来补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願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数决定，那末議會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們站在国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末你們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們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頌揚的东西指責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統治的危險；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

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撻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

13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驅逐出国的議員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絕大部分选票都投給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階級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資产階級，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敗。看来，小資产階級在危急关头离开戰場，只是为了要在順利的情況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戰場。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險性。巴黎的軍隊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絕對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决心遵照議會多数人的意旨来組織任何一个內閣，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尔、貝利耶、布洛利和摩萊），一句話，就是恳求所謂的城官們⁷⁰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載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沒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沒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閣；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寬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內閣。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檢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国民議會。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內閣閣員，都沒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議會，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議院副議長这个官高祿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湯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議員之一維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終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議會中进行斗争，它沒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間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于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資产階級有時間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釋（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話，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議會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領導和負責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选权，并規定选举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們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滿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現在應該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們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庄严的宁靜（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責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議員們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礼的举

动来向大家证明：責罵他們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們的当选解釋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議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滿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⁷¹。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應該的。在这一摧殘以后，革命最前緣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聞报”⁷²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3月和4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构的斗争，正如他們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記，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絕了他們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們把自己的命运交給民主派的領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敗使他們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們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們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現在他們却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劍来到投票站。他們用这样的預言来安慰自己。最后，軍隊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級的处罰，正如他們曾經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罰一样。可是这次軍隊坚决地对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 coup d'état〔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像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5月31日的选举法把国民议会議員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廢止，国民議會和波拿巴之間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規定发給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議會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謂交际費。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內閣閣員們向国民議會要求每年发給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費。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錢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詐手段。国民議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說，如果国民議會不松开錢袋，不以每年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議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給人民。国民議會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政治上被弄得毫无价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实价的法郎，总额是三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举出来的，他要求賠償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議会的委员会拒絕了他这种厚顏无耻的要求。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議會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議會虽然否決了每年的文官費，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决定。国民議會既已答应給錢，同时又以自己的煩惱表明

自己的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丧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篡夺权力的议会的口吻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驕横，而国民议会在这次事件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须考虑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间一样，这次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⁷³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

拿巴派的將軍。在這個團體里，除了一些來歷不明和生計可疑的破落放蕩者之外，除了資產階級可憎的敗類中的冒險分子之外，還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游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拆破爛的、磨刀的、鍍錫匠、叫化子，一句話，就是隨着時勢浮沉流蕩而被法國人稱作 *la bohème* [浪蕩游民] 的那個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的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這就是 *sans phrase* [不加掩飾的] 波拿巴。他這個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历史生活和這種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詞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妝跳舞會。例如，在進攻斯特拉斯堡時，一只受過訓練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當他在布倫登陸時，他給幾個倫敦僕役穿上了法國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隊⁷⁴。在他的十二月十日會中，有一萬個游手好閑分子應該裝作人民，正像聶克·波頓應該扮演獅子⁷⁵一樣。當資產階級毫不違反法國演劇格式的迂腐規則，十分嚴肅地表演最純粹的喜劇時，當它一半被騙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莊嚴堂皇時，一個把喜劇僅僅看作喜劇的冒險家當然是要獲得勝利的。只有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侖的假面具下裝作真正的拿破侖以後，他才會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

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⁷⁶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像，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末，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檳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檳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 «Vive Napoléon! Vivent les saucissons!» [“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安排得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慫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

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諾馬耶拒絕調換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尙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軍隊在軍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报纸⁷⁷攻击尙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連不断地召开秘密會議，会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軍隊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陣营，有两个敌对的參謀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宮，另一个在尙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宮。国民議会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尙加尔涅間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国記者对这种情况的評論相同，这位記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僕們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們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陸軍部长奧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继任陸軍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議會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滿了瑣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从宪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讲到当前的 questions brûlantes〔緊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軍隊的指揮权完全屬於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詞句結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一个人身受誓言約束，我将謹守这个誓言所給我划定的狹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們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議會就会調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則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論将来的决定如何，我們总應該有这样一個共同的了解：一个偉大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誰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

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風波和乱子。我对諸位是开誠布公的。望你們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誠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資产階級慣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調，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爾和薩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問題，秩序党的城官們一刻也沒有弄錯。誓言他們早已听厌了，他們自己的人們中間就有許多政治上違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軍隊的那一段話，他們倒沒有听漏。他們憤懣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煩瑣地列举了最近頒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拒絕修改宪法时，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贅物，妨碍他們行动，当然更妨碍他們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陸軍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預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銳的爭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迴避、緩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①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現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謀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經過敏地加以解釋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

^① · 1848年2月。——編者注

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里的腊腸，這腊腸是根本不會說話的。“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波拿巴要求讓他安安靜靜地干他的事情，而議會黨却已經被雙重的恐懼所麻痺：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寧狀態，二怕自己在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眼中成為造成不安寧的罪人。既然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秩序黨也就不敢用“戰爭”來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會期待在國民議會開會時必將大吵大鬧，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對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會交出它關於十月事件的記錄，但這個要求被多數否決了。國民議會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動人心的辯論。國民議會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直到12月底，才開始發生了一些關於議會個別特權問題的小衝突。自從資產階級以廢止普選權暫時避開了階級鬥爭的時候起，運動範圍就縮小了，變成專為兩個權力間的特權問題發生的小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議員，名叫摩干，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長魯艾在回答法院院長的詢問時宣稱，應當不再拘什麼儀式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來。於是摩干就被投入債務監獄。國民議會知道這種破壞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消息時，大為憤懣。它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當晚就通過自己的法警用強力把他從克利希監獄里放出來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為了要證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聖性，並且為了將來在必要時能夠把討厭的山岳黨人安置到現成的地方去，國民議會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時，拘捕負債的議員是容許的。國民議會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國民議會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最后一點影子都消滅無余了。

上面已經讲过，警卫专員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詞，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陰謀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行为。因此，議會总务官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提議成立一个特別議會警察队，由国民議會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轄。內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議，說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結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規定議會警卫专員应由議會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并由議會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訴訟，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詞宣布为凭空捏造，檢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議會嘲笑了一頓。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議會常任委員會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議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惯于在每次給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沒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議會为酬答伊雍的忠誠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議會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間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間采取行动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国民議会在11月和12月間，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現在我們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干案件时，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議員，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个原則只运用于可恶的議員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爭執。国民議會沒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謀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

階級的首領，它竟把衝突歸結為在警衛專員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部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稜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力的鬥爭變成關於權限問題的很小的糾紛，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等空曠，把一些空洞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當行政權力真正名譽掃地，當國民議會的事業將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卻不敢戰鬥，因為它如果這樣做，就會對全國發出一種發動的信號，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力就靜待時機，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興趣時，借一個很小的無關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就發泄出滿懷的憤怒，那時它就拉開后台的布幕，揭開總統的假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情緒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衝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着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他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表示關心，正如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表示關心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卻不了解，為什麼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麼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戰爭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12月20日，巴斯噶·杜普拉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部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⁷⁸。波拿巴和他的親

信把她獻給人世，而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則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保護之下，雖然法國的法律除了以救濟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發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發行了七百萬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來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為了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空論式的勞動權。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認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條就是從他們口袋里騙去的無光彩的法郎。無論如何，這種彩票不過是一種騙局而已。妄想不離開巴黎就能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那些負債累累的侍從。國民議會同意給他的三百萬法郎已經用光，無論如何總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為建立所謂的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村] 曾向全國募集捐款，並且他自己在認捐名冊上第一個認捐了一大筆款子，但他只是徒勞了一番。冷酷的資產者抱着不信任的態度等待他付出認捐的款子；而這筆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於是利用社會主義空中樓閣進行的投機把戲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金條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並不滿足於把七百萬法郎中扣除獎金以後的一部分純收益裝進自己的腰包，他們還製造了大批假彩票，同一個號碼的彩票發出了十張、十五張以至二十張，——這真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金融手段呵！這裡，國民議會所碰到的不是名義上的共和國總統，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這裡，國民議會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反憲法，而是違反 *Code pénal* [刑法典]——的地点把他當場捉住。如果說國民議會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質問，那末，它這樣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議要國民議會宣布自己“滿意”於提醒秩序黨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為。資產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國家人物的資產者，总是用

理論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儼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蕩人，是一个驕橫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資產阶级的騙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現在，在国民議會亲手帮助他順利地走过了軍人宴会、閱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違犯 Code pénal [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經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轉为进攻的时刻已經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陸軍部长、海軍部长和財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国民議會借以表示它的嘮叨不滿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們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議會。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国民議會休会期間就已經开始做的事情，即軍权和議會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爱丽舍方面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 5 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頒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軍官們在叛乱时不要寬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們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議會的要求派遣軍隊。1851 年 1 月 3 日，內閣因这一命令受到了质問。为了調查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則一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議會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說：这种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說：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議會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議會可以信賴他。国民議會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議會既委身于一个將軍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軍隊的万能；但是这位將軍弄錯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暫時領用的权力交付給国民議會去反对同一

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議會，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資產階級在1849年1月29日賦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說，和当代的圣者們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于他們的党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势要求他們創造奇迹时，他們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說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們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憤懣。

当晚，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爱丽舍宮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換尚加尔涅，五个閣員拒絕署名。“通报”宣布內閣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則以組織由尚加尔涅指揮的議會軍队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作的。它只要把尚加尔涅选为国民議會議长，并調来任何数量的軍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統率着軍队和巴黎国民自卫軍，并且正等待和軍队一起被召去援救国民議会，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肯否认国民議会直接調动軍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問題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麼成效的。当时軍队将听从国民議会調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時間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將軍（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願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議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議員脫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議。不过，城官們这时也許还能发

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们并没有这样作，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认谁作主。波拿巴由于城官们的这种企图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股票牌价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退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了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的议会⁷⁹，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 post

festum〔在事后〕发出嘮叨的抗議。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內閣。貝多將軍提醒大家記住常任委員會在議會休會期間的温和态度，記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絕把自己的議事記錄公布出来。这时內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記錄，因为这些記錄現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沒有任何味道，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繆扎的建議，国民議會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員會”。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軌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貿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儲备丰富，儲蓄銀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議會所喧嚷的所謂“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內閣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將軍連提都沒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規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內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贊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項，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內閣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說，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統派和奥尔良派同純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內閣，不只失去了軍隊，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議會多数；由于热狂地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軟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閣員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經常使平庸的資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議員已經从秩序党陣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議員們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領蒙塔郎貝尔在那时已經把他

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議會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領們，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統派的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說，虽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議會制共和国是整个資产階級实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产階級眼前把他們在議會背后繼續努力从事的复辟計謀咒罵为危險而无謂的陰謀。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內閣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統的打击。可是撤換尙加尔涅的并不是內閣，而是总統。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嗎？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陰謀活动作为罪名嗎？可是秩序党早已把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事項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換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換了1850年5月曾威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燒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嗎？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統拥有由宪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統居然把自己由宪法賦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議會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廢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議會特权当作違反宪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議會範圍以內。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議會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記憶，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議會迷才可以說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議會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階級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

之后，仍然把它的議會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閣閣員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議會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說，內閣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議會里已經沒有一个党派占居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謂的过渡內閣，其中沒有一个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純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組成的內閣。秩序党現在可以把自已的精力花費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力則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議會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愈是成为單純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給予总统一百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領命令他的听差閣員們提出来的。这一次，問題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多数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見，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二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絲毫怀疑，它甚至不願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議案展开討論。只要那个叫做伐伊斯的內务部长出来声明說，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組織秘密团体，民主報紙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傳來不利的消息，日內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魯貝市的厂主們縮短了工作時間，貝耳島⁸⁰的囚犯已經騷动起

来——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紅色怪影，秩序党不經討論就立刻否决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議會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描繪的新騷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沒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負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謂的过渡內閣却一直勉强維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議會。他时而表示要組織一个有拉馬丁和比約参加的共和党内閣，时而表示要組織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要出現）参加的議會內閣；时而又表示要組織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貝諾瓦·达济参加的正統派內閣，时而又表示要組織一个有馬尔維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內閣。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撥秩序党各派互相攻訐，并以共和党内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組織議會內閣的真誠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調和态度的打击。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給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給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沒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寬恕的。商业蕭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沒有飯吃，在卢昂、牟尔豪森^①、里昂、魯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內

^① 即牟罗兹。——編者注

閣，除了把魯艾、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保留不動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电訊而被制憲議会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兼任內閣閣員的議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而且三個月中和波拿巴進行鬥爭，只不過是為了在4月11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滿足于非議会的內閣，1851年1月他滿足于超議会的內閣，而到4月11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会的內閣了，這一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会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会和保皇派議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測定議會生命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4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證：波拿巴認為國民議会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 coup d'état [政變] 後發表的宣言，這個 coup d'état 是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的。尚加爾涅把這個死刑的判決告訴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丑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螞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⁸¹。

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軍权和夺回已經喪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領導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純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經失去了独立的議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針，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議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議会現在必須解决一个問題：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資產階級統治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之間，在民主主义和无產階級无政府状态之間，在議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間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間进行选择！这样，在議会內部就出現了一个引起爭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別将圍繞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結合体。修改宪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結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簡單。他們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們在国民議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數，而依照宪法又必須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數贊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

自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們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場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現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議會是早已沒有权力的議會，人民則是企图重新爭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徑投票支持修改宪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規定，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違背宪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簡單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給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縮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間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會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資產階級中的两派（正統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統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們共同进行統治的必要条件，是它們的共同階級利益借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錢爭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們各自的国王，他們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奥尔良派的議員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會周期地建議廢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議會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会頑強地阻擋其被逐国王返國的場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說，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納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給它。情勢迫使他們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問題由情勢所迫又非討論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問題，而且会使資產階級两派的共同統治成为問題；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國中輪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間的竞争，复活資產階級两派間爭奪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們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結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們的王室的所謂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議會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統派双方的色彩都脫落了，各种形态的資產者都消溶为一般的資產者，消溶为資產者这个类屬了。現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統派，正統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們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們彼此統一的化身；他們互相排斥的派別利益的表現，应当成为他們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的表現；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把两个君主国都廢除了的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經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們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石。仿佛正統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資產者的君主国，或是資產階級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襲土地貴族的君主国一样。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頂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样，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

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1852年2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表演，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作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⁸²，再从威尼斯奔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

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棄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現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的自願退让，为了正統派放棄自己的权利，懺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教。这种后退可能給予奥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是它誕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奥尔良派閣員、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即早筹划融合事业，实际上他們只是表現了七月革命后的醉后的头痛，表現了对資产階級王权和資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現了对正統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們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間的調停者，事实上他們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維尔亲王就是把他們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茲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放棄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暫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許把总統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說，这样作是和他們家族的傳統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謠言說茹安維尔要当共和国总統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九月間，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統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敗，而且还破坏了他們在議會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們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間愈是疏远，它們之間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維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內閣閣員福适和正統派之間的談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伊勒里宫和馬松閣之間进行爭吵、維萊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間进行爭吵的时代⁸³。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萊、布洛利、梯也尔和奧迪隆·巴罗之間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萊、布洛利、蒙塔郎貝尔和奧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議員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議：

“下面署名的議員建議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議員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維尔一致声称：国民議會无权建議廢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議會。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數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討論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議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議会的少数，拥护必須执行議会少数決議的原則。可是，秩序党在 1850 年 5 月 31 日和 1849 年 6 月 13 日岂不都曾經把議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嗎？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議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嗎？它不是曾經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約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罰了民主派嗎？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統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議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議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毀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議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議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議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議会本身的統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議会以自己的決議廢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統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說，当它本身还繼續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統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經站在門前了。当議会正忙于討論修改宪法的問題时，波拿巴撤銷了表現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將軍第一师团指揮官的职务，任命馬尼揚將軍继任該职，这位將軍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倫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統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調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廢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統合作，又不能和总統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誰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給事变支配，交給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

人民的斗争中已經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利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態度，最好是从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⁸⁴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

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辞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

掌握的資產階級，就連那些曾為它的利益而採用過的攻訐手段也不值得採取了。這部分資產階級表明：為了保持他們的公共利益、他們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的**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是有礙於他們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們感到痛苦和煩惱。

當波拿巴巡遊各地時，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市政官員、商業法庭的法官等等，到處都幾乎毫無例外地以極卑屈的態度迎接他，甚至當他在第戎無情地攻擊國民議會，特別是攻擊秩序黨的時候，也是這樣歡迎他。

當商業情況良好的時候（1851年初還是這樣），商業資產階級狂暴地反對任何議會鬥爭，生怕這種鬥爭會使商業吃虧。當商業情況不好的時候（從1851年2月底起已成為經常現象了），商業資產階級就抱怨議會鬥爭是商業停滯的原因，並要求為了活躍商業停止這種鬥爭。關於修改憲法的討論恰好發生在這種不好的時期。既然當時問題是關於現存國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資產階級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們終止這種痛苦的過渡狀態，同時又保持現狀。這裡面沒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終止過渡狀態，正是延長過渡狀態，將最後的解決拖延到遙遠的將來。保持現狀只能有兩種方法：一是延長波拿巴掌權的期限，一是讓波拿巴按照憲法退職，選出卡芬雅克來。一部分資產階級傾向於後一種解決方法，可是他們除了叫他們的代表對這個迫切的問題保持沉默，不去觸動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議。他們以為，如果他們的代表不出來講話，波拿巴就不會行動了。他們希望有一個為了不使人看見而把頭藏起來的鴛鴦的議會。另一部分資產階級希望讓已經坐在總統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總統，一切照舊不變。他們感到憤慨的，是他們的議會不願意公開違背憲法和率直地放棄權力。

在国民議會休会期間，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資產階級的地方代議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贊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議會，拥护波拿巴。

資產階級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憤怒，比它跟議會代表們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資產階級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資產階級法庭就判处数额異常巨大的罰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經指出，議會內的秩序党由于叫囂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階級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議會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同資產階級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众，却对总统奴顏婢膝，詆毀議會，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資產階級中講話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產階級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們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說，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統治地位相連的麻煩和危險。

这个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甚至对于为它本階級的統治而进行的單純的議會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領袖人物；但是現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責备无產階級沒有为它这个資產階級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資產階級时刻都为最狹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階級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現在它

却哀叫无产階級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資产階級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腸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階級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拋棄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資产階級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淺学之輩。我指的是“經濟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馴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說什么“无知的、沒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階級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識、紀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資产階級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輸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轉；6月28日，法兰西銀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貼現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轉。法国資产階級把这种商业停滞說成是純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議会和行政权力間的斗争，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門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轉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綫上籠罩着烏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宮打来霹靂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資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識、洞察力和

智力源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倫敦工业展覽会⁸⁵整个会期內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说法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間达到顶点的則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織业和絲織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織工厂还在繼續生产，但是它們所获得的利潤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則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則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順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的是輸出，在英国是輸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綫的範圍內去寻找）是显而易見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結果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覽会即将举行而特別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們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預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漲，后来突然降低，——一句話，就是棉价漲跌不定。生絲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織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織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門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經常和它們相伴而生的一种暂时停頓。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間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

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 1851 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謠傳、議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訐、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 in partibus〔国外〕的英雄们预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多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谈到过。1851年5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⁸⁶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到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 coup d'état [政变] 的謠傳

一刻也沒有停息過。影子像彩色的照像底片一樣已蒙上了各種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兩個月份的歐洲報紙，就可以找到這類情況的報道：“巴黎到處流傳着政變的謠言。聽說首都今天夜間就要被軍隊占領，而明天早晨就會有解散國民議會、宣布塞納省戒嚴、恢復普選權并向人民呼喚的法令出現。聽說波拿巴正在尋找閣員來執行這些非法的法令。”這些報道總是不變地以“延期”一語結束。政變始終是波拿巴的固定不移的觀念。他是抱着這個觀念重回法國的。他為這個觀念所控制，以致經常流露於言談之間。他十分軟弱，因此經常放棄自己的觀念。巴黎人十分習慣於像對待幽靈一樣地對待這個政變的影子，以致最後當這個政變有肉有血地出現時，巴黎人還不願意相信它。可見，政變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於十二月十日會的头子嚴守秘密和國民議會驚慌失措。這個政變是不管波拿巴怎樣隨便洩露秘密，以及在國民議會完全知悉內情的條件下成功的，因為這是先前的事變進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內閣閣員們宣布他決定恢復普選權；10月16日內閣閣員辭職；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內閣組成的消息，同時，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師師長馬尼揚已把最可靠的團隊調到了首都。11月4日國民議會宣布復會。國民議會除了把它已學過的課程按簡單扼要的提綱復習一遍並表明它只是在死後才被埋葬之外，是別無他事可作了。

國民議會在和行政權力鬥爭時所失掉的第一個障地就是內閣。國民議會不得不以完全承認純系虛構的托利尼內閣而莊嚴地承認這個損失。當日羅先生以新內閣名義向常任委員會作自我介紹時，常任委員會報之以嘲笑。這麼一個軟弱的內閣竟敢來執行

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問題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議會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議會背道而馳地做。

国民議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廢除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們就提出了这种內容的法令。国民議会立即否决了部长們关于必須立即頒布这个法令的建議，而法律本身在 11 月 13 日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議會就再度撕毀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議机关变成了一个階級的篡权議會，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連結議會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說行政权力建議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議会轉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議會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轉向呼吁軍隊了。国民議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調动軍隊的权力，确立自己創建議會軍的权力。国民議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軍隊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間、自己和波拿巴之間的仲裁者，承认軍隊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棄統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調动軍隊而是把自己調动軍隊的权利当成討論的題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議會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軟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敗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馱子^①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

^① 十四世紀法国經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論述意志自由問題时曾讲了一个馱子的故事：一头馱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間，无法进行選擇，結果只好餓死。——譯者注

之間決定哪一方誘惑力更大，而是要在兩頓棒打之間決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爾涅，二怕波拿巴；老實說，這種處境決不是英雄好漢的處境。

11月18日，有人對秩序黨本身提出的市議會選舉法提出了一個修正案，規定市議會選舉人在選區內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這個修正案被僅僅一票的多數否決了，但是立刻就發現這一票是計算錯了。秩序黨由於分裂成各個敵對的派別，早就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這時它表明，議會內根本沒有什麼多數可言了。國民議會喪失了通過決定的能力。它的各個構成部分已經沒有任何聯結的力量使其相互結合在一起了，它已經斷了氣，它已經死了。

最後，在大難臨頭的前幾天內，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又一次莊嚴地證實自己已與議會內的資產階級決裂。梯也爾這個議會英雄特別嚴重地患了議會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議會死后還協同國務會議想出了一個新的議會陰謀把戲——制定責任法，把總統牢牢地約束在憲法範圍之內。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廳舉行奠基典禮時，簡直像馬贊尼洛那樣有力地把那些愛跑市場的太太和賣魚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錯，一個賣魚女人的實際力量等於十七個城官）；在議會總務官提出法案之後，他曾使他在愛麗舍宮設宴招待的那些尉官們喜出望外，同樣，這時，11月25日，他又把聚會在馬戲場想從他手中領取倫敦工業展覽會獎章的工業資產階級吸引過來了。現在我把“辯論日報”上他的演說中最典型的一段話引錄如下：

“這樣出乎意料的成績使我有權再說一遍，如果法蘭西共和國有可能關心自己的實際利益和改組自己的機構，而不是一再容忍蠱惑者和君主主義幻

想所惹起的騷扰事件的損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該是多么偉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鳴似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門。結果是沒有进步，只有斗争。我們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現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經久不息）我們看到，从前为吃革命的苦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現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縛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們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風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資产階級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議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毀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勁的薩兰德魯茲先生的房子挨炮彈也最多。

克倫威尔在解散长期議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議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議會議員赶出会场。拿破侖虽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議会去向它宣讀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續的声調）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無論和克倫威尔或拿破侖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銀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馬尼揚將軍，用十五个法郎加燒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間的賊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謀者相会，命令他們闖入最危險的議会首領們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尙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茲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監獄，用軍隊占領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議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張貼告示，宣告国民議会和国务會議已被解散，

普选权已經恢复，塞納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圍已聚集了許多議會权威人士，他們已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會議。

議會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統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內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決議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門前張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車从那里送进馬薩、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監獄。秩序党、立法議會和二月革命的結局就是如此。

在作結論之前，我們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簡括的概述。

I.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劇。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議會时期。

(1) 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階級对无产階級进行斗争。无产階級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敗。

(2) 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資產階級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統而廢除。

(3) 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立宪議會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議會灭亡。共和派資產階級遭受失敗。

III.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議會时期。

(1) 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6月13日止。小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遭受失敗。

(2) 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

实行議會专政。秩序党以廢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統治，但失去議會內閣。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議會資產階級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議會失去軍隊总指揮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議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敗。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議會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資產階級議會和資產階級报刊同資產階級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議會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議會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階級、軍隊以及其余各階級所拋棄而复灭。議會制度和資產階級的統治复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詞句、作为一个預言出現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窒死于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在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又常常像幽灵似地出現。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四散奔逃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告。議會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但是1851年12月2日事件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統治，結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沒有让法国从害怕紅色无政府状态的未來災禍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燒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馬特尔林蔭道上和意大利林蔭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貴资产阶级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來災禍給资产阶级兌現了。资产阶级曾把馬刀奉为神，結果是受到馬刀的統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結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監視之下，結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軍，結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軍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結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軍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結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軍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

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搶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阿尔谢尼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说：“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结果是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侖的«Dans cinquante ans, 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①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复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资产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

^① 指1851年政变后的法国。——编者注

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个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官方的选举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旁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处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的记忆犹新，它丝毫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士兵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

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⁸⁷！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儼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

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

議會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負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現。

小农人数众多，他們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們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貧困而更为加强了。他們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經濟条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們就形成一个階級。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个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过議會或通过国民公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来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从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阳

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傳統在法国农民中間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侖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們。于是就出現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中的一条：«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 [“不許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侖。經過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后，預言終於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階級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許有人会反駁我說：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嗎？軍隊不是圍攻过农民嗎？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嗎？

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蠱惑人心的活动”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块土地并賜給他們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見；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过去；不是农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現代的万第⁸⁸。

議會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侖的幻想，并使他們（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們发动起来的时候，資产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

在議會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識中发生了新思想和傳統的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結果总是資產階級压服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間的不斷冲突上，結果总是資產階級撤換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議會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們自己的产物，即軍隊，結果总是資產階級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懲罰了他們。这个資產階級現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鈍，說这些 vile multitude [可鄙的群氓] 愚鈍，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賣給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階級对帝國的信賴，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規的时候，資產階級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剛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 coup d'état [政变] 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議他們自己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投票表決。1848 年以來的經驗教訓，使他們学聰明了。但是他們已經投身于历史的地獄，历史迫使他們履行諾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塗，以致恰恰是在最紅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們的意見，国民議會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現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侖巩固和調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現在貧困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侖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

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侖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經過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紀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紀却已变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須維護的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侖观念”] 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錯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侖統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剝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綫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統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紀內，封建領主已由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貴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資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負担的抵押債務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債每年債息的总額。受到資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

而窗戶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資產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贊揚，現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并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現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決、查封財產和强制拍賣的法典。在法國，除了官方計算的四百萬(包括兒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還有五百万人瀕于死亡，他們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們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不可調和地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可是，強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這是第二個拿破侖應該實現的第二個«idée napoléonienne» [“拿破侖觀念”]) 應該用強力來保衛這種“物質的”制度。的確，這種«ordre matériel» [“物質制度”] 正是波拿巴反對造反農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語。

小块土地除了肩負資本加于它的抵押債務外，還肩負着賦稅的重担。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一切關係和個人的齊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從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同等的作用。它消滅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也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到處入侵。最後，它造成沒有職業的過剩的人口，使他們無論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鑽營官

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設官职。拿破侖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場，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連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賦稅。拿破侖的賦稅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資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富貴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階級并列的人为等級，而对这个等級說来，保存他的統治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他曾經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設了領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idée napoléonienne*»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統治。可是，如果說剛剛出現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協調，由于它处在依賴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順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債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脫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蒼天是剛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創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蒼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塗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对羅馬的征討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貝尔先生所想的剛剛相反罢了。

最后，«*idée napoléonienne*»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軍隊占压倒的优势。軍隊是小农的 *point d'honneur* [光荣]，因为軍隊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財產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頌揚他們剛获

得的民族統一，掠奪世界并使之革命化。軍服是他們的大禮服，戰爭是他們的詩篇，在想像中擴大和完整起來的小塊土地是他們的祖國，而愛國主義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態。可是，現在法國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所要對付的敵人，已不是哥薩克，而是法警和稅吏了。小塊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謂的祖國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賬簿中了。軍隊本身已不再是農民青年的精華，而是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的敗類了。軍隊大部分都是招募來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個波拿巴本人只是一個招募來的人物，只是拿破侖的替手一樣。現在軍隊是在執行憲兵職務圍捕農民時樹立英雄業績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會的头目的體系中的內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國境外去用兵，那末軍隊在干了几樁強盜勾當後就不是獲得光榮，而是遭到痛打了。

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切<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侖觀念”〕都是不發達的、青春年少的小塊土地所抱的觀念；對於已經衰老的小塊土地說來，這些觀念是荒謬的，它們只是它臨死掙扎時的幻覺，是變成了空話的詞句，是變成了幽靈的魂魄。但是，為了使法國國民大眾解脫傳統的束縛，為了使國家權力和社會之間的对立以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一出模仿帝國的滑稽劇是必要的。隨着小塊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劇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國家建築物將倒塌下去。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軍事官僚政府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來⁸⁹。

12月20日和21日大選的謎，要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找到解答，這次大選把第二個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並不是為了讓他去接受法律，而是為了讓他去頒布法律。

顯然，資產階級現在除了投票選舉波拿巴之外，是再沒有別的

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士宗教會議⁹⁰上訴說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須改革風化时，紅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們大声喝道：“現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們却要求天使！”法国資產階級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現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資產階級社会！只有盜賊还能拯救財產；只有違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經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負有保障“資產階級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資產階級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階級。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階級的代表人物，并頒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階級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階級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階級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階級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現。因此必須保护原因并在結果出現的地方把結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結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結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現。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 and 資產階級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階級在資產階級社会的範圍內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預先抄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⁹¹的賢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現。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階級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軍隊都屬於这个階級，而这个階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庫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頒布法令、撇开法令和違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負的这种充滿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說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設法拉攏这个階級，时而又設法侮辱另一个階級，結果使一切階級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襲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階級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預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資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銀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貸款。但是銀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經營，——因此就应该优待銀行。于是銀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結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訂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約。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稅負。因此必須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稅額。但是給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 en detail〔零买〕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稅增加了一倍，而 en gros〔大批买〕酒喝的中等階級的酒稅却减低了一半。現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須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債負并加速財產集中的抵押銀行。但是这些銀行必須利用来从被沒收的奥尔良王室財產中榨取金錢。可是沒有一个資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沒有規定的条件，結果土地抵押銀行也就始終只是一紙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階級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給另一个階級一些什么。正如吉

茲公爵在弗倫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財產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債務而被称为法国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財產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債務。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贈給法国，或者說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錢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議院、国务會議、立法团、荣誉軍团勳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沒有士兵的国民自卫軍参謀部以及被沒收的奥尔良王室財產，都成了买卖对象。軍隊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給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會員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沒收奥尔良王室財產一事曾說过这样一句俏皮話：«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鷹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話，对于这只无宁說是烏鴉的鷹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特斯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計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財產的守財奴說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計算你的財產，但你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說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錯年月，他們把每分钟都計算进去。钻进宮廷，钻进內閣，钻进行政机关和軍隊的上层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貪婪的浪蕩者。他們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儼如苏路克高官显宦

^① «vol»一語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

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維隆-克勒維尔^①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社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內閣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C'est le roi des drôles», “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⁹²或路易十五統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論，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②。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侖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資產階級經濟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瀆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⁹³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侖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汪东圓柱頂上被推下来。

①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表妹培蒂”中，把克勒維尔描繪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維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維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

② 这是德·日拉丹夫人的話。

弗·恩格斯 英 国⁹⁴

I

英国辉格党人的运气大为不佳。帕麦斯顿还没有来得及因为“没有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得到一个同盟者，一个朋友”而被撤职，由于撤职一事而引起的第一件丑闻还没有平息，整个报界就又掀起了战争的叫嚣，并因此而公布了一大堆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管理不善的事例，而这些事例足以毁掉几个部。

从1846年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权威都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英国被侵犯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但是在当时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些首先无事张皇的人的那种唐·吉珂德式的姿态只能令人可笑。特别突出的是赫德将军，当时，他经常呼吁国家要加强国防，因而落了个不很光彩的名声。当然，在这里也不应当忘记，老威灵顿曾同样认为现有的岸防工事是非常不够的。

不过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突然使这些争论具有了新的意义。约翰牛立即感到，法国的军事独裁，即对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的拙劣的模仿，很可能使法国投入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企图对滑铁卢的失败采取报复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

的英雄功迹不是十分辉煌的：在开普兰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的尝试，——尽管他们使用了欧洲的战术和火炮——也被手无寸铁的黑人粉碎了，这些黑人使敌人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⁹⁵。假如英国军队不得不同经历过阿尔及利亚战争锻炼的可怕得多的“非洲人”⁹⁶发生冲突，那他们会得到什么下场呢？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不知廉耻的冒险家，谁敢担保他不会在一个早晨不通过枯燥的宣战手续，就率领十至十二只满载军队的蒸汽舰在许多艘战列舰的护送下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并向伦敦进军呢？

情况确实很严重。政府立刻下令在南部沿海和东南沿海的各大港口的入口处构筑新的炮台。但是公众对这件事情也是认真的，并且采取了那种快要使政府感到极不愉快的做法。人们首先调查了现有武装力量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时候，即使根本不防守爱尔兰，那末能够用来保卫大不列颠的最多不过两万五千个兵士和三十六门马拉的火炮；至于海军，目前各港口没有一艘较大的军舰是准备好启航去阻击登陆的。人们发现，英国兵的装备使他们的运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根本不实用，这点在同卡弗尔人作战时已经得到证明；同时还发现他们的武器根本不能和欧洲其他军队的武器相比，任何一个英国兵的枪都简直无法同普鲁士的针发枪或法国猎兵的步枪相比。在海军军需部里曾经发现营私舞弊和玩忽职守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所有这一切也被那些无事张皇的人和各式各样追求地位的人难以想像地加以夸大。

这件事似乎将首先触犯英国贵族、食利者和资产者，因为法国人的入侵和可能的占领将使他们首先遭殃。然而不要忘记，英国独立地发展，这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充分发展了的矛盾

通过斗争得到缓慢的然而彻底的解决，这对于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即使英国这种独特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有时也会成为大陆上在个别时候获得胜利的革命者的暂时障碍（如 1848 年和更早些的 1793 年），然而从根本上来讲，它所具有的革命内容却远远超过大陆上所有那些一时的震荡所具有的革命内容的总和。当对欧洲的侵占使法国大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英国通过蒸汽机使社会革命化了，夺得了世界市场，愈来愈把所有那些从历史上看已经衰落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从而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大决战打下基础。拿破仑曾企图将十五万人的军队从布卢调到福克斯顿并在共和国军老兵的援助下去占领英国，结果没有成功。这一情况对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复辟时期，当时大陆交给了被贝朗热恰如其分地描绘过的那些正统主义的微不足道的小人⁹⁷，而在英国，由于坎宁内阁已经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内阁，因而在老牌的反动的托利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并且开始了对英国宪法的逐渐破坏，这种破坏活动从坎宁开始，后来又由皮尔继续，至今仍未终止，它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导致整个腐朽建筑物的轰然倒塌。这种对旧的英国制度的破坏和这种破坏所赖以发生的、由大工业引起的英国社会的不断革命化，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而不管当时在大陆上得胜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并且这种发展虽然缓慢，但却可靠，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失败⁹⁸是一次非常性的失败，是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坚决的排斥。推动英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不是大陆上的政治动荡，而是普遍的商业危机，是威胁着每个人生存的直接的物质打击。而现在，当工业资产阶级从政权中最后地排除所有传统阶级，从而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进行

决战的日子迫近的那些无可争辩的迹象日益明显的时候，如果这个发展受到阻碍，或是英国被12月2日的掠夺成性的御用军所征服，哪怕是暂时地征服，那也会给欧洲的整个运动带来最悲惨的后果。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集结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所以，在工业中只存在着是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工业中（只要在某个地方已经有了它的話），有着能够促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他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显然，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最关切的问题就是：英国的这种将导致两个工业阶级的矛盾走向极端尖锐化和导致被压迫阶级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的发展方向，不要因受到外国的压迫而改变；这种发展的动力不要受到削弱；决战的时刻不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入侵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大不列颠是一个不包括爱尔兰时拥有二千二百万居民而包括爱尔兰时则有二千九百万居民的国家，像这样的国家不是通过突然的袭击所能占领的。那些无事张皇的人举出迦太基为例，说迦太基的舰队和陆军都分散在最远的领地，而迦太基的两次失败都是罗马人突然袭击的结果⁹⁹。但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这一点姑且不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所以能在非洲登陆，只是因为在这以前迦太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已被消灭，迦太基的舰队已被赶出了地中海，所以突然袭

击决不是突然襲击，而是一个庄严的軍事行动，正是这次行动，才十分自然地結束了延續很久的而在很长时期中終究是羅馬占优势的战争。而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就像拿破侖并吞威尼斯共和国一样¹⁰⁰。但是，現在法国已不是 1797 年时代的法国，而英国也不同于当年衰退的威尼斯。

拿破侖曾經认为占領英国至少需要十五万人。在那时虽然英国能頂用的士兵比現在多得多，但是它的人口和工业資源都少得很。因此，不管目前英国人拥有的力量怎样薄弱，然而要想占領英国，至少还需要同过去一样多的人。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任何一个在英国登陆的侵略軍至少需要推进到提斯河、太恩河或者甚至推进到特威德河；它如果停留在比較近的地区，那末各工业区的全部資源仍然是在防御者的手里，而它为了对付后者不断增加的力量，就不得不去占領从軍事观点来看好处很小并且使它的力量过于分散的那些障地。在上面提到的几条河以南的地区，即英格兰本身，共有一千六百万居民。然而为了保证交通綫，为了圍攻和占領岸防要塞以及防止必然发生的民族起义，需要很大数量的兵力，以至他們能够在苏格兰边界采取积极行动的兵力就非常少了。因此，为了占領英格兰，鎮压国内的起义，并且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正規战争，假如只有不到十五万人的軍隊，即使是在最好的指揮下，也是不可設想的。

假定能够用征召新兵和巧妙集中的办法把十五万人迅速集結在法国北部沿海的某一个地点，这至少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可以一方面抽調塔霍艦队¹⁰¹和附近其他各停泊場的蒸汽舰，另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停泊在各港口的、曾被拆

除了武器裝備的艦船進入戰鬥準備，這樣就能够在拉芒什海峽集中相當可觀的一批海軍兵力；再過一個月，全部蒸汽艦和一部分帆力艦將從大西洋各停泊場以及從馬爾他島和直布羅陀開來。因此，登陸部隊必須一次登陸完畢，或者，至少也要分幾大批登陸，因為登陸部隊同法國的聯繫遲早要被切斷。每次至少需要渡過五萬人，這樣，全軍三次就可以渡完。同時，運送軍隊只能使用有限的幾艘軍艦，或者根本不能使用軍艦，因為這些軍艦必須對付英國艦隊的攻擊。法國不可能在六個星期內在拉芒什海峽的本國港口內集中足以運送五萬人及其所必需的火炮和彈藥的運輸工具，即使扣留中立的船隻，也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但是遠征每推遲一天，都會給英國帶來新的優勢，因為英國唯一需要的就是集中艦隊和訓練新兵的時間。

但是，如果說考慮到英國的艦隊就不應該把十五萬人的登陸部隊分成三批以上登陸，那末任何一個嚴肅的軍事家考慮到英國的陸軍，也就不敢率領五萬人以下的軍隊在英國登陸。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对入侵有利的情况下，英國人也仍然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來進行準備；如果認為英國人在這段時間內不會組織起一支在敵人援軍趕到以前就能毫不費力地把這支五萬人的前衛部隊趕到海里去的陸軍，那對他們是太不了解了。必須考慮到，軍隊只能在瑟堡和布倫之間上船，而登陸只能在威特島和杜弗之間進行，也就是說只能在沿海地區進行，而這一地區的任何一個地方距離倫敦都很近，只要行軍順利，四天之內即可完成這段距離。必須考慮到，上船和登陸取決於風向和潮水；英國艦隊將在拉芒什海峽中進行抵抗；第一批登陸和第二批登陸之間大約要相隔八天到十天的時間，無論如何不能少於四天，因為絕大部分的軍隊是要靠帆船來

运送,而且这些军队必须在瑟堡和布倫之間的整个沿海地区集中;要知道“布倫兵营”¹⁰²也不是立即就能建立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不能一次至少运送七八万人,法国人恐怕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为此,还是需要弄到运输工具,而这又需要时间。但是远征每延迟一个星期都会使英国的防御手段得到增长,而且比敌人的运输工具和海战手段增长得更快,所以这就使侵犯者处于愈来愈不利的地位;事情很快就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除非他们一次就把十五万人运送过去,否则他们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并且这十五万人即使过去了,也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如果不继续派十万人左右的预备队,最后也必遭歼灭。

总而言之,利用突然袭击是不能侵占英国的。假如为了侵占英国而把整个大陆联合起来,那末仅仅是制造和获得运输工具就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英国却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本国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可以集中起一支海军,其力量将超过大陆各国的所有舰队力量的总和,从而使它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最后,还可以组织起一支陆军,它将使任何敌人不可能在英国土地上停留下来。

正是现在,英国人的民族感比1815年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遭受侵略的严重危险会使这种民族感达到一个新的特殊的高潮,况且,大不列颠的居民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毫无军事素质的;当然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大陆上的这些阶级比较起来是很不善于使用火器的,因此也不太适于进行内战。但是总的来说,英国居民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有尚武精神的,而且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适合于当兵的人。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猎人和偷猎者,即受过一半训练的轻步兵和猎手;有四

五万名从事机器生产的机械师和工人，他們受到的訓練比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精选出来的同样数量的人都要良好，所以更适于在修械所工作，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役。紧靠苏格兰边界的地区几乎完全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带地形的特点是崗巒起伏，因而非常适合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如果說，游击战迄今只是在人口比較稀少的国家里取得成功，那末，英国在遭受严重襲击的情况下将会证明：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例如在几乎到处是房屋毗連的郎卡郡和西約克郡，游击战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

至于說为了掠夺富有的港口城市和破坏仓库等而进行的突然襲击，显然，在目前英国完全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襲击。关于防御工事甚至不值得一提。只要斯比特海德海峡沒有軍艦，就能平安无事地进抵南安普頓港灣的入口处，派遣足够数量的軍队登陆，以便从南安普頓任意索取賠款。看来，烏里治目前同样有可能被占領和破坏，但却需要使用較大的力量。保卫利物浦的只是一个拥有十八門铁制的沒有瞄准装置的海軍炮的可怜的炮队，炮队的勤务由八个或十个炮手和半个連的步兵担負。但是，除布萊頓以外，英国的所有沿海城市都位于海灣的里面或者是河流入海口的上游，而且都有淺滩和暗礁作为天然的工事，而这些淺滩和暗礁又只有当地的領港員才熟悉。誰要是企图在沒有領港員引导的情况下在这些狭窄的、通常只有漲潮时大船才能通过的海峡中开辟道路，那末，他就要冒得不偿失的危險，这样的远征一旦遇到某种抵抗和一些事先預料不到的微小的阻碍，就会遭到像 1849 年丹麦远征埃克恩弗尔德¹⁰³时的悲慘結局。相反，假如有一两万人乘蒸汽舰迅速地在某一个乡村地区登陆，对一些小的外省城市进行短时间的然而肯定会有一点积极后果的掠夺性的远征，那当然是很容易实现

的，因为现在对这种远征是绝对无法阻止的。

但是只要塔霍舰队、北美分舰队以及一部分在巴西和非洲之间追捕那些贩运奴隶的船只的蒸汽舰奉命返回英国，同时使停泊在各军港的、曾被拆除武器装备的舰船都进入战斗准备，那末所有这些忧虑就会自行消失了。这样就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推迟任何一个更严重的侵犯尝试，从而使英国有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但是惶恐的心理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后果，它将使英国改变那种可笑的政策：在地中海保持有八百门舰炮，在大西洋有一千门，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有三百门，而在国内却没有一艘军舰保卫沿海地带；就是说，改变那种当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的政策。拙劣、笨重和各方面都很陈旧的装备，以及陈旧的武器；陆军和海军部门的极端严重的玩忽职守；在这些部门中达到了危险程度的任人唯亲的风气、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的行为，——这一切缺点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最后，工业资产阶级将摆脱对和平大会与和平协会的偏爱，由于这种偏爱，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应得的嘲笑，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损害。如果战争终于爆发的话，那末，根据众所周知的、现时正在大放异彩的全世界历史的讽刺来看，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位先生必将以和平协会会员¹⁰⁴和不久将来的大臣的双重身分发动一次很可能以整个大陆为对象的激烈的战争。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II

議會會議定于2月3日即下星期二召开。关于議會首先要辯論的三个主要問題，我們已經簡要地說过了其中的两个¹⁰⁵：帕麦斯顿的撤职問題和对法战争中的防御手段問題。剩下的就是第三个問題，也就是对英国的发展极其重要的問題——**选举改革問題**。

一开始就会由罗素提出的新改革法案，还将使我們有充分的机会来詳細地考察英国选举改革的普遍意义。現在，当关于这个法案还只是听到一些流言和对流言的解釋的时候，我們只能指出，在这整个問題中，首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反动的或頑固的階級，即土地貴族、食利者、证券投机商、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船主和一部分商人和銀行家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他們的权力，以及他們要把哪一部分权力让給站在所有进步階級和革命階級前列的工业資產階級。关于无产階級在这里暫時还談不到。

“每日新聞”¹⁰⁶——工业資產階級在倫敦的机关报和关于这类問題的最好来源——报道了关于輝格党内閣准备的新改革法案的一些消息。根据这个报道，預定的改革触及到現行的英国选举制度的三个方面。

从前，每一个議員必須拥有至少获得三百英鎊收入的地产才具备进入議会的資格。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限制条件差不多总是通过假买地产和假造契約的办法被迴避过去了。它对工业資產階級說来早已失效了；現在这个条件應該完全取消。要求取消这个

条件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宪章¹⁰⁷的“六点”中的一点，我們很想看看官方怎样来承认这六点（整个这六点带有完全资产阶级的性质，在美国都已实现）中的一点。

迄今为止选举制度是这样规定的：按照英国的旧习惯，一部分議員由郡选派，另一部分議員則由城市选派。想在郡里选举的人，必須拥有每年获得两英鎊收入的独立自主的地产（freehold property），或者拥有每年获得五十英鎊收入的租佃地产。可是在城市里却不同，凡是租住房屋交付十英鎊房租和交納相应比例数目的济貧稅的人，都有选民資格。由于这种制度，在选派議員的那些城市里，大批的小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也就是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享有选举权，而在郡的选举中，絕大部分的选民則是从屬於貴族的 tenants at will，也就是那些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从而完全依附于土地占有者老爷們的租佃者。去年洛克·金先生建議，把在城市里实行的房客繳納十英鎊租金这一条也推广到郡里，这个建議在当时人数很少的下院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贊成，而反对的只是那些大臣們。据說，罗素現在建議把郡的租金要求降低到十英鎊，而城市降为五英鎊，这一措施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时在城市里，无产阶级中收入較多的那一部分人将会立即获得选举权，这样一来，在一些大城市就很可能使宪章派的代表当选，而在中小城市里工业资产阶级将会获得許多新的选票和議席。在郡里，沒有选派自己代表参加議會的地方小城市的所有中小资产者都会立即获得选举权；他們通常会构成絕大多数，对現在在郡里占統治地位的某些貴族家族來說，他們人数众多而且又有比較独立的地位，因此他們能够制止这些貴族至今在选举中还采用的恐怖手段。这些地方小城市的小资产者本来就越来越处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

之下，現在，他們將會把很大一部分的郡交給工業資產階級。

直到現在，各個選區在地區大小和重要性上是非常懸殊的；代表名額無論同居民的數目還是同選民的數目都完全不相稱。在某個地方，一百或二百名選民能推選那麼些代表，而在另一個地方，六千至一萬一千名選民也是推選那麼些代表。特別是在城市中這種差別更加懸殊；而選民不多的小城市恰恰就是這個或那個大土地占有者進行最丑惡的收買賄賂（例如聖奧爾本斯）或者是實行絕對選舉獨裁的集中點。根據“每日新聞”報道的材料，有八個最小的城市選區應當被剝奪今後推選自己代表的權利，可是其餘的選舉議員的小城市，將會同另外一些相鄰的至今只在郡里才有代表的地方小城市聯合起來，這樣一來，選民數目就會大大增加。這是模仿蘇格蘭早在同英格蘭聯合（1707年）時起就開始實行的城市組合制度。無論這種措施多麼不徹底，工業資產階級也會指望通過它來加強它的政治勢力，其證明就是，工業資產階級很久以來就認為選區的平等化同議會改革的所有其他問題比較起來具有特殊的意義。此外，根據報道，倫敦和郎卡郡這兩個工業資產階級的主要中心將在議會中獲得更多的代表名額。

如果羅素真的打算提出這類的法案，那末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這件事對這位小人物來說的確是很了不起的。顯然，他對皮爾的桂冠羨慕不已，他要表現一次“勇敢”。誠然這種勇敢將伴隨着英國輝格黨人所固有的胆怯怕事、謹小慎微和顧慮重重的表現，並且在目前英國社會輿論的情況下，除了羅素本人和他的同僚——輝格黨人而外，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勇敢。但是在一切猶豫、動搖、懷疑之後，在上次會議結束以來一直全力以赴地企圖尋找立足點而又屢遭失敗以後，大概不能期待這位小小的勳爵提出比上述建議

更多的东西了，当然假定他在星期二之前还提不出新的主張的話。

不用說，工业資產階級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要求 household suffrage，即凡是占用一幢房子或其一部分并因此而交納市政稅的戶主的选举权；它也要求秘密投票和完全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同样数目的选民和同样数目的財產有相等的代表名額。它将頑強地、长期地和內閣进行討价还价，并从內閣方面得到每一个可能得到的让步之后，才会出售对內閣的支持。我們的英国工业家們都是些老练的商人，大概他們要按最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票的。

但是，現在就已經可以看出，甚至像前面談到的內閣提出的最低限度的选举改革，除了加强工业資產階級的权力而外，不会得到其他的結果。現在，工业資產階級已經在实际上統治着英国，为了使它的最高統治权在政治上也得到承认，它正在朝这个方向飞速前进。无产階級为爭取自身利益而对工业資產階級进行的独立斗争只有在后者的政治統治权确立之后才能开始，但是無論如何它也会从这次选举改革中得到一些利益。这个利益到底会有多大，完全取决于选举改革的辯論和最后通过是在商业危机爆发之前进行，还是一直拖延到商业危机的到来；因为无产階級暫且只能在偉大的决定性时刻才作为一支积极力量走上前台，正如古代悲剧中的命运之神一样。

1852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1月23日和30日

載于1927年“馬克思主义年鉴”第4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給“泰晤士報”編輯的信¹⁰⁸

親愛的先生！

大陸上最後殘留的一些獨立報刊也都被查封了，因此揭露在歐洲的這個地區所發生的一切違法 and 迫害行為這樣一個光榮的義務，就落到英國報刊身上了。所以，請允許我通過貴報向公眾報告一件事實，這件事實表明，普魯士的法官和路易-拿破侖的政治奴僕們完全是不相上下的。

您知道，假如在恰當的時機搞一個經過周密策劃的陰謀，那將是一種多么有價值的 *moyen de gouvernement* [統治方法]。普魯士政府在去年年初很需要搞這樣一個陰謀，好讓議會變得比較馴服一些。為此目的，逮捕了許多人，動用了全德國的警察，但是結果他們一無所獲；經過種種偵查之後，警察當局最後只能把少數幾個人關進科倫監獄，硬說他們是一個遍於各地的革命組織的領袖。在這幾個人中首先包括同新聞界有聯繫的兩位先生：貝克爾博士和畢爾格爾斯博士；還有從事醫務工作的丹尼爾斯博士、雅科比博士和克萊因博士，其中的兩個人是很好地履行了濟貧所醫生的艱苦職責的；此外還有一個大化學企業的領導人、因自己在化學方面的科學成就而馳名全國的奧托先生。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有罪，所以，人們每天都以為他們會得到釋放。但是，就在他們被

拘禁的期間，頒布了一個“紀律法”，這個法律使政府有權通過非常簡便的手續解除任何一個不稱政府心意的審判官員的職務。這個法律的實施可以說立即影響到當時已經拖延很久而遲遲未決的、上面提到的那幾位先生的案件的進程。不僅把他們關進了單人牢房，不僅禁止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朋友之間的任何來往（甚至是書信來往），不許他們讀書和寫作（在普魯士，這一切甚至對重犯在判決之前也是不禁止的），而且改變了整個訴訟程序的方向。Chambre du Conseil〔高等法院〕（您知道，在我們科倫是根據Code Napoléon〔拿破侖法典〕進行審判的）立即同意確認他們的犯罪構成，並且把材料提交檢察院，即由法官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其職能相當於英國的大陪審團¹⁰⁹。我請您特別注意這個委員會所作的史無前例的決定。在這個決定里有下列一段實在令人吃驚的話，現在我們把這段話逐字逐句地翻譯如下：

“鑒於沒有提出可靠的材料，因而也未能確定犯罪構成，所以沒有理由提起公訴（您當然會以為，由此得出的必然結論應該是下令釋放被拘禁者了吧？完全不是！）^①，因此，全部記錄和文件發還偵查員，重新進行偵查。”

這就是說，在十個月的拘禁期間，儘管警察當局花了很大力氣，王國檢察官也費盡心機，卻沒有能夠造成一点点犯罪構成，而在此之後，全部程序卻要從頭再來一遍，也許，再經過一年的偵查，案件會第三次交還給偵查員吧。

這樣令人不能容忍的違法行為是事出有因的，政府現在正在準備成立一個由最忠順的分子組成的最高法庭。政府在陪審法庭上必然會遭到失敗，所以它必須拖延對這個案件的最後審理，直到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號〈 〉內的話或標點符號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

——譯者注

能够把它移交給新的法庭，而这个新的法庭当然是会对国王百依百順，而使被告毫无保障的。

如果普魯士政府仿照路易·波拿巴的办法，立即根据国王的命令对犯人进行判决，那岂不是显得更加誠实得多嗎？

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您的最順从的僕人

普魯士人^①

1852年1月29日于倫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斯图加
特版第1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① 这个署名是馬克思的，信的正文則是恩格斯写的。——編者注

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 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一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嗎？和誰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嗎？”在所有議論欧洲事态的場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問題。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偉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險家，一夜之間就占領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議會，两天之內就把首都的起义鎮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騷乱，經過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統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攬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羅馬帝国的御用軍軍团把帝国拿到市場上拍賣給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經歷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資產階級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訊”¹¹⁰，从12月份起就沒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們对这个軍事独裁者、毀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殘出版事业的劊子手等等的义憤。

然而，在給路易-拿破侖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視的同时，我們认为工人階級的机关报¹¹¹不应该加入这个罵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紡大王的报刊、土地貴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謾罵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紳士們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們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侖所有从別人那里搶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階級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們在英国的利益的階級那里搶去的。这并不是說，路易-拿破侖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階級，不从工人階級那里搶去他所想要的一切。問題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階級身上已經没有什么可搶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敗之后，在資产階級議會統治的三年半期間，凡是能够从工人階級那里搶去的东西，他們都已經搶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階級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搶的东西呢！选举权嗎？——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經剝夺了工人階級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嗎？——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經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階級所壟断了。出版自由嗎？——真正的无产階級的报刊已經被淹沒在起义者即偉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殘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議會后来的每一次會議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¹¹²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們的武器嗎？——已經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軍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階級的手里。

可見，到不久前的 coup d'état [政变]时，工人階級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經极少，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了。而另一方面，中等資产階級和大資产階級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

刊、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議會都屬於它們。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經過三十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場地。对这个阶级來說，在几小时之內就被搶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就像他們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侖的卑鄙的違法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議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維護“原則”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侖之間进行的。路易-拿破侖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經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闊綽的先生們”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戶和沒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經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剝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失去了1852年5月可能得到的一次大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滿，那时，它将在1848年6月之后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場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統治权，它就不能允許在沒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資格来干預双方之間的糾紛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因此，工人阶

級必須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議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轉到它的范围内——轉到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場。但是，不要忘記，即使在这种場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經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議会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經发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侖和军队結成同盟？此外，还应当記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經在六月起义中被殘杀，有的則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侖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絕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騷动，更不要說革命了。

現在，在英国人們都說，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則他們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說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是應該得到这样漂亮的綽号的。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們的見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方向，他們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极限为止。1848年六月的失敗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現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侖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連串胜利的頂峰。可以預料，一

且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清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二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壟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傳統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籠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連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 *métayers* [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負債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

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騷动时期的工人阶级，其次是賴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統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間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從他們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轉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說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員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負債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鈍，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們抱住自己的旧傳統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傳的深奥道理；他們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們沒有負債而且生活还比較富裕，因此他們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給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侖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緒，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轉到紅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傳統，他們断言，如果說路易-拿破侖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們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这个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騙子，而在自己周圍又环繞着一群上流社会的大騙子的路易-拿破侖，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墮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子組成了一个領取津貼的組織，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

样，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摇旗呐喊的败类，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通过这一切，他就能安祥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沒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行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拿破侖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血流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侖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吗？但是，路易-拿破侖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障地——共和国；而一旦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一个好像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拿破侖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侖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三

我們再說一遍：路易-拿破侖所以能取得政權，是因為最近四年來法國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的公開的戰爭，使這些階級精疲力竭，削弱了每個階級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權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上述這種情況下，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只能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進行（至少暫時是如此），即通過競爭、工會組織以及其他各種和平鬥爭的手段進行，——在英國，一百年來各個階級就是利用這些手段互相對抗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切互相鬥爭的階級都希望（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有一個所謂強有力的政府，它能夠鎮壓和制止一切小規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發起來的公開戰爭，這些戰爭得不到任何結果，而只會破壞新形式的鬥爭的發展，延遲為新的決戰積蓄力量的過程。這種情況多少可以說明法國人普遍順從現在的政府這樣一個無容爭辯的事實。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都能重新積蓄起足夠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夠出來公開為自己要求對法國的專政呢？這當然誰也無法斷定。但是由於現今事變的迅速發展，這兩個階級當中的任何一個階級都有可能突然出現在戰場上，這樣，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在街頭重新爆發的時間，就可能比根據雙方相對的或絕對的力量所能預料的要早得多。因為，如果法國的革命政黨即工人階級政黨一定要等待 1848 年 2 月時的力量對比重新出現，那末它勢必要在上十年的時間中俯首聽命，安分守己，——當然它不會這樣做。

NOTES

TO

THE PEOPLE.

BY

ERNEST JONES,

OF THE MIDDLE TEMPLE, BARRISTER AT LAW,

Author of the Wood Spirit, Lord Lindsay, My Life,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Confessions of a King, Recollections of a Student, The New World, Beldagon Church, Painter of Florence, Canterbury versus Rome. &c., &c.

PRICE TWOPENCE.

CONTENTS:

The People's Anthem	==	==	813	Labors Grievances	==	==	842
Current Notes	==	==	813	THE CHARTIST MOVEMENT	==	==	844
Woman's Wrongs	==	==	829	Continental Notes	==	==	846

London:

J. PAVEY, 47, HOLYWELL STREET.

1852.

Giles & Co., Printers, 22, Castle Street, Holborn.

Read in this Number "Continental Notes."

Read in this Number "Current Notes, No. 1."

Read in this Number "Chartist Reports, 1."

載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
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語人民”杂志的扉頁

同时，像路易-拿破侖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这一点我們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終必須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我們不談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們只想談談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經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¹¹³。有誰能够預料由路易-拿破侖駕駛的大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擋得住必将爆发的風暴呢？

但我們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鷹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况来談吧。支持他的是軍隊、僧侶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資產階級（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須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爭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入安于新的秩序。至于軍隊、僧侶、政府官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經糾集在自己周圍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謀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賄賂、現金以及公开搶劫国家的財產。我們已經看到路易-拿破侖如何敏捷地支付現金，或是把他的朋友們安插到最能使他們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戴莫尔尼來說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滿身債務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經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債，而且还大大撈了一把，其数目甚至連貝尔格萊夫廣場¹¹⁴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銀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資產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問題——工人

問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能够宣揚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議會和會議讲坛都已經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階級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階級的利益。路易-拿破侖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誰来付款？”这样一个問題。由于这个問題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目，比所有其他問題——民軍問題、改革問題等等——加起来还要多。尽管路易-拿破侖强制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項的很大一部分¹¹⁵，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們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階級的状况，弄清楚現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們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們就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侖的名字的人的現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結論。

弗·恩格斯写于 1852 年 2 月—4 月初

載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3 月 27 日和
4 月 10 日“寄語人民”第 43、48 和 5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寄語人民”

卡·馬克思 致“科倫日報”編輯部的聲明

“科倫日報”¹¹⁶第51号发表的巴黎2月25日的一篇通訊的作者就所謂德法密謀¹¹⁷写了下面一段話：

“有些被告已經潛逃，其中有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說是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这种不仅給我增添了“同伙”而且增添了“代理人”的說法的欺騙性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阿·迈尔是卡·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魯士陸軍中尉維利希的一个密友，他曾在他們領導的流亡者委員會¹¹⁸中当會計師。关于这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人离开倫敦一事，我只是从我的一个日內瓦的朋友的来信中才得知的。我的朋友告訴我，有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以最荒謬的指責对我进行攻击。最后我从法国報紙上了解到这个阿·迈尔原是一位“政界人物”。

卡尔·馬克思

1852年3月3日于倫敦

載于1852年3月6日
“科倫日報”第5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科倫日報”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流亡中的大人物¹¹⁹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52年5—6月

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一次載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1930年版第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歌頌吧，永垂不朽的靈魂，為有罪的人的贖罪”¹²⁰……通過哥特弗利德·金克爾。

哥特弗利德·金克爾生于四十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利德·金克爾。毫無虛構的真實情況。傳略”這本由阿道夫·施特羅特曼出版(1850年漢堡霍夫曼和康佩出版社版，八開本)¹²¹的自傳中已有描述。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義的濟格瓦特時期¹²²的英雄，這個時期在德國產生了無限的愛國主義的苦悶和淚如泉涌的悲傷。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濟格瓦特的姿態初露頭角的。

他的日記又長又亂（他的世俗生活就是帶着這樣的特点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他的表白也同樣雜亂無章，這一切都應歸功于使徒施特羅特曼，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位使徒的“七拼八湊的敘述”。

波恩 1834年2月—9月

“年輕的哥特弗利德和他的朋友保爾·澤勒爾一同研讀福音神學，他以勤勉和虔誠博得了他的著名教師〈扎克、尼茨施和布列克〉的尊重。”（第5頁）

一開始我們便看到他“顯然是沉溺于深思”（第4頁），他“悲傷而憂郁”（第5頁），完全像一個 grand homme en herbe [未來的偉人] 所應該表現的那樣。“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閃爍着憂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視着”幾個“穿棕色燕尾服和淺藍色外套的”大學生，

他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飾內心的空虚”(第6頁)。他感到道义上的憤慨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馬尔海奈凱”，而这些大学生竟罵馬尔海奈凱是“蠢才”。后来，当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繼續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馬尔海奈凱的时候，他在日記中针对馬尔海奈凱抄下了下列的文学名言(第61頁)：

“我說，徒爰空想的那是蠢人，
那犹如一匹着了魔的畜生，
不管周圍都有牧場美好青青，
却在于枯的荒原上四处找寻。”¹²³

不过，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忘記了麦菲斯托費尔用来取笑渴求知識的学生的另一句名言：

“你尽管蔑視理智，蔑視科学！”¹²⁴

整整这一个有教益的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給世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6頁)。

于是哥特弗利德說：

“假如沒有战争，这一代是始終不会灭亡的……只有十分有力的手段才能帮助我們这个衰微的时代！”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你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但又比他更胜一筹。”

由此可見，淺藍色的外套使哥特弗利德蒸蒸日上，甚至可以宣布自己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了。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評語，这个評語可以作为傳記的題詞：

“我和父亲时常暗笑你偏爰模糊的概念！”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伟人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了意义深重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比金克尔更有意思地经历过的那些不值一提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中和任何教会法庭中屡见不鲜的跟小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利德总是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友人保尔的家要离开波恩回维尔腾堡去。哥特弗利德便把这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哥特弗利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声明连这一次他“已经爱过两次了”。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13页）。哥特弗利德和友人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发出下面的颂歌：

“别了，友谊，我将认救世主为兄弟！别了，爱情，信仰将是我的未婚妻！别了，你的爱恋之情，我将和成千成万正直的人结合在一起！去吧，我的年轻的心，学会单独和你的上帝在一起，和他战斗，直到你战胜他，直到他赋予你新的名字，除了得到它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你好，壮丽的初升的太阳，我的觉醒的灵魂的影象！”（第17页）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利德狂热地颂赞自己的灵魂的良好时机。但是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同声齐唱。在这个热烈地倾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利德讲话时“声音激昂，容光焕发”，他“忘记有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狂喜”，如此等等（第17页）。一句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一样。

“保尔以忠实的眼光带着忧郁的微笑看着他，并說道：‘在你的胸中跳动着的一颗比我更勇敢的心，你，当然，将胜过我，但允许我在远离你的地方仍然做你的朋友。’哥特弗利德高兴地握住向他伸出的手，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第18頁）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場戏里，哥特弗利德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友人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利德偏爱模糊的概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利德的高超和未来的偉大。哥特弗利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寬厚地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

* * *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加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日。家庭的节庆也成了炫耀的机会，“可敬的母亲像救世主的母亲一样，也叫馬利亚”（第20頁）。毫无疑问，这就是預示着哥特弗利德也要做世界的救主和贖罪者。这么一来，在傳記的头二十頁內，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繪成挪亚、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 * *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利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內心的感受。他作为傳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学家所特有的虔敬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軟弱和矯揉造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們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虔信宗教，哥特弗利德也充分意識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誠的贖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富于生趣的消遣”发生了冲突，而从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教和詩意的斗争；上加塞尔牧师的儿子和一伙同学一起喝下

的一杯啤酒也变成了体现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搏斗的极不幸的一杯。从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对“哥特弗利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28页），这种被认为是未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利德对演员的矫揉造作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个虔诚的悍妇，据说有一次她打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那个女孩子在教堂中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小姐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利德在泽尔舍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宏伟的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重大事件。

* * *

泽勒尔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利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深情地低声对她说：“爱利莎，再见了！别的话我不敢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声济格瓦特式的叹息：

“毁灭了！”“默默无言！”“柔肠寸断！”“灼热的额头！”“深沉的叹息！”“剧痛浸透了他的脑髓”等等。（第37页）

这样，这一整场摹仿先知以利亚的表演，就成了演给“朋友保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向孤独而悲痛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利德。”（第38页）

哥特弗利德又高兴起来了。

“只有当我配得上我的亲爱的人并有了名望的时候，我才再和她相见，我的这个决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第38页）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悶的时候，他也沒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和預先向人炫示桂冠。哥特弗利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难以想像的浮夸把他的恋爱故事記載在紙上，以便世界不致失掉他那些只存在于日記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主要效果还没有达到。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請他的打算征服世界的导师注意这种情况，如果爱利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利莎也许就不再能使他滿意了。

哥特弗利德却庄重地说：“呵，不会的！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內心的花瓣的时候，又将会怎样呵！”（第40頁）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提出反駁，說理性上的理由不能使詩人信服。

“哥特弗利德微笑着回答道：‘您的全部智慧就像我們的可爱的疯狂一样，毕竟不能使您摆脱命运的波折。’”（第40頁）

对着自己微笑的納尔苏修斯¹²⁵，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候选者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这位大人物所喜爱的瓦格納¹²⁶，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着”。效果达到了。

* * *

哥特弗利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識上达到了高峰，他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

“可惜，我同黑格尔派离得愈来愈远了；成为一个唯理論者，这是我最衷心的願望，但是我同时又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必要时甚至还是一个虔敬主义者。”（第45頁）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

柏林 1834年10月—1835年8月

哥特弗利德脱离了貧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但是我們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較起来）的生活情况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特弗利德的日記中記載的，只是他同新的 *compagnon d'aventure* [冒險伙伴]，巴門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激动，以及可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金錢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評論員的身分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完全沒有任何联系，只是在施略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轉。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泰然自若地充作沃尔弗拉姆^① 大师，而哥特弗利德則充作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大师（第67頁）。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漸漸暗淡下去；哥特弗利德又迷恋于瑪丽·施略辛小姐了；他不幸得悉爱利莎同他人訂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个本来應該完全屬於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沒有得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在他离开柏林之前，老魏斯〈导演〉又一次把他带进剧院。这位殷勤的老人指着陈列德国剧作家的半身像的大厅里的几个空着的壁龕，并意味深长地說道：

‘还有空着的位置！’

这时，一种奇異的感觉控制了这个人。”

哥特弗利德非常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老滑稽演員所作的“未来的永垂不朽”这种过分的夸奖；为普拉頓的孽徒哥特弗利德預备的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

① 即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編者注

波恩 1835 年秋—1837 年秋

“他經常動搖于藝術、生活和科學之間，這三方面他都研究，但是沒有固定的意向，他希望在他決定不下從事哪一門的情況下在每一方面都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得到一些，甚至創造一些。”（第 89 頁）

哥特弗利德意識到自己是個猶豫不決的學識膚淺的人，于是他回到波恩。感到自己的學識膚淺自然并不妨礙他去考取學位并擔任波恩大學的講師。

“無論是夏米索，或是克納普都不願在他們出版的年鑑¹²⁷上發表他投去的詩篇，這件事使他非常煩惱。”（第 99 頁）

這就是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顯露頭角的初次嘗試，而他在個人的生活圈子裡一直是憑吹噓他的未來的偉大度日的。從這時起他便最終成為大學生文藝小組中頗成問題的當地名人，直到他在巴登遭到射擊負了輕傷而一舉成為德國小市民的英雄為止。

“在金克尔的胸中逐漸激起對永久和忠實的爱情的苦悶，這種苦悶是任何工作都无法排除的。”（第 103 頁）

這種苦悶的第一個犧牲品，是一個叫敏娜的姑娘。哥特弗利德和敏娜演起戲來，為了玩花樣，有時他竟扮作慈悲的馬哈德伐¹²⁸，要這位姑娘把他當作神來崇拜，而他則關切姑娘的健康。

“如果關於她的狀況金克尔能够欺騙自己的話，那末他是會愛她的；不過他的愛情只能加速這朵凋萎中的玫瑰的死亡。敏娜是第一個能够了解他的姑娘；不過她會成為他的第二個希姑葩^①，她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火炬，雙親的火焰會通過孩子燒毀自己的房屋，就像柏里亞的特洛伊城被燒毀一樣。但

① 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特洛伊國王柏里亞的妻子，偉大英雄赫克托爾的母親。——譯者注

是他不能离开她，他为她柔腸寸断，他的痛苦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同情。”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必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經常忙于装扮自己的花花公子，他在选择未婚妻时最初总是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所谓的病状以及它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们的后果等那些令人作呕的議論，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并没有断絕这种关系，而是在这种关系中寻求内心的充分的自我滿足；只是在这种关系使他有機會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他才割断了它。

哥特弗利德到他的一个剛死了儿子的舅父家去。在可怕的半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很富于貝里尼的歌剧風味的戏：“在遺骸旁”和她訂了婚約，第二天早晨便順利地被舅父接納为未来的女婿。

“他也时常想到敏娜，想到他必将重新見到她的时刻，那时她已永远地失去了他；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她不能向一顆早已交給了別人的心提出任何要求。”（第 117 頁）

訂立新的婚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向使“义务和热情”发生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通过极端庸俗的卑鄙行为实现的；体面的小市民竟然自认为敏娜对他那“已經交給了別人”的心提出要求是不合法的。虽然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騙是靠事后捏造“交心”的日期来維持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有德行的大人物感到絲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利德在耐人寻味的必要情况下，伤害了“可怜的偉大的心”。

“停了一会哥特弗利德繼續說：‘同时我感到应当請求您的寬恕，亲爱的

敏娜，也許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 敏娜，昨天我那樣親切地伸給您的這隻手，再也沒有自由了，我已經訂婚了！’”(第123頁)

不過這位傳奇式的候補神學家很謹慎，他告訴她訂婚是在他“那樣親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後的幾小時以後發生的。

“天啊！…… 敏娜，您能原諒我嗎？”(同上)

“我是個男子，應該忠於自己的義務，我不應該愛您！但是我並沒有欺騙您。”(第124頁)

在這個事後增添的道義上的義務出現之後，就該去作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有成效地顛倒整個關係了：仿佛不是敏娜寬恕他，而是道德高尚的偽善者寬恕被欺騙的敏娜。於是抱着這個目的又去捏造了一套：敏娜“會從遠處懷恨他”，由於這個假想，最後又添上了一段道德說教：

“‘我願意原諒您；如果是這樣的話，您可以預先就相信我會寬恕您。而現在要永別了！我的義務在召喚我，我不得不離開您了。’於是他緩步走出了涼亭…… 從這一刻起哥特弗利德便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第124頁)

喜劇演員和臆想的情人變成了偽善者，以假惺惺的寬恕一切的姿態脫了身。濟格瓦特通過臆造的戀愛糾紛，順利地達到了能夠把自己描繪成一個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終於大白，原來這一切捏造的戀愛波折，只是哥特弗利德的一幅矯揉造作的自画像。整個事情的过程是這樣：幻想將來要永垂不朽的偽善者，把舊約全書中的故事同施皮斯、克勞倫和克拉麥爾式的時髦的“流動圖書館”幻想揉合在一起，並且陶醉於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浪漫的英雄人物。

“他在翻書的時候，偶然發現了諾瓦利斯的‘奧夫特丁根’ 129，後者還在一年前就時常鼓舞他去從事詩的創作。當他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他就同

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条頓’的小組，小組成員給自己規定的目的是一起学习德国历史和文学，他当时用的笔名就是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現在他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就是瓦特堡下面的可爱的小城里的那个亨利希，对‘藍色花朵’的思念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但是，不管他怎样质問他的心，敏娜和他的未婚妻都决不是那童話中的閃閃发光的花朵。他陷入了幻想，如饥如渴地繼續讀下去，光怪陆离的世界圍住了他，最后，他哭着倒在沙发上，思念着‘藍色花朵’。”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飾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謊言；爱伪装，力图穿上別人的盛装，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內在本質”。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現在又装扮成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藍色花朵”，而是会把他认作这种角色的女人。最后，他終於在一个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符合他們的理想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藍色花朵”，虽然这花朵已經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傳說和冒險故事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哥特弗利德的天資不足，这是他从別人那里抄袭来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瑪丽、敏娜、爱丽莎第一和爱丽莎第二的毫无根据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經达到了歌德的感受这样的高度。歌德在狂烈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利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現在也應該旅行到羅馬去。歌德已預感到哥特弗利德：

“連鯨魚身上也有虱子，
我怎能擺脫它們的騷扰？”¹³⁰

意大利 1837年10月—1838年3月

哥特弗利德在日記中連篇累牘地描繪了从波恩到科布倫茨的

旅程，这是羅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結束完全一样，即把別人的遭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輪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約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剛剛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創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¹³¹。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真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終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剧”。(第 140 頁)

在金克尔从科布倫茨到羅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情浓意深的来信（他經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驅散了阴郁的思想。”(第 144 頁)

“对美丽的爱利莎的爱情，在年輕人的思念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 146 頁)

* * *

在羅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羅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訴他，爱利莎能够使他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 只是現在他才学会了爱。”(第151 頁)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給她幸福。而在幻想“藍色花朵”时，他早就預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滿了强烈詩兴的童話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蕩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編排新的冲突：

“在意大利，金克尔的繆斯显然是打瞌睡了。”(第 151 頁)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体裁**。”(第 152 頁)

后来我們知道，他在意大利逗留了六个月之后，順利地带着“**体裁**”回到了德国。因为歌德在羅馬写了他的“哀歌”，所以哥特弗利德也写了哀歌“羅馬的觉醒”。(第 153 頁)

* * *

在金克尔的寓所，女佣交給他一封他的未婚妻的来信。他高兴地拆开了信，然而

“大叫一声，倒在床上”。“爱丽莎告訴他，有一个姓德·的医生，是个很有錢的人，业务很发达，甚至还有……一匹乘馬(!)，这个人已向她求婚。因为他，金克尔，可怜的神学家，还要过相当长的時間才能弄到一个可靠的地位，所以她請求他解除把他俩联結在一起的約束。”

接着便是“恨世和懊悔”¹³²的完整的再現。

哥特弗利德“毁灭了”，“呆若木人”，“发楞的眼神”，“复仇的心”，“匕首”，“情敌的胸膛”，“对手心臟的血”，“冰块一般地冷淡”，“痛苦得发狂”，如此等等。(第 156 和 157 頁)

在“可怜的神学家的这些痛苦和欢乐”中，不幸的候补者主要是被一种思想折磨着：爱丽莎为了“眼前的世俗的幸福”而“鄙視”他(第 157 頁)。哥特弗利德按照舞台艺术的各项規定沉湎于上述感情，过了不多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下面的崇高的慰藉：

“她配不上你，你有天才的双翼，它們将使你高高地飞越在这些阴郁的痛苦之上！当你的荣誉遍布全球的时候，那个变节的女人将受到內心的惩罚！……誰知道，也許过几年她的孩子会求我帮助，我倒并不想过早地迴避这件事。”(第 157 頁)

在他当然地預先高度享受了“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后，便露出了市僧伪君子的卑鄙的嘴臉。他估計，也許将来爱利莎的陷入貧困的孩子会来求助于偉大的詩人，而“他倒并不想过早地迴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馬”而不要哥特弗利德經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的幸福”而擯棄了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劇。老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尚的意識总是轉变成卑鄙的意識¹³³。

波恩 1838年夏—1843年夏 (陰謀和爱情)

哥特弗利德在意大利歪曲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决定回国后表演席勒的“陰謀和爱情”。

虽然哥特弗利德的心灵因世界悲哀而受到难堪的折磨和煎熬，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167頁)。他打算“通过著作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169頁)，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爭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利德經常因追求“女人”而感到的“模糊的苦恼”表现在对婚約的朝訂暮改上。訂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征服和束縛住所爱的人的标准的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的藍色花朵的时候，詩人那种温柔的、模糊的感伤的幻想便凝結成候补者的非常明朗的思想：用“义务”的紐結来补充那理想的心灵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見面便 *à tort et à travers* [不加選擇地] 追求同所有的雛菊和百合花訂婚的庸俗行

为，使哥特弗利德为了证明他的“詩人的偉大的痛苦”而不停地傾吐衷腸时所装出的那付矯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嘔。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利德当然又應該“訂婚”了。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其虔敬的宗教狂热早被哥特弗利德用感叹詞在日記里永久記載的那个約翰娜，直接給他指明了使他苦悶的对象。

“比格霍耳德恰巧在这几天宣布他同金克尔小姐訂婚，而比任何时候都纏得更紧地干涉弟弟的恋爱事件的約翰娜，由于种种原因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这些最好不談），希望哥特弗利德也同她的未婚夫的妹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結婚。”（第 172 頁）“金克尔”——不言而喻——“應該无条件地爱慕那位温順的姑娘…… 那是个可爱的純洁的姑娘”（第 173 頁）。“金克尔以非常的柔情”——这是不言而喻的——“获得了她的双手”，“只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生活上有一个可靠的地位并且能够使他的未婚妻”——这又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个教授的或牧师的和睦家庭，幸福的双亲就会高高兴兴地立刻把她許配給他”。

充滿热情的候补者在每次冒險中表現出来的对結婚的向往，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詩句洋溢在紙面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鬚发，他都认为是“空虛的东西”。

“这一切我都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第 174 頁）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纏得更紧的姐姐約翰娜”的命令，并且由于經常使他心痒的对“小手”的爱慕，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結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叫做“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靜的”爱情（第 175 頁），“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 176 頁)

事情是这样：在哥特弗利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經常同浪漫的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利德沒有能够通过戏剧的效果在新的济格瓦特式的境况中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便求助于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比較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成了虔誠的荣克-施梯林¹³⁴，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同新的情人“結婚”。

* * *

最后，我們就要談到这个充滿事件的生命中的极不幸的災难，即施梯林同那个和馬蒂約离了婚的女人約翰娜·莫克尔相識一事。哥特弗利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幻想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齡大而已經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沒有得到世界的承认。她有令人討厭的庸俗的面貌；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有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来博得声誉。在柏林，她曾經企图模仿蓓蒂娜^①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敗。她的經驗使她的性格变得殘酷了。她和金克尔一样，曾經喜爱装腔作势和无限夸張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性质，但随着年齡的增长她对爱情的迫切“需要”（施特罗特曼的話）比起用詩歌大談爱情的需要来是愈来愈强烈了。金克尔在这方面的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

① 即阿尔宁。——編者注

剧，直到互相满足为止，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馮·奥夫特丁根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四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利德置身在“团体的浪潮”（第 190 页）里，即在德国大学城里的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做“特权小组”）里，这些小组只能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者的生活中开辟新的纪元。莫克尔唱着歌，并且陶醉在掌声里。哥特弗利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哥特弗利德说：‘当你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下张开天才的双翼在快乐世界的上空飞翔的时候，你大概感到心曠神怡吧。’莫克尔激动地反驳道：‘那是您的感觉。我听说您有非常好的诗才；也许您也会受到极口赞扬……那时我将问您，您幸福吗，如果您不……’‘如果我不？……’——哥特弗利德在她停顿下来的时候问她。”（第 188 页）

笨拙的多情善感的候补者上钩了。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不久前她

“听了她关于基督受难的传道，她想，这个漂亮的青年真正棄絕了尘世，他甚至唤醒了她胸中的因心灵中纯朴的梦想而引起的轻微痛楚，这种梦想从前是由那已失去的信仰之声所唤起的。”（第 189 页）

哥特弗利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 189 页）了。他异常高兴地“确信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他立刻决定“以自己对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感人的信仰”，“重新赢得……这个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要“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

* * *

“在1840年間金克尔也被任命为科倫福音公会的牧师助手，他开始每星期日早晨到那里去讲道。”(第193頁)

傳記作者的这个說明提醒我們談一談金克尔在神学中的立場問題。“在1840年間”，批判已經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布魯諾·鮑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①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傳教士。但是他既沒有正統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 à la [正如]克魯馬赫尔一样，是通过多情善感的空談同基督教勾搭上的，他把基督描繪成“朋友和老师”，企图拋棄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一切“丑陋的东西”，并且用好听的空話来偷換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換内容、用空話偷換思想这套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談家，他們自然是要把民主当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学問，讲民主則相反，好听的空話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内容的响亮的空談，nullité sonore [空談]完全代替了对問題的見解和看法。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的东西，采取克劳倫的方式加以闡述，在他的演說和著作中，显示出这种牧师饒舌的典范，这种饒舌有时也被叫做“散文詩”，而且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詩才”。不过，他創作詩的目的[不]^②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毒莓来裝飾他那平凡的小徑。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本质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上的軟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現出来了。他“模仿大学生”的举止，来迴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則上升为大学讲师。这一派里出現了

① 下面的字是“运动”、“批判”，在原稿中已被划去。——編者注

② 这里原稿被弄坏了。——編者注

整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們、叔尔茨們以及同他們类似的人物，这些人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怀抱里說他們的漂亮的空話，研究他們的學問，完成他們的无足輕重的“崇高使命”。

* * *

新的恋爱关系現在具有了关于小公鸡、小母鸡^①和小鸡蛋的小故事的性质。

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在当时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写作模糊的“政治詩歌”的現象逐渐消失，而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現了。

哥特弗利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創辦了“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

“唯一的宗旨就是为亲密友好的小集团每周举行一次欢暢的和快乐的晚会，并使参加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供爱好艺术的善意的批評家們評断”。（第219頁）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宗旨是要解决藍色花朵之謎。集会是在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莫克尔当然要被捧为“女王”（第210頁），金克尔則被捧为“大臣”（第255頁）。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給予他們的不公正的待遇”（第296頁）。他們可以在他們所选择的亨利希·馮·奥夫特丁根和藍色花朵的角色中互相滿足对方的需要，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

① 原文中是俏皮話：«Hinkel»（“小公鸡”）和«Gockel»（“小母鸡”）同金克尔和莫克尔的发音相似。——編者注

哥特弗利德應該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終於創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第 254 頁）。这一出可笑的喜劇本身同时成了实际行动的序幕：

“这些晚会也給了他到莫克尔双亲家中去拜訪莫克尔的机会。”（第 212 頁）

在这里我們要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哥丁根的“林苑协会”¹³⁵的摹制品，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期，而“小金虫协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作为辯護士的傳記作者自己承认，如塞巴斯提安·隆加尔特、利奧·哈賽、卡·阿·施倫巴赫等等这些“忠实的小金虫”（第 254 頁）都是些平凡、庸俗、懶惰和头脑空虚的大学生。（第 211 和 298 頁）

* * *

哥特弗利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比較”（第 221 頁），不过“关于結婚和訂婚的問題，暂时还没有時間来作无謂的思考（其实，他是慣于这样做的）”（第 219 頁）。他就像布利丹的馱子一样，在两堆干草之間犹豫不决。但是飽經世故和比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明显地促进了看不見的联系”（第 225 頁）；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緣或天賜良緣”。（第 229 頁）

“有一天，哥特弗利德在通常因为有事而不能去看莫克尔的时候到她那里去。他輕輕地走到她的房門前，听到了哀怨的歌声。他注意地听着：

‘有你在旁，我就像

沐浴在朝霞里……’

‘多么痛苦，

唉，你却不知！’

长长的、悲哀的音调结束了她的歌声，并慢慢地消失在空中。”（第 230 和 231 页）

哥特弗利德悄悄地（他自以为如此）溜回家里，他认为这一情节非常有意思，便开始写起要死要活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累莱¹³⁶（第 233 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了。除了上述机缘以外，还有另一个命定的机缘，这一次算是定局了。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 236 页），而且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艘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哥特弗利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当他紧抱着被救者游近岸边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只有这个女人才能给他幸福。”（第 238 页）

这一次哥特弗利德终于不是想像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亲和力”¹³⁷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解除了婚约。

* * *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会监察公署告诉哥特弗利德，说他是新教牧师，不能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结婚。哥特弗利德引用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

1. “他同那位女士在‘希尔策居姆普欣’饭店里喝咖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罪过。”（第 249 页）

2. “问题还没有决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公开声明，他打算同这位女士结婚，也没有说没有这个打算。”（第 251 页）

3. “至于信仰问题，那末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第 250 页）

“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喝一杯咖啡。”（第 251 页）

哥特弗利德說完了這句話，便同无法拒絕邀請的恩格斯牧師一起離開了舞台。哥特弗利德善于这样威嚴而溫和地解決同現存條件發生的衝突。

* * *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利德发生什么影响，我們举下面这一段話来加以說明：

“1841年6月29日。这一天隆重地庆祝‘小金虫协会’成立一周年。”(第253頁)“关于誰应当受獎的問題，得出了一致的決定。哥特弗利德謙恭地跪在女王的面前，女王把当然的桂冠戴在他的灼热的头上，这时夕阳的熾热的光輝照耀在詩人的容光焕发的臉上。”(第285頁)

在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像的詩人榮譽之后，藍色花朵就趕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願望。在这个晚上，莫克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詞的結尾概述了“协会”的全部宗旨：

“我們得出的教訓是什么？

小金虫，飞吧！

誰老了誰就找不到伴侶，

因此，不要作过多的考虑！

小金虫，飞吧！”

天真的傳記作者說，“这里所包含的許婚的意思，完全是一时之兴”(第255頁)。哥特弗利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放棄”两年之內繼續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們加給他的桂冠和对他的崇拜和吹捧。1843年5月22日，他和莫克尔結婚了，在这以前，莫克尔(尽管她不信教)根据下面这个荒謬的借口信仰了新教：“新教与其說是以某些信条为基础，不如說是以倫理概念为

基础。”(第 315 頁)

“又得出一个教訓：
藍色花朵和信仰格格不入！”

* * *

哥特弗利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轉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結合的。但是現在莫克尔要讀施特劳斯的“耶穌傳”¹³⁸，因而又变得不信教了，

“他痛心地随她沿着怀疑的小徑走向否定的深淵。他同她一起給自己开辟走向新哲学迷宫的道路。”(第 308 頁)

因此，他的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經对群众发生了影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偶然的高兴。

从他的日記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么：

“我倒願意看一看，这个从康德到費尔巴哈的巨大的浪潮会不会把我拋向泛神論！！”(同上)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論的範圍，好像費尔巴哈就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日記里接着說道：“我的生活的基石并不是历史的認識，而是不可动搖的体系，神学的核心也不是教会的历史，而是教义。”(同上)

好像德国哲学恰巧沒有把不可动搖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認識里，恰巧沒有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的历史中！这些自白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位民主主义者的全部反革命性，对这位民主主义者說来，运动本身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辯駁的永久真理即腐朽的靜止点的一种手段。

根据哥特弗利德上述的辯护的流水賬本，讀者可以自己判断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状况和这位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神学家身上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

二

金克尔的生活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在二月革命发生以前，他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科特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作者在巴登受伤为止，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

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传记作者没有提到。金克尔自己承认，他最大的愿望是至死也要当一个剧院的老经理。他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叫艾森胡特的巡回演出的丑角演员，这个人带着他的戏班子沿莱茵河来回旅行，最后发了疯。

哥特弗利德除了在波恩发表充满牧师的雄辩的讲演之外，有时也在科伦举办神学和美学方面的富于艺术的演出。当二月革命爆发时，他用以下的预言结束了这些演出：

“从巴黎传来的战斗的雷声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标志着一个美好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暴风雨之后，接着便幸福地吹起自由的和风；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幸福的时代——君主立宪的时代。”

君主立宪政体把金克尔提升为副教授，来答谢他的这番恭维。但是，这个承认并不能使 grand homme en herbe [未来的伟人] 感到满意。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决不急于让“他的荣誉遍布全球”。此外，新的政治诗给弗莱里格拉特带来的桂冠，使曾经受到“小金虫”们褒奖的诗人坐立不安。于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来

了一个向左轉，先成为立宪民主派，然后又成为共和民主派（honnête et modéré〔循規蹈矩的和温和的〕）。他很想当議員，但是在5月的选举中他既沒有能到柏林去也沒有能到法兰克福去。然而他不顾这些最初的失敗，繼續爭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說，他花了不少力气。起先他很明智沉着，只在本地的小地区內活动。他創辦了“波恩报”，一种以民主派的无謂空談和愚昧无知能够拯救祖国这种幼稚可笑的想法著称的地方小报。他把“小金虫协会”提高到民主派大学生俱乐部的水平，从这个俱乐部里不久便出現了一群这样的学生，他們向波恩地区的所有居民傳播老师的荣誉，并把金克尔教授先生硬塞給每一个集会。他自己在娛樂場同食品雜貨店老板大談其政治，同正直的手工业者友好地握手，甚至在京德尼希和澤尔舍德的农民中宣揚他热爱自由。但是他特別同情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他同他們一起，为手工业的衰落，为自由竞争的惨重后果，为現代的資本和机器的統治而痛哭流涕。他同他們一起制定了恢复行会制度和消灭交易所投机的計劃，为了完成他所想的这一切，他在“手工业，救救自己吧！”¹³⁹这本小册子中闡述了他在娛樂場同小业主們談話的結果。

为了使人一眼看清金克尔先生的位置究竟應該擺在哪里，他这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如法兰克福^①所具有的全民意义，他把这部著作献給了“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經濟委員會的三十位委員”。

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美”的探求，使他立刻得出結論：“手工业者阶层目前完全分裂了。”（第5頁）分裂就在于：有一些手工业者“去食品雜貨店老板和官吏的娛樂場”（了

① 此处法兰克福是指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譯者注

不起的成就!)，而其他的人則沒有去；有一些手工业者受到了教育，而另一些沒有。虽然有这种分裂，但作者仍然看到了有利的征象：在可爱的祖国，各地都成立了手工业者协会和举行了手工业者會議，并且到处都在进行改善手工业者阶层的状况的宣傳(請回忆一下1848年的“文克布莱希哀歌”¹⁴⁰)。为了对这个有益的运动貢獻一份力量，他出了个好主意，陈述了他的拯救綱領。

首先，作者研究了这样一个問題：怎样才能通过限制来消除自由竞争的弊病，而又决不根本取消自由竞争。在这个問題上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立法应当防止沒有学得足够的手艺和达到必要的熟练程度的青年成为师傅。”(第20頁)

“每个师傅只能有一个学徒。”(第29頁)

“学习手艺也必須經過考試。”(第30頁)

“考試时考生将随之学习的师傅必須在場。”(第31頁)

“为了保证必要的熟练程度，我們要求立法規定，今后凡不滿二十五岁的人都不得当师傅。”(第42頁)

“为了保证学得足够的手艺，我們要求今后每一个新的师傅都要經過考試，而且是当众考試。”(第43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考試要完全免費。”(第44頁)“一个居住在农村里的同行师傅也要經過”(第55頁)这种考試。

朋友哥特弗利德自己干着挨戶叫卖政治的勾当，却希望把“流动的或挨戶叫卖”其他普通商品的生意人当作不正当的生意人加以取締。(第60頁)

“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在营业中力图使自己赢利，而使他的被欺騙的貸款人受到損失。就像一切含糊的东西用外国名字来表示一样，这种行为也用一個外国名字来表示，这就叫破产。为此，他便很快地把自己的成品拋向邻近的地区，并立刻把它們卖給出高价的人。”(第64頁)这种甩卖行为“是一种不老实的行为，是我們的可爱的邻居——商业阶层灌輸到手工业者的園地里来

的”，这种行为必須加以取締(朋友哥特弗利德，連根鏟除禍害和立即取締破產，不是更干脆得多嗎?)。

“趕集当然是另一回事。”(第 65 頁)“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当让各个地方召开專門討論市集問題的全体公民會議来处理，由多数(!)来决定保存还是取締固定市集。”(第 68 頁)

哥特弗利德后来轉到手工业和机器劳动之間的关系这个复杂的“爭論問題”，并且提出了下面的原則：

“让每一个出售成品的人只握有他能亲手制造出来的商品。”(第 80 頁)
“因为机器和手工业分离，所以二者都走向了衰落，并脫离了正道。”(第 84 頁)

他想通过手工业者(如該城市的裝訂工人)成立协会和共同购置机器的办法把手工业和机器結合起来。

“因为他们們将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完成定貨而利用机器，他們的生产費用就能够少于拥有工厂的商人。”(第 85 頁)“資本可以用协会来摧毁”(第 84 頁)(而协会可以用資本来摧毁)。

后来，他又把自己关于波恩的联合起来的有執照的裝訂工人“拥有画綫机、平整机和切紙板机”(第 85 頁)的思想扩大到关于“机器所”的思想。

“有关行业的联合起来的行会師傅的协会应当在各地設立同小商人的工厂相仿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为当地的師傅制造定貨，不接受其他雇主的任何定貨。”(第 86 頁)这种机器所的特点是：只是“在开初需要經營商业”(同上)。“陶醉于”这种想法的哥特弗利德高声叫道：“同这种想法一样新穎的任何想法，在实现之前，都需要非常平靜和实际地加以考虑，直至考虑到最微小的細節。”他号召“每一种手工业都独自为自己作这样的考虑。”(第 87、88 頁)

这里又扯到了关于反对来自利用囚犯劳动的国家的竞争的論战、关于罪犯流放地(“建設一个人道的西伯利亚”第 102 頁)的回

忆，以及对军事部门的“所谓手工业连和手工业委员会”的抨击。不言而喻，手工业者阶层所担负的军事重担应当减轻，为此，国家必须按照高于自己所能生产的价格向手工业者订购炮弹。

“这样，竞争问题就不再存在了。”(第109页)

哥特弗利德然后转而谈到了第二个基本论点，这就是国家应当给手工业阶层以物质援助。哥特弗利德完全是从官吏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他坚持这样的意见：最容易帮助手工业者的是由国库贷款建立手工业局、储金互助会等等。至于国库应当从哪里得到这笔资金，这里当然没有加以研究，因为这是问题的“不漂亮的”方面。

最后，我们的神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扮演道德宣教者，不能不指教手工业者阶层，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自己。起初是“抱怨长期借款和扣款”(第136页)，并且要求手工业者凭良心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朋友，你是否坚持你所做的每一种活都取同样的和不变的报酬？”(第132页)关于这件事，他特别警告手工业者不要向“有钱的英国人”要过高的价钱。哥特弗利德英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的结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第139页)然后是埋怨手工业者的妻子不该热衷于打扮和手工业者本人不该老惦着喝酒(第140页及以下各页)。

手工业阶层能够用来改善本身情况的手段是：“行会、互助保险会、手工业者仲裁法庭”(第146页)，以及工人教育协会(第153页)。这种教育协会的最新成就是：

“歌唱和朗诵终于架起了一座通往戏剧表演和手工业者剧场的桥梁，必须把这种剧场始终看做这些美学意图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劳动阶级重新学会登台表演的时候，对他们的艺术教育才告完成。”(第174、175页)

这样一来，哥特弗利德便順利地把手工业者变成了喜劇演員，从而又把問題归結为自身。

但是这种討好波恩手工业者的行会要求的把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朋友哥特弗利德由于发誓要帮助恢复行会，因而被选为代表波恩出席欽定的第二議院¹⁴¹的議員。“从这一瞬間起哥特弗利德感到自己”幸福了。

他立刻动身前往柏林，由于他认为政府打算把第二議院建立成經過核准的立法者的永久“行会”，他准备永久居住在那里，并决定叫妻子和孩子到他那里去。但是第二議院被解散了，哥特弗利德在享受了为时不久的当議員的乐趣之后，伤心失望地回到了莫克尔的身边。

此后不久，政府和法兰克福議會之間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南部和萊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祖国在召唤，哥特弗利德响应了它的号召。在济克堡有后备軍的軍械庫，而且济克堡同波恩一样，是哥特弗利德最經常地播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同他的朋友退职少尉安內克联合起来号召他們所有的追随者向济克堡进军。集合地点在吊桥。本来应当来一百多人。但是等了很久以后，哥特弗利德数了一下他的好汉們，还不到三十人，而且其中（这是“小金虫协会”的洗不尽的耻辱）总共只有三个大学生！虽然如此，哥特弗利德仍然同他們这一小部分人勇敢地过了萊茵河，直赴济克堡。夜漆黑，下着雨。突然勇士們的背后傳来了馬蹄声。勇士們躲在路旁，枪騎兵的巡邏队从他們身旁飞驰而过。有几个卑鄙的坏蛋泄露了秘密：当局已有准备，无法进军了，于是只好退回。这一夜哥特弗利德所感到的刺心的痛苦，只有他以前当克納普和夏米索拒絕把他的初期詩作收进他們的繆斯年鉴时所感受的痛苦可以相

比拟。

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不能再留在波恩了。可是，难道普法尔茨不是他进行活动的广阔的场地吗？他动身前往凯则尔斯劳顿，因为必须给他一项职务，所以便在军事局里给了他一个高俸的闲差（据说是委托他管理海军事务¹⁴²）。他照例是在当地的农民中挨户叫卖自由和人民福利来赚取面包，听说，在某些反动地区他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哥特弗利德肩负行囊精神饱满地在大路上走着，从那时起，所有的报纸都按这一不变的特征来描写他。

但是，普法尔茨的运动很快就结束了，金克尔又重新出现在卡尔斯卢厄，不过肩上背的已不是行囊而是火枪，从此火枪又成了他的不变的特征。据说，这枝火枪非常漂亮，枪柄和枪托是用桃花心木做的。无论如何，这是一枝很美的、富于艺术性的火枪。美中不足的是，朋友哥特弗利德既不会装弹，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也不懂步法。因此，有一个朋友问他：他为什么要去战斗，哥特弗利德反驳道：“不战斗干什么，我不能回波恩去，可是我必须活下去！”

于是，哥特弗利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哥特弗利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分担了这支队伍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掉队者预备的马车上午度过的。在拉施塔特¹⁴³，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形到现在还没有确实查明，可以相信的只是，志愿部队在散兵战中迷了路，这时从侧翼向他们射来了几枪，一颗流弹轻轻地擦

过了我們的哥特弗利德的头；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地上。虽然他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已不能同其余的人一起撤退了；他被护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在那里他向黑林山的純朴的居民請求道：“救救我吧，我是著名的金克尔！”最后，他碰上了普魯士人，于是便当了巴比倫的俘虏。

三

从被俘的时候起便开始了金克尔生活中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开辟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小金虫协会”一听到金克尔被俘，便立刻写信给所有的德国报纸，说伟大的诗人金克尔面临着被战地法庭判处枪决的危险，德国人民，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而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应当竭尽全力来拯救被俘的诗人的生命。据说，他自己这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自己同“他的朋友和导师基督”相比，关于自己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从这时起竖琴成了他的标志。于是，德国突然知道了金克尔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从这一瞬间起，大批德国小市民和风流自赏的庸人们一时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主演的关于蓝色花朵的喜剧的演出。

这时普鲁士人已经把他交付军事法庭。这使他有机会在经过了长时期的间歇以后第一次重新向他的听众发表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演说，就像他在科伦当牧师助手时成功地做过的一样（莫克尔可以作证），而且科伦也注定了不久就要重新欣赏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辉煌成就。他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由于他的一位朋友的不识分寸，这一辩护词后来不幸被柏林“晚报”传到了广大的公众的耳里。在这个辩护词中金克尔“抗议”

“把我的行为同革命不幸最后沾上了的污垢和淤泥（我知道这一点）相提并论。”¹⁴⁴

金克尔发表了这一高度革命的辯护詞之后，被判处二十年的要塞监禁；不过后来又恩准改为普通监禁。他被轉解到了瑙加特^①，据說他在那里曾經被迫紡羊毛，因此，他的标志先是行囊，后是火枪，再后是豎琴，而从現在起則变成了紡車。以后我們將看到，他怎样带着新标志錢袋橫渡重洋。

与此同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 1849 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們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們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沒有实现，在青年們的沸騰的心里甚至对祖国的命运发生了怀疑。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像的殉难者，因为他会像羔羊一样温順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他的痛苦会最清楚地体现出一切庸人的脆弱的而纏綿的苦悶。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已經酝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紡車旁的西番蓮金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傳道者、美学教授、議員、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現的詩人和剧院老經理的結合体之外，还有誰更适于表演这出偉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人所接受的。所有的报纸都充滿被俘的詩人的逸事、特写、詩篇、回忆。他在獄中的苦难被无限地夸大，描繪得像神話一样；报纸每月至少要报道一次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在所有的市民俱乐部里和一切晚会上，人們都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想起他。有教养的阶层中的少女因他的詩篇而感伤叹息，体会过热恋之苦的老处女在祖国

① 波兰译作：諾伏加特。——編者注

各个城市里为他的男性力量的逐渐消失而痛哭。而参加运动的其他一切普通的牺牲者、被枪杀者、陣亡者、被俘者，在这个唯一的牺牲羔羊面前，在这个征服了男女庸人的心的大丈夫面前都銷声匿迹了，人們仅仅为他而泪如雨下，不过，就是他一个人也已經可以給这些泪水以应有的报答了。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絲毫也不比上一世紀的文学中的济格瓦特时期逊色；而济格瓦特-金克尔从来也沒有感到还有什么比扮演这个角色更好了，在这个角色中，他之所以偉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那一切，而是由于他所沒有做的那一切，他所以偉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軟弱和恭順，在这一角色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有礼貌、有感情地忍受下去。飽經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軟心腸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經營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經发表过和沒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風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經驗，例如“螢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錢，她允許“小金虫”施特罗特曼应公众的要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記中最隱秘的表白。她組織了各种捐款，表現出无可置疑的經營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們的軟心腸变成了硬塔勒^①。同时她还感到滿意的是能够

“每天在自己的小房間里看到德国最偉大的人物，例如阿道夫·施塔尔。”

这种济格瓦特狂在科倫陪审法庭开庭时达到了頂点，在法庭上哥特弗利德于 1850 年春天作了訪問演出。这里举行了关于图

^① 旧德国貨幣，相当于三馬克。——譯者注

謀攻打济克堡的审判，因此金克尔被押解到了科倫。由于在本傳略中哥特弗利德的日記摘要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在这里引用一位目击者的日記片断也是完全恰当的。

“金克尔的妻子在監獄中訪問了他。她通过铁栏用詩句向他問候，而他，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則以六步韵詩作了回答。然后两人相对而跪，站在那里的典獄吏，一个老軍曹，弄不清他是不是要和这两个疯子或喜劇演員打交道。后来檢察長問他，他們在会面時說了些什么，獄吏回答說，虽然他們讲的是德語，但是他連一句也听不懂。关于这一点金克尔夫人好像說过，不应当任命一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毫无教養的人充当獄吏。”

在陪審員面前，金克尔完全扮演成引人流泪的角色，“少年維特之煩惱”¹⁴⁵ 时代中济格瓦特时期的文学家。

“‘法官先生，陪審員先生……我的孩子們的勿忘我花一般的眼睛……萊茵河的碧綠的水……再没有什么比同无产者握手更有失尊嚴的了……囚犯的蒼白的嘴唇……故乡的新鮮空气’以及其他胡話，这一整篇著名的辯護詞就是如此，公众們、陪審員們、檢察官們、甚至宪兵們听了这篇辯護詞都流出了悲伤的眼泪，于是法庭在一片叹息和呻吟声中一致通过宣判无罪。金克尔当然是一个可爱的好人，但是在其余的方面，他是宗教、政治、文学的回忆的令人嫌膩的混合体。”

很明显，在这段話里，作者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所幸的是这个痛苦的时期很快就因金克尔被解救出施潘道監獄这件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而告終。在这个解救事件中重演了獅心理查和布朗德爾的故事¹⁴⁶，不过在这里，坐在監獄里的是布朗德爾，而獅心則在庭院里演奏手搖風琴，而且布朗德爾不过是一个平庸的蹩脚詩人，而獅心實質上是个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獅心就是“小金虫协会”里的大学生叔尔茨，一个野心大而能力小的陰謀家，不过他这点能力已足够来了解“德国的拉馬丁”了。金克尔得

救后不久，大学生叔尔茨便在巴黎发表声明說，他清楚，受他利用的金克尔当然不是 *lumen mundi* [世界的灯塔]，正是他叔尔茨，而不是別人，肩負着担任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使命。这个人，一个曾被“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閃爍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視过的“穿棕色燕尾服和淺藍色外套的”大学生，的确是靠牺牲一个可怜的獄卒而救出了金克尔。这个獄卒現在正因此而坐了牢，不过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他是为爭取……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自由而牺牲的受难者！

四

在倫敦我們又看到了金克尔，这一次，由于坐牢的光荣和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多泪，他成了德国最偉大的人物。朋友哥特弗利德意識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很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富于浪漫色彩的得救事件在國內又激起了人們对金克尔的狂热的迷恋，这种迷恋只要非常巧妙地引上所需的道路，就会产生出实际的成果。同时，这个世界城市給著名的英雄开辟了重新博得荣誉的新的廣闊場所。他很清楚：他一定会成为当代的紅人。为此，他暫時放棄了一切政治活动，把自己关在家中，首先关心的是重新留起胡子，因为一个先知是不能沒有胡子的。然后，他訪問了狄更斯、英国自由派報紙的編輯部、倫敦西蒂区的德国商人，主要是訪問了該地的風流自賞的犹太人。他是所有人的理想人物：在一些人眼中是詩人，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授，一些人眼中是基督，一些人眼中是庄严的受难者奧德賽，但是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他都是溫柔的、灵巧的、好心的和仁慈的哥特弗利德。他一直到狄更斯在“家常話”里頌揚他和“新聞画报”¹⁴⁷上刊登了他的像片时才安靜下来。他使少数几个也在異乡感受到金克尔的煩惱的在倫敦的德国人活动起来，好像是为了要他們邀請他去作关于現代剧的讲演，并且把讲演会的門票整疊整疊地分发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詞的广告，进行詐騙，到处糾纏，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告

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滿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榮耀，在水晶宮¹⁴⁸的大鏡子里欣賞自己的映像，可以說，他感到非常舒適。

他的講演得到了承認（見“宇宙”¹⁴⁹）。

“宇宙”。金克爾的講演

“當我有一次看到德布勒的幻燈片時，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語言’來創作這樣亂七八糟的作品，能否講述幻燈片？當批判者一開口就不得不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批判的自由就像顫動的弦上發出的一个逐漸停息的音符的逐漸消失的聲音那樣，在產生激動的反應的通了電的神經里顫動，這當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寧願放棄對科學的無感覺作枯燥無味的、學究式的分析，而不願放棄德國流亡者的迷人的繆斯在我的感覺里的思想遊戲中產生的共鳴。一個響亮的、創造性的、建設性的、逐漸形成的‘字眼’——‘現代思想’構成這一金克爾式的基調，它的和音的這種反應。人類對這一思想的‘判斷’力從一堆混亂的虛偽傳統中引伸出了真理，並把它當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財產置于智力發達的、思想合乎邏輯的少數人的保護之下，這少數人使真理脫離了有信仰的愚昧而走向無信仰的博學。博學的無信仰肩負着詆毀由虔信宗教的錯覺產生的神秘主義，鏟除陷於偏見的傳統習慣的勢力，利用懷疑，這個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學斷頭台來砍掉威信的头並且通過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權政治的迷霧，邁向花朵盛開的民主主義的原野。〈廢話〉頑強地、熱心地學習人類的以及人們本身的編年史，這是一切變革參加者的極偉大的任務，而這一點是被驅逐的反叛的詩人非常清楚的，他在前三個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資產階級公眾面前講述現代戲劇史時，展示了自己的«dissolving views»〔“幻燈片”〕。”

“一個工人”

僅僅從“共鳴的範圍”、“逐漸消失的聲音”、“和音”和“通了電的神經”這幾個用語來判斷，大家都會確信，這個工人就是金克爾的最親近的親人莫克爾。

然而，就是這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孤芳自賞的時期也不一定能永久地維持下去。現存世界秩序的審判日、民主的末

日审判、光荣的 1852 年 5 月¹⁵⁰ 一天天临近了。为了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个偉大的日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重新披上政治的獅子皮，同“流亡者”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这里我們来談一下倫敦的“流亡者”，这是一堆由法兰克福議会、柏林国民議会和下院的前議員，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¹⁵¹ 这出喜剧的泰斗們，沒有讀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談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組成的混合物。

1848 年德国的大人物們已經站在可耻的結局的边缘，而“暴君”的胜利却挽救了他們，把他們扔到了国外，使他們变成了受难者和圣徒。反革命救了他們。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們中的大多数人引到了倫敦，于是倫敦便成了他們的欧洲中心。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須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事情，好使公众日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們的存在。必須以任何代价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些巨人的帮助也能前进。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沒有能力（由于自身的无能，也由于現存的条件）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們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張地宣布想像的活动情况、想像的政党、想像的战斗和想像的利益。这些廢物愈是沒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們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像中考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預尝了当权的滋味。这种充滿豪言壯語的热烈活动的結果，是組織了大人物称号的互助保險会和未来的政府职位的互助保障会。

五

建立这种“組織”的初次嘗試早在1850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倫敦各处都散发了用极其夸張的笔調写成的“告德国民主派的通告草案。草稿”和“致領袖們的附函”。这个通告和附函的内容是号召建立統一的民主的教会。最近目的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¹⁵²来共同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倫敦建立印刷所，团結一切派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流亡者就应当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領導中心，流亡者的組織就应当为广泛的民主派組織奠定基础。沒有資金的卓越人物应当作为中央局的委員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稅款中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不仅沒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共同的資本”，实行这种課稅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毫不隱諱，現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員會是这个“組織”的榜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占有較有利的地位的卓越的同盟者的羡慕。

这个通告是魯道夫·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合写的，在他們两人背后还隱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的以通訊委員身分出現的光輝形象阿尔諾德·卢格先生。

魯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爭吵的、夸夸其談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話：“我宁願做个厚顏无耻的空談家，而不願做默默无聞的人”¹⁵³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銘。康普豪森先生在权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与年輕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以重

要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見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話。由于官僚制度的体面，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舞台上，他有一次真的当了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后来在几个左翼議員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①出席柏林国民議会的議員。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講話的施拉姆却默不作声，但是又經常发牢騷。在制宪議会被解散以后，这个人民的民主派活动家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但是仍然沒有重新当选。后来，在布倫坦諾执政时期，他在巴登出現了一个短時間，并且在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¹⁵⁴里認識了司徒卢威。来到倫敦以后，他宣布要脫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官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而設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资产階級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装扮成激进资产者的模拟品。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較重要的人物。他的令人想起山羊皮的臉，他的凸出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眼睛，他的微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加尔梅克人的特征，立刻显示出他是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滿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說和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老实說，應該指出，由于目前对每个人來說要出風头都是愈来愈困难了，我們的古斯达夫，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擇手段地时而充当預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宣傳各式各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爭取德国自由的斗争，这是他在派駐联

①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編者注

邦議會¹⁵⁵的俄国大使館中担任了一个編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維護联邦議會的小册子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骨預先經他摸过和研究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傳只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預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地为德国天主教¹⁵⁶的道德原則及水疗法作宣傳。由于他对一切实证知識深恶痛絕,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的思想,在这些大学里应当取消普通四系的課程¹⁵⁷,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他所以非常頑强地想成为偉大的作家,自然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風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風格的东西。

早在四十年代初,古斯达夫便創辦了“德国旁观者”¹⁵⁸,这是他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張小报,他握有这張小报的特許权,而这張小报就像一个固执的思想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經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約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韦尔凱尔合著的“政治科学詞典”¹⁵⁹,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的版本。古斯达夫便立即着手从事这一加工工作,預先以“政治科学原理”¹⁶⁰为名出版了一个片断;这个工作成了“1848年以来最刻不容緩的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沒有运用近年来的經驗”。

与此同时,一次跟一次地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古斯达夫亲自对这三次成为整个現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的起义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描述¹⁶¹。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遭到了驅逐,而当他的报纸“德国旁观者”剛剛得以复刊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另外找了一个主編,繼續出版了該报。真正的“德国旁观者”和自命的“德国旁观者”斗争

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不过，古斯达夫却为此拟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应该分成二十四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和两院。宪法上还附有精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

1848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达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为了向黑林山脉的农民确切证明吸烟有害而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的这段时间。在寥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机关报。德意志自由国家。自由、富强、教化”¹⁶²的通报。可是，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第一条。取消瑞士进口货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税。第二条。責成稅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

他的忠实的阿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此外，她主持了被俘宪兵的宣誓典礼，即给每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别上红色的袖章，然后拥抱他。可惜，古斯达夫和阿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困于牢狱，在那里，古斯达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恢复了的自由时为止。那时，古斯达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的其余的固执的思想中又加进了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从……回顾……”1850年巴黎版¹⁶³）。后来他妄想充当外交部长，并且取得六万弗洛林归自己支配。布倫坦諾先生不久重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达夫的权力重担，于是古斯达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里担任了反对派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反对布倫坦諾实行那些他早先曾经支持

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达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法尔茨，但是禍中有福，当然的“德国旁观者”重新又在哈尔特河畔的紐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达夫所遭受的許多不应遭受的痛苦。还可以自慰的是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补充选举中，他被选为巴登制宪議会的議員，因此他有了以官方人士的身分回到巴登的可能。在这个議會中使古斯达夫大出風头的只有三个在夫賴堡提出的提案：（1）6月28日：宣布一切想同敌人举行談判的人都是叛徒；（2）6月30日：任命新的临时政府，以司徒卢威为全权委員；（3）前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由于拉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繼續反攻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居民免遭战争的災禍，为此必須預先发給每个官兵十天的薪餉，而制宪議会的議員則发給十天的薪金和旅費，然后吹着軍号，打着战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达夫独自潜入了瑞士，然而却被詹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儿打了出来，于是便来到了倫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大禍害**。这六大禍害是：君主、貴族、僧侶、官僚、常备軍、錢袋和臭虫。古斯达夫的另一发现是：錢袋是路易-菲力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达夫現在开始在“德意志倫敦报”¹⁶⁴（前不倫瑞克公爵的報紙）上宣傳这六大禍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感激万分地屈服于公爵閣下的檢查了。这就是古斯达夫对待第一个禍害——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禍害——貴族的态度，那末我們的富于宗教道义感的共和党人在給自己定制的名片上是自称为“司徒卢威男爵”的。如果說他沒有能够如此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禍害，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达夫利用在倫敦的閑

暇編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圣徒的名字被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名字所代替，特别是經常代之以“古斯达夫”和“阿馬利亚”这两个輝煌的名字，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仿制的德文名称，并且还有许多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地方。但是，在倫敦，恢复“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心爱的固执的思想又重新出現了。这些思想得到了施拉姆的完全的贊同，因此便产生了通告。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員——偉大的阿尔諾德·卢格，由于他的面貌令人想起那始終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騎兵班长而在其他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說，这位騎士由于外表特別好看而与众不同。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的臉型叫做貂的小臉(*figure de fouine*)。阿尔諾德·卢格，呂根島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蠱惑者的阴謀¹⁶⁵而在普魯士的监牢里坐了七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¹⁶⁶，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这样的原則(这个原則他曾在—部短篇小說中闡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間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怜虫海尔維格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在婚姻中就应当实现自己，因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結婚給自己奠定了“实体基础”。

他靠他的黑格尔詞句和“实体基础”充当了德国哲学的看門人，而作为德国哲学的看門人，他便有責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¹⁶⁷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頌他們；他趁这个机会在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們。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鮑威尔、費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們

开始把简单明了的經典学說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們的卢格茫然若失，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疇，現在更是乱成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因强大的运动产生了强烈的苦悶，在这个运动中，思考和写作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¹⁶⁸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別人的著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表露自己的智慧的写作材料看做自己的主要使命。但是，对这种抄袭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对这种一直达到必然的最終結果的写作消化过程，我們的卢格比他的前輩更善于賦以更加巨大得多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看門人，而是現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善于把他的才智方面的天生的平庸隐藏在思辨的措詞的濃密的荆棘之后。和尼古拉一样，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給它送了終¹⁶⁹。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为，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有权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領域內战胜敌人，卢格也作起詩来，这些詩枯燥无味得胜过任何一个荷兰人的最高成就，但卢格却把它們当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臉上扔去。

不过，我們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滿意黑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看出矛盾，但是他沒有能力解决矛盾，而且对辯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維再沒有比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更自在的了。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情：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們融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並沒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經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靠这种方法来摆脱矛盾：在理論家面前，他把自己的思維方面的弱点装扮成实际的思想方式，而在實踐家面前就剛剛相反，把自己的實踐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終装扮成理論思想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終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詞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的信任才能算是“信仰”。

在进一步观察我們的薩克森的摩里茨（卢格喜欢在小圈子里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生活中的波折之前，我們先談一下他早在办“年鉴”的时候就已經表現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热中于发表宣言。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沒有人責备他应当对某一原始思想負責，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使他便于把某种新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用多少有些誇張的方式）来加以捍卫，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嘗試組織政党、派別、“群众”，他們都将拥护他，并且他在其中也可以执行騎兵班长的职责。后来，我們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簡直完善得无以复加。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諾德的这种勤奋是无与倫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如他所說的，“从一个圖書館抄到另一个圖書館”，所以他宁願“从活的生活里吸取”，即每天晚上将头脑里所想的一切、一切“奇聞”、新思想和其他在白天听到、讀到和得到的消息无比认真地記載下来。然后看需要把这一切用作研究这样一个課題的材料，这个課題卢格每天都是像对待大小便那样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說，

他苦于无法控制写作。关于他在每天的写作劳动的产品里谈的是什么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问题都加上了绝对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水里、鸡里、肉饼里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瓦瑞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十八本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地翻阅这些精装的书本，心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仰都还没有呢！”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正直意识”的化身，当他在“精神现象学”¹⁷⁰里(不过他是丝毫也不理解这本书的)高兴地发现，“正直意识”能使自身永久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

是自我犧牲的樣子而出現，怯懦被描繪成最大的勇敢，卑鄙變成了高尚，而粗魯放縱的舉止被說成是坦率和心情暢快的表現。一條把哲學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話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陰溝，一個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賤的品質、既狡猾又愚蠢、既貪婪又遲鈍、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遜、既虛偽又像一個被解放的農奴、像一個村夫一樣地樸實的人，庸人和空想家，無神論者和空話的信仰者，絕對的不學無術者兼絕對的哲學家，這就是我們的阿爾諾德·盧格，黑格爾早在1806年就這樣預言過了。

“德國年鑑”被封後，盧格便帶着家眷乘上特制的馬車搬到巴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運使他在這裡結識了海涅，而後者卻把他當作“把黑格爾著作譯成波美拉尼亞文”的人來加以歡迎。海涅問他，普魯茨是不是他的筆名，對此盧格誠懇地表示了異議。但是海涅總是無法改變我們的阿爾諾德就是普魯茨的詩的作者這個觀念。同時海涅很快就發覺，盧格雖然沒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裝成了一個有堅強性格的人，因此，我們的朋友阿爾諾德引起了詩人關於阿塔·特洛爾¹⁷¹的想法。雖然阿·盧格沒有寫出偉大的作品來給他的旅居巴黎樹立紀念碑，但是海涅為他完成了這一工作，這還是應該歸功於他的。為了對此表示感謝，詩人獻給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銘：

“阿塔·特洛爾，一只跳舞的熊，
作為一個丈夫，他色情，虔誠，壯實；
受到了時代精神的奸污，
這個原始森林的短褲漢；

舞跳得很壞，
然而挺着絨毛蓬鬆的胸脯，自鳴得意；

有时，他也散发着恶臭，
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

在巴黎，我們的阿尔諾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和共产主义者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¹⁷²上发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張是完全相对立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件倒霉事，不过他以理智地退隐承受了这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們的卢格学会了随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聞”的有趣的故事。长年利用这些“奇聞”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來說都逐渐地变成了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无味的奇聞。巴黎的浮华、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¹⁷³、便宜的牡蠣，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他的头脑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聞，而巴黎則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聞庫。至于他自己，竟也做出了这样的奇事，竟想用鋸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聞就頗有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聞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多少有点名气的德国人驅逐出境的时候，卢格以 *savant sérieux* [大学者]的身分向杜沙特尔部长作了自我介绍，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也許，他在这里是指保尔·德·科克的“拜月者”中的“学者”，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的理由是，他会按特殊方式把軟木塞射到空中去¹⁷⁴。

此后不久，阿尔諾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見了前荷兰下級軍官、科倫地方的作家和普魯士小稅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結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跟卢格学哲学，卢格則跟海因岑学政

治。从这时起卢格产生了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只在德国运动中的更加不学无术的人面前以 *par excellence* [道地的] 哲学家的姿态出現。可是在这方面命运使他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属于“光明之友”¹⁷⁵ 派的僧侶(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甫(隆格)和芬尼·列伐尔特才认为他是哲学家。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强。施蒂納的“唯一者”¹⁷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一切自封的新思想，使卢格的头脑混乱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須下决心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驟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下得救了，德国的一切糊塗虫，从罗伊希林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詞句来掩盖他們的狼狽相的。这种詞句尤其适合时宜的是，費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人”，阿尔諾德就拚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現在还不肯放棄。但是，阿尔諾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更加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面前的再次出現把自己表现为有性格的人”。从这时起，在阿尔諾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活动原野。他把最厚顏无耻的放肆和糾纏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須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¹⁷⁷，那也不行。無論如何都必須同随便哪一家地方报纸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上可以完成“再次出現”。給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談他自己，否則他就不写。这个“再次出現”的原则必須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紐約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們的卢格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可以回到萊比錫去叫那里的人們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他在这里找到的也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維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

当了尼古拉的角色，因为連一个空职位也沒有，卢格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一切“奇聞”都已毫无用处。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們的阿尔諾德出乎意料之外地得救了。强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連最迟鈍的人也能順順当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魚。因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建議改革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个名字¹⁷⁸ 创办了一張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¹⁷⁹ 是法国的一張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无味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明，它甚至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理性的首都”也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像的报纸呈献给德国公众。卢格的不善辞令的特点似乎是最可靠地保障了隱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那些思想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个理由，阿尔諾德被选为布勒斯劳^① 出席法兰克福議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編輯的身分带着荒謬的宣言出現。在其余的方面，他只是用欧洲各国人民代表會議的宣言这种幻想来表現自己，他热心地附和大家的关于普魯士融合于德意志的願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德意志融合于普魯士，而法兰克福則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起来要当薩克森的貴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魯士都融合于德勒斯頓了。

他的議會活动并没有給他带来桂冠，相反地，他自己的那一帮人由于看出他的迟鈍和无能，而对他大失所望。同时，他的“改革报”的业务也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只有亲自回到柏林才能扭轉这种局面。作为“正直意識”的他，自然为自己的离去找到了具有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編者注

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他并且还建議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議會。这当然沒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按照“德騷的榜样”（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后来，在維也納被圍的时候，他草拟了新的宣言，号召弗兰格尔將軍起来捍卫維也納，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字的宣言已經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唯一的文件获得了民主派代表會議¹⁸⁰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被圍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伊費尔那儿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报”的建議，可是这些建議都遭到了拒絕。曼托伊費尔对他表示，再也沒有比“改革报”更好的反对派报纸了，“新普魯士报”¹⁸¹要危險得多等等，天真的卢格連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傳播到德国各地。同时，阿尔諾德醉心于消极抵抗¹⁸²，并且自己实行起来了，他把报纸、編輯及其他一切都交給命运去摆布，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进攻了，卢格头也不回地从柏林逃到了倫敦。

在德勒斯頓爆发五月起义的时候，阿尔諾德同他的朋友奥托·維干德和市議會一起成了萊比錫运动的領袖。他和他的这些同事一起发表了告德勒斯頓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請他們勇敢地战斗，因为在萊比錫有卢格、維干德和本市的父老們守卫着，而守卫者也受着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們的勇敢的阿尔諾德便急忙离开，到卡尔斯卢厄去了。

在卡尔斯卢厄他也并不感到安全，虽然巴登人駐扎在尼喀河畔，而形势也还远沒有发展到采取軍事行动的地步。他請求布倫坦諾派他到巴黎去做大使。布倫坦諾开了他一个玩笑，让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大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从

他那里騙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受到任命的布倫坦諾政府的代表——許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止非常奇特，甚至連他自己过去的編輯奧本海姆也认为必須在官方的报纸“卡尔斯卢厄日报”¹⁸³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作为官方人士到巴黎来，而是完全“由自己負責”。有一次，当許茨和布林德带着他去見賴德律-洛兰的时候，卢格突然中断了外交上的談話，开始当着法国人的面痛罵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了出来。6月13日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們的阿尔諾德，他簡直連什么理由都沒有提出便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倫敦这块自由的大不列顛的土地时才又鎮靜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倫敦，卢格先是企图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大使。后来他又企图以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資格钻进英国新聞界，可是到处碰壁，原因是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当人們問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魯諾·鮑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現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全集來說，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許多次的小册子！甚至連小册子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甚至連报刊文章也不是，而只是从讀过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段而已。必須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給“先驅”写了两篇文章¹⁸⁴，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現在已經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阿尔諾德·卢格，即（1）“当代的宗教”、（2）“民主和社会主义”、（3）“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現在还无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杰出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某些旧文章的还

沒有发表的新标题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諾德又开始了他每天的功課，把“晨报”¹⁸⁵轉載自“科倫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譯成德文，这对他本身頗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利，只是使勃律盖曼先生大吃了一惊。

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找到了为准备充当德国流亡者中最聪明的糊塗虫^①所必需的閑暇。

正如古斯达夫提倡素食，哥特弗利德提倡德国小資产階級庸人的感情一样，阿尔諾德提倡德国小資产階級庸人的理性，或者說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和阿尔諾德·文克里特¹⁸⁶一样，他也沒有发现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②。在德国革命中，卢格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許小便”的招牌那样惹人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讓我們回到我們的通告和附函上来吧。通告沒有得到預期的反应，成立民主的統一的教會的初步嘗試也毫无結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声明說，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法語，也不会写德文。但是，大人物們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

Che ciascun oltre moda era possente,
Come udirete nel canto seguente.

[一人是另一人的奇妙的力量，
詳細情节，請听下一首歌曲。]^③

① 俏皮話：德語中《Konfusius》（“糊塗虫”）和 Konfuzius（孔夫子）发音相同。——編者注

② 俏皮話：德語中《Ga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道路”）和《Go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阴沟”）只有《a》和《o》一个字母之差。——編者注

③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編者注

六

罗多芒特-海因岑¹⁸⁷和古斯达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年来一直靠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竟充满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决定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到了舒斯特岛，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又开始攻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忘掉了雷汞”。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一个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雨下“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信仰是不能防御枪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卡尔斯卢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是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官方通报^①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决“不打算”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要组织精锐部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仰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即军人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要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愿部队，他退却了，一直到重新回到瑞士的故土为止。“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¹⁸⁸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进军更富于血腥

① 即“卡尔斯卢厄日报”。——编者注

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經再沒有什麼人了，真正的雷永还没有发现，战争不是靠革命信仰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和鉛彈来进行的，現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认为德国已經丢失了。在純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完全走了样的語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險的人物了。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驅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資将他送到了倫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沒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无疑問，他曾經为革命大大奔忙了一阵。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为了赶去帮助祖国，在紐約举行了“支援革命的捐款”，并且好容易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邦遭到惨敗的时候，他靠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資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拉芒什海峡的彼岸。他很滿意既能向革命征收款項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要錢作退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騎士叙事詩中常常出現威武的魁偉的巨人；他們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們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圍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結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偉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連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們。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因此，他一安全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勇敢的文章。而在紐約我們的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時間內，經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以至原先只对后

者处以少許罰金的治安法官，終于注意到他的行动帶有目的性，判決侏儒李希特尔先生因毆打而賠償二百美元。

在这个一切都健康的巨大身軀上自然附有**健康的人的思想**，海因岑先生深信，他是最富有这种思想的。按照这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要求，海因岑先生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一无所知。由于健康的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也叫做“他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这种思想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經深入到思想的极限”），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說或是靠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經被著作界拋棄了的服装来炫耀自己，而新的現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慣，他把它們說成是不道德的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这对他來說变成了一种一向如此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当贊同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詭辯的人才不想理解它。如此結实的体格，如此健康的人的思想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的端正的**信仰**，并且它們完全应当使对这些信仰的愚蠢的信任达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是做得最出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依靠信仰，拿信仰和每个論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所不理解的人，他干脆都把他們說成是沒有任何信仰、由于存心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像白昼一样明白的事物的人。他呼喚他的繆斯——憤慨——来反对阿利曼¹⁸⁹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罵，他叫喊，他自吹自擂，他教訓人，他吐沫飞溅地做着簡直令人啼笑皆非的空洞說教。他表明，謾罵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教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什么样子。他的風格也和他的繆斯一样，永远是童話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¹⁹⁰，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小棍子，就是它的結

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沒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才立刻躊躇起来。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¹⁹¹的女魚販子一样，有一次奥康奈尔同这个女商贩发生了爭吵，奥康奈尔一个勁儿地罵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这个平行六面体！”，这样就罵得她一句話也讲不出来。

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經歷中，應該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上虽不會做到將軍，但是做到了下級軍官。由于受此屈辱，后来他总是批評荷兰人，說他們是沒有信仰的民族。以后，我們又在科倫看到他做了小稅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劇，在这个喜劇中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竟枉費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¹⁹²。他在“科倫日报”末版的地方閑話栏內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妄自尊大地議論科倫的俱乐部（科倫的所有偉人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康的人的思想在各种微不足道的私人冲突中的一般經歷一样，在他看来都具有世界事件的性质。他在“普魯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这本书比費奈迭的书¹⁹³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內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关于出版問題的案子。虽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受六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險，因此逃到布魯塞尔去了。他从那里要求普魯士政府不仅保证他能自由通行，而且为他完全廢除法国的訴訟程序，并把他交付审理普通犯罪案件的陪审法庭¹⁹⁴；普魯士政府頒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以普魯士政府的“逮捕令”一文作了答复¹⁹⁵；可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宣傳精神反抗和君主立宪，而把革命者說成沒有道德的和狡猾的人。他从布魯塞尔轉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見

了朋友阿尔諾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正如阿尔諾德在論战中力图掌握对手的观点一样，海因岑在咒罵中也开始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神論者，便怀着改宗者的热忱和激情，立刻向可怜的老福倫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論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他现在就希望在德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但是健康的人的思想也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海因岑成了革命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魯的語調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并以死亡来威胁所有的君主，世上的一切災禍的根源。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出版和推銷这些小册子的資金，趁机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在这一笔生意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罵。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詳細的說明。这些小册子在周游全国的德国酒商中为海因岑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商到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

他从瑞士轉到了美洲；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詩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內便断送了紐約的“快邮报”¹⁹⁶。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給“曼海姆晚报”¹⁹⁷写了几篇关于偉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馬丁的小册子¹⁹⁸，来报复拉馬丁和整个政府輕視他、对他的在美洲的德国人代表的委任状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魯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和宣布了大赦，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險。人

民应当召喚他。而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打算缺席当选为代表汉堡出席法兰克福議会的議員，他的理由是：既然他不是一个好演說家，那末他就会更积极地投票。但是他失敗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倫敦，他极其憤怒地批評青年人，因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这些青年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 l'homme de la veille 或 l'homme du lendemain [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 l'homme du jour [今天的人]，特別不是 de la journée [坚决行动的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須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鮮血(当然是别人流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出丑。反动派曾出錢把他送到倫敦，現在他們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法再把他免費送到紐約。可是，他的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只是惹得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做蠢貨，說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冠冕堂皇地了解这件事情，他……在前不倫瑞克公爵的“德意志倫敦报”上发表了他的杀气騰騰的、充滿了血腥味的文章，——当然是为了現錢。

古斯达夫和海因岑老早就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达夫說成圣賢，而古斯达夫則把海因岑說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洲革命結束，就来結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之間的致命的糾紛”，并重新开始他的 3 月以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政党的綱領，作为自己的建議和草案以供討論”。这个綱領引人注意的是：它发明了一个特殊的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門，它負責建立公共的运动場、格斗場(不是在彈雨下)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取消男子的优先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的优先权”(特別是在战

时采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見克劳塞維茨)。其实，这个綱領不过是海因岑給古斯达夫的一紙外交照会，根本沒有人注意它。这个綱領非但沒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鬪鸡之間的立即破裂。海因岑要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要是普魯士人，同时为了避免誤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者”。而古斯达夫則相反，要求三头独裁，其中除他以外，至少还应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达夫还以为他已經发现，海因岑在急忙公布的綱領里窃取了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试就破产了，而根本未被世人承认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隱居生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使他再不能忍受而在1850年秋天到紐約去为止。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不知疲倦的古斯达夫在他再一次打算和弗里德里希·博布欽、哈貝克、奧斯渥特、羅森勃魯姆、康海姆、格隆尼希和其他“杰出的”人物共同成立流亡者中央委員會的企图遭到失敗以后，就到約克郡去了。在这里，奇妙的花园应当百花盛开，而滿园爭艳的也不是阿耳契娜¹⁹⁹花园里的邪恶，而是美德。一个很幽默的英国老头，讨厌我們的古斯达夫的理论，他抓住了他的话柄，在約克郡给了他几摩尔根沼澤地，附上一个必須执行的条件即要他在那里建立“斋戒移民区”，在这个移民区里严禁吃肉、吸烟和喝酒，只允許素食，每个移民每天早晨都必須讀一章司徒卢威关于国家法的著作，以代替祈禱。此外，移民区还必須自力更生。古斯达夫帶了他的阿馬利亚、黃口小儿士瓦本人施璫費尔和其他几个战友順从地出发了，并且建立了“斋戒移民区”。关于这个移民区能說的只是：在那里，不是一片“繁荣安乐”的气象，而尽是教化和煩惱与消瘦的无限“自由”。就这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們的古斯达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他的伙伴们沒有像他那样的反芻的习惯，他們厌恶素食，因而决定背着他宰掉唯一的一头老奶牛，而这头奶牛的牛奶却是“斋戒移民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古斯达夫对于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同类的行为惊駭異常，痛哭流涕，他憤怒地宣布，移民区解散了，而既然他这次仍然无法在倫敦恢复“德国旁观者”或者建立某种“临时政府”，于是他决定去当一个湿的教友派信徒²⁰⁰。

八

决不适于奥斯坦德的隐居生活并向往着“再次出现”于公众面前的阿尔诺德听到了古斯达夫的不幸的消息。他立刻决定赶回英国，踏着古斯达夫的肩爬上欧洲民主派五巨头之一的地位。事情是这样：当时由馬志尼、賴德律-洛兰和达拉什成立了欧洲中央委员会²⁰¹，其首脑是馬志尼。卢格嗅到了这里还有一个空位。馬志尼固然可以把由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將軍的恩斯特·豪格任命为他的“流亡者”²⁰²的德国撰稿人，但是，即使从面子来考虑，他也不可能让这个毫无名声的人充当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們的卢格知道，古斯达夫还在瑞士就認識了馬志尼。他自己虽然也認識賴德律-洛兰，但是可惜他不認識自己。于是，阿尔诺德在布萊頓住了下来，开始討好和同情純朴的古斯达夫，答应和他一起在倫敦創辦“德国旁观者”，甚至由他出錢来共同經營罗泰克-韦尔凱尔的政治科学辞典的民主派版本。同时，他把我們的古斯达夫作为大人物和撰稿人介紹給一家德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他按照自己的原則总是把它們放在手边的（这一次命运落到了“光明之友”派教士杜朗的“不来梅每日紀事”²⁰³的身上）。彼此互賴互助。古斯达夫把阿尔诺德介紹給馬志尼。因为阿尔诺德讲的是別人完全不懂的法語，所以沒有人能妨碍他以大人物的姿态，尤其是以德国“思想家”的姿态自荐于馬志尼。飽經世故的意大利狂热者第一眼就看出了阿尔诺德是他所需要的人，是一个 *homme sans conséquence*

[无关紧要的人]他可以在他的反羅馬教皇的訓諭上以德国人的名义签名。于是，阿尔諾德·卢格便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馬車的第五个輪子。当一个亚尔薩斯人問賴德律，他怎么会产生同这种 «bête» [“蠢貨”] 联合的念头，賴德律刻薄地回答道：«C'est l'homme de Mazzini» [“他是馬志尼的人”]。当有人問馬志尼，为什么他要和賴德律这个毫无思想的人联合的时候，老滑头回答道：«C'est précisément pourquoi je l'ai pris.» [“这正是我选中他的原因。”] 馬志尼本人有充分理由摆脱开有思想的人。而阿尔諾德·卢格却感到他已經超过了自已的理想人物，有时甚至把布魯諾·鮑威尔也忘記了。

当他必須签署馬志尼的第一个宣言的时候，他忧郁地想起了他在哈雷反对利奧教授和在瑞士反对福倫老头的时刻，前一次他还是神圣三位一体的学說的信徒，而后一次則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論者了。而这一次却要同馬志尼一起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这时，我們的阿尔諾德的哲学良心已經由于他同称他为哲学家的杜朗及其他教士的交往而大大地墮落了。最近，我們的阿尔諾德已完全无法摆脱某种宗教上的弱点，此外，他的“正直意識”又在对他悄悄地说：“签名吧，阿尔諾德！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 [为巴黎作弥撒是值得的]²⁰⁴。决不能 in partibus [在異国的] 欧洲临时政府中白白地充当无关紧要的委員！想想吧，阿尔諾德！每两星期在宣言上签一次名，而且是作为 «membre du parlement allemand» [“德国議會議員”] 置身于欧洲最偉大的人物的集团里！”于是阿尔諾德汗流浹背地签了名。他喃喃自語道：“真是奇妙的怪事！Ce n'est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 [万事开头难]。”他在头天晚上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后面这句话。然而，对阿尔諾德的考驗还

沒有完結。歐洲中央委員會向歐洲、法國人、意大利人、西里西亞的波蘭人、瓦拉幾亞人發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以後，現在輪到德國了，好在這時正好爆發了布隆采爾城下的大戰²⁰⁵。馬志尼在草稿中攻擊了德國人缺乏世界主義精神，尤其是攻擊他們沒有必要傲慢地對待意大利的臘腸商、流浪樂師、糖果點心商、玩土撥鼠者和捕鼠器販賣商。阿爾諾德雖受此羞辱，却什麼都一口承認下來。他甚至聲明，同意將提羅耳省的意大利語部分和伊斯的利亞半島讓給馬志尼。但是這還不夠。不僅必須忠告德意志民族，而且還應當給它的軟弱的一面以影響。阿爾諾德這次受命發表本人的意見，因為他代表了德意志部分。這時他的感受就像應考的約卜西²⁰⁶一樣。他沉思地搔着後腦勺，經過長久的考慮後，含糊地說：“從塔西佗時代起，德意志的彈唱詩人用低沉的聲音唱着歌，冬天裡在所有的山上生起篝火，以便烤腳。”

馬志尼微笑地說：“彈唱詩人、低沉的聲音和所有的山上的篝火！這對德意志的自由並無幫助！”於是，彈唱詩人、低沉的聲音、山上的篝火和德意志的自由都被當作給德意志民族的小費而收入了宣言²⁰⁷。阿爾諾德·盧格自己也很奇怪，居然通過了考試，並且第一次懂得，管理世界並不需要有多少智慧。從此，他比任何時候都更鄙視還在青年時代就已經寫出十八部巨著的布魯諾·鮑威爾了。

當阿爾諾德在歐洲中央委員會的僕從座位上這樣為馬志尼簽署反對君主保衛上帝的好戰宣言的時候，**和平運動**在科布頓的領導下不但席卷了英國，甚至越過了德意志海，這才使騙子手美國佬艾利修·巴里特和科布頓、堯普、日拉丹以及印第安人卡-基-加-基-瓦-瓦-貝-塔得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舉行和平代表大會²⁰⁸。

我們的阿尔諾德也手痒痒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实现他的“再次出現”，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宣言。因此，他自命为这个法兰克福會議的通訊委員，并且向那里寄去了乱得一塌糊塗的和平宣言，这篇宣言是他用他的思辨的波美拉尼亚文照科布頓的演說改写成的。有几个德国人向阿尔諾德指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好战立場同他的教友派信徒的和平宣言之間有矛盾。对此他通常是这样予以反駁：“这里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辯证法。我在年輕时研究过黑格尔。”而“正直意識”則这样安慰他：馬志尼不懂德文，因此很容易蒙混他。

剛剛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对他的庇护也預示了阿尔諾德同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九

1849—1852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偉大戏剧的序幕，还在十八年前就已經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1830—1831年的蠱惑民心的流亡者。虽然这样长的時間已經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殘余人物存留下来。他們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身活动的結果泰然处之，他們繼續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計劃，成立临时政府和向左右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經驗丰富的騙子在通曉事务方面比新的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由十八年来玩弄阴謀、勾結、詭計、宣言、欺騙和个人突出的实践經驗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領，使馬志尼先生在掌握了三个在这方面缺乏經驗的傀儡之后，有勇气和信心宣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誰也沒有像我們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勢而处于成为典型流亡者鼓动家的更有利的地位。而他也就成了我們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諾德們、古斯达夫們和哥特弗利德們多少是有意識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們也許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話)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

哈罗像凱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1852年于倫敦)²⁰⁹。他生于“金弗里亞半島”^①，屬於有先見的北弗里西安人种，这个人

① 即日德兰半島的古称。——編者注

种通过克雷門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偉大民族都起源于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忠誠”，因而于1821年出发前往希腊。显然，从青年时代起，朋友哈罗就认为，他負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騷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他

“由于奇妙的命运而来到了专制制度的发源地，直接靠近了沙皇，而在波兰的时候，仔細观察了君主立宪的伪善的性质”。

因此，还在波兰时哈罗就已經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落后的欧洲历史上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了关于“国籍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1832年3月于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里”。关于这一著作必須指出，人們差点在汉巴赫大典²¹⁰上引用了它。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詩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大人物之声。論德国的統一’”，并主編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德意志”²¹¹。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地于1831年11月4日遭到了联邦議会的禁止。这正是光荣的战士所缺少的，現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視，同时戴上了受难者的花冠。于是，他可以高呼：

“我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并且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它們大部分是免費奉送的。其中有几部的收入甚至不能抵銷出版費的开支。”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1831年11月，韦尔凱尔先生就在一封长信里，枉費心机地企图“說服他走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平綫”。以后，在1832年1月，普魯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馬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議他为普魯士服务。两次推崇居然都是来自敌人方面！可以說，馬尔滕的建議“无意中”喚起了他的

“两个希望：复活斯堪的那维亚国际这个观念，来对抗这种王朝的背叛行为”，并且“从这时起至少是已被遗忘了一百年的‘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已经复活了”。

这样，来自南日德兰半島的、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的、我們的北弗里西安人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得到的第一个結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的地位有了保障。爭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老战士，“国籍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的人，由于联邦議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詩人，思想家和新聞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爭夺的、連敌人也尊敬的偉大人物，加上又是一个头脑空虛和糊塗得足以相信自己偉大的偉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呢？但是，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增高了。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調来綜合关于自由的偉大学說、国籍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在觉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爱好自由的願望。这样的著作只有头等的詩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能够成为这样的詩人和思想家的也只有哈罗。于是便出現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总共則有十二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貢獻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十年。可惜，这十二部书中有十一部“至今还只是些手稿”。

然而，同繆斯的甜蜜的交往維持得并不很久。

“1832—1833年冬天，运动在德国已經准备好了，但是在法兰克福的悲剧性的混乱中遭到了失敗。当时我受委托在4月6日深夜占領克尔要塞(?)。人和武器都已經准备好了。”

可惜，这一切都毫无結果，哈罗也不得不离开，而到法国内地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話”。已經准备好向薩瓦进軍的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那里，他成了“他們的司令部的同盟者”，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認識了馬志尼。然后，这一帮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險家組成的硫黄党²¹²在高貴的拉莫里諾的率領下，向薩瓦进行了有名的侵犯²¹³。在这次进軍中，我們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和毅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而对于自己的“毅力”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結果很糟，这一伙人回到瑞士的时候，已經土崩瓦解，东逃西散了。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騎士充分認識到他們对于暴君是多么可怕，仅仅这一次进軍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回声还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們的流亡的英雄的时候，他們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全体群众中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領導分子，但終归还是一分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广大的群众即“懦夫”、“漠不关心的人”、“缺乏信仰的人”日益嫌棄起义的把戏〔Putschschwindelei〕，而我們的騎士也感到自己愈来愈孤单，于是他們的妄自尊大也就开始滋长起来了。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那样怯懦、愚蠢和自私自利，那末，在他們自己看来，忠于事业的人的出現是多么必要！这些人像献身者一样胸怀仇視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未来的更勇敢的下一代保存了偉大时代的美德和对自由的热爱的傳統。如果連他們也背叛了事业，那末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像1848年的民主派一样，他們在每一次的失敗中都吸取了新的必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資料大成問題的游俠唐·吉訶

德。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可以创立他们的最伟大的功绩，即成立“青年欧洲”²¹⁴了，这个同盟的由马志尼拟定的关于团结友爱的宣言，于1834年4月15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以下面的身分参加了这个同盟，这就是

“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被授予公民权的‘青年德意志’和‘青年意大利’的成员，同时又是斯堪的那维亚支脉的代表”，他“直到今天还代表”这一脉。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世纪的开端：纪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前计算和往后倒算的，就像过去一直是从基督降生日开始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点。他是 *in partibus* [在异国的] 欧洲几头独裁中的一头，虽然他并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后面，除了他的无数尚未出版的著作、几个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堕落的政治骗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们的哈罗已清清楚楚地带在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个背包就是团结友爱宣言。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青年德意志’于1836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也就是由于这一脱离，“1848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地可悲。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沉痛。在这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柏林来的老脸厚皮的约翰奈斯·弥勒，1831年在阿尔坦堡出版的关于

普魯士政治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的作者”，他到英国去了，在那里他“除了每天早晨在斯密斯菲尔德市場上照料猪以外，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共产主义流行病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間傳播开来，而且它已經成了我們的哈罗的最危險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的唯一的銷售市場因此封閉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間接的书报檢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現在还遭到这种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承认的，現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王朝’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間接的书报檢查”甚至把我們的哈罗赶出了欧洲，他到了里約热內卢（1840年），在那里他曾充当了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他“忠实地遵循着时代的精神”，在那里出版了

“‘斯堪的那維亞之詩’（两千册），这部作品，从这时起由于在水手中流行而成了海洋上的作品”。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毫不苟且的責任感”，他很快又回到了欧洲，

“他連忙到倫敦去看馬志尼，并且在那里很快就看出了共产主义对欧洲人民事业的危險性”。

新的功勳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备²¹⁵。为了支援他們的这一事业和向专制制度进攻，哈罗

“又回到了南美，預备同加里波第共同为了人民的未来，用暴力协助南美合众国的成立”。

然而，专制君主識破了他的意图，于是哈罗便急忙躲了起来。他到紐約去了。

“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我展开了頻繁的腦力活动，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写

成了屬於戏剧集‘人民’的‘思想的权力’，这部作品到現在同样地还只是一份手稿。”

他随身带着一个臆想的地方組織«Humanidad»〔“人类”〕的委任状从南美到达了紐約。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法国”一书，而在启程去欧洲的时候

“我又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爱永記在詩集‘斯堪的那維亞’中的几首詩里”。

他到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在这里，他发现

“离开了二十七年后，国际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被弄得无比混乱，这些概念就像腐烂的稻草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党派的暴怒和民族的仇恨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里”。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从1831年起，我的政治著作，以及我的一切意願和活动，在祖国的这些边疆地区便不被人們所知”。

奥古斯滕堡党²¹⁶十八年来一直以 *conspiration du silence*〔沉默的陰謀〕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軍刀，拿着一支步枪、四支手枪、六把匕首，来号召成立志願部队；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作了各种冒險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給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的，另一封是給斯堪的那維亞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說也給倫敦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我代表一万五千个挪威工人向你們伸出友誼之手！”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通知，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結友爱宣言，

他很快又成了歐洲中央委員會的謙遜的伙伴，同時又是

“太晤士河畔的格累夫森德的守夜人和傭人，在那里，在我被懷疑弄虛作假之前，我要用九種不同語言為不久前成立的經紀商行尋找商船船長，這至少是哲學家約翰奈斯·彌勒在照料豬的時候所沒有遇到過的事”。

哈羅把他的充滿了豐功偉績的生活總結如下：

“除了詩歌以外，很容易算出，我獻給民主運動的德文著作有一萬八千冊以上（按照漢堡的行市，每冊價格從十先令到三馬克，總價值約二萬五千馬克），沒有一次收入能抵銷出版費的支出，更不用說，我根本就沒有從這里面得到任何收入來維持我的生活。”

關於我們的來自南日德蘭的拉曼徹的蠱惑人心的探險家的冒險故事，我們就講到這里。在希臘和巴西，在維斯拉河和拉普拉塔河，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和紐約，在倫敦和瑞士，忽然是“青年歐洲”的代表，忽然是南美的《Humanidad》〔“人類”〕的代表，忽然是藝術家，忽然是守夜人和傭人，忽然又是推銷自己的著作的書商；今天在西里西亞的波蘭人中間，明天在南美人中間，后天又在商船船長中間；他得不到承認，被人一脚踢開，孤獨一身，默默無聞，但是又到處都以自由的游俠姿態出現，深深地蔑視一般市民的行業，——我們的英雄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況下，始終是個以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著稱的糊塗蟲。他不顧整個世界，總是滔滔不絕地說話、寫作和發表文章，把自己說成 1831 年以來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主要車輪。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appearing to be a manuscript page. The text is dense and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It begins with "Die... die... die..." and continues with several lines of text. The handwriting is somewhat slanted and compact. There are some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throughout the page.

Handwritten notes or corrections in German, written in a different cursive script. It includes phrases like "Die... die... die..." and "Die... die... die...". The text is more vertical and appears to be a separate section or a set of notes related to the main manuscript.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手稿的一页

(正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补充是卡·马克思写的)

十

阿尔諾德虽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沒有达到他辛勤劳动的目的。由于馬志尼的恩寵，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至少应当得到德国流亡者对这一称号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当把承认他的领导的人們拿出来給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国他“背后有一部分輪廓鮮明的人民”，但是，当馬志尼和賴德律在卢格臉上只看到前面一部分的时候，这后面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引起他們的信任。一句話，阿尔諾德必須在流亡者中間給自己制造“輪廓鮮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倫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不如說紧跟着他来到的还有許多被驅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瑞士受过建立临时政府的訓練，他們給倫敦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鮮空气，而对我們的阿尔諾德來說，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同时，海因岑在紐約重新当上了“快邮报”的主編，因此，阿尔諾德現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①上以外，还在大洋的彼岸实现他的“再次出現”。如果阿尔諾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特曼的話，那末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 1851 年头几个月的

^① 即“不来梅每日紀事”。——編者注

“快邮报”全是不可估价的資料。阿尔諾德在排出他那丰富的文学排泄物时所表現的那种无限庸俗的空談，那种愚蠢、无耻和純粹像螞蚁般的勤勉以及妄自尊大，簡直是令人难以想像。海因岑把阿尔諾德描繪得儼然是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阿尔諾德則把他的海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賢哲！他告訴他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有时，为了向美国公众报道偉大的阿尔諾德的某些«fashionable movements»〔“举世聞名的举动”〕，他以倫敦和巴黎的匿名的通訊者的身分出現。

“阿尔諾德·卢格又一次使共产主义者陷入了困境。”——“阿·卢格昨天〈巴黎的來訊，但日期出卖了狡猾的老笨伯〉作了从布萊頓到倫敦的散步。”还有：“阿尔諾德·卢格写信給卡尔·海因岑說：‘亲爱的朋友和編輯……馬志尼向你致意……賴德律-洛兰允許你翻譯他的論6月13日的文章’”如此等等。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說道：

“我在卢格的信中〈在“快邮报”上〉看到，海因岑向卢格〈秘密地〉大肆吹噓他的报纸在美国的重要性，而卢格对他則以欧洲强国的政府自居。只要卢格給海因岑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聞，他总不放过机会附带說，可以让合众国的其他报纸轉載这一新聞。好像它們都认为这一消息很有价值，都在等待卢格的允許似的。順便說說，虽然有卢格先生的話和許諾，但是我还不一次也沒有看見这些重要新聞在什么地方轉載过。”

卢格老大爷利用這張小报，就像利用“不来梅每日紀事”一样，也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諛奉承的話来罗致新到的流亡者：現在这里有天才詩人和爱国者金克尔，偉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如此可爱、如此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統帅等等。

同时，为了和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屬於欧洲各民族的全部流

亡的下等人。当布隆采尔城下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上签署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貝尔特、迈尔、迪茨、謝特奈尔、沙佩尔、維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把下面的消息当做最新的新聞报道說：暴君們的神圣同盟这时(1850年11月10日)已武装了一百三十三万士兵，在他们后面还有七十万武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僕役作为后备，“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代表會議²¹⁷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因此，宣言最后必不可免地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宣言(收到这份宣言的“祖国报”²¹⁸给它一个外号，把它叫做法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残酷无情的嘲笑。“祖国报”称它为

“dii minorum gentium [二流偉人的]宣言”，写得毫无色彩，毫无風格，只是戴了几朵«serpents»[“蛇”]、«sicaires»[“雇佣的凶手”]和«égorgements»[“血腥的屠杀”]这类可怜的雄辯之花。

“比利时独立报”²¹⁹报道說，它的起草人都是些«soldats les plus obscurs de la démocratie»[“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并且說，虽然該报所持的是保守派方向，但这些可怜虫把宣言送給它在倫敦的記者。他們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該报为了給以懲罰，恰巧不想刊載这些签名。这些騎士尽管向反动派討好，但是仍然无法使人承认他們是陰謀家和危險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諾德加强他的活动。因此，他企图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創辦一張名叫“人民之友”(«Volksfreund»)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达夫坚持的話，那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业遭到了失敗，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伴反对阿尔諾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多情善感的”哥特弗

利德要求稿費付現款，可是阿尔諾德坚持汉澤曼的观点：在金錢問題上沒有感伤派的地位²²⁰。阿尔諾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專門的目的，这就是向讀者协会——由工資优厚的工人和小資产者組成的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錢財。但是，就連这件事也沒有成功。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諾德“再次出現”的新机会。賴德律和他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白白地放过2月24日(1851年)而不举行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紀念会”，不过出席的只有法国人和德国人。馬志尼沒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謙意。哥特弗利德出席了紀念会，但是盛怒而回，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現並沒有引起預期的奇妙的效果。阿尔諾德的遭遇是惨痛的：他的朋友賴德律装做不認識他；而他走上讲台后，竟惊慌失措到这样一种程度，連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演讲稿也沒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語含糊地讲了几句話，之后又叫了一句：«À la restauration de la révolution!» [“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很不滿意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朗恼恨馬志尼—賴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沒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必須也消灭天才的貴族!”流亡者下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俠义的維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滿了錦旗，墙上赫然排列着偉大的人民活动家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間是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貝之間是雅科比，巴尔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間是罗伯特·勃魯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路易·勃朗尖声尖气地宣讀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貴族、1848年在卢森堡宮里开会的代表們²²¹的献詞。維利希宣讀了来自瑞士的献詞，这个献詞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虛假的借口騙取到的，由于不

知分寸地公布了这些名字，在献詞上签名的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逐。德国沒有寄来献詞。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滿了无限的团结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臉上都現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流亡者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被反革命报纸拿来大肆宣扬。最稀奇的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做巴特尔米的人当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但是不久真相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特别的请求而从貝尔-耳島监狱中寄出来的献詞²²²。在献詞中布朗基尖锐而公正地抨击了1848年临时政府中的所有的委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个献詞沒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詞。委员会方面以勃朗、維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維迪尔諸先生为代表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說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献詞。但是“祖国报”在它向轉寄献詞原文給它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这一声明。它把安都昂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都昂在回答中說，他把献詞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即巴特尔米，并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詞已收到的通知。这以后，巴特尔米先生不得不声明，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献詞，但是认为献詞写得不恰当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这以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維迪尔，沒有通知巴特尔米便写了一封信給“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說，軍人的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維利希及其他在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

的人都撒了謊。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是六個而是十三個。他們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獻詞，大家討論了這個獻詞，經過了長久的辯論之後，以七票對六票的多數決定不宣讀這個獻詞。維迪爾是投票贊成宣讀的六個委員中的一個。

當“祖國報”在收到了維迪爾的信之後又收到巴特爾米先生的聲明時，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發表這一聲明時加上了下面的“前言”：

“我們常常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而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在蠱惑者的身上什麼東西更發達一些，是吹牛還是愚蠢？我們收到的從倫敦來的第四封信，使我們更難回答這個問題了。這些可憐蟲在那裡有多少呵！他們是這樣迫切地渴望寫作和看到他們的名字被登載在反動的報紙上，甚至甘心蒙受無窮的恥辱和自卑自賤。公眾的嘲笑和憤慨同他們有何相干——只要‘辯論日報’、‘國民議會報’、‘祖國報’刊載他們的作文練習就行了。為了得到這種幸福，這個世界主義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由於對寫作的同情心，我們因此刊載了‘公民’巴特爾米的下面這封信，這封信是一個新的、我們希望也是最後的證據，它證明著名的布朗基獻詞是真實的。他們起初全都否認這個獻詞的存在，而現在卻為了爭着確證這個獻詞的存在而互相辱罵以至撕打起來了。”

十一

“真正发展的力量”（用我們的阿尔諾德的“通体美丽的”話來說），是在下面。2月24日卢格在国外給自己出了丑，又連累了德国流亡者。少数还想同他一起工作的流亡者感到失去了信心和得不到支持。阿尔諾德把一切都归罪于流亡者中間的糾紛，并且比从前更坚决地主張團結起来。他已經出了丑，却还在渴望获得新的机会再一次給自己出丑。

因此，維也納三月革命周年紀念日就被利用来組織一次德国人的宴会。狭义的維利希拒絕参加，因为他屬於“公民”路易·勃朗，不能同屬於“公民”賴德律的“公民”卢格一起工作。前議員賴辛巴赫、施拉姆、布赫尔等人也避免接近阿尔諾德。因此，出席的有（除了不发言的客人以外）馬志尼、卢格、司徒卢威、陶森璠、豪格、隆格、金克尔，他們都发表了演說。

卢格的演說“愚蠢透頂”，就連他的朋友也这么說。但是出席宴会的德国公众还要忍受更大的苦难。陶森璠的小丑戏、司徒卢威的呻吟、豪格的空談、隆格的哭訴弄得大部分听众等不到听善于詞令的耶利米-金克尔²²³准备在最后上点心时发表的演說，都紛紛溜走了。哥特弗利德以受难者的身分，“代表受难者”，并且为了受难者向所有的人，“从爭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紅色共和党人”，发表了悲伤的調和詞。他們全都照共和党人的样子悲切地呻吟，在个别場合下，如金克尔，甚至仿照紅色共和党人的样子呻吟，同时

他們全都帶着驚美的心情五體投地地拜倒于英國憲法之前，——“紀事晨報”²²⁴在第二天早上就提醒他們注意這種矛盾。

但是，在同一天晚上，盧格仍然達到了自己想望的目的，這可以从發表的宣言中看出，我們現在把宣言中最精彩的地方摘引如下：

告德國人！

“祖國的弟兄們和朋友們！我們，下面的簽名人，現在，在你們吩咐之前，成立了德國事務委員會（什麼樣的委員會都是一樣）。

“歐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員會給我們派來了阿爾諾德·盧格，巴登的革命派來了古斯達夫·司徒盧威，維也納的革命派來了恩斯特·豪格，宗教運動派來了約翰奈斯·隆格，監獄送來了哥特弗利德·金克爾。我們建議社會民主派的工人們給我們派來自己的代表。

“德國的弟兄們！事變奪去了你們的自由……我們知道，你們不能永遠放棄你們的自由；至于說到我們，我們是不惜用一切手段（不論是成立委員會或發表宣言，這是阿爾諾德可以證明的）來加速恢復自由的。

“當我們……當我們支持馬志尼的公債並為它作擔保的時候，當我們……當我們……成立各國人民的神聖的同盟來對抗他們的壓迫者的非神聖的同盟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你們衷心希望做的事情……自由在人類的世界論壇的法庭面前對暴君們進行了偉大的審判（在阿爾諾德當檢察長時，“暴君們”可以安心地睡覺）……火災、謀殺、破壞、飢餓和破產不久就會成為德國的普遍命運。

“請你們把目光從德國轉向法國，法國全國正燃燒着怒火，比任何時候都一致要求自由（見鬼，誰能預見到12月2日！²²⁵）。請看看匈牙利，甚至克羅地亞人也站到了自由的一邊（多虧“德國旁觀者”和盧格發明的由鋸末製造的衣服）。並且請相信我們——因為我們知道這一點，——波蘭是永垂不朽的（這已由達拉什先生秘密地托付給他們了）。

“力量對力量——這就是公正，而公正的時刻就快到了。而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來爭取成立比預備議會更有效的（啊哈！）臨時政府和比國民議會更強

有力的人民政权〈关于这些先生們想用彼此哄騙的办法来争取些什么东西，請看下面〉。

“我們要特別向你們介紹我們在財政和报刊方面的草案〈强大的临时政府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指令——責令稅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它們主要地只是提供实际的利益。广大的社会人士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每认购一次意大利公債就是对我們的委员会和我們的事业的直接的帮助，而目前你們能够給我們的实际援助主要是**加强資金的来源**。我們会把錢变成**社会輿論和社会力量**〈阿尔諾德来从事这种变化!〉……我們告訴你們：請认购一千万法郎——我們就将解放大陆!

“德国人，請記住……〈你們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在山上生起篝火〉請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們〈这在目前非常需要，几乎同需要金錢一样〉，請把你們的錢袋給我們〈請別忘記了这一点!〉，請你們伸出手来! 我們期待着，你們的热心将随着你們的被压迫的增强而增强，并且在决定性的时刻，你們的及时的支援将充分加强委员会的力量〈否則委员会就不得不借助于燒酒了，这是違背古斯达夫的良心的〉。

“責成全体民主派傳播我們的宣言〈其余的工作由稅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去做〉。

“德国事务委员会：阿尔諾德·卢格，古斯达夫·司徒卢威，
恩斯特·豪格，約翰奈斯·隆格，哥特弗
利德·金克尔

1851年3月13日于倫敦。”

我們的讀者認識哥特弗利德，認識古斯达夫；阿尔諾德的“再次出現”也十分頻繁地一再重复着。因此，剩下的只有两位“有效的临时政府”的成員还需要加以介紹。

約翰奈斯·隆格(或者如他喜欢在密友中自称的那樣，就称作約翰)自然沒有写成启示录²²⁶。他身上並沒有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是个庸俗的、平凡的、像水一样、或者說得确切一点、像洗滌用的温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人。大家知道，約翰奈斯所以成为有名的人物，是因为他不願让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²²⁷充当自己的庇护者，虽然

無論誰充當約翰奈斯的庇護者都是一樣。當約翰奈斯出現時，老保路斯惋惜黑格爾已死，因為後者現在當然已經不能把他叫做肤淺的人，而已故的克魯格却很高興自己已死，因而避免了負有深謀遠慮者之名的危險。約翰奈斯屬於在歷史上經常碰到的這樣一些人，這些人在某個運動發生和壯大後幾個世紀，還硬把這件事當作最新的新聞，以最枯燥無味的方式向庸人和八歲的孩童述說這一運動的內容。當然不能長久靠這種行業為生，我們的約翰奈斯在德國很快就陷入了一天比一天難堪的境地。他的從德國假文明中流出來的平淡無味的水已經再也沒有人要了，於是約翰奈斯來到了英國，在那裡，我們看到他以加瓦齊神父的競爭者的身分從事活動，但是並無特殊成績。這個無能的、單調的、枯燥無味的鄉村神甫在熱情充沛、演技精湛的意大利修道士面前當然顯得遜色了，而英國人開始打起賭來，賭注很大，爭論的問題是，這個令人討厭的約翰奈斯是不是就是那個把如此莊重的德意志民族導向運動的人。但是，阿爾諾德·盧格安慰着他，阿爾諾德·盧格發現我們的約翰奈斯的德國天主教同自己的無神論有顯著的血緣上的相同之處。

路德維希·馮·豪克，前奧地利皇家工兵上尉，後來，在1848年，是在維也納擬定的憲法的起草人之一，以後是維也納國民自衛軍的營長，他在10月30日以雄獅般的勇猛守護着城市的大門，抵抗皇帝的軍隊，只是在一切都已經喪失以後才離開了崗位。這以後他逃到了匈牙利，在特蘭西瓦尼亞參加了貝姆的軍隊，在軍隊里由於勇敢而升到總參謀部的上校之職。戈爾蓋在維拉戈什城下投降²²⁸之後，路德維希·豪克被俘，並且英勇地被絞死於奧地利人在匈牙利設立的絞架之下。奧地利人由於經常遭到失敗而懷着復

仇之心，并因俄国人的使他們无法忍受的庇护而恼恨得发狂，因而在匈牙利設立了无数的絞架。我們的豪格在倫敦长时期地被认为就是在匈牙利战役中聞名的、被絞死的軍官豪克。現在，似乎已經确定，他并不是已故的豪克。正如羅馬陷落后他必須同意馬志尼把他提升为將軍一样，他現在也不能拒絕阿尔諾德把他变成維也納革命的代表人物和强大的临时政府的成員。后来他在音乐的伴奏下，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論的經濟基础的优美的演讲。在流亡者中間，这个忧郁的人以愚蠢的小牲畜或者如法国人所說的 *la bonne bête* 这个外号聞名。

阿尔諾德把自己的願望看得高于一切。宣言、强大的临时政府、一千万法郎的公債，加上一張类似周刊的小报，由豪格將軍主編，名称叫得很謙遜：“宇宙”。

宣言沒有任何結果，誰也不去讀它；“宇宙”出到第3期便憔悴而死；錢沒有收到；强大的临时政府分裂成了本身的几个組成部分。

在“宇宙”上首先登載了关于金克尔的演讲的广告、关于可尊敬的維利希为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流亡者募集捐款的广告和关于哥林盖尔的啤酒店的广告。此外，它还刊載了阿尔諾德的諷刺文章。老丑角給自己捏造了一个好客的朋友，一个在德国的叫做弥勒的人，而自己則以一个德国族长的身分出現。弥勒对于在報紙上讀到的关于英国的好客盛举的一切都感到惊奇，并且表示担心，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会妨碍族长管理“国家事务”。不过，随他去吧，因为族长回到德国后将会因忙于国家事务而不得不拒絕弥勒的款待。在結尾，弥勒感叹地說：“就是說，被邀請到温莎去的并不是叛徒拉多維茨，而是馬志尼、賴德律-洛兰、公民維利希、

金克尔和您自己(阿尔諾德·卢格)!”不过,如果說“宇宙”出到第3期就长眠了,那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不善于做推銷工作之故,——他們在英国的一切群众大会上把报纸塞給演讲人,請他們代为介紹,因为它捍卫的正是他們的原则。

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債的呼吁书还没有登出,突然謠傳倫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連同阿馬利亚)赴美收集捐款。

“当委员会决定出版一張德文周刊,并委托豪格为主編的时候,司徒卢威因自己想当主編并給小报起名‘德国旁观者’,故提出了抗議并决定赴美。”

紐約“德意志快邮报”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該报沒有提到(而海因岑对此有自己的理由),馬志尼已把不倫瑞克公爵的“德意志倫敦报”撰稿人司徒卢威的名字从德国委员会的名单中一笔勾銷了。古斯达夫立刻把自己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紐約的土地上去。但是不久便从大洋彼岸傳来了紧急情报:“古斯达夫的‘旁观者’完蛋了。”照古斯达夫所說这完全不是由于缺少訂戶,也不是由于他沒有閑空写文章,而仅仅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訂戶不多的緣故。但是因为現在按民主方式加工罗泰克的“世界史”已不能再拖延下去(而这一工作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因此,他,古斯达夫要用“世界史”的形式,而不是用“德国旁观者”的形式付給訂戶以他約許下的文章頁数;但是,他不得不請求先付預訂款,而这个請求在目前情况下是不應該归罪于他的。当古斯达夫在大洋此岸的时候,海因岑宣称,他同卢格是欧洲最偉大的人物。但是,他还没有到达彼岸,他們之間就拚命地吵起来了。古斯达夫写道:

“海因岑于6月6日在卡尔斯卢厄看到人們把大炮推出来,他就夹在女人中間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了。”

海因岑則称古斯达夫为“女卜者”。

“宇宙”正好是当阿尔諾德在信奉正統派的海因岑的报纸上为它大肆吹嘘的时候毁灭了，而强大的临时政府則恰好是在罗多芒特—海因岑对它宣布“軍人的服从”的时候停止了存在。海因岑在和平时期偏爱軍事，这是很出名的。

“在司徒卢威离去后不久，金克尔也退出了委员会，于是委员会便停止了工作。”（紐約“德意志快邮报”第23号）

因此，“强大的临时政府”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尔諾德也已經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創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創造不了；同时，无论怎样重新布置、改組和組合，这三个人总是政府以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核心。但是，这个不倦的人还不願承认，他的計劃失敗了；对他來說，全部問題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这能使他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計謀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实现“再次出現”和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談。

至于哥特弗利德，那末他为 respectable City-merchants [倫敦西蒂区的可敬的大商人]做的戏剧性的演讲絲毫也未能使他丢臉。另一方面，十分明显，3月13日的宣言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巩固阿尔諾德先生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哥特弗利德本人以后一定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他絲毫也沒有好处。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言公布后不久，dama acerba [严厉的太太]莫克尔便在“科倫日报”上登載了如下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沒有在宣言上签名，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公債，并且已經退出了剛剛成立的委员会。对此阿尔諾德在紐約“快邮报”上是是非非地說，金克尔由于生病的确沒有在宣言上签名，然

而他是贊成宣言的；宣言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間里擬定的，他還轉寄了一部分到德國去，而他退出委員會是因為選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將軍。阿爾諾德在作此聲明時尖銳地攻擊了“絕對的受難者”、“民主派的貝凱拉特”金克爾的虛榮心，並且對約翰娜·金克爾太太也表示懷疑，因為為她效勞的是“科倫日報”這種被禁止的報紙。

可是阿爾諾德撒下的種子並不是落到了多石的土地上。“美麗的靈魂”哥特弗利德決定用巧計勝過對手，並且把革命的財寶攬為自己一人所有。約翰娜還沒有來得及在“科倫日報”上否認這件令人可笑的事，我們的哥特弗利德就已經在大洋彼岸的報紙上獨自出面號召認購公債，並且還說，應當把金錢寄給“享有最大信任”的人。除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外，還有誰能是這樣的人呢？他要求先交納五百英鎊作為印制革命紙幣之用。盧格立刻在“快郵報”上宣布，他，盧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員會的財務員，在他那里可以得到馬志尼的已經準備好的紙幣。因此，對於想喪失五百英鎊的人來說，取得現成的紙幣無論如何總比拿還不存在的東西來投機要聰明得多。而羅多芒特-海因岑則喊叫道，如果金克爾先生不放棄自己的計謀，那就要公開宣布他是“革命的敵人”。於是哥特弗利德在“快郵報”的直接對手“紐約國家報”²²⁹上發表了回擊的文章。這樣，在大西洋彼岸已經在採取一切形式進行戰爭，而在此岸還在交換猶大之吻。

但是，哥特弗利德自己很快就覺察到，由於他不客氣地以自己的名義宣布推銷國民公債，多少總有點傷了民主派道德高尚的庸人們的面子。為了糾正這一錯誤，他現在想出了一個解釋：

“這個為了推銷德國國民公債而發出的號召交款的宣言根本不是他發表

的，很可能是他的在美国的过分热心的朋友为此利用了他的名字。”

这个说明引出了維斯博士在紐約“快邮报”上发表的以下的回答：

“大家知道，这个号召为德国公債进行宣傳的宣言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寄給我并且迫切地請求我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发表的。誰要是对此表示怀疑，我可以把这封信給他看。如果这个声明确实是金克尔发表的，那末为了他的荣誉，他应当公开放棄这个声明，并且公布我同他的来往信件，以便向当事人表明，我同这件事毫无关系，根本談不到‘过分热心’。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就必须把这个声明的可敬的作者公开叫作不怀好意的誣蔑者，或者，如果这样会发生誤解，就叫作輕率的和无耻的空談家。我自己这方面不能相信金克尔会做出这样空前的背信棄义的事。維斯博士。”（紐約“德意志快邮周报”）

哥特弗利德該怎么办呢？他又抬出了 *aspra donzella* [严厉的太太]，他声明說，“輕率的和无耻的空談家”是莫克尔；他断定，他的夫人是背着他在进行公債的事情。无庸爭辯，这个策略是非常“美”的。

因为我們的哥特弗利德像芦苇一样柔軟，他随着人民感情的風向（按照他所认为的），忽而出現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一項事业，忽而又把它拋棄。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資產階級在倫敦为他这个革命的受难者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同时却背着这个資產階級同以維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下层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的生活同他在波恩时的儉朴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說他生活得像一个“穷人的代表”所應該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規定的礼仪对待資產階級，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階級。但是，作为一个想像力大大盖过了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現出一个暴发戶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

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展覽会的文章是他的最富于代表性的写照。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晶宫里的一面大镜子。对他来说，客观世界已化为镜子，而主观世界则化为句子。好像是为了展示一切事物的美的一面，他对一切事物卖弄風騷^①，并且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把这种卖弄叫做詩，叫做牺牲，或者叫做宗教。老实說，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卖弄自己。可是，当想像直接变成說謊，夸張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沒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不过可以預先告訴我們的哥特弗利德，既然他已經落到古斯达夫和阿尔諾德这些經驗丰富的小丑手里，那他就只好丢掉自己的獅子皮了。

① 俏皮話：德語中 «schöne Seite» 的意思是“美的一面”，«schöntun» 的意思是“卖弄風騷”。——編者注

十二

工业展覽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紀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們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倫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鬧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倫敦感到很不舒服；他們汗流浹背地完成了在必須参观展覽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謝特奈尔的“哈瑙”飯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飯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騰騰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何况还可以免費观看德国最偉大的人物。他們也坐在这里，有議會議員、議院代表、統帥、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說家，他們像一切其他普通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 *coram publico* [在全体人民面前] 神气十足地議論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詳細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閣的最秘密的會議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非常准确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們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然后各派意見的拥护者虽然已經搖搖晃晃，站立不稳，但是帶着他們已为拯救祖国尽了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識紛紛回家去了。流亡者們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倫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費則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組織就是这个在錫侖-謝特奈尔²³⁰的庇护下

設在朗-愛克街上的靠了展覽會而極其興隆的酒店組織。真正的中央委員會經常在這裡開會。其他一切委員會、組織、黨的小組都純粹是這個真正德國的寄生性酒館常客組織的唬人幌子和愛國主義小擺設。

這時，流亡者又得到了以新來者梅因、孚赫、濟格爾、戈克、菲克勒爾等等先生為代表的增援部隊。

梅因，這個因錯誤而生下來就沒有刺的小刺蝟，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繪如下：

“在文學中，就像在社會上一樣，常常能遇到這樣一些矮小的、可笑的、長得滾圓的人物，他們天賦某種才能，和人們糾纏不清，因為每一個人都能隨便地從高處看他們，所以他們可以讓人隨便地尋開心。而這些人就從中獲得許多好處：他們生活着，活動着，他們的名字被人稱道，老是受人們的款待。如果他們遭到失敗，他們也不驚惶不安，而是把失敗看作個別的情況，並且等待將來獲得最大的成功。在法國的文學世界裡，潘辛涅便是這樣的人物。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無論怎樣捉弄他，無論引誘他去做什麼，無論怎樣欺騙他，甚至他的悲慘的死亡（他在西班牙淹死）也不能減弱他的生命所產生的滑稽可笑的印象，正如焰火筒決不會由於噼噼啪啪響了一陣以後嘯的一聲爆炸開來而獲得什麼意義一樣。”²³¹

相反地，當代的作家們談到他時這樣說：愛德華·梅因屬於那些“堅定的”、代表柏林的智慧的人物，同德國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愚蠢正相反。他同他的朋友繆格、克萊因、察貝爾、布爾等人也在柏林成立了“梅因的甲蟲協會”。每一個梅因的甲蟲都坐在自己的獨特的小葉子上，而愛德華·梅因則坐在曼海姆的一張小晚報上^①，他在这張小葉子上每星期以極大的努力生產綠色的通訊員幼蟲。

^① 即“曼海姆晚報”。這句話里的“小葉子”和“小報”原文是雙關語：德語中 Blättchen 一字，既有“小葉子”之意，又有“小報”之意。——譯者注

这个梅因甲虫在 1845 年甚至行将主編一本月刊；人們从各方面給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等待着，但是整个事业一下全垮了，因为爱德华在經過了八个月以后，混身冷汗地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因为我們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林三月革命后，他以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而出了名。在倫敦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二十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編和审查的“倫敦新聞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解除了职务，因为他頑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在柏林发表过的一篇深奥的关于雕刻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的流亡者們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 *homme d'état* [国家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了“稳固的观点”。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产中将会发现許多为預定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編輯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說他好像根本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即好像是寂寞女神以犹太首飾匠儿子的形象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 «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épté le genre ennuyeux» [“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風格都好”]①这一句話的时候，他已預感到我們的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的出現。我們宁願把奥本海姆当做作家，而不願把他看做演說家。你可以不看他的作品，但是要想迴避听他的演說，*c'est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轉生說也許是正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紀中所用的

① 伏尔泰喜剧“浪子”的序言。——編者注

名字确实无法确定了，因为無論在哪一个世紀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談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現在三个輝煌的时期中，这就是阿尔諾德·卢格的編輯、布倫坦諾的編輯、金克尔的編輯。

这一伙人中的第三个是尤利烏斯·孚赫先生。他屬於柏林移民区中那些善于以巨大的进取心發揮自己的小小的才能的胡格諾教徒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貿易派别的旗手毕斯托²³²的角色登上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扮演这个角色是被汉堡商人雇来进行宣傳的。在革命風潮时期他們允許他打着气势凶凶的无政府主义招牌鼓吹貿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抛开了，于是他同梅因一起开始主編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現存政府的危險立場，而当后来該报由于沒有錢交納保证金而停办的時候，“新普魯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惋惜。同“新普魯士报”的这种亲热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以至我們的孚赫竟开始在倫敦为这家报纸写起通訊来了。孚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对自由貿易的迷恋使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据非常完善的活动标尺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勒斯劳报”的不知分寸，这个文件已为广大公众所知。

同这个柏林智慧的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永恒信念的三星，即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繪的，是个

“个子不大、沒有胡須、一切都同拿破侖相似的人”；他，按照同一个戈克

的說法，是个“英雄”，“未来的人”，“首先是个天才的、天賦創造精神的、不倦地忙于新計劃的人”。

在我們之間有人說，济格尔將軍是巴登的一个自信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輕的尉官。他从法国革命的战役史中看到，由一个少尉一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沒有胡須的人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个革命軍队的总司令。他由于名字的不同而在軍队中博得的声望^①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願望。他在尼喀河畔进行的战斗以及在黑林山沒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而他的退往瑞士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策略。他的軍事計劃证明他通曉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了忠实于革命的傳統，不考虑敌人、也不注意作战綫和退却道路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忠实地从莫罗在当时選擇的一个陣地轉到另一个陣地，尽管如此，如果說，他沒有能在所有的細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軍，如果說，他不是帕拉迪茲，而是在埃格里紹渡过萊茵河，那末应当說这是由于敌人的眼光短淺，不善于估計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行为。济格尔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傳教士，他在这些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固然比拿破侖更缺乏文采，然而比拿破侖更充滿信念。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軍官手册；我們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話：

“按照章程，革命軍官必須备有：一頂帽子(除便帽外)，一把帶鞘的軍刀，一条黑紅黃三色的駱駝絨腰帶，两副黑色皮手套，两套軍服，一件斗篷，一条呢褲，一条領帶，两双皮靴或鞋，一个十二英寸长、十英寸高、四英寸厚的黑皮

^① 見本卷第377—378頁。——編者注

旅行袋，六件衬衣，三条衬裤，八双长袜，六块手帕，两条面巾，一副刮脸和洗脸用具，一副文具，一块规定式样的石板，一把刷子，一本野战勤务章程。”

約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繪)是

“誠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榜样，这个人曾經把上巴登和湖濱边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并由于多年的斗争和苦难而博得了差不多同布倫坦諾一样的声誉。”

和一个誠实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身分很相称，約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張胖得滾圓的臉、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的生活，人們只知道他是靠十五世紀的一件艺术雕刻品和几件同君士坦士宗教會議²³³有某种关系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錢观赏这些珍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給他們，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洋洋得意地說的那樣，都是他“仿照古董的样式”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功績是：第一，他在預备議會²³⁴的會議結束后被馬提下令逮捕，第二，他于1849年6月在施图加特被勒麦下令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給自己丢丑的危險。后来維尔騰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納了一千古尔登的保证金，而菲克勒尔却隱姓埋名地到土尔高去了，他就这样銷声匿迹，使保证人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濱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湖濱农民的思想 and 感情。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抱定这样一种見解：长期的学习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預先警告他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館的圖書館去。

阿曼杜斯·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人^①，他

① 俏皮話：Amandus (阿曼杜斯) 一字有“愉快的”“可爱的”意思。——編者注

“的确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是个诚实的公民，他的谦逊和高尚的行为使他到处都有朋友”（“西美周刊”）。

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认，在政府里他丝毫也不能反对布倫坦諾，并且由于谦逊而给自己加上一个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宣布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天宣布在多瑙埃申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由于谦逊，他后来宣称（在1852年向雅努斯-海因岑²³⁵），12月2日巴黎无产阶级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种巴登-法兰西的和法兰西式的南德所固有的民主派的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逊和“戈克派”的存在的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巴登革命失败后有些可敬的人到苏黎世来看他，并对他说，参加巴登革命的有德国各个种族的人，所以必须把巴登革命看做全德的事件，正如罗马革命是全意大利的革命一样。他是坚持到底的活动家，所以他应当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由于谦逊，他拒绝了。”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爾的挚友的人，是可以也“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由于这些人，以及和他们类似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活动家们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 *au grand complet* [会齐了]，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到。

十三

Chi mi darà la voce e le parole,
 E un proferir magnanimo e profondo!
 Che mai cosa piu fiera sotto il sole
 Non fu veduta in tutto quanto il mondo;
 L'altre battaglie fur rose e viole,
 Al raccontar di questa mi confondo;
 Perchè il valor, e'l pregio della terra
 A fronte son condotti in questa guerra.

(Bojardo. Orlando innam. Canto 27.)

誰使这架小小的豎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汲取振奋人心的詞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鮮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見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議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劍相斗。①

由于这些最后的 fashionable arrivals〔新到的名人〕充实了流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須努力大規模地“組織起来”，使自己具有一个最終的形式的时刻来到了。可以設想，这种努力将引起新的和激烈的敌对行动。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現在已达到了最高潮。个人之間的爭吵，互相傾軋，玩弄詭計，无节制地自吹自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編者注

播，——大人物們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这个小圈子内的政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甚至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有这些追求和奋斗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对这只圣杯²³⁶的盘算，所以先驗的競争，关于紅胡子皇帝^①的胡須的爭論立刻就成为了小丑們的毫不出色的竞赛。誰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一場老鼠与青蛙之战²³⁷，那他可以在紐約“快邮报”、“紐約德文报”、“德意志总汇报”、“国家报”、巴尔的摩的“通訊員”、“警钟报”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必需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沒有引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給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許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倫敦的可怜的草人（就像利用吓唬鴉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流亡的英雄們对于现状决沒有任何危險，他們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現出一片死寂的沉靜，好让他們的聲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靜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們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偉人。

新到的南德的正直人物們同哪一方都沒有联系，因而在倫敦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調停人的角色，同时可以把所有的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一些杰出人物的周圍。他們的高度发达的責任感要他們不要放棄这种机会。但是他們同时看到，在这方面同他們完全团結一致的賴德律—

① 紅胡子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綽号。——譯者注

洛兰已經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總統的安乐椅。对于他們这些法国的近邻來說，重要的是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即承认他們是德国的临时統治者。对济格尔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让賴德律保障他的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越过阿尔諾德才能走向賴德律。况且，阿尔諾德所戴的坚强性格的假面具那时还使他們敬仰，而且他还应当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們南德的黄昏。因此，他們首先去向卢格請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亲密的周圍人物——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賴辛巴赫为首的前議會議員和議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奥本海姆，最后是維利希和他的义勇軍，但后者已成泡影。在这里，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蓮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爵的賴辛巴赫代表資產階級；而作为維利希的維利希則代表无产階級。

关于奥古斯特·維利希，首先应当說明的是，古斯达夫总是因他的尖头盖骨而暗中不信任他，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負这个过分发达的凸出部分压倒了其余的一切脑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倫敦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維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的气氛，維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个时期的木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的領袖。

游击队的領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現代戰爭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現象。游击队的領袖习惯于独立行动，是反对任何最高总司令的。他的游击隊員只服从他，而他也完

全依赖于他们。因此，纪律在志愿部队里有极其特殊的性质：看情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这是经常的）则极端松懈。游击队的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面孔，他经常必须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讨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般的军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属服从，必需用其他的品质来巩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需具有哪怕是高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必须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自己的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的心，欺骗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卓越的人物。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变得和流氓无产阶级一样了。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因此，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需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需是有原则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向队伍传教，在同每一个士兵作个别谈话时经常进行有教益的宣传，从而把这个最高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就此变成自己的精神上的儿女。如果这个最高观念具有思辨的、坚强的性质，并且超过一般的理智的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²³⁸一样，那就更好了。因此，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高高地超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敢之上；而这样的部队所以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末部队就能

够更加坚强。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交往，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并且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一定要竭力争取脱离军队，或者立刻使自己摆脱无信仰者的团体；他们最痛恨大规模的军事联合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最高尚的感悟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无作用。因此，游击队的领袖应当是个道地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他应当用自己的德行来对付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敢把他灌醉，而他自己必须宁可避开众人，偷偷地，哪怕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抱着酒瓶痛饮。如果他由于人类的弱点，在饱尝了人世的幸福之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末他就永远不要走大门，而宁肯绕个弯，越墙进去，以便不要把任何人诱入歧途。对于女人的魔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的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决不当成为过分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在 *cavaliere della ventura* [探险的骑士] 的后面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用和免费住宿勉强度日的 *cavalieri del dente* [吃饭的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出面来进行准备好的安慰，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国，因而也是为了受难者本身的利益。

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诚然，这些品质发生了某些不十分好的变化。首先他应当为新的部队保存核心，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愿部队的残余和平民流亡者组成的核心，在兵营中的生活或者由

政府維持(例如在伯桑松时)²³⁹,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維持。兵营中的生活应当用观念来使它神圣化; 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 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 对一般非軍人活动的卑視获得了最崇高的意义。但是, 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軍事条例的約束, 而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訓条, 所以偶尔因共同的金庫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有时, 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的权威的头上。如果哪里附近有手工业者协会, 那末这里就可以用来作为替酗酒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 并且給手工业者描繪将来的放蕩生活和游击队冒險活动的远景, 以补偿他們現在所做的沉重的劳动。此外, 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錢供养部队, 因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高度的原則性的意义。不論在兵营里, 或者在协会里, 說教和在个人交往中的古老的不拘礼节的作風都不是沒有影响的。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应失去他所絕對必需的不可动搖的信念, 而且, 正如他在战时在每次失敗以后总是預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 現在他也經常宣告, 这至迟再过两星期就“会开始”, 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 在哲学上是必需的。因为他經常必須面对着敌人, 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对, 所以他在后者中間将发现对自己的明显的敌意, 并且确信, 无耻的人光是由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就会打算毒害他或刺死他; 因此, 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的領袖在战时如果不想像他被居民奉为偶像, 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 同样, 在平时就是在沒有实际的政治联系的情况下, 他也不断地設想或想像着这些联系, 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騙局。征用和免費住宿方面的才能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現出来。反之, 我們的罗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 像一切高尚的和偉大的行为一样,

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考驗。博雅多在第二十四首歌中唱道：

特平在談到布拉瓦伯爵時說，
他的一生在童貞中度过，
誰願意相信就相信吧，先生們！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就像洛多維科·阿里欧斯托先生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²⁴⁰。但是，我們的現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詩人本人混淆起来，詩人在讲到自己時說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卡的胸怀里找回理智，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所得到的的是被赶出了大門。

在政治上，游击队的領袖要表现出他在进行小战斗的各种方法上的无与伦比的經驗。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意，从一个派別轉到另一个派別^①。小小的阴谋活动、可鄙的規避行为、不时的撒謊、以道义上的憤慨为借口而干出来的阴險的勾当在他那里都表现为高尚意識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他的言論和行为的最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說謊！”固定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棄义行为的富丽堂皇的屏障，并且使缺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們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飽經世故的出色人物來說，这正是所需要的。

唐·吉訶德和桑科·判札的二位一体，既热爱粮袋又热爱固定观念的、对漫游騎士的免費膳食和他們的光荣同样感到振奋的、

^① 双关語：德語中《Parteigäng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有“任何一个党派的信徒”之意。——編者注

以坚强性格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騙行为的、进行小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这就是維利希。他的真正的未来是在格兰德河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間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給紐約“德意志快邮报”編輯部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說明：

“他們〈南德人〉决定同其余的派別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实现这个良好意图的希望很渺小。金克尔繼續在搞阴谋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他的傳記作者和几个普魯士尉官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秘密行动，逐漸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錢弄到手，然后就以强大的金克尔派的身分突然公开出現。这样做既不誠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

济格尔先生在給同一家报纸的信中把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图中的“誠实”想法表露如下：

“如果說，我們少数几个有正直想法的人也局部地进行了秘密活动，那末我們这样做只是为了抵御金克尔和他的同謀者的卑鄙的阴谋活动和勒索行为，并且向他們证明，他們并不是为了主宰一切而出生的。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强使金克尔出席有許多人参加的大会，在那里我們要向他和他的（照他的說法）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們证明，并不是一切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首先让乐器〈叔尔茨〉，然后是让奏乐者〈金克尔〉去見它的鬼吧。”（1851年9月24日“紐約德文周报”）

在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卢格的“理智”，而在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則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互相咒罵，互相称之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的成分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一个偉大的战斗，必須談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派別的外交手腕。

阿尔諾德（以及他的伙伴們）首先关心的是組織“不公开的俱

乐部”，它的公开的表面的目的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则应当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1850年夏天起就已经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找到理想的中間分子，在他們之中他可以毫不客气地作为統治者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組織、組織各种委员会就构成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政策中的必要因素。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們应当竭力設法不让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表的号召預先签名认购五百英鎊的宣言得到了回答，他收到了一份从新奥尔良来的寄錢給他的通知，根据这一点，他就同維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賴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等人一起組成了秘密的財務委员会。他們这样想：如果我們有了錢，流亡者就会拥护我們；如果流亡者拥护我們，那末我們也将成为德国的統治者。因此，他們首先必須让流亡者群众忙于参加各种单纯是为了討論形式問題而召开的會議，但是用一切办法阻撓成立正式的組織，使不超出“未形成的团体”的範圍，尤其是不让組織任何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妨碍敌对的派别，阻撓他們的活動，而自己則在他們背后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活动家們”)共同的特点是力图欺哄流亡者群众，不讓他們知道自已的最終目的，只是把他們当作幌子；然后，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們拋棄掉。

現在我們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馬基雅弗利們、达来朗們和梅特涅們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場。1851年7月14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出場

的私人協商失敗”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請所有派別的有名的活动家都来参加7月14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的會議。有二十六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議組織德国流亡者的“不公开的小組”并且从小組中分出“工人委员会，来协助达到革命的目的”。提案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約六个信徒的反对。經過了許多小时的热烈爭論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十六票对十票)。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們再不能参加这个計謀，并且离开了會場。

第二場。7月20日。上述的多数派組成了一個单独的同盟，在新加入者中間有菲克勒尔介紹的陶森瑙。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通一样，陶森瑙先生是它的阿伯拉罕-圣克拉。西塞罗的两个腸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視而不发笑²⁴¹。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鏡子中自己的严肃表情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說，卢格曾經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仰，那末命运报复了他，給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議，會議延期了，延期的目的是設法再一次同金克尔派达成協議。

第三場。7月27日。會議在克朗邦飯店举行。“有名的”流亡者 au grand complet [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了来参加已經成立的同盟。相反地，他們坚持“組織不包括工人委员会和沒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辯論俱乐部’”。叔尔茨在这整个議会程序中扮演了年輕的金克尔的导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本团体应以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名宣布自己为非公开的政治同盟。新成員应从德国流亡者中，根据同盟成員的建議，由多数票通过吸收之。”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这个提案的通过引起了全場的鼓掌和欢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由于全体一致通过，每个人都感到，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为革命作了件有益的事情。”（戈克，1851年8月20日“快邮周报”）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告中欢呼道：

“現在全体流亡者組成了一支統一的緊密團結的隊伍，連布赫爾也參加了，只有怙惡不悛的馬克思集團除外。”

梅因的這些話也可以在柏林的石印的政府通告^①中看到。

于是，在全体表现了互相谦让的情况下，在为庆祝德意志共和国而发出的“烏拉”欢呼声中，偉大的流亡者俱樂部誕生了，它将举行非常令人振奋的會議，并且将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欢喜地解了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直到今天仍在美国作为健在的机构而发生作用。

第四場。 8月1日。在克朗邦飯店举行第二次會議。

“很遺憾，我現在必須報告：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俱樂部的勝利上是犯了錯誤。”（戈克，8月27日“快邮周报”）

金克尔不經多数人預先通过便把六个普魯士流亡者和六个工业展覽会的普魯士參觀者引进了俱樂部。**达姆**^②（主席，前巴登制

① “普魯士石印通訊”。——編者注

② 达姆在这里！

誰在这里？

达姆！

誰？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

宪議會主席) 对这种等于叛国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声明說:

“俱乐部只是一个公开的松弛的团体，它除了提供人們互相認識和举行任何人都可以来听的座談的机会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因此，最好是尽量让外面的拜訪者参加本团体。”

大学生叔尔茨連忙来补救他的教授的愚蠢行为，提出一个关于准許拜訪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阿伯拉罕·圣克拉一陶森瑙站了起来，并严肃地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1)“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它每周要提出关于当前政治、特别是德国的当前政治的准确报告；这些报告应当归入同盟的档案，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公开发表；(2) 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把反动派的奴僕們在过去三年中对民主派的拥护者干出来的以及現在还在干的违法行为和殘暴行为的尽可能詳細的材料記載到同盟的档案中”。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有

賴辛巴赫：“在这两个看样子似乎不錯的提案里他看到了可疑的見不得人的用意和想法，这就是想通过选举这些委员会的办法来賦予本团体以他和他的朋友們所不希望的正式的性质。”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这样的委员会可以攫取到一种具有秘密性质的职能，因而可以逐漸导致形成正式的委员会。”

梅因：“我所希望的是言論，而不是行动。”

如戈克所断定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于是馬基雅弗利一叔尔茨便提議延期表决。阿伯拉罕·圣克拉一陶森瑙由于天真而同意了这个提案。金克尔认为，

“表决应当延期，到下一次會議再举行，主要原因是，今天晚上他那一派看来是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和他的朋友們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表决是‘結合他們的真心’的。”

問題轉到下一次會議討論。

第五場。 8月8日。在克朗邦飯店舉行第三次會議。討論陶森璫的提案。金克爾和維利希違反協議，帶來了“流亡者下層，le menu peuple〔平民〕，以便在這次結合自己的良心。”叔爾茨提出一個關於志願報告當前政治問題的修正案，於是，經過了預先的商議，立刻就有人自願宣讀這些報告：梅因談普魯士，叔爾茨談法國，奧本海姆談英國，金克爾談美國和未來（因為他的最近的將來是在美國）。陶森璫的提案被放到了一邊。他令人感動地聲明說，他願意犧牲他的正義的憤怒，把它獻給祖國，他願意留在同盟者的圈子裡。但是盧格—菲克勒爾派立刻擺出一副受了騙的美麗的靈魂的憤怒姿態。

插曲。 金克爾終於從新奧爾良收到了一百六十個英鎊，這筆錢，金克爾必須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參與下，為了革命的利益把它變為能贏利的資本。本來就已被上一次的表決結果刺痛了的盧格—菲克勒爾派知道了這件事。決不能再浪費一分鐘，必須行動起來。於是便形成了一個用“鼓動者協會”的名字為自己的停滯的和污濁的存在裝璜門面的新的流亡者泥潭。它的成員是陶森璫、弗蘭克、戈克、濟格爾、黑爾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爾、盧格。協會立刻在英國報紙上發表聲明，

“它的建立並不是為了辯論，而主要是為了活動，它將不是致力於 words〔言〕，而是致力於 works〔行〕，並且首先要建議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現金。鼓動者協會把執行權托付給陶森璫，並任命他為自己的對外的全權代表和通訊員；同時，它承認盧格在歐洲中央委員會里的地位（帝國攝政者的地位），也承認他過去的活動，承認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國人民。”

在這個新的聯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個原始的集團，即盧

格—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諾德在經過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后，终于达到了他所想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馬車的第五个輪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八个人組成的“一部分輪廓鮮明的〈可惜太鮮明了〉人民”。但是連这一点滿足也被破坏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間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須从現在起就停止“写作和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胡話”。粗暴无礼的菲克勒尔认为阿尔諾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沒有讀过也用不着去讀的作品，才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場。 8月22日，克朗邦飯店。首先便是叔尔茨的“外交上的杰作”（見戈克）：建議由屬於各派的六人組成全体流亡者委員會，并吸收維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員會的五个成員加入委員會（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維利希派将总是处于多数的地位）。建議通过了。选举也举行了，但是“国家”中由卢格統治的那一部分的成員拒絕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破产了。此外，过了四天維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手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員會，因为表现出极端不恭的“流亡者下层”的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員會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关于这个流亡者委員會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經過认真考虑的。有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場提出質問。有人建議要流亡者俱乐部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要公开宣布不同意它的全部活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老济格尔，見下面^①）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魯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

^① 見本卷第377—378頁。——編者注

朋友卢格是馬志尼的奴僕和“老牌的肮脏的造謠中伤者”。布魯士斯，你也在內！^① 戈克不是以偉大的演說家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身分进行反駁，并且无情地攻击两面派的、优柔寡断而阴險的、牧师般地慷慨激昂的金克尔：

“不让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有机会参加工作，这是不可原諒的！但是这些人显然只要求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的联合，为的是在这种幌子下使这个集团能够达到某种目的。”

当戈克談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时候，金克尔庄严地站了起来，并庄重地說，他

“已經控制了整个美国新聞界，并且已經采取措施，要法国新聞界也服从他的影响”。

真正的德国派的提案通过了，并且引起“鼓动者”提出了声明，說他們的协会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間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在整个現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流亡者的产物实际上只存在到它們之間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現在它們好像只存在于考尔巴赫的異教徒灵魂之战²⁴²中，而这場战斗到今天还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以及在各种會議上繼續进行着，并且看样子將繼續进行到世紀末。

不承认任何紀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維利希来了，他断定，流亡者俱乐部同这个騎士联合是丢了臉，这件事使整个會議更加騷乱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絕望了，已經几次失去了对會議的控制。而在討論鼓动者协会的問題时，由于它的會員的

① 凱撒被刺后發現他的好友布魯士斯也是謀刺者之一时，对布魯士斯說的話。（見“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7集第55頁）——譯者注

退場，混亂已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脅、狂哮聲中，這個有教益的會議開到了深夜兩點，最後主人熄滅了煤氣燈，使憤怒的敵對者陷入一片漆黑，並且以恐怖結束了這場拯救祖國的事業。

在8月底俠義的維利希和多情善感的金克爾企圖從內部來炸毀鼓動者協會。他們向誠實的非克勒爾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他，非克勒爾應當同他們以及他們的親密的政治上的朋友們一起組成財務委員會以支配新奧爾良寄來的錢。這個委員會將一直存在到能夠召集革命本身的正式的財務委員會時為止；但是，如果接受這個建議，那就是同意解散一切存在到那時的德國的革命團體和鼓動團體。”

正直的非克勒爾被這個“欽定的、秘密的、不負責任的委員會”激怒了，

他喊叫道：“僅僅是一個財務委員會怎麼能把一切革命政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不論是現在收到的或是過去收到的錢都不能成為要求民主派中各個意見不同的派別犧牲自己的獨立的理由。”

這樣，這個叫人開小差的企圖非但沒有引起預期的解散，反而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因此，陶森璠可以宣布，兩個強大的派別——“流亡者”和“鼓動者”之間的破裂已成為無可挽救的了。

十四

为了表明“鼓动者”和“流亡者”之間的战争是以多么融洽的方式进行的，我們从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引用几个片断。

“鼓动者”

卢格宣布，金克尔是“普魯士亲王的代理人”。

另一个“鼓动者”发现，流亡者俱乐部中的杰出的成员似乎是：

“除牧师金克尔外，还有三个普魯士尉官、两个来自柏林的平庸的作家和一个大学生。”

济格尔写道：

“不可否认，維利希获得了几个信徒。当然，既然在三年的时间内不断向人们說教并且只說他們爱听的話，那末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能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信徒。金克尔一伙力图把維利希的这些信徒拉到自己这方面来。維利希的信徒和金克尔的信徒便开始勾搭起来了。”

第四个“鼓动者”宣布，金克尔的追随者都是“偶像崇拜者”。

陶森瑙对流亡者俱乐部作了如下的說明：

“在爱好和平的假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一贯进行欺騙，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党派的領袖和組織者的身分出現，企图欽定秘密的財務委员会和玩弄各种幕后的阴謀詭計（不管它們在那里被叫做什么），不成熟的政治家們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来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命运，可是一旦爆发革命，这类讲究虛荣的計劃就都烟消云散了。”

最后，罗多芒特-海因岑宣布，卢格、戈克、菲克勒尔和济格尔是他个人所认识的在英国的唯一值得尊重的流亡者。流亡者俱乐部的会员都是“利己主义者、保皇党人和共产党人”。金克尔是“不可救药的爱好虚荣的蠢才和夸夸其谈的显贵”；梅因、奥本海姆、维利希等等都是他海因岑“只有把身子弯到膝盖骨才能看清的小人物，他们甚至还没有长到卢格的踝骨那样高”。（1851年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警钟报”等等）

“流亡者”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悬在空中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自命为全权代表的钦定委员会？它既不是由任何人选出的，也不询问一下它想代表的人，他们是否愿意让这些人来做他们的代表？”——“凡是知道卢格的人都晓得，发表宣言是他的不可救药的毛病。”——“在议会里，卢格甚至还不如特利尔的拉沃或西蒙有影响。”——“凡是需要行动的革命毅力、组织工作、镇静或沉默的地方，卢格就成了危险人物，因为他既不能闭口不说，又无法停笔不写，而且总希望代表整个世界。卢格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结交，这翻译成卢格的话，就是向所有报刊发出通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结成了兄弟般的革命联盟。’”——“这种妄自尊大的钦定委员会的做法、这种自夸的无所作为，促使卢格的最亲近和最明智的朋友，如奥本海姆、梅因、施拉姆，为了共同的活动而同其他人建立联系。”——“站在卢格背后的不是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而是一个轮廓鲜明的宁静的书呆子。”

“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询问，这个陶森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维也纳人偶尔相信，他是为了把维也纳民主派的坏的一面公布于世而经常责难它的反动性的维也纳民主派中的一个。但是这应由这个维也纳人负责。无论如何，这个大人物是不知名的；但是他究竟不是个大人物，还不得而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平平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那她就会陷于极端狼狽

的境地。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锐的反政府的言論而成为有声望的軍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論是由于經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輕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高潮中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陸軍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較成熟的和真正的軍官，在他們面前，年輕的、毫无經驗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們必須服从这个无名的、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才能的年輕人的时候，他們感到相当的气憤。但是这里有布倫坦諾，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的事情…… 济格尔在整个巴登战役中表现了极端的无能…… 無論如何，值得注視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在黑林山脉中，济格尔把共和国軍队的英勇的士兵們交給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給他們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輕便馬車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还以引人注意的失败的統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偉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勇的業績，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們这位偉大的熟人，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的确可笑，当这些人〈如鼓动者协会的會員們〉責难别人不彻底的时候，他們自己却是些政治上的零，無論如何，既不是整个什么，又不是半个什么。”——“个人野心，这就是隱藏在他們的原則基础后面的东西。”——“鼓动者协会作为一个协会只具有私人的意义，就像一个什么文艺小組或台球房一样，因此，它沒有任何理由要求承认它，也沒有任何权利頒发委任状。”——“你們自己抽签决定的！外行应当成为內行，为的是讓他們自己来判断，你們是些什么样的人！”（巴尔的摩“通訊員”）

应当承认，这些先生們彼此都很了解，又几乎都达到了了解自己的地步。

十五

这时，“流亡者”的秘密的财务委员会选出了管理委员会，由金克尔、維利希和賴辛巴赫組成，并且决定认真地从事发行德国公債。大学生叔尔茨，正如1851年底的紐約“快邮报”、“紐約德文报”和巴尔的摩“通訊員”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到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去，并且开始在那里寻找一切过去的、已被遺忘的和銷声匿迹的議會議員、帝国摄政、議院代表和其他有名的人物，直到已故的拉沃，爭取他們为公債作保证。这些已被遺忘的倒霉的人便急忙为这一事业作保证。要知道，如果說为公債作保证到底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話，那末这就像互相保证 in partibus [在異国的] 政府职位一样，而金克尔、維利希和賴辛巴赫等先生就这样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取得了保证。而在瑞士无可慰借地苟延殘喘的、可敬的、道德高尚的人物們，对于“組織”和保障职位热中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老早就在他們中間根据資历按秩序分配了未来的政府职务，而在决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职位归誰时，总要吵得不亦乐乎。一句話，大学生叔尔茨回来时口袋里是带着保证书的，于是伙伴們便开始了工作。固然，几天以前，金克尔在同“鼓动者”进行的又一次的会商中曾答应不以“流亡者”的名义单方面进行公債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带了保证人的名单及賴辛巴赫和維利希的全权委托书离开了，好像是为了要在英国北部作他的美学演讲，而实际上是为了从利物浦横渡大洋到紐約去，就像帕威法耳²⁴³那样到美

国去寻找圣杯，即民主派的金銀財宝。

于是开始了动听的、神奇的、夸張的、从未听說过的、真正的和充滿冒險情节的关于“流亡者”和“鼓动者”在大洋两岸进行得更加激烈和更加頑强的偉大战斗的故事，——关于哥特弗利德为了同科苏特竞争而进行的十字軍征討的故事，关于他怎样在經受了千辛万苦和难以形容的考驗之后终于带着装在旅行袋里的圣杯回到了故乡的故事。

Or, bei signori, io vi lascio al presente,
E se voi tornerete in questo loco,
Dirò questa battaglia dov'io lasso
Ch'un'altra non fu mai di tal fracasso.

(Bojardo, canto 26.)

現在，先生們，我要离开你們了；
如果你們再到这里來的話，
我将告訴你們战斗的喧嚷和叫囂，
这个战斗是沒有任何战斗可以与之相比的。①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六首歌。——編者注

NEW-YORK DAILY TRIBUNE.

VOL. XII.....NO. 3,640.

NEW-YORK, SATURDAY, AUGUST 21, 1852.

PRICE TWO CENTS

卡·馬克思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輝格党²⁴⁴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于倫敦

不列顛議會大選的結果已經揭曉了。关于这个結果，我将在下一篇文章^①中更詳細地加以分析。

在竞选运动中，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支持的有哪些党派呢？

有托利党、輝格党、自由派保守党人（皮尔派），*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自由貿易派（曼彻斯特学派²⁴⁵的信徒、議會改革和財政改革派），最后，还有宪章派。

輝格党、自由貿易派和皮尔派联合起来反对托利党。真正的竞选斗争就是在这个联盟和托利党之間展开的。至于宪章派，他們是既反对輝格党、皮尔派和自由貿易派，也反对托利党的，也就是說，他們反对的是整个官方英国。

大不列顛的政党在合众国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因此，这里只要把每个政党的显著特点略提几笔就够了。

托利党在1846年以前以旧英国傳統的卫道者聞名。人們說，他們把英国宪法奉为世界第八奇迹；他們是 *laudatores temporis acti*〔往事的贊美者〕，是王位、高教会派²⁴⁶以及不列顛臣民的特权

① 見本卷第405—411頁。——編者注

和自由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不祥的1846年谷物法被廢除时²⁴⁷，托利党人叫苦連天，这就证明了他們正是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同时也揭露了他們之所以对旧英国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恋恋不舍的秘密。原来，这些制度正是最适合于大土地所有制的，他們(土地貴族)一直依靠这些制度統治着英国，而且直到現在还企图以此保持自己的統治。1846年赤裸裸地暴露了构成托利党的现实基础的物质的階級利益。1846年从托利党身上撕下了一直用来掩盖它的階級利益的那張为傳統所尊崇的獅子皮。1846年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稅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稅派”則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稅派”听起来却是經濟上的絕望的哀鳴；“托利党”似乎标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則，“保护关稅派”則代表着物质利益。这些保护关稅派所保护的是什么呢？是他們自己的收入，是他們自己的地租。可見，托利党人归根到底是和其他資產者一样的資產者；难道世界上还有不保护自己錢袋的資產者嗎？托利党人和其他資產者的区别，也就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潤的区别。地租是保守的，利潤是进步的；地租是民族性的，利潤是世界性的；地租信奉国教，利潤則是天生的非国教徒。1846年廢除谷物法，只是承认了一件既成的事实，承认英国市民社会的成分中早已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土地占有的利益服从于金融集团的利益，地产服从于商业，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当英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經是一比三的时候，还怎么能够不肯定上述这个事实呢？托利党实力的物质基础就是地租。地租是由食物的价格来調节的，而食物的价格又是靠谷物法人为地保持在高度水平上的。谷物法的廢除降低了食物的价格，食物价格的降低又使地租下降，而随着地租的下降，托利党

的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实力也就被破坏了。

现在托利党人企图干些什么呢？他们企图保持住已经丧失了社会基础的政治权力。他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反革命，即国家对社会的反动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力图用强力保持那些从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两倍时起就已注定要复灭的制度和政治权力。这种企图必然要以托利党人的失败而告终；它一定会加速和加剧英国的社会发展，造成危机。

托利党人在租佃农场主中间争取拥护者，这些农场主或者还习惯于把地主看做自己天然的尊长，或者在经济上依赖地主，或者还不懂得农场主与地主之间利益的共同点并不比债务人与高利贷者之间利益的共同点更多。托利党人还得到那些关心殖民利益、关心航海利益的集团以及国教信徒，一句话，得到所有那些认为必须反对现代工厂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和它所酝酿的社会革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分子的拥护和支持。

托利党的世仇是輝格党，一个与美国的輝格党²⁴⁸除了名称以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政党。

英国的輝格党人在政治博物学上属于这么一个种类，像所有的两栖类一样，他们的生活很轻松，但要加以描写却很困难。我们还是像他们的敌人那样，称他们为在野的托利党人呢？还是像大陆上的作家们所爱做的那样，把他们看做一定的人民原则的维护者呢？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陷入像輝格党的历史学家庫克先生所陷入的那种窘境，这位先生在他的“政党史”²⁴⁹中非常 naïveté [天真]地宣称，虽然輝格党所依据的确是一些“自由的、道德的和开明的原则”，但是，非常遗憾，在輝格党存在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期内，每当它执政的时候，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妨碍它实现这些原

則。這就是說，連輝格黨自己的歷史家也承認，輝格黨的实际行為同它所宣布的“自由的、開明的原則”完全是兩回事。因此，這個黨很像一個酒鬼，在市長面前堅稱他在原則上是擁護戒酒的，但是每逢禮拜天他總是完全偶然地喝得酩酊大醉。

現在我們還是不要去管輝格黨人的原則吧；我們根據歷史事實可以更好地判斷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我們要看的是他們的所做所為，而不是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信仰，以及希望別人怎樣來看待他們的作用。

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一樣，也是大不列顛的大土地占有者。不僅如此，輝格黨的核心正是由英國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構成的。

他們和托利黨人到底有什麼區別呢？輝格黨人是資產階級的，即工商業中等階級的貴族代表。由於資產階級把執政的壟斷權和國家官職的獨占權讓給了輝格黨這一貴族寡頭，後者就向資產階級做了一切已由社會和政治發展進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讓步，並且幫助資產階級實現這些讓步。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而每當輝格黨人採取這種迫不得已的措施時，他們就大聲疾呼，說這樣一來歷史進步已經達到了極限，整個社會發展已經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然後他們就“緊緊貼在”這個“頂點”²⁵⁰上。輝格黨人要比托利黨人易于忍受地租收入減少之苦，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不列顛帝國收入的得天獨厚的管理人。只要他們還把政權的壟斷看成自己的世襲財產，他們就可以放棄谷物法為他們造成的壟斷。自從1688年“光榮革命”²⁵¹以來，除了若干次短期的中斷（主要是由於第一次法國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反動），執掌國務的一直是輝格黨。誰要是回憶一下這一段英國歷史，他就會發現：力圖保持自己

世襲的寡头政权乃是輝格主义的唯一特征。至于除此以外輝格党有时也加以维护的那些利益和原则,并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工商业阶级的发展即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强加于它的。就像1688年以后輝格党和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金融巨头联合起来一样,在1846年我们看到它又和工业巨头联合在一起。輝格党对1831年改革法案²⁵²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正像它对1846年自由貿易法案的实行也没有尽多大力量一样。这两个改良运动——政治的也好,商业的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当这两个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把托利党从政府职位赶走的最可靠手段,輝格党便上台执政,并把同政权有关的那一部分胜利果实据为己有。1831年輝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刚好进行到不致使资产阶级过分不满的程度;1846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貿易措施限制到能替土地贵族挽救尽可能多的特权的地位。他们每一次都急忙拉住运动,以便阻止运动继续发展,同时恢复自己的地位。

非常明显,一旦土地贵族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来争夺政权,一句话,当托利党彻底垮台的时候,英国历史上也就不会再有輝格党的地位了。既然贵族已经消灭,那些反对这个贵族的资产阶级贵族代表还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当城市开始兴起时,德国的皇帝曾经给这些城市委派了帝国总督——*advocati*——以保护它们不受周围贵族阶级的攻击。但是当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十分强大,完全独立,不仅能打退贵族的进攻,而且还能向贵族进攻时,它们就立刻把那些高贵的总督——*advocati*赶走了。

輝格党对于不列顛資產階級來說就是这种 *advocati*，而一旦托利党丧失对土地的壟断，輝格党也就会立刻丧失对政权的壟断。随着資產階級的独立性和力量的增长，輝格党也就由一个政党退化为一个集团。

很清楚，英国輝格党只能是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各色各样的分子的混合物；其中有拥护馬尔薩斯的封建主义者，抱着封建偏見的大富商，失却荣誉感的貴族，无力經營产业的資產者，滿嘴进步詞句的保守分子，狂热迷恋保守主义的进步分子，一点一滴地贩卖改良的捐客，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以及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英国人民群众一向以富有健全的审美感著称。他們对一切杂七杂八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对蝙蝠和罗素的政党都抱着本能的嫌恶。英国的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階級，和托利党一样仇恨“大富商”，也和資產階級一样仇恨貴族。而对輝格党，人民恨的則是两种人：貴族和資產階級，即压迫他們的地主和剝削他們的金融巨头。人民恨的是輝格党所代表的寡头政权，它一百多年来統治着英国，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事情。

皮尔派（自由派保守党人）不是一个政党，他們不过是对一位政党活动家，对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一种紀念而已。但是，英国人是过于讲求实利的民族，他們认为紀念除了用来編写挽歌是没有什么别的用处的。而現在，当英国人民已在全国各地为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建立起青銅的和大理石的紀念碑时，他們更加认为沒有格萊安、格萊斯頓、卡德威尔等这样一些活的皮尔紀念碑也未尝不可了。所謂的皮尔派，不过是罗伯特·皮尔为自己訓練的一帮幕僚而已。而由于这批幕僚为数甚多，所以他們也就

一时忘掉了他們背后是沒有任何人馬的。这就是說，皮尔派就是过去的皮尔的拥护者，目前他們还没有决定归附哪一个政党。而这种犹豫不决，显然是不能成为建立独立政党的充分根据的。

剩下的还有自由貿易派和宪章派。关于他們，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簡略地加以說明。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2 日

載于 1852 年 8 月 2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540 号和 1852 年 10 月 2 日“人民报”第 2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No. 137

LONDON, SATURDAY, OCTOBER 9 1852.

(Price Fourpence)

卡·馬克思 宪章派

1852年8月10日星期二于倫敦

托利党、輝格党、皮尔派，——总之，所有我們到目前为止已經分析过的党派，或多或少都屬於旧的时代，而自由貿易派（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議会改革和財政改革派）則是現代英国社会的正式代表者，即統治着世界市場的英国的代表者。他們是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的資產阶级的党派，是竭力想把自己的社会势力也变成政治势力并把最后一批傲慢的封建社会僕役鏟除的工业資本的党派。領導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資產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工厂主。他們力求使資產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飾的統治，力求使人們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現代資本主义生产的規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統治。他們所理解的貿易自由就是让資本暢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縛。土地應該成为市場的商品并按照貿易的一般規律来經營。應該有紡紗业和棉織业工厂主，也應該有食品业工厂主，而貴族地主却不應該再有。簡言之，就是不允許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規章和壟断存在，除非它們来源于“政治經濟学的永恒規律”，即来源于制約着資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表

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这是社会发展中的过了时的、行将告終的阶段的产物——的斗争的实质的，是下面这个口号：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 *faux frais*（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必需的費用）。这个口号不仅是向个人提出的，而主要地是向全民族提出的。

王权連同它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宮廷、王室費以及侍从人員难道不是生产的 *faux frais* 嗎？沒有王权，民族一样能够生产和交換产品，所以，要打倒王位！貴族的薪高而清閑的职位，上院，——这是些什么呢？生产的 *Faux frais*。龐大的常备軍呢？生产的 *faux frais*。殖民地呢？生产的 *faux frais*。国教会連同它通过掠夺和募化而掌握的財富呢？生产的 *Faux frais*。还是让神甫們互相自由竞争吧，让每个人願意給他們多少錢就給他們多少吧。龐大臃肿的英国司法机构以及它的大法官法庭²⁵³ 是什么呢？生产的 *Faux frais*。民族之間的战争呢？生产的 *Faux frais*。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剝削它們。

可以看出，对这些不列顛資產階級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們說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貴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产費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換自己的产品。他們最終的要求必然是**資產階級共和国**。在資產階級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統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資產階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內对外政策上保障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务；而就連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須組織得尽可能合理而經濟。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党就会叫做**民主党**。但它不能不是革

命的，而且它或多或少有意識地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作為貴族國家的舊英國。然而，它最近的目的卻是實現議會改革，議會改革會使進行這種革命所必需的立法權轉到它的手裡。

但是不列顛的資產者不像法國人那樣容易激動。雖然他們也力求實現議會改革，他們卻不會為此而進行一次二月革命。相反地，在1846年由於廢除穀物法而取得了對土地貴族的巨大勝利以後，他們就滿足於從這一勝利中獲得的物質利益，並不想同時從這一勝利中得出必然的政治和經濟結論，這樣也就使輝格黨得以恢復它對行政權的繼承性壟斷。在整個1846—1852年期間，他們由於高喊“偉大的原則，實際的〈應讀作：渺小的〉行動！”這樣的口號而受到人們的嘲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在每一次強大的運動中，他們都不得不求助於工人階級。但是，如果說貴族是他們垂死的對手，那末工人階級卻是他們新生的敵人，因此他們寧願同垂死的對手勾結，也不願用實在的、並非表面的讓步去加強日益成長的、掌握着未來的敵人。所以，他們極力避免同貴族發生任何暴力衝突。但是歷史必然性和托利黨人都在推着他們向前走。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把舊英國、把過去的英國徹底破壞；而一旦他們成為政權的唯一執掌者，一旦政治統治和經濟實力都集中在他們手中，因而對資本的鬥爭不再同對現政府的鬥爭割裂開來，那時就會爆發英國的社會革命。

現在我們來談談憲章派這個不列顛工人階級的具有政治積極性的部分。他們為之而鬥爭的憲章里的六條，所包括的內容不外是對普選權的要求，以及使普選權不致成為工人階級的空想的那些條件，這就是：實行秘密投票、規定議員支薪、每年舉行大選。但是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

占人口的絕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隱蔽的內战过程中，无产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义企业主(农場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組，我下次再談。現在我只讲讲不久前的选举。

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顛議會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就得有除繳納济貧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鎊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須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²⁵⁴，或者是一个每年交納不少于五十英鎊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結論：宪章派在剛剛結束的选举斗爭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說明他們在实际上怎样参加了这次选举斗爭，我應該把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是：

候选人提名日 [Nomination day] 和选举結果揭曉日 [Declaration day] 的區別！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的區別！

当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說的时候，他們第一步要經過举手表决选举。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贊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經举手表决(暫時)当选。可是好景不常。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馬上就不要了。例如，如果享有选举特权的人們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投票表决

則只有享有特权的选民阶层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算是合法的当选者。第一次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暂时給予社会輿論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以便在下一步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軟弱无力。

也許有人会觉得，这种举手表决的选举，这种危險的形式做法，其目的只是要把普选权弄得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只是同“老百姓”开个天真的貴族式的玩笑（軍务大臣貝雷斯福德少校就是这样說的）。但是这样想是錯誤的。一切德意志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傳統延續到十九世紀，只是因为不必承担很大的費用和風險，就能給不列顛的階級議會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統治階級从这种习俗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維護。只是当資产階級开始在輝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正式政党采取独立的立場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候选人提名日独立地行动。然而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間、候选人提名日和选举結果揭曉日之間的对立，从来没有像在最近这次 1852 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明显，从来没有这样尖銳地表现为敌对原則之間冲突，从来没有具有这样的威胁力，这样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請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誰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为候选人，他就会在投票表决时落选。誰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他就会飽尝人民的烂苹果和磚头。完全依照法律手續当选的議員不得不首先好好地考虑作为議員的肉体的“我”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十二分之一、占全国成年男性居民五分之一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賄賂。一边是一些拋棄了自己的特点的党派：坚持保守观点的自由派，宣讲自由主义思想的保守

派；另一边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捍卫自己的事业的人民。一边是一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破烂机器，是所有的正式党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逐渐把对方碾得粉碎这样一个无益的过程；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将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架官方的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候选人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竞选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所有的选区中，我只举一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选区即哈里法克斯的选举为例。在这里，互相竞争的候选人有爱德华兹（托利党）、查理·伍德爵士（前辉格党内阁财政大臣，格雷伯爵的女婿）、弗兰克·克罗斯利（曼彻斯特派），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一个最有才干、最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哈里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所以在那里托利党的希望不大。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激烈的斗争只是在伍德和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发表了历时约半小时的演说，开头和后半段都被广大听众的不满的喊声吵得根本听不清。据一个坐在他近旁的记者报道，他的演说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罗列已经实行的自由贸易派措施，攻击得比勋爵政府和吹嘘‘国家和民族的空前繁荣！’（喊声：“听啊！听啊！”）他连一个新的有助于改革的措施都没有提出来，只是用暗示的口吻稍稍提到约翰·罗素勋爵的选举法改革法案”²⁵⁵。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摘录。

“厄內斯特·琼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說：

‘选民和非选民們！你們到这里来庆祝一个庄严隆重的节日。宪法今天在理論上承认普选权，也許只不过为了明天在實踐中把它拋棄……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有两种制度的代表，你們必須决定要哪一种制度的代表来統治你們七年。七年——这是整整一小段生命啊！……我請你們在这七年的大門前停一停，让这几年今天在你們的眼前緩慢地平靜地走一趟吧。你們两万人今天采取的决定，也許就是为了让五百个人明天違反你們的意志！（喊声：“听啊！听啊！”）我已經說过，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两种制度的代表。不錯，在我的左边有輝格党人、托利党人和富有的企业主，但是实质上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区别。富有的企业主說：要賤买貴卖。托利党人說：要买得貴，卖得更貴。对于工人說来他們是一模一样。但是这第一种制度現在是占上風的，虽然它的根子已經因大众赤貧的膿疮而糜烂。这个制度是靠同国外的竞争生存的。而我可以断言，在賤买貴卖的制度下，在依靠同国外的竞争的制度下，工人階級和小企业主階級的破产还要繼續下去。为什么？劳动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哪怕是长一粒粮食，織一碼布，都要人去劳动。可是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沒有任何独立的营生。劳动是以雇佣方式出卖的商品，劳动是市場上买卖的对象；既然劳动創造一切財富，所以首先必須购买劳动。“要买得便宜，要买得便宜！”劳动在最廉价的市場上被购买。而跟着来的是：“要卖得貴，要卖得貴！”卖什么？**劳动产品**。卖给誰？卖给外国——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卖给**工人自己**，因为工人既然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就不能享有劳动的第一批果实。“要賤买貴卖！”你們喜欢这种事情嗎？“要賤买貴卖！”买工人的劳动要賤，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貴！这种交易的原則就是一定要让人吃亏。企业主以便宜的价錢购买劳动，他又出卖产品并必然从中获得利潤。他把产品卖给工人自己，結果，企业主同被雇佣者之間的每一次买卖，都是企业主的有意的欺騙行为。这样，劳动由于不断的亏损而愈来愈降低，資本則由于經常的欺騙而愈来愈提高。但是我們所說的这个制度还不仅仅限于这些。它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們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經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关税高的国家必須比关税低的国家卖得便宜。但是外国的竞争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之价格也就总是不断降低。因此，在英国工資就要不断下降。怎样使工資下降呢？通过过剩的劳动。这种劳动的过剩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通过对土

地的壟斷，把超過工廠需要的人手趕向工廠；通過對機器的壟斷，把這些人手趕到街頭；通过使用女工，奪走男工手中的織布梭；通过使用童工又把女工從織布機上排擠下來。企業主站在這種由活人堆成的過剩勞動的基礎上，腳下踩着破碎的心靈，大聲喊道：“會餓死的！誰願意做工？有一點總比根本沒有強啊！”於是備受折磨的群眾就如獲至寶地抓住這個機會，同意企業主提出的條件。（有人高喊：“聽啊！聽啊！”）對於工人來說，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結果就是這樣。而這對你們選民們會產生什麼影響呢？這對國內商業，對小商人，對濟貧捐，對一切捐稅會產生什麼影響呢？外國競爭的任何一點加強都會相應地使國內價格進一步下降。勞動價格的任何下降都必須以過剩勞動的增加作為基礎，而過剩勞動的增加又是靠擴大機器生產達到的。我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這對你們會產生什麼影響呢？我左邊的這位自由主義的曼徹斯特派採用了一項新的發明，把對他說來已成為多餘的三百人拋到了街頭。小商人們！這樣你們就失掉了三百個買主。濟貧捐繳納者們！這三百人就成為了新的貧民。（人們向演說者高聲喝采）但是請注意，邪惡還不僅限於這些！這三百個人首先會使那些還在同一生產部門中工作着的人的工資降低。企業主說：“從現在起我降低你們的工資。”工人們反對。於是企業主就補充說：“你們沒有看見我剛剛趕到街頭去的這三百人嗎？要是你們高興的話，你們盡可以同他們調換一下位置，只要讓他們回來，他們是願意接受任何條件的，因為他們快要餓死了。”工人們感到，事情的確是這樣，於是他們的反抗也就垮了。喂，你這個自由主義的曼徹斯特派，政治上的偽君子啊！在聽我們講話的這些人面前，你現在怎樣回答我？但是，邪惡還不僅限於這些。失掉了自己本來職業的人要到其他部門去謀生，這就會大大增加過剩勞動和降低工資。今天工資很低的職業，過去曾經是工資很高的，而今天工資高的在不久的將來工資也會降低。這樣，工人階級的購買力就一天一天地縮小，國內商業也將隨之而蕭條下去。商人們，要記住這一點！你們的買主愈來愈窮，你們的利潤愈來愈少，而要你們救濟的貧民將愈來愈多，你們必須繳納的濟貧捐以及其他捐稅的數目將愈來愈大。你們的收入降低，你們的支出增加。你們收入得更少了，花費得更多了。你們喜歡這種制度嗎？有錢的工廠主和地主把濟貧捐以及其他捐稅的全部担子都轉嫁到你們身上。你們中等階級成了為富翁們補償捐稅支出的工具。他們製造出了為他們創造財富的貧困，而硬要你們為他們親手製造的這種貧困負擔代價。地主逃避了這種負擔，因為

他們享有特權；工廠主逃避了這種負擔，他們從工人的工資方面得到補償，而這又會影響到你們。你們喜歡這種制度嗎？我左邊的這些先生所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至於我自己向你們提出的意見是什麼呢？我向你們指出了邪惡。這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想做得更多一些。我在這裡還要指出正義何在，並加以證明。’（熱烈鼓掌）”

接着厄內斯特·瓊斯就開始闡述自己對政治經濟改革的觀點，然後又繼續說道：

“‘選民和非選民們！我剛才向你們講述了幾項社會政治措施，現在我也像在1847年做過的一樣，呼喚立刻實行這些措施。但是，因為我力求擴大你們的自由，結果他們奪去了我的自由。（喊聲：“聽啊！聽啊！”）因為我努力為你們所有的人建立自由之宮，他們就把我丟進了刑事犯的牢房。這裡在我左邊就坐著一位看管過我的獄官。（聽眾對坐在左邊的人發出一片激烈的長時間的責難聲）因為我要大聲疾呼地保衛真理，我就被責令閉口。我被關在獄中達兩年又一個星期之久，住在單人牢房里，受到最嚴厲的隔離管束，不但不給我紙筆墨水，反而強迫我撕亂麻……不錯，（演說人轉向查理·伍德爵士）在兩年又一個星期的期間內，你們是戰勝者，可是現在我的出頭之日到了！我要喚醒在場的英國人心中的復仇之神。（場內爆發熱烈的掌聲）聽吧！你們難道沒有感到，在這廣大群眾的每一動作中復仇之神都在振動他的翅膀嗎！（場內再次爆發經久不息的掌聲）……有人會說這不是社會的事情。不，這正是社會的事情！（喊聲：“對呀！對呀！”）……我所以說這是社會的事情，是因為不同情被捕者的妻子的這個人，也絕不同情工人的妻子。不同情被監禁者的兒女的這個人，也絕不同情僱傭奴隸的兒女。（掌聲和喊聲：“對呀！對呀！”）他過去的历史证明了這一點，他今天的許諾也推翻不了這一點。是誰投票贊成愛爾蘭非常法，贊成禁口律法案，贊成壓制愛爾蘭的報刊？輝格黨人！就是這個人！打倒他！是誰十五次投票反對休謨關於擴大選舉權的提案，反對洛克·金關於各郡選區的提案，反對尤爾特關於短期議會的提案，反對貝克萊關於秘密投票的提案？輝格黨人！就是這個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對釋放弗羅斯特、威廉斯和瓊斯？輝格黨人！就是這個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對調查在殖民地的暴行，包庇華德和托林頓，包庇伊奧尼亞群島和

錫兰的暴君？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反对减少收入一万二千英鎊的劍桥公爵的薪俸，反对陆海軍費的任何削減，反对廢除窗口稅？是誰四十八次投票反对縮減一切其他的捐稅(其中也包括减少他們自己的薪俸)？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对廢除紙張稅和广告稅，反对廢除知識稅？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投票贊成增設一批主教职位和教区，贊成給予梅努特学院津貼，反对削減这类津貼，反对免除非国教徒²⁵⁶的教会稅？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对对食品摻假的事件作任何調查？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对降低食糖的關稅和取消麥麵稅？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誰投票反对縮短面包师的夜班工作時間，反对調查針織工厂工人的状况，反对对工人住宅的卫生檢查，反对禁止未成年工人早上六时以前上工，反对由教区給貧苦孕婦以救济，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輝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以上帝和人道的名义打倒他！哈里法克斯的公民們！英国公民們！两个制度摆在你們面前，現在你們来加以抉擇吧！’（簡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說、特别是演說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广大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傾听每一句話，演說每一停頓，立刻就像滾滾波濤一样响起了对輝格党代表和階級統治的憤慨之声。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經久难忘的場面。在举手表決的时候，贊成查理·伍德爵士的只有很少几个主要是被收买或者被吓倒的人。几乎全部与会者都在难以描繪的热情和欢呼中高举双手贊成厄內斯特·琼斯。）

市长宣布厄內斯特·琼斯先生和亨利·爱德华茲先生經举手表決当选。于是，查理·伍德爵士和克罗斯利先生随即要求投票表決。”

事情的結局正如琼斯所預言的那样：他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輝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却以五百票被选入議會。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2 日

載于 1852 年 8 月 25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543 号，并摘要載于 1852 年 10 月 9 日“人民報”第 23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并根据“人民報”校对过

卡·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

1852年8月20日星期五于倫敦

上届下院解散以前，議員們決定給自己的继任者尽量制造困难，阻撓他們进入議會。他們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詐騙行为。

他們拟定了一大串詳尽的和瑣碎得难以想像的問題，根据上述法律，这些問題可以向呈交选举抗議书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議員提出。可以要求他們宣誓說明：他們的代理人是誰，他們和代理人的联系如何。可以向他們提出問題并要求加以說明：不仅就他們所知，甚至就他們“推測、估計和猜想”，在选举中他們自己花了多少錢，或者別人替他們花了多少錢——經他們同意的或者沒有經他們同意的。一句話，任何一个議員，只要稍微怀疑也許有人曾为了他而違犯法律，他就无法經住这种奇異的考驗^①而不犯違誓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像僧侶对待三十九信条²⁵⁷那样自由地——只相信其中几条，却在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

① “考驗”原文为 Ordeal，原意是古代条頓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受裁判者将手插入烈火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或不中毒，便算无罪；此外，同原告举行决斗而获胜也算无罪。——譯者注

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議會成为曾經代表三个王国发表演說并为它們制定法律的历届議會中最清白的一届。但是，我們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无可爭辯的光荣：在他們执政期間，理論上宣布了最純潔的选举，而在實踐中却发生了最大規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間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的壟断以来的**前所未有的行賄、舞弊、暴行、酗酒和謀杀**的活剧。我們听說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們在地主的監視下違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人民对被迫害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冷酷地瞄准这些人开枪，他們大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克勒尔郡和里美黎克的事件）。也許有人会說：这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錯，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搗毁对手的讲坛；他們派遣成群的匪徒和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們開設了道地的酒窟；他們不惜巨資进行收买，例如在得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竞选的地方，他們都不断恫吓选民。”

上面是厄內斯特·琼斯的“人民报”²⁵⁸描写的情形。听了宪章派这个周报的报道以后，現在我們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周刊——工业資產階級最穩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倫敦的“經濟学家”怎样說吧。

“我們确信并且可以肯定地說，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舞弊和恫吓**，出現的**詭媚、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的类似情况所不及的。据說，这次选举中行賄的規模比往年大得多……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像……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陰謀，大規模地行賄，野蛮地恐吓选民，誣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躪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軟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謠、陷害、誹謗，褻瀆神圣的語言，詆毀高尚的名声，——如果我們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們就会在一大堆肉体被踐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議會就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頂上建立起来的。”

恫吓和舞弊是司空見慣的方式。首先是政府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例如，在得比，有一个选举代理人在行賄时被當場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軍务大臣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少校借給他一笔錢作竞选費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公报”公布了由一个海軍基地司令官簽署的海軍部給預备役軍官的通告，要他們投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在科克、拜尔法斯特和里美黎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里美黎克打死了八个人）。地主威胁佃戶，如果佃戶不和他們投一样的票，就要把他們从土地上赶走；得比勳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給他們的同行做出了榜样。店主遭到失去主顧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到处都使用了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宗教的手段。女王頒布了禁止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告諭，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都是“打倒天主教徒！”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騷动²⁵⁹就是这个告諭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甫也用类似的武器回敬了敌人。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結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皇家法律顧問就已經收到二十五个地区递来的抗議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賄和恫吓事件而宣布議會选举无效。在得比、考克茅斯、巴恩斯特珀耳、哈里季、坎特布里、亞馬斯、威克菲尔德、波士頓、哈得茲菲尔德、温莎及其他許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議員的抗議书，并筹集了相当的訴訟費用。可以肯定，即使在事态的发展对議會中拥护得比政府的議員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他們也至少会有八个到十个人由于这些抗議书而被取消議員資格。

当然，行賄、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場所自然是农业地区和貴族統

治下的城鎮。在通过 1831 年的改革法案时，輝格党曾費尽心机把这些地区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的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飲濫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政治信仰交易的結賬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国杂志^①这样說：“这种定期举行的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風敗俗的痕迹。”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羅馬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隶只当一天主人，那末这一天粗野的本能就会統治一切。主人就是統治階級的或統治階級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貴，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階級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他們周圍則有成千上万个沒有选举权的人，后者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單純的配角；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贊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英国百余年来的选举史，那末产生的問題就不会是英国历届議會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会提出这样的問題：它們为什么居然还能成为它們过去的那个样子，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英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代議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想必也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有时却能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問題，——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如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邏輯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結論；相反，議員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英国选举中傳統的

① 即“經濟学家”。——編者注

行賄，不正是表現互相競爭的政黨之間力量對比的一種粗野而露骨的特殊形式嗎？這些政黨在其他場合以尋常的方式採用的影響和統治的手段，在選舉的這幾天中則以特殊的方式，以相當離奇的形式實行着。而這兩種不同情況却有一個共同的前提：互相競爭的政黨的候選人代表着全體選民的利益，而這些有特權的選民又代表着沒有選舉權的群眾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說，這些沒有選舉權的群眾還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爾斐的女巫必須被一種氣體迷倒，才能得到神諭；不列顛人民必須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帶來神諭的立法使者。至於到哪裡去找這些使者，那是不說自明的。

從工商業中等階級即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正式的政黨與輝格黨和托利黨平起平坐的時候起，特別是從1831年改革法案通過的時候起，各個階級和政黨彼此間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產者對耗費頗大的競選手段，對大選的這些 *faux frais* [非生產費用] 絲毫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同土地貴族競爭，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個人出錢來得便宜。另一方面，他們意識到他們代表着普遍的在現代社會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們能夠要求選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本着個人或地方的利益行事。用來影響選民的陳舊手段愈是（由於選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為土地貴族的武器，而為資產階級所不能使用，資產階級也就愈是堅持上述的要求。因此，資產階級就為建立在道德原則基礎上的選舉而鬥爭，並且強迫議會通過根據這種精神制定的法律，其中每一項法律都是用來抵禦土地貴族的地方勢力的。的確，從1831年起，賄賂行為採取了比較文明比較隱蔽的形式，大選也在較為平靜的狀態下進行了。現在，人民群眾總算是不再做應聲蟲了，過去他們或多或少

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列特在丘必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²⁶⁰，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获得相当的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场所，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细地监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1852年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保守党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则异口同声地喊道：改革的敌人给改革的拥护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

如果看一下1831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愈大，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这个圈子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这个圈子的呼声愈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愈来愈少，因而，选民圈也就愈来愈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就拿伦敦做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26 728个选民，参加投票的只有10 000人。在哈姆雷特塔区，登记的选民有23 534人，参加投票的只有12 000人。在芬斯贝里，20 025个选民中投票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17 433名登记的选民中投票的只有13 000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

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說明什么呢？說明这个选民圈已經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說，选民們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們只是对結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輝格党就是帮助輝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們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問題的決定已不再取决于議會，也不再取决于議會选举。谷物法是誰廢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張保护关税的議會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張保护关税的議會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純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廢除的。現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議會的手段了。他們把直到現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議會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狹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們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賄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想像拚命挽救那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決定作用和选出真正国民的議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結果怎样呢？旧議會解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結的时候，它已經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絲毫作为的派別集团了。新議會开始时的情形則同旧議會完結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馬克思写于1852年8月16日前后

載于1852年9月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552号和1852年10月16日“人民報”第24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并根據“人民報”校對过

卡·馬克思 选举的結果

1852年8月27日星期五于倫敦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最近这次大选的結果。

如果我們把輝格党、自由貿易派和皮尔派合在一起总称之为“反对党”而把它們同托利党相对立，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关于新議会的統計資料，清楚地反映出我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經指出的那种巨大的对立，即**城市**和**农村**之間的对立。

在**英格兰**，城市选出了一百零四名內閣的拥护者和二百一十五名反对党的拥护者，而各郡則选出了一百零九名內閣的拥护者，反对党的代表只有三十二名。从作为托利党的堡垒的各郡中，应当除去最富庶和影响最大的地方——約克郡的西区、南郎卡郡、密多塞克斯、东薩雷等；把派遣代表参加議会的城市除开不算，这些地方包括了居住在各郡的一千万居民中的四百万人。

在**威尔士**，如果把城市的选举和农村的选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选举結果恰恰相反。这里的城市选出了十名反对党的拥护者和三名內閣的拥护者，而各郡則选出了十一名內閣的拥护者和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① 見本卷第400頁。——編者注

在苏格兰，这种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中当选的有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而没有一个內閣的拥护者。各郡則选出了十四名內閣的拥护者和十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在爱尔兰，对比关系不同于大不列顛。爱尔兰的民族政党在农村地区有很大势力，这里的居民更直接地受天主教僧侶的影响，而在北方城市中占优势的是英格兰人和新教徒。所以在这里农村是反对党的真正的中心，虽然在現行的选举制度下，这一点不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在爱尔兰，城市选出了十四名內閣的拥护者和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各郡則选出了二十四名內閣的拥护者和三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

如果你們要問，究竟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那末应当說：所有政党合在一起战胜了托利党，因为后者很明显地获得少数，尽管它使用了收买、恐吓和政府的压力等等手段。根据最精确的材料，共选出了二百九十名內閣的拥护者，三百三十七名自由派，或者說三百三十七名联合反对党的代表，以及二十七名动搖分子。即使把这二十七名动搖分子算作是內閣的拥护者，自由派仍然保持二十票的优势。可是，托利党人本来是指望获得多数的，他們希望至少获得三百三十六票。即使不談这个在数字对比上失利的問題，托利党人也已經在竞选中遭到了失敗，因为他們的領袖被迫放棄了自己的保护关税原則。在得比的二百九十个拥护者之中，有二十个表示根本反对任何保护关税政策，而在其余的人中間，大多数人——包括迪斯累里本人在內——都反对谷物法。

得比勋爵在他提交議会的咨文中断言，只有在絕大多数人贊成的情况下，他才改变英国的貿易政策。他远沒有想到他自己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虽然选举的結果完全不符合托利党人的乐

观的愿望，这种结果对托利党人来说仍然要比反对党所期望的好得多。

没有一个政党比辉格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恰好是在这个党的力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所谈的就是它的上一任的大臣们。辉格党的群众一方面同自由贸易派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同皮尔派混在一起。英国辉格主义的真正的重要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辉格党的官方上层人物身上。不错，伦敦西蒂区重新选举了上届辉格党内阁的首脑约翰·罗素勋爵，但是，在1847年伦敦西蒂区的选举中，马斯特曼先生（托利党人）曾经比约翰·罗素勋爵少得四百一十五票，而在1852年他却比罗素勋爵多得八百一十九票，成为第一名当选人。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十一个成员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这十一个人是：财政部部务委员威·基·克雷格爵士、财政部部务委员理·孟·贝留、检察长戴·邓达斯爵士、内务大臣乔·格雷爵士、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约翰·哈奇尔、财政部秘书长乔·康瓦尔·路易斯、军械总长秘书克·爱·佩吉特勋爵、海军部秘书长约翰·派克、爱尔兰事务大臣威·索麦维尔爵士、海军部部务委员斯图亚特海军上将，此外，还应当把下院委员会²⁶¹主席贝尔纳先生算上。一句话，自从改革法案公布以来，辉格党人还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

皮尔派在上届议会中所占的数目就已经很少，而由于他们的名额进一步减少，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集团；他们的许多最有影响的领袖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例如：卡德威尔和尤尔特（两人都是利物浦的）、格林（朗卡斯特）、马洪勋爵（哈特福）、朗德尔·帕麦尔（普利茅斯）等等。卡德威尔的失败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应，这不仅由于他曾代表过的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由于他

同已故的罗·皮尔爵士的私人关系。要知道，他同馬洪勛爵都是皮尔爵士的遺囑保管人。卡德威尔遭到失敗的原因是他拥护廢除航海法令²⁶²和不同意“打倒天主教徒！”的口号。而在利物浦，国教信徒給了选举以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自由貿易派的一个机关刊物^①說：“这个只会做生意的、貪得无饜的团体，很少有时間去培养宗教情感；因此它必須依靠僧侶，变为僧侶手中的工具。”

此外，和曼彻斯特的选民不同，利物浦的选民不是普通“人”，而是“有身分的人”；而維護宗教上的旧的正統观念，是对有身分的人的首要的要求。

最后，自由貿易派在这次竞选中也有几个最有声望的人落选。例如，在布萊得弗德，最老的自由貿易派宣傳家和政論家之一湯普逊上校（綽号“老母鵝”）遭到了失敗；在奥尔丹，自由貿易派的一个最有名的鼓动家和最有辯才的演說家威·約·福克斯遭到了失敗；甚至連布萊特和基卜生本人也仅仅以微弱的多数在該党的堡垒曼彻斯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輝格党人。不言而喻，在現行的选举制度下，曼彻斯特派是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在議會中占多数的。但是，許多年来他們吹嘘說，只要一旦輝格党被打倒，托利党重新执政，他們就会展开大規模的鼓动并完成英雄的業績；現在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不久以前的竞选中我們又看到他們謙恭地同輝格党携手合作，单单这一点就已經表明了他們道义上的失敗。

但是，尽管沒有一个正式的政党获得胜利，甚至相反地，它們每一个都遭到了失敗，而英国国民却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安慰：

① 即“經濟学家”。——編者注

这一次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一种职业——律师在議會中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代表权。下院有一百多名議員是律师；看来，这个数字不論对于希望自己的事业在議會中获得成功的政党來說，还是对于企图根据国民的同意作出决定的議會來說，都不是一个吉兆。

上面援引的数字对比毫无疑义地說明，整个反对党与托利党相比获得了否定的多数。如果它采取联合行动，那末它在議會召开的最初几天就能把內閣推翻。但是它沒有能力組織自己的巩固的政府。为此必須重新解散議會而举行新的大选；然而新的大选又只会有一个結果，那就是必須重新解散議會。要摆脱这种兜圈子的状况，就必须进行議會改革。但是腐朽的政党和新的議會宁肯要托利党統治，也不願采取这样英勇的步驟。

如果单独地来考察每一个政党，那末托利党人虽然同联合起来的反对党相比是少数，但他們仍然是議會中最有力量的政党。况且，他們巩固地占有最重要的国家职务，依靠着一支訓練良好的、紧密团結的和相当統一的軍隊；最后，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这一次遭到失敗，他們的比賽就会永远結束。而与它相对峙的是一个由四支軍隊組成的联盟，每一支軍隊都由一个特殊的长官来率領，这个联盟是由利益、原則、回忆和欲望各不相同的一些集团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反对把議會紀律宣布为最高原則，它們以嫉妒的目光注視着它們当中任何别的集团提出的要求。

显然，各个反对党集团之間在議會中的对比同它們在国家中的力量对比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輝格党在議會中日益成为反对党的一个人数最多的部分，其余的集团都以它为核心，集結在它的周圍。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危險的是，这个經常把自己想像为

管理國家的首腦的政黨，更加關心得多的是如何迴避自己的同盟者的要求，而不是如何打敗共同的敵人。反對黨的第二个集團皮爾派，共有三十八個代表；它的首領是詹·格萊安爵士、悉·赫伯特和格萊斯頓。詹·格萊安爵士依靠同曼徹斯特學派的代表結成聯盟來進行投機活動。他本人過於強烈地追求首相的職位，因而絲毫不願意幫助輝格黨人重新獲得他們舊日的管理國家的壟斷權。另一方面，許多皮爾分子贊同托利黨人的保守觀點，自由派只能在貿易政策問題上指望得到他們的經常的支持。

一家自由派的報紙寫道：“在許多其他問題上，要使自己的措施具有某種形式以保證得到絕大多數的支持，這對大臣們來說並非難事。”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自由貿易派的力量比上屆議會中更強了；他們現在擁有一百一十三名代表。同托利黨人的鬥爭將使他們更前進一步，超過輝格黨人的穩健政策認為適當的界限。

最後，還有一個擁有大約六十三名代表的“愛爾蘭旅”，雖然它自從“丹王”^① 死後就沒有獲得什麼成就，但是它的人數卻完全可以左右力量的對比；除了對得比的憎恨以外，它同不列顛的反對黨毫無共同之處。在不列顛議會中，它代表愛爾蘭反對英格蘭。在比較長期的運動中沒有一個議會政黨能夠有把握地指靠它的支持。

現在我們把上面所作的分析做一個簡單的總括：雖然與托利黨人相對抗的是一個否定的多數，但是沒有一個黨能夠代替它而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托利黨人的失敗必然會引起議會改革；他們擁有一支緊密團結的、統一的、訓練良好的軍隊，並且佔據着最重要的國家職位；反對黨是四個各不相同的集團的堆積物，而聯合

① 即丹尼爾·奧康奈爾。——編者注

起来的军队打起仗来往往打不好并且缺乏机动性；加之，否定的多数仅仅占二三十票的优势，占议会四分之一的一百七十三名議員都是由新人构成的，他們胆怯地避开一切威胁他們的东西，即一切可能使他們丧失用高价买到的議員席位的东西。綜上所述，我們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托利党是有力量的，如果說这种力量不足以取得胜利，那末却足以把事情引向危机。看来，它已經决心这样作。倫敦所有的日报和周刊都流露出对于这种危机的恐惧，因为它会使整个英国官場的面貌革命化。“泰晤士报”、“紀事晨报”、“每日新聞”、“旁观者”、“观察家”都惊慌失措，議論紛紛。它們最希望的是能通过发表激烈的言論說服托利党辞职，并想以此防止危机。但是，不論是激烈的言論还是善意的不滿，都不能使它們逃避冲突。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6 日前后

載于 1852 年 9 月 1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558 号和 1852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报”第 25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侖的联盟。——帕麦斯頓

1852年9月28日星期二于倫敦

下面我报道几件确凿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活动的。

不久前，匈牙利將軍費特尔受科苏特和馬志尼之托，带着一位美国画家的护照游遍了整个意大利。一位經常演出的匈牙利女歌唱家費倫齐女士和他同行。因此他得以深入上层官方人士之間，而馬志尼交給他的信又使他得以出入秘密团体。他游遍了全国各地，从都灵和热那亚經米兰到羅馬和那不勒斯。不久前他回到了英国，并做了一个使民主派的首脑馬志尼先生大为震惊的旅行报告。費特尔报告的主要点是說意大利已完全陷入了**实利主义泥坑**：絲織品、植物油和其他土产品的貿易急剧扩展，已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事情，资产阶级（馬志尼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念念不忘地仔細盘算着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热切希望通过精心經營来弥补这些損失，因此根本不可能設想，**革命运动会在意大利首先爆发**。費特尔在这个文件里說，在法国的火山口沒有再噴出火焰之前，意大利这个国家里不可能爆发任何起义，何况那部分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 革命居民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和計劃經常被破坏，現在

已經消沉下来，而主要的是沒有群众的支持。

馬志尼根据費特尔的这个报告，把法国厉声乱罵了一通，于是 *volens nolens*〔不管願意不願意〕，只好重新让古老的巴比倫^①領先了。

但是，这些先生决定再同法国結成联盟，他們开始同（你們猜同誰？）路易·波拿巴先生进行談判。

經馬志尼同意，科苏特把一个叫基什的人派往巴黎同波拿巴分子建立联系。基什从前曾和日罗姆·波拿巴的儿子們相識。現在他經常逍遙自在地出入于巴黎的咖啡館和其他类似的場所，老是在比埃尔·波拿巴跟前轉来轉去，对他大加恭維，并不断向科苏特发送堂而皇之的报告。这样看来，匈牙利的解放从今以后毫無疑問是要靠路易-拿破侖和科苏特的合营公司了。革命者的首脑同“暴君”結成了生死同盟。

还在这一切事件发生之前，波兰人列列韦尔老头和正教神甫塔杰烏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所謂波兰的“集中”²⁶³来到了倫敦，把起义的計劃給科苏特和馬志尼看，波拿巴的协助自然是該計劃的决定条件。他們在倫敦有一个密友，即兰茨科隆斯基伯爵，这位伯爵同时又是俄国皇帝的密探，而他們所提出的計劃，十分荣幸地已經过圣彼得堡的預先审查和修正了。这位兰茨科隆斯基伯爵目前正在巴黎，一面監視基什，一面好到奥斯坦德去接受圣彼得堡发来的新指示。

基什从巴黎給科苏特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放在神話集里倒是很合适的；但是由于法国的神話般的状况，这些保证

① 指巴黎。——譯者注

也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说科苏特收到了路易-拿破仑邀请他到巴黎去的一封亲笔信。科苏特似乎把这封信的副本散发到匈牙利全国各地去了。他好像已经在这个国家里为总起义做好了一切准备。参加密谋活动的甚至有皇家的官吏。科苏特希望在10月间起事。

以上我只是几乎逐句转述了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一切。如果你们现在问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怎样，那末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想一箭双雕。他在竭力骗取科苏特和馬志尼的信任，然后好把他们出卖给奥地利人，以此作为奥地利人同意他攫取法国皇冠的交换条件。此外，他估计，只要大家一知道科苏特和馬志尼同他进行了谈判或建立了某种关系，他们在革命党人之中就会威信扫地。另外，由于他的即位遇到了专制强国的激烈反对，像他这样一个冒险家也是完全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同密谋叛乱者结合在一起去碰碰运气的。

至于说到意大利，路易·波拿巴是在梦想把倫巴第和威尼斯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把那不勒斯转给他的堂兄繆拉特。馬志尼先生的前途真是不错啊！

既然我又谈起了意大利，就请允许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意大利最近几次争取自由斗争的女英雄之一維斯康蒂伯爵夫人不久前曾在倫敦同帕麦斯顿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勋爵阁下告诉她，他希望在年底以前成为英国政府的首脑，那时欧洲很快就能得到改造；尤其是意大利不能再继续忍受奥地利的蹂躏，因为用铅弹和火药长期统治一个国家是决不可能的。帕麦斯顿说，他指望法国在所有这些方面能成为他的盟友。如果爆发总起义，无论如何他希望倫巴第立即并入皮蒙特，而倫巴第宣布为共和国的問

題，則完全留待将来去决定了。

我相信老奸巨滑的帕麦斯頓是让强烈的幻想給迷住了，特别是他不了解，即便他在議會党徒之間还享有一点威望，但是他在全国範圍內是毫无威信。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9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2 年 10 月 1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59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貧困和貿易自由。——日益 迫近的商业危机

1852年10月15日星期五于倫敦

商业大臣汉利先生不久以前向他的一伙朋友，在班伯里的制麵厂聚会的农场主們宣布說：貧困現象由于某些原因而減輕了，但是这决不是由于貿易自由，而首先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海外黄金的发现，爱尔兰居民的大批外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船舶的更大需求等等。所以，我們应当承认，“饥荒”是对付貧困的特效药，正如砒霜对付老鼠一样。

倫敦的“經濟学家”說：

“至少，托利党人不得不承认現今的繁荣和它的必然結果——习艺所的荒廢。”

“經濟学家”接着试图向表示怀疑的商业大臣证明，习艺所的荒廢純粹是貿易自由的作用的結果，只要貿易自由得到充分的发展，习艺所也許就会从不列顛的土地上完全消失。然而很遺憾，“經濟学家”的統計根本沒有证明人們希望通过它来证明的东西。

大家都了解，現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經常的連續性經過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轉，信心漸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

張，崩潰，壓縮，停滯，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談完这点之后，我們再来談“經濟学家”的統計。

1834年，济貧費的数額达6 317 255英鎊，到1837年，这个数字降到最小限度，只有4 044 741英鎊。后来，这个数字又逐年增加，至1843年增加到5 208 027英鎊。在1844、1845和1846年，又降到4 954 204英鎊，但是在1847和1848年又有增长，1848年达到6 180 764英鎊，几乎达到1834年实行新济貧法²⁶⁴之前的水平。在1849、1850、1851和1852年，这个数字又降到4 724 619英鎊。但是1834—1837年这段時間是繁荣时期，1838—1842年是危机和停滯时期，1843—1846年是繁荣时期，1847—1848年是危机和停滯时期，1849—1852年又是繁荣时期。

那末，这种統計說明了什么？它至多不过证明那个陈腐的同义反复：不列顛的貧困現象随着停滯和繁荣时期的更替而加剧和減輕，这不取决于貿易自由或保护关税政策。此外，我們甚至发现，在自由貿易时代的1852年，济貧費的总额比保护关税时代的1837年多679 878英鎊，尽管有爱尔兰的饥荒、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英国的另外一家自由貿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貿易自由使出口額增加，而出口額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結果必然使貧困現象減輕，以至于最終消失。它援引下面的数字作为論据。有劳动能力但又需要靠教区的救济来維持生活的人数如下：

1849年1月1日在590个济貧区——201 644人

1850年1月1日在606个济貧区——181 159人

1851年1月1日在606个济貧区——154 525人

把这个表同出口的統計作一比較，我們就会发现不列顛和爱

尔兰的产品出口額是：

1848年.....	48 946 395 英鎊
1849年.....	58 910 883 英鎊
1850年.....	65 756 032 英鎊

这个表說明什么呢？由于出口額增加了 9 964 488 英鎊，1849 年有 20 000 多人摆脱了貧困；由于出口額进一步增加了 6 845 149 英鎊，1850 年又有 26 634 人得到了生路。因此，如果我們假定貿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現象，那末，在現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貧困就必须使对外貿易額每年再增加 50 000 000 英鎊，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資產階級統計学家竟敢侈談“空想主义者”。——其实沒有比这些資產階級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

我手头有济貧委员会公布的几份文件。誠然，这些文件表明，从 1848 到 1851 年貧民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是，同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从 1841 到 1844 年这段時間，貧民的平均数是 1 431 571，而在 1845 到 1848 年这段時間的平均数是 1 600 257。1850 年在习艺所內和习艺所外受到救济的貧民有 1 809 308 名，1851 年有 1 600 329 名，即比 1845—1848 年的平均数略有增加。現在把这些数字同人口調查所提供的人口数对照一下，我們就会发现 1841—1848 年每 1 000 个居民中有 89 个貧民，而在 1851 年有 90 个貧民。由此可見，与 1841—1848 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上貧困現象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貿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与此同时，我們看到罪犯的人数也增加了。只要看一看医学杂志“手术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摻假和食物摻毒一直是同質

易自由平行发展的。在倫敦每周都由于“手术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組成的完备的調查委员会来檢驗在倫敦銷售的食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經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摻毒的情况——可以說所有这些食品都摻上了毒。

显然，資产階級貿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稅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資产階級社会經濟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結果的現象。100万貧民在不列顛的习艺所里混日子的情况，正如在英格兰銀行存有1800万到2000万英鎊的黄金一样，也是与不列顛的繁荣密切相連的。

这一点是应当永远肯定的，而資产階級的幻想家却不然，他們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貿易自由的結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資产階級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給予的东西。虽然应当永远肯定这一点，但毕竟还要确认，1852年是英国所經歷过的那些特別繁荣的年代中的一年。国家收入的数额——虽然廢除了窗口稅；——关于航海的报告，出口商品的清单，金融市場的牌价，而首先是工业区的空前活跃，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十九世紀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淺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經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擴張和崩潰阶段。資产階級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說：“絕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沒有像現在这样无足輕重。我們現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場上一經出現，很快就会銷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

利潤，并且刺激他們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

換句話說，現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現有的剩余資本已經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繼續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根据工厂总监萊昂納德·霍納先生最近的报告，1851年，仅仅棉紡織厂的設備能力就增加了3717馬力。他列举了一大串正在建設中的工厂的名字。在这个地方正在建設一个150馬力的紡紗厂，那个地方正在建設一个拥有600台織布机的生产花布的織布厂，另一个地方又在建設一个拥有6万紗錠、620馬力的紡紗厂，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建設一个拥有200馬力的紡紗厂和一个拥有300馬力的織布厂等等。而最大的一个生产駝絨和各种衣料的工厂正在布萊得弗德(約克郡)附近兴建起来。

“据計算，为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建造的那个工厂占地6英亩，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这个工厂的規模大小。主厂房将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式样非常奇特的石头建筑物，它有一个长达540英尺的大厅；机器設備将包括最新的結構，这些結構的优点已經得到公认。費尔貝恩兄弟将在曼彻斯特建造一批預計有1200馬力的蒸汽发动机来开动这許多机器。仅一个煤气工厂，按其規模來說不亚于一个小城市的煤气工厂；这个工厂将按照怀特的碳氢化合物系統进行建設，估計将花費4000英鎊。据統計，需要5000个噴嘴，这些噴嘴每天要消耗10万立方英尺煤气。除了这个大規模的工厂以外，索耳特先生要在这个工厂附近为工人建筑700所住宅。”²⁶⁵

从大量的投資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嗎？絕對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貿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同样是由工业过度生产所直接引起的1838—1842年这个空前的停滞时期。剩余資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

中，而不分散到貿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徑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資產階級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在危机到来时充斥市場的全部商品立即变成沉重的累贅，那末这对于大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來說将更加沉重好几倍，因为这些工厂已經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來說乃是生命攸关的問題。任何时候，只要資本放棄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通途徑，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钻进英格兰銀行的拱門。当巨大的金額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資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資本时，*saue qui peut*〔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得更高。

我从“印度之友”中引用了另外一个可以說明日益迫近的危机的性质的事实。根据它所公布的 1852 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材料来看，1851 年加尔各答进口的棉織品和各种棉紗的价值是 4 074 000 卢比，几乎占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二。今年这种进口的總額还要增加。而且这还不包括关于孟买、馬德拉斯和新嘉坡进口的資料。但是，1847 年的危机已經向我們显示了对印貿易的这些方面，所以現在沒有人能对这种向“我們的印度帝国”的輸入額占總額三分之二的工业繁荣的最終結局抱有絲毫的怀疑。

关于将紧跟着現在的繁荣时期到来的那个崩潰时期的特点，我們所能說的就是这些。許多征兆，特別是英格兰銀行中的黄金盈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都預示这个崩潰将在 1853 年到来。

目前在英格兰銀行的地下室中儲存着 21 353 000 英鎊的金块。有人試圖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采掘的过剩来解釋

这种黄金流入的情况。但是，只要略微看一看事实，我們就会相信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

英格兰銀行的黄金儲备的增加，实际上只意味着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換句話說，意味着出口大大超过进口。事实正是如此，最近的貿易报告指出，大麻、糖、茶、烟草、酒、羊毛、谷物、油类、可可、面粉、靛藍、皮革、馬鈴薯、熏肉、猪肉、黄油、干酪、火腿、猪油、大米，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屬印度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进口都大大减少了。1850年和1851年，进口額显然是过大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大陆上由于歉收而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上漲，就造成了縮减进口的趨勢。只有棉花和亚麻的进口增加了。

这种出超的情况也說明为什么外汇牌价有利于英国。另一方面，由于出超部分得到了黄金輸入的补偿，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英国資本閑置起来，从而扩大了銀行的准备金。銀行和个人都在想方設法为这些白白閑置的資本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現在借貸資本充裕而利率低的原因。头等期票的貼現率是1.75%到2%。但是从任何关于商业史的著作中，例如从图克的“价格史”²⁶⁶中，都可以看出，英格兰銀行地下室中的金块的大量儲存、出口超过进口、有利的外汇牌价、借貸資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征兆汇合起来，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轉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現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額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圍繞着誘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潰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

我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的經濟預言家会把这种观点看作

是異端邪說。但是，自从著名的財政大臣“繁荣的罗宾逊”^①在1825年危机的前夜召开的議會會議開幕时預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那个时代起，这些資產階級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預測或預言过危机嗎？相反地，沒有一次繁荣时期，他們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們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訓誡的、庸俗的說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說他們缺乏先見之明和沒有謹慎从事。

关于暫时的工商业繁荣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政治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加以論述。

卡·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12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2年11月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601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弗·約·罗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編者注

卡·馬克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1852年10月19日星期二于倫敦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目前英国工商业的状况；現在我們来看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預期的工商业危机的到来，会使不可避免的反对托利党人的斗争带有更激烈和更革命的性质。相反地，現在的繁荣在当前是这个党的最好的同盟。誠然，这个同盟者不允許他們恢复他們自己已經放棄了的谷物法，但是的确巩固了他們的政权并帮助他們实现社会反动，如果这种反动不遇到什么阻碍，就一定会为他們爭得根本的阶级利益，因为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就是为了物质的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迪斯累里并没有宣布任何谷物法，而是为了負担过重的租佃农场主的利益宣布重新分配稅收負担。为什么租佃农场主的負担过重呢？因为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交納像在保护关税政策时期那么多的租金，而保护关税政策时期的谷物价格却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貴族也不想降低自己土地的地租，但是它想实行一种新的稅收形式，借以补偿农场主向貴族多交納的那部分稅金。

我再重复一遍：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么？

“劳埃德氏新聞周报”²⁶⁷ 抱怨說：“爱国主义甚至可以栖身于餐柜之中，只要它能在那里找到飲食。因此，自由貿易現在是得比伯爵的支柱；他高臥在用科布頓和皮尔采集的玫瑰花鋪成的床榻上。”

人民群眾有足夠的工作，並且生活也比較有保障，當然貧民（他們的存在與不列顛的繁榮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聽信政治鼓動的。但是，得比勳爵的詭計首先得到資產階級投身於強大的工業生產過程的那種狂熱的幫助，這個過程是：開辦工廠，設計機器，製造船隻，生產棉紗和棉製品、毛織品，充實庫存，出售商品，交換，出口，進口，以及其他各種多少有益的事；但是他們從事這些事情的目的總不外是發財致富。在生意興隆的時候，資產階級清楚地知道這樣幸運的時機將愈來愈少、愈來愈難遇到，所以它所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並且一定要弄到錢，弄到尽可能多的錢，除了錢它什麼也不需要。資產階級讓自己的 *ex professo* [職業] 政治家監督托利黨。但是這些政治家（請看約瑟夫·休謨在“赫爾報”²⁶⁸ 發表的信）完全正當地抱怨說，他們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很難進行活動，正如人的機體在沒有大氣壓力的情況下很難進行活動一樣。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不能夠擺脫那種不愉快的預感：在最高當權派當中正發生某種可疑的事情，內閣非常厚顏無恥地利用目前的繁榮所引起的政治冷淡。所以它有時在自己的刊物上用這樣的話來警告內閣：

“很難預測，民主派（請讀作：資產階級）會多麼長久地保持自己現在這種英明的忍耐，保持對自身的力量和別人的權利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當時貴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貴族不應當從民主派的一般行為中得出結論說，民主派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溫和態度。”（倫敦的“經濟學家”）

對此，得比回答說：難道你們把我當成一個傻瓜，以為我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讓你們給吓住？難道在隨着經濟風暴和營業停滯時期的到來你們無暇認真過問政治的時候我會袖手等待？

托利党人的活动計劃日益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們首先是阻撓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在爱尔兰他們迫害刊登对他們不利的文章的报纸；現在他們对那些散发小册子反对在民軍中使用体罰的和平协会²⁶⁹的活动家提出控訴，說他們造謠惑众，煽动騷乱。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他們就不声不响地鎮压那些在大街上和报刊上进行活动的孤立的反对党。

然而他們却逃避同自己的反对者作任何重大的公开的爭論，延迟議会的召开，并且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在議会的會議開幕之后，正如一家激进派报纸^①所說的，为“死去的公爵^②的葬礼，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民的利益”奔忙。議會将在11月的第一周召开，但是毫無疑問，严重的辯論不会在1月以前开始。

托利党人用什么来填补剩下来的这段時間呢？用选民登記运动和建立民軍来填补。

选民登記运动的目的是把反对托利党的人从明年的議會选举的新名单中删除，或者阻撓把他們列入这些名单；为此就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見，以便为阻撓把某人列入选民名单提供法律根据。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律师作为代表，并由自己开支有关訴訟手續的一切費用。关于因未被列入名单而提出的申訴或对某人列入名单而提出的異議二者孰是孰非的問題，須由皇家法院²⁷⁰的首席法官所任命的資格审查律师加以裁决。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一直是郎卡郡和密多塞克斯。为了获得在北郎卡郡开展运动的經費，托利党人发出了认捐签名簿，上面有得比勋爵本人的签名，他慷慨地捐献了五百英鎊。在郎卡郡反对选民登記的意見非常多，甚

① 即“人民报”。——編者注

② 即威灵頓。——編者注

至达到六千七百四十九条，其中南郎卡郡四千六百五十条，北郎卡郡二千零九十九条。在南方，三千五百五十七条反对登記的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一千零九十三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在北方，一千三百三十四条反对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七百六十五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农村选民，而不涉及本郡的城市选民）。托利党人在郎卡郡成了胜利者。在密多塞克斯郡有三百五十三个激进主义者和一百四十个保守分子被从选民名单上除名，这样一来，后者就赢得了二百多票。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托利党人，另一方是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大家知道，后者成立了一些自由农土地协会，即制造新选民的机构。托利党人不去触犯这个机构，而是破坏它的产品。根据密多塞克斯的资格审查律师沙德维尔先生的判决，许多属于上述自由农土地协会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宣布，凡是土地的价值不足五十英镑的土地占有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判决不能向普通法法院²⁷¹提出上诉。大家都很清楚，对事实问题和权利问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就会使始终为现存内阁所左右的资格审查律师在编制新的选民名单方面握有极大的权力。

托利党人在进行选民登记运动上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的领袖对这个运动的直接干涉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得比伯爵对于新议会的长久存在没有寄以特别的希望，如果议会不俯首听命，他就会解散它，而现在，他企图借助资格审查律师来保证保守党人在新的大选中获得多数。

因此，托利党人一方面想掌握住他们通过选民登记运动所操纵的选举机器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民军法案来支配

刺刀，而刺刀是实施最反动的議會法令和沉着地对付和平协会的威胁所必需的。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①喊道：“只要反动派控制了赋予它以合法外表的議會和作为常备軍事力量的武装民軍，它在英国什么都干得出来！”

正在这个特別危急的时刻，“铁公爵”这位平淡无奇的滑铁卢英雄之死使貴族摆脱了討厭的守护天使，这位天使在軍事上是頗有經驗的，他往往为了掩护得很好的退却而牺牲表面的胜利，为了及时的妥协而牺牲十分順利的进攻。威灵頓是上院的安撫者；在决定关头，他可以全权代表六十个或更多的人发表意見；他阻止了托利党人向資產階級和社会輿論公开宣战。但是現在，由于存在着一个以爭論的爱好者^②为首的、渴求冲突的托利党内閣，上院

“不再像在公爵领导时那样，作为一个压艙物来穩定这艘国家的船，它可能成为危及这艘船的安全的多余的索具”。

上述关于作为压艙物的上院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意見，当然不是我們的意見，而是自由派的倫敦報紙“每日新聞”的意見。曾經被称作杜埃罗侯爵的新威灵頓公爵，立即从皮尔派陣营轉到了托利党人陣营。所以，現有的一切迹象都說明，貴族准备作最冒險的嘗試来重新占領失去了的陣地，重溫 1815—1830 年的黃金时代。而目前資產階級既沒有時間进行鼓动，也沒有時間造反，甚至沒有時間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滿。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2 日
載于 1852 年 11 月 2 日“紐約每日論
坛报”第 360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① 即“人民报”。——編者注

② 即得比。——編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英国各报編輯部的声明

亲爱的先生!

我們請您注意普魯士报界，甚至包括像“新普魯士报”这样一些最反动的报纸对于正在审判的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所持的立場，以及在目前，当法庭还没有来得及把三分之一的证詞审查完毕，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文件的可靠性都还没有加以证实，辯护人还一言未发的时候，这些报纸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贊揚的审慎态度。这些报纸最坏也不过是配合着国家起訴人的說法把科倫的被告和我們这些在倫敦的朋友描写成“对近四年来欧洲的整个历史以及1848年和1849年所有革命震蕩要負完全責任的危險的阴謀家”，而在倫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竟出言不逊地把科倫的被告和我們几个人描写成“一帮游手好閑的无賴”、騙子手等等。我們也向英国公众提出被告辯护人曾向德国公众所提出的同样請求——在案件审理完毕以前，不要忙于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他們现在就作进一步的說明，就会使普魯士政府有可能阻碍揭发警察局所干的違反誓約、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盜等等一切騙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魯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沒有先例的。当所有这一切在当前的审理过程中被揭露出来时，英国的社会輿論，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辯护

人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的匿名作者，將作出公正的評价。

您的順从的僕人

弗·恩格斯 斐·弗萊里格拉特

卡·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0月28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載于1852年10月28日“旁观者”
第1270号、1852年10月30日“人
民报”第26号、1852年10月30日
“晨报”、1852年10月30日“先驅”
和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
第23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
根据其他报纸校对过

卡·馬克思 致“晨報”編輯的聲明

親愛的先生！

請接受我真誠的謝意，感謝您對我的朋友，科倫被告人的案件所給予的慷慨援助^①。為了使被告的辯護人能夠揭露普魯士警探甚至在審訊過程中所干的一系列卑鄙行為，我想告訴您他們在最近為了證明我和科倫的被告之間存在着罪惡關係這一點而干出的騙人勾當。據10月29日“科倫日報”報道，警務顧問施梯伯先生造出了他的一個新文件——一封似乎出於我的手筆的令人可笑的信，說什麼我在信中委託我的一個虛構的代理人“把五十份‘紅色問答書’從門縫里塞給克雷弗爾得的某些民主主義者，執行這一任務的時間選定在1852年6月5日午夜時分”。

為了我的被控告的朋友，我特作如下聲明：

- (1) 我未曾寫過上述的信件；
- (2) 我只是從本月29日的“科倫日報”上才知道有這封信；
- (3) 我從未見過所謂的“紅色問答書”；
- (4) 我從未以任何方式幫助散發過這種“紅色問答書”。

這個聲明我也向馬爾波羅街治安法官陳述過，因而它等於經

^① 指“晨報”發表為科倫的被告辯護的聲明（見本卷第429—430頁）。——編者注

过宣誓所作的证詞，我已把它寄往科倫。如蒙貴报予以披露，我将非常感激，因为这是防止普魯士警察局截留这个文件的最有效的方法。

亲爱的先生，我始終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卡尔·馬克思博士

1852年10月30日于倫敦

索荷廣場第恩街28号

載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
和1852年11月6日“人民报”
第2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晨报”，并根据
“人民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1852年11月2日星期二于倫敦

讓我們來繼續考察从当前的工商业繁荣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各种政治后果。

在工业普遍活跃、商业周轉加速以及人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气氛下，摆脱了一切外来压力的各个議會政党十分平靜地完成着它們自己的解体过程。

“目前皮尔派和罗素派彼此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皮尔派——这些单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不可缺少的‘国家活动家’，現在竭力想同当权派攀亲。例如，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的机关报‘紀事晨报’对約翰·罗素勋爵在佩特发表的那篇十分平庸的演說作了多么热烈的称贊！”

这是政府的半官方报纸“先驅晨报”²⁷²的話。

“卫报”²⁷³反駁說，相反，只要听听商业大臣汉利先生在班伯里的制麵厂中对自己的朋友們——农場主們談論皮尔派的那番話就足够了。

汉利先生說：“这个党派有自己的原則，并且始終忠实于这些原則。貿易自由还是保护关税的問題，本来是一个可以商榷的問題，只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把它变成了党派的問題。”

“卫报”写道，汉利先生在談論皮尔派时是怀着敬意的，他并且

断言：“目前，在恢复偉大的保守党的統一方面已不再有什么严重的障碍。”完全正确，——“卫报”喊道——讓我們把保护关税政策放在一边吧，讓我們来恢复保守党吧！换言之，“卫报”預料，既然谷物法問題已不再是爭論的对象，皮尔派現在是願意同托利党結成反动的联盟的。而“每日新聞”是把一部分皮尔派轉到得比陣营这一点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报道的。可是，人們怀疑許多輝格党人都都做了这种不体面的事，而只要注意到他們的貴族核心是由一伙貪图私利的人組成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达尔豪西勋爵來說吧，这位大人在皮尔执政的自由主义时期，是皮尔內閣的大臣。在皮尔倒台以后，罗素又在自己的新閣中給他安排了一个位子。他同紐卡斯尔公爵、圣日耳曼茲勋爵以及前政府的其他成員一起在上院中支持輝格党人玩弄的手腕，从而获得了奖賞，补到了印度总督这样一个肥缺——这是寡头政权的奖券中的头奖。他从这里大大地撈了一把。輝格党人曾經由于他們作出的这种“空前的”牺牲——沒有让自己的心腹去担任这个大家都看着眼紅的职位——而自吹自擂。現在，又有一个誘餌摆在达尔豪西勋爵面前——五港总督之职，这是一个年进万金的閑差事²⁷⁴。据說，这位可敬的大人并不嫌遗产过多，因此他认为甚至在得比內閣时期保有这个职位不出任何意外，也是他的爱国的天职。

我們可以从本星期的自由派报刊上的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事奇聞] 中找到几十則这样的趣事，找到許多关于某某輝格党人就他投到托利党人方面去的最低价格进行談判的丑聞。这一切說明輝格党已經极端腐敗；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同該党的两个主要領袖——罗素和帕麦斯頓之間的分裂比較起来，就得退居次要地位了。关于同最近的竞选有关的一些事件，我們已經早有所聞；

帕麦斯顿勋爵在这次竞选中对內閣陣营的候选人所給予的支持，——按照自由派报纸自己的說法，——看来是十分令人不解的。可是現在，帕麦斯顿本人的报纸“晨邮报”²⁷⁵居然也在一篇社論中透露說，帕麦斯顿打算或者以大臣和下院領袖的身分参加內閣，或者，——如果得比內閣很快倒台的話，——就用旧內閣遗留下来的那些不太“难以接受的人”組織一个新的內閣。“晨邮报”认为整个說来这些傳聞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同时它又声明它不是以帕麦斯顿勋爵的名义講話，而是以它自己的名义講話。但是，帕麦斯顿却不顾輝格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的所有这些刨根問底的、甚至是令人討厭的探詢，还是认为不需要反駁上述这种有損他的名譽的报道。皮尔派的“紀事晨报”在談到这些傳聞时的口吻清楚地表明，上述这种合并的思想，在格莱斯頓及其伙伴們那里并不会引起什么 *horror vacui* [对死的恐惧]^①。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每日新聞”揭露了这一事实，并且慷慨激昂地要求輝格党和皮尔派中間的变节者公开地轉到得比那边去。这样，我們看到，議會中的这些迄今为止总是你上我下、輪流执政的党派，它們每一个都既不信任所有其他党派，也不信任自己的成員；他們彼此都以临陣脫逃、貪污行賄、妥協主义相責难，然而它們又毫无例外地全都承认：如果把谷物法問題撇开不談，那末，除了私仇和个人虛荣心之外，沒有任何东西妨碍它們同得比派联合起来。它們对得比采取的态度，同去年12月2日前夕秩序党各个派別对波拿巴采取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

不难理解，反对党在展望即将到来的議會竞选运动时是相当

① 直譯是：害怕空虛。——編者注

胆怯的。

小約翰·羅素被授予了裝在一個小盒子里的、佩特城榮譽公民證書，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後，他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作為答謝，下面就是這篇演說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認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們一樣，正義感也責成我們等待採取措施，這些措施將使農業、殖民活動和航運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無理拒絕給予的那種滿足（笑聲）；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結束長期的鬥爭。”

現在還歸羅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報紙“地球報”（晚報）²⁷⁶對這些話作了如下的評述：“任何一個像1835年反對羅·皮爾爵士的那樣的反對黨，都必然會因各個自由派領袖之間的競爭而遭到失敗。”這就是說，利用聯合的反對黨一致投票的辦法在會議開幕後立即推翻得比內閣的企圖已經完全打消了，而約翰·羅素勛爵仍舊扮演了他那第一個發出退却信號的角色。關於議會反對黨的整個前途，它的領袖約·休謨先生在致“赫爾報”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自白：

“我與過去出席下院的愛爾蘭議員接觸的經驗說明，愛爾蘭議員絕不是那種能夠在這個或那個領袖的影響下站在一定的立場上並且堅持這種立場的人。愛爾蘭議員過於乖僻，過於急躁，過分注意愛爾蘭的屈辱和災難。直到現在，據我所知，還沒有做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對得比政府的行動抱不信任態度的自由派聯合起來。當我聽到得比勛爵的前任〈輝格黨人〉發表空洞的聲明，並看到他們準備洗手不干，而不願意捍衛人民的事業、號召改革的擁護者同他們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對他們在政黨的聯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擔心，也許得比派會聽任這些人翻來復去地重彈他們的老調，而同時得比派自己卻照舊任意利用他們的權力來保證自己的事業獲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處。在建立人民政黨的某種可能性產生以前，這種狀況還將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

儘管曼徹斯特學派的現在的領袖約翰·布萊特在特設的午宴

上向拜尔法斯特的厂主們发表演說时，竭力向爱尔兰議員們献殷勤，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冲淡約瑟夫·休謨对他們的攻击所造成的恶感，但是在一切有关議會紀律的問題上，“老約”的意見仍然是权威的意見。

由此可見，議會反对党已經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

的确，旧的議會反对党已經过于衰朽了，以致它的奈斯托尔²⁷⁷——休謨現在在他漫长的一生的晚年，竟然也公开声明，在下院中不存在“人民政党”，而采用这个名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总之，目前籠罩着整个反对党陣营中的是一片分崩离析、萎靡不振、束手无策的景象。

卡·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16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2年11月29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3625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建立新反对党的嘗試²⁷⁸

1852年11月9日星期二于倫敦

随着至今占統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解体以及它們的特征的消失,愈来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要求正以各种方式表現出来。

約翰·罗素勋爵在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演說中第一个提出了这个問題^①。他宣称,得比勋爵发出的警报部分地是由于妄加在約翰·罗素勋爵头上的那些謠言——所謂他持有“极端民主的观点”——而引起的。“当然,关于这个問題,我没有必要再指出,这些謠言是毫无根据的,是荒唐无稽的。”但是他宣布自己的确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就从毫无害处的意义上闡明了这个詞。

“一个国家的民主,換句話說也就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毫无疑问,民主也像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一样有权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民主并不打算侵犯王室的任何特权。民主也不想廢除上院的任何合法的特权。这种民主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財富的增长、智力的增长,就是那些更加开明的和更加适合于以开明的方法統治世界的观点的形成。但是我想說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說,在民主的障地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能再求助于連我过去也非常熟悉的那种以旧的强制办法为基础的作法了。相反,民主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① 見本卷第436頁。——編者注

必須使它有一个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机构来表現它的力量和影响。”

对此,“先驅晨报”慷慨激昂地說道:

“約翰·罗素勋爵有两套原則,在他执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他是反对党的时候則使用另外一套。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原則是什么也不做,而在他不执政的时候,他却庄重地許諾一切。”

如果“先驅晨报”竟把我們在上面援引的約翰·罗素的那些胡謔叫做是“一切!”,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来警告小約翰·罗素是由于他的那种爱戴国王、尊重貴族和保护主教“民主”,那我們倒很想知道,“先驅晨报”所說的“什么也不”是指的什么了。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得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把民主說成是唯一的一个必須与之进行斗争的党派。于是,不可避免的約翰·罗素出場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財富的增长,这种財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們通过輿論和法律所认可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願望的增长。由此可見,民主正是資產階級即工商业中等階級的願望的体现。得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現,而約翰·罗素則自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这样一事实:他們本階級內部即貴族階級內部的旧的內訌已經不能引起國內的任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經准备拋棄“輝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的条件] 的話。在这种情况下,輝格党实际上將繼續扮演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資產階級的奴僕。由此可見,罗素所提出的改組党的計劃,归結起来不过是要給党起一个新的名称。

約瑟夫·休謨也认为必須組織一个新的“人民政党”。然而,

按照他的意見，不能根据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和类似的建議来組織这样的党。“站在这样的立場上，在六百五十四个代表中，您甚至連一百个也联合不起来。”那末，他究竟有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权的新发明呢？

“人民同盟——或人民政党，或人民联盟——应当在一点上，譬如說，在秘密投票这样一个要求上达成協議；达到这一点之后，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其他各点。尽管这个运动只能由下院中为数不多的一批代表发起，但是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議會外的人民和选民相信他們必須参加，并支持議會中的那个不大的人民政党。”

这个休謨曾經是人民宪章²⁷⁹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拋棄了由六点构成的人民宪章而轉向財政改革和議會改革派的那个仅仅由三点构成的“小宪章”。而現在我們看到，他已經满足于秘密投票这一点了。从他給“赫尔报”的一封信的結尾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新发明也只寄托多么小的希望：

“請告訴我，有多少編輯会冒險去支持在議會保持目前这样的成分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执政的政党呢？”

因此，既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打算在目前多少改变一下議会的成分，而只限于要求秘密投票，那末連它自己也承认，它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建立这样一个軟弱的政党（而且已經公开承认是軟弱的政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約瑟夫·休謨的嘗試之外，还有一个創立新政党的嘗試。这就是所謂的民族政党。这个党不要人民宪章，而想以普选权作为自己唯一的口号，于是它就恰好丢掉了那些能够把爭取普选权的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得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面我还有机会談到这个民族政党。它是由那些力图躋身于体面的上流

社会的过去的宪章派，以及那些企图使宪章运动听从自己支配的激进派、资产阶级思想家组成的。站在他们后面的——不管“民族主义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这些人驱使和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先锋。

因此，任何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卑鄙的妥协和叛变行为，所有这种追逐蝇头小利的行为，所有这些动摇不定和欺骗手段都只能证明：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大门口；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即将到来；反对党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和无力反抗；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民族政党”从宪章后退到普选权；约·休谟从普选权后退到秘密投票；其他的人从秘密投票后退到平均分配选区，如此等等，最后一直到小约翰·罗素为止，在他那里，除了民主这样一个空洞的字眼之外，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作为口号的东西。约翰·罗素勋爵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族政党的最终目标，也是休谟的“人民政党”和其他一切有名无实的政党（就假定它们之中有那么一个党具有某些类似生命力的东西）的最终目标。

一方面由于进入物质繁荣时期而产生了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和冷淡态度，而同时却不能不担心托利党仍然怀有某种不良意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领袖看到他们很快就会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同时某些有声望的领袖又清楚地意识到人民过于冷淡，因而不可能在目前发动一个独立的运动，——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各个政党做了相互靠近的尝试，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力图在议会之外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最后一直到全都回到罗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上来。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政党”的企图，厄内斯特·琼斯发

表了以下的公正的見解：

“人民憲章是政治改革方面所能採取的措施中的一種最全面的措施，憲章派是大不列顛的唯一的真正的民族政黨，只有它極力主張政治的和社會的改革。”

而憲章派執行委員會²⁸⁰的委員之一羅·喬·蓋米季是這樣告訴人民的：

“你們拒絕資產階級的合作嗎？當然不，如果這種合作是根據公正的、光榮的條件提出的話。什麼條件呢？普通的和可以接受的條件。要承認憲章，而在承認之後就同它的為了實現它而已經組織起來的朋友聯合起來。如果你們拒絕這樣做，那末你們不是反對憲章本身，就是因自己的階級優勢而自傲，以為它可以給你們領導權。在第一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忠實的憲章主義者會同你們結成同盟；在第二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工人會這樣損害自己的尊嚴而崇拜你們的階級偏見。工人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時也接受真誠的幫助，不論這種幫助來自誰。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行動中所要遵循的方針是：他們要想得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

目前，憲章派的群眾也被物質生產吸引住了。但是黨的核心到處都在重新組織起來，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重新建立了聯繫。一旦商業和政治的危機到來，目前憲章運動的總參謀部毫不聲張地進行的活動就會在整個大不列顛顯示出它的作用。

卡·馬克思寫於 1852 年 10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2 年 11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622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科苏特、馬志尼和路易-拿破侖

致“紐約論壇报”編輯

亲爱的先生！

我在9月28日写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些事实，說明科苏特和馬志尼的活动真相^①，現在我發現那篇文章引起了許多非难，造成了民主派报刊广泛进行空泛的辯駁、咒罵和大声威胁的口实。

我确实知道科苏特并没有跟着叫嚷。如果他本人出来反駁我的报道，那我就会重新来談談这些报道，并且举出可以确凿证明上述事实确实可靠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可是，我写那篇文章与其說是想反对科苏特，不如說是想給他一个警告。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联盟，只是必須肯定，是你領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着你走。

至于說到根据权威材料反駁我的那位先生，那末我要提醒他一句古老的諺語：*Amicus incommodus ab inimico non differt.* [愚友和敌人沒有两样]^②。

民主派报刊、尤其是德国的民主派报刊方面的先生們，照例是叫嚷得最响亮的；我要告訴这些先生，他們心里全是狂热的保皇党

① 見本卷第412—415頁。——編者注

② 和俄国的諺語“殷勤的傻瓜比敌人更危險”差不多。——編者注

人。这些先生离开了国王、神明和教皇是不行的。他們剛一脱离旧的統治者的监护，就已經給自己制造了新的統治者，并且对“異教徒和謀叛者”暴跳如雷。这些人非常令人討厭：他們揭露了令人不快的真相和公布了有損名譽的事實，因而侮辱了新出現的民主主义之王的尊嚴，褻瀆了新出現的民主主义之神的聖明。

您的特約通訊員

1852年11月16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寫

載于1852年12月1日“紐約
每日論壇報”第3627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最近的科倫案件的最后声明

致“晨报”編輯

亲爱的先生！

为了对自己和对現已在科倫被判罪的朋友們負責，我們认为有必要向英国公众介紹一下同最近的一个巨大案件有关的如下一些事实。这一案件发生在科倫，在英国的报刊上沒有得到足够的說明。

仅仅为了弄到这一案件所需要的证据，就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們的朋友們一直被单独监禁着，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許他們干，甚至連书都不許他們看，病了也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就是得到了治疗，那也是已經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甚至在递交了“起訴书”之后还是禁止他們同自己的辯护人交換意見，这是一种直接破坏法律的行为。而把他們监禁得这样长久、这样严酷的借口究竟是什么呢？当头九个月已經过去的时候，“檢察厅”宣布：缺乏起訴的根据，因此需要重新开始偵查。于是重新开始偵查。过了三个月，当陪审法庭开庭的时候，国家起訴人推托說，证据太多，他至今还无法把它們弄清楚。接着又过了三个月，由于原告方面的一个主要证人生病，于是审訊又拖延下来了。

这样一再拖延的真实原因，是普魯士政府当局心虛，它害怕它

所大肆渲染的“聞所未聞的揭发”在如此貧乏的事实面前經不起考驗。最后，政府总算物色到了一批从来没有在萊茵省露过面的陪審員：其中有六个是反动貴族、四个是 haute finance [金融貴族] 的代表、两个是高級官員。

向这个陪審法庭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证据呢？不过是一小撮想当陰謀家的不学无术的幻想家（这帮傢伙是一个叫舍尔瓦尔的公开的警探的同謀者和工具）瞎造乱編的一些宣言和信件。在这以前，这些文件中的絕大部分都在倫敦的一个叫做奥斯渥特·迪茨的人的手里。在国际博覽会²⁸¹ 期間，普魯士警察当局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了他的写字台的抽屜，这样，就用平常的盜窃办法偷得了他們所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首先被用来揭发所謂巴黎的德法密謀²⁸²。現在科倫的法庭辯論已經证明，这些陰謀家及其在巴黎的代理人舍尔瓦尔正好都是被告們和我們这几个在倫敦的朋友們的政敌。但是国家起訴人硬說，只是某些純私人的糾葛才阻碍了被告們和我們这几个在倫敦的朋友們参加舍尔瓦尔及其同謀者的密謀。有人指望用这类論据来证明科倫的被告們在道义上参与了巴黎的密謀。当人們要科倫的被告們對他們的公开敌人的行动負責时，舍尔瓦尔的眞正的朋友們和他的同謀者就被政府当局傳到法庭，但他們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坐在被告席上——不，他們是坐在证人席上提供反对被告的证詞。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卑鄙的。由于輿論的压力，政府当局不得不去寻找比較不令人怀疑的证据。在一个叫做施梯伯的人——科倫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王室警务顧問、柏林刑事警察局长的领导下，全部警察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声称，有一个特別信使从倫敦給他带来了一批特別重要的文件，說什么这些文件无可爭辯

地证明了被告們同我們几个人一起参与了他所控告的密謀。“除其他許多文件外，信使給他送来了在被告們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馬克思博士主持下举行的秘密协会會議的原本記錄。”可是施梯伯在他那矛盾百出的证詞中竟把他的信使到达他那里的日期弄錯了。而当被告的主要辯护人施奈德尔博士当面指責施梯伯的证詞不真实的时候，施梯伯除了摆出一副他是負有国家最高当局所委托的最重要使命的国王代表的臭架子以外，不敢作任何別的回答。至于記錄本，施梯伯曾两次发誓作证說，它是“倫敦共产主义协会的原本記錄”，可是后来，他被辯护人弄得无可奈何，終于不得不承认这可能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暗探所获得的一个筆記本。最后，从他本人的证詞中也可以看出，記錄本是別有用心捏造的，它出自施梯伯在倫敦的三个代理人——格萊夫、弗略里和希尔施之手。希尔施本人后来也承认，記錄本是在弗略里和格萊夫的指使下編造出来的。这一点在科倫已經十分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甚至连国家起訴人也說施梯伯的这一个如此重要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倒霉的本子”，純粹是捏造。这个人否认原告方面提出来作为一种证据的那封模仿馬克思博士笔迹的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文件也是一种明显而粗糙的捏造的证据，同样，用来证明被告不是有革命意图、而是实际参与某一个哪怕是稍微有点像是密謀的活动的其他一切文件，都变成了警察当局所干的捏造勾当的明证。政府当局生怕被揭露，因而它不但迫使邮局扣压寄給辯护人的一切文件，而且还指使施梯伯用威胁手段去吓唬辯护人，說要控告他們同我們几个人有“罪恶的通信关系”。

如果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件也拿不出来，而硬要宣判有罪，那末，能够这样做（即使这一类陪审員也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只是由

于把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应用；在这样应用法律时，就連“泰晤士报”与和平协会也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叛国的可怕罪名而被告发。此外，科倫案件由于长期拖延，由于原告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寻常的手段，已成了一起尽人皆知的案件，因而宣判被告們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当局有罪，而萊茵省普遍认为，宣判无罪的后果将是陪审法庭这个制度本身立即被廢除。

亲爱的先生，我們始終是您的順从的僕人

弗·恩格斯

斐·弗萊里格拉特

卡·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1月20日于倫敦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載于1852年11月29日

“晨报”第191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晨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最近的科倫案件²⁸³

1852年12月1日星期三于倫敦

你們也許已經从欧洲报刊上看到許多关于迫害普魯士共产党人的科倫的巨大案件及其結局的报道。但是，鉴于这些报道没有一个哪怕是比較真实地說明了事实，鉴于这些事实能够揭穿使欧洲大陆受到束縛的各种政治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回头来談談这一案件。

由于結社权和集会权的廢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組織的可能性。更何况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領袖們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境。但是，任何政党沒有組織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說在自由资产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們的社会地位、它們的物质优势以及它們的成員之間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代替这类組織的話，那末，沒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資財的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組織。正因为如此，無論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現了許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1849年起就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了，并且被扣上阴谋家組織的罪名而遭到迫害。这些团体中，有許多的确是阴谋家的組織，的确是为了推翻現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誰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組

織密謀，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樣地，在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那就是胡鬧。但是，另外還有一些團體，它們抱有更遠大更崇高的目的，它們懂得：推翻現存政府只不過是即將來臨的偉大鬥爭中的過渡階段，它們竭力把以它們為核心的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訓練黨去進行最後的決戰。這一決戰或遲或早將必然在歐洲不僅永遠消滅“暴君”、“專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統治，而且永遠消滅無比強大的極端可怕的權力：資本對勞動的支配權。

德國先進的共產主義政黨²⁸⁴的組織就是這樣。這個政黨根據它的“宣言”（發表於1848年）的原則以及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連載的題為“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①這組文章中所闡明的原理，從來不抱這樣的幻想：似乎它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隨心所欲地進行那種必須在實踐中實現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運動的起因及其失敗的原因。它認為，階級間的社会對抗是一切政治鬥爭的基礎，因此它去探究這樣的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個社会階級能夠而且必然要擔負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也就是擔負起在政治上領導該民族的使命。歷史向共產主義政黨表明：繼中世紀的土地貴族之後，後來也奪取了政權的最初一批資本家的金融實力怎樣成長起來；這個金融資本家集團的社会影響和政治統治怎樣被工業資本家的日益增長（從使用蒸汽時起）的威力所排擠；另外兩個階級即小資產者階級和工業工人階級目前在怎樣要求統治權。1848—1849年的實際革命經驗證實了一種理論觀點，從這種觀點得出的結論是：共產主義的工人階級首先必須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去當政，然後它才能指望在不斷的鬥爭

① 見本卷第3—115頁。——編者注

中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制。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不能抱有推翻德国现存各邦政府的直接目的。它建立这种秘密组织不是为了推翻这些政府，而是为了推翻迟早必将取它们而代之的那个叛乱政府，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当时都能给予并且无疑地会给予反对 status quo [现状] 的革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但是，在给这种运动作准备的时候，除了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能有其他方法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的。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对它的这些基本原则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当它的某些成员为虚荣心和个人野心所驱使，企图把同盟变成 ex tempore [即兴地] 进行革命的阴谋家组织时，他们很快就被开除出盟。

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提出理由把这样的同盟叫做阴谋家组织，叫做为策划叛乱而建立的秘密团体。如果这也算是密谋的话，那也不是反对现存政府的密谋，而是反对它的可能的继承者的密谋。这一点普鲁士政府当局也是知道的。当局之所以把十一名被告单独监禁了十八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来干最惊人的法律勾当，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八个月的监禁之后，“由于缺乏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竟又把被告们关了好几个月来继续进行侦查，简直岂有此理！最后，当被告们终于出现在陪审法庭上的时候，竟没有办法给他们扣上某种带有叛国性的预谋勾当的罪名。但是他们毕竟被判了罪，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样被判罪的。

1851年5月，同盟的一个特派员^①被捕，根据从他那里查获的文件逮捕了其他一些人。一个叫施梯伯的普鲁士警官很快就接

^① 即诺特莱克。——编者注

到一項命令，要他監視莫須有的密謀在倫敦的据点。他终于从上述一些被开除出盟以后真的在巴黎和倫敦組織了密謀的叛徒們那里获得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是通过双重的罪行获得的。收买了一个叫罗伊特的人，砸开了該协会秘书^①的写字台，从抽屜里偷走了文件。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这种盜窃行为的結果是揭发出所謂巴黎的德法密謀，并給密謀的参加者判了罪，但是仍然沒有提供出共产主义者大同盟的綫索。順便提一下，巴黎的密謀的領導人是住在倫敦的几个爱虛荣的傻瓜和政治 chevaliers d'industrie [騙子] 以及一个过去曾經因伪造行为被判了罪但目前已在巴黎当上了警探的人^②。受他們愚弄的一些糊塗虫老是用狂暴的豪言壯語和杀气騰騰的浮夸辞藻来弥补他們在政治上的极端微不足道。

因此，普魯士警察当局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发现。它在普魯士駐倫敦的大使館里設立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格萊夫的警探以大使館随員的头銜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老实說，这种作法足以把普魯士的所有大使館都置于国际法之外，甚至連奧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在格萊夫的领导下工作的，有一个叫弗略里的倫敦西蒂区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联系，是一个天生下賤专干卑鄙勾当的下流坯；另一个暗探是店員，名叫希尔施，不过，他在倫敦时就已經有人怀疑他是一个密探。他曾經混入流亡倫敦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間。他們为了查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曾容忍他在自己人中間混了一个时期。他勾結警察当局的罪证不久就被发现，这位希尔施先生从此也就

① 即奧·迪茨。——編者注

② 即舍尔瓦尔。——編者注

隱藏起來了。這樣一來，他雖然已經沒有任何可能獲得可供出賣的情報，但他畢竟還不是無事可干。當他幽居在肯辛頓時，雖然從來沒有碰見過一個上述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每周都要編造一些關於普魯士警察當局根本無法破獲的那個陰謀家組織的虛構中央委員會的虛構會議的虛構報告。這些報告的內容是最荒唐不過的。沒有一個名字是確實的，沒有一個姓是真有的，強加在這個或那個人身上的話，沒有一句是至少有點像這個人可能說出的話。希爾施在偽造這些假貨時曾得到他的老師弗略里的幫助，而且也絕不能證明“隨員”格萊夫沒有親自動手干這一卑鄙的勾當。儘管這些東西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普魯士政府當局還是把這些荒謬絕倫、胡說八道的東西當做神聖的真理，可以想像，把這類證據當作提交給陪審法庭的訴訟材料，已經造成了什麼樣的混亂。案件開始審訊時，上述的警官施梯伯先生親自出馬坐在證人席上，發誓證明所有這些荒謬的捏造材料都是真實的，並洋洋自得地硬說什麼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和在倫敦的那些应当被看作這一可怕密謀的主要組織者的人們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個密探的確處於極端秘密的狀態，因為八個月中他在肯辛頓一直沒有露過面，生怕真的碰到密謀的某一個參加者。但是他似乎每周都在報告這些人的最秘密的思想、言論和活動。

然而，希爾施和弗略里這兩位先生還留了一手，他們還有一個傑作。他們把他們所捏造的全部報告改編成秘密的最高委員會（普魯士警察當局硬說有這麼一個委員會）會議的“原本記錄”。而施梯伯先生發現，這個本子竟同他過去從這兩個人那里得到的報告一模一樣，所以他立刻把它交給陪審員，並再一次發誓說，經過一番慎重的研究之後，他堅信這個本子是真實的。就在那個時候，希

尔施所报告的那絕大部分荒謬的捏造材料公布了。当这个秘密委员会的虛構成員听到了他們在此之前甚至想都沒有想到过的关于他們的报道时，他們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洗礼时本来命名为威廉的人，在这里却被改名为路德維希或卡尔；一些人硬被說成在倫敦发表演說，其实当时他們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一些人被报告說他們讀过某些信件，其实这些信件他們从来没有收到过；报告中还說什么他們每星期四都举行例会，其实他們只不过是在每星期三照例举行一次友誼聚会；一个剛会写字的工人竟成了記錄之一，并且以記錄的身分签了名；他們所有的人发表意見时都被迫一律用也許是普魯士警察派出所的語言，但决不用多半是由在本国享有盛名的著作家組成的那个协会的語言发表意見。除了这一切，还捏造了一張伪造者們为收买記錄本而向臆造的中央委员会的虛構的秘书付款的收据。但是这个虛構的秘书的存在，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个詭譎的共产党人用来愚弄不幸的希尔施的一个迷陣而已。

这种拙劣的捏造是太糟糕了，結果竟弄得事与願違。虽然被告的在倫敦的朋友們根本不可能向陪審員說明事实真相，虽然他們寄給辯护人的信件在邮局里被沒收了，虽然文件和发誓写成的书面证詞（它們毕竟被交到这些律师的手里了）不允許作为证据，但是由于激起了公憤，甚至連国家起訴人，以及曾发誓担保这个記錄本的真实性的施梯伯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捏造的。

但是，这种伪造并不是警察当局所干出来的唯一的伪造行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警察当局在罗伊特偷来的文件上加油添醋，借以歪曲文件的原意。有一个滿紙

荒唐的文件是模仿馬克思博士的笔迹写成的，这个文件直到最后起訴人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捏造的以前，有一个时候硬被說成是馬克思写的。但是，在警察当局的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干出五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因为当局千方百计地要把辯护人弄得措手不及，不得不在倫敦弄证据，而辯护人同流亡在倫敦的共产主义者的每一次通信在法庭上都被說成是参与假定的密謀的一种行为！

格萊夫和弗略里这两个人的真面目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樣，这是連施梯伯先生本人在他的证詞中也已經表明了。至于說到希尔施，他在倫敦治安法官面前曾經供认，他在弗略里的指使和协助下伪造了“記錄本”，后来他为了逃避刑事处分而逃离了英国。

在审判过程中所进行的这样可耻的揭露，使政府当局狼狽不堪。它为这个案件物色的陪審員都是过去沒有在萊茵省露过面的人物：六个貴族——十足的反动分子、四个金融巨头、两个政府官員。这帮人毕竟不很願意去細心地分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证据；这些证据竟在他們的面前堆了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时經常在他們的耳边发出这样的叫喊声：被告們是可怕的共产主义密謀的头子，这个密謀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神圣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政府和法律！可是，如果政府当局在当时不向特权階級暗示：在这个案件中宣判被告无罪，这将成为廢除陪審法庭的信号，并将被人理解为直接的政治示威，理解为自由資產階級反对派准备甚至同极端革命派結成同盟的证据，那末終归是会宣判无罪的。不管怎样，政府当局最終还是把普魯士的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給七名被捕者判了罪，而只有四人被宣判无

罪。被判罪者分別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監禁²⁸⁵。毫無疑問，當你們得到這個消息時，你們一定會及時地把它報道出去的。

弗·恩格斯寫於 1852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2 年 12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645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²⁸⁶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底—12 月初

1853 年以小册子“揭露科倫
共产党人案件”发行于巴塞尔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 1885 年版本,并
根据 1853 年和 1875 年版
本校对过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Basel,

Buchdruckerei von Chr. Krüsi.

1853.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第一版的扉頁

一 前 言

1851年5月10日，諾特榮克在萊比錫被捕；不久以后，毕尔格尔斯、勒澤尔、丹尼尔斯、貝克尔等人也被捕了。1852年10月4日，科倫陪審法庭开始审訊被捕者，他們被控犯了反对普魯士国家的“图謀叛国”罪。这样，审前羈押（单独监禁）竟拖了将近一年半之久。

在諾特榮克和毕尔格尔斯被捕时，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宣傳协会）章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²⁸⁷，以及一些人名住址和印刷品。諾特榮克被捕的消息已經傳出八天以后，科倫才开始搜查和逮捕。可見，如果当时还能发现一些东西的話，那末現在，无疑一切都已經无影无踪了。实际上，被查获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过了一年半之久，当陪審法庭終于审訊被捕者的时候，原告方面所掌握的 *bona fide* [可信]材料一份也沒有增加。可是，据檢察机关（以馮·澤肯多尔夫和澤特为代表）断言：普魯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它們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Nous verrons!* [讓我們來看一看吧!]

审前羈押一再拖延的理由被說得奧妙无穷。最初，說什么薩克森政府不願把毕尔格尔斯和諾特榮克引渡給普魯士。科倫的司法机关曾向柏林的內閣要求过引渡，但是沒有結果；柏林的內閣也

向薩克森當局要求過引渡，但是也沒有結果。其實，薩克森政府已經同意了。畢爾格爾斯和諾特榮克已經被引渡。最後，到了1851年10月，事情有了一些進展，材料終於交給科倫上訴法院的檢察院。檢察院作了決定，認為“缺乏起訴所必需的客觀的犯罪構成，因此必須重新開始偵查”。司法機關的這一股忠於職守的熱情，是由前不久剛頒布的紀律法鼓起來的，這一法律規定：普魯士政府有權清除不稱職的任何一個司法官。這一次，審判由於缺乏犯罪的證明材料而宣告改期。而當陪審法庭在下一個季度審判庭開庭時，審判則不得不由於材料太多而延期。據說，文件太多了，起訴人來不及細心研究。起訴人慢吞吞地細心研究了材料，把起訴書交給了被告，並規定在7月28日對案件進行審理。但是這時，政府當局的主要審判支柱警察廳長舒耳茨病倒了。由於舒耳茨的健康欠佳，被告們不得不再坐三個月的牢。好在舒耳茨死了，公眾也已經迫不及待，於是政府當局才不得不把幕布拉開。

在這整個時期里，科倫警察廳、柏林警察總局、司法部和內務部經常對偵查的過程進行干涉，同樣，後來它們的可尊敬的代表施梯伯也經常以證人身分對科倫舉行的公開審訊進行干涉。政府物色了一批在萊茵省的編年史上空前未有的陪審員。其中除了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黑爾什塔德、來丁、約斯特），城市貴族的代表（馮·比安卡、馮·拉特），頑固守舊的容克的代表（海布林·馮·蘭岑瑙爾、菲爾施坦堡男爵等人），還有兩個普魯士的政府顧問：一個是王室侍衛官（馮·明希-貝林豪森），一個是普魯士教授（克羅伊斯勒爾）。由此可見，在這個陪審法庭中，德國統治階級中的一切階層都有代表，而且也只有它們才有代表。

有了這樣一批陪審員，普魯士政府當局似乎可以選擇一條直

路，可以組織一次完全有傾向的审判了。毕尔格尔斯和諾特荣克等人承认屬实的文件以及那些直接从他們那里查获的文件的确絲毫不能证明有什么密謀；这些文件根本不能证实 Code pénal²⁸⁸所規定的任何行为的存在，而只是不容置辯地证明了被告們对現存政府和現存社会的敌对态度。但是，立法者的理性所沒有預料到的东西是可以由陪審員的良心来加以补充的。被告們把他們对現存社会的敌对行为弄得不違犯法典的任何一个条文，这难道不是他們的一种奸計嗎？沒有列入治安卫生条例的病名录的病难道就不是傳染病了嗎？如果普魯士政府仅仅根据实有的材料就想证明被告們是一些有害的人，而陪審員又认为判决被告“有罪”就足以使他們不致为害，那末誰能攻击陪審員和政府当局呢？除了那些目光短淺的幻想家以外，誰也不能这样做。原来这些幻想家认为，普魯士政府和普魯士的統治阶级非常强大，只要它們的敌人不越出辯論和宣傳的范围，就能給他們以自由活动的場所。

然而，普魯士政府自己把政治审判的康庄大道堵塞了。审判一拖再拖，內閣对偵查的过程进行直接干涉，暗中指示进行不可思議的恐怖活动，大肆吹嘘什么全欧洲性的密謀已被揭穿，令人发指地虐待被捕者，这就使案件扩大成为 *procès monstre* [巨大案件]，成了全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而使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頂点。普魯士政府已經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經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輿論的法庭面前。

政府为了补救第一次失策，必然又再一次失策。在偵查时执行法院偵查員职务的警察，在审讯时不得不以证人的身分出面。除了平常的起訴人以外，政府还得挑选一个不平常的起訴人；除了

檢察机关以外，还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澤特和澤肯多尔夫以外，还得派出施梯伯和他的維尔穆特、他的烏儿格莱夫以及他的小玩艺儿戈德海姆^①。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断向法律上的原告方面提供該方面所白費力气、捕風捉影地寻找的种种事实，第三种国家力量对法庭的干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庭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庭长、法官和檢察官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給警务顧問兼证人施梯伯，并經常躲在他的背后。在闡明檢察院无法找到的“客观的犯罪构成”所依据的那些警察启示以前，我們还要再說几句開場白。

从人們在被告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及他們本人的供詞中發現：曾經有过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它的中央委员会最初設在倫敦。1850年9月15日，这个中央委员会分裂了。多数派——起訴书称它为“馬克思派”——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倫。少数派——他們后来被科倫人开除出同盟——在倫敦組織了独立的中央委员会；并在倫敦和大陆上建立了宗得崩德²⁸⁹。起訴书把这个少数派及其应声虫叫做“維利希—沙佩尔派”。

澤特和澤肯多尔夫硬說，倫敦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是由某些純私人的糾葛引起的。早在澤特和澤肯多尔夫說这种話以前，“俠义的維利希”就已經在倫敦流亡者中間散布了种种关于分裂的原因的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語。維利希利用阿尔諾德·卢格先生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²⁹⁰这辆馬車的第五个輪子及其他同他类似的人作为工具在德国和美国报刊上大肆散播这类流言蜚語。民主派曾經

① 俏皮話：Wermuth, Greif 和 Goldheim(小称是 Goldheimchen)都是警官的姓，同时《Wermut》又有“苦痛”、“苦艾”、“苦艾酒”的意思，《Greif》有“兀鷹”的意思，《Goldheimchen》有“金黃色的蟋蟀”的意思。——編者注

认为，只要尽快地把“狭义的維利希”描繪成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他們就能輕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人。“狭义的維利希”本人也认为，“馬克思派”如果不出卖德国的秘密协会，特别是如果不让科倫中央委员会去接受普魯士警察当局的慈父般的监护，就不可能揭露分裂的原因。現在这些情况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我們不妨从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倫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會議的記錄^①中引证几小段話。

馬克思在說明他的关于分离的建議时，曾經說过以下的一段話，他說：“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国际冲突，而你們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觉。’我們特別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階級不够成熟，而你們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級偏見阿諛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詞变成圣物一样，你們則用无产階級这个詞来玩这套把戏。你們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話代替革命的发展”如此等等。

沙佩尔先生作了回答，他的原話是这样的：

“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見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問題在于，是我們自己动手去砍掉別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們的脑袋。〈沙佩尔甚至保证說，一年以后，即1851年9月15日，有人将要把他的

^① 見本卷第635—641頁。——編者注

脑袋砍掉。>在法国快要輪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輪到我們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靜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們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階級获得統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見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見解”如此等等。

由此可見,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并不是由私人原因引起的。但是,如果說是原則性分歧,那也是不对的。沙佩尔—維利希派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們只有別出心裁地曲解別人的思想的本領,他們把別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們已經把这些思想連同詞句都掌握了。如果指責維利希—沙佩尔派是“行动派”,也同样是錯誤的,除非把行动理解为在下流的叫囂、臆想的密謀和毫无結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

二

迪茨的档案

在被告那里查获的“共产党宣言”是二月革命前出版的，几年来一直公开出售；这本书无论从它的形式或者从它的使命来说，都不可能是“密谋”的纲领。被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此外，章程是秘密的宣传协会的章程，但是，在 Code pénal〔刑法典〕里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这种宣传以破坏现存社会为最终目的，但是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以后还可能灭亡十次，以至最终灭亡，而现存社会决不会因此掉一根毛。共产党人能够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宣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破坏社会，那末，他无异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但是，既然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社会，那末它的手段必然是政治革命，而推翻社会要以推翻普鲁士国家为前提，就像地震要以破坏鸡窝为前提一样。然而被告们是从这样一种罪恶观点出发的：没有他们，当前的普鲁士政府也会垮台。因此，他们并没有组织过目的在于推翻现在的普鲁士政府的同盟，也不曾犯过任何“图谋叛国”罪。

什么时候曾經有人控告过把打倒任何一个頑固守旧的羅馬地方官当作自己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魯士的国家哲学家們，从萊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賜的国王。难道曾經有人以危害霍亨索倫王朝的罪名追究过他們嗎？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任意翻轉和顛倒，已发现的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已經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幽灵一样消失了。事情依然沒有进展，檢察院訴苦^① 說：“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馬克思派”也真够狡猾的了，偵查了一年半还根本沒有使缺乏的犯罪构成增加任何一点东西。

这样的苦楚是需要帮助解除的。而維利希-沙佩尔派就和警察当局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讓我們来看一看，这一派的接生婆施梯伯先生是怎样把他們拖进科倫案件中去的。（見施梯伯 1852 年 10 月 18 日在法庭上的证詞。）

1851 年春季，当施梯伯以保护工业博覽会的参观者不受坏蛋和小偷^② 之害为名而逗留在倫敦时，柏林警察总局寄給他一份从諾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同时

施梯伯发誓作证說：“我特別注意密謀的档案，根据从諾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来看，这个档案一定是在倫敦的一个名叫奥斯渥特·迪茨的人手里，档案里面一定有同盟盟員的全部来往信件。”

密謀的档案？同盟盟員的全部来往信件？但是迪茨是維利

① 在原文中是双关語：«Klage des Anklagesenats» 也有“檢察院起訴”的意思。
——編者注

② 双关語：原文是 «Stiebern und Diebern»，这两个詞是由施梯伯这个姓的同音詞 «Stieber»（警犬，轉意是坏蛋，到处找人的密探）和 «Diebe»（小偷）这个詞构成的。——編者注

希一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因此，如果說他手头有密謀的档案，那就是維利希一沙佩尔派的密謀的档案。如果說迪茨手头有同盟的来往信件，那只能是敌視科倫被告們的宗得崩德的来往信件。但是，只要查閱一下从諾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可以发现一个大漏洞，即这些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到奥斯渥特·迪茨这样一个档案保管人。在萊比錫的諾特荣克怎么能知道在倫敦的“馬克思派”本身所不知道的事情。

施梯伯不能直截了当地說：陪審員先生們請注意！我在倫敦有了一个聞所未聞的发现。很遺憾，这一发现所涉及的密謀，同科倫的被告們毫不相干，科倫的陪審員无权根据它作出判決；但是它能够提供把被告們单独监禁一年半的理由。施梯伯是不能这样說的。为了把在倫敦发现的綫索和偷来的文件同科倫案件似是而非地扯在一起，就有必要把諾特荣克牽連到这个案件里去。

于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說，有人建議他用現金去收买奥斯渥特·迪茨手中的档案。然而这不过是这样一回事：有一个叫做罗伊特的普魯士密探，从来沒有参加过共产主义协会，和迪茨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文件。施梯伯先生很可能为这种偷窃行为而賞給罗伊特一笔錢，但是，如果这一勾当在施梯伯逗留倫敦时被人发觉，那末他就难免要到凡迪門島²⁹¹去旅行一趟。

1851年8月5日，施梯伯在柏林收到了从倫敦寄来的一个“用結实的油布包起来的包裹”，里面包的是迪茨的档案，即一大包文件，共有“六十种之多”。这是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同时他还发誓作证說，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包裹里面，除了其他許多信件以外，还有柏林总区部1851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如果有人一

定要說，施梯伯在作偽誓，他竟担保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了1851年8月20日的信，那末他会振振有詞地回答說，普魯士王室顧問和福音书作者馬太有同样的权利，例如拥有創造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的奇迹的权利。

En passant [順便提一下]。从在維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維利希—沙佩尔派对罗伊特的破門行窃的行徑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魯士警察当局手里。

当施梯伯得到了用結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这个宝贝时，他簡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发誓說：“全部綫索都已經暴露在我的眼前了。”但是，有关“馬克思派”和科倫被告們的这个宝贝究竟是些什么貨色呢？施梯伯本人供认，什么也沒有，根本什么也沒有，有的只是：

“标有‘9月17日子倫敦’字样的、显然是构成馬克思派核心的几个中央委員关于因1850年9月15日發生的著名分裂而退出共产主义协会的原声声明。”

施梯伯本人是这样說的，但是，即使是在提出这个不伤人的证詞时，他也不能限于簡簡單單地叙述一下事实。他不得不把它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使它带有警察当局的威風。上述的原声声明除了提到前中央委員会的多数成員及其朋友們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工人协会²⁹²、但决不退出“共产主义协会”这几行字以外，別无任何內容。

施梯伯可以为他的通信者省下油布，为他的上司省下邮資。施梯伯只要翻閱一下^①1850年9月份的几家德国报纸，他就会发

^① 双关語：《Stieber》[施梯伯]是姓，《durchstiebern》的意思則是“乱翻”、“搜查”、“探察”。——編者注

現黑字印在白紙上的“馬克思派核心”的一項聲明，他們在聲明中宣布同時退出流亡者委員會²⁹³和大磨坊街的工人協會。

可見，施梯伯之流在搜查證據的工作中獲得的直接成果，就是“馬克思派核心”於1850年9月17日退出大磨坊街的公開的協會這一聞所未聞的發現。“科倫密謀的全部線索都已經暴露在他的眼前了。”但是公眾並不相信他的眼睛。

三

舍尔瓦尔的密謀

然而，施梯伯很善于从偷来的宝物中得到好处。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文件，給他提供了一条发现所謂“巴黎的德法密謀”的綫索。这些文件中有維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員阿道夫·迈尔的六份报告（上面标有“巴黎”的字样）和巴黎总区部給維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五份报告。（施梯伯于10月18日在法庭上作的证詞。）施梯伯到巴黎作了一次愉快的外交旅行，并且在那里亲自結識了偉大的卡尔利埃；这个人剛剛在臭名远揚的金条彩票事件²⁹⁴中证明他虽然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外国私有财产的摯友。

“因此，我在1851年9月前往巴黎。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給了我极其热情的支持…… 在法国警探的帮助下，敏捷而准确地查出了在倫敦的信件上发现的綫索。确实探查到了密謀的各个首領的住所，并对他們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他們的一切會議和他們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監視。在那里发现了非常危險的东西…… 我当时不得不向卡尔利埃局长所提出的要求让步，于是在9月4日午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施梯伯在10月18日所作的证詞。）

施梯伯是在9月份离开柏林的。我們假定他是在9月1日离开柏林的。他到达巴黎最早也得在9月2日晚間。9月4日夜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这样，跟卡尔利埃談判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而在这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不仅“探

查到了”密謀的各个首領的住所，而且还对他們的一举一动、他們的一切會議、他們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監視”，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在“探查到了他們的住所”之后进行。施梯伯的到达巴黎，不仅激起了“法国警探們”的奇效的“敏捷性和准确性”，而且还迫使专搞秘密活动的首領們变得“殷勤”起来，迫使他們在二十四小时之內进行了那么多的活动，举行了那么多的會議，写了那么多的信件，以致在第二天晚間就可以对他們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9月3日这一天探查到密謀的各个首領的住所并且对他們的一举一动，一切會議和全部信件都进行了監視，但是这还不够。

施梯伯还发誓作证說：“法国警探們有机会出席了阴謀家的許多次會議，并获悉他們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決議。”

这样看来，警探們剛剛对會議进行監視，他們就能通过監視出席了會議，他們剛剛出席了一次會議，會議就变成許多次會議，剛剛举行了几次會議，事情就已經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竟通过了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決議——而这一切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呵！就在施梯伯結識卡尔利埃的那一天，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員打听到密謀的各个首領的住所，首領們結識了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員，在当天請他出席自己的會議，并在当天举行了許多次會議来迎合他，一直到急急忙忙地通过关于在最近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決議，才同他分手。

不管卡尔利埃怎样献殷勤，——当然誰也不会怀疑他在政变前三个月內破获共产主义密謀的殷切心情，——施梯伯期望于他的东西要比他所能办到的多。施梯伯要求警察的奇迹，他不仅要求这种奇迹，而且还相信这种奇迹，他不仅相信这种奇迹，而且还发誓证实这种奇迹。

“当开始行动时”，即当采取果断的行动时，“我亲自跟一位法国警官一起首先逮捕了法国共产党人的主脑——危险的舍尔瓦尔。他猛烈地反抗，于是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

这就是施梯伯在 10 月 18 日作的证词。

“舍尔瓦尔在巴黎曾经谋害过我，而且是在我的住宅里进行的，他在夜里潜入了我的住宅；当我们俩人格斗时，我的妻子赶来帮我，结果受了伤。”

这就是施梯伯在 10 月 27 日作的另一个证词。

4 日午夜，施梯伯对舍尔瓦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舍尔瓦尔进行了顽抗。3 日午夜，舍尔瓦尔对施梯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施梯伯进行了顽抗。但是，就在 3 日这一天，阴谋家和警探之间还有着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表明，不仅施梯伯已在 3 日发觉了阴谋家的意图，而且阴谋家也已在 3 日发觉了施梯伯的意图。当卡尔利埃的警探们发现阴谋家的住所时，阴谋家也发现了施梯伯的住所。当施梯伯对阴谋家扮演“监视者”的角色时，阴谋家对他扮演了采取行动的角色。当施梯伯梦见阴谋家的反政府密谋时，阴谋家正在组织对他本人的谋害。

施梯伯在他的 10 月 18 日的证词中继续说道：

“在这次格斗中（当时施梯伯是进攻的一方），我发现舍尔瓦尔竭力要把一片纸塞进嘴里并要把它吞下去。我好不容易抢救出半片纸来，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

可见，当时这一片纸是被舍尔瓦尔在嘴里用牙齿咬住了，因为只抢救出半片纸来，而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警官或其他什么人——只有把手伸进“危险的舍尔瓦

尔”的嘴里去，才能搶救出另外半片紙来。舍尔瓦尔在这种进攻面前能够进行自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咬人，据巴黎的一些报纸报道，舍尔瓦尔真的把施梯伯夫人咬伤了。但是在演这场戏时，跟施梯伯一起在场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警官。施梯伯明明說，施梯伯夫人是舍尔瓦尔在施梯伯的住所进行謀害时由于赶来帮他才受伤的。如果把施梯伯的证詞同巴黎报纸的报道对照一下，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舍尔瓦尔为了夺回施梯伯先生在4日午夜从他嘴里撕下的紙片而在3日午夜咬伤了施梯伯夫人。施梯伯将会这样回答我們：巴黎是个奇迹的城市，拉罗施夫柯早就說过，在法国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我們暂时撇开对奇迹的信仰，那就会明白：前一个奇迹的发生是由于施梯伯把許許多多在時間上彼此毫无联系的活动硬凑在一起，并把它們硬塞在9月3日这一天里；而后一个奇迹的产生則是由于他把在同一个晚間、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各种不同事件安排到两个不同的晚間和两个不同的地方去。現在讓我們来把实际情况同他从“一千零一夜”里学来的那一套胡吹瞎說比較一下吧。但首先我們还要談一談一种奇迹般的情况，虽然它并不是奇迹。施梯伯把舍尔瓦尔正要咽下去的紙片撕下了一半。在这半片搶救出来的紙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有施梯伯所要寻找的一切。

他发誓作证說：“在这片紙上有給駐斯特拉斯堡的特派員吉佩里希的一項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及他的詳細地址。”

現在讓我們来看一看事实。

我們从施梯伯那里得知，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用結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迪茨的档案的。1851年8月8日或9日，在巴黎出現了一个叫施米特的人。看来，施米特这个姓对化名旅行的普

魯士警探來說是一個最理想的姓。1845—1846年，施梯伯曾化名施米特完成了西里西亞山區的旅行，1851年，他在倫敦的走卒弗略里也化名施米特完成了巴黎的旅行。他在巴黎偵察了維利希—沙佩爾派密謀的各個頭子，而首先發現了舍爾瓦爾。他大吹大擂，說什麼他是從科倫逃出來的，曾經給地方同盟儲金部捐助了五百塔勒。他用德勒斯頓和其他各個地方的委任狀來證明自己的身分，他談到了同盟的改組情況，談到了各個派別的聯合情況，說什麼分裂純粹是由某些私人糾葛引起的，——當時警察當局已經在宣傳團結與和睦了，他並且保證要用上述的五百塔勒來重新把同盟引向繁榮。施米特在巴黎逐漸地認識了維利希—沙佩爾派的同盟支部的各個頭子。他不但知道他們的住址，而且還拜訪他們，偵查他們的來往信件，監視他們的活動，鑽進他們的會議，並且充當 agent provocateur〔奸細〕向他們進行煽動。施米特把舍爾瓦爾吹捧得愈厲害，愈是把他譽為同盟中的一個尚被埋沒的偉人，一個至今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作用（就像許多偉大人物所經歷的那樣）的“主腦”，舍爾瓦爾就愈是飄飄然地自鳴得意起來。有一天晚上，施米特和舍爾瓦爾一起去參加同盟的會議，舍爾瓦爾把他寫給吉佩里希的一封著名的信在寄出之前念給施米特聽了。這樣，施米特才知道有吉佩里希這麼一個人。施米特說，“既然吉佩里希已經回到斯特拉斯堡，那末我們就應當馬上把領取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的五百塔勒的那份委託書寄給他。現在我把保存這筆款項的那個人的住址給您，請您把吉佩里希的住址給我，我可以把它當做一個證件寄給吉佩里希準備找的那個人。”施米特就這樣弄到了吉佩里希的住址。當天晚上，舍爾瓦爾把寫給吉佩里希的信寄出了，過了一刻鐘，按照來電指示，逮捕了吉佩里希；在他的住所進行了搜查，那封

著名的信被截获了。吉佩里希是在舍尔瓦尔被捕以前被捕的。

此后不久，施米特告訴舍尔瓦尔說，一个名叫施梯伯的普魯士密探已到达巴黎。他施米特不仅已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而且据他住所对面的一个咖啡館的招待說，施梯伯居然商量好要逮捕他施米特。他說，舍尔瓦尔准行，他一定能把这个卑鄙的普魯士警察好好教訓一頓。舍尔瓦尔回答說：“我要把他扔到塞納河里去。”他們約定了第二天闖进施梯伯的住所，就說他在家里，并且要記住他的特征。第二天晚上，我們的这两位英雄真的出动了。在路上，施米特认为，最好舍尔瓦尔进房子去，而他留在門外放哨。他还說：“你可以問一下看門人，施梯伯在不在家，如果看門人让你进去，你就对施梯伯說，你打算跟施彼尔林先生談談，打算問他一下，他是否从科倫带来了急需的期票。还有，你的白帽子太惹人注意，民主气味太重。真的！把我的黑帽子戴走吧！”他們交換了帽子。施米特留在外面看守，舍尔瓦尔拉了一下鈴，走进施梯伯住的房子。看門人說施梯伯可能不在家，舍尔瓦尔剛想走开，忽然从楼梯上傳来了一个女人的叫声：“呵，施梯伯在家。”舍尔瓦尔順声走去，走到了一个戴綠色眼鏡、自称是施梯伯的人的面前。舍尔瓦尔把早就商量好的关于期票和施彼尔林的那一番話說了一遍。施梯伯急忙打断他的話：“这可不行，您跑进这所房子里来打听我，等有人把住所告訴了您，然后您就准备离开，……我看这是非常可疑的。”舍尔瓦尔很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施梯伯按了按鈴，馬上出来几个小娄罗把舍尔瓦尔包圍起来；施梯伯一把抓住他那装着一封信的上衣口袋。虽然这不是舍尔瓦尔給吉佩里希的指示，但毕竟是吉佩里希給舍尔瓦尔的信。舍尔瓦尔竭力想把信咽下去，施梯伯把手伸进他的嘴里。舍尔瓦尔連咬带推，又动手打人。当施梯伯拚命搶救信的

这一半的时候，他的爱妻则在拚命抢救信的另一半，而且由于她对丈夫的忠心而受了伤。这一场面所掀起的喧鬧声惊动了許多邻居，他們紛紛从自己的房間里走出来。这时，施梯伯手下的一个小娄罗穿过楼梯栏杆扔下一块金表来，当舍尔瓦尔高喊«Mouchard!»〔“密探!”〕的时候，施梯伯及其同伙就一齐高喊«Au voleur!»〔“捉賊!”〕。看門人把金表送来，这时«Au voleur!»的喊声四起。舍尔瓦尔被逮住了，他在門外已找不到他的朋友施米特了，而在那里发现了四五个来押解他的士兵。

在事实面前，施梯伯所宣誓证实的一切奇迹都云消雾散了。他的走卒弗略里活动了三个多星期；他不仅发现了密謀的綫索，而且还帮助捏造了这些綫索；施梯伯只要从柏林来一趟，并且高喊：Veni, vidi, vici!〔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胜利了!〕就行了。他可以把現成的密謀当做一件礼物贈給卡尔利埃。而要求卡尔利埃的只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殷切心情”。施梯伯夫人沒有必要在3日被舍尔瓦尔咬伤，因为施梯伯先生是在4日才把手伸进舍尔瓦尔的嘴里去的。在吉佩里希的地址和重要指示被咽下一半之后，它們无須像从鯨魚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約拿^①那样完全从“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大嘴里爬出来。真正算得上奇迹的，不过是陪審員对奇迹的信仰，施梯伯竟敢郑重其事地向他們和盘托出他臆造的謊言。他們真不愧是“順民的愚昧”^②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

施梯伯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說：“在監獄里，我把舍尔瓦尔寄到倫敦去的一切原本报告都給他看了，結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觉我已了解

① 亚米太的儿子約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風大作，約拿被拋入海中，耶和华又安排一条大魚把他吞沒。約拿向耶和华禱告求饒，耶和华吩咐大魚把他吐到陆地上。（見旧約全書約拿書第二章）——譯者注

② 这是普魯士大臣馮·羅霍夫說的一句話。——編者注

一切，于是他就全都向我交代了。”

施梯伯最初拿給舍尔瓦尔看的東西，決不是舍尔瓦尔寄到倫敦去的那些原本報告，這些原本報告不過是施梯伯後來在柏林跟其他文件一起從迪茨的檔案上抄下來的。他最初拿給舍尔瓦尔看的是舍尔瓦尔剛剛收到的由奧斯渥特·迪茨署名的一封通知信以及維利希最近寫的幾封信。施梯伯究竟是怎樣弄到這些信的呢？原來當舍尔瓦尔同施梯伯及其夫人又咬又打的時候，勇敢的施米特-弗略里跑到舍尔瓦尔的太太（一個英國女人）那里去；他告訴她，——當然，這一位倫敦的德國商人弗略里是用英語跟她講的，——她的丈夫被捕了，危險得很，她可以把舍尔瓦尔的文件交給他，以免它們給舍尔瓦尔帶來更大的危害，舍尔瓦尔委托他把文件轉交給第三者。為了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使者，他拿出一頂白帽子來，這頂白帽子是他從舍尔瓦尔那里拿過去的，因為它的民主氣味太重。弗略里從舍尔瓦尔的太太那里弄到了這些信件，而施梯伯又從弗略里那里得到了它們。

不管怎樣，施梯伯現在已擁有比以往在倫敦時更為有利的作戰基地了。他偷到了迪茨的文件，同時還捏造了舍尔瓦尔的口供。這樣，他就迫使他的舍尔瓦尔（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供出“他同德國的聯繫”：

“據他說，他長期住在萊茵地區，在這中間，1848年住在科倫。在那里，他結識了馬克思，并被馬克思接收入盟。後來他在巴黎，在那里現有的一些人的基礎上積極協助擴大同盟。”

舍尔瓦尔是1846年在倫敦由沙佩爾介紹并接收入盟的，而馬克思當時在布魯塞爾，根本不是同盟²⁹⁵的盟員。可見，舍尔瓦尔不可能是1848年在科倫被馬克思接收加入該盟的。

三月革命爆发时，舍尔瓦尔到莱茵普魯士呆了几个星期，但后来他又从那里回到倫敦，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他一直呆在倫敦。这样看来，他在这一个时期不可能“在巴黎积极协助扩大同盟”；也許能創造发生事件的时间順序的奇迹的施梯伯还能創造空間的奇迹，甚至还能使第三者有一种分身的本領。

馬克思只是在1849年9月間离开巴黎之后，当他在倫敦加入了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时，才同包括舍尔瓦尔在內的几百名工人有了一面之交。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可能在1848年在科倫認識他。

舍尔瓦尔起初向施梯伯真实地交代了所有这些問題。施梯伯企图迫使他招假口供。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只有施梯伯本人的证詞才能說明这一点，因而，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对施梯伯來說，全部問題就在于使舍尔瓦尔同馬克思之間有一种虚构的联系，从而在科倫被告們和巴黎密謀之間制造一种人为的联系。

施梯伯剛剛需要 en détail [詳尽地] 述說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德国的联系和通信的問題的时候，他甚至連提也不提一下科倫，可是却洋洋自得地大談特談不倫瑞克的赫克、柏林的劳貝、美因茲的莱宁格尔和汉堡的提茨等等，等等，一句話，大談特談維利希—沙佩尔派。施梯伯說，这一派“手里”有“同盟的档案”。由于粗心大意，档案已从該派的手里轉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个档案里，他並沒有发现舍尔瓦尔在1850年9月15日倫敦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写給倫敦或者只写給馬克思个人的只言片語。

他通过施米特—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騙取了她丈夫的文件。但是，他仍然沒有发现舍尔瓦尔从馬克思那里得到的只言片語。为了帮助解除这种苦楚，施梯伯就口授而强迫舍尔瓦尔笔录：

“他和馬克思的关系很緊張，原因是，虽然中央委员会在科倫，但是馬克

思还是要求同他通信。”

如果施梯伯沒能发现馬克思同舍尔瓦尔之間在1850年9月15日以前的来往信件,那不过是由于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舍尔瓦尔同馬克思完全断絕了通信联系。Pends-toi, Figaro, 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費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普魯士政府偵查了一年半所搜集到的对付被告們的材料(一部分是由施梯伯本人提供的),否定了被告們同巴黎支部、同德法密謀的任何联系。

1850年6月的倫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证明:巴黎支部在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就已經解散了。迪茨的档案中的六封信证明,巴黎各支部是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倫以后由維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員阿·迈尔重新組織起来的。該档案中的巴黎总区部的信件证明:这个区部极端敌視科倫中央委员会。最后,法国的起訴书也证明:据以控告舍尔瓦尔及其同志的一切事件只是在1851年才发生的。因此,澤特(在11月8日的法庭上)竟不顾施梯伯的种种揭露,认为最好稍微暗示一下,馬克思派可能于某年某月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巴黎的某种密謀,但是他声称,他澤特根据上級指示,认为这是可能的,至于这个密謀的时间和密謀本身一概不知。那种纵談澤特有洞察力的德国报刊,它的迟鈍是可以想見的!

普魯士警察当局 *de longue main* [老早]就企图在公众面前把馬克思并通过馬克思把科倫被告們說成是参与德法密謀的一伙人。在审訊舍尔瓦尔的案件时,警探貝克曼給“科倫日报”寄去下面这样一个标有“1852年2月25日于巴黎”字样的簡訊:

^① 博馬舍“疯狂的日子,或費加罗的婚礼”。——編者注

“有些被告已經潛逃，其中一個名叫阿·邁爾的人，據說是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在這以後，“科倫日報”刊登了馬克思的一個聲明，聲明說：“阿·邁爾是沙佩爾先生和前普魯士陸軍中尉維利希的一個密友，他同馬克思毫不相干。”^①現在，就連施梯伯本人在他的1852年10月18日的証詞中也聲稱：“1850年9月15日在倫敦被馬克思派開除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們派遣阿·邁爾到法國去”云云，甚至还引証了阿·邁爾同沙佩爾—維利希的來往信件。

“馬克思派”的成員之一——康拉德·施拉姆在外國人受迫害的情況下，於1851年9月間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里和其他五六十個顧客一起被捕了；他被控犯有參與愛爾蘭人舍爾瓦爾所領導的密謀罪，把他監禁了將近兩個月。10月16日，一個德國人在警察局的監獄里訪問了他，向他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我是普魯士官員。您知道，在德國各地，特別是在科倫，由於共產主義協會的被破獲，已經有許多人被逮捕。只要信上一提到什麼人的名字，他就要遭到逮捕。目前，政府當局的處境相當尷尬，因為它逮捕了許多人，但不知道他們是否同這個案子有某種關係。我們知道，您並沒有參加過 *complot franco-allemand* [法德密謀]，相反地，您很熟悉馬克思和恩格斯，您無疑很了解德國共產主義聯合會的一切詳情。假如您能給我們提供有關這一方面的必要情報，並願意比較準確地指出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人是無罪的，那我們將感激不盡。這樣，您就能幫助許多人獲得釋放。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您的話寫成正式記錄。您不必為這種話擔心”等等。

當然，施拉姆向普魯士國家的這一位笑里藏刀的官員下了逐客令，並向法國內閣提出抗議，抗議這類訪問，於是，施拉姆在10月底被驅逐出法國。

^① 見本卷第257頁。——編者注

关于施拉姆是“馬克思派”的成員，这一点是普魯士警察当局从迪茨那里发现的关于退出工人协会的一项声明中了解到的。关于“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謀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普魯士警察当局自己向施拉姆承认过的。如果“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謀之間的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末，这不可能是科倫发生，而只能是在巴黎发生，因为該派的一个成員跟舍尔瓦尔同时在那里坐牢。但是，普魯士政府最怕舍尔瓦尔和施拉姆之間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事先会把政府当局希望从巴黎案件中得到的、用以对付科倫被告們的全部結果統統推翻。法国的法院偵查員在釋放施拉姆时作出的判決，承认科倫案件和巴黎密謀毫无关系。

施梯伯还作了最后的尝试：

“至于上述的法国共产党人的头子——舍尔瓦尔，人們长期以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誰，但是毫无結果。最后，从馬克思本人向一个警探所作的一项秘密声明中才弄清楚，原来此人曾因伪造期票被关进亚琛監獄，1845年越獄潛逃，1848年，在当时的一片混乱情况下被馬克思接收入盟，并以同盟特派員的身分被派往巴黎。”

馬克思不可能告訴这位 *spiritus familiaris* [家神]——施梯伯的警探：他于1848年在科倫把早在1846年就被沙佩尔在倫敦接收入盟的舍尔瓦尔接收入盟；或者他曾迫使舍尔瓦尔住在倫敦，并迫使他在同一个时期內在巴黎亲自进行宣傳；同样，馬克思也不能在施梯伯提供证詞之前告訴施梯伯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老牌警探：舍尔瓦尔于1845年在亚琛坐过牢并伪造过期票，因为这一点他恰好是从施梯伯的证詞中知道的。也許这一类 *hysteron proteron* [逆序法]^① 是只允許施梯伯应用的。古代

^① 这是一种錯誤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 (*hysteron*) 当作最初的、前面的 (*proteron*)，把实际的順序顛倒过来。——編者注

世界留下了垂死的角斗士，普魯士國家會留下發誓的施梯伯^①。

很久很久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四處打聽，這個舍爾瓦爾到底是誰，但是毫無結果。9月2日晚上施梯伯到了巴黎。4日晚上舍爾瓦爾被捕，5日晚上他被從他的牢房押到一個燈光暗淡的房間里去。施梯伯在那里，跟施梯伯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法國警官、亞爾薩斯人，他的德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但是精通德語，並具有警察的記憶力；這個人對虛情假意的、卑躬屈節的柏林警務顧問並沒有特別的好感。於是，在這個法國官員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了如下的談話：

施梯伯用德語說：“您聽着，舍爾瓦爾先生，您的法國姓和愛爾蘭護照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我們很清楚。我們知道您是萊茵普魯士的居民。您的名字叫K·，您能否避免一切後果，這完全取決於您自己；您如果老老實實地把一切都向我們坦白出來，那就能達到這一點”如此等等。

舍爾瓦爾表示拒絕。

施梯伯說：“有這麼一個人，他偽造了期票並從普魯士監獄越獄潛逃，現已被法國當局引渡給普魯士，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您，您得考慮考慮，這是一個關係到十二年單獨監禁的問題。”

法國警官說：“我們給這個人時間，讓他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好好想一想。”

舍爾瓦爾被押回他的牢房。

當然，施梯伯不能把話說穿，他不能向公眾承認：他企圖用引渡和十二年單獨監禁的威脅手段來吓唬舍爾瓦爾，逼他招出假口供來。

但是，施梯伯仍然沒有打聽到，這個舍爾瓦爾到底是誰。他在陪審員面前仍然叫他舍爾瓦爾，而不是叫K·。不僅如此，施梯伯

^① 雙關語：《Stieber》〔施梯伯〕是姓，又有“偵探”、“暗探”的意思。——編者注

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在哪里。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他仍然推測那个人是在巴黎。辯护人施奈德尔第二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质問說：“曾經再三提到的舍尔瓦尔現在不是在倫敦嗎？”施梯伯理屈詞穷、狼狽不堪，只好回答說，“他不能透露有关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而只能重复那种說什么舍尔瓦尔躲在巴黎的謠傳”。

普魯士政府經常遭到厄运：它总是被愚弄。法国政府允許它从火中取出德法密謀之栗，但是不允許它把栗子吃掉。舍尔瓦尔竟能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它使他有可能在巴黎陪审法庭結束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后，过几天就跟吉佩里希一起逃到倫敦去。普魯士政府曾指望用舍尔瓦尔作为科倫案件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只不过为法国政府又物色了一个間諜²⁹⁶。

在舍尔瓦尔假逃跑的前一天，有一个普魯士的 faquin〔无賴汉〕来到他那里；这个人身穿黑礼服，鑲着袖头，留着一撮向上翘的黑胡子，短短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已經斑白了，总之，这是一个挺体面的男人。后来，据介紹，这个人是普魯士的警监格莱夫，随后他还作了自我介紹，也說他是格莱夫。格莱夫是凭他那个未經警察局长而直接从警务总长那里得到的通行证去会見舍尔瓦尔的。警务总长对哄騙他所心爱的普魯士人的那种主意大为开心。

格莱夫說：“我是普魯士官員，是奉命前来同您談判的；沒有我們，您永远出不去。我向您建議。您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它把您引渡給普魯士；它早就答应我們这样做了。我們需要您在那里作科倫的证人。当您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将来案件結束时，我們一定会把您釋放，决不食言。”

舍尔瓦尔說：“我沒有你們也能出去。”

格莱夫确有把握地說：“这不可能！”

格莱夫还召来了吉佩里希，建議他以共产党特派員的身分到

汉諾威去五天。而这个建議也沒有奏效。第二天，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就溜之大吉了。法国官員們洋洋得意，笑逐顏开，关于这一不幸事件的紧急情报已經发到柏林，而施梯伯在10月23日仍然发誓证明說，舍尔瓦尔是在巴黎；甚至在10月27日，他还是不能提供出任何情报，而只是从謠傳中得知舍尔瓦尔藏“在巴黎”。同时，警监格萊夫在科倫审讯期間曾三次到倫敦去訪問舍尔瓦尔，以期順便从他那里打听打听奈特在巴黎的住址，指望从他手里收买到对付科倫人的证詞。但是一无所获。

施梯伯有理由把他同舍尔瓦尔的关系隱瞞起来。因此，K·仍然是舍尔瓦尔，普魯士人仍然是爱尔兰人，施梯伯直到現在还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誰”^①。

在舍尔瓦尔同吉佩里希的来往信件中，澤肯多尔夫—澤特—施梯伯的三人合唱队終於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卡尔·穆尔是吸血鬼，
我把他当作榜样。”²⁹³

① 甚至在“黑书”²⁹⁷里，施梯伯还是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誰。在第2册的第33頁上，在№111下面提到了“舍尔瓦尔”，同时标出：“見克列美尔”，而在№116下面則說：“正如从№111中所看到的，克列美尔曾化名舍尔瓦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也用过弗兰克这个盟內代号。1853年（应当是1852年）2月，他（当时所用的名字是舍尔瓦尔）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八年監禁，但很快就逃出監獄，到倫敦去了。”在該书第2册里，載有嫌疑分子的履历史表（按字母順序排列并依次編号），但施梯伯在这一册里对舍尔瓦尔还是一无所知。他已經忘記了，他在第1册的第81頁上曾这样承认过：“舍尔瓦尔原来就是一个名叫約瑟夫·克列美尔的萊茵官員的儿子，他（好一个他！老子还是儿子？）竟濫用自己石版匠的手艺伪造票据，因而被捕，但在1844年他从科倫的（不对，从亚琛的！）監獄逃了出来，先到英国，后来又回到巴黎。”大家不妨把这一点同上面引证过的施梯伯在陪审員面前所提出的证詞比較一下。警察当局在任何时候都絕對不能說真話的。（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为了使舍尔瓦尔給吉佩里希的信深深地印在代表陪审法庭的三百名主要納稅者的頑固头脑里去，这封信被荣幸地宣讀了三遍。凡是熟悉內情的人，透过它那种天真的、吉卜賽人的热情，一眼就能識破这是一套企图吓唬自己和別人的小丑把戏。

其次，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民主派对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²⁹⁹的那种能奏奇效的力量抱有共同的希望；他們决定在这一天参加革命事变。施米特-弗略里妄图使这种固定观念具有計划的形式。这样一来，舍尔瓦尔及其同志就陷入了密謀的法律范疇。因此，通过他們就获得了一項证据：即使科倫的被告們沒有組織反对普魯士政府的密謀，那末，显然舍尔瓦尔派無論如何曾組織过反对法国的密謀。

普魯士政府企图通过施米特-弗略里来制造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巴黎密謀和科倫被告們之間的虛构的联系。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这种三位一体在舍尔瓦尔的密謀中起了主要作用。下面我們还会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情形。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一切概括如下：

甲是共和主义者，乙也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甲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乙受警察局的委托制造定时炸彈。甲因此被告发。如果制造定时炸彈的不是甲，而是乙，那末，甲的罪过就在于他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为了揭发甲，乙被召去作反对他的证人。这就是舍尔瓦尔密謀的可笑的一面。

当然，这类邏輯在公众面前已站不住脚了。施梯伯的“事实的”揭发已化为一股熏天臭气；檢察院只是訴苦說“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需要新的警察奇迹。

四

原本記錄

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庭长^①指出：“正像警務顧問施梯伯向他宣布的那樣，施梯伯還要提供新的重要證據”，為此，他要再一次把上述的證人召來。施梯伯向前蹦了一下，開始新的演出。

在這以前，施梯伯所描述的是維利希—沙佩爾派的活動，或者簡言之，舍爾瓦爾派的活動，即這一派在科倫被告們被捕以前和以後的活動。不論在被告們被捕以前或被捕以後，施梯伯關於他們本身都只字不提。舍爾瓦爾的密謀是發生在這些被告被捕以後，而施梯伯現在却說：

“在這以前，我在我的證詞中所描述的，只不過是這些被告被捕以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內部情況及其盟員的活動。”

這樣說來，他承認舍爾瓦爾的密謀“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內部情況及其盟員的活動”並沒有任何關係。他承認他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證詞是毫無用處的。他對他在10月18日提供的證詞太漠不關心，竟認為繼續把舍爾瓦爾和“馬克思派”混為一談簡直是多此一舉。

他說：“首先還存在着維利希派，在這以前，只抓到了該派中在巴黎的舍爾瓦爾，等等。”

① 即哥貝爾。——編者注

啊哈！这就是說，主要的首領舍尔瓦尔就是維利希派的首領。

但是，施梯伯現在应当提供**最重要的**报告，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重要的呵！如果不強調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詞的不重要性，那末这些最重要的报告就会失去它們的重要性。施梯伯暗示，在这以前，其实我什么也沒有报告，而只是現在我才开始。注意！在这以前，我报告的是跟被告們敌对的舍尔瓦尔派的情况，老实說，这同案件毫不相干。現在我来报告一下“馬克思派”的情况，所談的也只是該派在这次案件中的情况。可是，施梯伯不可能說得那么簡單明了。因此他这样說：“在这以前，我所描述的是被告們被捕**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現在，我要描述一下被告們被捕**以后的**同盟。”他甚至能够用他的那一套特技使純粹修辞上的詞句具有伪誓的性质。

科倫的被告們被捕以后，馬克思似乎組織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一点，可以从已故警察厅长舒耳茨悄悄地派进倫敦同盟并跟馬克思有直接来往的一个警探的证詞中看出来。”

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过記錄，而这个“**原本記錄**”目前在施梯伯手里。原本記錄证实了在萊茵省、在科倫，甚至就在法庭里的可怕的阴谋活动。記錄中載有被告們从監獄中跟馬克思通信的证据。一句話，迪茨的档案是旧約全书，而原本記錄則是新約全书。旧約全书是用結实的油布包装的，而新約全书則是用緋紅的皮面精装的。紅的皮面在任何情況下都是demonstratio ad oculos〔明显的证据〕，然而，現今的世界比多馬时代更不信神了；它甚至不相信亲眼看到的東西。自从摩門教³⁰⁰被發現以来，現在誰还相信旧約或新約全书呢？可是，同摩門教并非毫不相干的施梯伯却要

規定这样做。

“当然，”——摩門教徒施梯伯說，——“当然有人会反駁我說：这一切只不过是可鄙的警探們的胡說八道，但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說，——“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們所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可靠的。”

說得多好听呵！正确的证据和可靠的证据！而且还是充分的证据！充分的证据！而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施梯伯早就知道：

“馬克思同审前羈押的被告們进行秘密通信，但是我沒能发现他們通信的綫索。而在上个星期日，一位倫敦来的特別信使給我带来了一份报告說，进行这种通信的秘密地址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住在旧市場的当地商人德·科特斯的地址。这位信使还交給我一份倫敦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原本记录；这个本子是用錢从一个同盟盟員那里买到的。”

原来，施梯伯同警察厅长盖格尔和邮政总局勾結在一起了。

“好在曾經采取了必要的預防措施，要不然，再过两天，晚班的邮政人員就把寄給科特斯的信从倫敦运走了。根据最高檢察机关的命令，把信没收并把它拆开。在信里发现了馬克思亲笔写給律师施奈德尔第二的一个长达七頁的指示。信中指明应该怎样进行辯护…… 在信紙背面还写着一个大拉丁字母 **B**。照信抄了一份；把容易分开部分原信同原信封一起保存起来。然后把信装入信封；外勤警官接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一封信，該警官是被派去会見科特斯并向他介紹自己是馬克思的特派員的”等等。

接着，施梯伯描繪了一出卑鄙的、警察狗腿子式的喜剧：外勤警官怎样扮演馬克思的特派員，等等。10月18日，科特斯被捕，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声明說：标在信中收信人位置上的拉丁字母 **B** 指的是貝尔姆巴赫。10月19日，貝尔姆巴赫被捕，并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搜查。10月21日，科特斯和貝尔姆巴赫又被釋放了。

这个证詞是施梯伯在10月23日星期六提供的。“在上星期

天”，也就是10月17日的那个星期天，特別信使带着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記錄到来了；信使到达后两天，即10月19日，接到了寄給科特斯的信。可是，科特斯早在10月18日就由于外勤警官在10月17日轉交給他的那一封信而被捕了。可見，信到达科特斯手里要比带来科特斯的地址的那个信使早两天，或者說，科特斯10月18日被捕是由于他在10月19日才接到的那一封信。这难道不是時間順序的奇迹嗎？

后来，施梯伯被律師們追問得狼狽不堪，只好說，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記錄的那个信使是10月10日到达的。为什么是10月10日呢？因为10月10日也是星期天，同时对10月23日來說，也正好是“上”星期天，因此，以往关于上星期天的最初的說法仍然有效，从这一方面來說，伪誓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信就不是信使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而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接到的。現在，伪誓的对象已变成信，而不是信使了。施梯伯的誓言簡直就跟路德心目中的农民一模一样。如果帮助他从这一边爬上馬背，他就会从另一边滾下馬去。³⁰¹

最后，在11月3日的法庭上，从柏林来的警监戈德海姆这样說：10月11日，即星期一，从倫敦来的警监格萊夫已当着他 and 警察厅长維尔穆特的面把記錄本轉交給施梯伯了。这样，戈德海姆就是指控施梯伯犯有双重伪誓罪。

盖有倫敦邮局邮戳的原信封证明，馬克思是在10月14日星期四把写給科特斯的信交給邮局的。这样，信就应当在10月15日星期五晚上到达。因此，在接到信前两天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記錄的那个信使，应当在10月13日星期三出現。但是他既不可能在10月17日到达，也不可能10日或11日到达。

不管怎样，格萊夫这个信使毕竟已把他的原本記錄从倫敦帶給施梯伯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呢？施梯伯和他的同事格萊夫一样，也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没有馬上把它提交給法庭，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問題已經不是在馬扎斯³⁰²的監獄鐵窗后面所获得的口供。在这个时候，恰好收到了馬克思写的信。这帮了施梯伯的大忙。科特斯只起了姓名地址的作用，因为信本身并不是写給科特斯的，而是写給标在装在信封里的信紙背面上的那个拉丁字母B的。可見，科特斯实际上至多只是一个地址。不过，我們暫且假定这是一个秘密的地址。其次，暫且假定这是馬克思同科倫被告們通信的那个秘密地址。最后，暫且假定我們的倫敦警探們已委托同一个信使把原本記錄和这个秘密地址同时带走，信是在信使以及地址和記錄本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这样一来，我們便可以一箭双雕。一則，我們证明了同馬克思秘密通信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二則，我們证明了原本記錄的确实性。原本記錄的确实性为地址的正确性所证实，地址的正确性又为信件所证实。我們的警探們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地址和信件所证实，原本記錄的确实性又为我們的警探們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所证实。Quod erat demonstrandum. [这就是需要证明的。]接着是外勤警官演出的愉快的喜剧；后来又是秘密逮捕——公众、陪審員和被告本身都大为震惊。

但是施梯伯为什么不叫他的特別信使在10月13日到达呢，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嗎？因为不然的話，他便不成其为特別的了；因为，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順序是普魯士警務顧問的弱点，而翻閱普通的日历在他看来則是有失尊严的。除此之外，原来的信封是保存在他自己手里的；因此，誰能够弄清楚这件事呢？

可是，施梯伯在他的证詞中由于对某一事实諱莫如深，早就弄得声名狼籍了。如果他的警探知道科特斯的地址，那末，他們也就知道用装在信封里的信紙背面上的暗号 **B** 作为掩护的那个人了。施梯伯对拉丁字母 **B** 的秘密一无所知，因此竟在 10 月 17 日下令在監獄里搜查貝克尔，以便从他那里找到馬克思的信。他只是从科特斯的供詞中才知道字母 **B** 指的是貝尔姆巴赫。

可是，馬克思的信是怎样落到普魯士政府手里的呢？原因很简单。普魯士政府經常把委托給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倫案件审理期間，它特別爱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供許許多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

同真正的信使一起，原本記錄也无影无踪了。可是，当然，在 10 月 23 日的法庭上，当施梯伯洋洋得意地談他的新約全书，即紅皮书的內容的启示时，他还没有怀疑这一点。他的证詞的直接結果，就是以证人身分出席法庭的那个貝尔姆巴赫第二次遭到逮捕。

貝尔姆巴赫为什么第二次被捕呢？

因为从他那里查获了文件嗎？不是的，因为在他那里搜查之后又把他釋放了。他是在科特斯被捕以后二十四小时被捕的。可見，如果他那里有对他不利的文件，那末它們必定会不見了。究竟为什么要把证人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而让已被确定为不是了解同盟活动情况，就是参加同盟的那些证人——亨策、黑特采尔和施泰因根斯，安然无恙地坐在证人席上呢？

貝尔姆巴赫接到了馬克思的信，信中除了对起訴这件事情进行批評以外，并没有談到別的东西。施梯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信就摆在陪审員的面前。他不过是用警察式的誇張手法来叙述这一

事实的：“馬克思本人經常从倫敦对目前的案件予以影响。”同时，陪審員們給自己提出了像基佐曾向他的选民們提出过的問題，*Est-ce que vous vous sentez corrompus?*〔你們是否感到自己被收买了呢?〕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把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呢？普魯士政府从偵查一开始就力图在原則上系統地剝夺被告們进行辯护的种种手段。律師們由于直接同法律发生抵触，甚至在递上最后的起訴书之后，仍然被禁止同被告們进行联系，这一点他們曾經在公开审判时申訴过。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詞，从1851年8月5日起他手头就已經有迪茨的档案了。但是迪茨的档案並沒有附入起訴书內。只是在1852年10月18日举行的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才把它宣布了一下，同时也只是在有利于施梯伯的限度內宣布的。必需把陪審員、被告和公众弄得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必需把律師們弄得在警察式的意外行动面前束手无策。

而在提出原本記錄之后是怎样变得热心起来的呵！普魯士政府生怕揭穿。但貝尔姆巴赫从馬克思那里收到的是辯护材料：不难設想，他可能收到有关記錄本的說明。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了一项同馬克思通信的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就必然要妨碍每个普魯士公民交出自已的姓名地址来。A bon entendeur demi mot.〔对懂得的人來說，半句話就够了。〕貝尔姆巴赫的被监禁是为了排除辯护材料。貝尔姆巴赫要坐五个星期的牢。如果审判一結束就馬上把他釋放，那末，普魯士法庭无異就公开承认它是俯首貼耳、卑躬屈节地服从于普魯士警察当局的。貝尔姆巴赫是 ad〔为了〕普魯士法官的 *majorem gloriam*〔莫大的光荣〕而坐牢的。

施梯伯发誓作证說：

“在科倫被告們被捕之后，馬克思又在倫敦糾集了他的党的殘余分子，組織了一個大約由十八個人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等等。

這些殘余分子從來沒有散過伙，一直是糾集在一起的，因此他們從1850年9月起就經常組織 private society [私人團體]。施梯伯用一道最高當局的命令迫使它們消失，以便在科倫被告被捕之后用另一道最高當局的命令又使它們復活，並以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形式出現。

10月25日星期一，在倫敦收到一份“科倫日報”，上面刊載了關於施梯伯在10月23日所作的證詞的報告。

“馬克思派”既沒有建立過新的中央委員會，也沒有作過自己的會議的記錄。它很快就了解到，新約全書主要是由漢堡的威廉·希爾施捏造出來的。

1851年12月初，希爾施以共產主義流亡者的身分參加了“馬克思的協會”。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漢堡方面的來信揭發他是一個密探。可是當時決定允許他在協會里留一個時期，以便對他進行考察，獲得他究竟有罪還是無罪的證據。在1852年1月15日的集會上，曾宣讀了一封科倫來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的一位朋友告訴他說，審判照例延期，並說甚至親人也很難同被捕者見面。同時信中还提到了丹尼爾斯博士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集會以後，無論是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或者是在遠方都不見希爾施了。1852年2月2日，馬克思從科倫接到通知說，根據警察當局的秘密報告，曾在丹尼爾斯博士夫人那里進行了搜查；據這個秘密報告稱，丹尼爾斯夫人寫給馬克思的信似乎在倫敦共產主義協會里宣讀過，並且委托馬克思給丹尼爾斯博士夫人寫回信，說他，即馬克思，正在進行德國的同盟的改組工作等等。這個秘密報告被逐

字逐句地照抄在原本記錄的第一頁上。——馬克思立即回信說，因為丹尼爾斯夫人從來沒有給他寫過信，所以他不可能宣讀她寫給他的信。整個秘密報告是由一個叫希爾施的不正直的青年人捏造出來的；此人為了撈到錢，毫不費力氣地給普魯士警察當局編造它所必需的種種謊言。

從1月15日起，希爾施不見了，他不參加會議了；現在他已被最後開除出協會。同時還決定轉移協會的集會地點和改變開會日期。在這以前，照例是每星期四在西蒂區的法林頓街商場內約·威·馬斯特爾斯家裏集會的。現在，會議日期改在星期三，地點改在索荷區王冠街上的“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警察廳長舒耳茨能夠使希爾施不聲不響地直接接近馬克思”，儘管有了這種“接近”，但是希爾施過了八個月還是不知道協會的集會地點和開會日期。不論在2月以前或以後，他在編造“原本記錄”時，老是硬把會議編在星期四，并把會議標上“星期四”的字樣。只要翻開“科倫日報”，我們就會發現：1月15日（星期四）的記錄，以及1月29日（星期四）的記錄、3月4日（星期四）的記錄、5月13日（星期四）的記錄、5月20日（星期四）的記錄、7月22日（星期四）的記錄、7月29日（星期四）的記錄、9月23日（星期四）的記錄、9月30日（星期四）的記錄。

“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向馬爾波羅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如下的聲明：“馬克思博士的協會”從1852年2月起每逢星期三都在他的店裏集會。希爾施硬說李卜克內西和林格斯是他的原本記錄的記錄員，他們在上述的治安法官面前出示了自己的簽名。最後，還弄到了希爾施在施泰翰工人協會³⁰³里所作的記錄，因此，就可以把他的筆迹同原本記錄上的筆迹加以比較。

可見，原本記錄已證明是捏造的，甚至在这里沒有必要對它的內容進行批判，因為它的內容由於本身矛盾百出已不攻自破了。

困難在於把文件送給律師。普魯士郵局只不過是從普魯士國境一直布置到科倫的一種前哨^①，其目的在於切斷對辯護人的武器供應。

人們不得不通過迂迴曲折的道路進行這項工作，以致10月25日寄出的第一批文件，直到10月30日才能到達科倫。

因此，律師們一開始就只好使用在科倫能夠得到的一點點辯護材料。施梯伯受到了第一次打擊，這種打擊是來自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方面的。法律顧問、丹尼爾斯博士的岳父、可敬的法學家、因思想保守而著名的市民彌勒，10月26日在“科倫日報”上發表聲明說，他的女兒從來沒有同馬克思通過信，施梯伯的原本記錄是一種“欺騙”。1852年2月3日寄往科倫的信——信中馬克思說希爾施是個警探，是偽造警察情報的人——是偶爾被發現並交給了辯護人的。在“馬克思派”關於退出大磨坊街協會的聲明（該聲明存放在迪茨的檔案里）中，發現了W·李卜克內西的真正筆迹。最後，律師施奈德爾第二從科倫濟貧所的秘書比恩包姆那里收到了李卜克內西的親筆原信，從私人文書施米茨那里收到了林格斯的親筆原信。在法庭秘書處，律師們一方面把記錄本同退出協會的聲明中的李卜克內西的筆迹作了比較，另一方面又把記錄本同林格斯和李卜克內西的信件作了比較。

已被法律顧問彌勒的聲明弄得心慌意亂的施梯伯，得到了有不祥之兆的研究筆迹的消息。為了預防帶有威脅性的打擊，他在

① 雙關語：◀Post▶是“郵局”；◀Vorposten▶是“前哨”。——編者注

10月27日的法庭上又插嘴进来，声明說：

“李卜克內西在記錄本上的签名同已經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他的各次签名迥然不同，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怀疑。因此，他作了一番較為詳細的調查以后，才發現該記錄的签名人原来叫做H·李卜克內西，而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李卜克內西这个姓的前面，写的是字母——W。”

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质問道：“誰告訴他还有一个H·李卜克內西”，施梯伯拒絕回答。施奈德尔第二又問他，林格斯和烏尔麦尔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們这两个記錄的姓是跟李卜克內西的姓同时在記錄本上出現的。施梯伯感到面临着新的威胁。他三次假装沒有听见別人提出的問題，竭力掩飾自己的慌張，又拚命保持鎮定，一連三次毫无理由地嘮叨什么他是怎样得到記錄本的。最后，他支吾其詞，喃喃自語地說，林格斯和烏尔麦尔也許不是真名，而只不过是“盟內代号”。对于記錄本上經常提到丹尼尔斯夫人是馬克思的通信人一事，施梯伯这样解釋說，可能需要讀作：丹尼尔斯博士夫人，而需要把这理解为公证人貝尔姆巴赫的助手。律师馮·洪特海姆問他希尔施是个什么样的人。施梯伯发誓作证說：

“他也不認識这个希尔施。但是据傳这个人并不是普魯士警探，原因是普魯士方面曾經对这个希尔施本人进行过監視。”

施梯伯作了一下手势，于是戈德海姆就急忙地发出尖叫：“1851年10月，他曾經被派到汉堡去捉拿希尔施。”我們將要看到，同是这一个戈德海姆，就在第二天又被派到倫敦去捉拿同一个希尔施。由此可見，硬說什么用現款向流亡者收买过迪茨的档案和原本記錄的同一个施梯伯，現在又硬說希尔施不可能是普魯士警探，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他說来成为流亡者已經足够了，因为施梯伯保证他的絕對受贿或者絕對清廉是以需要为轉移的。但

是，施梯伯本人在11月3日的法庭上宣布弗略里是警探，难道这一个弗略里不是政治流亡者嗎？

在已发现施梯伯的原本記錄漏洞百出以后，他在10月27日还恬不知耻地說，“他对原本記錄的真实性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

在10月29日的法庭上，鉴定人把由比恩包姆和施米茨轉交来的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两人的信件同記錄本作了一番比較以后，声称，記錄本上的签字是捏造的。

檢察长澤肯多尔夫在起訴詞中說：

“在記錄本上发现的材料是同通过别的途徑获得的材料相吻合的。但是檢察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記錄本是真实的。”

这个本子是眞的，可就是缺乏证明其眞实性的证据。新約全书呵！澤肯多尔夫繼續說道：

“不过，辯护詞本身已經证明，記錄本里至少包含有許多眞实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关于在那里提到的林格斯的活動情报，而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林格斯的活動情况，那末記錄本也不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报。因此，在記錄本里談到的有关林格斯的活動的一切，不可能证明記錄本的内容，而就其形式來說，倒能够证明“馬克思派”的一个成員在記錄本上的签字确系捏造。可見，用澤肯多尔夫的話來說，这一切证明了：“記錄本里至少包含有許多眞实的东西”，——也就是眞正的捏造。檢察长（澤特—澤肯多尔夫）和邮政总局同施梯伯一道拆开了寄給科特斯的信。可見他們知道信件到达的日期；因此他們知道，当施梯伯最初发誓作証說信使是17日到达的，后来又說是10月10日到达

的，最初是在 19 日接到信的，后来又說是在 12 日接到的時候，他是在違反誓約。他們都是他的同謀者。

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妄圖保持鎮定。他擔心有朝一日可能從倫敦收到揭發性的文件。施梯伯感到情況不妙，同樣，由他所體現出來的普魯士國家也感到情況不妙。已經到了被當眾揭露的地步。因此，10 月 28 日警監戈德海姆被派往倫敦去拯救祖國。戈德海姆在倫敦干了些什麼呢？他企圖在格萊夫和弗略里的協助下驅使希爾施到科倫去，以 H·李卜克內西的名義發誓證明記錄本的真實性。給予希爾施固定的國家津貼。但是希爾施的警察本性發展得並不亞於戈德海姆。希爾施知道，他既不是檢察官，也不是警監，也不是警務顧問，因此他沒有違反誓約的特權。希爾施已預感到，一旦事情搞糟了，他就會孤立無援。希爾施不願變成羊^①，尤其不願變成替罪羊。希爾施斷然拒絕了。但是光榮仍然留給普魯士的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因為它曾企圖在關係到它的那些被告同胞的腦袋這樣一個刑事案件中雇用假證人。

這樣一來，戈德海姆就毫無結果地回到了科倫。

在 11 月 3 日的法庭上，在起訴詞結束之後和辯護詞開始之前，施梯伯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地突然插嘴進來：

施梯伯發誓作證說：“他應對記錄本作進一步的調查。他已派警監戈德海姆從科倫到倫敦去，委託他去進行這一調查工作。戈德海姆是 10 月 28 日離開的，而是在 11 月 2 日回來的。戈德海姆現在就在這裡。”

戈德海姆按照他的上司的手勢，慢吞吞地走了出來，發誓作證說：

① 雙關語：«Hirsch» [希爾施] 是姓，但也有“鹿”的意思。——編者注

“他到倫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監格萊夫，格萊夫把他帶到城区肯辛頓去找警探弗略里，即把記錄本轉交給格萊夫的那個警探。弗略里向他——証人戈德海姆承認了這一點，並証實他的確是從一個名叫H·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派成員那里得到記錄本的。弗略里毫不猶豫地承認了H·李卜克內西出賣記錄本的收款條屬實。証人在倫敦未能抓到這個李卜克內西，據弗略里斷定，因為后者害怕公開露面。他這個証人在倫敦確信：除了某些錯誤以外，記錄本的內容是**完全靠得住的**。尤其是，幾個曾參加過馬克思召集的許多次會議的可靠警探向他証實了這一點，但這個本子並不是原本記錄，而只是載有馬克思召集的許多次會議的開會情況的**筆記本**。這樣看來，要解釋還沒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來源問題，只有以下兩個辦法：或者是像警探堅決保證的那樣，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他為了掩蓋自己的叛變行為，因而不用自己的筆跡書寫；或者是警探弗略里從馬克思的其他兩個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記錄本的札記，同時為了抬高自己的貨物的價格，而使這個札記具有原本記錄的形式。要知道，通過警監格萊夫已經正式確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來往頻繁…… 証人戈德海姆斷言：他在倫敦確信，以往關於馬克思召集的秘密會議、倫敦同科倫之間的聯繫、秘密通信等等的一切情報都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為了證明倫敦的普魯士警探們就在目前消息還是怎樣靈通，証人戈德海姆報告說，10月27日在馬克思那里召開了一次絕密的會議；會上討論了對付記錄本所必須採取的措施，特別是對付那個對倫敦黨來說最頭痛的警務顧問施梯伯所必須採取的措施。把有關的決議和文件絕密地寄給了律師施奈德爾第二。就在寄給施奈德爾第二的文件中還有一封私人信件。這封信是施梯伯本人在1848年寫給在科倫的馬克思的，馬克思把它保管得極其嚴密，因為他希望用這封信來敗壞証人施梯伯的聲譽。”

証人施梯伯插嘴說，他當時由於遭到無恥的誹謗而寫信給馬克思，說要控告他，等等。

“除了我和馬克思，任何人都可能知道這件事情，當然，這是來自倫敦的種種情報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證明。”

這樣一來，按照戈德海姆的意見，原本記錄除了不正確的部分

以外，是“完全靠得住的”。戈德海姆之所以确信它的可靠性，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原本记录根本不是什么原本记录，而只不过是“笔记本”。而施梯伯呢？施梯伯决不会感到自己是从极乐世界中跌了下来，相反地，他倒觉得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了地。在最后一瞬间，原告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施梯伯就通过他的戈德海姆一下子把原本记录变成了笔记本。如果两个警察彼此揭露对方的谎言，那末，这是不是表明他们两个人都献身于真理呢？施梯伯利用戈德海姆来掩护他的退却。

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在这以后，谁不会发誓作证说，可怜的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在一道到达住在老远的城区肯辛顿的弗略里那儿以前，简直就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警监格莱夫是住在警探弗略里的家里的，而且正好是住在弗略里家的楼上的，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格莱夫带戈德海姆去找弗略里，相反地，是弗略里带戈德海姆去找格莱夫。

“住在城区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多么准确呀！普鲁士政府把自己的间谍也揭露出来了，指出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把他们全都暴露了，这样，你们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吗！如果记录本是伪造的，那只好请你们去找“住在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了。真妙！去找十三区的私人文书比埃尔。要知道，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指明这个或那个人，那末，就不但要叫出他的姓，而且要叫出他的名。不是弗略里，而是查理·弗略里。人们要指出这个人公开进行的某种活动，而不是他秘密从事的职业。可见，这是商人查理·弗略里，而不是警探弗略里。而当人们想要说出这个人的住址时，就不

但要指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倫敦的一个区，而且要指明区、街、門牌號碼。因此，并不是肯辛頓的警探弗略里，而是肯辛頓区維多利亞路 17 号的商人查理·弗略里。

可是，“警监格萊夫”，这至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說法。但是，如果警监格萊夫在倫敦把自己列入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之內，并从警监变成 attaché〔隨員〕，这是跟审判毫无关系的多么 attachement〔令人依恋的人物〕。心的意向就是命运的声音。

因此，正像警监戈德海姆所保证的一样，警探弗略里也保证，他是从一个真的保证自己是 H·李卜克內西而且甚至把收款条交給弗略里的人那里得到記錄本的。戈德海姆在倫敦只是未能“逮住”这个 H·李卜克內西。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留在科倫，因为警务顧問施梯伯的保证由于下列情况而变得不太有分量了：他的这些保证只不过表现为由警监格萊夫所保证的警监戈德海姆的那些保证，而警探弗略里又为格萊夫效劳，保证了他的保证。

戈德海姆并不以自己的那一套聊以自慰的倫敦經歷而感到难堪，同时他还以他所固有的那种巨大自信力（它必然要代替他的判断力）“完全”相信，施梯伯关于“馬克思派”、关于它同科倫的联系等等所发誓作证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現在，当他的部下戈德海姆把 testimonium paupertatis〔赤貧证明书〕交給他的时候，难道警务顧問施梯伯还没有被掩护起来嗎？施梯伯通过他那一套发誓作证的伎俩获得了这样一种結果：他把普魯士的教阶制头脚顛倒过来了。你們不相信警务顧問嗎？好。他已敗坏了自己的声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們就会相信警监。你們不相信警监嗎？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們至少会相信警探，

alias mouchardus vulgaris [換言之,即普通的密探],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就是發誓的施梯伯所製造的異教徒的概念混亂。

戈德海姆直到現在還證明說,正如他在倫敦所確信的那樣,原本記錄是不存在的,而關於H·李卜克內西的存在,他只能肯定說,在倫敦沒有能“逮住”他;正因為這樣,他就確信施梯伯關於“馬克思派”的“一切”證詞都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在這以後,除了這些否定的論據(按照澤肯多爾夫說法,其中包含“許多真實的東西”)之外,他最終還是不得不提供肯定的論據,來證明“倫敦的普魯士警探們就在目前消息還是怎樣靈通”。他引用了下列情報作為典型例子:10月27日“在馬克思那里召開了一次絕密的會議”。在這次絕密的會議上,討論了對付記錄本和“最令人頭痛的”警務顧問施梯伯所必須採取的措施。把有關的命令和指示“絕密地寄給了律師施奈德爾第二”。

雖然普魯士警探們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是這些信件的發送路線對他們來說還是“絕密的”,因此,儘管郵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扣押這些信件。不妨聽一聽蟋蟀^①是怎樣在斷垣殘壁的窟窿里憂郁地唧唧叫的:“把有關的信件和文件絕密地寄給了律師施奈德爾第二”。對戈德海姆的密探們來說,是絕密的。

關於記錄本的無中生有的決議不可能是在10月27日在馬克思那里召開的絕密會議上通過的,因為馬克思在10月25日就已經把證明記錄本是捏造的那些基本材料寄走了,雖然不是寄給施奈德爾第二,而是寄給馮·洪特海姆先生。

文件畢竟寄到了科倫,這向警察當局暗示的不僅是它的良心

^① 雙關語:《Heimchen》——“蟋蟀”,這個詞和Goldheim〔戈德海姆〕這個姓諧音。——編者注

的不純潔。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倫敦。10月30日，他在“晨報”、“旁觀者”、“觀察家”、“先驅報”以及“人民”上發現了一項由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馬克思和沃尔弗署名的聲明^①；這些人在聲明中要求英國公眾注意辯護人對 forgery, perjury, falsification of documents [捏造、違反誓言、偽造文件]，總之對普魯士警察當局所干的卑劣行徑所進行的揭發。發送文件是如此“絕密”，以致“馬克思派”把這件事公開地告知英國公眾，誠然，這只是在10月30日，即戈德海姆到达倫敦和科倫收到文件以後的事。

然而，就是在10月27日，也曾往科倫寄送過文件。無所不知的普魯士警察當局是從哪里了解到這件事情的呢？

普魯士警察當局的活動並不像“馬克思派”那樣絕密。相反地，它在這以前的幾個星期里就已完全公開地在馬克思的住宅前面安排了兩名密探，他們 du soir jusqu'au matin, du matin jusqu'au soir [從晚到早、從早到晚] 都在街上監視他，跟踪他。於是，馬克思於10月27日在馬爾波羅街的完全公開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國各報的採訪記者正式確證絕密的文件，在這些文件上有李卜克內西和林格斯的親手筆迹以及“王冠”小酒店老板關於會議日期的証詞。普魯士的守護天使們跟踪他，從他的住所跟到馬爾波羅街，從馬爾波羅街跟到他的住所，又從他的住所跟到郵局。他們只是在馬克思絕密地到區的治安法官那里去，要求他下令逮捕這兩名“盯梢”時才溜之大吉。

但是，普魯士政府還有一條門路。這就是，馬克思直接通過郵局把10月27日確證過並標有“10月27日”字樣的文件寄到科倫，

^① 見本卷第429—430頁。——編者注

以防普魯士之鷹的利爪抓走這些文件的絕密地寄出的副本。所以，科倫郵局和警察當局知道標有“10月27日”字樣的文件是由馬克思寄出的，而戈德海姆就大可不必前往倫敦去揭露這個秘密。

最後，戈德海姆感到，他必須從“10月27日召開的絕密會議”上“特別”決定寄給施奈德爾第二的那些東西中“特別”指出某種東西來，而他舉出了施梯伯寫給馬克思的信。但遺憾的是，馬克思寄這封信的日子並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10月25日，而且並不是寄給施奈德爾第二，而是寄給馮·洪特海姆先生。可是，警察當局是從哪里知道馬克思還把施梯伯的信保存起來並準備把它寄給辯護人呢？還是讓施梯伯再出面來談一談。

施梯伯打算採取 *praevenire* [先發制人的行動] 來阻止施奈德爾第二把對他來說如此“令人頭痛的信件”公開出去。假如戈德海姆說，我的信是在施奈德爾第二那里，據施梯伯的估計，而且還是由於“同馬克思有罪惡的聯繫”而得到信的，那末，施奈德爾第二就會把這封信隱藏起來，借以證明戈德海姆的密探們的消息不確實，證明他本人同馬克思並沒有罪惡的聯繫。因此，施梯伯插了嘴，歪曲信的內容，最後還以盛氣凌人的叫喊聲結束他的話：“除了我和馬克思，任何人都可能知道這件事情，當然，這是來自倫敦的種種情報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證明。”

施梯伯有一套別出心裁的手法，用以掩蓋那種使他感到頭痛的秘密。當他不說話的時候，所有的人也必須保持沉默。因此，除了他和一位上了年紀的貴夫人之外，“任何人都可能知道”：他曾經作為她的 *homme entretenu* [面首] 住在魏瑪附近。但是，如果施梯伯有種種理由力求使馬克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信的內容，那末馬克思就有種種理由力求使施梯伯以外的一切人都知道

这封信的内容。现在我们知道了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那末施梯伯的最坏的证明究竟是怎样的呢？

但是，当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什么“除了我和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在有意識地違背誓言。他知道，并不是馬克思，而是“新萊茵报”的另一位編輯給他回信的³⁰⁴。無論如何这还是“除了他和馬克思之外的一个人”。我們不妨在这里引证一下这封信，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容。

在“新萊茵报”第 77 号上刊登了一篇 12 月 21 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訊报道，通訊中无耻地捏造說，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以一个有民主主义思想方式的人的姿态去偵查杀害利希諾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將軍的罪犯的。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 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調解当地居民馮·施韦茨勒尔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經有很长時間了。此外，我不妨介紹您去看一下 12 月 21 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 338 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 248 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謠。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馬上把所附的辟謠刊登在貴报上，并代我正告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謠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懲罰，否則，非常遺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編輯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貢獻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謂民主派)早已从戰場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終不倦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繼續到現在。如果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現的迟鈍。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謠言，最初是由“新普魯士报”这家声名狼籍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妨碍这家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駁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謊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

官員，普魯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

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密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諛奉迎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騎士大街65号

施梯伯从哪里知道，馬克思是在10月27日把他的信寄給施奈德尔第二的呢？但是，信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在10月25日寄的；不是寄給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給馮·洪特海姆的。可見，施梯伯只知道这封信还存在，并推測馬克思将把信告訴辯护人中的某一个。可是，这类推測有什么根据呢？当載有施梯伯10月18日提供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詞的“科倫日报”到达倫敦时，馬克思給“科倫日报”、柏林“国民报”和“法兰克福报”写了一个声明（載于10月21日），他在声明的結尾用他的还保存着的信威胁施梯伯。为了把信保守“绝对秘密”，馬克思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信的声明。由于德国的报纸胆小怕事，他遭到了失敗，但从此普魯士邮局便聞名了，而同普魯士邮局一道，它的施梯伯也聞名了。

这样，唧唧叫的戈德海姆从倫敦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这就是：希尔施并不发誓作伪证；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并不是“可感触到的”；原本记录根本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倫敦密探們知道“馬克思派”在倫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魯士密探們的名誉，戈德海姆把用拆信和偷信的办法探出的①一点

点消息說了出来。

在11月4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尔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記錄本，揭穿了他的借口和違反誓約的勾当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插嘴进去，并且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大家甚至竟敢指責維尔穆特先生、警察厅长維尔穆特先生違背誓言。可見，施梯伯又回到正統的教阶制的上升阶梯上来了。在过去，他是按照異端的、按照下降阶梯移动的。如果大家不願相信他——警務顧問，那就必須相信他的警監；如果不願相信警監，那就必須相信这位警監的警探；如果不願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終究要相信下級警探希尔施。而現在則相反。他这位警務顧問似乎可以提供假誓言；而警察厅长維尔穆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憤慨时，他就用愈来愈痛苦的心情去頌揚維尔穆特^②，他就用最純洁的維尔穆特、作为人的維尔穆特、作为律师的維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維尔穆特、作为警察厅长的維尔穆特、for ever〔不朽的〕維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現在公开审判时，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計地把被告們 au secret〔完全隔离〕^③，并在辯护人和辯护材料之間豎起一道屏障。他指控施奈德尔第二跟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說什么施奈德尔侵害了以他为代表的普魯士最高当局。就連陪审法庭庭长哥貝尔、就連哥貝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沉重压力。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必然性：尽管他謹小慎微、卑躬屈节，他也要在施梯伯背上抽几

① 双关語：《aufgestieberte》——“探出的”这个形容詞是与 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諧音。——編者注

② 双关語：《Wermut》〔維尔穆特〕也有“痛苦”、“苦艾”、“苦艾酒”的意思。——編者注

③ 直譯是：单独監禁。——編者注

鞭子。不过施梯伯自持正确。因为弄得臭名远扬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檢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內閣、普魯士駐倫敦大使館——一句話，整个普魯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記錄。

現在施梯伯先生允許刊登“新萊茵报”給他的回信。

可是，讓我們跟戈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头來談談倫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根据戈德海姆的証詞（在11月3日的法庭上），記錄本的来源也还没有弄清楚。戈德海姆为了說明記錄本的来源，作了两个假定。

他說：“要解釋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問題，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密探所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W·李卜克內西是属于“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記錄本上李卜克內西的签名并不是W·李卜克內西。因此，施梯伯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証說，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W·李卜克內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內西的，即一个叫做H·李卜克內西的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同姓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的消息的来源。戈德海姆发誓作証說：“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叫做H·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派成員那里得到記錄本的。”接着，戈德海姆还发誓作証說，“他在倫敦未能抓到这个H·李卜克內西”。那末，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H·李卜克內西究竟給世界，特别是給警监戈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他在原本記錄上的笔迹之外，沒有提供任何存在标志；但是，戈德海姆現在声明：“李卜克內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H·李卜克內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現

在，H·李卜克內西什么也沒有留下，甚至連筆迹也沒有留下，甚至連一个字母也沒有留下。可是，戈德海姆从哪儿知道H·李卜克內西(戈德海姆只是根据記錄本上的筆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与記錄本上的筆迹不同的另一种筆迹书写的，这一点直到現在仍然是戈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創造自己的奇迹，那末戈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創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德海姆忘記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經發誓保證過H·李卜克內西確有其人，忘記了他自己剛剛也發過這種誓。但是就在他發誓作證說什么H·李卜克內西確有其人的同時，他想起了H·李卜克內西是施梯伯不得不採用的一種遁詞，是不得不散布的一種謊言，而情急就不顧法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內西，即W·李卜克內西，如果說W·李卜克內西是真的，那末記錄本上的簽名便是假造的。他不敢承認，弗略里的下屬希爾施，除偽造了原本記錄以外還偽造了簽名。因此，他作了一個假定：“李卜克內西不用自己的筆迹書寫”。我們也不妨來作一假定：戈德海姆過去一度偽造過鈔票。他受到了法庭審判，經查明，鈔票上面的簽字并不是銀行經理的簽字。戈德海姆會這樣說，先生們，請不要曲解我的話，請不要曲解我的話！鈔票是真的。它出自銀行經理本人之手。如果他的姓不是他本人簽上的，而是別人偽造的，那末這同事情有什么關係呢？“原來他不用自己的筆迹書寫”。

戈德海姆繼續說道，如果關於李卜克內西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末，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從馬克思的其他兩個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了記錄本的札記，同時為了抬高自己的貨物的價格，而使這個札記具有原本記錄的形式。要知道，通過警監格萊夫已經正式確定，德朗克和

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頻繁。”

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呢？如果类似原本記錄的記錄本是由李卜克內西、林格斯和烏尔麦尔三个人签署的，那末，誰也不会从这里得出結論說，“它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伊曼特之手，而所有的人都会說，它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或者出自林格斯和烏尔麦尔之手。不幸的戈德海姆一下子就提高到分开的判断——或者，或者，——难道他还要說“林格斯和烏尔麦尔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嗎？就連戈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別的说法。

正像密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樣，如果原本記錄不是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那末，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編造的，但他是从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記錄本的札記的。关于他們，警监格萊夫已經正式确定，他們同弗略里来往頻繁。

戈德海姆說，“为了抬高自己的貨物的价格”，弗略里使这个札記具有原本記錄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騙，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貨物的价格”。像这位普魯士密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贪图私利而編造假記錄并伪造签名），无论如何都不会編造假札記。这就是戈德海姆的結論。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 1852 年 4 月間，即在他們被瑞士当局驅逐出境之后才到倫敦的。但是原本記錄的三分之一是由 1852 年 1 月、2 月和 3 月的記錄組成的。可見，原本記錄中有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是弗略里在沒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場的情況下編造出来的，虽然戈德海姆也发誓說，或者記錄本是由李卜克內西編出来的，或者是由弗略里編出来的，然而是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札記編出来的。戈德海姆对此发誓，而戈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魯士斯，但

毕竟是戈德海姆。

可是，还是这样假定，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4月以来就已经把札記交給弗略里了，因为戈德海姆发誓說，“通过警监格萊夫已經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頻繁”。

現在讓我們来談談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弗略里并不是作为普魯士警探在倫敦出名，而是作为西蒂区的商人、而且还是作为民主派商人在倫敦出名的。他是阿尔坦堡人，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倫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望和很富裕的家庭的英国女人結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老企业家、教友派信徒过着儉朴的生活。10月8日或9日，伊曼特以教員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私人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提出的詳細证詞，科倫是在10日收到原本記錄的，而根据戈德海姆的最后一次证詞，科倫則是在10月11日收到原本記錄的。可見，当弗略里素不相識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給他上第一課法文課时，他就不仅已經把原本記錄裝訂成紅皮精装本，而且已經把本子交給特別信使帶到科倫去了。弗略里原来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札記創造了自己的記錄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見過一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10月30日，当时原本記錄早已回到它那原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砸破写字台，偷走別人的文件，詐取假证詞，制造臆想的密謀，伪造文件，发伪誓，企图賄买假证人，一句話，不满足于为了判科倫被告們的罪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政府当局还竭力給被告們的倫敦朋友扣上骯髒的嫌疑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对于他，施梯伯发誓作证說，他并不認識他，而戈德海姆則作证說，他不是密探。

11月5日星期五，倫敦收到了一份“科倫日報”，上面刊載了有關陪審法庭於11月3日的開庭情況的報告，庭上聽取了戈德海姆的證詞。人們馬上打聽起格萊夫來了，就在同一天查明，他是住在弗略里那里的。與此同時，德朗克和伊曼特帶着“科倫日報”到弗略里那里去。他們硬要他讀一讀戈德海姆的證詞。弗略里面色蒼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裝驚奇的样子，說什麼他時刻準備在英國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駁斥戈德海姆的證詞。不過，他事先還必須跟他的律師商量一下。約好在第二天，即11月6日星期六下午見面。弗略里答應在這次見面時把他的已經官方證明的現成的證詞帶來。當然，他沒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在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去，在這裡他們發現了寫給伊曼特的這樣一個便條：

“在律師的幫助下，一切都已辦妥，一旦把人查明，就可進行下一步的工作。今天律師還寄來這件東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區去一趟，請明天到我這兒來，明天從午飯後到五點鐘我都在家。弗·”

在便條的背面還附着這樣幾句話：

“我剛剛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威納爾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這一點你們明天就會相信。你們準備什麼時候來，請寫信給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復：

“我十分驚奇，我現在竟沒有在您家里碰見您，因為您又沒來赴下午的約會。我要老實對您說，由於上述種種情況，我已經對您有意見了。如果您感到有必要說服我的話，那就請您到我那兒來，而且最遲明天早晨就去，因為我不能向您擔保，您這個普魯士間諜的活動不會成為英國報紙上的議題。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沒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在星期天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一趟（他們裝作對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

瞬間发生过动搖),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声明。不管怎样躊躇和动搖,声明还是写成了。当对弗略里說,他不但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姓,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动搖得特別厉害。声明的全文是:

致“科倫日报”編輯部

本人認識伊曼特先生大約有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間,他教我法文課,至于德朗克先生,我是在今年10月30日星期六才初次見到的;

他們两个人誰也沒有給我提供过同科倫案件中出現的記錄本有关的任何情报;

我并不認識任何叫李卜克內西的人,而且同这个人毫无联系。特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1852年11月8日于倫敦肯辛頓

当然,德朗克和伊曼特深信,弗略里会指令“科倫日报”不要接受有他的署名的任何声明的。因此,他們沒有把他的声明寄給“科倫日报”,而把它寄給了律師施奈德尔第二,可是,施奈德尔第二是在案件即将結束时才收到声明的,他已經无法加以利用了。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瑪丽花[Fleur de Marie]³⁰⁵,但他毕竟是一枝花^①,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 fleurs-de-lys [百合花]^②。

記錄本的历史到此还没有結束。

11月6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倫敦弯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声明,它无异发誓作证說,他本人在格萊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

① 双关語:«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是姓。——編者注

② 在法国土語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 T. F. (travaux forcés, 即苦役)称之为 Fleurs-de-lys [百合花]。馬克思究竟如何正确地描繪了这个人物,可以从附录(見下面第八章 № 1)³⁰⁶中看出。(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編造了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現的原本記錄。

这样一來，最初是“馬克思派”的原本記錄，接着是密探弗略里的筆記本，最后又成了普魯士警察当局的作品，單純的警察作品，*sans phrase*〔毫無粉飾的〕警察作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記錄的秘密的那一天，另一个普魯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頓弗略里家里大忙了一陣子，这一次却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件，而是把自己的家私什物包上了結实的油布。这只鳥儿不是別人，正是格萊夫^①，这是一位全巴黎都熟悉的人物、科倫的特別信使、倫敦的普魯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揮者、被派到普魯士大使館里去当随員的警监。格萊夫接到了普魯士政府的立即离开倫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誤。

在歌剧演出結束时，一直被側面布景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圓形逐級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五色灯光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的輪廓展現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魯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結束时，被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圓形逐級上升的这一个伪造原本記錄的小作坊也展現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資产者密探和 *agent provocateur*〔奸細〕、西蒂区的商人——弗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外交警监格萊夫；站在最高一个台阶上的則是格萊夫被派到那里去充当随員的那个普魯士大使館本身。在六个到八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的監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記錄。但是，在弗略里的上面

① 双关語：«Greif»〔格萊夫〕也有“兀鷹”的意思。——編者注

一层住的是普魯士警监格萊夫，他監視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萊夫本人照例地在普魯士大使館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時間，在那里也有人監視他并指导他。可見，普魯士大使館是原本記錄賴以生长的原来的温室^①。因此，格萊夫必然溜之大吉。他是在 1852 年 11 月 6 日溜走的。

原本記錄再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了，即使是筆記本也是如此。檢察官澤特在他回答律師們的辯護詞時已把这个記錄本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們又回到了上訴法院的檢察院鉴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发布的需要重新开始偵查的命令所由产生的那个出发点去了。

^① 在巴塞尔出版的 1853 年版本上，在这几个字后面还有其他版本上所沒有的两句話：“因此，格萊夫必然溜之大吉。在倫敦等待他的耻辱也落到了普魯士大使館的身上了。”——編者注

五

“紅色問答书”的附函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員**荣克尔曼**提供了如下的证詞：

“他沒收了一个包有几本‘紅色問答书’的小包裹，是寄給克雷弗尔得的一家旅館的招待員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个附函。发信人不詳。”“据檢察机关說，看来附函是出自**馬克思**之手。”

在10月28日的法庭上，鉴定人(???)**萊納德**认为，附函是**馬克思**写的。这一附函是这样写的：

公民！

因为我們完全信任您，所以我們現在把五十本“紅色問答书”寄給您，您务必在6月5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钟把它們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們、最好是工人們的家門里去。我們滿怀信心地指望您的那种公民的英勇行为，因此我們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誼

革命委員會

1852年5月于柏林

证人**荣克尔曼**还說，“上面提到的包裹是寄給证人**基安奈拉**的”。

在科倫被告們的审前羈押期間，柏林的警察总监**辛凱尔迪**充当了总指揮，他領導着耍了种种手腕。他不讓**莫帕**专美于前。

在法庭辯論時，到場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警务顧問——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經常从倫敦跑科倫，另一个則經常从科倫跑倫敦；許許多多警探和下級警探，他們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門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員。

載有 10 月 27 日和 28 日的证人证詞的那份“科倫日报”一到倫敦，馬克思就到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倫日报”上引证的附函全文轉抄了下来，并請求予以证实；同时，他作了相当于誓詞的如下的声明：

- (1) 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 (2) 他只是从“科倫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 (3) 他从未見過所謂的“紅色問答書”；
- (4) 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紅色問答書”。

应当順便指出，这个声明 (declaration) 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如果它是假的，那末，在英国就会招致違背誓言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經寄給施奈德尔第二，同时还发表在倫敦“晨报”上^①，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間可以确信：普魯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委托給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信秘密扯在一起了。最高檢察机关反对审查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了对照一下。最高檢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后再看一下馬克思的經官方证明的抄件，就足以使有意伪造馬克思笔迹这件事甚至連我們的陪審員的銳利目光也蒙混不过去。因此，为了維護普魯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① 見本卷第 431—432 頁。——編者注

施奈德尔第二指出，

“情願給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馬克思”。

即使只讀过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滿戏剧性的附函是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夏夜里，在半夜三更的睡梦中，把“紅色問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們的家門里去这样一种討厭的显然受人指使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就像“公民的英勇行为”以及“指望”用来在軍事上“完成”这一“指示”的“满怀信心”很能表明維利希的想像力一样。但是金克尔—維利希怎么能做到用馬克思的笔迹写他們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能够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手稿的“尚未完全查明的来历”的假定，那末这种假定看来就是这样：警察当局在克雷弗尔得发现了五十本“紅色問答书”，其中附有一个夸大其辞的、完全是答复質問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倫，*qu'importe?* [不都是一样嗎?]——把附函的原文改成馬克思的語气。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貨物的价格。”

可是，就連最高檢察机关在它的堪称反对卡提利納的演說^①的那个演說中也不敢引用这一附函。檢察机关拒絕使用附函。这样一来，該附函对于确定所缺乏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① 指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納的演說。——編者注

六

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1848—1849年革命失敗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論自由和結社权，換句話說，失去了党組織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們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來說，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現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們，法庭迫害它們，監獄冲散它們的队伍；而形势又經常使它們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現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敗，在那里，攻击現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則把組織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現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現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謂中間等級的政权，相反地，必須首先协助它建立統治权。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員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

status quo〔現存秩序〕的革命，但是，為這一革命做準備工作，為它進行宣傳鼓動、為它進行秘密活動和組織密謀，都不是他們的任務。他們可以把這種準備工作交給總的形勢和直接有關的各個階級去進行。如果他們不打算放棄自己的黨的立場和由無產階級生存的總條件所直接產生的歷史任務，那他們就必須把這種準備工作交給它們去進行。對他們來說，目前的政府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現象，而 status quo 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過渡環節，同時，即使跟它搞得筋疲力盡，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共產主義者同盟**”並不是一個陰謀家團體，而是一個秘密地進行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團體，因為德國無產階級被公開地剝奪了 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條件〕^①，被剝奪了出版、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如果這樣的團體也進行秘密活動，那末，這只有在蒸汽和電進行反對 status quo 的秘密活動的意義上才會發生。

不言而喻，這種不是把組織**未來的執政黨**，而是把組織**未來的反對黨**作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團體，對於下面這樣一些人來說，吸引力是不大的：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動的那種莊嚴的、帶有戲劇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蓋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來時滿足自己的一點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計地試圖在目前就成為顯要人物，在蠱惑宣傳的成果中撈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義的愛吵吵嚷嚷的饒舌者們的擁戴。

因此，從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已分離出了一個集團，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已被分離出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謀，至少也是密謀的**外表**，因而堅持同當代的民主主義英雄結成

① 直譯是：火和水。——編者注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Röln.

1853.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年波士頓版的扉頁

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維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維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貸款的活动中是以 entrepreneur〔承攬人〕的身分出現的。

关于这一集团对科倫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剛才已經說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澤尔在科倫陪审法庭开庭时已对这个問題作了明白而詳尽的闡述。

在結束我們的叙述之前，我們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看一看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倫案件审理期間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施梯伯从該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日期证明，即使在罗伊特干了盜窃勾当之后，該集团的文件还是繼續通过某种途徑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現在为止，該集团仍然沒有澄清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实**。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1846年由他接受入盟的，而不是在1848年由馬克思接受入盟的，等等。他对施梯伯的謊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該集团知道，威胁证人豪普特的信是該集团的成員**哈克**写的，但是它竟容忍把嫌疑的罪名繼續加在被告們的党的头上。

該集团的成員**莫澤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拙劣可笑的摹本“紅色問答书”的作者³⁰⁷，这个莫澤斯·赫斯不仅亲手写自己的大作，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把自己的一批批“紅色問答书”送給誰的。他知道他自己儲存的大批“紅色問答书”，馬克思一本也沒有动过。莫澤斯若无其事地使被告們沉重地背着嫌疑的罪名，說他們的党在萊茵省散发了他那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紅色問答书”。

該集团一方面采取沉默的办法，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言論跟

普魯士警察當局狼狽為奸。在審訊期間，該集團並不在被告席上出現，而是以“王室証人”的身分出現的。

亨策，維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認曾參加過同盟活動，在倫敦維利希那里呆了幾個星期，然後回到了科倫，以便提供反對貝克爾的假証詞，其實反對貝克爾的證據要比反對他自己的證據少得多；他證明什麼貝克爾在1848年是同盟的成員。

黑特采爾從迪茨的檔案可以看出，他參加過該集團、從它那里得到了金錢支持、並因參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審法庭審訊，現在竟以証人的身分出來反對被告們。他提供了假証詞，竟把在革命時期偶然發生的柏林無產階級的武裝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起。

施泰因根斯因自己的信件（見10月18日的法庭）暴露了：原來他曾經是該集團在布魯塞爾的主要代理人，現在他在科倫並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以証人的身分出現的。

在科倫陪審法庭開庭前不久，維利希和金克爾委派了一個裁縫的幫工^①充當特派員前往德國。金克爾雖然並不是該集團的成員，但維利希曾是德美革命貸款的頭目之一。

後來突如其來的那種危險當時就已威脅着金克爾：倫敦的委託者們不讓他和維利希掌管貸款，儘管他們表示憤怒抗議，那筆錢還是寄回美國去了。因此，金克爾正是在那個時候需要到德國去的擺擺樣子的使命和跟德國的擺擺樣子的通信，一方面是為了證明在那里總還有革命活動的場所，能使他與美元在活動中得到使用，另一方面是為了尋找金克爾和他的朋友維利希在財務報告（見

^① 即奧·格貝爾特。——編者注

奧·賴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中所記載的那種大量通信的借口、郵資開支的借口，等等。正如金克爾自己供認的，他在德國不論同資產階級自由派還是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都沒有什麼聯繫。因此，他也認錯了人，竟把該派的特派員當做德美革命同盟的特派員。這個特派員的唯一任務就是在工人中間進行旨在反對科倫被告們的黨的活動。應當承認，時機選得很好，給在最後一瞬間恢復審訊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魯士警察當局完全了解特派員的為人、動身日期和行程。是從哪裡了解到的呢？這一點我們就會看到。警察局的密探們出席了他在馬格德堡召開的幾次秘密會議，並報道了會議上進行討論的情況。科倫被告在德國和倫敦的朋友們對此簡直不寒而栗。

如上所說，11月6日，希爾施向彎街的治安法官供認，他在格萊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偽造了原本記錄。這一步是維利希驅使他走的。維利希和旅館老板謝特奈爾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爾施的供詞抄了三個不同的副本，並郵寄給科倫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爾施剛跨出法庭的門坎回家的時候，就應當立即把他逮捕起來，這是極其重要的。根據在他身上的經官方證實的證詞，在科倫遭到了失敗的案件有可能在倫敦取得勝利，即使不能使被告們取勝，那至少也是對政府的勝利。但是，相反地，維利希却千方百計地阻撓這一步的實現。關於這一點，他不僅對直接有關的“馬克思派”，而且對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對沙佩爾都守口如瓶。只有謝特奈爾一個人知道他的秘密。謝特奈爾聲明，他和維利希一道把希爾施送上了輪船。這就是，按照維利希的打算，希爾施本來應當在科倫提出反對他自身的證詞的。

維利希告訴希爾施用什麼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爾施把這一

点轉告普魯士大使館，普魯士大使館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沒有到达指定地点，它們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踪的希尔施又在倫敦悠然出現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維利希是他的同謀者。

維利希在答复就这件事情向他提出的質問时承认，他从1852年8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原来根据他的提議，希尔施已在1851年被当做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維利希泄露了弗略里是个普魯士間諜，后来又把写給弗略里的和弗略里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訴了維利希。据說，他——維利希曾利用这一手段来監視普魯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維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如果維利希从1852年8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魯士間諜，并且深知他的那一套陰謀詭計，那末，他怎么不知道原本記錄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魯士政府本身**暴露**了自己的間諜弗略里之后才出面干預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預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經官方证实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馬克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繼續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里弄到了十五英鎊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繼續在德美革命貸款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訴弗略里，致使普魯士密探能在隔壁房間把討論情况記錄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派員、裁縫的帮工的行程告訴弗略里，甚至

从弗略里那里弄到錢来組織这次負有特殊使命的旅行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說，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当如何在科倫陪審法庭上作证**反对貝克尔**^①呢？应当承认，que tout cela n'est pas bien clair〔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① 維利希和貝克尔的关系是这样的：

“維利希給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計劃。他指定我去使科倫的卫戍部队革命化!!! 不久前我們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許許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蠢惑民心的法官³⁰⁸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倫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絕担負下一步行动的領導責任的。真够朋友！”（引自 1851 年 1 月 27 日貝克尔給馬克思的信）

七 判 決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輿論就愈来愈支持被告。当原本记录的騙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科倫日报”已經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輿論低头，轉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誹謗开放的，現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种种短評了。普魯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紀事晨报”的通訊員們突然开始让国外輿論对不利的結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們的学說怎样有害和駭人听闻，也不管在他們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恶，但是密謀的事实根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們未必能被判罪。“泰晤士报”的柏林通訊員竟那样虛伪地、俯首听命地写报道，这是一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斯普累河旁的这个城市的上层分子中間的恐惧心理。当电报閃电般地把陪審員作出的那种“有罪”的宣判从科倫傳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宮廷和它的宦官們的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更是无法压制了。

随着記錄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現在陪審員們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現在他們必須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在答复律師們的辯护詞时，檢察官澤特抛开了記錄本。說什

么他不希望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霉的”记录本，它在时间上造成了巨大的无益的浪费，而对案件却毫无裨益；施梯伯受骗是出于值得赞扬的忠于职守，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里硬说，记录本里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可靠的，而只是对不能证明它是真的这一点表示遗憾。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记录本已失去了真实性，在这同时，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证过这个证词）也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由于在一年半当中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而拼凑起来的种种事实也随之失去效力。陪审法庭原定在7月28日进行的案件审理工作，竟拖延了三个月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厅长舒耳茨生病。这个舒耳茨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1852年1月和2月间，曾在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交给舒耳茨、舒耳茨转交给科伦警察厅、而科伦警察厅又转交给法院侦查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头几页；就是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法院侦查员引进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房间里去。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1851年10月还是没有获得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就根据内阁的命令，下指示开始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厅长舒耳茨。所以，舒耳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末舒耳茨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上的几页，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使原本记

录的产生和成长有必要的時間，被告們被单独监禁了十二个月。鸡毛蒜皮！——澤特大声喊道，他已經在下面这件事情中发现了罪证：辯护人和被告花了八天的時間去清除普魯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不辞劳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为此被告們坐了一年半的监牢。原本記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綫索，即来自大使館和警察当局、內閣和各地方当局、檢察机关和邮政局、倫敦、柏林和科倫等等方面的种种綫索的集結点。原本記錄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違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記錄保持有效，falsa〔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記錄；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記錄是真的。原本記錄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創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純粹的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們陪審員先生們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傾向性的案件”，——澤特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辯論开始。而現在他更強調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偵查之后，陪審員們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輿論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審員們又需要“純粹的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澤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檢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謀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純粹是傾向性的法律，可見，密謀的概念只不过是合法手續燒死政治異教

^① 希腊神話中說奥吉亚斯王的牛圈极其骯髒，轉意为藏污納垢之所。这里指普魯士政府当局所捏造的全部伪证。——譯者注

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們被捕以后頒布的新的普魯士刑法典去对付他們，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減輕懲罰的条款，奴顏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許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純粹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偵查呢？这是由于傾向。

因此，如果問題仅仅在于傾向，那末，我們是否应当跟澤特一施梯伯一澤肯多尔夫之流、跟哥貝尔之流、跟普魯士政府、跟科倫行政区的三百名主要納稅人、跟王室侍卫官馮·明希-貝林豪森和菲尔施坦堡男爵进行一場关于傾向的原則性爭論呢？*Pas si bête.* [我們并不那样愚蠢。]

澤特承认(在11月8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即被檢察长委任同他一道代表檢察机关于預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閱材料时，在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現了这样的念头：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感到自己更应当同陪審員們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他必須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審員中間有許多人也許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問題。”

所以，澤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指南³⁰⁹。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
明天就想教給別人。”³¹⁰

可是，檢察机关遭到了特別的不幸。它去找反对馬克思的客观材料，而找到的却是反对舍尔瓦尔的客观材料。它去找被告們所宣傳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們与之进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义。在施泰因的指南里虽有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然而就是沒有澤特所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批判的共

产主义登記上。不錯，澤特手中有被告們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那个“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有一章是专门批判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記过的所有大智大慧的。从这一章里想必能清楚地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出澤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独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施泰因都帮不了絆脚石的忙^①。在这里应当懂得，即使仅仅是为了提出控告。现在被施泰因所遺棄的澤特究竟怎样摆脱窘境呢？他肯定地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的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的。〈Very fine. [妙极了。]〉……在第二章里分析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末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在11月6日的法庭上)

虽然“宣言”共分四章，而不是分三章，但是凡是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干脆不去想它。因此，澤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倒霉透顶的一章，它的内容是批判施泰因记录过的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它的内容包括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独特倾向**。可怜的澤特！最初他缺乏**犯罪构成**，现在他又缺乏**倾向**。

然而，我的朋友，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灰色的³¹¹。澤特指出，“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在最近既已使被号召者忙了起来，也已使不被号召者忙了起来。”澤特无论如何是属于被号召者之列的，因为檢察长澤肯多尔夫在三个月以前已正式“号召”他研究社

① 俏皮話：«Stein» [施泰因] 是姓，又有“石头”的意思。——編者注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澤特們早就一致地认为：伽利略“并没有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而只有那些把他說成是異教徒的宗教裁判者才“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E pur si muove！〔而地球依然在运转！〕^①

被告們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統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們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搖輿論那样动搖一下陪审員們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遺的政府的阴谋、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普魯士政府的腐敗。陪审員們自言自語地說，但是，如果普魯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說——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擲，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們，無論他們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非常危险的，他們的学說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为了使我們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它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挽回政府的荣誉，我們也来破坏我們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point d'honneur〔荣誉〕。讓我們来感謝，讓我們来判罪。

萊茵的貴族和萊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決：“有罪”来应和法国资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盜賊还能拯救財產；只有違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經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

① 原来澤特不止一次“被号召”。而在后来他又繼續“被号召”——为的是表彰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績——即“被号召”担任萊茵省总檢察官之职；在担任这一官职时在任期内拿到了退休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臨終的圣餐，于是就安安静静地的归天了。（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審員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倫的陪審員和法庭喊道，讓我們胜过法国的陪審員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審員竟宣判罪证比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讓我們胜过 12 月 2 日政变的陪審員吧。讓我們补判勒澤尔、毕尔格尔斯以及其他人所体现的奈特的罪吧。

这样一来，在萊茵普魯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審法庭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審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級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寬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 312…… 这就是給需要这类手段来維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結論。这就是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結論…… **耶拿！**

卡·馬克思
議會。——11月26日的表決。
——迪斯累里的預算案

1852年12月10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关于各个政党在議會中重新掀起的斗争的重要结果所作的预言已经应验了^①。在会议开幕时,反对党对内阁获得了否定的多数;但从那时起,构成这一多数的各个互相竞争的派别彼此削弱了对方。11月26日下院没有通过維利尔斯先生提出的关于貿易自由的“激进的”決議案,而通过了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个模棱两可的修正案,这就表明了議會里各个旧政党之間的普遍的尔虞我詐和它們的普遍的分崩离析。

把1846年的法令³¹³說成是一項“英明而公正的”法令的維利尔斯先生的決議案,是背着科布頓和布莱特这些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自由貿易派而拟定的。輝格党决定按自由貿易派的利益行事,可是既不讓他們有主动精神,也不讓他們在获得預期的胜利以后参加政府。最先建議使用“英明而公正的”这种使內閣感到侮辱的字眼的罗素,表示贊同格萊安的修正案。得到內閣拥护者贊助的皮尔派提出了一項提案,這項提案承认貿易自由在将来是适

① 見本卷第433—442頁。——編者注

宜的，而否认它在过去是适宜的；这一提案使托利党有可能补偿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令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可是，同是这些皮尔派却不赞成迪斯累里的修正案，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提案，而准备支持最初那个主张贸易自由的决议案。本来已经快要取得胜利的辉格党，由于帕麦斯顿的出场而遭到了失败，后者维护格莱安的修正案，从而在皮尔派的帮助下使内阁拥护者获得了胜利。最后，保护关税派内阁所获得的这一胜利，本身却是承认贸易自由的，因而它激起了至少五十三名最坚决的执政党本身拥护者的反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论据、政党倾轧、议会手腕、相互背叛等等，就是11月26日辩论的总结，在辩论期间，自由贸易政策被正式承认，不过它是以保护关税派作为解释者，以保护关税派作为代表者，以保护关税派作为未来的执行者。

我在会议召开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竞选演说中已拒绝恢复谷物法的迪斯累里，打算通过税收改革来补偿大地主的损失，这种改革使租佃农场主有可能缴纳同过去保护关税政策时期同样的地租^①。迪斯累里解除了农场主目前的一部分税负，把它转嫁给人民群众，于是他就能这样安慰自己：他给日益感到拮据的大地主找到了一个新的手段，它比那种意味着直接拿群众的胃进行投机的旧的不可靠的保护关税制度更有效得多。迪斯累里先生的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拿他们的钱袋进行投机；这一计划目前体现在他本月3日提交给下院的预算案中。而今晚的辩论大概就要决定这个预算案的命运了。

高谈“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的措施” (Massregeln zur Hebung

① 見本卷第424頁。——編者注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已成了德國各邦政府和德國慈善家們的習慣。而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案則可以毫不誇張地稱之為一系列“改善有閑階級的狀況的措施”。可是，就像這類措施在我們的德國各邦政府和慈善家們那里總是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江湖騙術一樣，英國財政大臣目前為了有閑階級的利益而想出來的這個計劃也純粹是一場欺騙，他指望用這種欺騙來促使農場主更加心甘情願地繳納現行的高額地租，而答應他們表面上減輕他們的稅負；迪斯累里只有借助於某種顯然帶有真正掠奪城市居民的性質的措施，才有可能用這種幻想來愚弄他們。

迪斯累里早就故作神秘地宣布了自己的預算案，向所有人保證創造出世界第八奇蹟。據說他的預算案可以“結束各個階級之間的利害之爭，制止它們之間的殊死的戰爭”，“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滿足，而不使任何人受到侵犯”，“把各種各樣的利益融合成為一個繁榮的整體”，“通過確立”會在將來出現的“新原則來第一次建立起我們的貿易和財政體系之間的和諧”。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已不再在將來出現，而在一星期以前就向英國議會和全世界宣布了的啟示吧。像在作這種神秘的啟示時所應做的那樣，迪斯累里十分莊嚴地按照一切應有的儀式把它交付審議。1842 年，皮爾在闡明自己的財政草案時曾花了兩個鐘頭。迪斯累里則至少讲了五個鐘頭。他第一個鐘頭用來詳細地證明：“受害者”根本沒有受害；第二個鐘頭他用來說明哪些事情是他不打算為受害者干的，他的這些話同沃尔波尔、帕金頓、馬姆茲伯里的聲明以及他自己過去的聲明是相矛盾的；其餘三個鐘頭則用來說明預算案，列舉種種情節來描繪愛爾蘭的狀況，說明國防問題，說明預定的行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題目。

預算案的要点如下：

(1) **航运**。部分地降低灯塔稅，一年中降低的总額約为十万英鎊。这就是說，每吨在一年中所減輕的負擔不到六便士，而且同时这要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能对航运发生某种影响。完全停止征收过境運輸稅。海軍部的某些触犯商船利益的权力被取消了；例如，海軍軍官在外国港口招募海員时不应当要求立即付給海員薪水，他們应当对遇險的海船予以无报酬的帮助，在港口里不应当把非軍事船只从最适合于停泊的地方赶走。最后，应当委派下院的一个委员会来处理領港和船上装载压艙物等項事宜。这就是全部有利于航运的措施。可是，为了使自由貿易派不致由于这些規定对他們作了某种实际的让步而夸口，輸入造船用的木材的關稅的殘余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2) **殖民地**。允許在繳納關稅以前对砂糖加以精制，这样，今后就要根据为出售而生产的精制砂糖的数量征收關稅，而不再按原糖征稅。此外，准备鼓励中国人移入西印度，以保证种植場主有足够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砂糖的級差關稅不予取消。

(3) **麦麩稅和蛇麻草稅**。麦麩稅应当降低一半，据迪斯累里說，这将使收入减少二百五十万英鎊。同时，蛇麻草稅也要降低一半，这又将使收入减少約三十万英鎊。这种降低稅收的措施应从1853年10月10日起实行。取消現行的禁止外国麦麩輸入的規定和現行的外国蛇麻草的进口稅，应当規定新的稅率，其數額应相当于这些商品所应繳納的消費稅。

(4) **茶叶**。把現在对各种茶叶所征的稅从每磅两先令两个半便士降低到一先令；可是这种降低稅收的措施应当在六年之中逐步实行：1853年降低四个半便士，以后每年降低两便士，一直到

1858 年為止。就 1853 年來說，這將使收入減少四十萬英鎊。

(5) 財產稅和所得稅。這種稅原定只實施到 1853 年 8 月 5 日為止，現在規定延長三年；這種稅的稅額照舊，但它的分配應加以改變。對能提供收入的財產的稅額和對各種職業的收入的稅額應當有所區別。不動產和有價證券的稅額不變，即每英鎊徵稅七便士，各種職業（農業、商業、自由職業、領薪水的工作）的收入的稅額則由百分之三降低到百分之二。以後這些收入每英鎊將只徵收五又四分之一便士。另一方面，免稅的收入的最高額，從一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鎊降低到一百英鎊，對不動產和有價證券，則降低到一年五十英鎊。為了使農場主不致因這些準備實行的改變而遭到某種損失，向他們徵稅時將不是像現在這樣根据地租的一半來徵收，而是根据地租的三分之一來徵收，這樣一來，在改變以後，凡是一年繳納的地租不到三百英鎊的農場主都可以免稅。為了對教會表示照顧，凡是一年收入一百英鎊的牧師都繼續免于納稅。最後，所得稅第一次被推廣到愛爾蘭，但這決不涉及大地主，而僅僅適用於有價證券的收入和薪金。

(6) 房屋稅。規定凡是每年付房租在十英鎊以上的租戶都要繳納房屋稅，——到現在為止，只是每年付房租在二十英鎊以上的租戶才繳納這種稅。此外，房屋稅數額本身也增加一倍：例如，小店鋪應繳的稅額由每英鎊六便士增加為一先令，住房應交的稅額則由每英鎊九便士增加為一先令六便士。

總起來說，這一預算案意味着：

一方面，把英國的所得稅擴展到那些過去免稅的城市居民階級身上去，並且向愛爾蘭的有價證券的持有者和國家官員徵收這種稅；房屋稅則被推廣到那些過去不繳納這種稅的城市居民階級

身上，并把这种稅的數額增加一倍。另一方面——把由农业負擔的麥麵稅和蛇麻草稅減少二百八十万英鎊；把由航运負擔的稅額減少十萬英鎊，把茶葉稅減少四十萬英鎊。

由于增加所得稅、扩大房屋稅的繳納者的範圍、把房屋稅的稅額增加一倍，城市居民的稅負加重了；这样做是为了使农村居民的稅負減輕二百八十万英鎊。因此，小店鋪老板、工資收入較高的机械工人和商业職員都成了房屋稅的納稅人，并且第一次成了征收所得稅的对象。与此相适应，地皮每英鎊繳稅七便士，住房則每英鎊繳稅兩先令一便士。降低茶葉稅并不会改变这种对比关系，因为这一數目同增加的直接稅比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从降低茶葉稅得到的好处，对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

免除爱尔兰的大地主的一切所得稅，并使英国的农場主和僧侶不受扩大所得稅範圍的影响，这显然是靠牺牲城市的利益来向农村表示仁慈。可是，从降低麥麵稅得到好处的究竟是誰呢？是大地主，是农場主，还是消費者呢？把稅降低意味着减少生产方面的風險。按照政治經濟学規律，减少生产費用必然会使价格降低，因此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大地主，也不是农場主，而仅仅是消費者。

可是，这就应当注意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能生长头等大麦的土地，在英国是独占的領地，适合种大麦的土壤只是在諾定昂郡、諾福克等地才有，而外国麥麵的供应，是有自然界限的，因为不論大麦或者麥麵都經不住长途的海洋运输。第二，英国的大啤酒酿造者实际上握有那种主要以現行的进出口貿易許可证制度为基础的壟断权。因此，甚至谷物法的廢除也沒有使烈性黑啤酒和烈性白啤酒的价格下降。

所以，从降低麥麵稅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农場主，也不是消費

者，这些好处将为大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所瓜分。既然消費稅征收局仍然对农业进行可恶的干涉，那末，征收以往各种稅的半数所需要的行政开支，将同过去征收全数时所需要的相等。現在，为征收一千四百四十万英鎊的消費稅所需的开支，每一百英鎊是五英鎊六先令。而把稅收减少三百万英鎊以后，每一百英鎊的开支則为六英鎊到六英鎊四先令。总而言之，收入愈是减少，非生产开支就愈是增加。

因此，迪斯累里的預算案可以說就是給大地主賠償損失，而且是“十分慷慨地賠償”。

可是，这一預算案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奇特的地方。

如果你們想实行自由貿易派的貿易制度，那末，你們首先就得改变財政制度。“你們应当从間接稅回到直接稅”，——迪斯累里这样說，而迪斯累里是正确的。

直接稅，作为一种最簡單的征稅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后来，城市实行了間接稅制度；可是，久而久之，由于現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貿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貿易和世界市場，間接稅制度就同社会消費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關稅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換。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國庫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損害自由竞争和交換。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間接稅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稅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稅不容許进行任何欺騙，每个階級都精确地知道它負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稅、財產稅和房屋稅等直接稅更不受人欢迎的了。現在不妨問一下：由于自由貿易而不得不

轉向直接稅制度的英國工業階級，究竟用什麼辦法能夠實行直接稅制度，而不致激起社會的不滿，同時也不致增加自己的負擔呢？

這只有通過下列三種辦法：

向國債進攻。可是，這將是破壞國家信用，是沒收，是革命的措施。

把地租變成徵稅的主要對象。但這也是對財產的侵犯，也是沒收，也是革命的措施。

收回教會掌握的財產。但這仍然是對財產的進一步侵犯，仍然是沒收，仍然是革命的措施。

科布頓大聲喊道：“決不能這樣做，我們只應當縮減國家開支，這樣，我們也就能減輕我們目前的稅負。”

這是一種空想。首先，英國和大陸之間的关系要求不斷地增加國家開支；其次，科布頓所代表的工業階級的勝利也要求這樣做，因為由於它的勝利，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會變得更加殘酷，用於鎮壓方面的開支也會愈來愈多。換言之，預算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縮減。

綜上所述，貿易自由促使轉向直接稅制度。直接稅制度則包含着反對教會、大地主和國家有價證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而這種聯盟將使英國資產階級喪失它可以从貿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資本對勞動的無限統治。

卡·馬克思寫於 1852 年 12 月 10 日前後

載於 1852 年 12 月 28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3650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卡·馬克思 答科苏特的“秘书”

致“紐約論壇报”編輯

1852年12月14日星期二于倫敦

亲爱的先生！

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报道科苏特和馬志尼的活动的通訊^①在美国报刊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因此，最近我曾寄給您一篇关于該通訊的說明^②。在那篇說明里（在那里我曾經順便指出，科苏特本人和那些由于我的通訊而引起的无数文章是毫无关系的，而且我与其說是想反对科苏特等，不如說是想給他們一个警告，等等），我談了我认为当时必須談的关于这个問題的一切。但是我收到了最近几号的美国报纸，在那里我发现了好像是出自科苏特先生的秘书之手的、对我的报道所做的类似官方辟謠的东西。由于这个“文件”，我必須通知您，科苏特經我詢問，已向我肯定地作了如下的說明：

- （1）目前他根本就沒有秘书；
- （2）上述“辟謠”并未得到他的認可；
- （3）他在接到我的通知前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① 見本卷第443—444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412—415頁。——編者注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权威的”声明，我就不预备再谈这个问题了。让那些不请自来、不适当地表现殷勤的辩护士去自寻安慰吧。

您的特約通訊員

卡·馬克思写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65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內閣的失敗

1852年12月17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要赶快告訴你們昨天晚上使內閣失敗的一場辯論的結果。

在內閣大臣們遭到这次总的失敗之前，他們那位最勇敢的战士軍务大臣阿基里斯·貝雷斯福德³¹⁴的单独作战就已經遭到可耻的失敗。得比选举审查委員會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个报告确认了自由党人提出的选举抗議书中所列举的各种事实，并在結論中认为证人的供詞已經证实：在得比的选举期間普遍采用了賄賂手段。但是委員會並沒有进一步审查罪证，它沒有直接控告貝雷斯福德的賄賂行为，而只限于对他的“态度輕率和目光短淺”进行严厉的指責。且看議會是否同意这个可尊敬的委員會的意見，是否容許貝雷斯福德先生繼續保留他在議院里的席位吧。如果这样，議會本身就等于是同意貝雷斯福德大臣先生关于“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憎的賤民”这一著名的格言。不管怎样，貝雷斯福德的大臣的官职是难保了。

在談了这一小段題外話以后，讓我們回到正題上来吧。

下院的議員們一連花了四个晚上零大半个晚上來討論这样一个問題：是应当审查整个預算案还是应当审查整个決議，是研究总的原則还是研究与某一点有关的具体材料。最后他們得出的結論

是：議院目前只应当研究提高房屋稅和擴大直接稅征收範圍的問題。

迪斯累里先生的預算案中的這一重要提案遭到了議院的否決，表決的結果是：

二百八十六票贊成，三百零五票反對。

內閣的反對者獲得了十九票的多數。在此以後，議院決定把下次會議延遲到下星期一舉行。由於時間不夠，我不可能對這次辯論進行詳細的分析，雖然我很希望這樣做。我只能談談迪斯累里先生最後一次發言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而他的發言無疑是所有發言中最值得注意的。

前財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和詹姆斯·格萊安爵士集中火力攻擊了迪斯累里關於動用借來的社會福利基金（每年四十萬英鎊）來彌補由於降低航運稅而造成的赤字的提案。詹姆斯·格萊安爵士非常起勁地論證了這筆基金的良好作用。迪斯累里先生對這一點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想向委員會指出過去曾經有過多麼令人吃驚的濫用國家資金的行為，指出實際上曾經不經議會的同意、不受議會的監督而浪費了多少金錢，而且這還僅限於通過主管這項借來的社會福利基金的機關所浪費的金錢。”

接着他就詳細地揭露了輝格黨政府在這筆基金上面玩弄的卑鄙的財政手腕。然後，迪斯累里說明了他的預算案所依據的原則。

“在決定我們第一步究竟應當怎樣走之前，需要解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在規定直接稅的數目的時候，我們可以向國家提出多大的要求，而這筆款項是任何想走上財政改革道路的內閣所必不可少的。（喊聲：“對呀！”）哈里法克斯的代表（查理·伍德爵士）指責我的提案是輕率地增加國家的直接稅。（喊聲：“聽啊，聽啊！”）卡賴爾的代表（詹姆斯·格萊安爵士）責備我隨便地把直接稅增加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首先，我以政府的名義提出的這個提案不但

不是輕率地增加直接稅的稅額，而且在實際執行這個提案的時候，直接稅也不會達到這位可敬的紳士、哈里法克斯的代表掌管財政時期所達到的數額，因為他不僅征收財產稅和所得稅，甚至还征收窗口稅；在實行窗口稅的最后一年，他從這種稅得到的收入將近二百萬英鎊。（掌聲）這位警告我們不要輕率地提高直接稅額的可敬的紳士，在掌管財政的最后一年減少了窗口稅的數額，滿足於由於用另一種稅代替窗口稅而保留下來的七十萬英鎊這樣一個小小的數字。但是我不會忘記，輕率地責備我提高直接稅額的這位可敬的紳士，起初提出的、代替窗口稅的另一種稅的稅額是如此龐大，如果真的實行，他的房屋稅就會比我任何時候提出的都要高。（熱烈的掌聲）但是，就只這些嗎？這位責備我輕率地提高國家直接稅的可敬的紳士所做的就只這些嗎？正是這位征收了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其確切數額的財產稅的財政大臣，正是這位征收了將近二百萬英鎊的窗口稅的大臣，有一次曾經來到下院，提出了一個使會議大吃一驚的提案：把財產稅和所得稅增加將近一倍。（熱烈的掌聲）我認為這種行為才真可以說是一種毫不考慮後果的輕率態度…… 向我們提出要把房屋稅增加一倍。這實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數目啊！但是，如果這位可敬的紳士真的把財產稅和所得稅增加一倍，那末我看，指責他輕率地提高國家的直接稅倒是很公平的。（熱烈的掌聲）有人在叫嚷什麼輕率態度，難道在財政史上還有什麼可以和這位可敬的紳士所表現的輕率態度相比嗎？（熱烈的掌聲）究竟他有什麼根據提出這樣一個奇怪的不可思議的提案，一個只有在關係到國家安危的情況下才應該提出的提案呢？當他遭到抵制、遭到失敗和備受嘲笑的時候，他又聲明說收入已經夠用，沒有他的這個提案也過得去了。（熱烈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假如將來有一位歷史家敘述說，有一個大臣提議把所得稅增加將近一倍，而第二天他又聲明，預算的收入已經完全夠用，大家一定都不會相信這位歷史家，一定會懷疑他是在撒謊吧。（又爆發一陣掌聲）”

迪斯累里這樣向查理·伍德爵士進行報復之後，繼續說道：

“我們應當說明，在財產和收入之間，在不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收入之間是有差別的。因此我們應該堅持我們過去認為、現在也仍然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原則，這個原則即使現在不被承認和通過，它將來也一定會被承認和通過，這個原則就是**直接稅**的基礎應當擴大。（執政黨議席上發出贊同的喊

声)…… 假如有人想使这样的状况,也就是使拥有政权的阶级靠社会上的一部分更富有的人担负过重的直接税而靠工人负担过重的间接税来维持自己的情况成为我们社会制度的永恒的原则,那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东西会比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更为危险和更能引起毁灭性的后果了。(掌声)不过,我深信,特权阶级将会首先由于这种毁灭性的后果而受害。”

迪斯累里把话题转向自由贸易派,他说:

“我们看到,殖民地关税的伟大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地拥护对生产者课以重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故意要嘲笑我们似的,竟利用了我们来终于有勇气正当地放弃了的那些错误论点。(热烈欢呼)你们对我说,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死亡,你们对我们说,保护关税派的政党已不存在!不!这个政党还健在,这个政党就在这里。(用手指反对党议席)他们不仅坐在我们原来的席位上,而且把我们的原则也据为己有,不过,我相信他们也同样不会做出多大的成绩。(掌声)”

最后迪斯累里对查理·伍德爵士劝他收回自己的预算案的忠告作了如下的回答:

“有人劝我收回自己的预算案。有人对我说,皮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预算案,而且不久前其他一些人(辉格党人,其中包括查理·伍德爵士)也这样做了。(笑声)我并不羡慕皮特先生的荣誉,但也不想降低到其他一些人那样的水平。(热烈的掌声)不,先生们,我已经看到,无力实行自己措施政府将会得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既不会给政府带来荣誉,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照我看来,这种结果同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同对议院的尊严是不相容的。(热烈的掌声)我想起了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曾经在1848年提出又收回,重新提出又重新收回。(笑声)这个只是在人们忍耐的情况下才勉强存在的政府的活动造成了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国家的财政上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正是我现在必须努力加以纠正的那种以房屋税代替窗口税的可耻行为吗?(掌声)不满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某些政党的利益…… 是的,我很清楚谁将反对我。我遇到的将是一个联盟。(掌声)妥协也可能会得到成功。过去也曾经有过得到成功的联盟。不过,即使是得到成功的联盟,其胜利也总是很短暂的。我也知道,英国不喜欢联盟。(掌声)我不愿意求助于联盟,

我要訴諸支配着國家的社會輿論。由于自己那種英明的不可抗拒的影響，社會輿論甚至足以使議會的決議受它的控制，沒有它的支持，最莊嚴最古老的機構也不過是沒有根基的幻想的產物。（可敬的紳士在震耳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今天各報對於內閣這次失敗的後果的看法如何呢？

“紀事晨報”（皮爾派的機關報）和“晨報”（激進派的機關報）認為內閣一定會辭職。“泰晤士報”也同樣認為大臣們會提出辭職，不過它懷疑反對黨是否能像它推倒舊政府一樣容易地成立起新政府。“每日新聞”（曼徹斯特派的機關報）認為倒台的內閣可能和帕麥斯頓勳爵聯合起來重新組閣。“晨郵報”（帕麥斯頓的機關報）認為這種重新組閣是一種當然的事情。最後，“先驅晨報”（得比—迪斯累里）認為如果大臣們今天辭職，女王^①明天就會被迫把他們重新召回。

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大臣們由於自由貿易派的擴大直接稅的決議案而遭到了失敗。但是他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如果說他們曾經以放棄自己的原則為代價勝利地擊退了議會的第一次攻擊，那末反對黨所以能在第二次戰役中戰勝他們，也正是由於反對黨放棄了他們自己的原則。

這樣，這些辯論完全證實了我以前談到的議會中各個政黨的狀況^②。聯合起來的反對黨和二百八十六名緊密團結的托利黨人相比，僅僅獲得十九票的優勢。如果反對黨組織新政府，那末這個政府很快就會被推翻。如果反對派組成的新政府解散下院，那末，將在原來的條件下進行的新的選舉，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也就是

① 即維多利亞。——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33—442 頁。——編者注

說,当在新的下院中重新开始旧的角逐的时候,各政党又会照旧相互削弱,英国的政治又会重新陷入 cercle vicieux〔兜圈子的境地〕。

因此我认为,現在还是同过去一样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抉擇:或者是**让托利党政府繼續存在下去**,或者是**实行議會改革**。

卡·馬克思写于 1852 年 12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1 月 7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659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衰老的政府。——聯合內閣的 前途及其他

1853年1月11日星期二于倫敦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政治千年王国**³¹⁵的开始，在这个王国中，派系紛爭的風气将从地面消失，只有天才、經驗、勤劳和爱国主义才会成为有权担任官职的唯一品质。現在內閣成立了，在我們看来，它得到各派人士的贊同和支持，它的原則也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泰晤士报”首先用这些话热情洋溢地頌揚了阿伯丁政府的成立。根据該报的語調，人們会以为，从今以后为英国造福的将是一个完全由年輕有为的新人物所組成的內閣。所以，当全世界发现在大不列顛的历史上开辟新紀元的几乎全是些年逾八十精力衰弱的老头时，无疑都会感到惊奇。阿伯丁年近八十；兰斯唐已經入土半截；帕麦斯顿和罗素也近乎如此；格莱安是从上世紀末以来就差不多在历届政府里供职的官僚；內閣的其他成員，由于年老体衰已經死过两次，只是又被人为地复活了。一句話，十个百岁的老头——这就是“泰晤士报”的政論家用来組成（看来是用簡單合成的方法）新的“千年王国”的材料。

他們向我們保证說，在这个“千年王国”里，任何派系紛爭，甚至党派本身，都必将消失。“泰晤士报”想以此來說明什么呢？从

前一直享有使自己表面上成为民族政党或議會党的特权的某些貴族集团，現在已經認識到繼續扮演这种滑稽剧已經不可能了，这些貴族集团由于这种認識和近来他們所取得的慘痛教訓决定停止小小的內訌，并且为了保卫他們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总体，——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党派就該不再存在了嗎？組成这类“联合”的事实本身难道不正是确定无疑地象征着那两个真正在成长壮大但又局部地丧失代表資格的現代社会的基本階級——工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准备保卫自己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政党的权利的时刻已經到来了嗎？

在得比勛爵执政时期，托利党人永远地放棄了自己的旧的保護關稅理論，并宣称自己是貿易自由的拥护者。当得比伯爵宣布自己的內閣辞职时，他說：

“諸位先生，我記起了——而你們，諸位先生，大概也会記得——高貴的伯爵〈阿伯丁〉在本議院會不止一次地宣称，除了貿易自由問題以外，他同現政府在任何一个問題上都沒有有什么分歧。”

阿伯丁勳爵在证实这种說法时又进了一步，他指出，“为了抵抗民主派的侵害，他准备联合高貴的伯爵〈得比〉，但是，他难于指出，哪儿有这种民主派”。根据两方面的承认，在皮尔派和托利党人之間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但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外交政策，阿伯丁伯爵指出：

“三十年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則沒有改变，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某些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从1830年到1850年一直在阿伯丁和帕麥斯頓之間进行的整个斗争，即前者力求与北方强国結成同盟，而后者坚持同法国建立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協商”]；一个是贊

成路易-菲力浦，而另一个是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个是反对干涉，而另一个是贊成干涉等等这两者之間的斗争，总之，他們所有的糾紛和爭論，甚至不久以前由于馬姆茲伯里勳爵“可耻的”外交政策而引起的普遍憤怒——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純粹的錯觉”。可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能找到比它的外交政策遭到更彻底的改变的其他东西嗎？1830年前同北方强国同盟；从1830年起同法国同盟(四国同盟)³¹⁶；从1848年起英国同整个大陆隔絕而陷于完全的孤立。

首先，得比勳爵向我們保证說，托利党人同皮尔派之間沒有任何分歧；随后，阿伯丁伯爵又向我們保证說，皮尔派同輝格党人、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之間也同样沒有分歧。按照他的意見：

“国家就是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或原則沒有实际影响的區別而弄得疲憊不堪了。除了保守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都是不可想像的，——同样正确的是，除了自由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也是不可想像的。”

“这些术语的涵义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區別已使国家感到厌倦。”

这样一来，三个貴族党派——托利党人、皮尔派和輝格党人一致认为：他們彼此之間实际上沒有任何区别。此外，在另外一点上他們也都是是一致的。迪斯累里申明，他打算实行貿易自由的原則。阿伯丁勳爵說：

“女王陛下的現任各部大臣的偉大目的和他們执政的主要特点，必須是保护和合理地扩大自由貿易。这是特別委托給他們的使命。”

总而言之，整个貴族階級都同意，政府應該使資產階級得到好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們又决定不让資產階級直接領

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資產階級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来的英国貴族打算按照拿破侖主張对人民采用的原則来对待資產階級，这个原則就是：«Tout pour le peuple, rien par le peuple» [“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厄內斯特·琼斯在“人民报”上指出：

“显然，排除資產階級的明显意图，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伪装，而他們〈大臣們〉为了毫不費力地做到这一点，就把一些次要的和影响不大的职位让給如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貝尔納·奥斯本等这些自由派的貴族。但他們不該設想，梅費尔区³¹⁷的这个讲究穿戴的自由派会滿足曼彻斯特派的那些严肃的先生們。后者所感兴趣的除了市場交易，別无所求。他們所想的的就是英鎊、先令和便士，是职务和地位，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巨額收入，这个帝国連同它的一切資源都應該专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务。”

而实际上，只要浏览一下“每日新聞”、“晨报”特别是“曼彻斯特时报”³¹⁸，即布莱特先生的直屬机关报，就足以使人相信，曼彻斯特派的信徒在答应給联合政府以临时支持时，所遵循的只是皮尔派和輝格党人对上一届得比內閣所实行的政策：他們想使大臣們有可能把自己考驗一下。至于这种“考驗”的意义是什么，迪斯累里不久以前已經有机会領教过了。

因为托利党内閣的失敗是由爱尔兰旅决定的，所以新的联合政府自然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在議會中得到这个党团的支持。他們用财政部部务委員的职位很快地引誘上了爱尔兰旅的經紀人薩德勒先生，使克奧先生得到了爱尔兰总檢察长的官职，让蒙塞耳先生当了軍械局秘书。

“先驅晨报”写道：“他們指望用这三項收买来爭取到爱尔兰旅。”

然而，我們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三項收买是否能保证得到整个爱尔兰旅的支持。我們現在就已經在爱尔兰的“自由人报”³¹⁹上讀到了这样的话：

“目前已經到了解决租佃者权利問題和宗教自由問題的決定性时刻。这些問題的成敗，現在不取决于大臣們，而取决于爱尔兰的議員。得比內閣是被十九票推翻的。如果有十个人轉向另一方，那就会改变事件的进程。在各党派的这种情况下，爱尔兰議員是万能的。”

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見：或者是托利党政府，或者是議會改革，二者必居其一^①。讀者如果了解一下阿伯丁勋爵对这个問題的看法，那将是很有趣的。他說：

“改善人民的状况，并不排斥〈这样！〉消除代議制的缺点，因为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未必能唤起人們对这种制度的热爱。”

阿伯丁勋爵的同僚在他們担任政府要职之后进行的选举中異口同声地宣布，代議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时，他們每次都要自己的听众了解，这样的改革必須是“温和的、合理的，改革要深思熟虑，謹慎从事，不应操之过急”。可見，現在的代議制暴露的缺陷愈多，人們愈是公开地承认这一点，那就愈加表明不願迅速和彻底地改变这种制度。

最近这次大臣的改选，对一个新的发明作了首先試驗，由于这个发明，各个政治活动家不論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能否进入內閣，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威望。这个发明就是使用至今尙未在实际中运用过的“尙待商榷的問題”这个概念。奥斯本和維利尔斯过去曾当众保证贊成秘密投票，可是現在他們又說这是一个尙待商榷的問

^① 見本卷第 552 頁。——編者注

題；摩耳斯沃思曾保證為殖民地的改革而鬥爭，而現在，這又是一個尚待商榷的問題；克奧、薩德勒等人曾保證維護租佃者的權利，而現在，這也是一個尚待商榷的問題。總之，他們作為議員時經常談到的自己認為已經解決了的一切問題，在他們當了大臣之後，都變成了尚待商榷的問題。

最後，我還必須指出由於皮爾派、輝格黨人、激進派和愛爾蘭人的聯合而出現的另一個新奇的情況。這些黨團的每一個著名的活動家，都被調離他們被認為能夠發揮某種才能或運用某種知識的那些部門，而被委派到對他們很不恰當的崗位上去。帕麥斯頓這位著名的外交大臣被委派到內務部，而在內務部干了一輩子的羅素卻被調去掌管外交；格萊斯頓這個皮由茲教派³²⁰的埃斯科巴爾被任命為財政大臣；作為威克菲爾德先生的荒謬的殖民主義制度³²¹的模仿者或擁護者而獲得一定聲望的摩耳斯沃思，當了公共工程大臣；在任財政大臣時經常被財政赤字或盈餘而弄得到處碰壁的查理·伍德爵士，現在當了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連來復槍和火槍的區別都分辨不清的蒙塞耳被任命為軍械局秘書；唯一沒有調離原職的一個人是詹姆斯·格萊安，他在任海軍首席大臣時很早就由於第一個把腐爛的蛆蟲帶進不列顛艦隊而博得了極大的榮譽。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1 月 28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677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政局展望。——商業繁榮。
——餓死事件

1853年1月14日星期五于倫敦

約翰·羅素勛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銜証章時宣稱，他只打算臨時擔負這個部門的工作，在不久的將來，外交事務將轉交克拉倫登伯爵掌管。的確，羅素勛爵在外交部始終是個真正的外國人；如果把出版枯燥的匯編（大概是關於從尼姆韋根和約以來所簽訂的各個條約的歷史的匯編）這一工作除外，那他就沒有任何特殊表現了，而這本書老實說充其量不過是像羅素曾一度用來震驚世界的那本“悲劇”³²²一樣地引人入勝。約翰勛爵既然保住了在內閣的地位，他很可能成為下院的首領，看來，他在內閣里將集中全副精力來制定新改革法案。要知道，自從1831年為了實行自己的措施，而在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之間十分巧妙地分配“腐朽的市鎮”³²³以來，議會改革一直就是他的專業。

我曾預言：內閣為了把整個“愛爾蘭旅”爭取到聯合政府方面而對三位愛爾蘭議員所採用的收買手段^①，是無濟於事的。現在這個預言完全被証實了。“自由人報”和“記事報”的立場，魯卡斯、穆爾和達菲先生的書信和聲明的語調以及保障租佃者權利同

① 見本卷第556頁。——編者注

盟³²⁴的最近一次會議所通過的反对薩德勒和克奧先生的決議足以證明，阿伯丁政府將控制的僅僅是愛爾蘭的極小的一部分力量。

眾所周知，內閣的首腦阿伯丁勳爵將出席上院會議。布萊特先生不久前在曼徹斯特歡迎美國新任大使英格索爾先生的宴會上發表演說時，利用機會宣稱，徹底廢除上院是工業資產階級“進步”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條件]。自從組成聯合內閣以來，這是曼徹斯特派的第一次正式聲明；這個聲明大概在某種程度上將幫助阿伯丁勳爵發現那個使得比勳爵恐懼萬狀的民主派的蹤跡。

由此可見，“泰晤士報”的充滿樂觀主義的政論家曾聲稱永遠消除了的黨派鬥爭又重新激烈起來，儘管“千年王國”的紀元是以議會會議延至2月10日而開始的。

在新年之初，人們異口同聲地大肆宣揚商業和工業繁榮的繼續增長，截至本月5日為止的國家收入報告的公布、商業部關於最後一個月和截至1852年12月5日為止的十一個月的正式報告、工廠視察員的報告以及每到新年之初發表的綜述上一年整個商業形勢的商業年報都證實了這一點。

國家收入報告表明全年收入總共增加978 926英鎊，最後一個季度增加702 776英鎊。除關稅外，本年的各項收入均有增加，國家收入總額達50 468 193英鎊。

被認為是人民福利標志的消費稅為：

截至1852年1月5日為止的一年.....	13 093 170 英鎊
截至1853年1月5日為止的一年.....	13 356 981 英鎊

商業活躍程度的標志——印花稅為：

1851—1852年度.....	5 933 549 英鎊
1852—1853年度.....	6 287 261 英鎊

表明上层階級財富增加的財產稅为：

1851—1852 年度……………5 304 923 英鎊

1852—1853 年度……………5 509 637 英鎊

商业部关于截至 1852 年 12 月 5 日为止的一个月和十一个月的报告表明：

	1852 年	1851 年	1850 年
出口价值(按英鎊計算)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一个月	6 102 694	5 138 216	5 362 319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十一个月	65 349 798	63 314 272	60 400 525

可見，上述一个月的出口价值几乎增加了一百万英鎊，而十一个月的出口价值才增加了二百多万英鎊。至于出口价值的增长是否与进口价值的增长相平衡或者被出口价值所超过，由于缺乏进口价值的任何資料，我們无法知道。

再来看看工厂視察員的报告。郎卡郡地区工厂視察員霍納先生在他剛发表不久的包括截至 185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資料的半年报告中写道：

“至于談到毛紡、精梳毛織和絲織厂的情况，一年来在我負責的地区变化不大，亚麻厂仍处于 1851 年 11 月 1 日以前那样的状况。但棉織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甚至从中减去目前停工的厂(其中很多厂大約很快就可以复工，特别是保全了机器设备的厂)，那末近两年来投入生产的新厂也有 129 个，总設備能力达 4 023 匹馬力。53 处現有工厂的設備能力共增加 2 090 匹馬力，因此，設備能力总共增加 6 113 匹馬力。看来，这至少使棉織工业增添 24 000 名工人。但問題还不止于此，因为目前还有許多新的工厂正在兴建。在包括埃士頓、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和利斯等城市在內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就有 11 个工厂在兴建，其設備能力估計共达 620 匹馬力。据說，机器制造业由于定貨过多簡直忙得喘不过气来。不久前一位十分明智的、善于观察的工厂主对我說，現在許多正在建筑的工厂，由于缺乏机器設備，大約最快也要到 1854 年

后才能开工生产。尽管上述材料以及我的同行在他們今年的报告中引用的材料能够說明生产的巨大增长,然而,这些材料还不能反映这种增长的全貌。因为目前存在着生产增长的十分广泛而丰富的源泉,关于这方面还很难得到什么資料。我所指的就是蒸汽机方面的现代化的革新,由于这种革新,旧的、甚至新的发动机能够发挥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过去认为不可能达到的能力”。

接着,霍納先生引用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从北明翰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如果加速机器的运转和給它們装上伍尔夫的高压双重汽缸,这会使生产率得到多么大的提高;采用这种汽缸,就可以使現在使用的机器的生产率比革新以前至少提高 50%。

从所有工厂視察員的报告的综合材料中可以看出,到 185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一年中,开工生产的新厂共有 229 个,它們共拥有 4 771 匹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 586 匹馬力的水力发动机;扩建現有工厂 69 个,拥有 1 532 匹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 28 匹馬力的水力发动机;兩項总计达 6 917 匹馬力。

往下,再来看看商业年报,我們发现所有这这些年报都充滿了像“泰晤士报”頌揚政治“千年王国”时的那种激情,不过,无论如何,这这些年报总比这家报纸要好些,因为它們所依据的是事实(至少在涉及到过去一年的情况时),而不是願望。

农业也沒有抱怨的理由。年初,小麦的每周平均价格是 37 先令 2 便士,年底就达到了 45 先令 11 便士。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牲畜、肉类、油类和干酪的价格也提高了。

1851 年 8 月,某些食品,主要是糖和咖啡的价格空前下跌,并且一直继续到 1851 年年底,因为明辛街³²⁵的混乱在 1852 年 1 月才达到了頂点。現在年报指出大部分外国产品,特别是从殖民地輸入的产品,如糖、咖啡等等的价格大大上涨。

至于原料的情况，我們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加以判断。

休斯和罗納德先生在年报中說道：

“羊毛貿易状况在去年整个一年中非常令人滿意…… 国内市場对羊毛的需求量空前巨大…… 毛織品和精梳毛織品的出口达到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1851年的出口額，而1851年的出口指标曾是这几年中最高的…… 价格不断上漲，但是暴漲只是在最近一个月內发生的，因此目前可以认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与去年同期比較平均超过15—20%。”

邱吉尔和西姆先生报道：

“木材貿易在1852年国内商业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倫敦的輸入量是1200船貨物，相当于1851年的数字。两年来比以往各年的800船貨物左右的平均指标增加了50%。如果說建筑木材的数量仍然是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那末对松木薄板、条板或鋸过的木料等的需求量在1852年却空前地增加了，年平均数达到680万块，而过去是490万块。”

关于皮革制品，波威尔公司作了如下的报道：

“无疑，去年几乎对所有制革工业部門的工厂主都是有利的。在年初原料很便宜，但是后来的情况却是：皮革制品的价值比往年提高了很多。”

特別繁荣的是冶金工业。铁的价格由每吨5英鎊漲到每吨10英鎊10先令，不久之前又漲到每吨12英鎊；以后漲到每吨15英鎊是可能的。有愈来愈多的高炉投入生产。

关于航运业，奥弗尔和加門先生作了如下的报道：

“去年的特点是不列顛的航运业異常景气，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金矿的發現对实业活动的刺激…… 貨船載运量普遍增加了。”

造船业也是同样活跃的。利物浦的湯季、卡里等先生的年报中关于这个生产部門談到以下情况：

“我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我們的年度报告中报道过关于本港在出售船只的吨数和成交价格方面的如此有利的材料。殖民地船舶的价格整整上漲了

17%，且有进一步上漲的趨勢。尚未售出的船舶的數量已減至 48 只，而 1852 年是 76 只，1851 年為 82 只，預計最近不會增加…… 一年來開到利物浦和出售的船舶數是 120 只，總載重量為 50 000 噸；1852 年在本港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數是 39 只，總載重量為 15 000 噸，而 1851 年是 23 只，總載重量為 9 200 噸。在這裡已經造成和正在建造的輪船數是 13 只，總載重量為 4 050 噸…… 至於說到鐵制帆船，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船隻愈來愈受到歡迎。現在，無論是這裡，或者克萊德、新堡以及各地的造船工人都在以空前的規模建造這樣的船隻。”

關於鐵路的情況，伍德斯和斯塔布斯先生寫道：

“報告給我們提供了最美好的希望的根據，並且遠遠趕過了一切過去的計算。上週的報告指出綫路長度比 1851 年增加了 348 哩，即 5.5%；貨運收入增加了 41 426 英鎊，即 14%。”

最後，杜菲公司（曼徹斯特）的通報指出，1852 年 12 月份同印度和中國的貿易是十分廣泛的。剩餘貨幣被看作是這樣一種情況，它有利於國外市場的企业家的活動，並能使他們在年初所受到的商品和產品方面的損失得到補償。

“目前，開墾新地、開採礦山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種方案正吸引着投機商人和資本家。”

根據工廠視察員的報告，就可以看到一般工業地區，特別是棉織工業區的繁榮情況。關於棉織生產的情況，約翰·里格利父子公司（利物浦）作了如下的報道：

“過去一年的棉花貿易的發展成了國家普遍繁榮的標志，它導致了非常良好的結果…… 同時也表露了一系列的好現象，但是最驚人和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美國空前豐收的三百多萬捆棉花都非常順利地銷售出去…… 在很多地區，對進一步增加工業企業的設備能力已經做了準備工作，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明年將加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棉花。”

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的情況也是如此。

麥克奈爾、格林豪和厄爾文（曼徹斯特）先生說：“我們要指出格拉斯哥

的棉織工业和冶金工业，哈得茲菲尔德、里子、哈里法克斯、布萊得弗德、諾定昂、萊斯特、設菲尔德、北明翰和烏尔未汉普頓的各种工业部門——所有这些工业看来都处在非常繁荣的状况。”

普遍繁荣中唯一例外的是約克郡的絲織工业和梳毛工业。关于工商业的总的前景，可以用曼彻斯特的一个通报的話归納如下：

“我們預感到的与其說是交易停頓和貨幣不足，不如說是投机过剩。”

在这种普遍繁荣极盛的时候，不久前英格兰銀行所采取的措施，引起了商业界的普遍不安。1852年4月22日，英格兰銀行把貼現率降到了2%。而1853年1月6日早上宣布，貼現率由2%提高到2.5%，也就是說，增加25%。有人企图把这次提高說成是由于最近某些承包铁路的大企业家得到巨額貸款造成的，如众所知，他們的一笔为数很大的期票仍在流通。另外一些人认为（見倫敦“太阳报”），英格兰銀行之所以提高貼現牌价，是想从普遍繁荣中获取自己的一份利益。而总的說来，这种行动被指責为“不妥当”。为了使讀者对此作出正确的評价，我在这里引用“經濟学家”的一份資料：

英 格 兰 銀 行			
	黃 金	有价证券	最低貼現率
1852年			
4月22日……	19 587 670 英鎊	23 782 000 英鎊	降低到 2 %
7月24日……	22 065 349 英鎊	24 013 728 英鎊	2 %
12月18日……	21 165 224 英鎊	26 765 724 英鎊	2 %
12月24日……	20 794 190 英鎊	27 545 640 英鎊	2 %
1853年			
1月1日……	20 527 662 英鎊	29 284 447 英鎊	2 %，但从1月6日起提高到 2.5 %

由此可見，銀行的現有黃金儲备比貼現率降到2%的1852年

4月多100万英鎊，但在这两个时期中間有显著的差别，因为黄金的周轉是从流入轉为流出。这种流出表現得特別猛烈，它超过了上月份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輸入量。此外，1852年4月有价证券比現在少550万英鎊。因而，在1852年4月，借貸資本供过于求，而現在正好相反。

与黄金輸出的同时，外汇牌价显著下跌，这种現象部分是由于大多数进口貨价格的大大提高，部分是由于对进口貨的广泛投机所致。与此有关的还有对农場主不利的秋冬两季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对今年收成的疑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谷物和面粉的巨額交易。最后，英国資本家广泛入股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和比利时建立铁路和其他公司，并且在不小程度上参与了現在以巴黎交易所为活动中心的普遍欺詐。因此，現在充斥于所有欧洲市場的倫敦期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就引起了外汇牌价的繼續下跌。7月24日一英鎊在巴黎換25法郎30生丁，而1月1日就只能換25法郎，某些生意甚至按低于25法郎的行市成交。

由于資本的需求与資本的供应成正比地增加，英格兰銀行最近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指望通过此項措施来消除投机和防止資本外流，我敢預言，这是絲毫无济于事的。

在讀者們随我瀏覽了证明英国不断繁荣的一系列資料之后，我再請他們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名叫亨利·摩尔根的不幸的制針工人为了出外謀生而在由倫敦到北明翰的路途上的遭遇。为了避免夸大之嫌，我特从北安普頓的報紙^①上逐字地轉抄了这篇报道。

^① 即“北安普頓信使报”。——編者注

死于贫穷

科斯格罗夫。“星期一早晨9时左右，有两个工人在科斯格罗夫教区斯雷德先生的破烂的草棚里避雨，他们听到人的呻吟声，接着就发现一个不幸的人躺在牲口棚里，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和他谈话并友好地请他共进早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摸了他一下，发觉他的身体冰凉，于是就去叫住在附近的斯雷德先生。过了一会，这位绅士打发一个小孩将这个不幸的人摺在小车上，用干草垫盖着，送往约一哩以外的亚德利-哥比昂的收容所，他到达那里正好下午一时整，但是过了一刻钟就死了。他的枯瘦的、髒污的、穿着破烂衣衫的身軀，令人不忍目睹。后来查明事情是这样的：2日星期四晚上，这个不幸的人得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济贫所所长发给穷人去亚德利收容所的一张路宿证，然后，他步行三哩多到达亚德利，被收留在收容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发给他的饭食，并请求允许他再呆一昼夜。他的请求被允许了。星期六清晨，他吃完早饭(可能，这就是他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餐)就离开收容所，返回斯特腊特福德，由于身体衰弱，两脚又被磨破(他的脚后跟已经磨破)，看来他乐意呆在这个第一次碰到的安身之处，这是属于某农场的野外建筑物的一个离公路有四哩远的做棚。6日星期一的中午，在那里有人发现他躺在干草里，因为主人不愿生人留在这里，遂命令他离开，他请求允许他再稍微呆一会儿，到下午4时左右他走了，以便在天黑前能在附近找个休息和过夜的地方，这地方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缺少半间房顶、没有门窗的破烂的草棚。就在这个难以想像的寒冷的住处，他钻进牲口棚，在那里滴水未进地躺了**七天**多，正如上面所叙述的，直到13日早上他才被发现。这个不幸的人叫亨利·摩尔根，是个制针工人；大约三、四十岁，看样子是个身体结实的人。”

很难想像有比这更駭人听闻的事件了。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人，由伦敦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的漫长而痛苦的旅途，向周围“文明”求援的绝望哀求，他的七日断食，迫使他听任命运摆布的那些人们的残酷无情，寻找容身之所的四处奔波，从收容所的屡被驱逐，最后，一个名叫斯雷德的人的惨无人道和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的默默惨死——这是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

景象。

当他在敞棚里和破烂的草棚里寻找一个容身之处时,无疑,他侵害了所有权!!!

如果把这个在高度繁荣时期发生的餓死事件告訴西蒂的养尊处优的資本家,那他会用 1 月 8 日倫敦“經濟学家”上的話来回答你們:

“令人高兴的是現在可以看到,在貿易自由时期,一切階級是如何繁荣昌盛;成功的希望增强着他們的力量;他們都在改善自己的生产,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好处。”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2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68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选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³²⁶

1853年1月21日星期五于倫敦

作为內閣新措施的結果的改选已告結束。內閣遭到了失敗。一直被认为是“爱尔兰旅”領袖的財政部部務委員薩德勒先生，被亚历山大先生所战胜：亚历山大先生以六票的优势当选。亚历山大先生的当选应归功于奧倫治派³²⁷和天主教徒的联合。另一方面，內閣在牛津大学取得了胜利，那里的投票繼續了十五天之久，斗争达到了极端緊張的程度。格萊斯頓以一百二十四票的优势战胜了高教會派³²⁸拥护者的候选人达德利·派西沃。我們建議古迪布腊斯邏輯³²⁹的崇拜者讀一讀在这次斗争中相互敌对的两家报纸——“紀事晨报”和“先驅晨报”的社論。

昨天，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后，英格兰銀行的經理們又将最低貼現率从2.5%提高到3%，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影响到了巴黎交易所，那里的各种有价证券又下跌了。即使英格兰銀行能够制止住巴黎的投机，但仍然会有使現存黄金外流的另一途徑——輸入谷物。無論是在英国，或在大陆，去年的收成估計要比常年减产三分之一。此外，到下一季收成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少粮食，人們也还存在着某些怀疑，因为庄稼由于土壤潮湿而播种晚了。所以正在

簽定輸入大量谷物的合同，結果，外匯牌價還是對英國不利。用海船從澳大利亞運來的黃金也不足以補償突然增加的谷物入口。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關於鐵的投機買賣^①。英格蘭銀行第一次將貼現率由 2% 提高到 2.5% 就已經影響了這個商業部門。近兩周售價七十八先令的蘇格蘭生鐵，本月 19 日跌至六十一先令。在鐵路股票的交易中，大概從利率提高的那一瞬間起，就可以預料到由於強制出售至今作為貸款抵押的股票而會出現停滯現象，強制出售股票的业务已經開始辦理。但是，在我看來，黃金外流不僅僅是由黃金輸出引起的，國內貿易的活躍，特別是工業區的國內貿易的活躍也充分助長了黃金的外流。

在目前政治生活暫時平靜的情況下，斯泰福宮的婦女大會關於黑人奴隸制告美國姐妹書和“美國千百萬婦女關於白人奴隸制給自己的英國姐妹們的充滿熱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對新聞界來說是很寶貴的材料。但是，沒有一家英國報紙注意到斯泰福宮會議是在薩特倫德公爵夫人主持下在宮里舉行的這個情況。而根據斯泰福和薩特倫德這兩個名字是足以公正地評價英國貴族的仁愛的，這種仁愛就是，儘可能遠離故鄉，而且最好不在大西洋此岸而到彼岸去為自己尋找目標。

薩特倫德家族致富的歷史，就是蘇格蘭-蓋爾居民破產和被剝奪的歷史，是把他們從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趕走的歷史。遠在十世紀時，丹麥人就在蘇格蘭登陸並侵佔了凱特涅斯平原，將原住居民趕到山里。按蓋爾語叫做“薩特倫德大人”的 Mor-Fear-Chattaibh，經常可以找到這樣的戰友，他們甘願冒生命危險保衛他，反對他的

^① 見本卷第 563 頁。——編者注

敌人，即丹麦人或苏格兰人，外地人或当地人。斯图亚特被逐出不列颠的那次革命³³⁰之后，苏格兰的小克兰首领间的私人纠纷日益减少，因而希望在这边远地区至少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力的英国国王们就鼓励克兰首领建立本族军队；通过这种制度，勒尔德，即这些首领们，就把现代的军事组织和古代的克兰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使前者成了后者的支柱。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兰**。克兰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换言之，它是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的。《*Klaen*》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亲系。“大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只限于在血缘亲属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一个氏族 [family] 的首领都是如此。某一克兰，即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氏族，正如俄国的农民公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一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地位同生活在我們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地位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族长的封地，而这些族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多么容易起变化，封地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同样，战争贡税或向首领缴纳的贡税同时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交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世

代代耕种的。这种貢稅不大，这与其說是現代意义上的地租或一般的收入来源，还不如說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从屬於他的族长的最高权力而繳納的貢物。直接从屬於“大人”的族长称为“塔克斯緬”[«taksmen»]，委托他們管理的土地叫“塔克”[«tak»]。“塔克斯緬”則管轄充当各村头目人的下級僕役，而这些僕役又管轄农民。

由此可見，克兰不外是按軍隊方式組織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規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傳統的强烈約束。在任何情況下，土地都是氏族的財產，在氏族內部，尽管有血緣关系，但是人們之間也有地位上的差別，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最初的篡夺是在驅逐斯图亚特之后由于建立氏族軍隊而发生的，从这时候起，貢稅成了“大人”[*Mor-Fear-Chattaibh*]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感染了倫敦宮廷的揮霍无度的風气，他就想方設法地从自己的僕役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錢，而僕役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們的下屬。最初的貢物变成了固定的貨幣代役租，实行这种代役租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会使傳統貢稅明确地固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篡夺，因为現在“大人”对“塔克斯緬”說来是处于領主的地位，而“塔克斯緬”对农民說来則以农場主的身分出現。由于現在“大人”也同“塔克斯緬”一样需要貨幣，因此，必然使生产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費，而同时也是为了輸出和交換。所以，国民生产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的多余人手也要摆脫掉。居民人数由此而开始减少。但在十八世紀时，居民多少还安然无恙，人們还没有明显地成为赤裸裸的暴利的牺牲品，这点可以从苏格兰經濟学家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著作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前十年发表的。斯图亚特（第一卷第

十六章)說:

“这些地段交納的地租,与地段的面积相比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把它同这个經濟单位所供养的人数相比,那就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地段比最富饒地区的同样面积的經濟单位所供养的人数要多十倍。”³³¹

薩特倫德伯爵夫人的管家、指导她的領地改善工作的洛克先生的著作(1820年)³³²证明,即使在十九世紀初期,土地貢稅还是很低的。例如,他举出了金特腊多埃耳領地 1811 年土地貢稅的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以前,每家每年至多須要繳納几先令的現款、供給少許家禽和服几天的劳役。

只是在 1811 年以后,才实现了彻底的和真正的篡夺,氏族的财产被强行变成了首領的私有财产,即現代意义的私有财产。这次經濟革命中的首領人物,是一位精通馬尔薩斯学說的女性——穆罕默德-阿利,也就是薩特倫德伯爵夫人,或者說,是斯泰福侯爵夫人。

首先,必須指出,斯泰福侯爵夫人的祖先是差不多拥有薩特倫德領地四分之三的苏格兰最北部的“大人”。这块伯爵領地比法国的許多省或德国的小公国还要大。薩特倫德伯爵夫人继承了这些領地,随后当作嫁妆帶給了自己的丈夫斯泰福侯爵,以后又帶給了薩特倫德公爵,这时,居住在这些領地上的居民已减少到一万五千人,高貴的伯爵夫人决定进行根本的經濟改革,将整个領土变为牧場。从 1814 年至 1820 年,这一万五千居民(約三千戶)不断地遭到驅逐和灭絕。他們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燒毀,所有的田地都被变为牧場。不列顛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結果他們竟同当地居民发生了直接的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絕离开自己的茅舍而被燒死在里面。高貴的伯爵夫人就是經過这种方式把自古

以来屬於氏族的七十九万四千英亩的土地攫为己有。在极为慷慨之时，她退还給被赶走的居民約六千英亩，每戶二英亩。而这六千英亩土地在退还以前一直是荒地，不能給所有者带来任何收益。伯爵夫人是如此的寬宏大量，她只以平均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的租金把土地出租給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伯爵家流血流汗的氏族成員，她把从氏族那里非法霸占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二十九个大牧羊場，每个牧羊場只住一家人，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租佃雇农。到1821年，一万五千个盖尔人已被十三万一千头羊所代替。

一部分被赶至沿海地区的原住居民试图以捕魚为生，他們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說法是一半生活在陆地上，一半生活在水中，但是，陆地和水合起来也只能使他們过半飽的生活。

西斯蒙第在其“社会概論”这部著作中关于对薩特倫德領地的盖尔人的这种剝夺（而这种剝夺还成了苏格兰其他“大人”仿效的榜样）作了如下的評論：

“大規模的占有領地不单单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現象，在查理大帝的整个帝国，在整个西方，軍事首領們都是篡夺整个整个的省份，并利用被征服的居民，有时甚至利用自己的战友的劳动来为自己耕种土地。在九世紀和十世紀时，曼恩、昂茹和普瓦图这三个地方，对它們的伯爵來說，与其說是公国，不如說是三块辽闊的領地。在很多方面与苏格兰相似的瑞士，在当时就被划分为几块領地。如果基堡、倫茨堡、哈布斯堡和格魯尔等伯爵处于不列顛法律的保护之下，他們也会达到像薩特倫德伯爵这样的地位。可能，他們当中的許多人会表现出同样的改良傾向（像斯泰福侯爵夫人那样），那时，为了給羊群让出地方，阿尔卑斯山上就会是不止一个共和国应该消灭了。甚至德国最专制的君主也不会让自己干出这类事情来。”³³³

洛克先生在为薩特倫德伯爵夫人辯护时（1820年）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什么正是在这个别的场合下必须有与其他一切场合所采用的原则不同的例外呢？为什么土地占有者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以及为了只是同社会本身有关的那些原因而牺牲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绝对权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就应当为了薩特倫德公爵夫人殿下的虚假的慈善行为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呢？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圈地”的过程，在英国是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的。还在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点大鸣不平。在苏格兰，这个过程是在十九世纪初叶完成的；而在爱尔兰，当时正是高潮。高贵的子爵帕麦斯顿本人不过是几年以前才把人们从自己的爱尔兰领地上“圈出去”，并且用的就是上述的方法。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一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³³⁴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上述的薩特倫德伯爵夫人的土耳其式的改革，至少可以从馬

尔薩斯主义的观点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其他的苏格兰貴族还更进了一步。在以羊代替人以后，他們紧接着又以野兽代替羊，而以狩猎区代替牧场。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托尔公爵。

“在征服英国以后，諾曼諸王把英国的大片土地改变成森林；现在这里的領主也是这样对付苏格兰高地的。”（罗·薩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1848年版）335

为了要給阿托尔公爵的野兽和薩特倫德伯爵夫人的羊騰出地方而被赶走的那群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們被迫逃往何方呢？他們在哪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呢？

在北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雇佣奴隶制的反对者有权譴責黑人奴隶制，但是薩特倫德公爵夫人、阿托尔公爵、曼彻斯特的棉紡大王們——决不可能！

卡·馬克思写于1853年1月21日

載于1853年2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3687号，并摘要載于1853年3月12日“人民报”第45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馬克思
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
——英格蘭銀行的措施³³⁶

1853年1月28日星期五于倫敦

1月25日“泰晤士報”上有一篇題為“自殺成風”的文章，發表了如下見解：

“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國每當公開執行絞刑之後通常會立即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或不幸事故；這是處死某一著名罪犯對神經過敏病患者和神經衰弱的人的強烈影響的結果。”

“泰晤士報”列舉了一些事件來證實這種論斷。其中一個事件是：在設菲爾德有一個瘋子，當他同另一些瘋子談過關於巴爾布爾被處死的情形之後，就上吊自殺了。另一事件發生在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身上，他也是上吊自殺的。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大概也不會認為所舉事實可以作為哪一種說法的論據。這裡簡直是在公開歌頌劊子手，因為死刑被稱贊為社會的 *ultima ratio* [最後的手段]，而這一切居然登載在一家“指導性的報紙”的社論上。

“晨報”對“泰晤士報”的酷愛絞架和該報的血腥邏輯提出非常尖銳而又恰當的批評，並附有下面一個在1849年四十三天內發生的事件的很有趣的日志：

死 刑	杀人和自杀
米尔兰…………… 3月20日	汉納·桑德耳斯…………… 3月22日
	莫·乔·牛頓…………… 3月22日
普利…………… 3月26日	約·乔·格利森——在利 物浦四次杀人…………… 3月27日
斯密…………… 3月27日	
豪…………… 3月31日	在萊斯特杀人和自杀 …… 4月2日
	在巴特毒杀事件 …… 4月7日
	威·貝利 …… 4月8日
兰迪奇 …… 4月9日	約·华德杀死了自己的 母亲…………… 4月13日
薩拉·托馬斯… 4月13日	亚德利…………… 4月14日
	道克西杀死了父亲…………… 4月14日
	約·貝利杀死了自己的 两个孩子之后自杀了… 4月17日
約·格里菲思… 4月18日	查理·奧弗頓…………… 4月18日
約·拉什…………… 4月21日	丹尼尔·霍姆斯登 …… 5月2日

这个統計表证明(“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不仅自杀而且連最殘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奇怪的是,上述文章甚至沒有拿出任何一个論据和前提来闡明它所宣揚的野蛮理論。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則,可以用来論证在以文明自負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許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說来,刑罰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統計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該隱以来,利用刑罰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沒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权利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罰理論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論,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謹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說:

“刑罰是罪犯的**權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為。罪犯把違法說成是自己的權利。他的犯罪是對法的否定。刑罰是這種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這種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並且是他強加於自身的。”³³⁷

毫無疑問，這種說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確的，因為黑格爾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單純的客體，即司法的奴隸，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決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們稍微深入些觀察問題的本質，就會發現，德國唯心主義只是通過神祕的形式贊同了現存社會的法律；在這裡是如此，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着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着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這種把刑罰看成是罪犯個人意志的結果的理論只不過是古代 «jus talionis» [“報復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思辨表現罷了。直截了當地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比劊子手更好的自衛手段，並通過“世界指導性的報紙”把自己的殘酷宣稱為“永恆的法律”，這樣的社會也實在是太美妙了。

阿·凱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學著作“人和人的能力”³³⁸一書中寫道：

“有一種預算，是我們根據它有規律地進行開支的，這就是監獄費、拘留所費、斷頭台費……我們甚至可以用我們預計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數的方法來預算出將會有多少人用自己親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雙手，將有多少人進行欺詐，將有多少人進行毒殺。”

凱特勒先生在1829年發表的對可能出現的罪行的估計，不僅僅以驚人的準確性預算出了後來1830年在法國發生的犯罪行為的總數，而且預算出了罪行的種類。凱特勒引用的下面這個

1822—1824年間的統計數字證明，社會的這一或那一部分國民犯罪行為的平均數與其說決定於該國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說決定於整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基本條件。美國和法國的一百個被判刑的罪犯的情況是這樣的：

年 齡	費拉得爾菲亞	法 國
21 歲以下	19	19
21 歲到 30 歲	44	35
30 歲到 40 歲	23	23
40 歲以上	14	23
合 計	100	100

這樣，如果說大量的犯罪行為從其數量和種類就會揭示出像自然現象那樣的規律性，或者如果說，照凱特勒的說法，“在兩個領域（物理世界或社會生活）的哪一領域中動因非常合乎規律地導致一定結果，這是很難斷定的”，那末，應不應該認真考慮一下改變產生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頌揚那些處死相當數目的罪犯來為新的罪犯騰出位置的劊子手呢？

理查·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40頁）³³⁹的出版是哄動一時的事件之一。這本小冊子的第一部分考察了1793年革命時期和革命以前的時期，由於作者公開和大力地抨擊了英國人對這個時代的陳舊的偏見，這一部分是值得稱贊的。科布頓先生證明，在革命戰爭中英國曾是侵略的一方。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獨創的見解，實質上他只是重復英國過去的最偉大的小品文作家、已故的威廉·科貝特下過的結論，而且要遜色得多。另一部分雖然用經濟學觀點寫成，卻多少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科布頓先生極力證明：關於路易-拿破侖企圖入侵英國的臆測是完全荒謬的，關於英國未設防的流言並沒有現實的根據，而且

這些流言只是希望增加國家開支的人散布出來的。他根據什麼來證明路易-拿破侖對英國不懷一點敵意呢？他根據的就是拿破侖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跟英國翻臉。他又根據什麼來證明敵人不可能侵入英國呢？照科布頓先生的說法，就是根據英國在八百年間沒有遭受過侵犯這一點。最後，他根據什麼理由來證明關於國防情況令人不滿的叫嚷是純粹自私自利的欺人之談呢？他根據的就是最高軍事當局的聲明：他們感到非常安全！

路易-拿破侖甚至在立法議會上還從來沒有遇到哪一個崇拜者是如此地輕信他的真誠意願與和平意願，而現在他却十分意外地發現以理查·科布頓先生就是這樣的崇拜者。拿破侖的一貫維護者——“先驅晨報”——發表了（在昨日那一號）一封信，這封信是給科布頓先生的，而且大家確信是在波拿巴本人直接唆使下寫成的；薩托里的至高無上的英雄³⁴⁰ 在信中向我們擔保，只有在女王^① 遭到起來暴動的民主派的威脅因而需要他的二十萬名 *décembraillards*，或吶喊者^② 的時候，他才會光臨英國。但是，按“先驅報”的意思，這個民主派不是別人，正是科布頓一伙人！

必須承認，仔細讀過上述的小冊子之後，我們自己也開始擔心，是不是會發生像侵犯大不列顛這樣的事。科布頓先生不能算是幸運的預言家。在廢除穀物法之後，他旅行了大陸，甚至訪問了俄國；回國後他說，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各國人民都一心一意地致力於商業和工業活動，現在都給自己選擇了一條平靜的、沒有政治風暴、爆發和震蕩的純業務的發展道路。他的

① 即維多利亞。——編者注

② *décembraillards* (*décembre*+*braillards*) 直譯是：“十二月會的吶喊者”；指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會的成員。——編者注

預言还未来得及傳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 1848 年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布頓先生簡短的預言的諷刺性的回答。在根本沒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說那里有和平。

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論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只是把問題說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資本代替大炮。和平协会昨天在曼彻斯特开了会，会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們对路易-拿破侖的統治进行的令人討厭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在注意这篇声明的时候，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下院通过了增加陆海軍費用，竟沒有遭到任何反对，而且沒有一个出席和平會議³⁴¹的議員讲一句反对扩軍提案的話。

在因議會延期召开而出現的政治沉寂的时期，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問題上：当前的改革方案和英格兰銀行最近关于貼現率的規定。

本月 24 日“泰晤士报”向公众报道說，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草拟中。关于改革方案的性质，从查理·伍德先生在哈里法克斯的竞选演說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演說中表示反对各选区一律平等的原則；其次，从詹姆斯·格萊安在卡賴尔的演說也可以看出，他在演說中反对秘密投票；最后，根据下面流傳的一种看法也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就是：甚至約翰·罗素³⁴²在 1852 年 2 月开的极小的改良主义药丸也是过于强烈和过于危險的。但是，还有一些迹象使人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联合內閣的喉舌“經濟学家”在 1 月 22 日的这一期中不仅肯定：

“我們的代議制的改革被列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才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且硬說“我們還沒有从事立法活动的初步材料。选举权的扩大、

平等化、調整、修改、保护和重新分配，这就是問題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每一方面都需要深入考虑和認真研究……不能說我們有一部分国家活动家对所有这些問題或其中若干問題缺乏应有的有用知識，不过他們的知識是偶然获得的而不是經過一番功夫得来的，因而这些知識很杂乱、片面和不完全……显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选出一个**問題研究委員會**来研究同這個問題直接或間接有关的全部問題。”

这样，*coram publico* [当着全体人民，当着公众]研究政治的任务又摆在我們的瑪士撒拉的內閣³⁴³ 面前了。皮尔的同僚、墨尔本的同僚、坎宁的助手、老格雷的副手以及在利物浦勛爵手下或在格倫維耳勛爵內閣里供职的人們，原来所有这些半个世紀前才开始自己的活动的新手，都因为經驗不足而不能向議會提出什么有关选举改革的彻底的建議。看来，“經驗随年岁而增加”这个旧諺語也得被推翻了。“每日新聞”惊呼道：“各派老将的联盟的这种謙虛态度可笑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同时它質問道：“你們的改革方案又在哪里呢？”“晨报”回答說：

“我們的意見是，現在这次會議根本不会討論任何改革法案。也許会試着采用一些立法措施来防止贿选和懲罰贿选，对其他一些次要問題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也許会努力去消除在國內議會代表名額的分配中产生的缺点，不过这种立法措施是不能称为新改革法案的。”

至于英格蘭銀行最近关于貼現率的規定，那末初期由于这些規定而引起的混乱，現在已經平息了。实业家也和理論家們一样相信，目前的繁荣景象不会再有大的中断或根本中止。但是，請讀一讀“經濟学家”的下面这段話吧：

“今年我国种植小麦的广大地区什么东西也沒有长出来。在我国土壤肥沃的广大区域有許多用来种植小麦的地方至今沒有播种，某些已經播种的地方情况也不妙，因为麦苗不是死了就是很不茁壯，要不就是遭了严重的虫災，以致这些地区的所有者的前景未必会比根本没有下种的好。要把全部用来

种植小麦的面积重新翻耕現在已經几乎不可能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市場和矿井的开发而暂时推迟了的危机无疑地将在歉收时发生。銀行关于貼現率的規定只不过是第一个不祥之兆罢了。1847年，英格兰銀行曾十三次变更貼現率。1853年这种措施将会有几十次。最后，我想向英国經濟学家們提个問題：現代政治經濟学在反对重商主义时曾证明：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产品只是同产品交换，黄金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可是現在，同一个政治經濟学在其生命終結的时候又以极其恐慌的心情注視着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經濟学家”說：“銀行必須通过自己的业务来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阻止資本輸出。”但是，“經濟学家”是否打算阻止棉織品、生铁、毛織品和衣料的輸出这样的資本輸出呢？难道黄金不是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嗎？“經濟学家”是不是在晚年也变成了重商主义者呢？它是不是打算让外国資本自由輸入而禁止英国資本輸出呢？它是不是希望廢除文明的保护关税政策而恢复土耳其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呢？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說政界里广泛流傳着一种說法，好像格萊斯頓先生与阿伯丁內閣的許多領導人物在所得稅問題上发生了分歧，并且这位可尊敬的紳士的辞职可能会是这些分歧的結果。如果是这样，墨尔本勋爵政府的前任財政大臣弗兰西斯·貝林先生也許就是格萊斯頓的继承人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3 年 2 月 1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69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国防。——財政。——貴族的
死絕。——政局

1853年2月8日星期二于倫敦

“每日新聞”斷言，政府現在正在認真地研究設立海防民軍的問題。

銀行的報告說明，黃金數量又減少了362 084英鎊。最近兩個星期內支出的黃金約1 000 000英鎊，其中一部分運往大陸，另一部分鑄成貨幣運往澳大利亞。法蘭西銀行的黃金儲備也在繼續減少（儘管英國的黃金大量流入法國），這表明私人已經開始在儲藏黃金，而這一點又清楚地說明：人們都不相信拿破侖政權能夠持久。

現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資，特別是造船工人、采煤工人、工廠工人和機械工人。這種要求是由普遍的繁榮引起的，而這種要求不能看做是一種十分異常的現象。更加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農業工人的組織得井井有條的罷工——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件。南威爾特郡的農業工人舉行了罷工，要求提高工資2先令，現在他們一周的工資只有7先令。

根據中央戶籍局局長的季度報告，去年從大不列顛遷往國外的每天有1 000人；人口的增长數略有下降。與此同時，結婚的人

数却有显著的增加。

在最近两周內，由于墨尔本子爵和梯尔科奈尔伯爵以及牛津伯爵的亡故，貴族中又有三家死絕。如果說有什么階級是馬尔薩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級数增长的規律的例外的話，那末这就是世襲貴族階級。就拿大不列顛的貴族和从男爵为例來說吧。目前，諾曼貴族已經是絕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絕大部分議員是在 1760 年被册封为貴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 1611 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貴族，現今只剩下 13 家了；在 1625 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貴族，現在只剩下了 39 家。这个規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斯貴族的異常迅速的死絕，尽管威尼斯貴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就被列为貴族。据阿姆洛的計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議會享有表決权的貴族有 2 500 人³⁴⁴。到十八世紀初这种貴族只剩下 1 500 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貴族。伯尔尼最高評議会在 1583 年到 1654 年这段時間里曾經把 487 家列入世襲貴族；其中在两个世紀之內死絕的有 399 家，到 1783 年，剩下的只有 108 家。如果看看更古一些的历史时期，那末塔西佗告訴我們，克罗狄烏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的一代貴族，*«exhaustis etiam quas dictator Caesar lege Cassia et princeps Augustus lege Saenia sublegere»* [“因为甚至执政官凱撒根据卡西烏斯法和元首奧古斯特根据謝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貴族也都死絕了”]^①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襲貴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不是經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

① 塔西佗“編年史”。——編者注

地加以維持的制度，那末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已因自然死亡而絕灭了。現代生理學认为，在高級动物中間，生殖力同神經系統的發展，特別是同腦髓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誰也不敢說，英国貴族的死絕同腦髓的过多有任何联系。

看来，那些預言“千年王国”的到来并且为它奠定了基础的政党，現在，即还在下院开会之前，就认为它已經不存在了。2月4日的“泰晤士报”說道：

“曼彻斯特派对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大发雷霆……而爱尔兰天主教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則把他們值得怀疑的热烈的贊揚献給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

“泰晤士报”使用的“爱尔兰社会主义”一詞，显然是指关于保障租佃者权利的宣傳。我打算在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來說明，現代所有的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論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³⁴⁵。其他報紙很少贊同剛剛引用的“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見解，这一点我們从“晨报”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來：

“假如我們认为爱尔兰人能够背叛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則，我們就是輕視了他們。”

阿伯丁的報紙的盛怒，是由于“千年”內閣的希望完全破灭的事实引起的。薩德勒先生和克奧先生是爱尔兰旅的公认的領袖，——一个是在內閣中，另一个是在戰場上。薩德勒先生是指导者和操纵者，克奧先生是发言人。收买了这两个人，就可以指望控制他們全体。但是，爱尔兰旅的成員被派到議會來担負着一項义务，这就是：充当反对派，对任何一个不确立宗教上的完全平等和不实现舍尔曼·克罗弗德关于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³⁴⁶原則的

政府保持獨立。由此可見，“泰晤士報”所以對這些人發怒，是因為這些人不願意毀棄自己的諾言。克耳斯(米斯郡)的集會和宴會使它發怒的直接原因。分發出去的通知號召所有收到通知的人對“不久前愛爾蘭議會黨隊伍中的逃跑現象”表示自己的不滿；同時還根據這個精神起草了決議。

內閣在愛爾蘭旅身上打的主意落空了，這是事前就可以預料到的；但是，愛爾蘭各個黨派的性質和立場現在正在發生變化，看來不論是這些政黨本身還是英國報刊，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變化的深刻意義。主教們和絕大多數僧侶都贊同參加政府的天主教議員的行為。卡爾洛的僧侶完全支持薩德勒先生，假如不是保障租佃者權利同盟的成員齊心協力的話，他是會遭到失敗的。真正的天主教政黨對這個分裂的看法，可以從法國的耶穌會全歐機關報“宗教、哲學、政治、科學和文學界”的一篇文章看出來。這篇文章說：

“能夠有充分根據地對克奧先生和薩德勒先生提出的唯一的指責，就是他們讓人家把他們同兩個團體（即保障租佃者權利同盟和宗教平等擁護者協會）牽扯在一起，這兩個團體只有一個目的——使毀滅愛爾蘭的無政府狀態合法化。”

“宗教、哲學、政治、科學和文學界”在激怒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這兩個團體公開同主教和僧侶作對，而且這是發生在主教和高級僧侶過去一向是人民和國民組織的最能得到信賴的領導者的國家里。”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假如保障租佃者權利同盟的擁護者偶爾出現在法國的話，那末“宗教、哲學、政治、科學和

文学界”是會想尽办法把他們放逐到凱恩^①去的。合并取消派³⁴⁷的鼓动純粹是政治运动，因此天主教僧侶能够利用这个鼓动从英国政府那里爭取到一些让步，在这里爱尔兰人民只是神甫手中的工具。保障租佃者权利的鼓动則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教会和爱尔兰革命政党之間发生彻底的破裂，从而把人民从几百年以来使他們所做的全部努力和牺牲以及他們的全部斗争化为烏有的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

現在，我們来談談郎卡郡改革运动的領導者們和該郡的代表本月3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聚会”。大会主席是乔治·威尔逊先生。他只談到商业和工业区的代表名額同农业区的代表名額不平等的問題，关于这个問題他說：

“在巴金汉、多尔塞特、威尔特、北安普頓和塞洛普这5个郡里，52 921名选民选出了63名議員，而拥有89 669名农村选民和84 612名城市选民即共計174 281名选民的郎卡郡和約克郡也只选出同样数目的議員。假如仅仅根据选民数字按比例地选举議員的話，那末这5个郡只能得到19个席位，而郎卡郡按同样的代表比例，則有权得到207个席位。12个大城市或城市选区（把倫敦算作两个城市选区）拥有192 000名选民、3 268 218名居民和383 000家住户，共选举24名議員。同时，安多佛尔、巴金汉、契珀楠、考克茅斯、托特涅斯、哈里季、洪尼頓、泰特福德、利明頓、馬尔波罗、大馬尔波罗和里士滿共有3 569名选民、67 434名居民和1 373家住户也同样选举24名議員……即使是最胆怯的改革家和最温和的人，大概也不会反对剥夺居民在5 000人以下的小地方的代表权而給大选民区增加20个以上的席位。”

議員米尔納·基卜生先生談論了国民教育和知識稅的問題。关于改革法案，在他的演說中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关

① 凱恩是南美法屬圭那亚的行政中心。过去法国反动統治者經常把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譯者注

于平等的选区这一条的声明：

“这一条也许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

另一位議員布拉瑟頓先生說：

“目前，任何一个不規定平等分配代表名額的改革法案都不能令人滿意。”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議員布萊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大人物”中間的真正大人物的演說。他說：

“政府是由輝格党和皮尔派組成的联合政府…… 我們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庆幸，以为我們的政府里已經有了能够致力于新的原則、执行新的政策的人，有了广泛地開創事业而不需要全国各地所有的改革拥护者推动他們的人。（喊声：“对！”）”

关于議會改革，布萊特发表了如下的意見：

“假如路易-拿破侖在法国实行像我們这样的代議制，假如他把所有的代表席位都給了最拥戴波拿巴王朝的农村地区，而不允許巴黎、里昂、馬賽选举代表，那末所有的英国报刊都会对他在法国实行的这种虚伪的代表制度加以譴責。（喊声：“对，对！”）…… 这里，郎卡郡，人口占英国的八分之一，征稅的财产占英国的十分之一，住戶也占英国住戶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們开始懂得了我們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个小障碍，这就是秘密投票碰到的障碍。（喊声：“听啊，听啊！”）我讀了約翰·罗素勋爵在他竞选时发表的演說；大概，倫敦的选民們当时的情緒特別好，否則他們是不会不反对他所說的‘反对任何秘密’的。看完这个演說后，我自言自語地說：‘好，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拥护者，我就会建議你帶上“泰晤士报”編輯部的記者参加內閣的最近一次會議。’（喊声：“对！”笑声）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詹姆斯·格萊安爵士的論据，他声明說，‘他不认为，可以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为什么不能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呢？既然公开投票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那末秘密投票也同样可以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秘密投票在馬薩諸塞州（或許也在美国其他州里）已經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同时，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很了解，他在卡

賴尔两三千居民面前讲的話是多么缺乏根据。那一天下着雨，我猜想，听众們在雨伞底下是不能十分仔細地斟酌他所提出的論据的。

布萊特先生在結束他的演說时說：“我們不应当忘記，英国从 1688 年革命以来，特別是在最近几年內获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工业和商业階級反对这个国家的貴族階級和特权階級的勇敢的斗争中取得的。我們应当繼續这种冲突，偉大的事业还有待于完成。（掌声，喊声：“对，对！”）”

一致通过的決議写道：

“大会号召同郎卡郡有联系的自由派代表們把自己看成一个以促进有利于議會改革的任何措施为己任的委员会，以便保证郎卡郡的代表名額能够增加得同該郡的人口、工业、财产和文化相适应。”

在这个大会上，曼彻斯特派又重复了他們的战斗口号：“工业資產階級反对貴族階級”。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泄露了他們的政策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他們力图剝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維護他們自己的特殊的階級利益。所有有关秘密投票、国民教育、知識稅等等的議論都不过是修辞性质的点綴。他們認真提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选区的平等，至少这是作为通过決議的基础和加給代表們以相应的义务的唯一的一条。为什么？在选区平等的情况下，城市的利益就会压倒农村的利益，資產階級就能把下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曼彻斯特派能够获得选区的平等，而又能避免对宪章派作重大的让步，那末后者碰到的就将不再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双方都爭先恐后地力图把他們拉到自己方面去的敌人，而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軍，他們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抵制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会在一个时期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建立起資本的无限統治。

对于联合內閣來說，那些在克耳斯和曼彻斯特对上届政府所作的热烈的贊揚可以說是一个不吉之兆。議員魯卡斯先生在克耳

斯声称說：

“在租佃者权利的反对者当中，沒有比兰斯唐侯爵、帕麦斯顿勋爵、悉尼·赫伯特等人更坚决的了…… 輝格党的內閣和格萊安的支持者不是对租佃者問題經常发表敌意的怨言嗎？另一方面，我們再来看看托利党的官方代表；让每一个讀过由各个党派提出的提案的人說句良心話：得比內閣在这个問題上的行为是不是比輝格党更誠实一千倍？”

米尔納·基卜生在曼彻斯特的大会上发表声明說：

“即使上届內閣的預算案整个說来非常糟糕，它在将来的政策方面总还有一些好的迹象。（喊声：“对，对！”）上届財政大臣至少是打开了局面。我指的是茶叶稅。据我听到的可靠的消息說，上届政府曾經打算廢除广告稅。”

布莱特先生的贊揚更进一步：

“在所得稅問題上，上届政府做的是很大胆的。从占有英国很大一部分不动产和地产的农村貴族方面提出和支持一个規定不动产的稅率和商业收入以及其他非固定收入的稅率不同的草案，这是一个我們不应当加以忽略的步驟，在我們的地区是应当欢迎这个步驟的。而迪斯累里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应当說，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謝。在他报告預算案的前言中，在使他遭到最終失敗的那天夜里同所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力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舌战的演說中，他談到了遺產稅（而所謂遺產稅，按我們的理解，包括动产繼承稅和遺產印花稅），他认为这些稅是需要加以整頓的。（热烈的掌声）”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8 日

載于 1853 年 2 月 2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699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意大利起义。——不列顛的政策

1853年2月11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意大利傳来的革命消息，突然打破了倫敦很久以来普遍存在的、在天然的濃雾复盖下的政治上的消沉气氛。根据电报得知：本月6日在米兰爆发了起义；散发了两份傳单，一份由馬志尼署名，另一份由科苏特署名，傳单号召奥地利軍隊中的匈牙利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起初起义曾經被鎮压下去，但随后又重新爆发起来；駐守軍火庫的奥地利人被全部歼灭，等等；米兰的城門已經关闭。不錯，法国政府的报纸发表了本月8日来自伯尔尼和本月9日来自都灵的两則补充消息，消息說起义在7日已被彻底鎮压下去。但是意大利的朋友們却认为，英国外交部接連两天都沒有获得任何直接的情报，这是一个吉兆。

巴黎傳說皮薩、魯卡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处在巨大的騷动中。

在都灵，內閣在接到奥地利領事的通知以后，召开了紧急會議討論倫巴第的局勢。最早的消息傳到倫敦是2月9日，这一天恰好是1849年羅馬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紀念日³⁴⁸，是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日子，也是1689年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日子，这真是一个巧合。

假如不能有几个奥地利团的兵力轉到革命方面来，那末目前

的米兰起义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最近我会接到一些从都灵寄来的私人信件，也许，这些信件会使我有可能会对所发生的一切作详细的报告。

关于不久前路易-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福隆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³⁴⁹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到惊奇；其实，当五个月之前从阿尔及利亚逃跑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三千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一千二百名公民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四千三百一十二人；这就是说，路易-拿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一百人！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人就达四千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二百二十六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二千六百一十一人，其中被赦免的有二百二十九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人是平均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被赦免的有一百八十人。在瓦尔省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六百八十七人。在被流放到凯恩去的一千二百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整个非洲去的大批的人的人数相比的。这个数字据估计共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

在名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12月的血腥 battues [圍剿]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昨天，議會又召开了會議。在上院演出了一場戏，这可以算是“千年”內閣的未来活动的一个应有的序幕。得比伯爵質問阿伯丁伯爵，政府打算提出什么措施提交議會審議。后者回答說，他早先已經說明过自己的原則，再重复一遍是不必要的，而在向下院宣布这些原則之前，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說明是过早的。接着是一場十分奇妙的對話，在這場對話中，得比伯爵的話一句接一句，而阿伯丁伯爵只是意味深长地不住地点头。

得比伯爵：“我想請問勛爵閣下，在这次會議期間，他打算向上院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啞場几秒钟；勛爵閣下并未起座。

得比伯爵：“也許，沉默就是意味着沒有措施？”(笑声)

阿伯丁伯爵嘟囔了一句什么，誰也沒有听清。

得比伯爵：“我是否可以請問一下，向上院将要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沒有任何回答。

議長提議休会，上院通过了休会的決定。

假如我們从上院轉到“忠于女王陛下的下院”的話，那末我們也許不能不同意：阿伯丁伯爵用他的沉默闡述內閣的綱領，比約翰·罗素勛爵昨天晚上用冗长而費解的演說闡述得要清楚得多。罗素的演說可以簡單地歸納如下：“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人”；把所有应由議會審議的問題的解决推迟一年，而在此期間，女王陛下的大臣們的薪俸将按时發給。約翰·罗素勛爵大致用下面的話表达了政府的这个意图：

“至于应当加以确定的陸軍、海軍和炮兵的人員数目，那将不会超过聖誕节前所确定的数字。至于預算中各个支出項目的数額，它們将比去年的

預算大大增加…… 將提出一項法案，根據這項法案加拿大立法機關將有權使用加拿大的後備教會基金…… 商業大臣將提出關於領港員問題的法案…… 對女王陛下的猶太臣民的权利限制將要廢除…… 將提出有關教育的提案。我還不能肯定，我將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在這方面提出的草案的範圍究竟有多麼廣泛。這個草案包括有關貧苦階級的教育措施，以及關於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建議…… 流放到澳大利亞去的制度將要廢除…… 將提出有關減輕對犯罪行為的懲罰的制度的法律草案…… 在復活節之後，財政大臣將立即或儘快地提出本年度的財政草案…… 最近幾天，上院議長將說明他準備提出的有關修正法律的措施…… 愛爾蘭事務大臣準備幾天後提出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的提案，該委員會將負責研究關於愛爾蘭的大地主和租佃者的一個法律草案…… 大臣們將盡全力來重新規定今年的所得稅，而不必再進行任何討論和辯論。”

關於議會改革，約翰·羅素勳爵聲明說，它可能成為下屆會議的討論題目。這就是說，目前不會提出任何改革法案。並且，小約翰還竭盡全力否定這樣一種設想：似乎他曾在什麼時候答應提出比他在上屆會議期間提出的法案³⁵⁰更帶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代議制的草案。他甚至由於把這種諾言硬加在他的身上感到生氣。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也從未想到過這一點。他甚至不能擔保，他打算在下屆會議上提出的法案能像1852年的法案那樣全面。關於賄賂和舞弊行為，他說：

“關於進一步制止賄賂和舞弊行為的措施是否必要，我認為最好等一等再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只想指出一點：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簡直無法形容下院對頂點約翰³⁵¹的這篇演說的反應多麼冷淡和多麼感到驚奇，很難斷定，究竟是他的朋友大惑不解還是他的敵人的幸災樂禍占主要地位。但是，看來所有的人都認為這篇演說徹底推翻了盧克萊修的關於«nil de nihilo fit»〔“無中不能生

有”]①的学說。至少約翰勛爵是从无中生出了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篇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演說。

原来以为，內閣是把自己的生存同新的所得稅稅額和新的改革法案这两个問題联系起来的。但結果是：关于所得稅，建議以現有的形式繼續保留一年。关于改革法案(甚至是在輝格党所規定的限度內的改革法案)則宣布說，大臣們只有在他們继任一年的条件下才准备提出。总的來說，除了改革法案以外，这些都是上届罗素內閣的綱領的再版。甚至預算草案的討論都要推到复活节以后，这样，大臣們不論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領到一季的薪俸。

关于部分改革的提案几乎完全是从迪斯累里先生的綱領中抄来的。例如，修正法律、廢除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关于領港員問題的法案、設立租佃者权利問題委员会等等。屬于現任內閣自己的条款只有設想中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規模，根据約翰勛爵自己告訴我們的話来看，不会比他本人更大)和廢除对于拉約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法律限制。賦予这个犹太高利貸者(大家都知道，他是波拿巴所发动的政变的同謀者之一)以选举权，是否就能使英国人民得到很大的滿足，那是值得怀疑的。

由在最近的大选中遭到完全失敗的两个政党的代表組成的內閣的这种无耻行徑，除了下面这个原因之外，是很难用別的理由来解釋的，这就是：任何新的改革法案都会要求解散現在的下院，而下院的大多数却牢牢抓住他們的議員席位不放，因为这些席位是他們高价买来的，是靠微不足道的多数选票获得的。

“泰晤士报”试图用来安慰讀者的办法可以說是最妙不过

① 卢克莱修：“論物性”。——編者注

的了：

“下屆會議，——这个期限比明天要更肯定得多，因为明天不仅取决于意志，而且取决于办事拖拉的人的生命。而只要世界不毁灭，下屆會議却一定会到来。既然如此，我們就把整个議會改革問題推迟到下屆會議召开时再談，而让內閣安靜一年吧！”

至于談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社会輿論消极冷淡的情况下，“在貴族联合內閣的冰冷气氛的籠罩下”，改革法案不由大臣們賞賜給人民，这对人民來說倒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应当忘記，阿伯丁勛爵曾經是托利党內閣的成員，这个內閣在 1830 年曾經拒絕同意改革方面的任何一个步驟。全国性的改革必須通过全国性的宣傳运动來實現，而不能依靠阿伯丁閣下的恩賜。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件事：上星期一，**全国保护不列顛工业和資本协会**³⁵²的总委員會在里士滿公爵主持下在南海公司大厦召开了一个專門會議，会上該协会通过了解散协会的明智的決議。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11 日

載于 1853 年 2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701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
論壇报”

卡·馬克思
弗蘭茨-約瑟夫遇刺。——米蘭
起義。——不列顛的政策。
——迪斯累里的演說。
——拿破侖的遺囑

1853年2月22日星期二于倫敦

來自施土爾威森堡^①的電報報告了如下的消息：

“本月18日下午一時，沿維也納城堡散步的奧皇弗蘭茨-約瑟夫突然遇刺，行刺者是一個名叫拉斯洛·李伯尼的匈牙利的裁縫幫工、原維也納的驃騎兵。行刺者用短劍刺傷了皇帝。侍衛官奧當奈爾伯爵攔住了行刺者。弗蘭茨-約瑟夫腦後被刺傷。這個二十一歲的匈牙利人被侍衛官用馬刀砍倒在地，並當場被捕。”

據另外一種傳說，行刺者使用的武器是火槍。

在匈牙利，最近剛剛揭發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旨在推翻奧地利的統治的密謀案。

“維也納日報”發表了幾份軍事法庭關於三十九人案件的判決書，這些人的主要罪名就是他們曾經同漢堡的科蘇特和盧施薩克共同策劃密謀。

^① 匈牙利稱作：塞克希費黑伐爾。——編者注

米兰的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拉德茨基立即颁布命令断绝同皮蒙特和瑞士的一切来往。也许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们已经得到从意大利传到英国来的点滴消息。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米兰事件的一个特征。

拉德茨基元帅的助手斯特拉索尔多伯爵在他本月6日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坦率地承认，大多数的居民完全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宣布米兰实行特别戒严。在随后发布的、带有“2月9日于维罗那”字样的公告中，拉德茨基推翻了他的部下的声明，力图利用起义的事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除了显然属于奥地利党的人之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处以大量罚款，把这些钱拿来给卫戍部队用。他在本月11日的公告中说，“大多数居民，除了少数值得赞扬的例外，都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他命令所有的司法机关即军事法庭没收所有同谋者的财产，而他给同谋下的定义是：

«Che tale complicità consista semplicemente nella omissione della denuncia a cui ognuno è tenuto». [“拒绝告密本身就是同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告密的义务。”]

根据这个理由，他可以拿6日发生起义，而5日居民没有告密为借口，立即把整个米兰没收。谁不愿作哈布斯堡王朝的间谍和密探，克罗地亚兵³⁵³就可以依法加以处置。一句话，拉德茨基宣布了一个新的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制度。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这些手中只有短刀作为武器的少数无产者，竟敢于向卫戍部队和驻扎在四周的四万名欧洲精锐之师这样的强敌发动进攻；

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財神的子孙們却在自己的民族飽受凌辱和蹂躪、流着鮮血和眼泪的时刻，沉緬于歌舞升平、灯紅酒綠的生活。但是，把这次起义当作馬志尼的种种不朽的密謀的最后結局来看，当作他針对着法国人民而发表的种种言过其实的宣言和盛气凌人的說教的最后結局来看，其結果却未免太可怜了。不过，我們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說的 *révolutions improvisées* [即兴的革命] 能够从此結束。有誰听說过，偉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偉大的詩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詩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 1848 年和 1849 年的可怕的經歷之后，要喚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領袖的紙上的号召已經不够了。科苏特利用一个机会，公开地完全否认自己同起义的联系以及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但是，他在事后要求大家承认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比他的朋友馬志尼高明，这一点看来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先驅”就这一点写道：

“我們认为有必要預先告訴我們的讀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

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在給“每日新聞”的信中，就科苏特先生和阿哥斯提尼先生的种种否认写道：

“有人怀疑他們是在坐观起义的成敗，准备或者分沾成功的荣誉，或者推脫失敗的責任。”

前匈牙利大臣貝·瑟美列在致“紀事晨报”編輯的信中抗議“科苏特非法盜用匈牙利的名义”，他說：

“誰想要对作为国家活动家的科苏特作出自己的評价，他就应当仔細研究一下最近一次匈牙利革命的历史；誰想要了解他作为一个密謀家的才能，他就应当回顾一下去年的不幸的漢堡远征。”

革命虽敗犹勝。这一点，从米兰的 *échauffourée*〔盲目举动；有勇无謀的行动〕在大陆各国的統治者中間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事件使他們大为震惊。只要讀一讀下面这封发表在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信就可以知道了：

“柏林2月15日訊：米兰事件在这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是本月9日傳到国王那里的，那时正是宫廷舞会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当时国王立即宣布說，运动是同一个有深刻根源的密謀相联系的，这个密謀的枝極遍布各地。他說，面对着这个革命运动，普魯士和奧地利必須建立紧密的联盟……一位高級官員喊道：‘也許，我們不得不在波河上保卫普魯士王国了’。”

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在柏林逮捕了大約二十个居民，对米兰事件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次逮捕的唯一理由。极端保皇主义的报纸“新普魯士报”就因刊登了科苏特所写的一份文件而被沒收。13日，大臣馮·威斯特华倫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匆匆拟定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政府沒收所有一切不是在普魯士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在維也納，逮捕和家宅搜查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俄国、普魯士和奧地利立即开始了会談，以便就政治流亡者問題向英国政府提出共同的抗議。請看，所謂的欧洲“列強”是多么脆弱，多么无力！革命地震的預报剛剛发出，他們就感到欧洲所有的王位都已經从根本上动搖了。虽然他們在自己周圍布滿了軍隊、絞架和監獄，他們却在被他們称之为“少数被人收买的恶棍的暴乱”面前发抖了。

“已經恢复平靜”。是的，是恢复平靜了。但这是在暴風雨的第一次爆发之后和它的第二次强劲的冲击之前出現的不祥的、可怕的平靜。

讓我們从大陆上的暴風驟雨的場面轉到風平浪靜的英国来

吧。看来，似乎小頂点約翰的精神主宰着官方世界的一切領域；似乎整个民族也像統治它的那些人一样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泰晤士报”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这也許是暴風雨之前的宁静，这也許是大火之前的烟雾…… 目前时期的特点就是阴郁沉悶。”

議會恢复活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內閣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和唯一引人注意的行动，还是阿伯丁勋爵的三鞠躬。关于約翰勋爵的綱領給他的敌人留下的印象，可以根据他的朋友的議論作出最好的判断。

“泰晤士报”說：“約翰·罗素勋爵发表了演說，他的演說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拍卖商在拍卖旧家具、殘貨或小店鋪用品之前的那一套兜攬生意的話动听…… 对約翰·罗素勋爵的演說的反应十分冷淡。”

众所周知，由于有更迫切地需要立法者处理的更加紧要的实际改革，新的改革法案被擱置下来了。目前，已經有实例可以說明，在实现改革的工具即議會本身尙未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2月14日，克兰沃斯勋爵在上院說明了他的法律改革的綱領。他的冗长的、枯燥无味的、含糊不清的演說的一大部分，是列举了人們期待他做而他还不准备做的那些事情。他为自己辯解說，他在羊毛口袋³⁵⁴上总共才坐了七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克兰沃斯勋爵在这个世界上已經活了六十三年，在六十三年中他当了三十七年律师”。依据道地的輝格党精神，他从以往的細小的法律改革所获得的比較大的成就当中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繼續以过去同样的热忱实行改革，就会違反一切謙虛的規則。按照道地的貴族精神，他避免涉及教会法，因为“这会同正当

的利益完全相違背”。这些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使社会蒙受損失。在克兰沃斯勋爵所准备的措施中只有下面兩項多少还有点意义。第一是“关于簡化轉卖土地的手續的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它使轉卖土地更加困难，它增加了这方面的費用和技术上的障碍，而同时却并不减少拖延現象和簡化轉卖财产的复杂手續。第二是关于成立整理規章法³⁵⁵的委员会的提案，該委员会的全部功績将是編纂出全部四十大本規章的索引。一个可怜的少女可以在懺悔神甫面前为自己辯护說，她虽然的确是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非常小。毫无疑问，克兰沃斯勋爵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自己的措施辯护，以抵御法律改革的最頑固的反对者的攻击。

由本月 18 日迪斯累里先生就英法关系問題向內閣提出的質問而引起的辯論，是到現在为止下院中唯一有趣的辯論。迪斯累里从普瓦提埃和阿津庫尔³⁵⁶讲起，一直讲到卡賴尔的竞选运动和哈里法克斯的圣职大厅里的演說。他的目的是要指責对拿破侖第三作无礼的批評的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迪斯累里竟然出面为他所領導的政治派別的世仇波拿巴分子辯护，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老托利党的彻底的瓦解。他不可能再用比为法国現在的制度辯护更恰当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反对党活动了。我們只要对他的演說的这一部分作一个簡單的分析，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軟弱性。

当他企图說明公众对于英法关系的現狀感到不安的原因时，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在他本人执政时开始的大規模的軍备活动，是这种不安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证明，增加和改进大不列顛的国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由于現代科学运用于軍事艺术而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他宣称，权威人士很久以前就已經承认必

須采取这种措施。1840年在梯也尔先生內閣时期，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曾經作了一些努力，其目的是至少为在国防方面实行新的制度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費了。在1848年大陆上爆发革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得有机会又把社会輿論引向它所希望的有关国防的問題上去。但这次还是沒有得到結果。只是在他和他的同僚应召領導政府的时候，国防的問題才最終成熟。他們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納如下：

- (1)成立了民軍。
- (2)整編了炮兵。
- (3)采取了充分巩固国家的軍火庫和沿海某些重要据点的措施。
- (4)提出了为海軍补征五千名水兵和一千五百名海軍陆战队士兵的提案。
- (5)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原有的实力，建立一支由十五到二十艘战列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航舰和較小的船只組成的拉芒什海峽舰队。

从所有这些来看，迪斯累里所证明的和他所想要证明的恰好相反。当叙利亚問題和塔希提島問題使同路易-菲力浦的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 有遭到破坏的危險的时候³⁵⁷，政府沒有能够增加軍备，当革命在整个大陆蔓延开来并且似乎已經威胁到不列顛的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也沒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一点直到現在才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好是迪斯累里先生的政府做了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拿破侖第三的行动使人們有理由比过去，比18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英国的安危。此外，科布頓先生說得很对：

“所計劃的海軍力量的增加不在于增加蒸汽机的数量，而在于增加人員；但从帆力舰过渡到蒸汽舰并不需要增加水手的数量，而是恰恰相反。”

迪斯累里說：

“法国存在着一个軍人政府，这是所以設想同法国的关系可能破裂的第二个原因。但是，如果軍队渴望战争，那末这是因为它們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不巩固。而法国現在所以为軍队所控制，并不是因为軍事野心家掌握了軍队，而是因为公民担心自己的安全。”

迪斯累里先生似乎完全沒有看到，問題是在于：軍队感到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巩固这种情况将維持多久；整个民族被迫对一个人數不多的公民階級的利己主义的不安情緒让步，对軍事专制（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狹隘的階級利益的工具）的現代恐怖制度屈服，这种情况将維持多久。

迪斯累里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

“我們国家里对今天法国的統治者的极大的成見…… 人們抱定这样一种見解：他取得政权后已經取消了在我国受到极大尊重的議會宪法，取締了出版自由。”

但是，迪斯累里並沒有能够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駁这种成見。他自己也說：“要对法国政治作出自己的評价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英国人民不像迪斯累里先生那样深知法国政治的秘密，他們的单纯而健全的思想也会告訴他們，当自己的国库因为疯狂的浪費和揮霍而枯竭的时候，那个既不受議會管轄、也不受报刊监督的肆无忌惮的冒險家，也就正是可能对英国实行海盜式襲击的人。

其次，迪斯累里先生举例证明波拿巴和前届政府之間的誠意协商对于維持和平起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他举了下列一些例子：在法国和瑞士之間可能爆发冲突的問題上、在开放南美河流自由通航問題上、在普魯士-紐沙特尔問題上，在强迫美国参加簽訂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时期，在就向埃及推行坦吉馬特政策的問題

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时期，在改变关于希腊王位继承次序的条约时期，以及在突尼斯问题上实行友好合作时期，等等。³⁵⁸这使我不禁想起法国秩序党的一个代表在1851年11月底关于拿破侖和議會多数派之間的誠意協商的演說，据说这种协定使議会有可能很容易地解决关于选举权、联合和出版等問題。但两天之后却发生了政变。

迪斯累里演說的这一部分軟弱无力，矛盾百出，但是他演說的末尾对联合內閣所作的攻击却十分精彩。

他在演說的末尾說道：“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現在不能不作这样的分析。这个理由我是在这个議院的各政党的現狀中發現的。目前的狀況是十分特殊的。現在我們有一个保守的內閣，同时我們又有一个保守的反对党。（掌声）关于偉大的自由党，我怎么也找不到。（掌声）輝格党和它們偉大的傳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又一次掌声）我想問問，激进派的青春的活力，它那过分乐观的期待，它那巨大的希望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担心，当它一从青年时代所常有的那种由于热情奔放和閱历太少而形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时，它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已被利用过并且已被拋棄的无用之物。（掌声）利用时毫不留情，拋棄时毫不客气。（掌声）激进派在哪里？在这个議院里是否还有一个人自称为激进派呢？（喊声：“听啊，听啊！”）一个人也沒有。他害怕人們会抓住他，把他变成保守党的大臣。（哄然大笑）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可笑的情况呢？造成这种非常不幸的政治局面的奧妙何在呢？我认为，为了說明目前的事态，我有必要去求助于那个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庫，这个武庫就是海軍首席大臣〈格萊安〉。也許議院还記得这样一件事：大約两年前，海軍首席大臣曾經按照他的习惯奉送給我們一个政治信条（他的演說中是有很多这种信条的）。他声明說：‘我是站在进步的基础上的。’先生們，当时我就想：如果进步可以站在上面，那它該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大笑和掌声）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演說者一时的失言。但是，請原諒我这一度在我头脑中閃过的怀疑吧。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在目前已經施行起来的制度。因為我們現在的內閣是一个进步的內閣，所以一切就都站在那里沒有动。（掌声）‘改革’这个詞

我們已經再也听不到了，已經再也沒有改革內閣，而只有進步內閣了，在這個內閣里，每一位閣員都決定什麼事情也不做，一切困難問題都被擱置一旁，一切不能達成協議的問題都被變成了尚待商榷的問題。”

迪斯累里的對手們是沒有很多話可以反駁的。只有“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庫”詹姆士·格萊安爵士是一個例外，因為他至少在這樣一個方面還保持了體面：他沒有完全收回那些被說成是他的過失的、對路易-拿破侖的侮辱性的言詞。

約翰·羅素勳爵指責迪斯累里把國家的對外政策變成了黨派之爭，並勸導反對黨說，

“在去年的種種糾紛和衝突之後，如果能有一個哪怕是短期的和平進步而避免各種重大的激烈的黨派之爭，那將是國家之大幸。”

辯論的結果，用於海軍的全部開支將被議院通過。但可以使拿破侖放心的是，這一切不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而只是滿足科學上的需要。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 [方式溫和，實質強硬]①。

在上星期四上午，皇家律師出席了大主教法庭，以外交大臣的名義要求約·多德森爵士把檔案中的拿破侖·波拿巴的遺囑的原本及補充指令交給法國政府。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如果路易-拿破侖願意打開這個遺囑，並打算實現它，那末這個遺囑很可能會成為現代的潘多拉的盒子³⁵⁹。

卡·馬克思寫於1853年2月22日

載於1853年3月8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3710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
論壇報”

① 同俄國諺語：“嘴甜手辣”差不多。——編者注

卡·馬克思
議會辯論。——僧侶和爭取十小時
工作日的斗爭。——餓死³⁶⁰

1853年2月25日星期五于倫敦

本周的議會辯論是不大令人感覺興趣的。22日在下院，斯普納先生提出一項取消梅努特神學院津貼³⁶¹的議案，斯科菲爾德先生又提出一項“廢除由國家負擔教會或宗教事宜的任何開支的全部現行條例”的修正案。斯普納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二票對一百六十二票被否決。斯科菲爾德的修正案要等到下星期三才討論；可是這個修正案也有可能根本撤回。在關於梅努特的所有討論中，值得注意的只有“愛爾蘭旅”的達菲先生的發言，他說，在他看來，

“要說美國總統或法國新皇帝會樂於恢復他們的國家同愛爾蘭僧侶之間的聯繫，這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昨晚的會議上，約翰·羅素勳爵向下院提出了他的“廢除對女王陛下的猶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這一提案以二十九票的多數被通過。於是，這個問題又一次在下院獲得了解決，但是毫無疑問，它在上院還是要成為懸案的。

高利貸精神早已統治了不列顛議會，而猶太人卻不准進入下院，這當然是很荒謬的，尤其是當猶太人已經有資格被選舉擔任一切地方公職的時候，不准他們進入下院就更加荒謬了。但是，“頂

点約翰”沒有提出他曾經向英国广大人民許諾的那个消除他們的无权状态的改革法案，而只是提出廢除对拉約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权利限制的議案，这件事倒是完全符合他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的特点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情多么不感兴趣：在整个大不列顛，沒有一个地方向議會提出一封要求准許犹太人进入議会的請願书。小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說揭穿了这场可怜的改革滑稽剧的全部秘密：

“說实在的，議會管的只是助爵閣下的私事。（高声喝采）助爵閣下是同一位犹太人一起被选为倫敦的代表的，（喝采声）他并且起誓每年要提出一个有利于犹太人的法案。（喊声：“对！”）毫无疑问，路特希尔德男爵是一个很有錢的人，但这絲毫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格外受到人們的尊敬，特别是当人們想到他这些财产是如何得来的时候。（政府党席位上发出“对，对！”和“哦，哦！”的喊声）昨天我刚刚从报上讀到，路特希尔德銀行同意在有可靠保证的条件下以百分之九的利息貸給希腊一笔款項。（喊声：“听啊！”）利息这样高，难怪路特希尔德銀行大发横財。（喊声：“听啊！”）商业大臣曾經談到压制报刊的問題。其实，誰也沒有像路特希尔德銀行这样厉害地、用貸款帮助专制国家的手段来压制欧洲的自由了。（喊声：“对，对！”）可是，即使男爵具有的美德像他的财产一样多，我們也还是有理由期望在下院中代表由一切反对前任內閣的政派領袖組成的政府講話的助爵閣下，能够提出比今天所討論的更重要的措施。”

对选举抗議书的审查工作已經开始了。坎特布里和郎卡斯特的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情况证实了某一階級选民的习以为常的受贿行为。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大部分案件都将通过妥协暗中了結。

“每日新聞”写道：“很明显，那些使改革法案的意图化为烏有并在本屆議會中重新取得优势的特权階級，是非常害怕完全的彻底的揭发的。”

本月 21 日，約翰·罗素助爵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的继

任人克拉倫登勳爵宣誓就職。約翰勳爵是第一個沒有任何官職而參加內閣的下院議員。他現在只是一個享有特權的幕僚，沒有官職，也沒有薪俸。可是，凱利先生已經宣布，對於可憐的約翰沒有薪俸這種不愉快的情況，將提出一項提案來加以補救。外交大臣一職在目前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德意志聯邦議會突然決定要求大不列顛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驅逐出境，而奧地利人則提議把我們全部裝上輪船，送到太平洋南部的一个荒島上去。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已經指出過，保障愛爾蘭租佃者權利的運動，不管它現在的領袖們的观点和意願如何，很可能有一天會變成反對教權主義的運動^①。我指出了上層僧侶已經開始對同盟^②採取敵對的立場。從那時起，舞台上又出現了一種把運動朝這個方向推進的力量。北愛爾蘭的地主竭力要使他們的租佃者相信，保障租佃者權利同盟和保衛天主教徒協會是同樣的東西，他們正假借反對天主教的傳播為名，努力組織力量來對付這個同盟。

愛爾蘭地主就是這樣號召他們的租佃者反對天主教僧侶的，而另一方面，英國新教僧侶則號召工人階級反對工廠老板。英國工業無產階級以雙倍的力量重新展開了長期以來的爭取十小時工作日、廢除廠內店鋪和實物工資制 [*truck and shoppage system*] 的鬥爭。這樣的要求必然會在已經接到許多有關這方面的請願書的下院提出來，因此，在以後的文章里，我將有機會詳細地談談那些慣於把報紙和議會讲坛變成散布他們的自由主義的花言巧語的傳聲筒的暴虐的工廠主所使用的種種殘酷而卑鄙的手段。這裡我們只需提起這樣一件事情：從 1802 年起，英國工人就不斷地為爭取

① 見本卷第 589 頁。——編者注

② 指保障租佃者權利同盟。——譯者注

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1847年通过了有名的約翰·菲尔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工厂中强迫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但是自由主义的大工厂主們很快就看出这一法案为在工厂实行輪班工作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1849年，有人向高等控訴院提出控訴，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輪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轉动的全部時間內不停地工作的輪班制〔«relay or shift-system»〕是完全合法的。問題又提到議會里；于是，在1850年，輪班制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这同时，十小时法案却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目前工人階級要求 *in integrum*〔不折不扣地〕恢复原来的十小时法案，而为了使这一法律更加有效，工人們又加上了一条要求：限制机器轉动時間。

簡單說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公开的历史就是如此。至于这个历史的內幕則如下述：資產階級以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打击了土地貴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貿易和廢除谷物法而侵犯了土地貴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貴族就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工人的利益和要求的保护人，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們的限制工厂中的工作日的要求，以此来反击資產階級。这些所謂的慈善家老爺們当时在一切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會議上都是打先鋒的。艾釋黎勳爵甚至由于他在这个运动中的言論而获得了某种“声誉”。土地貴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廢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們在1847年就迫使議會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資產階級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議會立法使他們喪失的东西。1850年，地主老爺們的怒气漸漸平息了，他們和厂主老爺們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輪班制非法，另一方面則給工人階級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額外劳动，作为老板們被迫遵守這項法

律而对工人階級的一種懲罰。而目前，貴族們感到同曼徹斯特派決鬥的時候迫近了，所以又想来操縱爭取縮短工作時間的運動；可是，他們又不敢親自出面，于是就通過國教會的教士來鼓動人民群眾反對棉紡大王，企圖用這種手段來拆後者的台。這些神父怎樣毫不留情地对工廠主進行十字軍征討，從以下的幾個例子中就可以看出來。在克蘭普頓曾舉行過一次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集會，主持會議的是聖布拉梅爾博士（國教會的代表）。在這個會上，斯泰里布雷芝的教區牧師聖約·雷·斯提芬斯宣稱：

“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那時各民族是受神權政體統治的…… 這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可是法律的精神依然如故…… 勞動者应当首先分享他親手生產出來的大地的果實。工廠法被肆無忌憚地破壞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這裡的工廠區的首席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先生不得不親自寫信給內務大臣說，沒有警察的保護，他不敢派也決不派他手下的任何視察員到某些區里去…… 要防的是誰呢？防的是工廠主！防的是區里最有錢有勢的人，防的是區里的地方官，防的是女王陛下的治安法官，防的是以王室代表的身分出席地方審判庭的人…… 可是老板們犯法受到過處罰沒有呢？…… 在我那個區里，星期日睡到九十點鐘甚至十一點鐘已成了工廠男工和大部分女工的習慣，因為一星期的勞動已經把他們累得精疲力竭了。星期日是他們疲乏的軀體能獲得休息的唯一的一天…… 而且，一般總是工作時間愈長，工資愈少…… 我寧願在南卡羅萊納當奴隸，也不願在英國工廠里當工人。”

在貝恩利舉行的爭取十小時工作日大會上，哈伯翰-伊夫斯的教區牧師聖埃·阿·維利提向聽眾發表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

“當郎卡郡的人民受盡壓迫的時候，科布頓先生、布萊特先生以及其餘的曼徹斯特派的先生們在做什么呢？…… 富翁們暗地里在打什麼主意呢？他們在盤算怎樣更好地通過欺騙的辦法從工人那里再奪取一兩個鐘點。這就是所謂的曼徹斯特派的代表們所抱的目的。這就使他們成了如此無恥的偽君子，如此狡猾的流氓。我以英國國教會牧師的身分對這種行為提出抗議。”

这些可敬的国教会的教士們所以会搖身一变成了保护工人权利的游俠騎士，而且是如此見义勇为的騎士，其原因我們已經指出过了。他們不仅要籠絡人心，以防苦难的日子、民主主义胜利的日子来临，他們不仅意識到国教会实质上是一个和地主寡头政权共存亡的貴族机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曼彻斯特派的信徒都是国教的敌人，他們都是非国教徒³⁶²，而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教会每年就要从他們腰包里掏去一千三百万英鎊，这首先就使他們非常心痛，他們决心要让这些世俗的金錢和僧侶阶层断絕关系，以便使这阶层的人更不愧为上帝的使徒。这就是說，这些虔誠的教士进行斗争是 *pro aris et focis* [为了他們自己切身的利益]。对曼彻斯特派的代表們來說，这次攻击則应当促使他們得出这样一个結論：除非他們决心——不管他們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給予人民，他們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貴族手中夺过来。

在大陆上，絞刑、枪决和流放已經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們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們的意識中的劊子手們，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們判处一种最殘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劍的天使把亚当驅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階級驅逐出他們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餓死**。

本月在倫敦又发生了一些餓死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瑪丽·安·桑德利，年四十三岁，死于倫敦市沙德威尔的煤巷。参加驗尸的医生托馬斯·皮恩指出，她是因虛弱和寒冷致死的。

死者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麼也沒有蓋。屋子裏面用的、燒的、吃的什麼也沒有。五個小孩子坐在靠近母親屍體的光禿禿的地板上，由於飢寒而不住地號哭。

關於“強迫移民”的問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里加以論述。

卡·馬克思寫於 1853 年 2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3 年 3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3716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
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馬志尼。
 ——流亡者問題。——英国选举中
 的賄賂行为。——科布頓先生³⁶³

1853年3月4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2月份公布的关于1851年和1852年貿易和航运的报告中我們看到,通过海关宣布的出口总值,1851年为68 531 601英鎊,而1852年为71 429 548英鎊;在1852年的出口总值中,棉織品、毛織品、麻織品和絲織品占47 209 000英鎊。1852年进口的数額比1851年小。由于供国内消費的进口的比重沒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英国有若干数量的金銀代替通常数量的殖民地产品而成为再輸出品。

殖民地移民局公布了1847年1月1日至1852年6月30日期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向世界各地移民的报告:

	自英格兰	自苏格兰	自爱尔兰	总 数
1847年.....	34 685	8 616	214 969	258 270
1848年.....	58 865	11 505	177 719	248 089
1849年.....	73 613	17 127	208 758	299 498
1850年.....	57 843	15 154	207 852	280 849
1851年.....	69 557	18 646	247 763	335 966
1852年(到6月止)...	40 767	11 562	143 375	195 704
总計	335 330	82 610	1 200 436	1 618 376

报告指出：“据估計，从利物浦迁出的移民十分之九是爱尔兰人，而从苏格兰迁出的移民四分之三是苏格兰高地的賽尔特人或經格拉斯哥出境的爱尔兰的賽尔特人。”

由此可見，在全部移民中，将近五分之四是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以及苏格兰附近島屿上的賽尔特人。倫敦“經濟学家”杂志就这个问题发表評論說：

“移民是以租佃小块土地和种植馬鈴薯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崩潰的結果。”該杂志接着又說：“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过剩人口的迁出，是实行任何一种改良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论是 1846—1847 年的饥荒或是随之而来的移民，都没有使爱尔兰的收入受到影响。相反，它的純收入在 1851 年达到 4 281 999 英鎊，即比 1843 年增加 184 000 英鎊。”

首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貧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一貧如洗的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潤的时候，当他們成为妨碍收入增长的一种負担的时候，就把他們赶走，然后来結算自己的純收入！这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学原理”³⁶⁴中所闡明的学說。李嘉图說，我們假定，一个資本家每年获得 2 000 英鎊的利潤。对他來說，雇用 100 个工人还是雇用 1 000 个工人不是一样嗎？李嘉图問道：“就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來說不也是这样嗎？”如果一个国家的实际純收入——地租和利潤——始終維持在原来的水平上，那末不管这些收入是来自 1 000 万居民还是来自 1 200 万居民，归根到底是一样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經濟学新原理”³⁶⁵一书中针对这种說法指出，根据这种观点，即使英国全部人口都消失了，島上只剩下一个国王（当时統治英国的是国王^①，而不是女王），只要有一种自动机器能使他获得和今天 1 200 万居民所創造的同样多

① 即乔治三世。——編者注

的純收入，那末这对英国來說也会是完全一样的了。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財富”（这个詞在这里只是一个语法上的概念）是一点也不会减少的。

我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經举过在苏格兰高地“圈地”的例子^①。下面这段引自“高尔威信使报”的話告訴我們，到現在，这个过程在爱尔兰还是造成强迫移民現象的根源：

“在爱尔兰西部，居民几乎已經从地面上消失。康諾特的大地主們悄悄地商議好赶走所有的小土地租佃者，对他們进行經常的歼灭战…… 在这个省里，每天都发生駭人听聞的殘暴行为，对此，公众是絲毫也不了解的。”

但是，不仅一貧如洗的綠色艾林^②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由于农业的改良和“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崩潰”而被赶走，也不仅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平原的强壮的农业工人被赶走（他們的迁移費是由移民局代办发給的），而且另一个階級——英格兰最稳定的階級，現在也被卷入这个“改良”过程。在英格兰的小农場主中間，特别是在那些租賃粘性重的土地的小农場主中間也发生了惊人的移民运动。这些小农場主眼看收成很坏，又缺乏必需的資本来大力改良土质以便偿付欠租，他們就只好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家园和新的土地，此外別无出路。我这里所談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現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羅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毀

① 見本卷第 570—576 頁。——編者注

② 即爱尔兰的古称。——編者注

灭的危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們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則，它們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違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們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們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增长，使它們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險的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則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見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見。李嘉图把“純收入”看做摩洛赫^①，认为大批大批的居民应该心甘情愿地做它的牺牲品；西斯蒙第則从他那悲天憫人的慈善心腸出发，企图用强力来保持已經过时的农业經營方法，并把科学从工业中驅逐出去，就像柏拉图把詩人从他的共和国³⁶⁶中驅逐出去一样。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是儿童作祭品。——譯者注

慮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竟当真以为，这种悲惨的过渡状态的意义就只是要使社会适应资本家（地主和金融巨头）的贪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看法更幼稚更浅薄的呢？在大不列颠，这一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

“经济学家”写道：“移民局代办除了给斯比脱菲尔兹和佩斯里的少数手工织工以补助之外，是不会给工业工人以补助的，自己花钱移居海外的更是寥寥无几，甚至没有。”

“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工人是不可能自己出钱移居海外的，而工业资产阶级又不会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聚集着巨大生产力的大城市集中起来，而这些巨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史到现在为止总是劳动者的殉难史。谁能阻擋他们再前进一步去支配这些到现在还支配着他们的力量呢？有什么力量能抗拒他们呢？没有这种力量！到那时，乞灵于“所有权”是没有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承认，目前生产方式中的变化摧毁了过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占有方式。这些变化剥夺了苏格兰的氏族的成员，爱尔兰的短工和佃农，英格兰的自耕农、手工织工、无数的手工业者以及整代整代的工厂童工和女工；总有一天他们也将剥夺地主和棉纺大王。

现在，大陆的上空还只是电光闪闪，但在英国已经是地动山摇。在英国已经兴起了改造现代社会的真正的风暴。

我在3月1日的文章中曾經說，馬志尼打算公开反駁科苏特³⁶⁷。果然，在3月2日的“晨报”、“晨邮报”和“每日新聞”上出現了馬志尼的信。既然現在馬志尼本人已經打破沉默，那末我也可以告訴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們的壓力下已經否认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動中我們就看到过許多这种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模稜两可的表現。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缺点，即所謂“演員的”气质。en paroles〔就言詞方面來說〕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員。誰要不願意为流行的偏見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見解，那我就介紹他讀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路德維希·鮑蒂揚尼、阿尔都尔·戈尔盖和路德維希·科苏特的傳記³⁶⁸。

如果說馬志尼在倫巴第沒有能够把意大利資產階級吸引到運動中來，那末可以確信，拉德茨基在這方面是完全能够做出很大成績的。目前他打算沒收所有遷居國外的人的財產，甚至連那些奧地利當局允許出境而在其他國家里獲得公民權的人的財產也包括在內——如果他們不能證明他們同最近的起義毫無聯繫的話。據奧地利報紙的估計，應當沒收的財產，價值約1200萬英鎊。

在3月1日的下院會議上，帕麥斯頓勳爵對達德利·斯圖亞特勳爵提出的問題作了如下的回答：

“大陸國家並沒有提出任何從英國驅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而如果他們提出這種要求，他們就將遭到斷然的、堅決的拒絕。不列顛政府從來不願意為其他國家的內部安全操心。”

不過，從交易所商人的報紙“通報”以及“辯論日報”上可以看出，這樣的要求已經準備提出；“辯論日報”在最近的一號上推測

說，英國已經同意接受奧地利、俄國、普魯士和法國的聯合要求。關於這一點該報接着說：

“如果瑞士聯邦拒絕奧地利在其邊境各州實行監視，那末奧地利就可能破壞瑞士領土的不可侵犯性而占領德森州；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為了保持政治均勢，便會把軍隊開進與它的國境毗連的瑞士各州。”

“辯論日報”實際上是建議用1770年普魯士的亨利希親王以玩笑方式向葉卡特林娜女皇建議的解決波蘭問題的簡單方法³⁶⁹來解決瑞士的問題。與此同時，自稱為德意志聯邦議會³⁷⁰的那個可敬的機關，正在鄭重其事地討論關於“应当向英國提出的要求”的問題，在這個莊嚴的問題上，從肺部呼出了如此多的空氣，簡直可以鼓起德國艦隊的所有的篷帆。

在3月1日的下院會議上，發生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有人宣布黎紀諾特和布萊克本的代表是通過賄賂手段選舉出來的，因此他們的當選是不合法的。當時約·雪萊爵士提議，把向這兩個區的委員會提出的證據轉交議院審查，並建議最早於4月4日發出重選的指令。關於這個問題，可敬的從男爵約·特羅洛普爵士指出，“已經委派了十四個委員會來調查各小選區的舞弊情況，現在還要再委派五十個新的委員會”，所以已經很難找出足夠的議員來成立對是否合法有所爭論的那些選舉做出決定的仲裁委員會以及成立處理議院日常事務的委員會。如果更深刻地考察一下議院本身所依據的基礎，那末必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等待着它的是崩潰，議會機器將完全停止轉動。

科布頓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評論中，以及他在曼徹斯特和平大會³⁷¹上和許多爭取教育改革的大會上所作的莊嚴的演說中，都不願放棄享受抨擊報刊的樂趣。所有的報刊對他也以牙還牙，其

中对他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一个英国人”^①，这个人写的一些評論路易-拿破侖的文章在 coup d'état [政变] 时期曾經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³⁷²，此后他就把自己的矛头轉向絲織业巨子棉紡大王們。他用給这位西区^② 的圣哲所下的刻薄的評語結束了致科布頓的信：

“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使他洋洋得意，冲昏头脑，他已經准备充当万民归心的独裁者了。这个小行帮的先知，整日喋喋不休，貪求荣誉，他不容異見，刚愎自用，不讲邏輯，耽于空想，有了一个念头就頑固不化，对人态度傲慢不逊，他是一个爱吵架的和平鼓吹者，好发脾气的博爱的劝化者，高唱‘自由’的专制教条的信奉者；当报纸不怕他的恫吓和不受他的欺騙时，他便暴跳如雷；他想閹割报纸，剝夺它的影响、精神力量和独立；他想把有高度教养的紳士們的职业降低为一伙雇佣的帮閑文人的行业，以使自己能够成为他們的唯一的領袖。”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4 日

載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722 号，并摘要載于 1853 年 4 月 16 日“人民报”第 50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① 即理查茲。——編者注

② 約克郡分为东西北三区。——譯者注

卡·馬克思
科苏特和馬志尼。——普魯士
政府的詭計。——奧地利和
普魯士的通商条約。——
“泰晤士报”和流亡者³⁷³

1853年3月18日星期五于倫敦

今天議會因复活节而休会到4月4日。

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根据流行的說法报道了李伯尼的妻子在佩斯遭到奧地利人的鞭撻³⁷⁴。后来我查明,李伯尼根本就沒有結过婚;在倫敦报刊上流傳着的另一謠言,說什么他是替他的受了奧地利人凌辱的父亲报仇,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行动純粹是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保持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并且像一个英雄一样地行动。

你們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能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馬志尼的声明的答复。我以为,科苏特把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得更糟了。他的最初的声明和最近的声明之間的矛盾異常明显,甚至不用我再来詳細证明了。此外,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語言的差別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張語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詭辯文体写的。

馬志尼的朋友們現在異口同声地說,米兰起义是他和他的同

志們所无能为力的客观形势造成的。但是，从一方面來說，密謀的本质决定了起义的特点，即过早地爆发，其原因不是由于叛变，就是由于偶然事件。从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你們在三年的時間里老是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們的整本革命詞典又只有“起义”一个詞，那末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足够的威信来命令：**不要举行起义**，那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奧地利人的殘酷已經使米兰的失敗变成了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开端。例如，請看帕麦斯顿勋爵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晨邮报”今天的报道：

“那不勒斯人民期待着在奥地利帝国中必将爆发的运动。那时从皮蒙特边境到西西里島，整个意大利都将奋起，可怕的災禍就要发生。意大利的軍隊將潰散，从1848年革命以来募集的所謂瑞士士兵也拯救不了意大利的君主們。意大利正在走向**难以想像的共和国**。毫無疑問，在1848年開場的戏剧的下一幕就是这样。在拯救意大利君主的斗争中外交手腕已失去任何作用。”

在馬志尼宣言上署名并在起义前游遍了意大利的阿烏利奧·薩菲在給“每日新聞”的信中公开承认：“**上层階級已陷入淡漠和絕望**”，只有“米兰人民”，无产階級，

“沒有領導而全凭本能的无产階級面对着奥地利总督的专制政治和軍事法庭的杀人勾当而对祖国的未来保持着信心，并一致地决心要复仇”。

馬志尼的政党終於相信，甚至在反抗異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階級差別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們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階級的革命运动，这是馬志尼的政党的一大进步。也許馬志尼的拥护者还会前进一步，深深意識到，如果他們希望他們的口号«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能得到响应，那末他們自己就必须认真地研究意大利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我打算将来詳細地闡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絕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这

些物质条件直到現在还使他們不是变得反动，就至少是对意大利的民族斗争漠不关心。

不久前我在巴塞尔出版的题为“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ss»）^①的二千本小册子在巴登边境被沒收，并按普魯士政府的要求焚毀了。巴塞尔政府也沒收了还在发行者那里的少数几本，企图引用大陆列强强加于瑞士联邦的新出版法，对发行者沙貝利茨先生、他的儿子^②，以及印刷所所有者加以迫害。这将是瑞士的第一桩这类审判案件，而且这件事情已經成为激进派和保守派爭論的題目。普魯士政府由于要对輿論掩盖它在科倫审判时期的卑鄙行为而如何焦虑不安，这你們只要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外交大臣通令，無論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便一律沒收（Fahndebriefe），但是他竟不敢指明这本小册子的真名。为了迷惑公众，他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学說”，可是这本小册子除了揭露普魯士国家的秘密之外，毫无其他內容。

1848年后德国当局唯一的“进步”就是訂立了奥普通商条約。et encore! [此外!]这个条約还附加了許多 clausulae[保留条件]，参插了許多例外，并把許多极重要的問題留待将来由还没有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同时，規定的稅率的减低实际上微乎其微，所以整个条約不过是幻想真正在商业上統一德国而已，是毫无意义的。該条約最显著的特点是：奥地利又战胜了普魯士。这个阴險、卑鄙、怯懦、动摇的假强国这次又屈服于比它殘酷、但是比它坦白的对手。奥地利不仅迫使普魯士勉强同意接受条約，而且普魯

① 見本卷第457—536頁。——編者注

② 即雅科布·沙貝利茨。——編者注

士还被迫恢复实行旧稅率的旧“关稅同盟”³⁷⁵，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十二年內，不經关稅同盟內部各小邦一致同意，也就是不經奧地利（德意志南部各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方面都是奧地利的附庸，因而也就是普魯士的敌人）允許，不得更改自己的商业政策。普魯士自从“蒙上帝恩賜”恢复君主政体以来，便日益衰落。大概，普魯士的国王，“当代賢人”认为，他的人民可以把他的政府在国外被迫忍受的屈辱看做对他们服从殘无人道的专制政治的慰借和奖励。

流亡者問題还没有解决。半官方的“奧地利通訊”駁斥了这种武断之說：奧地利当时向英国政府发出了新的照会，因为“鉴于最近各种事件表明帕麦斯頓勋爵重又得势，故帝国政府不能曝自身于尊严受辱之危地”。我已經向你們报道了帕麦斯頓勋爵在下院的声明^①。現在你們在英国报纸上可以看到阿伯丁在上院所做的亲奧的声明，照此声明来看，英国政府决心充当奧地利的密探和大审判官。帕麦斯頓的报纸^② 现在这样評論他的同僚的声明：

“即使是显然有意对阿伯丁勋爵做出的一些比較温和的让步，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很相信它們能够实现…… 沒有誰敢建議不列顛政府作充当外国政治工具和政治陷阱的尝试。”

你們看，在瑪士撒拉^③ 的内閣这个最高評議會里的“老朽无能和自由主义少壯派”之間是多么地和諧一致。倫敦的一切报刊都同声憤斥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① 見本卷第 621 頁。——編者注

② 即“晨郵报”。——編者注

③ 旧約全書中傳說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最长寿的老人；这里指由老头組成的內閣。——譯者注

你們記得，首先告发流亡者并挑唆外国列强要求驅逐他們出境的就是“泰晤士报”。当它确信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³⁷⁶的提案将在下院遭到否决而使內閣蒙受耻辱的时候，它便突然花言巧語地高唱为了保护避难权它(当然罗!)决心作任何牺牲。最后，在上院的議員大人們彼此亲切地交換了意見之后，它为了犒劳它的崇高的公民道德，便在3月5日的社論中迸发出恶毒的攻击：

“在許多大陆国家中，人們都认为，我們很高兴我国有一个豢养流亡者、豢养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的各国暴徒的場所……那些对英国有他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同胞这一点表示抗議的外国作家是不是以为，在我国流亡者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我們要消除他們的誤解。这一类可怜的人大部分过着貧困和悲慘的生活，吃的是異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而且被这个大城市的混浊浪濤所吞沒的他們能得到这种面包还算是好的……对他們的懲罰是一种最残酷的放逐。”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說得很对：英国是个出色的国家，問題是要不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見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話預告他将被逐出佛罗倫薩：

«Tu proverai sì come sa di sale
Lo pane altrui, e com'è duro calle
Lo scendere, e'l salir per l'altrui scale».

“你将懂得
別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別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³⁷⁷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屬於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可怜的一类的人”，但是他沒有受到敌人的像“泰晤士报”的无謂社論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則更幸运了！它逃脫了但丁在“地獄”里給它“預

备下的席位”。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說，流亡者不得不吃異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它还忘了加一句：就是这种面包还使他們花費了极大的代价），那末“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外国人的血汗养肥的嗎？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①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絞刑，利用被沒收了的头顱和被砍掉了头顱的财产^②制造出多少篇社論和弄到了多少金鎊啊！如果大陆沒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場的劣等貨色、倫敦烟囱的煤烟、泥濘、粗暴的馬車夫、太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內的出殯、感染鼠疫的墓地、骯髒的飲水、铁路上的災禍、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靜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經常貨品的有趣題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侖第一以来一点也沒有改变。

这家报纸在1815年7月27日那一号上曾写道：“人們是否考虑到，关于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必然会对欧洲各地的不滿者产生什么影响？他們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盟国的君主們害怕杀害这个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拥护者的人。”

这家报纸曾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軍征討：

“不消除这个民主主义叛乱得胜的恶例，决不同美国媾和。”

“泰晤士报”編輯部里沒有从大陆来的“暴”徒。恰恰相反，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物，一个名叫奧托·馮·文克施特恩的普魯士

① 古希臘迭尔非地方阿波罗神廟的女巫。——譯者注

② 馬克思的俏皮話，意思是：被砍掉了头顱的革命者和被沒收了的革命者的财产。——譯者注

人，他从前是一家德国小报的发行人，后来在瑞士陷入了貧困和悲慘的生活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弗萊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貸，直到最后投效倫敦的普魯士大使即頗有点名气的本生，并成为印刷所廣場³⁷⁸的預言者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止。“泰晤士报”編輯部有不少其他类似的从大陆来的温順人物，他們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說明英国的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濱河街的特魯勞先生由于国内稅务部門的全权代表根据威廉四世統治时期第六和第七年的法令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倫敦弓街治安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出售沒有付足印花稅便出版的、名叫“陶工自由报”的报纸。这家报纸在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了四号。它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爭取廢除知識稅协会的秘书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他“按照印花稅局的实际作法”出版报纸，这就是說“印花稅局曾許可‘文艺論壇’、‘建筑师’、‘笨拙’、‘賽馬新聞’³⁷⁹及其他刊物免付印花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評論”；他显然打算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以便达到由法庭决定什么样的报道应免交一便士印花稅的目的。法官亨利先生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該报的出版本来就不是打算向印花稅法挑战，而只是想利用該法律文字上至今还存在的两重含意而已。

今天的英国报纸刊登了君士坦丁堡3月6日来电，根据来电，利法特-帕沙将接替傅阿德-埃芬蒂的外交大臣之职。这个让步是俄国特命大使緬施科夫公爵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間关于圣地的糾紛³⁸⁰到現在还没有解决，因为路易-拿破侖恨透了俄国和奥地利阻撓他受教皇加冕的阴谋，他打算

靠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来进行报复。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談談这个老是不斷出現的东方問題，这个欧洲外交上的 pons asini [傻瓜的絆脚石]①。

卡·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18 日

載于 1853 年 4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733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
日論壇报”

① 直譯是：馱桥（人們这样称呼初学者很难解的欧几里得第五定理）。——編者注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 中央委员会會議³⁸¹

出席會議的有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鮑威尔、埃卡留斯、沙佩尔、維利希、列曼。

弗倫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會議是非常會議，上次會議的記錄不在手頭；因此記錄無法宣讀。

馬克思：这次會議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³⁸²委员会會議時間有冲突。既然維利希^①召集了区部會議，——我不想提出这个會議是否合法的問題——这次會議必須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三点意見：

1. 中央委员会从倫敦迁到科倫；它的职权在今天的會議結束之后立即移交給該地的区部委员会。這項決議應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員。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經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倫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建議，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統一。現在，既然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們的建議中这一点就不提了。無論在上次會議进行譴責投票的時候和現在在区部召开全會的問題上以

① 在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的脚注中引有1850年9月15日的會議記錄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間的重要出入。——編者注）

及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³⁸³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 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①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布，因而现行的盟章不能再继续生效。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³⁸⁴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 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②通知信，甚至跟宣言³⁸⁵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

① 独立

② 中央委员会的

把意志描繪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們对工人們說：为了改变現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而他們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觉。他們現在使用的“无产階級”这个詞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詞一样是一句空話。为了實現这句话^①，他們不得不把一切小資产者說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說，他們 de facto [实际上] 是代表小資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們不得不用革命的空話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辯論最后^②說明，私人决裂的內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則性分歧，而現在已經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見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盟員把宣言的維護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們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們來說是完全无所謂的，因为他們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权解散倫敦区部并把少数派^③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則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見，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爭吵，因为尽管这些人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就其信仰來說他們还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則純粹是浪費時間。沙佩尔常常說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們既可以分道揚鑣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徑。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願意加入我們的区部的最多有十二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願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給少数派。

① 这种观点

② 最后明显地

③ 中央委员会少数派

如果这个建議将被通过，我們当然也就不能留在^①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协会。归根到底，問題不在于两派之間存在敌对关系，相反地是在于停止紛爭，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們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們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像在法国无产階級跟山岳党³⁸⁶和“新聞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則的人跟組織无产階級的人正在决裂。我贊成中央委员会迁移^②和修改盟章。科倫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現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更善于行动^③的人。至于原則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辯論的問題。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見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問題在于，是我們自己动手去砍掉別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們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輪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輪到我們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靜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們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階級获得統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見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見解。但是，如果你們不想再跟我們打交道，好吧——我們就分道揚鑣。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們想要組織两个区部——那就組織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們再在德国相逢，也許那时我們又走上一条道路。我是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們想要分

① 同一个

② 到科倫

③ 領導革命

裂，好吧——那我們走我們的，而我們走我們的^①。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得組織兩個同盟。一個是為那些靠筆杆活動的人而組織的，另一個則是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動的人而組織的。我不贊成那種認為資產階級將會在德國掌握政權和我在這一方面是個盲目的狂熱者的說法；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根本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但是，在倫敦這裡有兩個區部，兩個協會，兩個流亡者委員會，那還不如組織兩個同盟，完全決裂。

馬克思：沙佩爾誤解了我的意見。只要我的意見被通過，我們就各走各的路，兩個區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時雙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間的一切關係。但是，它們是在同一個同盟之內，受同一個委員會^②的領導。甚至你們可以給自己留下絕大多數的盟員。至於說個人的犧牲，我為階級，而不是為個人作的犧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說到熱情，為了加入你認為眼看就會取得政權的黨，這種熱情卻不太需要。我一向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復無常的意見。我們為之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即使取得政權，它推行的不會直接是無產階級的措施，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措施。我們的黨只有在條件允許實現它的觀點的時候，才能取得政權。路易·勃朗便是一個說明取得政權為時過早會得到什麼結果的很好例證³⁸⁷。況且，在法國無產階級將不是單獨地，而是跟農民和小資產者一起取得政權，因此必須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們的措施。巴黎公社³⁸⁸證明，為了實現某種東西，並不需要參加政府。可是，當時一致同意告同盟書的少數派其他成員，譬如公民維利希，為什麼不發言呢？我們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們只是想

① 你們走你們的

② 中央委員會

倫敦区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問題是我提出的，我确实想对这个問題展开討論。至于沙佩尔的意見，我在协会里已經解釋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們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們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維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棄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棄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棄权。

沙佩尔声明對我們大家提出抗議。“現在我們完全分开了。在科倫我有熟人和朋友，他們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們走。”

馬克思：我們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讀記錄之后，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們在科倫沒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①。

有人問沙佩尔，他对記錄是否有反对意見。他說沒有什么反对意見，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見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議大家在記錄上签名。这个意見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年9月15日写于倫敦。

經過宣讀，表決和签名^②。

① 在第二个記錄副本上沒有这句话。——編者注

② 在第二个副本上沒有这几个字。——編者注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 卡·马克思

书记 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康·施拉姆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6年的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卷
第2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者的呼吁书³⁸⁹

我們收到了如下的一封信和附在下面的一份呼吁书。根据作者們的請求，我們把收到的信和呼吁书一并发表。

致“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1853年1月14日于华盛顿

告德国—美国公众书!

随着科倫巨大案件的发生，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摆脱了狭隘的、狂热的宗派运动对它的束缚，从而公开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同官僚警察国家的检察官相对抗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莱茵省的贵族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本等级的法庭作为陪审法庭，并且判决对他们的特权采取反对立场的劳动者是“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应尽的光荣义务是：提醒公众注意下面的呼吁书，这是呼吁书签名人为了在美国散发而寄给我们同盟的成员的；同时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可能收到的那一小部捐款转寄伦敦，并提出这笔捐款的用途报告。

各联合会(不论你们是什么名称)!

现在你们的成员正在举办许多热闹的联欢晚会。请支持我们祖国的这些坚强的朋友们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将这些晚会中的一次收入捐给他们。捐款请寄到：华盛顿艾恩大厦亚当斯运输

办事处“救济事务所”阿道夫·克路斯收。

主席

秘书

約·格尔哈特

阿·克路斯

1853年1月10日于华盛顿

呼吁书!

救济我們的科倫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們的无依无靠的家屬，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們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为被捕者和他們的家屬捐献的款項，請寄交倫敦哈克尼区賽頓廣場3号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

約翰·貝尔

威·李卜克內西

恩·德朗克

弗·明克斯

約·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約·弗·埃卡留斯

威·皮佩尔

弗·恩格斯

勒·弗·林格斯

斐·弗萊里格拉特

艾·卢普夫

伊曼特

約·烏尔麦尔

厄內斯特·琼斯

斐·沃尔弗

格·罗赫納

威·沃尔弗

卡·馬克思

明克斯第二

1852年12月7日于倫敦

請德国—美国各报轉載这份呼吁书。

載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的无产階級 代表及其家屬的呼吁书

救济那些由于坚持先进的立場并为之进行英勇頑强的斗争以致最后落于敌人手中的人们是各个政党及其成员的不可推卸的首要义务。对于无产階級的工人的政党說来，德国科倫被判罪者的遭遇就是如此。他們所以被判罪并不是因为犯了强加于他們头上的罪名——令人可笑地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們致力于組織工人的政党。审判他們的是屬於金融貴族和封建貴族的法官，仅仅由于这一点，就足以肯定这些人的判决是不会公平的，至于普魯士政府会利用最无耻的捏造来强使这些人昧着他們也許可能有的良心而保持緘默，那就更不用說了。

这些被判罪者都是每天靠自己的双手或笔墨来掙錢糊口的穷苦的工人和著作家，現在他們被囚在獄中，因此他們沒有任何可能繼續照顾自己的親屬。他們本人在監獄也遭受着各种苦难和折磨，如果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救济他們和消除他們对自己家庭的深重忧虑，他們势必会有丧失他們今天在党内賴以取得杰出地位的那种智慧的鮮明性和灵活性的危險。

不久前在倫敦成立了委員會。委員會推选无产階級詩人斐·弗萊里格拉特担任會計，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英国宪章派的領袖厄內斯特·琼斯。委員會向旅居美国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呼吁书，我

們立即表示响应。

“救济我們的科倫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們的无依无靠的家屬，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們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

为被捕者和他們的家屬捐獻的款項，請寄交倫敦哈克尼区賽頓廣場3号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

签名者：約·貝尔	恩·德朗克
約·格奧尔格·埃卡留斯	
約·弗·埃卡留斯	弗·恩格斯
斐·弗萊里格拉特	伊曼特
厄內斯特·琼斯	威·李卜克內西
格·罗赫納	弗·明克斯
明克斯第二	卡·馬克思
卡·普芬德	威·皮佩尔
弗·林格斯	艾·卢普夫
約·烏尔麦尔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³⁹⁰委托它的理事会組織被判罪者救济工作，并为此成立了由下面签署人組成的专门委员会。他們呼吁所有侨居紐約的那些珍惜自由事业和爱护祖国自由事业的保卫者的德国人把救济捐款寄給委员会。体操联合会将及时提出关于这些捐款的使用报告。我們相信，和我們屬於同一党派的各团体一定会願意积极参加这项救济工作。

主席团已經向美国各体操联合会发出了相应的建議。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社会主义体

操联合会确定举办一次公众抽彩，我们相信这次抽彩会提供大量的捐款，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的妇女和姑娘们不止一次地表现了慷慨解囊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她们同情自由及其先进战士的表现。

认捐现金和物品的募捐单盖有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印章，认捐者可到下列地址索取：运河街 38 号本协会；北威廉街 12 号莱歇尔泽尔和海茵处，以及寄居约·弥勒家的凯克——艾伦街 21 号。

代表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理事会

救济委员会

莱歇尔泽尔 舒勒尔 贝克尔

凯克 莱斯特尔

1853 年 1 月 16 日于纽约

载于 1853 年 1 月“纽约刑法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著作阐述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問題的观点。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編輯之一查理·德納要求馬克思为該报写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馬克思当时忙于經濟研究工作,于是他請求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萊茵报”合訂本作为主要的資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經常同馬克思交換意見。同时,这些文章在寄給报纸之前,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署名是馬克思;直到191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沒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版是在1896年由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出版的;同年出版了該书的德文譯本;1900年由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譯的該书法文版出版。1899年在柏林出版了該书前三章的俄文譯本,从英文翻譯的本书俄文版全文第一次是在1900年于倫敦出版的,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本书在俄国會多次出版,后来,本书又多次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俄文再版。

这一組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时沒有标题;在1896年的英文版中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給它們加上了标题,本版中仍旧保留了这些标题。——第3頁。

- 2 “論壇报”(《Tribune》)是美国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的簡称,1841年至1924年出版。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記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創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

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五十年代，該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場，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記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經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是該报的編輯之一。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經济发展、殖民地扩張、被压迫国家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問題。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銷路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常常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編輯部的社論发表，有时編輯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馬克思曾經对編輯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議。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經济危机，“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經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給該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完全停止了給該报写稿；“紐約每日論壇报”同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編輯部中主張与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該报离开了进步立場而引起的。——第7頁。

3 大陆体系 是指1806年拿破侖宣布的大陆封鎖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貿易。——第8頁。

4 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 廢除了普魯士境内的国内稅并且为建立关税同盟創造了条件。

确定了共同稅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魯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須建立全德意志市場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統一。——第9頁。

5 指1844年6月4—6日的西里西亚紡織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階

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搏鬥)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義。這種搗毀工廠、破壞機器的工人運動遭到政府軍隊的殘酷鎮壓。——第12頁。

- 6 德意志聯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維也納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聯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個邦，它們各自保持着封建專制制度；這就加深了德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散狀態，阻礙了德國的進一步發展。

聯邦議會是德意志聯邦的中央機關，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組成，會址設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聯邦議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實行反動政策的工具。——第13頁。

- 7 在1834年5月成立了所謂“稅務同盟”(Steuerverein)，這個同盟的成員是願意同英國進行貿易的德意志各邦——漢諾威、不倫瑞克、奧登堡和紹姆堡-利珀。到1854年，這個單獨的同盟瓦解了，該同盟的參加者併入了關稅同盟。——第13頁。

- 8 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歐洲反動勢力的首領奧地利、英國和沙皇俄國，不顧各國人民的民族統一和獨立的利益，為了使各個正統王朝復辟而改劃了歐洲地圖。——第15頁。

- 9 指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以及繼七月革命之後在比利時、波蘭、德國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歐洲國家發生的起義。——第16頁。

- 10 “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產生於德國的一個文學團體，它受海涅和白爾尼的影響。“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茲科夫、文巴爾克和蒙特等)在他們的文藝作品和政論中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他們起來捍衛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觀點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堅定。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很快就墮落成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第16頁。

- 11 喬·威·弗·黑格爾“法哲學原理”1821年柏林版(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1821)。——第16頁。

- 12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極端反動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許多法的历史學派的代表參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護。

法的历史學派 是十八世紀末產生於德意志的历史學和法學中的一個反動流派。該派以胡果、薩維尼等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關於這一學派的特征,見卡·馬克思“法的历史學派的哲學宣言”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頁和第452—467頁)兩篇文章。

正統派 是法國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擁護者。1830年,在這個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後,正統派組成了政黨。——第18頁。

- 13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倫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立的。該報曾吸收幾個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馬克思開始為“萊茵日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萊茵日報”也發表了弗·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萊茵日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後來把它封閉了。——第20頁。

- 14 海外貿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第21頁。

- 15 指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廣泛流行的一種反動思潮。“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蓋等用仁愛和友情的溫情宣傳冒充社會主義思想,否認在德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反克利盖的通告”、“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頁,第4卷第3—20頁、第223—275頁、第461—504頁)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23頁。

- 16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国的許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資產階級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羅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許多教条和仪式,他們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資產階級的需要。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誠主义的宗教派別。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国資產階級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滿的一种表現形式。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27頁。

- 17 一神論派或反三神論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別。一神論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資產階級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論派出現于十七世紀。十九世紀一神論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倫理因素提到首位。——第27頁。

- 18 拿破侖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謂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国的崩潰。1806年8月奧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羅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紀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28頁。

- 19 “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提出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0頁)。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頁)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28頁。

- 20 指所謂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即开始使中国淪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侵华戰爭。戰爭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約中有一条規定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第 30 頁。
- 21 1846 年 2—3 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大規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階級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貴族之間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貴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規模毀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貴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鎮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 30 頁。
- 22 指 1848—1849 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这次戰爭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統治下的倫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 1848 年 3 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实行統一的意大利統治階級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敗。——第 39 頁。
- 23 引自海涅的詩“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七章。——第 50 頁。
- 24 指 1848 年 8 月 26 日丹麦和普魯士签訂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爭取德国統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魯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魯士的統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 1848 年 8 月在馬尔摩签訂了可耻的休战条約。法兰克福国民議会在 1848 年 9 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約的决定,引起了抗議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 年春天,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 年 7 月普魯士和丹麦签訂了和約,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 50 頁。
- 25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闡发的关于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观点,見本卷說明第 XII 頁。——第 51 頁。

- 26 胡斯战争是 1419—1434 年間以偉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領袖楊·胡斯(1369—1415 年)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間，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皇帝組織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軍征討。只是由于捷克的貴族和市民階級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敗。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紀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 54 頁。
- 2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6 月 2 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別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該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領袖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問題。民主主义左派(薩賓納、弗利契、里別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張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 1848 年 6 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 6 月 16 日宣布代表大会會議无限期休会。——第 57 頁。
- 28 見海涅“夜巡邏来到巴黎”(詩集“現代的詩”)。——第 59 頁。
- 29 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倫敦組織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議會大厦，遞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书。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撓游行示威的进行，在倫敦集結了大批軍警。宪章派的領袖人(其中有許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棄游行示威并且劝說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敗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 61 頁。
- 30 1848 年 4 月 16 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組織”和“消灭人对人的剝削”的請願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而动员起来的資產階級国民自卫軍所阻止。1848 年 5 月 15 日，在举行人民示威时，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拥进了制宪議会的會議大厅，宣布解散制宪議會，建立革命政府。但是示威者很快就被及时赶来的国民自卫軍和军队所驅散。工人領袖布朗基等被捕。——第 61 頁。

31 1848年5月15日，因1848年1月炮轰墨西哥而被稱為炮彈國王的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二世鎮壓了人民起義，解散了國民自衛軍，解散了議會，取消了1848年2月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實行的改革。——第61頁。

32 1848年4月1日奧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暫行條例規定必須交納大量保證金才能取得出版報紙的權利。由於保留書報檢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審法庭）審判的制度，政府官吏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

1848年4月25日憲法規定了在選舉議會方面的苛刻的財產資格限制和居住資格限制，建立了兩院——下院和上院，並且保留了各省的等級代議機關。憲法將執行權和軍權交給皇帝並授予皇帝否決兩院通過的法律的權力。

1848年5月11日選舉法剝奪了工人、日工和僕役的選舉權。一部分上院議員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上院議員則按照兩級選舉制從納稅數目最多的人中間選舉。下院的選舉也是兩級制。——第65頁。

33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軍隊在背叛了革命事業的戈爾蓋率領下在維拉戈什向派來鎮壓匈牙利起義的沙皇軍隊投降。——第75頁。

34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從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倫出版，總編輯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工作的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維爾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民主派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新萊茵報”起了人民群眾的教育者的作用，號召他們起來和反革命作鬥爭。決定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

該報的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對普魯士政府以及科倫地方當局的政治上的揭發，——這一切使得“新萊茵報”在創刊后的最初幾個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普魯士的反革命政變之后更

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撓，“新萊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的被驅逐和“新萊茵报”其他編輯的被迫害，使該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萊茵报”，即第301号。报纸的編輯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說，“無論在什么时候，無論在什么地方，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75頁。

35 朗卡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約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1)的名字命名的貧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齡較大的和学习成績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師資的不足。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經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77頁。

36 1636年約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絕向皇家收稅官繳納一种未經下院批准的捐稅——“造船費”。就汉普敦拒絕納稅一事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情緒的高漲。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稅的斗争，是英屬北美殖民地爭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的序幕。1766年英国議会在抗議下不得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稅；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繳納間接稅的英国商品。1773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輸入繳納高額消費稅的茶叶的企图，以貨物在波士頓港口被銷毀而告終。这一切冲突导致了糾紛的尖銳化和加速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81頁。

37 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魯士资产阶级閣員們的倡議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了要求德国統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視，臂上戴着黑紅黃三色臂章——德国統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說，把自己裝成“德国自由和統一”的捍卫者。——第95頁。

- 38 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普魯士、薩克森、汉諾威、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参加的代表會議，會議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議會拟定的所謂帝国宪法。1849年5月26日代表會議結束时，普魯士、薩克森和汉諾威的国王締結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合”)，到1849年8月共有二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君主制的利益，規定帝国的摄政由普魯士国王充任，并規定議會由两院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魯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魯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1850年11月退出了“联合”。——第98頁。
- 39 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議会的會議。——第112頁。
- 40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的最后一篇，“紐約每日論壇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許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見本卷第449—456頁)一文載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屬於“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第115頁。
- 41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創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第116頁。
- 42 指在科倫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毕尔格尔斯、勒澤尔、丹尼尔斯等人)的事件，这次逮捕是普魯士警察当局于1851年5月間继薩克森当局在萊比錫逮捕同盟的特派員諾特莱克以后进行的。普魯士政府企图通过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挑撥性审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見本卷第457—536頁)揭示了科倫案件的作用。——第116頁。
- 43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在分析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馬克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

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必要性的論點。馬克思及時地將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這個時期的事件寫成了書。在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過程中，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換關於法國事件的意見。除了報刊和官方的資料外，馬克思還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個人通訊作為資料。“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本來是準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約·魏德邁在美國籌辦的“革命”周刊上以文叢的形式發表的，但是這個雜誌魏德邁只出了兩期（1852年1月），以後就由於經濟困難而停刊了。馬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這兩期中沒有來得及發表。根據馬克思的建議，魏德邁於1852年5月把這個著作以單行本出版，作為“不定期雜誌”“革命”的第1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邁將書名改為“路易-拿破侖的霧月十八日”（沒有用路易·波拿巴）。由於經濟窘迫，這個第一版的大部分魏德邁都沒有能夠從印刷廠主那裡買回，運到歐洲去的冊數不多。在德國或英國（用英文）再版的企圖也沒有成功。書的第二版到1869年才出版。在這次出版時，馬克思將著作的原文又重新審閱了一遍。在1869年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將他對原文的校訂作了如下的說明：“這本書如果加以修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誤，並且刪掉了一些現在已經看不懂的暗喻。”1885年由恩格斯編輯出版的第三版，全文與1869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法文譯本最先於1891年1—11月載於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同年該書又在利爾以單行本出版。1894年在日內瓦第一次出版了本書的俄文版。此後這本書曾多次以俄文重版，其中很多次是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負責出版的。這次出版時是根據1869年德文版的原文。——第117頁。

- 44 霧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在法國完成資產階級反革命過程的一次政變；政變的結果，建立了拿破侖·波拿巴的軍事專政。——第121頁。
- 45 貝德勒姆是倫敦的瘋人院。——第123頁。
- 46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經大選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第123頁。

- 47 据聖經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飢餓,开始惋惜他們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們至少还可以吃飽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鍋”就成了一句諺語。——第124頁。
- 48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轉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說大話的人讲的話,他硬說自己曾在罗陀斯島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說大話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語(*Ῥόδος*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島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125頁。
- 49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統任期屆滿。根据法国1848年宪法,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統的选举应该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125頁。
- 50 見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书斋”)。——第126頁。
- 51 在1869年的德文版以及1852年版和1885年版中,都将立法議会的召开日期錯写为1849年5月29日。——第126頁。
- 52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議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議員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資產階級自由派情緒的人們,主張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127頁。
- 53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騎士”一詩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貴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貪食、饕餮、酗酒以及懶汉、敗类的意思)形成的。
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131頁。
- 54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第132頁。
- 55 “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

- 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 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 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 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 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132頁。
- 56 法国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 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 但是, 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第134頁。
- 57 «Frère, il faut mourir!» (“兄弟, 要准备牺牲!”) ——是特拉普天主教修道会的成员在见面时的互相问候词。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 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136頁。
- 58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137頁。
- 59 指1849年5—7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 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 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 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 由于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 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 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139頁。
- 60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 1832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 1848年在英国的时候, 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 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第139頁。
- 61 指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51頁)。——第139頁。

- 62 羅馬皇帝卡利古拉(37—41)是由于御用軍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143頁。
- 63 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羅馬共和国的借口下，从制宪議會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軍的撥款。而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羅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143頁。
- 64 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茲和帕納及立法議会的議會总务官(議會負責經濟、財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員)提出的法案，法案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險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144頁。
- 65 彼得·施萊米尔是夏米索的中篇小說“彼得·施萊米尔奇遇記”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錢袋。——第147頁。
- 66 爱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1849年8月正統派曾在这里召开會議，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也参加了这次會議。
克勒蒙特是倫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这里。——第150頁。
- 67 第V条屬於1848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以阿拉伯数字編号的。——第153頁。
- 68 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羅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国王位的阴谋。据聖經故事，古犹太皇帝大卫是由先知撒母耳主持塗油仪式而登极的。——第158頁。
- 69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侖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一书。——第164頁。
- 70 加入立法議會新选举法起草委員會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由于他們貪圖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綽号是从維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紀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統治者。——第168頁。

- 71 按照 1850 年 7 月立法議會通过的出版法的規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稅，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內。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締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繼續。——第 170 頁。
- 72 “新聞報”(«*La Presse*») 是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資產階級日報；在 1848—1849 年，它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報，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報。——第 170 頁。
- 73 “通报”(«*Moniteurs*») 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的簡称，它是政府的官方机关報，1789 年至 1869 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 173 頁。
- 74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 年 9 月 30 日他在一些贊成波拿巴主义的軍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駐防軍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經過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 年 8 月 6 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謀家一起在布倫登陆，企图在当地駐防軍隊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終身監禁，但他 1846 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 174 頁。
- 75 聶克·波頓 是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人物。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第一幕第二場的情节。——第 174 頁。
- 76 舒夫特勒 和 斯皮格尔勃 是席勒的話劇“强盜”中的人物，是喪失一切道德观念的盜匪和凶手的形象。——第 175 頁。
- 77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期間在巴黎的官邸爱丽舍宮而来。——第 177 頁。
- 78 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詩“欢乐頌”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語。在这首詩中詩人歌頌了欢乐——来自爱丽舍烏姆或来自爱丽舍園的女儿（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園是天堂的同义語）。爱丽舍園也是巴黎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 181 頁。
- 79 議會 是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許多城市都

- 有議會，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議會，它辦理國王敕令的登記并具有所謂諫疏的權力，即對不合習慣及國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力。但議會的反對立場並沒有實際的力量，因為只要國王親自出席會議，敕令就一定要被登記下來。——第 185 頁。
- 80 貝耳島是比斯開灣的一個島。1849—1857 年是監禁政治犯的地方；參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義的工人也被囚禁在這裡。——第 188 頁。
- 81 馬克思在這裡運用了古希臘作家阿泰納奧斯（二至三世紀）的著作“學者們之宴會”（《Deipnosophistae》）中的一個情節。他轉述得不完全確切。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隱喻的方式譏笑帶兵前來幫助他的斯巴達皇帝阿革西拉烏斯的矮小身材說：“山懷孕了，宙斯很吃驚，但山生了個老鼠”。阿革西拉烏斯回答說：“你把我看作老鼠，但總有一天，你會把我看成獅子的”。——第 190 頁。
- 82 威尼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正統派的法國王位追求者尚博爾伯爵的駐在地。——第 194 頁。
- 83 指復辟時期正統派陣營中在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路易十八和維萊爾主張比較小心地採取反動的措施，而達爾圖爾伯爵（從 1824 年起為國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卻完全忽視法國的局勢，主張完全恢復革命前的秩序。
- 巴黎的土伊勒里宮是路易十八的皇宮；馬松閣是宮里的建築之一，在復辟時期是達爾圖爾伯爵的官邸。——第 196 頁。
- 84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是英國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刊物。——第 198 頁。
- 85 倫敦工業展覽會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業展覽會，於 1851 年 5—10 月展出。——第 203 頁。
- 86 “國民議會通報”（《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是法國反波拿巴派的日報，於 1851 年 2 月 16 日至 12 月 2 日在巴黎出版。——第 205 頁。
- 87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第 215 頁。

88 塞文 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

万第 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218页。

89 在1852年的版本中没有本段最后两句,作为本段的结束的是:“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第223页。

90 君士坦士宗教会议(1414—1418)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会上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翰·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理。会议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选出了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互相争夺教皇王位的人。——第224页。

91 見注15。——第224页。

92 是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227页。

93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 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227页。

94 恩格斯的关于英国的这两篇文章是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写的。恩格斯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期间共写了四篇文章,魏德迈只收到了其中的两篇,另外两篇在途中遗失了。然而魏德迈收到的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在保留下来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上

都有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这一篇名。第二篇上的篇名看样子是被魏德迈划掉了，文章的羅馬字母编号显然也是他加上去的。——第 228 頁。

- 95 在 1846—1853 年英国在开普兰进行了第五次反对科薩族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对东南非的一些部族的不正确的统称)。战争的头几年，当地居民不止一次的打败过英国军队。但是根据 1853 年的和約科薩族却被迫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給英国人。

1851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侵占奴隶海岸(西非)，并且为此目的，对居住在这里的約魯布族的內訌进行干涉。虽然在 1851 年 12 月英国人轰击了拉格斯城，但是他们仍然沒有能够征服当地居民，而不得不只限于在这里建立他們的傀儡政权。只是在 1861 年“购买”了拉格斯城以后，英国人才在奴隶海岸站住脚并为自己在尼日利亚的殖民地打下基础。——第 229 頁。

- 96 指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队。——第 229 頁。

- 97 貝朗热在他的“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 les funérailles d'Achille») 这个歌曲中諷刺了复辟时期法国的渺小的和无能的統治者。歌曲的标题中帶有一个双关語：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据傳說这是南特薩利亚的一个部落，在特洛伊战争中，这个部落的战士曾在阿基里斯的率领下作过战；mirmidon [米尔米东]同时还有小胖子、矮子的意思，而轉意是渺小的、无能的人。——第 230 頁。

- 98 見注 29。——第 230 頁。

- 99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241, 218—201, 149—146 年)，这个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羅馬和迦太基为了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統治，为了爭夺新的領土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終。——第 231 頁。

- 100 在反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战争(1792—1797)中，在拿破侖率领下同奥軍作战的法国军队于 1797 年 5—6 月占领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根据同年 10 月在康波福米奧簽訂的法奥和約，威尼斯共和国領土的一部

- 分包括威尼斯城划归奥地利，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后者在莱茵河边界上作出让步；另外一部分划归南阿尔卑斯共和国，該共和国是拿破侖在他所夺取的意大利北部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伊奥尼亚群島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的領土划归法国。——第 232 頁。
- 101 指停泊在葡萄牙塔霍河河口的英国舰队。十九世紀，英国地中海舰队會利用塔霍河河口作为中間基地。——第 232 頁。
- 102 指 1803—1805 年拿破侖第一在布倫地区建立的軍事基地，他打算从这里越过拉芒什海峡侵入英国。在这里集中了約二千五百只小运输船和十二万登陆部队。法国舰队在英法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在俄国和奥地利参加下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的反法联盟，迫使拿破侖放棄了他的計劃。——第 234 頁。
- 103 指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战争(見注 24)中的一个战役。1849 年 4 月 5 日，由十只船組成的丹麦分舰队，从海上向什列斯維希的瀕临海湾的城市埃克恩弗尔德发起攻击，以便登陆兵上陆。分舰队被海岸炮兵的交叉射击击潰。——第 235 頁。
- 104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派于 1816 年在倫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組織。协会得到了自由貿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貿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貿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經濟上政治上的統治。——第 236 頁。
- 105 此处在手稿上有下面这样一个編者注：“討論帕麦斯顿被撤职的文章，我們沒有收到。显然它是从英国寄来的时候在途中遺失了。”这个編者注看样子是魏德迈加的。——第 237 頁。
- 106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 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資產階級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第 237 頁。
- 107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滿二十一岁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选人

的財產資格限制，發給議員薪金。——第 238 頁。

- 108 現在發表的這封信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提議寫的，而由馬克思寄給“泰晤士報”編輯部。恩格斯還給“每日新聞”的編輯部寄去了一封類似的信。但是，因為這些報紙的編輯部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家採取極端敵視的態度，所以這兩封信未能發表。給“泰晤士報”的這封信是根據恩格斯在 1852 年 1 月 28 日給馬克思的信的背面所寫的該信的草稿刊印的。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保守派最大的一家報紙，1785 年創辦於倫敦。——第 241 頁。

- 109 大陪審團是 1933 年之前存在於英國的一種陪審團，由郡長從郡中選拔十二到二十三個“善良的和誠實的人”組成。陪審團的職能是對案件進行預先審查，並對是否將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審判的問題作出決定。——第 242 頁。

- 110 “每周快訊”(《*The Weekly Dispatch*》)是英國的一家報紙，1801 年至 1928 年以這個名稱在倫敦出版；五十年代該報具有激進的傾向。——第 244 頁。

- 111 指 1851—1852 年在倫敦出版的憲章派的周刊“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它的主編是厄·瓊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支持這個雜誌，參加該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並且從 1851 年 6 月到 1852 年 4 月間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第 245 頁。

- 112 指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通過的(1848 年 8 月 9—11 日，1849 年 7 月 27 日，1850 年 7 月)一系列有關出版物的法律。這些法律規定出版報刊要繳納很高的押金，對書報征收印花稅，並且規定對攻擊“所有制原則和家族權利”，以及“煽動內戰”的出版物要嚴加懲處。這些法律實際上是取消了法國的出版和言論自由。

恩格斯把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來和 1819 年英國議會通過的六項反動法令作類比，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集會自由。——第 245 頁。

- 113 在1853年底和1854年，一些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发生了尖銳的危机現象。市場商品滯銷現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紡織业和制铁业生产縮减。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現象。同样，美国的工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255頁。
- 114 貝尔格萊夫广场是倫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帶。——第255頁。
- 115 指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頒布的沒收奥尔良王室財產的命令。——第256頁。
- 116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倫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統治时期，該报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并且激烈地反对“新萊茵报”。——第257頁。
- 117 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脫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員。这个集团采取小資產階級的密謀性策略，忽視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組織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魯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領導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細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謂德法密謀。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謀叛国的罪名被判罪。奸細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獄逃跑。普魯士警察当局誣蔑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謀的企图就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康拉德·施拉姆，也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釋放。施梯伯在科倫案件中所能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謀的伪证都被馬克思揭穿了(見本卷第472—487頁)。——第257頁。
- 118 1849年9月馬克思被选入倫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該委员会附設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流亡者把倫敦流亡者中的无產階級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領導者的建議改組成了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領導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旬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員都受到了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257頁。

119 “流亡中的大人物”是抨击 1848—1849 年的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活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資產階級活动家在革命失敗后便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是給这种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并揭露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玩弄革命陰謀的有害活动。这本著作写于 1852 年 5—6 月，一部分写于倫敦，一部分写于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馬克思是 5 月底到他那里的。这一著作利用了靠朋友們的帮助事先收集起来的大量的实际材料：流亡者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文件、报纸、回忆录），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刊等等。参加选材和手稿整理工作的除馬克思夫人外，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恩斯特·德朗克。7 月初手稿就委托給一个自願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在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給了普魯士警察局。馬克思不久便在 1853 年 4 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紐約刑法报”上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

作者在世的时候，小册子一直没有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保存的手稿本（前几頁是德朗克执笔，以后都是恩格斯执笔由馬克思作补充）后来落到了爱·伯恩施坦手里，他不仅不設法出版，而且在 1913 年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时候，竟尽数地刪去了所有涉及馬克思就“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同班迪亚談判的地方。直到 1924 年，保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遺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庫才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手稿。1930 年这一著作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譯成俄文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和以前的版本不同，本版考虑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校閱中所做的修改，凡手稿中刪去的地方都沒有再刊印出来。——第 259 頁。

120 克洛普什托克“救世主”第一首歌。——第 261 頁。

121 «Gottfried Kinkel. Wahrheit ohne Dichtung». 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von Adolf Strodtmann. Bd. I—II,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850—1851. ——第 261 頁。

122 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十八世紀末曾風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說“济格瓦

- 特。修道院的历史”(1776年出版)是这一派的代表作。——第261頁。
- 123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頁。
- 124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頁。
- 125 納尔苏修斯——古代希腊神話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轉意是妄自尊大的人。——第266頁。
- 126 瓦格納——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伪学者、經院哲学家的典型。——第266頁。
- 127 指文学杂志“德国繆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和“基督教徒的娱乐”(«Der Christoterpe»)。前者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于1832—1838年在萊比錫出版，后者由阿·克納普于1833—1853年在杜宾根出版。——第268頁。
- 128 馬哈德伐即“偉大的神”，是印度主神之一湿婆的別名。印度姑娘們都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們崇拜的偶像。——第268頁。
- 129 “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是德国作家諾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小說，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說的主人公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是一个詩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藍色花朵”——理想的詩篇的象征。——第270頁。
- 130 歌德“温和的諷刺詩”。——第271頁。
- 131 指霍夫曼的中篇小說“約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一段情节。小說中的主人公木匠約翰奈斯·瓦赫特，由于不久前死了妻子和儿子而非常悲痛，但他在創作中找到了安慰并創造出独特的建筑設計图案。——第272頁。
- 132 “恨世和懊悔”是德国反动作家奧·科采布的剧作的名称。——第273頁。
- 133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現象学”1807年班堡和維尔茨堡版(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第 274 頁。

- 134 指作家萊克-施梯林的自傳體小說“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時代”(1778 年版)中的主人公,這本小說是偽善的虔誠的文學作品的典型。——第 276 頁。
- 135 “林苑協會”是 1772 年在哥丁根大學里成立的青年詩人小組(約·福斯、亨·畢爾格爾斯、路·哥爾蒂等人)。克洛普什托克是小組在思想上的鼓舞者。小組傾向於不久之後獲得“狂飈”(«Sturm und Drang»)之稱的思潮,這種思潮表達了德國市民階層對德國現存制度的不滿。哥丁根小組成員的特点是寫抒情詩,在這些詩里有抗議的主題,同時也夾雜着對德國市民的簡單的生活方式及其庸俗道德的傷感的歌頌。——第 280 頁。
- 136 羅累萊是德國詩人廣泛引用的民間傳說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致人於死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亨·海涅“羅累萊”這首詩在藝術上最出色地體現了這個形象。——第 281 頁。
- 137 歌德“亲和力”(Goethe.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第 281 頁。
- 138 大·弗·施特勞斯“耶穌傳”1835—1836 年杜賓根版第 1—2 卷(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第 283 頁。
- 139 哥·金克爾“手工業,救救自己吧!或德國手工業者為了改善自己的狀況應當要求什麼和做些什麼?”1848 年波恩版(G. Kinkel. «Handwerk, errette Dich! oder Was soll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fordern und thun, um seinen Stand zu bessern?» Bonn, 1848)。——第 286 頁。
- 140 “文克布萊希哀歌”(德國經濟學家卡·格·文克布萊希,他發表了恢復行會制度的反動理論)在這裡是用來諷刺地稱呼 1848 年在許多德國城市里召集的手工業者代表大會的,在這些大會上提出了恢復行會的反動、空想的綱領。1848 年 7 月 15 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集了全

- 德手工业者代表會議，制定共同綱領。由于师傅們不願让帮工平等地参加代表會議，后者便自己組織了一个代表會議，并且吸收南德各城市的工人参加。但是这个代表會議的綱領也是根据亲自参加了这两个會議的文克布萊希的反动学說制定的。——第 287 頁。
- 141 普魯士議会的第二議院是 1849 年 2 月 5 日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普魯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欽定的宪法而召集的。尽管該院的选举是根据极不完备的选举法进行的，但是第二議院里仍然形成了强有力的左翼反对派。到 4 月 28 日第二議院就被政府解散了。——第 290 頁。
- 142 普法尔茨并没有海岸綫。——第 291 頁。
- 143 1849 年 6 月 29—30 日巴登革命軍和普魯士軍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圍困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軍殘部在 7 月 23 日投降。——第 291 頁。
- 144 金克尔 1849 年 4 月 4 日在拉施塔特軍事法庭上的辯护詞曾登載在 1850 年 4 月 6—7 日的柏林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晚邮报”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上尖銳地批評了金克尔的这个辯护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51—354 頁)。——第 293 頁。
- 145 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Goeth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第 296 頁。
- 146 指英国国王獅心理查从囚禁中逃脫一事，他是在第三次十字軍远征(1190—1192 年)的归途中被奧地利大公列奧波特一世囚禁的。他是被法国的吟游抒情詩人布朗德尔解救出来的，据傳說后来布朗德尔成了獅心理查的宮廷詩人。——第 296 頁。
- 147 “家常話”(«Household Words»)——英国的一种文艺周刊；由查理·狄更斯于 1850—1859 年在倫敦出版。
- “新聞画报”(«Illustrated News»)——英国的一种画报(周刊)
- “倫敦新聞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簡称；1842 年开始

- 出版。——第 298 頁。
- 148 水晶宮，用金屬和玻璃構成，是為 1851 年在倫敦舉行的首屆世界工商業展覽會建造的。——第 299 頁。
- 149 “宇宙”（《Der Kosmos》）是在英國的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流亡者的機關報（周刊）；由恩斯特·豪格於 1851 年在倫敦出版；參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爾、盧格、隆格、奧本海姆、陶森璫。共出了六期。——第 299 頁。
- 150 1852 年 5 月，在法國按照憲法應當改選共和國總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人士，尤其是流亡者希望民主黨派通過這次改選上台執政。——第 300 頁。
- 151 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憲法遭到了德意志各邦多數的否決。5—6 月在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支持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 91—104 頁）這兩本著作中評述了這一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第 300 頁。
- 152 成立全體德國流亡者中央局的企圖是為了反對這個時期由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流亡者委員會（見注 118），其目的是阻撓無產階級成立獨立的組織。——第 301 頁。
- 153 德·狄德羅“拉摩的侄子”。摘自“狄德羅軼文集”1821 年巴黎版（D. 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In: «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 Paris, 1821）。——第 301 頁。
- 154 “堅決前進俱樂部”是 1849 年 6 月 5 日在卡爾斯盧厄成立的，它聯合了對布倫坦諾政府採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強右派分子的活動表示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的比較激進的一派（司徒盧威、契爾奈爾、海因岑等等）。俱樂部建議布倫坦諾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爾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進分子。俱樂部的委員接到否定的回答後，於 6 月 6 日試圖以武裝示威遊行來威脅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

- 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們繳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閉了。——第 302 頁。
- 155 見注 6。——第 303 頁。
- 156 見注 16。——第 303 頁。
- 157 德国大学里的普通的四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第 303 頁。
- 158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是德国激进派的周报,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 1846 年 12 月至 1848 年 4 月在曼海姆出版,1848 年 7—9 月在巴塞尔出版。該报于 1848 年 7—12 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默尔德斯继续以此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个小标题:“續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第 303 頁。
- 159 指卡·罗泰克“从古代到 1831 年一切等級的世界史”,1831—1833 年斯图加特版第 1—4 卷(K. Rotteck.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Bd. 1—4, Stuttgart, 1831—1833),和卡·罗泰克同卡·韦尔凯尔“政治詞典。一切等級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 年阿尔托纳版第 1—12 卷(K. Rotteck und K. Welcker. «*Das Staats-Lexikon. Encyclopä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Bd. 1—12, Altona, 1845—1848)。——第 303 頁。
- 160 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 1—4 卷(G. Struve. «*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Bd. 1—4)。头两卷于 1847 年在曼海姆出版,第 3—4 卷于 1848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303 頁。
- 161 指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 年伯尔尼版(G. Struve. «*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第 303 頁。

- 162 指“共和国政府报”(«*Republikanisches Regierungs-Blatt*»), 該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 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于1848年9月第二次巴登起义时期在寥拉赫出版。“德意志共和国! 富强、教化、人人自由!” («*Deutsche Republik! Wohlstand, Bildung, Freiheit für Alle!*») 这个口号被当作副标题刊印在該报上。——第304頁。
- 163 指阿·戈克匿名出版的书“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的革命。巴登制宪議會一委員写”1850年巴黎版(A. Ferra «*Rückblick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utschlands. 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Paris, 1850)。——第304頁。
- 164 “德意志倫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是倫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 自1845年4月出版到1851年2月該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位的不倫瑞克的卡尔公爵支持。主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貝尔格尔。自1849年至1850年該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的論文; 此外, 它轉載了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卡·馬克思写的“法兰西階級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际述評(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許多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305頁。
- 165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侖的压迫以后, 德国知識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生体操协会的許多成員, 在維也納代表會議(見注8)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 組織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在游行时提出了統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国王的走狗科采布一事成了鎮压“蠱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會議上所通过各項決議中, 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蠱惑者”。——第306頁。
- 166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綱要”1817年海得尔堡版(G. W. F.

-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eidelberg, 1817)。——第 306 頁。
- 167 “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該杂志自 1838 年 1 月至 1841 年 6 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萊比錫出版,自 1841 年 7 月至 1843 年 1 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該杂志在 1841 年 6 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編,从 1841 年 7 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頓編輯。1843 年 1 月,薩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議會則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內出版。——第 306 頁。
- 168 “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是德国启蒙派的机关刊物;于 1783—1811 年出版。該杂志曾几度改变名称,在 1799—1811 年間弗·尼古拉参加了它的出版工作。——第 307 頁。
- 169 指乔·威·弗·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5 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 卷第 1—3 册(G. W. F.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Bd. I—III; Werke, Bd. X, Abt. 1—3, Berlin, 1835, 1837—1838)及亨·海涅“浪漫主义学派”1836 年汉堡版(H. Heine.«Die romantische Schule». Hamburg, 1836)。——第 307 頁。
- 170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現象学”1807 年班堡和維尔茨堡版(G. W. F.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第 309 頁。
- 171 指亨·海涅的諷刺詩“阿塔·特洛尔”,詩中以一只博学的熊阿塔·特洛尔的形象来嘲笑德国的哲学家。——第 310 頁。
- 172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

- 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頁）。这些著作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进分子卢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311頁。
- 173 皇宮是巴黎的一座宮殿，屬於奥尔良王族。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宮里設置了表演場和娛樂場；皇宮里的花园和走廊是游乐的場所。——第311頁。
- 174 指索西薩尔——保尔·德·科克的輕浮小說“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第311頁。
- 175 关于“光明之友”，見注16。——第312頁。
- 176 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萊比錫版（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Leipzig, 1845）。——第312頁。
- 177 从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派竞选宣言”（1848年4月）中借用的話，在这个宣言中，全德国民議會的主要任务被宣布为“对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第312頁。
- 178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form. 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是德国一家報紙，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主編是愛·梅因，由阿·卢格和亨·伯·奧本海姆在萊比錫出版；1848年夏天到五十年代初該报在柏林出版。——第313頁。
- 179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黨人和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313頁。
- 180 指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會議。出

席代表會議的有德国各城市的二百六十个民主派組織和工人組織的代表。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极重要的問題上引起了爭執和分歧。代表會議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是限于制定毫无結果的矛盾百出的決議。例如代表會議在10月29日根据卢格的建議而通过的保卫維也納的呼吁书中,要求德意志各君主邦政府援助革命的維也納。馬克思在“新萊茵报”上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銳的批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7—530頁)。——第314頁。

- 181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宮廷权奸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这个报又名“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十字。——第314頁。
- 182 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見本卷第80—84頁。——第314頁。
- 183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創刊,是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倫坦諾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頁。
- 184 指卢格未加署名发表在1850年12月21日和28日的英国自由派周报“先驅”上的一篇名为“德国民主党”的文章。——第315頁。
- 185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倫敦創刊;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資產階級的机关报。——第316頁。
- 186 阿尔諾德·文克里特是半傳說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魯士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傳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軍隊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316頁。
- 187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的长詩“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罗多芒特来称呼海因岑,罗多芒特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說八道。——第317頁。

- 188 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在德国流行的德国作家約·提·海尔梅斯的說教的和感伤的小說“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薩克森的旅行”。——第 317 頁。
- 189 阿利曼是古代波斯神安赫腊曼紐的希腊名称，是众恶之神在世上的化身。安赫腊曼紐同众善之神阿胡腊瑪士达(希腊名称是奥尔穆茲德)永远处于不調和的敌对地位。——第 319 頁。
- 190 引自格林兄弟的童話“端飯的桌子，吐金的駱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小棍子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痛打敌人。——第 319 頁。
- 191 比林格斯盖特是倫敦的魚市場，以粗野的吵罵而恶名昭著，这种吵罵已成为該市場商販的生活习惯。——第 320 頁。
- 192 指海因岑的喜劇“奈貝尔博士，或学問和生活”1841年科倫版(«Doktor Nebel, oder: Gelehrsamkeit und Leben». Köln, 1841)。——第 320 頁。
- 193 指卡·海因岑“普魯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 Heinzen. «Die Preußische Bürokratie». Darmstadt, 1845),和雅·費奈迭“普魯士和普魯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 Venedey. «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 Mannheim, 1839)。——第 320 頁。
- 194 1811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領区内实行法国的訴訟程序。萊茵省在1815年归并于普魯士后，仍保存了这个訴訟程序；而法国的訴訟程序在这里逐漸地被普魯士人所排斥。——第 320 頁。
- 195 指卡·海因岑“逮捕令”1845年施哈尔貝克版(K. Heinzen. «Ein Steckbrief». Schaerbeek, 1845)。——第 320 頁。
- 196 “快邮报”(«Schnell post»)是“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的简称，是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于1843—1851年在紐約出版，半周刊。1848年和1851年該报的主編是卡·海因岑，1851年阿·卢格也加入了編輯部。該报还有一份附刊“德意志

- 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第 321 頁。
- 197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是德国一家激进派的日报,1842年由卡·格律恩创办,他不久便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見注 15)。該报于 1848 年底停刊。——第 321 頁。
- 198 指 1848 年出版的小册子: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萊茵斐尔頓版(K. Heinzen, «Frankreichs «Brüderlicher Bund mit Deutschland»», Rheinfelden)。——第 321 頁。
- 199 阿耳契娜是阿里欧斯托的长詩“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第 324 頁。
- 200 教友派信徒(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傳很广。教友派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教仪,鼓吹和平主义思想。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产生的主張革新教友派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教友派信徒(区别于信奉正統教义的教友派成員——“乾的”教友派信徒)。——第 324 頁。
- 201 欧洲中央委员会(全名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馬志尼的倡議于 1850 年 6 月在倫敦成立的。委员会是个联合各国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組織。这个組織在其成員和思想观点方面都极其复杂,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間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到 1852 年 3 月实际上就已經瓦解了。——第 325 頁。
- 202 “流亡者”(«Proscrit»)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的簡称;于 1850 年在巴黎出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編輯部的有賴德律-洛兰、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沃尔策耳。从 1850 年 10 月底起,改組成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圣阿曼(法国)出版到 1851 年 9 月。——第 325 頁。

- 203 “不来梅每日紀事” (*«Bremer Tages-Chronik»*) 是德國民主派報紙, 于 1849—1851 年出版; 1850 年 3 月起, 該報主編是魯·杜朗。——第 325 頁。
- 204 “为巴黎做弥撒是值得的”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 是亨利四世的話, 1593 年由于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 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 这时他便說了这句话。——第 326 頁。
- 205 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 在这里是对 1850 年 11 月 8 日在庫尔黑森的起义时期普魯士先头部队和奥地利先头部队之間的一次小冲突的諷刺称呼; 为爭夺德国的統治权而交战的普魯士和奥地利, 彼此爭夺干涉庫尔黑森內政的权利, 目的是鎮压起义。奥地利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 普魯士在这次冲突中不得不作了让步。——第 327 頁。
- 206 約卜西 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卡·阿·科尔图姆的极受欢迎的諷刺长詩“約卜西之歌”中的主人公。——第 327 頁。
- 207 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进行諷刺的这些詞句摘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告德国人书” (該文刊載在 1850 年 11 月的“流亡者之声”杂志上), 在摘引时作了改写。——第 327 頁。
- 208 指 1850 年 8 月資产階級和平主义者在美国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起显著作用的人物是美国資产階級博爱家艾利修·巴里特, 英国自由貿易派的領袖科布頓, 法国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日拉丹, 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前自由派政府首脑尧普, 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教友会派的代表, 以及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領袖。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說都是伪善的和假仁假义的。——第 327 頁。
- 209 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 1852 年倫敦版 (H. Harring. *«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 London, 1852)。——第 329 頁。

- 210 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組織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330頁。
- 211 指“德意志”(«*Deutschland*»)(民主派机关报，从1831年12月到1832年3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主編是哈罗·哈林)，以及这位作者的下列著作：“各族人民。詩剧。光荣。自由。祖国”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Völker. Ein dramatisches Gedicht. Ehre. Freiheit. Vaterland*». Straßburg, 1832)；“血滴。德国詩”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Blutstropfen. Deutsche Gedichte*». Straßburg, 1832)；“君主政体，或扫罗王的历史”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Monarchie, oder die Geschichte vom König Saul*». Straßburg, 1832)；“大人物之声。論德国的統一，德国詩”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Männer-Stimmen, zu Deutschland's Einheit. Deutsche Gedichte*». Straßburg, 1832)。——第330頁。
- 212 硫黄党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耶拿大学的学生联合会最初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員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黄党”成了一个普通的用語。——第332頁。
- 213 指1834年资产阶级民主派馬志尼組織的革命流亡者的进军。由各种民族的流亡者組成的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諾的指揮下由瑞士攻入了薩瓦，但是被皮蒙特的軍隊击潰了。——第332頁。
- 214 “青年欧洲”是政治流亡者各个革命組織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馬志尼的倡議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存在到1836年。“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組織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等。联合会的宗旨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333頁。
- 215 邦迪埃拉兄弟，密謀者組織的成員，于1844年6月帶領着一支不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起义者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奧地利的統治。由于队伍中一个

- 成員的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了。——第 334 頁。
- 216 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該王朝向丹麦国王爭夺占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权利。——第 335 頁。
- 217 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會議,根据俄国的倡議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目的是对普魯士施加压力,并迫使它放棄把德国統一在自己的保护下的計劃。——第 339 頁。
- 218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 年創刊,1850 年該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謂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們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39 頁。
- 219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資产階級的一家日报,1831 年在布魯塞尔創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339 頁。
- 220 引自汉澤曼于 1847 年 6 月 8 日在柏林的联合省議会的會議上的演說。——第 340 頁。
- 221 指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工人問題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巴黎的卢森堡宮召开。这个所謂卢森堡委員會是資产階級为了引誘工人群众放棄革命发动而成立的,它沒有資金,也沒有任何权力。路易·勃朗領導下的这个委員會的实际活动,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間起調停作用。1848 年 5 月 15 日人民群众发动以后(見注 30),政府便撤銷了委員會。——第 340 頁。
- 222 1851 年 2 月 24 日的群众大会(所謂“平等者宴会”)的組織者企图隱瞞布朗基的献詞,不使社会輿論得知,但是这篇献詞的全文在許多法国报纸上都登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詞譯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上了按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30—632 頁)。德譯文出版的份数很多,并且流傳在德国和英国。——第 341 頁。
- 223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聖經上的先知耶利米这个名字称呼金克尔。因耶路撒冷的被毀而引起的“耶利米哀歌”在文学中被作为悲叹和訴苦的例子(从此得出耶利米哀歌这个用語)。——第 343 頁。

- 224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資產階級的一家日报,1770年到1862年在倫敦出版;是輝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4頁。
- 225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第344頁。
- 226 “启示录”是收在新約中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該书被认为是圣徒約翰所著。“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神秘預言,在中世紀異教徒的人民运动中經常被利用。后来“启示录”中的預言被牧师用来吓唬人民群众。——第345頁。
- 227 見注93。——第345頁。
- 228 見注33。——第346頁。
- 229 “紐約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的一家日报,1834年出版;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350頁。
- 230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錫侖这个名字称呼謝特奈尔。根据希腊神話,錫侖是酒神狄奧尼苏斯的同伴。——第353頁。
- 231 歌德“評‘拉摩的侄子’對話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題”(Goethe. «Anmerkungen über Personen und Gegenstände, deren in dem Dialog: «Rameau's Neffe» erwähnt wird»).——第354頁。
- 232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溫莎的風流娘儿們”、“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入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謊者。——第356頁。
- 233 見注90。——第358頁。
- 234 預备議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會議。預备議会的絕大多数代表屬於君主立宪派。預备議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議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紙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358頁。

- 235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 雅努斯 这个名字称呼海因岑。雅努斯是古羅馬的一个神，它被描繪成具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轉意是两面派的人。海因岑于 1851—1852 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也叫“雅努斯”(«Janus»), 他在該报上攻击馬克思。——第 359 頁。
- 236 圣杯 ——按照中世紀的傳説，是一只有奇異力量的宝杯。——第 361 頁。
- 237 指古希腊的一首諷諧叙事詩“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奧馬希亞”), 荷馬的叙事詩的摸拟詩, 作者不詳。——第 361 頁。
- 238 指維利森在“关于 1831 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規模战争的理論”1840 年柏林版 1—2 册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 这部书中所叙述的观点。維利森的理論所根据的不是軍事艺术史的实际材料, 而是抽象的哲学原理。——第 363 頁。
- 239 指維利希于 1848 年 11 月在伯桑松(法国)組織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成員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貼, 但是在 1849 年初津貼便停止了。后来該队伍編入了所謂的維利希軍团, 該軍团参加了 1849 年 5—6 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 365 頁。
- 240 指阿里欧斯托的詩“疯狂的罗兰”中的第三十四首歌。阿里欧斯托把这首詩当作博雅多的詩“恋爱中的罗兰”的續篇。——第 366 頁。
- 241 这是西塞罗在“論預言”(«De divinatione») 这本书中引用的老卡通的一句话; 腸卜者是古羅馬的查看祭神牺牲的内臟而卜神意的預言者。——第 369 頁。
- 242 指“匈奴人之战”——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的一幅名画。画中描繪了許多陣亡战士的靈魂的战斗, 這場战斗是在戰場的上空进行的。——第 374 頁。
- 243 帕威法耳——許多中世紀詩歌的主人公; 他是出去寻找圣杯(見注 236)

的騎士；樹立了許多功勳。帕威法耳成了聖杯的守護者。——第 379 頁。

- 244 馬克思本人為“紐約每日論壇報”(見注 2) 撰稿實際上是从“英國的選舉。——托利黨和輝格黨”這篇文章開始的。在這以前，他寄給該報的文章只是恩格斯寫的“德國革命和反革命”這一組文章。本文和“憲章派”一文是一個整篇，最初馬克思是用德文寫的，寫後于 1852 年 8 月 2 日寄給了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由他譯成英文。馬克思在這以後寫的一些文章，也是這樣由恩格斯譯成英文的，這種做法一直繼續到 1853 年 1 月底，那時馬克思已經精通英文的文學語言，他本人已能用英文寫通訊了。在翻譯當中，恩格斯有時把長篇文章分為兩篇，然後馬克思就把它們作為單篇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例如，這一次恩格斯就是把馬克思寄來的文章分成了兩篇：“英國的選舉。——托利黨和輝格黨”和“憲章派”。

“人民報”在 1852 年 10 月以“大不列顛的大選”為標題連續轉載了上述文章以及“選舉中的舞弊”和“選舉的結果”這兩篇文章。“人民報”發表“憲章派”一文時，刪掉了馬克思從這份報紙上引用的某些材料。

“人民報”(《*The People's Papers*》)是憲章派的週報，1852 年 5 月由憲章派的左翼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瓊斯在倫敦創辦。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5 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為該報撰稿，同時還對該報的編輯工作給以幫助。該報除了轉載“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馬克思的重要文章以外，還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為該報撰寫的一些文章。在這個時期，該報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瓊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接近，曾經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為“人民報”撰稿並使他們和瓊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 年 6 月該報轉到了資產階級實業家的手中。——第 381 頁。

- 245 曼徹斯特學派是反映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思想的一個派別。這一派的擁護者即自由貿易派堅持貿易自由和國家不得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徹斯特，在曼徹斯特領導這一運動的是 1838 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兩個紡織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是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則成為自由黨的左翼。

——第 381 頁。

- 246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貴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強調与天主教的傳統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傳播在資產階級和下层神甫中間，这一派着重宣揚資產階級基督教的道德。——第 381 頁。
- 247 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 1846 年 6 月通过的。英国的旨在限制和禁止谷物輸入的所謂谷物法，是为了維護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 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貿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資產階級的胜利。——第 382 頁。
- 248 輝格党——美国政党名，該党主要是代表工业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以及同他們相联系的部分种植場主的利益。輝格党存在于 1834 年至 1852 年，当时奴隶制問題上的斗争的尖銳化，引起了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組。大多数輝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部分反奴隶制度党人 (freesoiler) 一起于 1854 年組織了主張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輝格党人則加入保护种植場主-奴隶占有者利益的民主党。——第 383 頁。
- 249 乔·温·庫克“政党史，从查理二世时期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成立起到改革法案的通过” 1836—1837 年倫敦版第 1—3 卷 (G. W. Cooke. «The History of Party; from the Rise of the Whig and Tory Faction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 Vol. 1—3, London, 1836—1837)。——第 383 頁。
- 250 这里是暗指輝格党領袖約翰·罗素的綽号“頂点約翰”。当罗素在 1837 年发表了演說之后激进派就給他起了这么一个諷刺性的綽号，因为他在演說中說，1832 年的議會改革已經是英国宪制发展的頂点。——第 384 頁。
- 251 英国資產階級历史著作都把 1688 年的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在这次政变之后，建立在土地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的妥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 384 頁。

- 252 指 1831 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为工业資产階級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會的大門。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軍无产阶级和小資产階級受了自由派資产階級的欺騙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385 頁。
- 253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約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許多場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訴訟程序是根据所謂“正义法”进行的。——第 389 頁。
- 254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紀。——第 391 頁。
- 255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曾在 1852 年 2 月做了預示即将实行該法案的声明；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議會討論。关于这个法案，恩格斯在論英国的各篇文章中做了分析（見本卷第 237—240 頁）。——第 393 頁。
- 256 指的是英国議会在 1846 年发給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津貼用以修建新校舍，并为該学院撥发經費的事。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把爱尔兰的天主教僧侶籠絡到英国統治階級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国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 397 頁。
- 257 三十九信条是 1571 年由英国議會通过的英国国教会的信条。——第 398 頁。
- 258 見注 244。——第 399 頁。
- 259 指 1852 年 6 月 29—30 日一群狂热的英国新教徒在地方当局和警察的纵容下在斯托克波尔特城（英国柴郡）蹂躪爱尔兰人的暴行。占全城居

- 民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住房被搗毀，有些爱尔兰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而当时警察却把一百多名无辜的爱尔兰人拘禁起来，拘禁的借口是他們参加了騷动。斯托克波尔特事件使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間的民族糾紛重新加剧起来。——第 400 頁。
- 260 据希腊神話，庫列特在克里特島上保护了嬰兒宙斯（至高无上的天神，相当于古羅馬神話中的丘必特）。宙斯的父亲害怕自己的孩子篡夺自己的王位，想把他吃掉，他的母亲女神蕾婭把他藏起来。庫列特用矛击盾牌发出的一片响声盖住了新生的宙斯的哭声。——第 403 頁。
- 261 根据英国議會沿用的議事程序，在討論某些重大問題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在这种會議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的职务由下院議長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上的一个人担任。——第 407 頁。
- 262 航海法令是英国議会在十七世紀后半期（从 1651 年起）通过的各种保护关税法的名称，其目的在于扶持英国的航海事业；这些法令于 1849 年被廢除。——第 408 頁。
- 263 “集中”是 1836 年成立的波兰民主协会的領導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 1832 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貴族資產階級的組織。协会的綱領中規定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級的不平等，規定将份地无偿地轉归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 1846 年爭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 年夏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集中”便迁至倫敦，但是协会的大部分會員仍旧留在法国。在五十年代，民主协会內部发生了思想上的分裂。1862 年，由于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 413 頁。
- 264 1834 年通过的济貧法只允許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貧民，那就是把他們安置到实行監獄苦役制的习艺所，人民把这种习艺所叫作“穷人的巴士底獄”。——第 417 頁。
- 265 馬克思摘自 1852 年 9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420 頁。

- 266 这里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价格史和1838年、1839年的流通状况”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1840)和“价格史和从1839年到1847年为止的流通状况”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第422頁。
- 267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报纸,1843—1918年以这个名称出版。——第424頁。
- 268 “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英国报纸,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799—1867年出版。——第425頁。
- 269 見注104。——第426頁。
- 270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426頁。
- 271 指的是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在这里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普通法进行。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是,除了其他问题外,还可以审理对资格审查律师就选举人名单所作的决定提出的上诉。根据英国的普通法,上诉法院只审理法律问题,即有关破坏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准则问题;至于事实问题,即有关案件的实际情况问题,根据普通法,则归陪审员审理。——第427頁。
- 272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33頁。
- 273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英国教会的机关报;1846年创刊于伦敦。——第433頁。

- 274 五港 (*Cinque ports*) 是英国东南部在中世紀建立起来的几个沿海城市的联合組織，由最初加入这个組織的港口的数目而得名。这个联合組織享有海洋貿易和捕魚方面的种种特权，同时它也担負給国王提供战船和軍事装备的义务。五港总督在中世紀时曾經握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但随着常备的皇家海軍的建立，五港总督已逐步变成了英国君主政体中的一个領高薪的閑差事之一。——第 434 頁。
- 275 “晨邮报” (*«The Morning Post»*) 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报纸；1772—1937 年在倫敦出版。——第 435 頁。
- 276 “地球报” (*«The Globe»*) 是英国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 (*«The Globe and Traveller»*) 的簡称，1803 年在倫敦出版，輝格党机关报，在該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 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436 頁。
- 277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話，奈斯托尔是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中的一个最老最賢明的英雄；在文学傳統中，他經常被当作飽經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第 437 頁。
- 278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38 頁。
- 279 見注 107。——第 440 頁。
- 280 这里指的是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漲的年代它的成員曾达到四万名。在协会的活动中表现出它的成員之間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統一，也表现出宪章运动的大多数領導者的小资产階級思想。1848 年宪章运动失败后，这个协会也随之一蹶不振，到五十年代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第 442 頁。
- 281 見注 85。——第 446 頁。
- 282 見注 117。——第 446 頁。
- 283 “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后来，这篇文章被收集在經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整理并于

1896年出版的单行本“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論文集里，以代替恩格斯答应过但未見报的这个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第449頁。

28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們在布魯塞尔組織了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俗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組織，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員特別有影响的蒲魯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頑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倫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議他們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組工作并根据他們所宣布的原則草拟同盟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倫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組織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規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組織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則成为同盟組織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倫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們在許多天的論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綱領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給了以馬克思为首的布魯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員會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員。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中央委員會組織了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擁護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國，他們堅信，由於德國落后、德國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覺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兩三百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難以對廣大人民群眾產生顯著的影響。鑒於这种情况，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必須參加民主運動的極左的、實際上是无產階級的側翼。他們加入了科倫的民主協會并介紹他們的擁護者參加民主派組織，以便在那里堅守革命无產階級的立場，批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性和動搖性，推動他們採取堅決的行動。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們的擁護者注意組織工人協會，对无產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為組織群眾性的无產階級政黨創造條件。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見注34）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領導中心。1848年年底，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試圖恢復中斷的聯繫，派約瑟夫·莫爾作為特派員去德國整頓同盟組織。倫敦中央委員會曾修改了1847年的盟章，削弱了這個文件的原則意義。譬如，不提推翻資產階級、確立无產階級的統治和建立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會共和國。1848到1849年的冬天莫爾在德國的使命並沒有完成。

1849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退出了民主協會。工人群眾已經有了政治經驗，他們对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大失所望，這一切使當時已經有可能在實踐中提出建立独立的无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計劃。不久德國西南部爆發了起義。这次起義的失敗成為德國革命的終結。

革命的進程表明，“共產黨宣言”中所闡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同盟是革命活動的一所很好的學校：它的成員堅決果斷地參加了各地的運動，他們在報刊、街垒和戰場上堅守着最革命的階級——无產階級的陣地。

革命的失敗沉重地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的許多盟員不是

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頓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組織也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倫敦。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經過改組的新中央委員會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組織已經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員會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闡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进行共产主义宣傳的新机关刊物“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出版。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数派坚决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險策略，它无视客观規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張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強調，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傳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旬，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終於导致了与該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會議（見本卷第635—641頁）根据馬克思的建議，把中央委員會的职权移交給科倫支部委員會。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倫敦中央委員會多数派的決定。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倫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頁）。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經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
——第450頁。

285 根据1852年11月12日科倫陪審法庭的判決，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員亨·毕尔格尔斯、彼·諾特荣克和彼·勒澤尔三人被判处六年徒刑，海·貝克尔、卡·奧托和威·賴夫三人被判处五年徒刑，弗·列斯納被判处三年徒刑。罗·丹尼尔斯、約·克萊因、約·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四人被宣判无罪。罗·丹尼尔斯因在監獄中得了肺病，获釋后过了几年就死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萊里格拉特为躲避逮捕和审判而逃亡倫敦。——第456頁。

286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是馬克思痛斥普魯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的一个战斗性的小册子。1852年10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倫进行的时候，馬克思就已經着手写这一著作。虽然条件极其艰难——馬克思和他的家庭极端貧困，但馬克思仍然在12月初写完了这一著作。12月6日，手稿寄給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給了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阿·克路斯，以便在那里出版。1853年1月，小册子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3月間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二千册)被警察沒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頓的民主報“新英格兰报”上陸續发表，到1853年4月底，該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波士頓出版的小册子也沒有能够在德国流傳。这本书只是在1875年在德国再版以后才在那里得到流傳。这一版和1853年匿名出版的版本不同，它标上了作者的名字。馬克思給这一版写了一个專門的結束語；馬克思于1860年写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不加标题补充到这本书里面。1885年，这本书經過恩格斯的編輯出了第三版，恩格斯还写了一篇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前几版不同的是，恩格斯把1850年3月和6月写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第359—366頁)加进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第一个俄譯本是在1906年出版的。——第457頁。

287 馬克思指的是在1850年3月和6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第359—366頁)。从起訴书中可以看出，在諾特荣克被捕时落入警察

- 手里的,还有下面两个在审判时当作罪证的文件:1850年9月同盟分裂后在科倫的中央委员会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頁)和1850年12月1日科倫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宣言。——第461頁。
- 288 *Code pénal* 是1811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領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刑法典;在1815年萊茵省归并普魯士以后,它在該省和民法典同时有效。——第463頁。
- 289 宗得崩德原来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諸州的单独联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諷刺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独立的組織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活动使普魯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而且帮助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1852年的科倫案件。——第464頁。
- 290 見注201。——第464頁。
- 291 凡迪門島是欧洲人对塔斯馬尼亚島的最初的称呼,在1853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469頁。
- 292 指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1840年2月成立的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頁)。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在二十世紀,許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訪問过这个协会。——第470頁。
- 293 关于馬克思及其拥护者退出流亡者委员会一事,見注118。——第471頁。

- 294 关于金条彩票的事，見本卷第181—183頁。——第472頁。
- 295 見注284。——第479頁。
- 296 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它的附录以及“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1875年版的跋中，引用了补充的真实材料，揭露舍尔瓦尔是个密探和奸細。根据这些材料，舍尔瓦尔是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的間諜，同时也是法国的密探；他的越獄潜逃是在法国和普魯士警察当局的同意之下进行的。他1852年5月到达倫敦时被接受加入沙佩尔所领导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但是，由于他在所謂德法密謀（見注117）的案件中的奸細作用被人揭发，不久便被清除出协会。——第485頁。
- 297 指警官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阴謀”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該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轉載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們的履历史。——第486頁。
- 298 引自海涅的詩“我从殘暴的女神那里逃脫”。——第486頁。
- 299 見注150。——第487頁。
- 300 摩門教徒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員。該派的創始人約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謂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門經”。在这本充滿荒誕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門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經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489頁。
- 301 路德在一次“席間演說”中曾把世界比作騎不穩馬的醉熏熏的农夫。——第491頁。
- 302 馬扎斯是巴黎的監獄。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因所謂德法密謀案（見注117）而被監禁的人們所提供的口供。——第492頁。

- 303 指在馬克思支持下 1852 年 1 月在倫敦成立的工人协会,該协会的主席是汉諾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該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工人罗赫納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該协会的許多成員,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內,都受了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都归附于先前的組織了。——第 496 頁。
- 304 在馬克思的手稿中,保存下来一份馬克思亲笔写的、但不是他签字的寄給施梯伯的一封信草稿。信中对这个警探进行了尖銳的駁斥。看来,这封信是在寄給施梯伯之前由“新萊茵报”編輯部的某个人签字的,很可能是由威·沃尔弗签字的,因为他可能了解施梯伯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第 507 頁。
- 305 瑪丽花 是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在罪犯当中长大、但依然保持着高尚人格和心地純洁的姑娘;作者給她冠上了一个虽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仍然保持着夺目的白色花瓣的百合花花名。——第 515 頁。
- 306 恩格斯指“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 1875 年版和 1885 年版上所加的第一个补遺。在这个补遺里重刊了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但没有加标题。附录中指出,科倫案件发生后不久,弗略里便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处了几年苦役。——第 515 頁。
- 307 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 1875 年德文版的跋中指出,“紅色問答书”的作者原来并不是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維的人。后来查明,馬克思当时是弄錯了。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种种文件,特别是赫斯本人在 1850 年 7 月 21 日写給魏德迈的信件,都证明了“紅色問答书”还是出于赫斯之手。——第 525 頁。
- 308 見注 165。——第 529 頁。
- 309 这里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現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 年萊比錫版 (L.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 1842)。——第 533 頁。
- 310 席勒的短詩“天之驕子”(«Die Sonntagskinder»)中的一句的改寫。——第 533 頁。
- 31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书斋”)。——第 534 頁。
- 312 暗示普魯士 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城下遭到的失敗;由于这次失敗,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国屈膝投降,这证明霍亨索倫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 536 頁。
- 313 指谷物法的廢除(見注 247)。——第 537 頁。
- 314 馬克思把貝雷斯福德諷喻为希腊神話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英雄阿基里斯。——第 547 頁。
- 315 据宗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絕对的正义将在大地上确立。——第 553 頁。
- 316 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間建立了名为“誠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到 1834 年 4 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簽訂所謂四国同盟时才完成了正式的条約手續。但是,在簽訂这个条約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經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后来使英法之間的关系尖銳化。这个条約在形式上是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軍事援助以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加强自己在这两国中的地位。——第 555 頁。
- 317 梅费尔是倫敦的一个区,許多英国貴族的私邸都在这里。——第 556 頁。
- 318 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它是在 1848 年由“曼彻斯特时报”和“曼彻斯特观察家”两报合并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支持自由貿易派;該报曾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到 1894 年。——第 556 頁。

- 319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爱尔兰日报,于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第557頁。
- 320 皮由茲教派是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以它的創始人之一皮由茲的名字得名。皮由茲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內恢复天主教仪式及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茲教派是英国貴族反对工业資產階級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当时英国貴族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抵制大部分属于各个新教教派的工业資產階級。——第558頁。
- 321 后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批判了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論。——第558頁。
- 322 指罗素“烏得勒支和約以来欧洲事务札記”1824—1829年倫敦版第1—2卷(《*Memoirs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Vol. 1—2, London, 1824—1829)一书和他的1822年出版的悲劇“唐·卡洛斯”。——第559頁。
- 323 “腐朽的市鎮”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紀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鎮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鎮和乡村,从中世紀时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議會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鎮”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貴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鎮”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559頁。
- 324 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是1850年8月由一些爱尔兰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創立的。同盟的目的是廢除阻碍爱尔兰資本主义发展的、对爱尔兰农民的半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的剝削方式。尽管这个同盟的领导过于温和,但它还是反映了为反对大地主和土地投机者而斗争的爱尔兰租佃者的利益。同盟的綱領归結起来就是要求禁止大地主任意廢除佃約,在停止租佃时赔偿租佃者在改良土壤方面的开支、确定公平合理的租金,确认租佃者有通过自由买卖轉让租佃的权利。在1852年的議會大选期間,同盟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同盟的要求得到了爱尔兰广大租佃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包括在內)的拥护。在1853年1月的改

- 选中,同盟宣傳反对那些奉行妥协政策而成为政府成員的爱尔兰議員。害怕国内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漲的爱尔兰大地主同天主教和新教的高級僧侶联合起来对付同盟。不久同盟就解散了。——第 560 頁。
- 325** 明辛街——倫敦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 562 頁。
- 326** 本文中引用的关于薩特倫德家族剝夺农村居民土地的材料,以后被馬克思运用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第 569 頁。
- 327** 奧倫治派协会是大地主和新教僧侶为对付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于 1795 年建立的反动恐怖組織。这个組織經常指使新教徒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徒。它在新教徒居住的北爱尔兰势力最大。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进行宣傳时期(見注 324),在爱尔兰,違背着大地主和天主教及新教的高級僧侶的意志,建立了奧倫治派新教僧侶和天主教徒的一般联合組織。——第 569 頁。
- 328** 見注 246。——第 569 頁。
- 329** 古迪布腊斯 是英国詩人巴特勒的同名諷刺长詩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談論和爭辯,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論断证明最荒謬的論点。巴特勒的长詩写于 1663—1678 年,它的用意是揭露英国資產階級的虛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第 569 頁。
- 330** 指 1688 年的政变(見注 251)。这次政变驅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二世,宣布尼德兰总督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第 571 頁。
- 331** 約·斯图亚特“政治經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 1767 年倫敦版第 1 卷第 104 頁(J.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wo volumes. Vol. I, London, 1767, p. 104)。——第 573 頁。
- 332** 約·洛克“关于斯泰福和塞洛普省斯泰福侯爵夫人領地和薩特倫德領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 1820 年倫敦版 (J. Loch. «An Account of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Estates of the Marquess of Stafford, in the Counties of Stafford and Salop and on the

- Estate of Sutherland». London, 1820)。——第 573 頁。
- 333** 馬克思引自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論”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230—231、237頁(J.-C.-L. Simonde de Sismondi.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I, Paris 1837, pp. 230—231, 237)。——第 574 頁。
- 334** 約·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顛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論”1759年倫敦版(J. Dalrymple. «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759)。——第 575 頁。
- 335** 罗·薩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倫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第27頁(R. Somers. «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 or, the Famine of 1847». London—Edinburgh—Glasgow, 1848, p. 27)。——第 576 頁。
- 336** 本文是馬克思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論文(見注 244)。——第 577 頁。
- 337**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1821)。——第 579 頁。
- 338** 阿·凱特勒“論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經驗”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 Quetelet.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I—II, Paris, 1835),馬克思曾引用的是本书的英譯本(1842年爱丁堡版)。——第 579 頁。
- 339** 理·科布頓“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R. Cobden.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Manchester, 1853)。——第 580 頁。
- 340** 指在薩托里閱兵的路易·波拿巴(見本卷第 176 頁)。——第 581 頁。
- 341** 指 1853 年 1 月底和平协会(見注 104)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

- 会。自由貿易派在大会上表現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傳和反对扩充軍备的決議；然而这些決議沒有起什么实际作用。——第 582 頁。
- 342 見注 255。——第 582 頁。
- 343 暗指阿伯丁联合政府成員的老迈的年齡。瑪土撒拉 是聖經故事中的大主教，傳說他活到九百六十九岁。成語“瑪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語。——第 583 頁。
- 344 阿姆洛·德·拉·烏賽“威尼斯政府的历史”1676年巴黎版第 48 頁 (Amelot de la Houssaie. «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de Venise». Paris, 1676, p. 48)。——第 586 頁。
- 345 馬克思在 1853 年 6 月写的“印度問題。——爱尔兰租佃权”一文中實現了他的这个意图。——第 587 頁。
- 346 指的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尔曼·克罗弗德 1835 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規定由于在土地上进行改良而廢除原来合同时給租佃者以賠償，1836 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来，該法案又會数次被重新提出討論(1847、1852 和 1856 年)，但是每一次都被下院否决。——第 587 頁。
- 347 合并取消派(来自 Repeal of Union, 即取消合并)，主張廢除 1801 年英国同爱尔兰的合并。英国政府在鎮压了 1798 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强加給爱尔兰的这个合并，彻底消灭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取消了爱尔兰議會。廢除这个合并的要求，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在爱尔兰成为最普遍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資产階級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把鼓吹廢除合并的宣傳运动仅仅看成是争取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資产階級作某些小的让步的手段。1835 年，奥康奈尔同英国輝格党达成了妥协，完全停止了 this 宣傳运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并力图把它引上同英国統治階級妥协的道路。——第 589 頁。
- 348 見注 59。——第 583 頁。

- 349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594 頁。
- 350 見注 255。——第 596 頁。
- 351 見注 250。——第 596 頁。
- 352 指保护农业和不列颠工业协会,該会最初的名称是保护农业协会。它是在 1845 年为同自由貿易派作斗争而建立的。該协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对廢除谷物法(見注 247)。——第 598 頁。
- 353 克罗地亚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装备輕武器的军队,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第 600 頁。
- 354 根据英国議会的傳統,上院議長(Lord-Councilor)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墊,它曾經是英国国民財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 603 頁。
- 355 規章法是英国的以議會法令——規章为根据的法律規范的总称。——第 604 頁。
- 356 指英国和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中的两次大会战。1358 年在普瓦提埃和 1415 年在阿津庫尔,英国步兵打败了法国騎兵。——第 604 頁。
- 357 1839 年土耳其和埃及因叙利亞問題又起冲突(叙利亞 1833 年被埃及军队强占)。法国对埃及帕沙(总督)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使这个时期英法在近东的关系恶化。英国为了竭力不让法国的影响在这个位于通向它的亚洲殖民地的要冲的重要地区得到加强,給土耳其以軍事援助来反对埃及,并且在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法国放棄对埃及的援助。
- 1844 年由于英国代办 3 月間被从塔希提島驅逐(塔希提島在此不久以前被宣布为法国保护国),英法关系又告紧张。塔希提島事件是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竞争加剧的結果。——第 605 頁。
- 358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于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它是由于路

易·波拿巴要求瑞士把法国的共和党人流亡者驅逐出瑞士国境而引起的。

在1845—1849年期間，英国和法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让英法商船通过。由于沿海遭到英法海軍的长期封鎖，阿根廷最后被迫让步，于1852年簽訂了开放上述河流让外国船只通行的条約。

紐沙特尔(諾恩堡的德国叫法)是瑞士的一个州，同时又隶属于普魯士。由于1848年的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結果，紐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魯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列强(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干涉阻止了普魯士采取武力。一直到1857年普魯士才最后放棄对紐沙特尔的要求。

1852年，英国和法国由于害怕美国强占隶属于西班牙的島屿古巴，建議同美国政府簽訂关于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由于美国的拒絕，协定沒有簽訂。

1851年土耳其借口向埃及推行坦吉馬特政策(坦吉馬特政策是1839年起在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改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来巩固君主政体)，要求埃及統治者实行一系列“改革”，实行这些“改革”就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归属于土耳其。由于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埃及被迫部分地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

1852年11月，英国、法国、俄国、巴伐利亚和希腊在倫敦簽訂了一个議定书，根据这个議定书，指定沒有子女的希腊国王奥托的弟弟巴伐利亚的阿德尔貝特代替巴伐利亚王室的另一个拒絕接受正教的亲王为王位的继承人。

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和法国一直阻碍突尼斯的独立，干涉它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土耳其統治突尼斯的野心。——第607頁。

359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糾紛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話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禍害的盒子，把这些禍害散布出来。——第608頁。

360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本文的标题作了修改。“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使用了一个与内容不符的标题：“議會辯論。

- 反对社会主义的僧侣。——“餓死”。——第 609 頁。
- 361 見注 256。——第 609 頁。
- 362 非国教徒 (*dissident*)，見注 256。——第 614 頁。
- 363 在“人民报”上，本文中題名为“强迫移民”的部分是单独作为一篇发表的；其余四部分則用“美国报刊和欧洲的运动”这个总标题发表。——第 616 頁。
- 364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稅的原理”(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一版于 1817 年在倫敦出版。——第 617 頁。
- 365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論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 年巴黎版第 1—2 卷 (J.-C.-L.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s I—II, Paris, 1819)。——第 617 頁。
- 366 指柏拉图的对话集“理想国”，其中描写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理想国家；柏拉图认为，应该把詩人从这个国家中驅逐出去，因为他们一点用处也沒有。——第 619 頁。
- 367 馬克思所提到的这篇文章沒有登載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我們也沒有得到該文的手稿。——第 621 頁。
- 368 指貝·瑟美列“路德維希·鮑蒂揚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維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 年汉堡版 (B. Szemere.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第 621 頁。
- 369 指 1770 年普魯士的亨利希在訪問彼得堡时所作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建議。——第 622 頁。
- 370 見注 6。——第 622 頁。
- 371 見注 341。——第 622 頁。

- 372 指1851年12月到1852年11月間英国記者理查茲用笔名“一个英国人”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第623頁。
- 373 本文的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624頁。
- 374 馬克思所引的事实大約在馬克思提到的1853年3月1日写的那篇文章中引用过,这篇文章我們沒有找到(見注367)。——第624頁。
- 375 見注4。——第627頁。
- 376 1848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議會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4月10日宪章派的游行示威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驅逐出英国。該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628頁。
- 377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首歌。——第628頁。
- 378 印刷所广场是倫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設在該处。——第630頁。
- 379 “文艺論壇”(《Athenaeum》)是英国的一家文艺評論周刊“文艺論壇,文学、科学和艺术問題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的簡称,1828—1921年在倫敦出版。
“建筑师”(《The Builder》)是英国一家建筑学問題周刊,1842年起在倫敦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一家具有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年起在倫敦出版。
“賽馬新聞”(《Racing Times》)是英国一家运动周刊,1851年起在倫敦出版。——第630頁。
- 380 希腊正教会和羅馬教会之間由于爭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引起了糾紛,这个老糾紛在1850年又因路易·波拿巴的发动而重新燃起,后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法国在近东的障地。关于圣地的糾紛发展成了外交上的大冲突,成了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630頁。
- 381 在这次发表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會議的記

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見本卷第465—466頁)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1850年12月1日科倫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會議通过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15頁)。这个記錄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評論”1956年第1卷第2部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ume I, part 2, 1956)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說道,这个記錄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与恩格斯写的記錄底稿有出入的地方在脚注中注明。

但是,經過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給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們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會議記錄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科倫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決議的海·威·豪普特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誰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記錄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記錄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間的重要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635頁。

- 382** 指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見注292)。——第635頁。
- 383**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見注118)。——第636頁。
- 334**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頁)是1847年12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848年下半年,同盟倫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作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性。在新盟章的第一段,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来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統治和建立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1850年12月,科倫中央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頁)。——第636頁。

- 385** 指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頁和第4卷第461—504頁）。——第636頁。
- 386** 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中的一派，它代表以賴德律-洛兰为首的結合在“改革报”周圍的一群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們参加了这个党。——第638頁。
- 387** 指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1848年2—5月間的法国資產階級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勃朗为首政府工人問題委员会的活动沒有任何实际結果，同时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第639頁。
- 388** 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領導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組織被消灭。——第639頁。
- 389** 本篇和下一篇文章包括馬克思以科倫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馬克思把呼吁书寄給阿道夫·克路斯在德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发表。馬克思在1852年12月7日給克路斯的信中指出，援助行动应当成为党的团结一致的表现。并建議在美国各地成立科倫被判罪者及其家屬救济委员会。——第642頁。
- 390**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是德国民主流亡者在美国的組織之一。該联合会于1850年10月5日在費拉得尔菲亚德国体操协会代表大会上成立。联合会联合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数十个协会；在其成立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保持联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員魏德迈曾为該联合会的机关报“体操报”（«Turnzeitung», 1851—1861年出版）撰稿。在美国內战年代里，該联合会积极参加了反对奴隶主各州的斗争。1865年这个組織改称为北美体操联合会。——第645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1年8月—1853年3月)

1 8 5 1

8月—11月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在倫敦的馬克思和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竭尽全力保护未来无产階級組織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鍛炼和教育无产階級革命干部。

馬克思认为探討經濟学說对于用經濟发展規律的知識武装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他繼續从事政治經濟学的研究。他整天都在英国博物館圖書館里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殖民問題、人口問題、信貸問題、銀行体系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他从薩默斯、劳頓、威克菲尔德、普萊斯科特、霍吉斯金、凱特勒、唐森、馬尔薩斯、休謨、格雷、达布耳德、威·巴·艾利生、阿·艾利生、哈德卡斯耳、普萊斯、孚赫、麦克庫洛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許多摘录，并作了評注。同时，馬克思还研究农艺学和农业化学問題，为此他閱讀了李比希和約翰斯頓的著作。

考虑到軍事知識对无产階級政党領導未来的革命战争的巨大意义，恩格斯繼續研究軍事史和軍事理論。

8月上半月

馬克思讀了比·約·蒲魯东的新著“十九世紀革命总論”，认为这是一本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論战性的著作。他打算在报刊上对这本书加以批判。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詳細地轉叙了蒲魯东这部著作的內容，

并請恩格斯对这本书发表自己的意見。

8月2日前后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他在曼彻斯特經常受到警察的監視，他請馬克思把党的文件放在安全的地方。

8月8日前后

馬克思收到資產階級进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理·德納邀請他为該報撰稿的建議。馬克思欣然接受了德納的建議，他想利用給这个報紙写稿的机会影响社会輿論，从工人階級立場上闡明一些最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稿共有十年以上。馬克思是該報的正式撰稿人，但是，因为馬克思忙于經濟學說的研究工作，所以大部分的文章是馬克思請恩格斯执笔的。

8月8日和14日

馬克思請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一組关于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

8月下半月—10月

恩格斯讀了比·約·蒲魯东的著作“十九世紀革命总論”，并写了一篇評論，揭露蒲魯东的改良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观点。恩格斯把这篇文章的手稿寄給馬克思。馬克思决定把它作为他准备写的一部反对蒲魯东的著作的基础。

8月18日以后

馬克思收到了在科倫的一个通訊人貝尔姆巴赫的来信，信中报告了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案件的审讯的情况。

**1851年8月21日—
1852年9月24日**

恩格斯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这些文章由馬克思署名連續发表在1851年10月25日至1852年10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这些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1848—1849年德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

8月底

馬克思收到琼斯的信，琼斯在信中告訴馬克思說，在他主編的宪章派杂志“寄語人民”第16期上轉載了馬克

思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論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为該杂志撰稿，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杂志的总的編輯工作方面协助他。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宪章派的刊物給英国无产阶级以思想影响，并支持琼斯和他的拥护者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他們贊同琼斯反对哈尼的言論，后者在宪章运动处于低潮时受了小資产階級分子的影响，脫离了无产階級的立場。

9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成員在巴黎被捕的消息和所謂的德法密謀案开始审讯的消息。

9月11日

馬克思在給魏德迈的信中批評了意大利資产階級革命家馬志尼的政綱和策略，指出馬志尼不了解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解决土地問題对于胜利地进行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

9月23日和2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讀了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泰霍夫的宣言“未来战争概論”之后，在通信中对这个宣言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

9月底—10月

馬克思为了研究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影响問題，閱讀有关技术史方面的著作，从波佩、貝克曼和尤尔的著作中作了許多札記。

10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資产階級流亡者引誘工人階級脫离革命运动的真正任务的企图，他們密切注視金克爾的活动，因为金克爾企图在美国进行“德美革命貸款”的冒險主义活动。馬克思給在華盛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阿·克路斯許多关于同金克爾作斗争的指示。

**1851年10月—
1852年**

恩格斯繼續研究俄語和其他斯拉夫語，并且研究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他閱讀了包林的“俄罗斯詩

文集”，并从这本书中作了許多关于罗蒙諾索夫、捷尔沙文、苏馬罗科夫、波格丹諾維奇、赫拉斯科夫、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的俄国作家的札記。恩格斯从原文閱讀了一些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銅騎士”，格利波也多夫的“聰明誤”，并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中的几节譯成了散文。

10月2日以后

馬克思收到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家勒文塔尔已最后拒絕出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著作。馬克思想在德国出版自己著作的其他嘗試也都没有成功。

10月4日

1851年9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就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被捕一事对馬克思进行誹謗的报道。为此，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刊登在10月9日的“科倫日报”上，10月18日的“总汇报”摘要发表了这篇声明。

10月16日

馬克思請迁居到美国的魏德迈想法把刊登在1850年宪章派杂志“紅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上的“共产党宣言”英譯文以单行本在美国出版。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未能实现。

10月31日

馬克思建議魏德迈把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維尔特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編成一套袖珍丛书在美国出版。馬克思并且打算以后把一些評論当前問題的小册子也收入这套丛书。出版丛书的事未能实现。

**11月5日—15日
前后**

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11月下半月

馬克思讀了蒲魯东的“无息貸款”一书，并給以否定的尖銳批評。

- 11月24日和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发表馬克思关于政治經濟学的著作的計劃問題交換意見。
- 12月1日** 为了組織一个抗議运动，反对普魯士警察当局在科倫一手捏造的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审讯，并迫使报刊对科倫被告案件表示意見，馬克思写信反对普魯士当局，并将这些信寄到巴黎，以便在法国报纸上发表。同时他还請威·沃尔弗給美国和瑞士写同样的信，并請恩格斯給英国写信。但是在报刊上組織抗議运动一事未能成功。
- 馬克思同反对倫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德国工人施泰翰、居姆佩尔等人建立了联系。
- 12月1日以后** 馬克思从弗萊里格拉特那儿得知，拉薩尔为了出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著作計劃在德国創辦一个股份公司，馬克思不同意这个建議。
- 12月3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深刻地分析了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这封信里的一些思想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得到发展。
- 1851年12月9日前后—1852年1月初** 馬克思收到海涅的秘书萊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許多关于12月2日政变前后法国的政治局勢的詳細报告。馬克思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时利用了信中提供的許多材料。
- 12月下半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魏德迈的信中得知他准备在紐約出版“革命”周刊(《Die Revolution》)以及这个周刊的綱領。魏德迈請馬克思和恩格斯为該杂志寄稿，并告訴他們，他准备在該杂志上轉載他們和他們的战友过去的文章。

- 12月16日 恩格斯建議馬克思為“革命”雜誌寫一篇關於法國12月2日政變的文章。
- 12月19日前後 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威·沃尔弗、斐·沃尔弗、維爾特、弗萊里格拉特、埃卡留斯商談為“革命”雜誌寫文章的事。
- 1851年12月19日前後—1852年3月25日前後 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深刻地總結了1848—1849年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在發展自己的革命學說方面做了新的貢獻。馬克思發展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第一次表述了工人階級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重要原理。
- 1851年12月20日前後—1852年1月3日前後 恩格斯居住在倫敦馬克思處。
- 12月27日 馬克思請弗萊里格拉特為“革命”雜誌寫一篇新年獻詩。

1852

- 1852年1月—1853年3月 恩格斯研究軍事藝術史，他特別注意1848—1849年革命時期的各次戰爭，尤其是匈牙利的和意大利的戰爭，他打算撰寫這些戰爭的歷史。他讀了克勞塞維茨、若米尼、維利森、霍夫施泰特爾、金策耳、戈爾蓋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著作。
- 1月1日 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第一章寄給魏德邁發表。
- 1月2日—24日 馬克思患重病，他很吃力地繼續寫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1月6日 “革命”雜誌第一期在紐約出版。這一期轉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的“國

际述評(三)”的一部分,同时,預告即将发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約·蒲魯奈的‘十九世紀革命总論’”,后一著作因“革命”杂志在第2期后停刊,馬克思未写成。

1月9日

燕妮·馬克思在給魏德迈的信中轉述了馬克思的請求,馬克思希望在“革命”杂志上說明科倫被告案件的真相,因为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在英国的刊物在金克尔的指使下,有意对这个問題保持沉默。

1月中旬

在馬克思的支持下,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工人,在倫敦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德国工人协会,由施泰翰担任主席。

1月15日

馬克思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区部會議,会上宣讀了从科倫寄来的关于延期审訊科倫被告案件的信。

1月23日

恩格斯为“革命”杂志写了一篇論英国的文章,文中闡述了他对大陆各国軍队侵入不列顛群島的可能性問題的研究成果。由于杂志停刊,这篇文章沒有发表。

1月28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要求,写信給“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編輯部,揭露普魯士政府对待科倫被告的橫暴行为。其中一封寄給了馬克思。1月29日馬克思将这封信寄給“泰晤士报”編輯部,署名“普魯士人”。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报刊上发表关于科倫被告的境况的材料的嘗試未能成功。

1月30日

馬克思詢問魏德迈能不能在美国出版他的政治經济学著作。

2月

馬克思在經濟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不得不把衣服送进当鋪,因此他不能到图书馆去。由于每夜辛苦地从事写作,馬克思的眼睛开始疼痛。

- 2月—4月初** 恩格斯写作“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文章发表在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的“寄語人民”上。
- 2月4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他打算吸收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革命”杂志撰稿。
- 2月中旬** 恩格斯在“欧門—恩格斯”公司办事处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在百忙中勉强抽时间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和“寄語人民”写稿。
- 2月18日** 馬克思寄給恩格斯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的补充材料，并建議他严厉批評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左派。
- 2月19日前后** 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区部的定期會議將威·希尔施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他是普魯士警察局的好細。根据这种情况，會議通过了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每周會議的地点和日期的決議。
- 2月20日** 馬克思知道“革命”杂志被禁止出版之后，請魏德迈設法在美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单行本。
- 2月24日** 馬克思接到参加庆祝1848年二月革命四周年的宴会的邀請，这次宴会是由倫敦法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領袖們发起举行的。馬克思沒有出席这次宴会。
- 2月27日** 恩格斯經常注意英国經濟的发展和英国的政治事件。他在給魏德迈的信中分析了这个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状况，并答应以这个題目写一篇論文寄給他。但是，恩格斯的願望未能实现，因为没有地方发表这篇論文。
- 3月3日** 馬克思写給“科倫日报”一篇声明，駁斥了这家报纸关

于他和所謂德法密謀案件的被告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員阿·迈尔有联系的断言。声明发表在3月6日“科倫日报”上。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請他注意，他們的书信遭到警察的秘密檢查。

3月5日

馬克思在給魏德迈的信中表述了他在对于階級和階級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方面所作的一些完全新的結論。这些結論就是：“(1) 階級的存在 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 相联系的；(2) 階級斗争必然要引导到 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向 消灭任何階級 和向 沒有階級的社会 的过渡。”

3月下半月

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关于在美国的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活动情况的报告。

3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說，他希望关闭“欧門—恩格斯”公司到利物浦去。在那里他将少管一些父亲的商业事务，而能够更多地从事科学工作和党的活动。他在信中还談到他研究俄語語法和詞汇的成績。

3月24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区部的定期會議上，馬克思报告了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的活动，特别是他們反对海因岑、金克尔的活动。會議贊同克路斯和魏德迈的活动。

3月25日

馬克思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寄給魏德迈。

馬克思通知魏德迈說，琼斯打算出版一份新的宪章派的报纸，为此，他正在宪章派工人中間募集經費。

4月13日前后

在倫敦馬克思处住了几天之后，恩格斯从倫敦回到曼彻斯特。

4月14日

馬克思的小女儿馬克思·弗兰契斯卡病死。他不得不

向邻居——一个法国流亡者借錢埋葬女儿。

4月16日

馬克思接到魏德迈来信說，由于缺乏必要的錢，在美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单行本一事，不得不推迟。

4月24日前后

馬克思从魏德迈給他的信中得知，由于一个德国工人流亡者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四十美元，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在美国出版。

4月30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計劃和恩格斯共同写几篇描繪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活动家們的“政治面貌”的文章。馬克思写道，瑟美列和佩尔采尔的熟人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奔走。（后来发现班迪亚是警察局的密探）馬克思請恩格斯把流亡者活动家們引用他給恩格斯的信和其他材料所作的評述的綜合評論寄給他，并請恩格斯写一些关于維利希的評述。

5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收集关于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活动家們的小册子的材料。馬克思和恩格斯請德朗克、威·沃尔弗、克路斯、弗萊里格拉特、魏德迈等人寄給他們有关这些活动家当中的一些人的傳記材料，并着手写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5月4日前后

馬克思接到德納来信，請他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一些关于英国目前状况的論文。

5月19日前后

“革命”杂志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复刊，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該杂志的一期在紐約出版。

5月21日

恩格斯在“歐門—恩格斯”公司工作的物质待遇在該公司的股東們簽訂的合同中明文規定下来，因此恩格斯就有可能更多地帮助馬克思的家庭。

5月底—6月下半月

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們共同写作“流

- 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 6月18日** 馬克思委托妻子把一些材料轉交給琼斯，以便在1852年5月开始出版的新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馬克思在总的編輯工作方面，特別是在国外通訊专栏方面給了琼斯許多帮助，并且还协助他管理該报的財務。后来，馬克思一直繼續帮助了这个宪章派机关报。由于馬克思的帮助，該报的訂戶数目增加，报纸得到了巩固。
- 6月25日—28日
前后** 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以后，就向他的妻子和德朗克口授“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然后把一份交給班迪亚，另一份自己保存。
- 6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魏德迈来信說，他在紐約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魏德迈請求按期寄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便使支部的成員能够及时閱讀。
- 7月—8月** 馬克思恢复他在英国博物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他研究了世界通史、国家机构史、艺术史、各个不同时代的妇女的状况等方面的大量著作。馬克思从馬基雅弗利、休里曼、瓦克斯穆特、西斯蒙第、艾希霍恩、布特維尔克、荣克、賽居尔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摘要。
- 7月初—8月** 恩格斯研究匈牙利軍事家戈尔盖的著作“我在1848—1849年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在书的空白处作了批注。同时还研究了有关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的其他著作。
- 8月—10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留心观察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之間圍繞金克尔通过“德美革命貸款”募集来的款項而进行的斗争。
- 8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还要推延三个月。

- 8月2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馬克思把該文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于8月6日和10日寄往紐約，題目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輝格党”和“宪章派”。这两篇文章发表在8月21日和2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8月12日—22日** 恩格斯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的第十七篇，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根据各次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經驗，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原理。
- 8月中—9月** 馬克思詢問拉薩尔、艾布納尔、施特列特、璫特是否有可能在德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德国出版此书的一切尝试都未成功。
- 8月16日前后** 馬克思著文揭露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实质。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馬克思把該文分作两个单篇于8月20日和27日寄往紐約，題目是：“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結果”。这两篇文章发表在9月4日和11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8月19日前后** 为了帮助恩格斯研究軍事問題，馬克思在英国博物館圖書館里翻閱了許多有关軍事問題的书籍，并写了一个資料目录寄給恩格斯。
- 8月19日** 馬克思收到貝尔姆巴赫的信，信中告訴馬克思关于科倫被告的境况，信中还說，科倫正在向各方面的人物进行查問，目的就是寻找馬克思的信件。
- 馬克思向萊比錫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建議，为他的出版物“时代”写一篇“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現代政治經濟文献”的評論。布罗克豪斯拒絕了馬克思的建議。
- 9月初** 馬克思經濟极端困难，他没有錢为生病的妻子、女儿燕

- 妮和女僕海倫·德穆特請醫買藥。有一個星期，馬克思全家只能吃到麵包和馬鈴薯。
- 9月2日以后—21日
前后** 馬克思希望用英文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請求，校案由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皮佩爾翻譯的第一章。
- 9月28日** 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馬志尼和科蘇特的活動。——同路易-拿破侖的聯盟。——帕麥斯頓”一文，目的是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領袖們防止民族運動被波拿巴集團所利用的危險。該文發表在10月1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10月—11月12日**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朋友們關心地注視着由普魯士政府一手製造的、10月4日在科倫開始的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著名活動家的審訊。他們竭盡全力幫助被告們的律師在法庭上證明起訴的虛偽，他們用各種方法把揭露普魯士警察當局的陰謀的文件和材料寄往科倫。
- 10月2日—23日** 憲章派報紙“人民報”轉載了馬克思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組文章：“英國的選舉。——托利黨和輝格黨”、“憲章派”、“選舉中的舞弊”和“選舉的結果”。這一組文章以“大不列顛的大選”作為總標題。
- 10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流亡中的大人物”這本小冊子的遲遲沒有出版感到不安，他們請求維爾特、德朗克等人調查一下班迪亞和出版商們的人品，據班迪亞說，他們表示願意出版這本小冊子。
- 10月12日** 馬克思寫了一篇關於英國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文章。這篇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馬克思把文章分作兩個單篇於10月15日和19日寄往紐約，題目是：“貧困和貿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業繁榮的政

- 治后果”。文章发表在11月1日和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0月16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馬克思把这篇文章分作两个单篇于11月2日和9日寄往紐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1月2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題目是:“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11月25日該报,发表时沒有标题。
- 10月20日前后** 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由魏德迈在紐約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百三十本。
- 10月23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組文章的第十九篇。恩格斯答应写的最后一篇——第二十篇沒有見报。
- 10月25日** 馬克思約請恩格斯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共同写一篇“告公众书”,以揭露普魯士政府的勾当。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他在倫敦受到警察的監視。
- 10月26日以后** 馬克思从維尔特那里获得出版商敦克尔从柏林发来的消息說,班迪亚所說的那个所謂預定出版“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商根本不存在。
- 10月28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揭露“泰晤士报”和“每日新聞”对科倫的被告和他們在倫敦的朋友們所作的誹謗和攻击。这篇由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馬克思、威·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10月28日的“旁观者”和10月30日的“人民报”、“晨报”、“观察家”和“先驅”上。
- 10月底—12月初** 馬克思写了“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
- 11月12日以后** 馬克思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陪审法庭对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判决:七人被判决三年到六年有期徒刑,只有

四人被无罪开釋。

11月16日

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回答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刊物就馬克思的“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侖的联盟。——帕麦斯頓”一文进行的誣蔑宣傳。該报12月1日刊登了这个声明。

11月17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区部會議上,馬克思提議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的情况下,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馬克思的提議被通过。

11月2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寄給“晨报”編輯部“关于最近的科倫案件的最后声明”。这篇由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馬克思和威·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11月29日的“晨报”上。

11月29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要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該文由馬克思署名,发表在12月2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1月底—12月

普魯士警察局的首脑得悉馬克思准备出版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策划者的小册子之后,发布命令說,小册子一出現就立即沒收。同时,还向其他国家的警察局特别是比利时警察局提出同样的要求。

12月3日

馬克思严厉要求班迪亚回答“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长期拖延出版的原因,并要求他对于他所說的那些出版商根本不存在一事作出解釋。

12月6日和7日

馬克思为了出版“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将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給在瑞士的沙貝利茨和在美國的克路斯。

12月7日

馬克思寄給在美國的克路斯一份关于救济科倫被判罪

者和他們的家屬的呼吁书，并提議組織救濟委員會。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內西、弗萊里格拉特、德朗克、威·沃尔弗、斐·沃尔弗、琼斯、約·格·埃卡留斯、罗赫納、普芬德、皮佩尔等人。呼吁书发表在1853年1月的“加利福尼亚国家报”和“紐約刑法报”上。

馬克思在給克路斯的信中，批評了比·約·蒲魯东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

12月10日前后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議會。——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預算案”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馬克思揭露了英国稅收制度的階級实质。該文由皮佩尔譯成英文，发表于12月2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2月14日前后

馬克思接到出版家沙貝利茨的通知說，“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已开始在巴塞尔印刷。

1852年12月17日和
1853年1月11日

馬克思写“內閣的失敗”和“衰老的政府。——联合內閣的前途及其他”一文，論述得比一迪斯累里的托利党內閣和代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內閣的反动政策。該文发表在1月7日和2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1852年12月下半月
—1853年1月10日

恩格斯居住在倫敦馬克思处。

12月27日以后

馬克思得知班迪亚和普魯士警察局有联系，他大概已把“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交給普魯士警察当局。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一有机会馬上在报刊上揭露班迪亚。

1853

1月—3月

馬克思研究貨幣理論和政治經濟学的其他一些問題，

同时还研究文化史和斯拉夫人历史。他从加利阿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中作了許多摘录。

馬克思和克路斯通信談在美国出版“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事。

1月下半月

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在巴塞尔出版。

1月21日

馬克思写“选举。——財政困难。——薩特倫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論述苏格兰高地大地主剝夺农民的問題。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发表在2月9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并摘要发表在3月12日的“人民报”上。

1月28日

馬克思第一次自己用英文写文章，題目是：“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銀行的措施”。这篇文章分析了資本主义社会中犯罪行为增多的社会原因。該文发表在2月1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2月11日和22日

馬克思写“意大利起义。——不列顛的政策”和“弗兰茨-約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顛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說。——拿破侖的遺囑”，这两篇文章发表在2月25日和3月8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2月12日

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琼斯邀請馬克思参加2月22日的宪章派公开群众大会。

3月4日

馬克思写“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馬志尼。——流亡者問題。——英国选举中的賄賂行为。——科布頓先生”一文。該文发表在3月22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并摘要发表在4月16日的“人民报”上。

3月7日—10日前后

馬克思患严重的肝炎。

3月9日

馬克思从沙貝利茨那里得知，运往德国的两千册“揭

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的一个靠边境的村子里被警察沒收了。

3月18日

馬克思写“科苏特和馬志尼。——普魯士政府的詭計。——奥地利和普魯士的通商条約。——‘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馬克思談到在瑞士出版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全部被警察沒收和銷毀。該文发表在4月4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3月25日

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分节在波士頓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馬克思建議他想办法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4月24日前后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卫(David 公元前九世紀末—十世紀上半叶)——根据聖經傳說,是古代以色列的国王。——第 158 頁。

四 画

日罗,沙尔·約瑟夫·巴特米(Giraud, Charles-Joseph-Barthelemy 1802—1881)——法国法学家,保皇派,曾任教育部长(1851)。——第 206 頁。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續地担任“新聞报”編輯,在政治上毫无原則;1848 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期間是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曾任立法議會議員(1850—1851),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182、327 頁。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艾米尔·德·日拉丹之妻。——第 227 頁。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領袖。——第 102、121、122 頁。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从 1850 年起是

科倫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審法庭宣告无罪。——第 241、242、461、495—496、498、531 頁。

丹尼尔斯,阿馬利亚(Daniels, Amalie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 495、496、498、531 頁。

文克施特恩,奥托(Wenckstern, Otto)——德国記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泰晤士报”的撰稿人,是普魯士派遭到倫敦的間諜。——第 629 頁。

文克布莱希,卡尔·格奥尔格(Winkelblech, Karl Georg 1810—1865)——德国經濟学家,鼓吹反动的恢复行会理論,即所謂“联邦社会主义”。——第 287 頁。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奥地利元帅,1848 年指揮鎮压布拉格和維也納的起义,1848—1849 年率領奥地利軍隊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57、66、69、71、77、78、314 頁。

戈克,阿曼杜斯(Goegg, Amands 1820—1897)——德国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員,革命失敗后逃离德国;七十年代归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304、354、356—359、367—374、377 頁。

戈尔盖,阿尔都尔(Görgy, Arthur 1818—1916)——1848—1849 年匈牙利革

- 命的軍事活动家，匈牙利軍隊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軍官和資產階級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75、346、621頁。
- 戈德海姆（Goldheim）——普魯士警官，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警察局派在倫敦的密探之一。——第464、491、498—506、508—514頁。
- 比約，奧古斯特·阿道夫·瑪麗（Bil-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師，奥尔良派，制宪議會議員（1848—1849）；1849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內务大臣（1854—1858）。——第189頁。
- 比安卡（Bianca）——城市貴族代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陪審員。——第462頁。
- 比恩包姆，威廉（Birnbaum, Wilhelm）——科倫济貧所的秘书，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497、499頁。
-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 Jean 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資產階級領導者之一。——第123頁。
- 巴罗，奧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領；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領導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內閣。——第141—143、147、161—163、172、186、189、196、205頁。
- 巴茲，让·狄德埃（Baze, Jean-Didier 1800—1881）——法国律師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奥尔良派。——第195、209頁。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羅維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民主主义者，政論家，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第一国际里为馬克思主义之死敌；由于分裂活动于1872年在海牙會議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108頁。
-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 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秩序党的代表人物；1849年为上訴法院的檢察长；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閣。——第168、180、181、185、186、190頁。
- 巴特勒，賽米尔（Butler, Samuel 1612—1680）——英国諷刺詩人，“古迪布腊斯”一詩的作者。——第702頁。
-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將軍，从1854年起是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1851年統率巴黎卫戍部队；波拿巴主义者。——第184、185、197頁。
- 巴里特，艾利修（Burritt, Elihu 1810—1879）——美国語言学家，資產階級慈善家和和平主义者，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組織者。——第327頁。
- 巴尔扎克，奧諾萊·德（Balzac, Honore'de 1799—1850）——偉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27頁。
- 巴塞爾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溫和的

- 自由派,巴登議會議員;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議會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83頁。
- 巴尔布尔,詹姆斯(Barbour, James 1831—1853)——罪犯,因在設菲尔德杀人被处死。——第577頁。
- 巴尔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議會議員,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无期徒刑,1854年被赦。——第340頁。
- 巴特爾米,艾曼紐尔(Barthélemy, Emmanuel 約 1820—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在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加入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判处死刑。——第341、342頁。
- 巴黎公爵——見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
- 巴巴罗薩——見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薩。
- 尤尔特,威廉(Ewart, William 1798—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自由貿易派,議會議員。——第396、407頁。
- 牛津伯爵,阿弗里德·哈里(Oxford, Alfred Harley 1809—1853)——英国貴族。——第586頁。
- 邓达斯,戴維(Dundas, David 1799—1877)——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檢察长。——第407頁。
- 扎克,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的教授。——第261頁。
- 孔斯坦,本扎曼(Constant, Benjamin 1767—1830)——法国自由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政論家和作家。——第122頁。
- 不倫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Braunschweig, 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1804—1873)——从1823年起为不倫瑞克公爵,1830年9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复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間的民主派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意志倫敦报”。——第305、322、348頁。
- 韦尔凱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論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15、25、77、303、325、330頁。

五 画

- 加瓦齐,亚历山得罗(Gavazzi, Alessandro 1809—1889)——意大利教士,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宣傳反对天主教教会和教皇世俗权力;后成为加里波第的战友。——第346頁。
- 加里波第,朱澤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1848年率領志願兵团站在皮蒙特軍隊方面英勇地与奧国作战;1849年4—6月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組織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爭取民

- 族解放和國內統一的鬥爭。——第334、340頁。
- 尼茨施, 卡尔·伊曼努尔(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1868)——德國新教神學家和傳教士, 曾在波恩和柏林擔任教授。——第261頁。
- 尼古拉, 弗里德里希(Nicolai, 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國作家, 出版家和書商; “開明專制制度”的擁護者。——第307、313頁。
- 司徒盧威, 古斯達夫(Struve, Gustaw 1805—1870)——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職業是記者; 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義和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領導者之一; 革命失敗後逃離德國; 在英國的德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袖之一; 曾站在北軍方面參加美國內戰。——第301—306、316、317、322—325、329、339、343—345、348、349、362頁。
- 司徒盧威, 阿馬利亞(Struve, Amalie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 是古斯達夫·司徒盧威的妻子。——第304、306、324、348頁。
- 皮爾, 羅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溫和派(皮爾派)的領袖; 曾任內務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 1841—1846), 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230、239、386、387、407、408、434、538、539、583、605頁。
- 皮爾, 羅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國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 皮爾派, 議會議員; 羅伯特·皮爾(1788—1850)的兒子。——第610頁。
- 皮恩, 托馬斯(Peene, Thomas)——倫敦醫生。——第614頁。
- 皮佩爾, 威廉(Pieper, Wilhelm 約生于1826年)——德國語言學家和記者,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流亡倫敦; 1850—1853年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第643、645頁。
- 瓦爾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蘭茨·利奧(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國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激進派, 職業是律師; 1848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副議長和左派領導人之一; 後為進步黨人。——第340頁。
- 瓦提梅尼爾, 安都昂·弗朗斯瓦·昂利(Vatimesnil, Antoine François Henri 1789—1860)——法國政治活動家, 正統主義者, 曾任教育大臣(1828—1830), 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第189頁。
- 漢利, 約瑟夫·沃訥(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曾任商業大臣(1852和1858—1859)。——第416、433頁。
- 漢普敦, 約翰(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出色的活動家, 代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利益。——第81頁。
- 漢澤曼, 大衛(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大資本家, 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 實施同反動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42、46、54、80、340頁。
- 盧格, 阿爾諾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國政論家, 青年黑格爾派, 資產階級激進派, 1848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五十年代是

-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01、306—316、321、325—329、337—340、343—350、352、356、358、362、367—369、372—374、376、377、464页。
- 卢普夫(Rumpf, E.)——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1年起流亡伦敦,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3、645页。
- 卢克莱修, 梯特·卡鲁斯(Lucretius, Titus Carus 约公元前99—55)——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 唯物主义者, 无神论者。——第596、597页。
- 卢施萨克(Ruscsak)——匈牙利裁缝, 民主主义者, 科苏特的战友。——第599页。
- 圣让·丹热利——见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 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
- 圣西门,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3页。
- 圣贝夫, 比埃尔·昂利(Sainte-Beuve, Pierre-Henri 1819—1855)——法国厂主和地主, 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秩序党的代表人物;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199页。
-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122页。
-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 Lerog de 1801—1854)——法国将军, 从1852年起是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陆军部长(1851—1854), 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144页。
- 圣蒲利斯特, 艾曼纽尔·路易·玛丽(Saint-Priest, Emmanuel-Louis-Marie 1789—1881)——子爵, 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正统主义者, 立法会议员(1849—1851)。——第194页。
- 圣日耳曼兹伯爵, 爱德华·格兰维尔·伊里奥特(Saint-Germans, Edward Granville Eliot 1798—1877)——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曾任爱尔兰总督(1841—1845和1852—1855)。——第434页。
- 布尔, 路德维希(Buhl, Ludwig 1814—80年代初)——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第354页。
- 布林德, 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15页。
- 布莱特, 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创立者之一; 自六十年代末起为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236、408、436、537、556、560、590—592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密谋活动的倡导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 1848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

- 翼的立場；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128、340—342 頁。
- 布赫尔, 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魯士官吏, 政論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左翼;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倫敦;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支持俾斯麦。——第 339、343、370 頁。
- 布洛利, 阿希尔·沙尔·萊昂·維克多(Brogie, Achille Charles Léonce Victor 1785—1870) ——公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內閣总理(1835—1836), 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 奥尔良派。——第 168、196 頁。
- 布列克, 弗里德里希(Bleek, Friedrich 1793—1859) ——德国新教神学家, 波恩大学神学教授。——第 261 頁。
- 布魯土斯(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約公元前 85—42) ——羅馬政治活动家, 是貴族共和国密謀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策划者之一。——第 122、374、512 頁。
- 布拉瑟頓, 約瑟夫(Brotherton, Joseph 1783—1857)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选举制改革的拥护者; 議會議員。——第 590 頁。
- 布倫坦諾, 罗倫茲(Brentano, Lorenz 1813—1891) ——巴登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領導巴登临时政府,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流亡瑞士, 后来流亡美国。——第 108、302、304、314、317、356、358、359、378 頁。
- 布拉梅尔(Brammel) ——英国教士。——第 613 頁。
- 布朗德尔·德·涅尔(Blondel de Neele) ——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的法国流浪詩人; 傳說他是英王獅心理查的宮廷詩人, 曾把被奥国俘虏的英王解救出来。——第 296 頁。
- 弗略里, 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 1824 年)(真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克勞澤) ——倫敦商人, 普魯士的間諜和警探。——第 447、452—455、476—480、487、499、500、502、503、509—517、527—529、531 頁。
- 弗兰克, 古斯塔夫(Franck, Gustav) ——奥地利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倫敦。——第 372 頁。
- 弗倫克尔(Fränkell) ——在倫敦的德国工人, 1847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1849—1850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員。——第 635 頁。
- 弗罗斯特, 約翰(Frost, John 1784—1877) ——英国小資產階級激进派, 1838 年傾向于宪章运动; 由于組織 1839 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 因此被判終身流放至澳洲; 后来被赦免并在 1856 年回到英国。——第 396、439 頁。
- 弗呂貝尔, 尤利烏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 ——德国政論家和进步书刊发行人, 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翼; 后为自由派。——第 78 頁。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 ——將軍, 普魯士反动軍

- 閣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年11月参加普魯士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第81、82、314頁。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1792—1806)。——第33、36頁。
-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87、599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薩(Friedrich I Barbarossa 約 1123—1190)——从1152年起为德国国王,后为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1155—1190)。——第361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18—21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1840—1861)。——第18—22、27、37、42、43、81、83、87、93、95、96、279、467頁。
-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II 1797—1854)——薩克森国王(1836—1854)。——第101頁。
- 弗萊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詩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为革命詩人,1848—1849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285、430、445—448、505、630、642—644頁。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約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魯士外交家,政論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魯士宮廷,曾任駐倫敦大使(1842—1854)。——第630頁。
- 白尔尼,路德維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論家和批評家,激进的小资产階級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319頁。
-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論家,和平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記”一书的作者。——第340頁。
- 卡佩隆(Caperon)——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为在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委員。——第339頁。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羅馬皇帝(37—41)。——第143頁。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资产階級共和派;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48年2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陸軍部长,极端残酷地鎮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62、133、138、139、147、187、200、209、250頁。
- 卡尔利埃,比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163、175、182、206、472—474、478頁。
-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領袖之一,后成为自由主义者;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陸軍大臣(1868—1874)。——

第 386、407 頁。

卡提利納，魯齊烏斯·賽爾吉烏斯(Catilina,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約 108—62)——羅馬政治活動家，貴族，反對貴族共和國密謀的組織者。——第 441、520 頁。

古泰(Goute)——法國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法國布朗基主義流亡者協會委員會的委員。——第 339 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國女皇(1762—1796)。——第 622 頁。

蘭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ey Fitzmauric 1780—1863)——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1806—1807 年任財政大臣，樞密院主席(1830—1841, 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 553 頁。

蘭茨科隆斯基(Lanckoroński)——伯爵，波蘭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第 413 頁。

六 画

喬治三世(Georg III 1738—1820)——英國國王(1760—1820)。——第 617 頁。

托林頓子爵，喬治·賓恩(Torrington, Georges Byng 1812—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議會議員，曾任錫蘭島的總督(1847—1850)。——第 396 頁。

托利尼，比埃爾·弗朗斯瓦·伊麗莎白(Thorigny, Pierre-François-Elisabeth 1798—1869)——法國法學家，1834 年審訊里昂四月起義者案件；波拿

巴主義者，曾任內務部長(1851)。——第 206 頁。

托克維爾，阿列克西斯(Tocqueville, Alexis 1805—1859)——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正統主義者和君主立憲制的擁護者，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曾任外交部長(1849 年 6—10 月)。——第 196 頁。

多德森，約翰(Dodson, John 1780—1858)——英國法官。——第 608 頁。

多布爾霍夫，安東(Dobhoff, Anton 1800—1872)——男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溫和的自由派，1848 年任商業大臣(5 月)和內務大臣(7—10 月)。——第 67 頁。

邁爾，阿道夫(Majer, Adolph 約生于 1819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50 年末至 1851 年為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駐法國的特派員；1852 年 2 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的被告之一。——第 257、339、472、481 頁。

邁爾霍弗(Mayerhofer)——1849 年為巴登臨時政府國防部副部長，曾採取背叛行動，拒絕執行必要的軍事措施。——第 304 頁。

艾釋黎，安東尼·庫伯，1851 年起為舍夫茨別利伯爵(Ashley, Anthony Cooper 1801—1885)——英國政治活動家，四十年代在議會里領導托利黨慈善家集團，1847 年起為輝格黨人。——第 612 頁。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國政論家，醫生，1848 年至 1849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後來屬於左派。——第 15 頁。

- 艾希霍恩, 約翰·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普魯士宗教、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 (1840—1848)。——第 27 頁。
- 安都昂, 古斯塔夫 (Antoine, Gustav)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法国流亡者; 奧古斯特·布朗基之婿。——第 341 頁。
- 安內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普魯士的炮兵軍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軍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9 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中校; 后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290 頁。
- 吉茲公爵——見洛林的昂利第二。
- 吉佩里希, 約瑟夫 (Gipperich, Josephe) ——德国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員, 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1852 年 2 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被告之一; 后来流亡英国。——第 476、477、485、486 頁。
- 西蒙, 路德維希 (Simon, Ludwig 1810—1872) ——特利尔的律师,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后流亡瑞士。——第 377 頁。
- 西塞罗, 馬可·土利烏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 106—43) ——杰出的羅馬雄辯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369、520 頁。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奧納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Léonard-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經济学家, 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第 574、617、619 頁。
- 伍德, 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1846—1852 年任財政大臣,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2—1855), 1855—1858 年任海軍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 (1859—1866)。——第 393、396、397、548—550、558、582、604 頁。
- 伍尔夫, 阿瑟 (Woolf, Arthur 1766—1837)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 562 頁。
- 亚历山大, 約翰 (Alexander, John)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1853 年是議會議員。——第 569 頁。
-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 356—323) ——古代卓越的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 176 頁。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約 571—497) ——古希腊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355 頁。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德国激进政論家, “萊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成員, “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因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 241、242、461、462、525、536 頁。
- 伊索 (Aisopos 公元前 6 世紀) ——半神話式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 125 頁。
- 伊雍 (Yon) ——法国警官, 1850 年掌管立法議會警卫队。——第 175、180 頁。
-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 ——德国

- 教师,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2年起流亡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11—515、642、643、645頁。
- 伊茨施太因,約翰·亚当(Itzstein, Johann Adam 1775—1855)——德国政治活动家,巴登議會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領袖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极左派;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第321頁。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t)——在倫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0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員。——第635、640頁。
- 列奥波特(Leopold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第101、108頁。
- 列伐尔特,芬尼(Lewald, Fanny 1811—1889)——德国女作家,曾加入“青年德意志”派。——第312頁。
-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参加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領袖之一,1847—1848年任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員。——第413頁。
- 达姆(Damm)——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制宪議會主席;后来流亡英国。——第370頁。
- 达菲,查理·加文(Duffy, Charles Gavan 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青年爱尔兰”組織的領導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創立者之一,議會議員;1855年流亡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曾历任国职。——第560、609頁。
-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組織的积极活动家,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第325、344頁。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中間派右翼。——第25頁。
-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得魯·拉姆西(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第434頁。
- 达尔林普尔,約翰(Dalrymple, John 1726—1810)——苏格兰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大不列顛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論”一书的作者。——第575頁。
- 达来朗-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长(1797—1799, 1799—1807, 1814—1815),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1814—1815),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則著称。——第368頁。
- 米尔納·基卜生——見基卜生,托馬斯·米尔納。
- 尧普,亨利希·卡尔(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德国法学家,自由派,黑森-达姆斯塔特政府首脑(1848—1850),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第

327 頁。

华德, 亨利·乔治 (Ward, Henry George 1797—1860) ——英国殖民官吏, 輝格党人; 曾任伊奥尼亚群島高級專員 (1849—1855), 錫兰总督 (1855—1860) 和馬得拉斯总督 (1860)。——第 396 頁。

休謨, 約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 ——英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領袖之一, 議會議員。——第 396、425、436、439、441 頁。

伐伊斯, 克劳德·馬利烏斯 (Vaisse, Claude-Marius 1799—1864)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內务部长 (1851 年 1—4 月)。——第 188、189 頁。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 (眞姓为阿魯埃)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355 頁。

考尔巴赫, 威廉 (Kaulbach, Wilhelm 1805—1874) ——著名的德国艺术家。——第 374 頁。

七 画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委員, 1849 年 2—5 月为科倫工人联合会主席;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6 年重新同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員。——第 257、339、341、464、465、468、470、472、476、479—481、483、488、521、525、527、635、637—640 頁。

沙德維尔 (Shadwell)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密多塞克斯資格审查律師。——第 427 頁。

沙貝利茨 (Schabelitz) ——瑞士出版家和书商。——第 626 頁。

沙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瑞士出版家和书商, 資產階級激进派;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与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 是沙貝利茨的儿子。——第 626 頁。

沙尔腊斯,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 (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 ——法国軍事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 1848 年曾参加鎮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 反对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被驅逐出法国。——第 209 頁。

狄更斯, 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298 頁。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論者,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領袖。——第 301 頁。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Δημοσθένης] 公元前 384—322) ——古希腊的大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馬其頓党的領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雅典同盟反馬其頓战争失败后 (公元前 338 年) 被驅逐出雅典。——第 315 頁。

亨策 (Hentze, A.) ——德国軍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

- 屬於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原告證人。——第 493、526、529 頁。
- 亨利，托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國法官。——第 630 頁。
- 亨利希(Heinrich 1726—1802)——普魯士王儲，軍事活動家和外交家，七年戰爭(1756—1763)的參加者。——第 622 頁。
- 亨利四世(Heinrich IV 1553—1610)——法國國王(1589—1610)。——第 326 頁。
- 亨利五世(Heinrich V)——見尚博爾，昂利·沙爾。
- 亨利六世(Heinrich VI 1421—1471)——英國國王(1422—1461)。——第 193 頁。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職業是教師，西里西亞農奴的兒子；學生運動的參加者，1834—1839年被關在普魯士監獄，1846—1847年為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1848年3月起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1849年為“新萊茵報”編輯之一，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友。——第 103、111、112、430、445—448、505、642、643、645 頁。
-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 1812—1895)——德國政論家，1846—1847年為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為“新萊茵報”編輯之一；1848—1849年革命後逃離德國；1850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期擁護馬克思；後來脫離了政治活動。——第 642、643、645 頁。
- 沃尔波尔，斯賓塞·霍雷修(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內務大臣(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7)。——第 539 頁。
-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約 1170—1220)——中世紀德國詩人，騎士詩“巴齊法爾”的作者。——第 267 頁。
- 貝林，弗蘭西斯(Baring, Francis 1796—1866)——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議會議員，1839—1841年任財政大臣，1849—1852年任海軍首席大臣。——第 584 頁。
- 貝爾，約翰(Baer, John)——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在倫敦的德國流亡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擁護者。——第 643、645 頁。
- 貝姆，約瑟夫(Bem, Joseph 1795—1850)——波蘭將軍，民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1830—1831年起義的參加者；1848年參加維也納革命鬥爭；匈牙利革命軍領導者之一；後在土耳其軍隊中服務。——第 72、346 頁。
- 貝留，理查·孟德斯鳩(Bellew, Richard Montesquieu)——英國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1846—1852年間為議會議員。——第 407 頁。
- 貝多，瑪麗·阿爾丰斯(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副議長。——第 147、186 頁。
- 貝朗熱，比埃爾·讓(Be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國最傑出的民主主義詩人，著有許多政治諷刺詩。——第 230 頁。
- 貝諾瓦·達濟，德尼(Benoit d'Azy,

- Denis 1796—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金融家和工业家；立法議會副議長(1849—1851)，正統主义者。——第189、194頁。
- 貝尔納(Bernard)——法国上校，領導軍事委员会鎮压巴黎1848年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是对反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組織者之一。——第139頁。
- 貝尔納，拉尔夫(Bernal, Ralph 死于1854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輝格党人，議會議員；1830—1850年間任議院委员会主席。——第407頁。
- 貝尔納·奧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海軍部秘书长(1852—1858)。——第556、557頁。
- 貝克萊，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第396頁。
- 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Berryer, Pierre 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正統主义者。——第151、168、187、194、196、198、202頁。
- 貝克尔(Becker, B.)——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成員。——第646頁。
- 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241、242、461、493、526、529頁。
- 貝克曼(Beckmann)——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巴黎的普魯士警探，“科倫日报”駐巴黎記者。——第481頁。
- 貝里尼，文欽佐(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269頁。
- 貝凱拉特，海尔曼(Beckerath, Hermann 1801—1870)——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財政大臣。——第350頁。
- 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f 1821—1875)——科倫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与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490、493、494、498頁。
- 貝雷斯福德，威廉(Beresford, William 生于1798年)——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曾任軍务大臣(1852年3—12月)。——第392、400、547頁。
- 杜朗，魯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1853年流亡美洲。——第312、325、326頁。
- 杜班，安得列·瑪丽·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制宪議會議員(1848—1849)和立法議會議長(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75、180頁。
- 杜普拉，巴斯噶(Duprat, 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記者，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反对路易·波拿巴。——第181、182頁。

- 杜沙特爾, 沙爾(Duchâtel, Charles 1803—1867)——法國國家活動家, 奧爾良派, 曾任內務大臣(1839—1840, 1840—1848年2月)。——第195、311頁。
- 克奧, 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愛爾蘭的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屬於皮爾派; 議會中愛爾蘭集團的領袖之一, 多次擔任愛爾蘭最高司法職務。——第556、558、560、587頁。
- 克魯格, 威廉·特勞戈特(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第346頁。
- 克魯馬赫爾, 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國傳教士, 加爾文教派牧師, 烏培河谷的虔誠派首領。——第278頁。
- 克雷通, 尼古拉·約瑟夫(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法國律師;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 奧爾良派。——第193頁。
- 克雷格, 威廉·基卜生(Craig, William Gibson 1797—1878)——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曾任財政部部務委員(1846—1852)。——第407頁。
- 克雷門特, 克努特·榮克博恩(Clement, Knut Jungbohn 1803—1873)——德國歷史學家和語言學者, 基爾大學教授。——第330頁。
- 克納普, 阿爾伯特(Knapp Albert 1798—1864)——德國詩人, 著有許多教會頌歌和聖歌, 虔誠主義者。——第268、290頁。
- 克路斯, 阿道夫(Cluß, Adolph 死于1889年之后)——德國工程師,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48年是美因茲工人教育協會的書記, 1849年流亡美國; 在五十年代和馬克思、恩格斯經常通信, 曾為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許多民主報紙撰稿。——第643頁。
- 克萊因, 約翰·雅科布(Klein, Johann Jakob 約生于1818年)——科倫醫生,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審法庭宣告無罪。——第241頁。
- 克萊因, 尤利烏斯·列奧波特(Klein, Julius Leopold 1810—1876)——德國劇作家和戲劇批評家, 青年黑格爾派。——第354頁。
- 克勞倫, 亨利希(Clauren, Heinrich 1771—1854)(卡爾·霍伊恩的筆名)——德國作家, 著有一些感傷主義的小說。——第270、278頁。
- 克勞塞維茨, 卡爾(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魯士將軍和資產階級最大的軍事理論家; 1812—1824年在俄國陸軍服務。——第323頁。
- 克拉倫登伯爵, 喬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韋利爾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後成為自由派; 曾任愛爾蘭總督(1847—1852), 殘酷地鎮壓1848年愛爾蘭起義; 外交大臣(1853—1858, 1865—1866和1868—1870)。——第559、611頁。
- 克拉麥爾, 卡爾·哥特洛布(Cramer, Karl Gottlob 1758—1817)——德國作家, 著有一些冒險小說。——第270頁。
- 克倫威爾, 奧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領袖, 從1653年起為英格蘭、蘇格

-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122、209、364 頁。
-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 (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1790—186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輝格党人，曾任大法官 (1852—1858 和 1865—1866)。——第 603 頁。
- 克罗弗德，威廉·舍尔曼 (Crawford, William Sherman 1781—186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资产階級激进派，支持宪章派；曾参預创办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議會議員。——第 587 頁。
- 克罗斯利，弗兰西斯 (Crossley, Francis 1817—1872)——英国厂主，资产階級激进派，議會議員。——第 393、397 頁。
- 克罗狄烏斯 (Claudius 公元前 10—公元 54)——羅馬皇帝 (41—54)。——第 586 頁。
- 克罗伊斯勒尔 (Kräusler)——普魯士教授，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 462 頁。
-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詩人，德国资产階級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261 頁。
- 希尔施，威廉 (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倫敦的普魯士警探。——第 447、452—455、495—500、508—511、513、515、516、527、528 頁。
- 利奧，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論家，极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維護者，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326 頁。
-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多次担任內閣职务，曾任首相 (1812—1827)。——第 583 頁。
- 利法特-帕沙 (Rifaat-Pascha 1798—1855)——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53 年任外交大臣。——第 630 頁。
-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經濟学家，资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 617、619 頁。
- 李伯尼，亞諾什 (Libényi, Janos 約 1832—1853)——匈牙利的裁縫帮工，曾于 1853 年謀刺奧国皇帝弗兰茨-約瑟夫。——第 599、624 頁。
- 李卜克內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創造人和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96—499、505、510、511、642、643、645 頁。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5)——羅馬教皇 (1846—1878)。——第 158、161 頁。
- 辛凯尔迪，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魯士政府官員，从 1848 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第 518 頁。
- 孚赫，茹尔 (尤利烏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派；貿易自由派的拥护者，五十年代初叶宣傳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观点, 1850—1861年流亡英国;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354—356頁。

伽利略, 伽利萊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偉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力学原理的創造人, 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第535頁。

穷汉瓦尔特 (或穷汉高蒂耶) (死于1096年)——法国騎士, 第一次十字軍远征 (1096—1099) 时法国农民支队中的統率者之一。——第364頁。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奧 (1810—1844) 和埃米利奧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an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軍官,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 (1844)。——第334頁。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 1822—1827), 首相 (1827)。——第230、583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628頁。

里士滿公爵, 查理·倫諾克斯-戈登 (Richmond, Charles Gordon-Lennox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第598頁。

劳貝, 賽米爾 (Laube Samuel)——德國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第480頁。

苏, 欧仁 (Sue, Eugene 1804—1857)——法国作家, 著有一些小市民的感伤的社会小說, 为立法議會議員 (1850—

1851)。——第169、515頁。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約1782—1867)——黑人的海地共和国總統, 1849年自封为皇帝, 号称法斯廷一世。——第226頁。

苏格拉底 (Sokrates 公元前約469—399)——古希腊哲学家, 奴隶主貴族思想家。——第304頁。

来丁, 科斯莫斯·达米安 (Leiden, Kosmos Damian)——科倫商人,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462頁。

八 画

佩罗, 本扎曼·比埃尔 (Perrot, Benjamin Pierre 1791—1865)——法国將軍, 1848年参加鎮压六月起义, 1849年統率巴黎国民自卫軍。——第185頁。

佩吉特, 克拉倫斯·爱德华 (Paget, Clarence Edward 1811—1895)——英国軍事和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1852年为軍械总长秘书。——第407頁。

佩尔采尔, 摩里茨 (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將軍, 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年流亡英国。——第68、71、74頁。

帕金頓, 約翰·索美塞特 (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 海軍首席大臣 (1858—1859 和 1866—1867) 和陸軍大臣 (1867—1868)。——第539頁。

帕麦尔, 朗德爾 (Palmer, Roundell 1812—1895)——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成为自由派; 曾任大法官 (1872—

- 1874 和 1880—1885)。——第 407 頁。
-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 ——捷克大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1848 年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 执行保护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第 54 頁。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最初是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228、237、412、414、434、435、537、538、551—554、558、575、621、625、627 頁。
- 金, 彼得·约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第 238、396 頁。
-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为莫克尔) ——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 264、271、275、277、279—283、290、293—295、299、349—351 頁。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 ——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后越狱逃跑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261—300、316、329、337—340、343—352、355、362、367—377、379、380、520、525、526 頁。
- 波拿巴, 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 ——拿破侖第一之弟, 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1807—1813), 1850 年起任元帅。——第 413 頁。
- 波拿巴, 比埃尔 (Bonaparte, Pierre 1815—1881) ——拿破侖第三之堂弟;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属共和派。——第 413 頁。
- 波拿巴王朝——法国帝国王朝 (1804—1814, 1815, 1852—1870)。——第 216—219、604 頁。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140、149、191、192、194、195、197、216 頁。
- 波林尼雅克, 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玛丽 (Polignac, Auguste-Jules-Armand-Marie 1780—1847) ——公爵, 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和内阁总理 (1829—1830)。——第 196 頁。
- 迪茨, 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約 1824—1864) ——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第 339、446、452、467—469、475、479、481、483、489、494、497、498、526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后成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8), 内阁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406、

- 424、537—540、543、548—551、555、556、597、599、604—608 頁。
- 罗素, 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領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237—240、386、393、407、434—439、441、537、553、558、559、582、595—597、603、608—611 頁。
- 罗泰克, 卡尔 (Rotteck, Karl 1775—1840) ——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第 15—16、25、303—305、325、348 頁。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在倫敦的警探。——第 452、454、469、525 頁。
- 罗赫納,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約生于 1824 年)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职业是木工;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第 642、643、645 頁。
- 罗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Rochow Gustav Adolf 1792—1847) ——反动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普魯士的内务大臣 (1834—1842)。——第 478 頁。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約翰, 葛德里奇子爵 (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23—1827 年任财政大臣和首相 (1827—1828)。——第 423 頁。
- 罗伊希林, 約翰 (Reuchlin, Johann 1455—1522) ——德国学者, 語言学家和法学家, 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第 312 頁。
- 罗森勃魯姆, 爱德华 (Rosenblum, Edward) ——德国大学生,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敗后逃離德国。——第 324 頁。
- 罗伯斯比尔, 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領袖, 革命政府的首脑 (1793—1794)。——第 121、122、340 頁。
- 拉特 (Rath) ——科倫厂主,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 462 頁。
- 拉沃, 弗兰茨 (Raveaux, Franz 1810—1851) ——德国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科倫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 駐瑞士的帝国專員,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攝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委員,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逃離德国。——第 377、379 頁。
- 拉托, 让·比埃尔 (Rateau, Jean Pierre 1800—1887) ——法国律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 波拿巴主义者。——第 142 頁。
- 拉伊特, 让·厄內斯特 (La Hitte, Jean Ernest 1789—1878) ——法国將軍,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議會議員 (1850—1851), 曾任外交部长 (1849—1851)。——第 168 頁。
- 拉图尔, 泰奧多尔 (Latour, Theodor 1780—1848) ——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1848 年任陸軍大臣; 1848 年 10 月为維也納起义者所杀。——第 68 頁。
- 拉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 1790—1869) —— 法国詩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 189、296、321 頁。
- 拉德茨基, 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 伯爵, 奥地利元帅, 1831年起指揮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 1848—1849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年任倫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第 59、66、67、70、600、621 頁。
- 拉多維茨, 約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 ——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权奸的代表人物;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347 頁。
- 拉莫里諾, 吉罗拉莫 (Ramorino, Gerorimo 1792—1849) —— 意大利將軍, 1834年領導由馬志尼組織的流亡革命者向薩瓦的进攻; 意大利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揮皮蒙特军队, 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第 332 頁。
- 拉摩里西尔, 克利斯托夫·路易·萊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 ——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 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 (6—12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第 147、209 頁。
- 拉罗施夫柯, 弗朗斯瓦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1613—1680) —— 公爵, 法国道德主义作家, 弗倫特党的活动家之一。——第 475 頁。
- 拉罗什雅克兰, 昂利·奧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 1805—1867) —— 侯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貴族院議員, 正統派領袖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宪議會議員; 后为第二帝国的參議員。——第 196 頁。
- 阿勒, 路易·比埃尔·孔斯坦 (Allais, Louis-Pierre-Constant 約生于 1821年) —— 法国警探。——第 175、180 頁。
- 阿伊, 比埃尔·德 (Ailly, Pierre d' 1350—1420 或 1425) —— 法国紅衣主教, 著名的神学家; 是君士坦士宗教會議的重要人物。——第 224 頁。
- 阿姆洛·德·拉·烏賽, 尼古拉 (Amelot de la Houssaye, Nicolas 1634—1706) —— 法国政論家, “威尼斯政府分史”一书的作者。——第 586 頁。
- 阿尔宁, 蓓蒂娜 (Arnim, Bettina 1785—1859) —— 德国浪漫派女作家, 在四十年代迷醉于自由主义思想。——第 276 頁。
- 阿托尔公爵, 乔治·奧古斯特斯·弗雷德里克·約翰·馬利 (Atholl, George Augustus Frederie John Murray 1814—1864) —— 苏格兰的大地主。——第 576 頁。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从 1850年起为皮尔派領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內閣首相 (1852—1855)。——第 553—557、560、584、587、595、598、603、627 頁。
- 阿伯拉罕·圣克拉 (Abraham a Santa Clara 1644—1709) (烏尔利希·梅格尔勒 Ulrich Megerle 的笔名) —— 奥地利天主教傳教士和通俗滑稽作品作

- 家。——第 369—371 頁。
- 阿尔康納蒂·維斯康蒂，康斯坦扎 (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約 1801—1870) ——侯爵，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女活动家。——第 414 頁。
- 阿里欧斯托，洛多維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疯狂的罗兰”一詩的作者。——第 317、318、324、349、350、366、377 頁。
- 阿哥斯提尼，切扎列 (Agostini, Cesar 1803—1855) ——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的信徒；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后来脫离馬志尼。——第 601 頁。
- 阿革西拉烏斯 (Agesilaus 約公元前 442—358) ——斯巴达皇帝 (約公元前 399—358)。——第 190 頁。
- 舍尔曼·克罗弗德——見克罗弗德，威廉·舍尔曼。
- 舍尔瓦尔，茹利安 (Cherval, Julien) (眞名約瑟夫·克列美尔) ——普魯士警察局奸細，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領導一个巴黎支部。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为 1852 年 2 月所謂的巴黎德法密謀案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当局的帮助下被放出監獄。——第 452、472、474—489、508、510、525、531、533、536 頁。
- 奈，埃德加尔 (Ney, Edgar 1812—1882) ——法国軍官，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總統的侍卫官，立法議会的議員 (1850—1851)。——第 161 頁。
- 奈特，路德維希·亨利希 (Nette, Ludwig Heinrich 約生于 1819 年) ——汉諾威的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的成員，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1852 年 2 月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的被告之一。——第 486、536 頁。
- 奈斯密斯，詹姆斯 (Nasmyth, James 1808—1890)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 562 頁。
- 法农 (Fanon) ——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在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員。——第 339 頁。
- 法齐，让·雅克 (詹姆斯) (Fazy, 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 ——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 (1846—1853 和 1855—1861)。——第 305 頁。
- 法卢，阿尔弗勒德 (Falloux, Alfred 1811—1886)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統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 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鎮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曾任教育部长 (1848—1849)。——第 147、161、162、196、198 頁。
- 明克斯，弗·(Münks, F.)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倫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642、643、645 頁。
- 明克斯第二 (Münks II)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倫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642、643、645 頁。
- 明希-貝林豪森，弗兰茨·泰奧多尔 (Munch-Bellinghausen, Franz Teodor 生于 1787 年) ——男爵，普魯士官吏，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 462、533 頁。
- 尚博尔，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 Charles 1820—1883) ——伯爵,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第 151、173、194、198 頁。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 ——法国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軍司令,曾参加驅散巴黎 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第 54、142—144、147、153、158、159、175—177、180、183—187、190、196、199、205、208、209 頁。
- 弥勒,弗兰茨·約瑟夫(Müller, Franz Joseph) ——科倫法律顧問,保守党人,是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岳父。——第 497 頁。
- 昂格勒斯,弗朗斯瓦·厄內斯特(Anglès, François Ernest 1807—1861) ——法国地主,立法議會議員(1850—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 199 頁。
- 雨果,維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 ——偉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的議員。——第 162 頁。
- 林格斯(Rings)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流亡倫敦,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496—499、505、512、642、643、645 頁。
- 图克,托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傾向于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貨幣論。——第 422 頁。
- 叔尔茨,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 279、296、337、338、362、367—373、379 頁。

九 画

- 施皮斯,克利斯提安·亨利希(Spieß, Christian Heinrich 1755—1799) ——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說。——第 270 頁。
- 施米茨(Schmitz) ——科倫私人文书,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 497、499 頁。
- 施拉姆,让·保尔·亚当(Schramm Jean-Paul-Adam 1789—1884)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陸軍部长(1850—1851)。——第 177 頁。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約 1822—1858)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从 1849年起流亡倫敦,“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82、483、635、641 頁。
- 施拉姆,魯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 ——德国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第 301、302、306、316、339、343、373、377 頁。
- 施瓦策,恩斯特(Schwarzer, Ernst 1808—1860) ——奥地利官員和政論家,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9月)。——第 67 頁。

施泰因, 罗侖茲 (Stein, Lorenz 1815—1890) —— 德国法学家, 普魯士政府的密探, “現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第 533、534 頁。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維希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約生于 1814 年) —— 汉諾威的細木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从 1851 年 12 月起又成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从 1852 年 1 月起領導倫敦工人协会。——第 496 頁。

施塔尔, 阿道夫·威廉·泰奧多尔 (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 —— 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历史小說和一些有关文学艺术史問題的学术著作。——第 295 頁。

施蒂納, 麦克斯 (卡斯巴尔·施米德的笔名) (Stirner, Max 1806—1856) ——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312 頁。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 普魯士警官, 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的組織者之一, 并且是这个案件 (1852) 的主要证人; 与維尔穆特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后为普魯士政治警察局长。——第 431、446、447、451、453、454、462—464、468—511、513、519、525、530—533 頁。

施梯維, 約翰·卡尔·貝尔特拉姆 (Stür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 —— 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曾任汉諾威內务大臣 (1848—1850)。——第 15 頁。

施倫巴赫, 卡尔·阿尔諾德 (Schlönbach,

Carl Arnold 1807—1866) —— 德国詩人,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朋友。——第 280 頁。

施塔迪昂·弗兰茨 (Stadion, Franz 1806—1853) —— 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反对加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內务大臣 (1848—1849)。——第 78 頁。

施瑙費尔, 卡尔·亨利希 (Schnauffer, Karl Heinrich 1823—1854) —— 德国詩人和記者,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逃离德国。——第 324 頁。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 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83、306 頁。

施特罗特曼, 阿道夫 (Strodtmann, Adolf 1829—1879) —— 德国作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50 年逃离德国。——第 261、276—279、281、285、295、337、338、362 頁。

施瓦尔岑堡, 費里克斯 (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 —— 公爵, 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48 年 10 月維也納革命被鎮压后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职务。——第 40 頁。

施泰因根斯, 祖伊特倍尔特·亨利希·海尔曼 (Steingens, Suitbert Heinrich Herman 約生于 1817 年) —— 德国工人, 油漆匠, 布魯塞爾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 (1852)的原告证人。——第493、526頁。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科倫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委員,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新萊茵报”案件的被告人; 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案的被告;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属于极左派;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447、485、497、504、506、508、509、515、519頁。
- 威尔逊, 乔治(Wilson, George 1808—1870)——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反谷物法同盟的主席(1841—1846)。——第589頁。
- 威廉斯, 澤芬奈阿(Williams, Zephaniah 約1794—1874)——宪章派, 1839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組織者之一; 被判終身流放澳大利亚。——第396、439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維尔騰堡国王(1816—1864)。——第101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王儲, 普魯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第376頁。
- 威廉四世(Wilhel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630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統帥,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年12月—1835年4月)。——第228、426、428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理查·威尔斯里, 杜埃罗侯爵(Wellington, Arthur Richard Wellesley, Marquis of Douro 1807—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前者之子。——第428頁。
- 威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 經濟学家, 曾制定资产阶级殖民理論。——第558頁。
- 威斯特华倫, 斐迪南·馮(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务大臣(1850—1858), 反动派; 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的異母哥哥。——第602頁。
- 济格尔, 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軍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曾任总司令,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軍副总司令; 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軍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內战; 是济格尔, 阿尔伯特之兄。——第108、354、356—359、362、367、369、372、373、376—378頁。
- 济格尔, 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巴登軍官, 記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53年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內战。——第373、377、378頁。
- 哈克, 約翰·卡尔(Haacke, Johann Carl 約生于1820年)——德国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同盟分裂后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第525頁。
- 哈林, 哈罗(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从1823年起曾間断地流亡各国。

- 第 328—336 頁。
- 哈賽，利奧 (Hasse, Leo)——哥特弗利德·金克爾的朋友，酷愛詩文。——第 280 頁。
- 哈貝克 (Habbegg)——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英國。——第 324 頁。
- 哈奇爾，約翰 (Hatchell, John 生于 1788 年)——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愛爾蘭首席檢察官 (1851—1852)。——第 407 頁。
- 哈布斯堡王朝——指所謂神聖羅馬帝國 (1273—1806 年其間曾有間斷) 皇帝、奧地利帝國 (1804 年起) 皇帝和奧匈帝國 (1867—1918) 皇帝的王朝。——第 600 頁。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國國王 (1625—1649)，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被處死。——第 593 頁。
- 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約 742—814)——法國國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52 頁。
- 約丹，西爾韋斯特爾 (Jordan, Sylrester 1792—1861)——德國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三十年代庫爾吉塞立憲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1848—1849 年為法蘭克福議會議員。——第 15 頁。
- 約翰 (Johann 1782—1859)——奧地利大公，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是德意志帝國攝政王。——第 48、64、100、103、104、111—113 頁。
- 約斯特·卡爾 (Joest, Karl)——科倫廠主，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 462 頁。
- 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1741—1790)——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1765—1790)。——第 33、34 頁。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1848 年臨時政府成員和盧森堡委員會主席；採取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1848 年 8 月流亡英國，倫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導人之一。——第 6、121、340—343、639 頁。
- 勃魯姆，羅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職業是記者；領導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左派；1848 年 10 月參加維也納·保衛戰；在反革命軍占領維也納后被殺害。——第 78、79、89、340 頁。
- 勃律蓋曼，卡爾·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國資產階級政論家，自由派；1845—1855 年為“科倫日報”主編。——第 316 頁。
- 洛克·金 (Locke King)——見金，彼得·約翰·洛克。
- 洛克，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國二元論哲學家，感覺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 122 頁。
- 洛克，詹姆斯 (Loch, James 1780—1855)——蘇格蘭經濟學家和律師，薩特倫德女公爵的財產管理人。——第 573、574 頁。
- 洛林的昂利第二，吉茲公爵 (Henri II Lorraine, Guise 1614—1664)——弗倫特黨活動家之一。——第 226 頁。
- 科克，保爾·德 (Kock, Paul de 約 1794—1871)——法國資產階級作家，著有一些輕浮的消遣小說。——第 311 頁。
- 科布頓，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國廠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派領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的創立者之一；議會議員。——第

- 236、327、537、544、577、580、581、605、616、622 頁。
- 科采布, 奧古斯特 (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國反動作家和政論家。——第 273 頁。
-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為英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進行鬥爭。——第 580 頁。
- 科蘇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oui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腦; 革命失敗後逃離匈牙利; 五十年代初期曾向波拿巴主義者集團求援。——第 317、319、340、380、412—414、443、545、593、599、601、602、616、621、624 頁。
- 科特斯 (Kothés, D.)——科倫商人, 民主主義者;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被告證人。——第 490—493、499 頁。
- 科勒特, 科勒特·多布森 (Collet, Collet Dobzon)——英國激進派記者和社會活動家。——第 630 頁。
- 科爾圖姆, 卡爾·阿爾諾德 (Kortum, Karl Arnold 1745—1824)——德國詩人和作家; 以“約卜西之歌”一書而著名。——第 327 頁。
- 科西迪耶爾, 馬爾克 (Caussidiere, Marc 1808—1861)——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34 年里昂起義的參加者; 七月王朝時期秘密革命團體的組織者之一; 1848 年二月革命後擔任巴黎警察局長, 制憲議會議員, 1848 年 6 月流亡英國。——第 121 頁。
- 洪特海姆, 理查 (Hontheim, Richard 死於 1857 年)——科倫律師,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辯護人。——第 498、504、506、508 頁。
- 耶拉契奇, 約西普 (Јелачић, Jellačić 1801—1859)——伯爵, 奧地利將軍, 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和斯拉窩尼亞省總督 (1848—1859), 積極參加鎮壓匈牙利和奧地利的 1848—1849 年革命。——第 66、68、69、71、73、74 頁。
- 英格索爾, 約瑟夫 (Ingersoll, Joseph 1786—1868)——美國政治活動家, 美國國會議員, 曾任駐英大使 (1852—1853)。——第 560 頁。
- 律斯勒, 古斯塔夫·阿道夫 (Roe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國教員和記者, 1848—1849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派; 1850 年起流亡美洲。——第 113 頁。
- 歐几里得 (Eukleidēs 公元前 4 世紀末—3 世紀初)——杰出的古希臘數學家。——第 631 頁。
- 柏拉圖 (Platon 約公元前 427—347)——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奴隸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619 頁。
- 派克, 約翰 (Parker, John 1799—1881)——英國政治活動家, 輝格黨人, 曾任海軍部秘書長 (1841 和 1849—1852)。——第 407 頁。
- 派西沃, 達德利·蒙特鳩 (Perceval, Dudley 1801—1856)——英國社會活動家, 托利黨人。——第 569 頁。
- 保路斯, 亨利希·艾伯哈特·哥特洛普 (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國新教神學家, 唯理論者。——第 346 頁。
- 榮克爾曼 (Junkermann)——克雷弗爾得的警局督察員,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的证人。——第 518、519 頁。
 榮克-施梯林, 約翰·亨利希 (Jung-Stilling, Johann Heinrich 1740—1817)
 ——德國作家, 虔誠主義者。——第 276 頁。

十 画

格雷, 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領袖之一, 曾任內閣首相 (1830—1834)。——第 393、583 頁。

格雷, 喬治 (Grey, George 1799—1882)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曾任內務大臣 (1846—1852, 1855—1858 和 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407 頁。

格林, 托馬斯 (Greene, Thomas)——英國政治活動家, 皮爾派, 1846—1852 年任議會議員。——第 407 頁。

格萊夫 (Greif)——普魯士警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倫敦普魯士諜報機關的領導人之一。——第 447、452—455、464、485—487、491、500、502、503、512、513、515—517、527 頁。

格萊安, 詹姆斯·羅伯特·喬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國國家活動家, 皮爾派, 曾任內務大臣 (1841—1846), 海軍首席大臣 (1830—1834, 1852—1855)。——第 386、410、537、538、548、553、558、582、604、607、608 頁。

格林兄弟, 威廉和雅科布 (Grimm, Wilhelm und Jakob 1786—1859 和 1785—1863)——德國語言學家, 柏林大學教授, 著名的德國民間童話和中世紀敘事詩的編撰者。——第 319 頁。

格拉古, 提比利烏斯·賽姆普羅尼烏斯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公元前 163—133)——古羅馬的護民官 (公元前 133 年), 曾為農民利益進行過爭取實現土地法的鬥爭。——第 122 頁。

格拉古, 凱尤斯·賽姆普羅尼烏斯 (Gracchus, Caius Sempronius 公元前 153—121)——古羅馬的護民官 (公元前 123—122), 曾為農民利益進行過爭取實現土地法的鬥爭, 提比利烏斯·賽姆普羅尼烏斯·格拉古之弟。——第 122 頁。

格蘭尼埃·德·卡桑尼亞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國記者, 無原則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奧爾良派, 後為波拿巴主義者; 第二帝國時期為立法團的代表。——第 227 頁。

格倫維耳, 威廉 (Grenville, William 1759—1834)——男爵, 英國國家活動家, 輝格黨人, 曾任內閣首相 (1806—1807)。——第 583 頁。

格隆尼希 (Grunich)——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倫敦。——第 324 頁。

格萊斯頓, 威廉·尤爾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後為皮爾派, 十九世紀下半葉是自由黨領袖之一;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內閣首相 (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 386、410、435、558、569、584 頁。

格爾哈特, 約 (Gerhardt, J.)——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國, 曾擔任科倫被判罪者及其家屬救濟委員會主席。——第 642、

- 643 頁。
- 格貝爾特, 奧古斯特 (Gebert, August)
——梅克倫堡的木匠, 在瑞士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后迁往倫敦, 1850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后屬於維利希—沙佩爾的冒險主義宗派集團, 并為該集團的中央委員。——第 339、526、528 頁。
- 馬提, 卡爾 (Mathy, Karl 1807—1868)
——巴登政論家, 官吏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溫和的自由派; 1848—1849 年曾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358 頁。
- 馬洪子爵, 菲力浦·亨利·斯坦霍普 (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1805—1875)
——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 皮爾派, 議會議員。——第 407 頁。
- 馬爾滕 (Malten)
——普魯士在國外的間諜。——第 330 頁。
- 馬克思, 卡爾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75、116、139、160、198、243、257、311、381、387、391、405、422、424、429—432、443—448、450、455、461、464—468、470、479—483、488—499、501、504—510、516、518—520、525、527、533、534、537、538、545、551、557、559、570、611、614、618、621、624—627、631、635—643、645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之一, 1849 年為羅馬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 1850 年是倫敦歐洲民主主義者中央委員會組織者之一; 五十年代初曾向波拿巴主義者集團求援。——第 325—329、332—334、337—340、343、344、347、348、350、359、374、377、412—414、443、545、593、601、616、621、624、625 頁。
- 馬尼揚, 貝爾納·比埃爾 (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
——法國將軍, 從 1851 年 12 月起是元帥, 波拿巴主義者; 參加鎮壓里昂 (1831 和 1849)、利爾和魯貝 (1845) 的工人起義和 1848 年巴黎六月起義; 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第 197、206、209 頁。
- 馬贊尼洛 (Masaniello 1620—1647) (托馬佐·安尼洛的綽號)
——漁民, 1647 年那不勒斯反對西班牙統治的人民起義的領袖。——第 208 頁。
- 馬爾維爾, 萊昂 (Maleville, Léon de 1803—1879)
——法國政治活動家, 奧爾良派, 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議員和立法議會議員, 曾任內務部長 (1848 年 12 月下半月)。——第 189 頁。
- 馬斯特曼, 約翰 (Masterman, John 約 1782—1862)
——英國銀行家和政治活動家, 托利黨人, 議會議員。——第 407 頁。
- 馬拉斯特, 阿爾芒 (Marrast, Armand 1801—1852)
——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領袖之一, “國民報”編輯, 1848 年為臨時政府委員和巴黎市長, 制憲議會議長 (1848—1849)。——第 6、123、133、143 頁。
- 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國教士, 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人, 宣傳仇視人類的人口論。——第 386、573、586 頁。
- 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思想

- 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資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368、371 頁。
- 馬尔海奈凱，菲力浦·康拉德 (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黑格尔派右翼。——第 262 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士·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成为保守党著名的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 (1852 和 1858—1859)。——第 539、555 頁。
- 海茵 (Hein) ——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成員。——第 646 頁。
- 海德，約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論家，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飈”的創始人之一。——第 312 頁。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50、59、131、307、310、486 頁。
- 海瑙，尤利烏斯·雅科布 (Haynan, Julius Jakob 1786—1853) ——奥国元帅，殘酷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 54 頁。
- 海布林，馮·兰岑瑙尔 (Häbling von Lanzenauer) ——德国地主，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員。——第 462 頁。
- 海因岑，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德国激进派政論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瑞士，后来又流亡英国；1850 年秋最后迁居美国。——第 311、312、317—322、337、338、348—350、359、377 頁。
- 海尔梅斯，約翰·提摩泰烏斯 (Hermes, Johann Timotheus 1738—1821) ——德国神学家和作家，长篇小说“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薩克森旅行記”的作者。——第 317 頁。
- 海尔維格，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e 1817—1875) ——著名的德国詩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306 頁。
- 哥貝尔 (Göbel)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審法庭庭长。——第 488、509、533 頁。
- 哥林盖尔，卡尔 (Göringer, Karl 約生于 1808 年) ——巴登小酒店主，曾参加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同盟分裂后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倫敦開設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第 347、353 頁。
- 哥若夫斯基，塔杰烏什 (Gorzowski, Thaddäus) ——波兰流亡者，波兰民主协会会员。——第 413 頁。
- 恩格斯 (Engels) ——科倫的德国新教牧师。——第 281、282 頁。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10、14、24、25、46、61、64、75、90、105、115、237、251、256、311、429、430、445—448、450、461、467、505、525、534、635、641—643、645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8、20、

- 28、109、121—123、138、174、176、209、213、215、218、219—223、225、227、230—232、242、250、256、356—359、556、599、608、629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總統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115、117、121、123、124、126、131、132、138—144、146—148、151、153、157—164、167—169、172—178、180—192、195—202、205—214、216—229、241、243—251、252—256、412—414、435、443、580—582、585、594、597、604、605—608、623、630 頁。
- 烏迪諾，尼古拉·沙尔·維克多 (Oudinot, Nicolas Chales Victor 1791—1863) ——法国將軍，奥尔良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1849年曾指揮侵犯羅馬共和国的軍隊；曾企图組織力量抵抗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第 143、157、162 頁。
- 烏尔麦尔，約翰 (Ulmer, Johann)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流亡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498、512、642、643、645 頁。
- 庫克，乔治·溫格罗夫 (Cooke, George Wingrove 1814—1865) ——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記者。——第 383、384 頁。
- 庫辛，維克多 (Cousin, Victor 1792—1867)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第 122 頁。
- 埃卡留斯，約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德国裁縫工人，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盟員，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后来参加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第 635、637、641—643、645 頁。
- 埃卡留斯，約翰·弗里德里希 (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 ——德国裁縫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1 年起流亡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約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兄弟。——第 642、643、645 頁。
- 埃斯科巴尔·伊·門多薩，安东尼奥 (Escobar y Mendoza, Antonio 1589—1669) ——西班牙傳教士，耶穌会教徒。——第 558 頁。
- 席勒，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175、181、274、533 頁。
-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 ——普魯士軍官，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加入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內战。——第 337、362、368、371 頁。
- 倍克，威尔海明娜 (Beck, Wilhelmina 死于 1851 年) ——奥地利女冒險家，曾假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員；奥地利和英国警察局的密探。——第 116 頁。
- 紐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1854)，陸軍大臣 (1854—1855) 和殖民大臣

- (1859—1864)。——第 434 頁。
- 特罗洛普, 約翰 (Trollope, John 生于 1800 年)——英国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622 頁。
- 索麦維尔, 威廉 (Somerville, William 1802—1873)——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47—1852)。——第 407 頁。
- 桑德利, 瑪丽·安 (Sandry, Mary Ann 約 1810—1853)——英国女工。——第 614 頁。
- 夏米索, 阿德尔貝特·馮 (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詩人, 反对封建的反动勢力。——第 147、268、290 頁。
- 爱德华茲, 亨利 (Edwards, Henry)——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 (1847—1852)。——第 393、397 頁。
- 朗道夫 (Landolphe)——法国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 流亡倫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第 341 頁。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魯士軍官,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柏林 1848 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軍总參謀长,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流亡瑞士, 是瑞士流亡者联合会“革命的集中”的領導人之一; 1852 年迁居澳洲。——第 337、362、368 頁。
- 茹安維尔亲王, 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瑪丽·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之子, 1848 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第 195、205 頁。

十一画

-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ward 1812—187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派;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 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354—356、362、370、371、374、377 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17、30—37、39、42、58、65、368 頁。
- 梅森豪澤, 凱撒·溫采尔 (Messenhauer, 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軍官和著作家, 1848 年十月起义期間是国民自卫軍司令和維也納卫戍司令; 城陷后为反革命軍队杀害。——第 72 頁。
- 梅兰希通, 菲力浦 (Melancht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 路德最亲密的助手, 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諸侯的利益。——第 369 頁。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維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兰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参加 1846 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848 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監獄釋放出来; 1848 年領導波兹南起义, 后来領導西西里島起义者的斗争; 1849 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間指揮革命軍;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間被任命为执政, 起义失敗后流亡法国。——第 109 頁。

- 理查兹, 阿弗里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英国剧作家, 记者, 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 623 页。
- 理查一世(獅心理查)(Richard I, Löwenherz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第 296 页。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 193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 283、578 页。
- 康海姆, 麦克斯 (Cohnheim, Max)——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 324 页。
- 康瓦尔·路易斯, 乔治——見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6 月任普鲁士首相, 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 42、46、54、80、301 页。
- 莫罗, 让·维克多 (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 历次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 357 页。
- 莫尔, 托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动家, 曾任大法官; 人道主义作家, 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第 575 页。
- 莫帕, 沙尔勒曼-艾米尔 (Maupas, Charlemagne-E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1851),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警务总长(1852—1853)。——第 206、518 页。
- 莫克尔 (Mockel)——見金克尔, 約翰娜。
- 莫斯累, 約翰·路德維希 (Mosle, Joh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 联邦议会的奥登堡代表; 1848 年被派到维也纳充当帝国专员。——第 77 页。
- 莫尔尼伯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会议员(1849—1851),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第 226、255 页。
- 基什, 米克洛什 (Kiss, Miklos 生于 1820 年)——匈牙利军官, 民主主义者, 流亡者, 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办。——第 413 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122、136、195、196、214、227、494 页。
- 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后成为自由主义者; 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408、589、592 页。
- 基安奈拉 (Chianella)——克雷弗尔得的侍者, 警察局谍报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见证人。——第 518、519 页。
- 勒麦, 弗里德里希 (Roemer, Friedrich

- 1794—1864) ——維爾騰堡國家活動家，1848年前是第二議院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領袖之一，1848—1849年任維爾騰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第15、16、358頁。
- 勒澤爾，彼得·格爾哈特 (Röser, Peter Gorhardt 1814—1865) ——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職業是製雪茄煙工人；1848—1849年是科倫工人聯合會副主席；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後來傾向於拉薩爾派。——第461、525、536頁。
-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紐爾·沙爾 (Le 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 ——法國將軍，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秩序黨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國防政府”的陸軍部長(1870—1871)。——第144、209頁。
- 梯也爾，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曾任總理(1836, 1840)；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奧爾良派；共和國總統(1871—1873)，摧殘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144、151、153、168、187、195、196、199、202、205、208、209、605頁。
- 梯爾科奈爾伯爵，約翰·德拉瓦爾·卡爾賓切爾 (Tyrconnel, John Delaral Carpenter 約1790—1853) ——英國貴族。——第586頁。
- 荷馬 (Homerus) ——傳說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298頁。
- 許茨 (Schütz) ——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巴登臨時政府駐巴黎代表；後流亡英國。——第315頁。
- 雪萊，約翰 (Shelley, John 1808—1867) ——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派，議會議員。——第622頁。
- 密勒，約翰·馬丁 (Miller, Johan Martin 1750—1814) ——德國詩人和作家，德國文學中的感傷主義的代表。——第261、265、270、276、277、295、296頁。
- 陶森瑙，卡爾 (Tausenau, Karl 1808—1873) ——奧地利政治活動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左翼的卓越代表，1848年革命時期為維也納民主聯合會中央委員會首腦；1849年起流亡倫敦。——第343、369—372、375—377頁。
- 莎士比亞，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國作家。——第174、215、356頁。
- 培爾西尼，讓·日爾貝爾·維克多 (Perr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 ——伯爵，法國國家活動家，波拿巴主義者，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1851年12月2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內務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第190、205頁。
- 曼托伊費爾，奧托·泰奧多爾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內務大臣(1848—1850)和首相(1850—1858)。——第81、314頁。
- 德里伯爵，愛德華·喬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 ——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領袖，後成為保守黨領袖之一；曾任內閣首相(1852, 1858—1859和1866—

1868)。——第 393、400、406、410、424—428、434—439、551、554—556、560、595 頁。

隱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約 1050—1115)——法国僧侶和傳教士,第一次十字軍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軍的領袖之一。——第 364 頁。

盖格尔,威廉·阿尔諾德(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魯士警官,1848 年任法院偵查員,后为科倫警察厅长。——第 490 頁。

盖米季,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ge 1815—1888)——宪章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第 442 頁。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派;1844 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第 26 頁。

十二画

舒耳茨(Schultz 死于 1852 年)——科倫警察厅长,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的組織者之一。——第 462、496、519、531 頁。

舒勒尔(Schuler, J. L.)——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會員。——第 645、646 頁。

凯撒(凯尤斯·尤利烏斯)(Caesar, Caius Julius 約公元前 100—44)——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122、304、329、374、586 頁。

凯克(Keck, V.)——在美国的德国流亡

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成員。——第 645、646 頁。

凱利,菲茨罗伊(Kelly, Fitzroy 1796—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 611 頁。

凱特勒,阿道夫(Quetelet, Lambert-Adolphe-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资产阶级的大学者;統計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579、580 頁。

隆格,約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竭力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第 312、343—346、349、369、372、373 頁。

隆加尔特,塞巴斯提安(Longard, Sebastian)——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友,曾醉心于詩文;后为科倫律師。——第 280 頁。

菲尔登,約翰(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工厂法的拥护者。——第 612 頁。

菲克勒尔,約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記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的領袖人之一;1849 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委員;革命失敗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英国。——第 354、356—358、369、372、373、375、377 頁。

菲尔施坦堡(Furstenberg)——男爵,普魯士地主,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審員。——第 462、533 頁。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3 頁。

傅阿德-埃芬蒂(Fuad-Effendi 1814—

- 1869)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多次任外交大臣和大維齐(封建时代近东某些国家的高级官吏——譯者注)。——第 630 頁。
- 博雅多, 馬提奧·馬利阿(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詩人, “恋爱中的罗兰”一詩的作者。——第 316、360、366、380 頁。
- 博馬舍, 比埃尔·奧古斯丹(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 481 頁。
- 博布欽,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 1826 年) ——德国手工业者, 1847 年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倫敦; 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倫敦德国资产阶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 324 頁。
- 博納德子爵, 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魯阿茲(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1754—184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保皇派, 复辟时期的貴族反动派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18 頁。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探討了唯心主义的辯证法。——第 16、121、125、262、274、279、306—310、320、328、346、468、578、579 頁。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又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303 頁。
- 黑特采尔, 卡尔·約瑟夫·奧古斯特(Haetzel, Karl Joseph August 約生于 1815 年) ——德国皮鞋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 8 月柏林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小組案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 的原告证人。——第 493、526 頁。
- 黑尔特勒, 丹尼尔(Hertle, Daniel 生于 1824 年) ——德国記者, 小资产阶級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50 年流亡美国。——第 372 頁。
- 黑尔什塔德(Herstadt) ——科倫銀行家,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 的陪审員。——第 462 頁。
- 普芬德, 卡尔(Pfänder, Karl 約 1818—1876) ——德国工人, 小型精細画画家, 正义者同盟盟員,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友。——第 635、641—643、645 頁。
- 普魯茨, 罗伯特(Prutz, Robert 1816—1872) ——德国詩人, 政論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級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第 310 頁。
- 普拉頓, 奧古斯特(Platen, August 1796—1835) ——德国詩人, 自由派。——第 267 頁。
- 普卜利科拉(普卜利烏斯·瓦列利烏斯·

- 普卜利科拉)(Publicola (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 約死于公元前50年)——羅馬共和国半神話式的国家活动家。——第122頁。
- 普魯士亲王——見威廉一世。
- 費倫齐 (Ferenczi)——匈牙利女歌唱家。——第412頁。
- 費特尔·馮·多根菲尔德, 安东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匈牙利將軍, 1848—1849年是科苏特的战友, 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412、413頁。
- 費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論家,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320頁。
- 費尔巴哈, 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283、306、312、315頁。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66—68、78頁。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彈国王”的渾号。——第61頁。
-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左派的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极左派; 七十年代归屬社会民主党。——第340頁。
-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生于1832年)——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后流亡美国。——第241、242頁。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572頁。
- 斯普納, 理查 (Spooner, Richard 1783—1864)——英国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第609頁。
- 斯泰福侯爵, 乔治·格兰維耳·魯森-高尔, 1833年起为薩特倫德公爵 (Stafford, Georges Granville Leveson-Gower 1758—1833)——苏格兰大地主。——第573頁。
- 斯提芬斯, 約瑟夫·雷納 (Stephens, Joseph Reiner 1805—1879)——英国教士, 1837—1839年曾积极参加郎卡郡的宪章运动。——第613頁。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勋爵 (Stuart, Lord Dudley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曾与波兰君主制保守派流亡者集团有联系。——第621頁。
- 斯图亚特, 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572頁。
- 斯图亚特, 胡斯頓 (Stewart, Huston 1791—1875)——英国海軍上将, 輝格党人, 曾任海軍部部务委員 (1850—1852)。——第407頁。
-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統治苏格兰 (1371年开始)和英格兰 (1603—1649、1660—1714)的王朝。——第571、572頁。
- 斯科菲尔德, 威廉 (Scholefield, William 1809—1867)——英国政治活动

- 家，資產階級激進派，議會議員。——第 609 頁。
- 斯特拉索尔多，尤利烏斯·采薩尔 (Strassoldo, Julius Cäsar 1791—1855)——伯爵，奧地利將軍，曾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1853 年是拉德茨基元帥助理。——第 600 頁。
-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 (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中世紀的德國詩人，騎士詩“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的作者。——第 267、271 頁。
- 萊納德 (Renard)——科倫書法教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鑑定人。——第 518 頁。
- 萊斯特爾 (Reistle)——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社會主義體操聯合會的成員。——第 645、646 頁。
- 萊寧格爾，約翰·格奧爾格 (Reininger, Johann Georg)——德國裁縫，共產主義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的成員，同盟分裂後屬於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1852 年 2 月是所謂巴黎德法密謀案的被告之一。——第 480 頁。
- 萊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偉大的德國數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第 468 頁。
- 萊歇爾澤爾 (Reicherzer)——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社會主義體操聯合會的成員。——第 645、646 頁。
- 提茨，弗里德里希·威廉 (Tietz, Friedrich Wilhelm 約生于 1823 年)——德國裁縫，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1850 年同盟分裂後屬於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第 480 頁。
- 湯普遜，托馬斯·培倫涅特 (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庸俗經濟學家，自由貿易派。——第 408 頁。
- 富爾德，阿希爾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國銀行家和政治活動家，奧爾良派，後成為波拿巴主義者，1849—1867 年曾多次任財政部長。——第 163、185、190、198 頁。
- 瓊斯，威廉 (Jones, William 約 1808—1873)——英國鐘表匠，憲章主義者，1839 年威爾士礦工起義的組織者之一；被判終身流放澳大利亞。——第 396 頁。
- 瓊斯，厄內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s 1819—1869)——杰出的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無產階級詩人和政論家，憲章派左翼領袖之一，“北極星報”編輯之一，“寄語人民”和“人民報”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第 393—397、399、441、556、642、643、645 頁。

十三画

- 路德，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動家，德國新教 (路德教) 的創始人，德國市民階級思想家，在 1525 年農民戰爭時期，站在諸侯方面反對起義農民和城市貧民。——第 121、369、491 頁。
- 路易斯，喬治·康瓦爾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財政部秘書長 (1850—1852)，1855—1858 年任財政大臣，內務大臣 (1859—1861) 和陸軍大臣 (1861—1863)。——第 407 頁。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218頁。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227頁。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8頁。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第122頁。
-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37、127、128、132—134、139、141、147、159、161、173、194、195、197、198、216、256、305、555、605頁。
- 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 Philippe Albert)——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第193、194頁。
- 路特希尔德,安瑟倫(Rothschild, Anselm 1773—1855)——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第22頁。
- 路特希尔德,拉約涅尔(Rothschild, Lionel 1808—1879)——男爵,倫敦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輝格党人,从1858年起为議會議員。——第597、610頁。
- 奧托,卡尔·烏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約生于1809年)——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241、242頁。
- 奧斯本——見貝尔納·奧斯本,拉尔夫。
- 奧普尔,阿尔丰斯·昂利(Hautpoul, Alphonse Henri 1789—1865)——法国將軍,正統主义者,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陸軍部长(1849—1850)。——第163、168、176—178頁。
- 奧古斯特(Augustus, Gajus Julius Cä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羅馬皇帝(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第586頁。
- 奧斯渥特,艾根(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逃离德国。——第324頁。
- 奧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師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領袖。——第320、410頁。
- 奧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經濟学家和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柏林“改革报”編輯之一,1849—1850年流亡;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15、337、355、356、362、372、377頁。
- 奧尔斯瓦特,魯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与資產階級相接近的自由貴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第80頁。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140、149、191、192、194、195、216、225、226頁。
- 奧古斯滕堡家族——什列斯維希-霍尔施

坦公爵家族(1627—1852)。——第 335 頁。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倫堡-施維林)(Orléans, d', (Hélène Louise Elisabeth) Duchesse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 133、162 頁。

雷尼奧·德·圣让·丹热利,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納(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ély, Auguste-Michel-Etienne 1794—1870)——伯爵,法国將軍,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曾任陸軍部長(1851年1月),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 185 頁。

雷繆扎,沙尔·弗朗斯瓦·瑪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 Marie 1797—187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奥尔良派,曾任內务部長(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外交部長(1871—1873)。——第 186 頁。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第 586 頁。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第 593 頁。

塞万提斯·德·薩維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偉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19、77、332、336、366 頁。

瑟美列,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曾任內务部長(1848)和革命政府首腦(1849);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

利。——第 601、621 頁。

塔西佗(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約 55—120)——著名的羅馬历史学家。——第 327、586 頁。

十四画

維斯(Wiß, C.)——德国医生和記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流亡美洲。——第 351 頁。

維隆,路易·德吉烈(Véron, Louis-Desiré 1798—1867)——法国記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主。——第 227 頁。

維利提(Verity, E. A.)——英国教士。——第 613 頁。

維萊尔,让·巴蒂斯特·賽拉芬·約瑟夫(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54)——伯爵,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統主义者,曾任內閣首相(1822—1828)。——第 196 頁。

維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軍官,社会主义者,倫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員会委員;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第 342 頁。

維利森,威廉(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普魯士將軍和軍事理論家;1848年任王室駐波茲南專員,1850年統率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軍隊对丹麦作战。——第 363 頁。

維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因政治

-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站在北軍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57、291、339、340—343、347、351、362—368、372—377、379、464、466、468—470、472、476、479—481、488、520、521、525—528、635、639頁。
- 維干德，奧托 (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家和书商；在萊比錫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1848—1849年曾参加薩克森的革命运动。——第312、314頁。
- 維达尔，弗朗斯瓦 (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經濟学家，小資產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書記，立法議會議員 (1850—1851)。——第169頁。
- 維尔穆特 (Wermuth)——汉諾威警察厅长，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证人；与施梯伯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464、491、509、519頁。
- 維埃伊拉 (Vieyra)——法国上校，1851年任国民自卫軍总部长官；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157頁。
-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551、581頁。
- 維利尔斯，查理 (Villiers, Charles Pelham 1802—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貿易派，議會議員。——第537、557頁。
- 維斯康蒂侯爵——見阿尔康納蒂·維斯康蒂，康斯坦扎。
- 福适，萊昂 (Faucher, Leon 1803—1854)——法国資產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馬尔薩斯派經濟学家，曾任內务部长 (1848年12月—1849年5月，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69、190、195頁。
- 福倫，奧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維希 (Follen, August Adolf Ludwig 1794—1855)——德国政論家和詩人，曾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1815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年流亡瑞士。——第321、326頁。
- 福格特，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資產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攝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第103頁。
- 福克斯，威廉·約翰遜 (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傳教士，政論家，自由貿易派，后来屬于自由党，議會議員。——第408頁。
- 福隆德，維克多 (Fronde, Victor)——法国軍官，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流放阿尔及利亚，后流亡比利时。——第594頁。
- 赫斯，莫澤斯 (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資產阶级政論家，四十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維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薩尔的拥护者。——第525頁。

赫克,路德維希(Heck, Ludwig 約生于1822年)——不倫瑞克的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0年同盟分裂后屬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第480頁。

赫德,弗兰西斯(Head, Francis 1793—1875)——英国殖民地的行政官,旅行家和作家。——第228頁。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海軍部秘书长(1841—1845),軍务大臣(1845—1848和1852—1855)和陆軍大臣(1859—1860)。——第410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1848年为制宪議會議員。——第157頁。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126、262、265、266、271—273、281、296、354、534頁。

蒙克,乔治(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將軍和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176頁。

蒙塞耳,威廉(Monsell, William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議會中爱尔兰党团的領袖之一;1852—1857年为軍械局秘书。——第556、558頁。

蒙塔郎貝尔,沙尔(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

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奥尔良派,天主教党的首領;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第186、196、222頁。

豪格,恩斯特(Haug, Erns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地利軍官,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流亡英国,“宇宙”周报的編輯之一。——第325、343—350、372、373頁。

豪克,路德維希(Hauk Ludwig 1799—1850)——奥地利軍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維也納起义和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敗后被杀害。——第346頁。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約生于1831年)——德国店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訊期間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釋放,逃往巴西。——第525頁。

察貝尔,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自由主义政論家,柏林“国民报”的編輯(1848—1875)。——第354頁。

十五画

摩萊,路易·馬蒂約(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派,曾任总理(1836—1837, 1837—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第168、196頁。

摩干,弗朗斯瓦(Mauguin, François 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革命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領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

- 是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傾向于右翼議員。——第 179、180 頁。
- 摩爾根，亨利 (Morgan, Henry 死于 1853 年) ——英国制針工人。——第 566、567 頁。
- 摩耳斯沃思，威廉 (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 ——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派，議會議員，曾任公共工程大臣 (1853) 和殖民大臣 (1855)。——第 556—558 頁。
- 魯艾，欧仁 (Rouher, Eugene 1814—1884) ——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曾任司法部长 (1849—1852 年間断地)；第二帝国时期担任过許多国家职务。——第 179、180、190 頁。
- 魯卡斯，弗雷德里克 (Lucas, Frederick 1812—1855) ——爱尔兰記者和政治活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領袖之一，議會議員。——第 559、591 頁。
- 魯瓦埃-科拉尔，比埃尔·保尔 (Royer-Collard, Pierre Paul 1763—1845)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 122 頁。
- 德·梅斯特尔，約瑟夫 (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 ——法国作家，保皇派，貴族的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死敌。——第 18 頁。
- 德拉·罗科 (Della Rocco) ——意大利流亡者，馬志尼的战友。——第 601 頁。
- 德穆兰，卡米尔 (Desmoulin, Camille 1760—1794) ——法国政論家，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第 122 頁。
- 德朗克，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德国政論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期間拥护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511—515、643、645 頁。
- 德弗洛特，保尔 (De Flotte, Paul 1817—1860) ——法国海軍軍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立法議會議員 (1850—1851)。——第 168 頁。
- 緬施科夫，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 ——公爵，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1853 年任駐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曾任俄国克里木陆海軍总司令。——第 630 頁。
- 劍橋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 ——英国將軍，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英国陆軍总司令 (1858—1895)。——第 397 頁。
- 賴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領袖之一，“改革报”編輯；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員，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 6、54、133、148、153、156、250、315、325、326、337—340、343、347、361—362、377 頁。
- 賴辛巴赫，奧斯卡尔 (Reichenbach, Oskar 生于 1815 年) ——伯爵，西里西亞

的地主，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從1850年起流亡英國，後來流亡美洲。——第343、362、368、371、379、527頁。

墨爾本子爵，威廉·拉姆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首相(1834和1835—1841)。——第583、584頁。

墨爾本子爵，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拉姆 (Molbourne, Frederick James Lamb 1782—1853)——英國外交家。——第586頁。

十六 画

鮑威爾，亨利希 (Bauer, Heinrich)——德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正義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職業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大利亞。——第635、641頁。

鮑威爾，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之一，資產階級激進派；1866年後成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278、306、309、315、326、327頁。

鮑蒂揚尼，拉約什(路德維希)(Batthyany, Ludwig 1809—1849)——伯爵，匈牙利國家活動家，匈牙利貴族自由派集團的代表人物；曾領導匈牙利政府(1848年3—9月)，執行與奧地利君主制妥協的政策；革命遭到鎮壓後被殺害。——第621頁。

穆爾，喬治·亨利 (Moore, George Henry 1811—1870)——愛爾蘭政治活動家，保障租佃者權利運動的領袖之一，議會議員。——第560頁。

穆罕默德-阿利 (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的統治者，曾實行過許

多次有利於埃及地主和商人的改革。——第573頁。

霍納，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國地質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曾任工廠視察員(1833—1856)，維護工人利益。——第420、561、562頁。

霍夫曼，恩斯特·泰奧多爾·亞馬多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德國作家，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他的作品中，現實的因素和幻想、神秘主義以及對認識的不合理性的宣傳糾纏在一起。——第272頁。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勃蘭登堡選帝侯(1415—1701)、普魯士國王(1701—1918)和德國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468頁。

諾馬耶，馬克西米利安·若爾日·約瑟夫 (Neumayer, Maximilian George Joseph 1789—1866)——法國將軍，秩序黨的擁護者，巴黎部队的司令(1848—1850)。——第176頁。

諾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 (弗里德里希·馮·哈丁堡的筆名)——德國作家，德國浪漫主義中反動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第270、274、277、279、282、285、293頁。

諾特萊克，彼得 (Nothjung, Peter 約1823—1866)——德國裁縫，科倫工人聯合會會員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451、461、462、468、469頁。

澤特，奧托·約瑟夫·阿爾諾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魯士法官，從1848年起任科倫檢察官，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起

訴人。——第 461、464、481、486、499、517、530—534 頁。

澤肯多尔夫, 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 (Seckendor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 ——男爵, 普鲁士法学家, 大法官; 1849 年是第二议院的議員, 属于中間派;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起訴人。——第 461、464、486、499、504、533、534 頁。

十七画

繆格, 泰奥多尔 (Mügge, Theodor 1806—1861) ——德国作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派。——第 354 頁。

繆拉特, 拿破侖·律西安·沙尔 (Murrat, Napoleon-Lucien-Charles 1803—1878) ——亲王,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拿破侖第三的堂兄。——第 414 頁。

謝特奈尔, 奥古斯特 (Schärttner, August) ——海瑙的制桶匠, 1848 年革命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倫敦, 開設小酒店, 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 为該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員。——第 339、353、527 頁。

十八画

魏斯, 約翰·哥特利勃·克利斯提安 (Weiß, Johann Gottlieb Cristians 1790—1853) ——德国演員和导演。——第 267 頁。

薩菲, 阿烏利奧 (Saffi, Aurelio 1819—

1890) ——意大利革命家和作家,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動家, 馬志尼的战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流亡英国, 从 1872 年起领导意大利共和党。——第 625 頁。

薩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第 122 頁。

薩德勒, 約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 ——爱尔兰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議會中爱尔兰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3 年任財政副大臣。——第 556、558、560、569、587 頁。

薩默斯, 罗伯特 (Somers, Robert 1822—1891) ——英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記者。——第 576 頁。

薩尔万迪, 納尔西斯·阿希尔 (Salvandy, Narcisse Achille 1795—1856) ——伯爵, 法国作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曾任教育部长 (1837—1839 和 1845—1848)。——第 194 頁。

薩兰德魯茲, 沙尔·让 (Sallandrouze de Lamornais, Charles-Jean 1808—1867) ——法国工业家, 制宪議會議員 (1848—1849);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第 209 頁。

薩特倫德公爵夫人, 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魯森-高尔 (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1806—1868) ——苏格兰的大地主, 輝格党的活动家。——第 569、570、575、576 頁。

薩特倫德伯爵夫人, 伊丽莎白·魯森-高尔, 斯泰福侯爵夫人, 1833 年起为公爵夫人 (Sutherland, Elisabeth Leveson-Gower, Marquise Stafford,

Countess 1765—1839)——侯爵夫人，1833年起为公爵夫人，苏格兰的大地主；斯泰福侯爵之妻，是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魯森-高尔·薩特倫德的婆婆。——第 573—576 頁。

薩克森的摩里茨 (Moritz von Sachsen 1696—1750)——法国元帅，原籍德国，爭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1—1748)的参加者；写过一些軍事理論著作。——第 308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倫敦出版。——第 387、397、399、404、411、426—428、430、432、505、556、576、623 頁。

三 画

“卫报”（《*The Guardian*》）——倫敦出版。——第 433、434 頁。

“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Der Matkäfer, 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波恩出版。——第 279 頁。

“太阳报”（《*The Sun*》）——倫敦出版。——第 565 頁。

四 画

“手术刀”（《*The Lancet*》）——倫敦出版。——第 418 頁。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尔出版。——第 339 頁。

“不来梅每日紀事”（《*Bremer Tages-Chronik*》）——第 325、337、338 頁。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第 361、377 頁。

“文艺論壇，文学、科学和艺术問題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倫敦出版。——第 630 頁。

五 画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塞腊姆普尔出版。——第 421 頁。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356 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227 頁。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第 315、317 頁。

“北安普頓信使报”（《*Northampton Mercury*》）——第 566 頁。

“加利福尼亚国家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旧金山出版。——第 642、643 頁。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布魯塞尔出版。——第 594 頁。

六 画

“年鉴”（《*Jahrbücher*》）——見“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宇宙”（《*Der Kosmos*》）——倫敦出版。——第 299、347—349、352 頁。

“观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版。——第 411、430、505 頁。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曼彻斯特出版。——第 556 頁。

- “先驅”(《*The Leader*》)——倫敦出版。
——第315、430、505、601頁。
- “先驅報”(《*Herald*》)——見“先驅晨報”。
- “先驅晨報”(《*The Morning Herald*》)——倫敦出版。——第433、439、551、556、569、581頁。
- “西美周刊”(《*Westamerikanische Blätter*》)——第359頁。
- “自由人報”(《*The Freeman's Journals*》)——都柏林出版。——第557、559頁。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倫敦出版。——第436頁。
-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紐約出版。——第321、337、338、348—351、361、367、377、379頁。

七 画

- “快邮报”(《*Schnellpost*》)——見“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313頁。
-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form. 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柏林出版。——第313、314頁。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237、239、411、428—430、434、435、551、556、583、585、601、610、621、625頁。
- “每周快訊”(《*The Weekly Dispatch*》)——倫敦出版。——第244頁。
- “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424頁。

八 画

- “国家报”(《*Staatszeitung*》)——見“紐約国家报”。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132、133、140、141、170頁。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508頁。
- “国民議會报”(《*L'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194頁。
- “国民議會通报”(《*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巴黎出版。——第205頁。
- “波恩报”(《*Bonner Zeitung*》)——第286頁。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508頁。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第602頁。
-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588頁。

九 画

- “紀事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344、411、435、530、551、569、601頁。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格斯堡出版。——第116、311頁。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143、173、184、185、188、210、594、621頁。
- “革命”(《*Die Revolution*》)——紐約出版。——第117頁。
- “建筑师”(《*The Builder*》)——倫敦出版。——第630頁。
-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 116、257、316、320、349、350、431、481、
495—497、508、514—515、519、530 頁。
“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第 307 頁。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第 18 頁。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巴黎出版。——第 132、208、621 頁。

十 画

-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
——第 339—342 頁。
“記事报”(《*The Tablet*》)——倫敦出版。
——第 559 頁。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
版。——第 411、430、505 頁。
“通訊員”(《*Correspondent*》)——見“德国
通訊員”。
“家常話”(《*Household Words*》)——倫敦
出版。——第 298 頁。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
版。——第 241、244、341、403、411、
429、430、448、530、551、553、560、562、
577—579、582、587、597、603、628—629
頁。
“高尔威信使报”(《*The Galway Mercury*》)
——第 618 頁。
“紐約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
tung*》)——第 350、361 頁。
“紐約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
Zeitung*》)——第 646 頁。
“紐約德文周报”(《*Wochenblatt der New-
Yorker Deutschen Zeitung*》)——第 367
頁。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3、7、64、387、397、

404、411、415、423、428、437、442—444、
450、456、544、545—546、552、558、568、
576、584、592、598、608、615、623、631
頁。

- “紐約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的報紙”
(《*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 heraus-
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
——第 361、377、379 頁。
“倫敦新聞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第 298、355 頁。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Le Pro-
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
selle*》)——巴黎出版。——第 325 頁。

十 一 画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倫敦出版。——第 316、430—432、445、
448、505、519、551、556、577、583、587、
621 頁。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倫敦
出版。——第 435、551、621、625、627 頁。
“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
倫敦出版。——第 245、253 頁。
“陶工自由报”(《*Potteries Free Press*》)
——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出版。——
第 630 頁。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
tung*》)——第 321、354 頁。
“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見“观察家时报”。
“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
don Charivari*》)——第 630 頁。

十 二 画

- “晚邮报”(《*Abend-Post*》)——柏林出版。
——第 293、356 頁。
“湖滨小报”(《*Seeblätter*》)——君士坦士

出版。——第358頁。

“普魯士石印通訊”(《*Preussische Lithograf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370頁。

“普尔和多尔塞特郡公报”(《*Poole and Dorsetshire Herald*》)——第400頁。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20頁。

十三画

“新聞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170、638頁。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14、356、429、602頁。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75、103、111、507、510頁。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版。——第198、202、399、401、408、416、417、425、565、568、582—584、617、620頁。

“奧地利通訊”(《*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維也納出版。——第627頁。

十四画

“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第425、436、440頁。

“維也納日报”(《*Wiener Zeitung*》)——第68、599頁。

十五画

“論壇报”(《*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壇报”。

“德意志”(《*Deutschland*》)——斯特拉斯堡出版。——第330頁。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311頁。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最初在曼海姆，后来在巴塞尔出版。——第303—306、324、325、339、344、348頁。

“德国旁观者。續刊”(《*Deutscher Zuschauer. Neue Folge*》)——曼海姆出版。——第303頁。

“德国通訊員”(《*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巴尔的摩出版。——第361、378、379頁。

“德意志总汇报”(《*Allgemeine Deutsche Zeitung*》)——紐約出版。——第361頁。

“德意志倫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305、322、348頁。

“德意志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紐約出版。——第351、370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萊比錫出版。——第306、307、310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306、307頁。

十七画

“賽馬新聞”(《*Racing Times*》)——倫敦出版。——第630頁。

二十画

“警钟报”(《*Wacker*》)——見“巴尔的摩警钟报”。

譯 后 記

本卷所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在柯伯年同志的譯文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英文版重新校訂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譯文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德文原著重新校訂的；这篇著作的标题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旧譯为“拿破侖第三政变記”或“路易·波拿巴政变記”。我們根据原著标题譯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因为：第一，原著标题如此，第二，法国共和历的霧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侖·波拿巴（即拿破侖第一）举行政变的日子，而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侖第三）举行政变的日期是1851年12月2日，馬克思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这个标题是为了表示这次政变不过是拿破侖·波拿巴政变的拙劣的翻版；为了便于讀者查閱，我們在本卷目录中附上了旧譯的标题。本卷附录中的“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曾根据年代順序移到第七卷的附录中，但因这份會議記錄与本卷內容也有直接联系，所以在本卷附录中仍旧保留下来。

本卷在譯校过程中，承北京大学張俊彥同志提了很多寶貴意見，謹向他表示感謝。